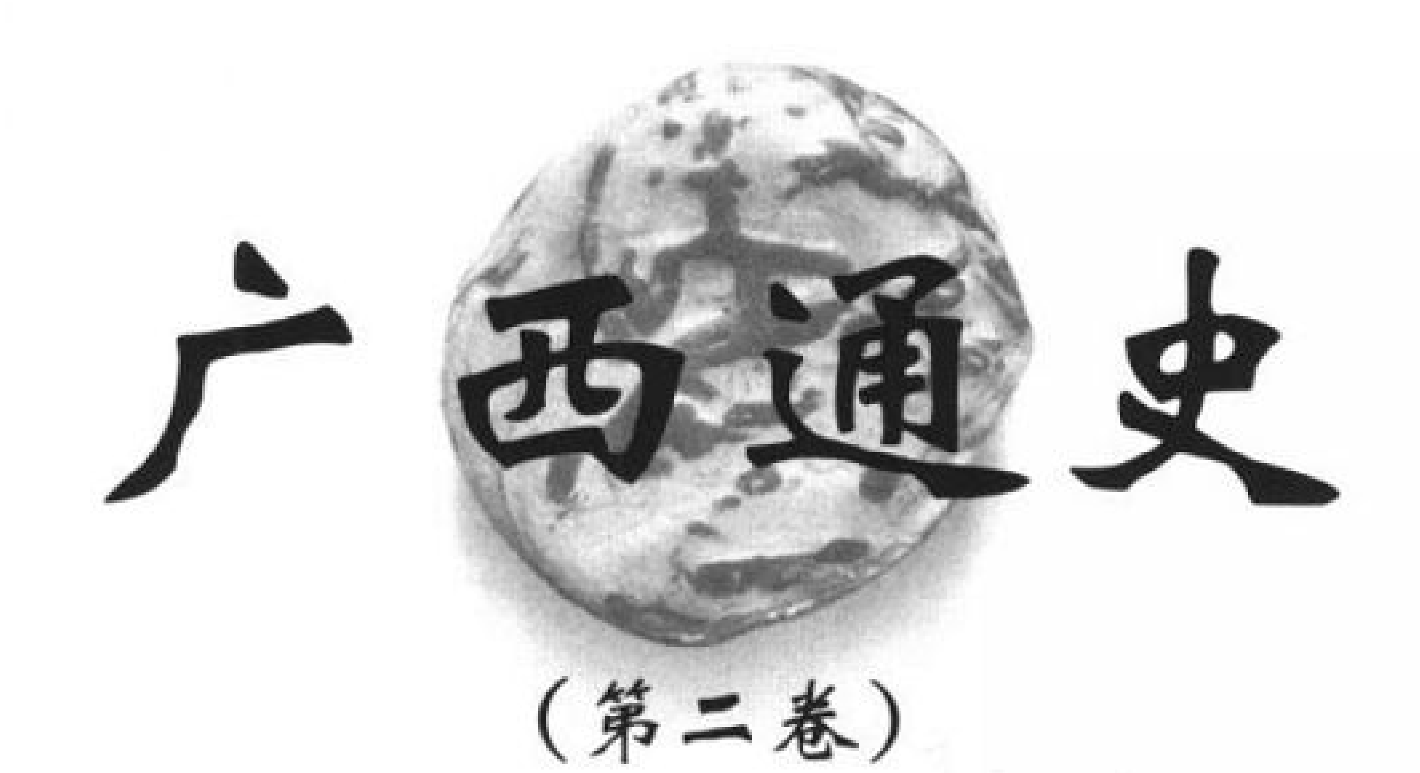
GUANGXI TONGSHI

广西通史

（第二卷）

钟文典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通史

（第二卷）

主　编

钟文典

本卷著者

钟文典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曹光哲　李庭华　马丕环
责任校对　蔡素琴
内文版式设计　鲍　翰
内文图片设计　马丕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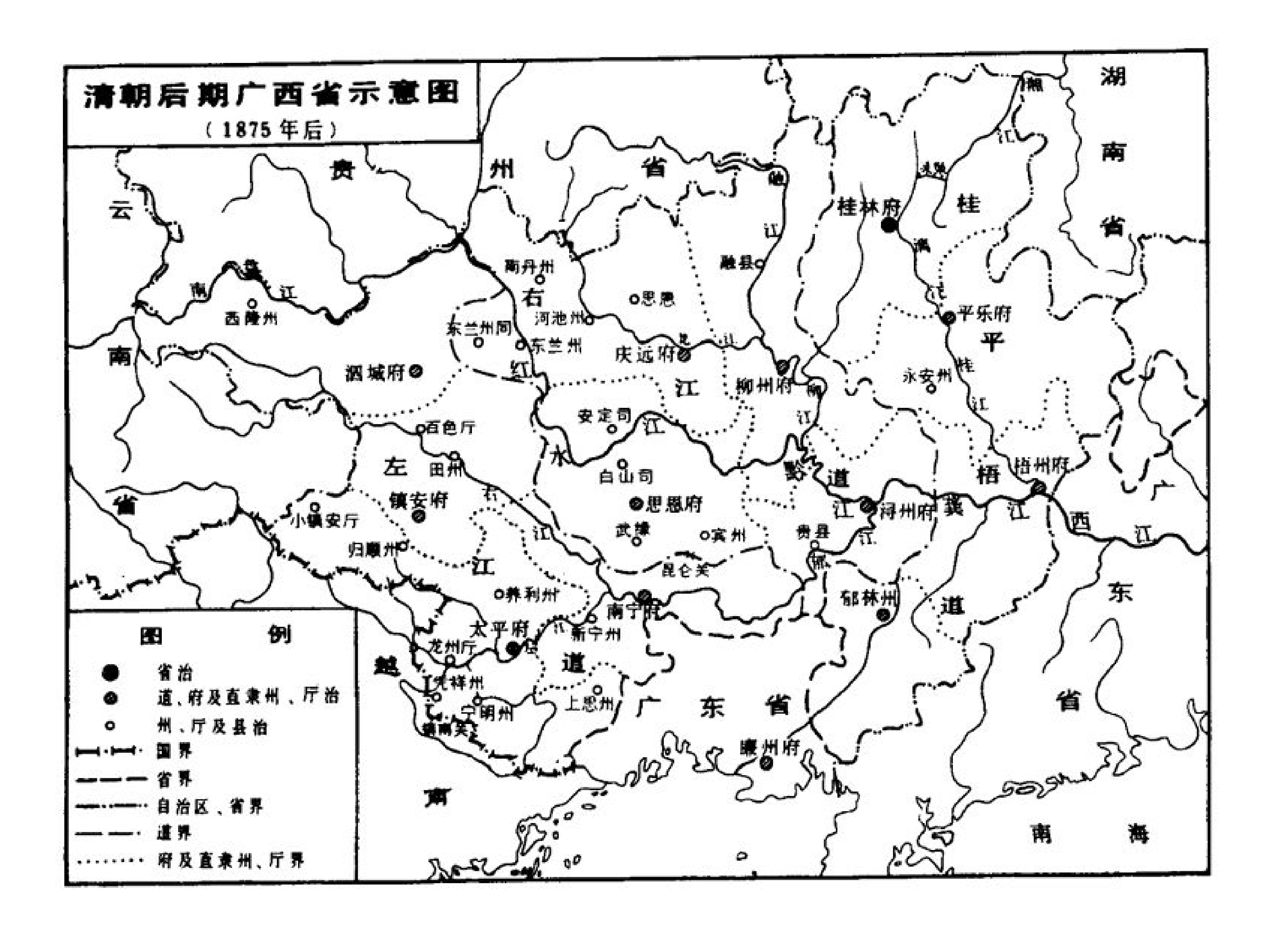
广西通史

（第二卷）

钟文典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24.75印张　619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3716-3/K·812　定价：130.00元（全三卷）



清朝后期广西省示意图
（1875年后）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夜的广西社会

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衰象毕露。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因这次战争而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①] 使我国封建社会逐步发生瓦解，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进入了它的近代史时期。

近代的广西社会，一般说来，如同全国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破坏下，也有一个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但是，由于广西地处边陲，大部分属于山区，长期处在分割和闭塞状态，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十分落后。所以，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的变化非常缓慢，大部分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变化。

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这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只有从这个基础出

---

① 主要的如：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增订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

发，对社会进行考察、研究，历史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我们在具体论述广西近代历史之前，有必要看一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

一、人口、耕地和农业

农业是自然经济的基础。要研究广西的社会经济，必须首先考察农业。而农业与人口、耕地以及耕作技术等有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探讨。

人口猛增，耕地日减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太平天国起义的200年间，广西的耕地面积始终徘徊在800万亩至1000万亩左右。各个时期的大概数字是：17世纪中期，即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全省耕地约500余万亩。经过康熙、雍正两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步发展。到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耕地面积增至1000万亩以上。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年，即嘉庆朝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社会动荡不安，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到了1851年（咸丰元年），全省耕地减至896万多亩。② 可耕土地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在小农经济时代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广西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出现了人口增长的一个大高峰和两个小高峰。根据统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②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60～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计，其具体增长情况是：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省人口为11.6万人。到了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省共有人口197.6万人。92年间，增加186万人左右。而自1753年以后，由于社会的相对安定，生产逐步发展，清政府严格整顿户籍，且在土司统治下的不少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入籍。加以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居民大量向广西迁徙，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到了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全省人口达629.4万人。33年间，净增人口431.8万人左右。出现了广西人口增长的大高峰时期。1787年以后，广西人口增长速度略有减缓。从1787年至1840年的53年间，只增人口133.9万人左右。1840年全省人口为763.3万多人。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11年间人口增长19万人，当时全省的总人口数为782.3万余人。①

具体到一个地区，也是如此。据地方志书记载：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145年间，庆远府属的宜山县人丁增加105倍，思恩县人丁增加115倍，河池州增人丁42倍，而天河县则由原额的280余人增至9.9万有奇，计增人丁350倍。究其原因，一是地方生齿日盛；二因“国初地广人稀，外籍迁进者日见其多”。②

应该指出，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人口普查和统计，所以上述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据此可以看到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200年间，广

---

①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只有纳赋“丁口”的统计，并无人口统计。1741年（乾隆六年）改用保甲造报户口，把每户的“大小男妇”都计算在内，自此始有人口统计。故此处所列顺治广西人口，是指纳赋的“丁口”。乾隆以后各朝广西人口的具体数字，均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9～10页。又罗尔纲先生的《困学丛书》第七种《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录有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全国各省人口的具体数字（中间有空缺），其中关于广西有关年份的人口数，与前列数字小有差别，特注明以供参考。《困学丛书》（上、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又：1661年的人口数疑为户口数。一说当年广西人口为58万余人。

② 杨家珍撰：《天河县乡土志》，《户口·汉户》。

西人口增长的大致趋势。

人多地少，矛盾重重

人口迅猛增长，而可耕土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毁弃不少。人口增长与耕地提供严重失调，势必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一，人均耕地锐减。

如按上述的广西人口与耕地平均计算，则17世纪中期，即清顺治年间，广西人均耕地可达14亩左右。到了18世纪中期，即乾隆前期，人均耕地减为5亩左右。到了同世纪80年代，即乾隆后期，人均耕地锐减至1.5亩左右。而19世纪中期，即太平天国起义之年，人均耕地不及1.2亩，仅为200年前人均耕地的十二分之一！也远比不上同时期全国人均耕地1.78亩之数！[①] 这种人均耕地的数量，是远远不能维持一个农民的基本生活的。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人估计："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说明每人需有3.3亩至5亩，平均4.25亩的耕地始能维持生计。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据贵州学政洪亮吉的估算，认为"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得生计矣"。罗尔纲根据解放前中国南、北方生产力的水平也做过估算，认为中国每人需有3亩土地始可维持生活。[②] 美国人贝克（O.E.Barker）也认为：中国北方农民需有4亩耕地，南方农民需有3亩耕地，始能维持生活。[③] 19世纪前期广西人均耕地不及1.5亩，说明当时广西所有的耕地只能勉强养活全省人口的半数而已！

土地对人生的关系如此重大。人多地少，激起人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这就必然造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土地的兼并和垄断。

---

①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0、60页。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见《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北京，三联书店，1995。其余参看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2）。

③ O. E. Barker,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4.1927。

自然经济既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施政的原则。土地不愁水火，不怕盗贼；而且在农奴制度时代，“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①] 占有土地的多寡，往往和权势的大小联系在一起。因此，土地占有实乃封建社会的核心问题。



清道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贵县北山里陆正钟等10村30户农民卖断田房山林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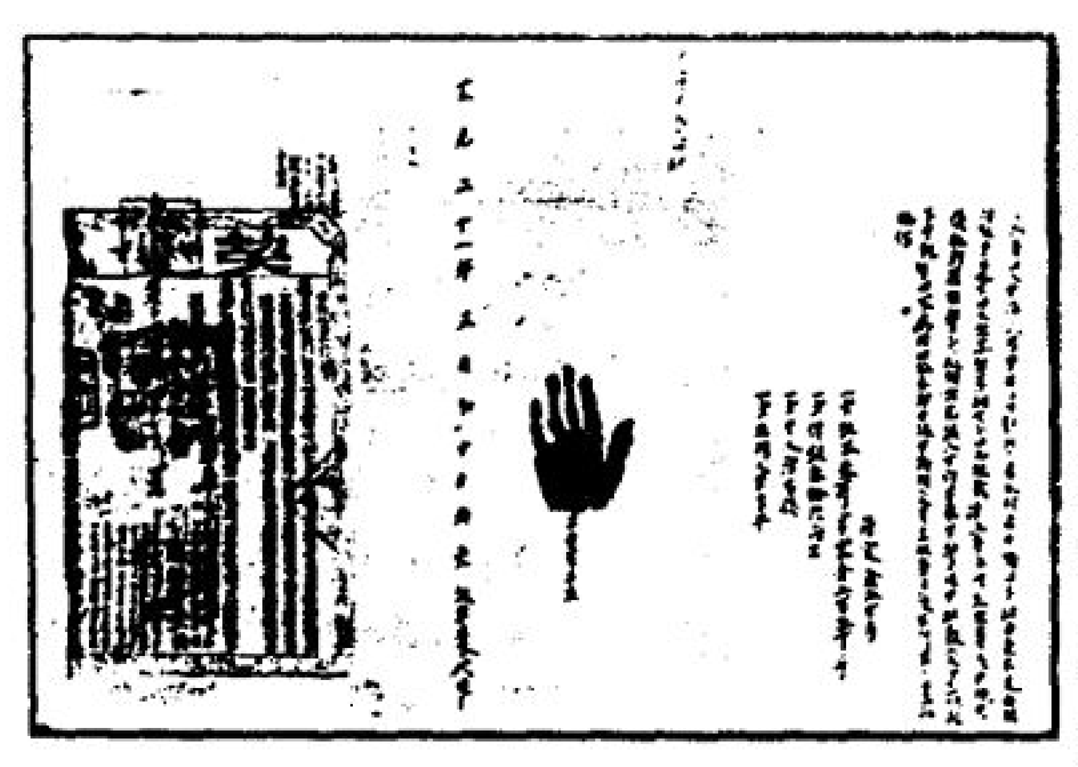
19世纪前期的广西，封建地主个人占有土地虽不及两湖、两江或华北各地动辄以千顷、万顷以至数万顷之多，但地主阶级和农民占有土地的悬殊，却是十分突出的。具体的情况是：全省绝大部分的耕地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富户手中，而80%以上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的耕地。[②] 尤其是西江沿岸的梧州、浔州、南宁三府和郁林直隶州所属的各个州县，地主、富农对耕地的兼并、垄断尤为严重。[③] 故有“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的记载。[④] 这种状况，在广西其他州县也是存在的。

① 列宁：《给农村贫民》，见《列宁全集》，第6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② 参看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③ 参看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广西通志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一章，《革命前夜的广西社会》，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

④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食货中》，民国九年版。


清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贵县农民覃苏氏、覃黄升母子卖断祖遗田产契纸（内有孤儿覃黄升手模）

除了私人占地以外，在广西，还有大量以宗族名义占有的“族田”（或称祭祀田、蒸尝田、太公田等）；以寺庙名义占有的“寺田”、“庙田”；以及由官府直接占有的所谓官田、学田、屯田、兵田、没官田、堡兵田、首报田、抚化田等等。这些所谓“公田”，其实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在那些享有权势的官绅、地主手中，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特殊形式，其性质也特别复杂。

居总人口约百分之十的官绅、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而居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却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这种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又造成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

第三，封建租佃关系的紧张。

农民依靠耕作维持生计，除农业外少有可能从事别的工作。而人多地少，且大量耕地操纵在官僚、地主手中，农民为了生活，谋耕迫切。但田少人多，于是“抢佃”之风顿起。地主阶级则乘机抬高地租，加重对农民的盘剥。这种情况，在西江沿岸地区，早在18世纪40年代即见其端倪。请看1748年（乾隆十三年）的桂平《龙华寺实在租粮并田坵永远碑记》的记载：

> 寺庙之赖有租业，由来尚矣！……我浔郡名刹，惟西山龙华寺为最。租业虽颇裕，但宣二里永浩户粮米九斗三升，今每年只收租谷五千斤，相沿日久，其中或被势豪包占，或被佃户隐匿，无从稽查。迨乾隆四年，而各佃互相兴讼争耕，控府叩县，纷纷不一，蒙

批差役查勘，大小共得田五百七十八顷；造册缴验审明，着会首、寺僧公同另行招佃。林兆兰等因见田土宽广，共议加租谷三千斤。斯时有佃人常中等自愿承耕，新旧共租谷八千斤，向无异议。不意去春三月内，各佃又复争执致讼，蒙前县主郭着役清查……而各佃户又自愿加租，共增租谷三千七百七十斤，俱取有各佃承批耕帖存房，共额租谷一万一千七百七十斤，永为定式。[①]

上引《碑记》不但说明早在太平天国起义100多年之前，广西围绕土地问题出现了“势豪包占”或“佃户隐匿”的情况。而且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外地破产失业游民的大批涌进，农民因“争耕”而“兴讼”，被迫所谓“自愿加租”的情况已经发生。龙华寺的一份庙田，8年之间，增租6770斤，超过原租5000斤而有余！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乘人之危，增加租利，加重剥削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到了19世纪前期，西江一河两岸的许多州县，地租率普遍从“百种千租”增加到“百种二千租”左右。[②] 官僚、地主绝不会以单纯的地租剥削为满足。除此之外，还有：

第四，种类繁多的敲诈勒索。

广西虽然地处边陲，土地贫瘠，但因清朝财政以“量出为人”为原则，故广西地丁、米石、租课三项的田赋负担，其赋率反较其他肥沃省份为高。如与邻省广东相比，则“广东下等田赋额八厘一毫，米六合五勺；广西下等

---

① 1974年，我在桂平西山龙华寺访得此碑，拓片现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历史研究所。又据乾隆十八年六月十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档案）：广西田租，乾隆早期桂东南地区“俗例：每种一斗（约合一亩），还租一石二斗”。张联桂：《同心斋杂录》下录云：贺县“民间田租，上中之田，一亩收租谷一百四五十斤不等”。周诚之：《龙胜县志·田赋》云：上则田每亩收租谷九斗，中则田每亩收租谷八斗一升，下则田每亩收租谷七斗二升，奇零瘠薄之下则田，每亩收租谷六斗。

② 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一章。按：广西农耕，百斤谷种，可耕十亩之田。

田为二分四厘，米三升七合。今广东地味当优于广西，而赋额仅及三分之一”。[①] 而官府在征赋过程中，弊端百出。地富乘机敲索，农民苦不堪言。先说粮税，“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②]。贫者被迫出卖土地，富者常以“减写粮米”为成交条件，“故田去而粮犹存者，所在皆是。胥吏催征，止（只）知向原户粮是问，拘提拷比，受累无穷”。“乾隆以来，历年控诉，奚止千百”[③]?！清朝初年，规定制钱一串，作银一两。后因银日贵而钱日贱，南宁府属地方，催科者“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④]。

再看农民纳谷交租。农民“纳谷之时，数十百里肩担背负；及运至仓，书吏等又多索费用。虽极干圆洁净，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纳者。……及其收谷，又不止淋尖踢斛，并多斛外抛洒，以供仓中斗级等之肆攫，不准小民拾回颗粒。稍不满意，即为挂欠，令其补纳，大约完谷一石，其耗费已需至数石矣”[⑤]！永淳地方，农民向地主交租，往往也有类似情形。[⑥]

租税之外，捐纳亦重，官绅之于百姓，常是“旧捐既仰取不遗，新捐又日增不已”。由于官绅贪索无度，农民“几年之蓄，常败于一年之费”。贫民常因“钱粮难完，被迫逃亡”。结果，“一人走，家人邻右怕坐，亦与俱走，势必一村墟矣”！[⑦]

还有无穷的徭役征调。例如：在容县，“凡修建城垣、公署、刑狱，砖瓦灰石，派民供亿，而上司过境，勒派民夫，多至千数百名，枵腹守候，其苦

---

① 吴贯因：《田赋私议》，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3536页。

② 吕濬堃、范晋藩：《陆川县志》卷八，《经政类·赋役》。

③ 周寿祺：《平南县志》卷一一，《经政略·田赋》。

④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二，《食货志·田赋沿革二》。

⑤ 蒋良术、戴毓驷：《灌阳县志》卷二一，《艺文志上·奏疏》。

⑥ 黄天赐、陈尔训：《永淳县志》卷四，《田赋志·秋米田赋科则》。

⑦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八，《食货上·田赋》；卷三〇，《食货下·课税》。

异常”。“道光间……（差役）乘轿入乡，横索酒食、鸦片、夫脚等费用，多至数十千文”。[①] 在永安州（今蒙山县），此类“滥役民夫”的暴政虽然屡经禁革，但禁而不止。1827年（道光七年），“地方盘仓、解犯以及新旧官卸任往来，暨因公赴省及一切家故旧人等往来，陆路塘夫及水团纤夫，及采棘樊监，修葺后衙，陈村厂役各款，俱行票拨民夫。每次少则数十，多则百余名不等，阖州苦累难堪”。[②]

上述种种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佃耕之外，还得借贷。这又招来了另外一层可怕的剥削：

第五，敲骨吸髓的高利贷。

在广西，高利贷的名目繁多，经营者多是官僚、地主和富商。他们互相结托，彼此转化，同时伸手向劳动人民进行榨取。

高利贷的常见形式是当押[③]。根据统计，清嘉庆初年，广西全省由流官统治的55个州县，经官府立案征税的当铺共有175家，而小押更是充斥广大城乡，无法计数。[④]

上述的统计数字当然是极不完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浔州府即有当铺48家，其中贵县（今贵港市）18家，桂平县15家，平南县11家，武宣县4家。[⑤] 而临桂一县，经营典当业者有19家，[⑥] 苍梧一县有21家。[⑦] 1850年（道光三十年），庆远府生员莫子升等23人联名具状请求发兵剿灭陈亚贵起义，其中就有9人是兼营典当业的高利贷者。而仅在1850年的上半年，在宜

① 封祝唐、黄玉年：《容县志》卷二八，《旧闻志》。

② 邓文渊：《永安州志》卷二，《地志下·民夫》。

③ 当押，指当铺和小押，三年典断曰当，一年典断曰押。

④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六一，《经政略十一·榷税》。该志记乾隆十四年广西各厅、州、县典当177家。但实际统计，当年仅32个厅、州、县的典当即达176家。

⑤ 夏敬颐、褚兴周：《浔州府志》卷三一，《贡赋·典当》。

⑥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一七《经政志·榷税》。

⑦ 王栋：《苍梧县志》卷十，《食货志下·杂税》。

山、迁江、忻城土县和理苗分县各乡圩（不含县城），被陈亚贵“焚劫”的当铺就有12家。[①] 上述浔州一府，临桂、苍梧两县和庆远府属的部分乡圩的当铺，已经达百家左右，其他九府一直隶州许多州县、乡圩的当铺还未计算在内。说明当时广西的当铺远在175家以上。

典当一般按月计息，通常是月息2~3分。当铺老板以压价收当，而用高价勒赎或转卖“断当”的物品，从中掠取高额利润。群众形容当铺是“树大根深，吃尽万里之土”；说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是“吃人不吐骨头”。

实物的高利贷有谷花、糖花、猪花、鸭花……诸名目。谷花又称借青苗。指春播禾苗为抵押，春借夏还，利息高达50%至60%。如延至秋收再还，则本利计息。故俗有“惯惯熟熟，一石石六；晚造归还，再加九六”之说。其他如糖花、猪花、鸭花等等，其借贷及归还情况与谷花类似。

现款借贷，朘削更甚。往往以月或以日计算利息。故有“雷公轰”或“九出十三归”诸名目。通常是借银一两，实得九钱。如以三分计息，则需偿还一两三钱之多。农民为救燃眉之急，明知榨取太过，也只好忍气吞声，徒呼奈何?！许多破产失业的农民无法在平原大峒佃田、借贷，被迫放弃本来已经十分落后的牛耕耜耨，向深山老林转移，谋求那种原始的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如同林则徐在《回疆竹枝词》写的：

不解耘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
幸多旷土凭人择，歇它两年种一年。[②]

但是，广西的山岭虽多，却多被土官、山主所占有。人民纵欲深居山僻，刀耕火种，也难得自由择耕之土，逃脱封建土官与山主的剥削！

总之，高利贷的盛行，是农民破产、农村凋敝的反映。它和封建的租税、徭役，像锋利的刀子插在人民的身上，给广西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带来重重

① 据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附莫子升等呈》，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林则徐诗钞》卷上。

灾难，也直接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就是19世纪中叶广西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的内部原因。

二、工业、矿业、商业

所谓“自给自足”经济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为百业之本。封建统治者不但“重农抑商”，而且视工、矿技艺为奇技淫巧，由是工矿业受压制，商业不能发展。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原因，广西的工业素来落后。自然经济的“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民既做“牛郎”，又当“织女”，一身而二任。除粮食自耕自吃，衣着自种棉麻，自己纺织解决外，日常“凡田间所需，多以农隙自行修造，外如石工、木工、竹工、铁工，非习之不熟者，亦皆以力穑之家，兼营其业。妇女则中馈饷耕，采樵汲水，陆居者更力作田亩。每日黄昏，则纫麻出棉（绞棉条成纱），夜分乃息。农事既毕，机声轧轧，与小儿啼笑之声相杂”①。贵县农民，耕作之外，“妇女织布自染自舂，秋深砧声四起，丁冬可听”②。这就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应该指出，这种美妙的、真正“自给自足”的小农田园诗画，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即使在某些地区出现，也仅是个别现象，而且难以稳定。所谓“自给自足”，绝不意味着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农民能够自己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是说他们谋取生活的方式，一切都是依靠自己动手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纪政·食货中·民业》。

② 龚政、梁崇鼎：《贵县志》卷二，《社会·生活状况》。

去解决。他们不习惯从事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没有能力仰求市场的供应。因此，往往是压低自己的生活需求和水平，去适应所谓“自给自足”的生活。一户农家，祖孙几代，先后同穿一件衣衫，共用一床棉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①] 当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生活需要的时候，总是以自我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直到拆屋荡产，卖妻鬻子，家破人亡。这也是工业不能发达，商业无由兴旺的原因。

手工纺织、造纸和榨油业

19世纪前期的广西工业，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手工棉麻纺织、造纸和榨油业。

棉麻纺织是广西传统的手工业。这从考古和历史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19世纪前期，许多著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棉麻织品仍在继续生产，并且畅销各地，深受人们的欢迎。要者如：纤维细长坚韧、色泽光洁的贵县苎麻夏布；凉爽离汗、轻薄非常的邕州麻练子；价值昂于丝绸的古冈州麻布；质厚而色美的瑶区染色棉布以及色白如雪、布重而绵厚的桂布等等。桂布又称桂管布，即俗称之家机布。这种棉织土布，19世纪前期，成了各地皆有生产的民间主要衣着用料。前引农妇“每日黄昏，则纫麻出棉，夜分乃息……机声轧轧”，以及贵县农家“妇女织布自染自舂，秋深砧声四起，丁冬可听”的景况，也是19世纪前期西江流域各地棉麻纺织业发达的写照。而柳江上游的融县，“棉布各区皆有，或絮被袄，或用手工纺织土布巾帨。清代，东区四顶、沙子、桐木等村及南区牛岭，土布甚好”。[②] 来宾县

---

① 1951年，我参加北京四大学土改工作团到广西柳城、鹿寨两县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多次看到贫苦农民指着祖孙几代人用过的破袄败絮诉苦。柳城县上雷乡岸浦屯一位壮族雇农，指着一件祖孙三代接替穿用的、补得已经走样了的破袄悲愤地诉说：“千补万补亏我补，穿件衣衫像鱼鳞；麻线拆来有四两，破布拆来有四斤。”

② 龙泰任：《融县志》第四编，《经济·物产》。

的壮汉族人民，种棉及棉纺织业也很普遍。据“父老言：乾隆、嘉庆间，南北两地产棉最盛，织机纺车，往往声相闻”。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光绪初年，犹仿佛昔日景象”①。

广西的棉麻纺织业，虽然历史久远，但生产工具落后，全靠手工操作。而一般农家织出的布匹，主要供给家用，投放市场的甚少，同样反映了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性质。

再看造纸业。广西地方盛产各种青竹，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早在17世纪后半期，即清康熙年间，就有福建和广东潮州的造纸工匠来到容县，“创纸蓬于山中”。当时，容县一地，即“有蓬百余间，工匠动以千计”。② 福建工匠教制的纸，称福纸。每槽需用“司役五、六人，岁可得百余令。至乾隆间，多至二百余槽。如遇荒年，借力役以全活者甚众”。③ 稍后，桂北融县、桂东昭平县等地的造纸业亦甚发达。融县出产有全料纸、东纸及复纸等品种。④ 昭平产品以竹纸为主。⑤ 纸张成了各地出口的大宗商品。

造纸靠手工操作，工艺虽为土法，但比较复杂、费时，其方法是：“于三月间择笋之出箨未老者，割裂成片，浸人灰砂池内，长短依池度为限，每铺竹一列，用石灰撒匀，第二、三、四各列皆如之。上用石及茅草压盖，历四十日取出，剥去外皮，洗去黑水，再浸四十日，践踏使溶成糊状，煮白梵木叶或竹胶叶等水和人。如取纸色白者，加白胶泥少许，另过小池，以纸帘人池捞取纸糊荡漾满帘，抛起滤去水分，纸以成张，然后铺贴于藏火复壁烘之使干，遂成竹纸。”⑥ 也有用碓礦代替用脚践踏，“使纤维绒细”，并用日光晒干纸页的。⑦

---

① 翟富文：《来宾县志》下编，《食货二·农工商业》。
② 史鸣皋：《梧州府志》卷三，《舆地志三·物产》。
③ 封祝唐、黄玉年：《容县志》卷六，《舆地志·物产下》。
④ 龙泰任：《融县志》第四编，《经济·物产》。
⑤ 李树枏等：《昭平县志》卷六，《物产部·制造物》。
⑥ 李树枏等：《昭平县志》卷六，《物产部·制造物》。
⑦ 龙泰任：《融县志》第四编，《经济·物产》。

上述的造纸方法，虽然仍是土法手工生产。因为每槽需有工匠、司役数人协作，就不是家庭手工业生产，而属于手工业作坊或手工工场的生产了。其产品主要不是家用，而是投放市场，因而也就明显具有商品经营的性质。

此外，利用农、林产品为原料进行手工加工的，如桐油、茶油、桂油、茴油等。19世纪前半期，在广西的恭城、龙胜、平南、容县、龙州、天保（今属德保县）等地，已经相当发达，而且成为有名的土特产品投向市场。

矿产采炼和火药加工

广西矿藏丰富，种类也多，其中如金、银、铜、铁、锡、铅等矿，也有较长的开发历史。早在宋代，南丹即有土民从事锡、铅矿的开采和冶炼，逐渐成为当地居民谋生的重要门路。为了管理和征税，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隶属于河池州。元、明以后，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和福建各省挟资前来开采者不乏其人。至有不少公馆、会所之设。清初，南丹矿业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727年（雍正五年），广西提督田畯在《陈粤西矿厂疏》中说："细访矿厂情形，富者出资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惟利是图。……无所底止。"① 正反映了这种经营的性质。其他如贵县银矿，富川煤矿等，也有较早的开采历史。而开采较多的，则是铜、铁、银、铅四种。据清代矿课钱法档案，历朝会典、事例、则例，各地方志书以及有关官私记载整理，从1644年（顺治元年）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广西报开的各种矿产共有127厂，中途停开者111厂，到了1838年，仍在开采的只有16厂，其具体情况如下表：②

---

① 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

② 参看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清代矿厂统计·各省矿业情况》。原表统计顺治元年至道光十八年广西报矿厂为126，停办矿厂为111，在开矿厂为15。今据光绪十八年刻羊复礼之《镇安府志》卷十六《矿厂》云：镇安硫磺矿于雍正、乾隆、嘉庆各朝"屡有开采，所得备作军需"。此条彭书漏计，故补人。是以广西报开厂数应为127，停开数为111，道光十八年在采数应为16。

矿名	报开厂数	停开厂数	在开厂数
铜	31	31	
铅	29	29	
铁	26	17	9
金	3	3	
银	13	10	3
银铜铅	7	7	
锡	8	6	2
水银	1	1	
煤	2	2	
硝	3	2	1
雄黄	3	3	
硫磺	1		1
合计	127	111	16

由此可以看到：自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190多年间，广西报开的各类矿厂不少，仅次于云南、广东而居全国第三位。但到了1838年，在采矿厂数为16厂，列全国第五位。① 此后，清政府以所谓“期于民生国计，两有裨益”，三令五申各地加紧开矿，“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其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朕亦不为遥制”。② 表明对开矿采取放任态度。但新开矿厂仍旧不多，广西亦只有永宁州崇庆铁矿，北流县铁矿及恭城县铁矿等几处而已！③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清代矿厂统计·各省矿业情况》。

②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谕。见王先谦：道光朝《东华续录》卷五八。

③ 参见道光朝《东华续录》卷四八、四九、五二。

广西的采矿业为何发展不起来？

采矿既有官采，也有私人投资开采。无论是官采还是私挖，皆因科学技术落后，故从识矿、开采、冶炼直至运输都困难重重。即以探矿而论，不是利用科学探测，而是依靠神仙赐予。故于找矿，“矿商必具牲醴，鼓乐采仗，以虔求于山之神。而应者，寻获砂苗，一掘即得；罔应者，砂苗随失随现，转寻转远，屡易其处，至于千穴万孔，累月穷年，而卒不得正引之所在”。①采矿全靠手工操作，技术水平甚低，生产效益极微，要想获利，实不容易。苍梧县芋荚山金矿，从雍正间（1723～1735）开采，“因出砂微薄，不敷工本”，结果是旋开旋闭。② 苍梧金鸡山，河池州响水，恭城县四头山、山（一作上）斗冈以及阳朔县石灰窑等地的铜矿，因为矿藏“原非旺盛”，出砂微薄，“无垅口可采”；或因“垅老砂残”，矿商无利可图；或因“资本无多”，经营困难，所出不敷工本，故时有封闭。③ 清王朝虽说对采矿“不为遥制”，而各级地方官府却常恃势与矿商争利。“官吏因缘为奸”，或对矿业开采实行各种控制、干扰政策，更是造成采矿业不能兴旺发达的原因。④ 如清政府对矿产实行二八或三七抽课，作为“国家定例”，课外余铜，则由官府给价收卖，“以供鼓铸”。矿商无权处理产品，而官给铜价太低，无利可图，甚或造成亏累。这种种刁难抑制，使矿商“势必告退而后已”。⑤ 更有以各种借口，实行官府垄断，任意禁止私人投资开采的。镇安府的硫磺矿，就是明显的例子。嘉庆朝以后，清政府以硫磺乃“军需所关，不便私采；且恐阑出交夷，遂议定官采，严私挖之议”⑥。

当然，也有个别人凭借“地利”、“人和”，经营采矿而发了大财的。例

---

① 沈日霖：《粤西琐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二。

② 史鸣皋：《梧州府志》卷九，《盐榷·榷税》。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广西的铜矿业》。

④ 参见道光朝《东华续录》卷四九，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谕。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广西的铜矿业》。

⑥ 羊复礼：《镇安府志》卷一六，《经政志一·矿厂》。

如：贵县北山里人覃奉璋，在道光年间招工百余名，开采平天山银矿，5年之间，获利40余万两，成了贵县靠开采银矿发家的第一号人物。① 这在广西的采矿业中，可说是罕有的。

随着矿产的开采，冶炼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铁矿为例，据统计：从1753年（乾隆十八年）到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的60多年间，广西商人经营冶铁工场，报告州县有档案可查的，少者之年8个，多者之年12个；工场冶炼生铁炉数，多者每年64座，少者每年亦有54座。②

顺便谈一下军工性质的火药生产。

清代，广西驻军所用火药，多由各协营自己加工制造。原料用硝，自己熬制；炭粉则采购柳树烧炭存灰，捣碎研末；硫磺则由镇安府天保矿购进。③原料加工，火药配造，以及所用工具，皆有严格规定。如舂药碓臼，规定"外方内圆，深一尺六寸，径宽一尺三寸"。白硝熬制，规定"先用大锅盛硝四十斤，清水十五斤，细火熬煮"，然后倒人缸内，再用"白布口袋幔盖缸面，将熬成硝水滤人布袋缸内；其袋滤过数十次，即须另换新袋，再滤出清汁，分入缸内提净，结成饼团……以漂白如冰雪，而上露簪牙为佳"。火药配造，"每臼用硝八斤，磺粉一斤二两，炭粉一斤六两，掺合入臼，三人轮替换舂不歇，以二万二千脚为准"。为此，生产多在夏初进行，"取其昼长，舂造易于见功，晒晾亦复得力"也。一般每天"每臼造药十斤。成品以筛晾成珠，先用手掌燃试，以不炙手为度"。因为用途不同，成品精度要求亦有区别。供鸟枪打靶用者，以远及130弓为合格，如供战阵使用，则以"远至一百六十

①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六，《人物列传·覃奉璋》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所列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821年（道光元年）各省铁矿"在采厂数"，广西从1736年（乾隆元年）起，开始有在采铁矿厂1个，以后逐渐增至6厂至7厂。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以后，又增至9厂。

③ 羊复礼：《镇安府志》卷一六，《经政志一·矿厂》云，天保硫磺矿开采"所得多备作军需，由邻省备价购买，或分送桂林、南宁两府，以备各协营就近赴买"。

弓，枪子中靶穿至石挡，捡回枪子，打成薄片”始合要求。[①] 说明火药加工相当复杂，对配造工场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

外籍商人和广西商业

如果说家庭手工业生产一般为了“自给自足”，那么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的产品则多用于投放市场进行交换；而广东、湖南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影响，对广西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广西的西江沿岸已经出现了一批商业圩镇。近代广西商业，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活动也多在西江、桂江、柳江和左右江沿岸的圩镇进行，内地与广大山区的商品交换并不发达。[②] 直至19世纪中叶，尽管沿江出现了苍梧戎圩，平南大乌（今大安），桂平大湟江口和临桂大圩[③] 等著名圩镇，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左右全省经济生活的商业中心城市。商品交换的地区性和商业经营的分散性，是当时广西商业的特点之一。

由于广西文化素称落后，社会经济极不发达。土著居民很少从事商业，也不善于经营贩运。即使在梧州府一带，直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广西土民依旧是“近山者樵，近水者渔，不事商贾”[④]。濒临大江的桂平县，

---

① 署义宁协思恩营游击璞崇额等：《龙胜火药厂碑记》，道光十六年立碑，现存龙胜县文管所。《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八六载：“顺治初年，工部设灈灵厂委官制火药，特命大臣督之。厂设石碾二百盘，每盘置药三十斤为一台。每台碾三日者以备军需，碾一日者以备演放枪炮。”又：参见拙文《介绍〈龙胜火药厂碑记〉》，见《广西军事志通讯》1987年第4期。

② 桂北和桂西北的许多地方，因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加之重农轻商观念的束缚，人们以经商为羞耻，即使解放以后，山区人民仍不习惯于市场买卖。1986年，我到龙胜马堤乡考察，乡政府所在地仍无农贸市场，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盐、布料等，宁可远走湖南的城步县采购。在乡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号召下，1987年始成立农贸小集。

③ 大圩今划归灵川县。因为这四个圩镇在明清之际商业已相当繁盛，故有“一戎、二乌、三江、四大”之谚。

④ 王栋：《苍梧县志》卷五《风土志·风俗》。

"自明以前，县中无商业可言"，明以后，大湟江口附近的瑶民，除"日用饮食外，无多求者"。[①] 是以广西商业，多操纵在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外省商人手中。太平天国起义时，有人明确指出：

> 粤西幅员辽阔，纵横三、四千里。……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柳、庆、桂、平四郡，楚南垦荒、贸易者多，粤东间有民人，亦略相等，闽省差少。梧、浔、南、镇、郁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②]

商业操纵在粤、湘、闽等外籍人手中，这是近代广西商业的又一特点。

广西与广东毗邻，有西江一水相通，舟楫往来数日可达。广东商人凭借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力量，随波进取，凡是船货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足迹。粤东会馆在广西到处建立，就是他们的势力存在的明证。乾隆年间，广东商人入桂达到了高潮。苍梧地连广东，粤商人居最早，故有苍梧一地，"商贾辏集，类多东人"之说。广东、广西两省"冠裳云集"，梧州亦逐渐成为广西"东南重镇"。[③] 早在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粤商即在苍梧戎圩创建粤东会馆。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重建时，建馆题名者约计1600余家（人），注明商号经营地点者有400家，其中已经落籍广西的粤商即近300家。他们分布在除泗城府以外的所有州县。[④] 桂平县大湟江口的广东客商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创建粤东会馆。[⑤] 平南大乌圩（今称大安圩）的两粤"商氓"，在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先建"列圣宫"，其殿宇"二进三楹，雕题丹桷"。此项工程，虽云"两粤之人，咸有事于土木"。但东人客也，以

---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食货中·商业》。

②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王栋：《苍梧县志》卷六，《风土·厢里》。

④ 温汝适：《重修粤东会馆题名碑记》。拓片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⑤ 冯成修：《创建粤东会馆序》。按：大湟江口旧称永和圩。碑文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文及其它》。

庙为家，故从之者众，计六百余人；西人主也，视家为庙，故助之者稀，仅数十人。稍后，粤东商客建会馆于列圣宫侧。可见，广东人到大乌经商，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为时亦早。① 桂东平乐，滨临桂江，乃梧州北上桂林必经之地；且自茶江东出龙虎关，可通湘南、粤北。清初即建粤东会馆。② 居民“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③。阳朔的粤东会馆建于1753年（乾隆十八年），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重建。④ 县北20里的白沙圩，“兴自明朝，是中路通衢之要，东客频来”。1828年（道光八年）亦建有粤东会馆。⑤ 地处右江上游的百色，乃广西与云南、贵州两省接壤重镇，“市廛商贾，多粤东来”。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就建起了规模宏伟的粤东会馆。⑥ 桂北山区龙胜厅的瓢里圩，因有桑江通船西出怀远（今三江县），与融江会合，经融县、柳州入西江而出海洋，故在康熙年间也有了粤东会馆，比1887年（光绪十三年）瓢里湖南会馆要早200年左右。⑦ 其他如融江上游的怀远、融县，左江上游的龙州，以及宁明州和下雷州等地，也都在清代前期出现了粤东会馆。⑧ 广东商人在广西到处建立会馆，主要由于他们客居“殊乡异井”，需要有一个“联声气而聚侪类”，“筹公事以敦乡谊”的地方，共同维护并不断发展他们在政治、经济直至文化等方面的利益。⑨ 广西粤东会馆林立，说明粤东商人入桂早，人

---

① 钟元辅：《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广西市县概况·平乐县·文物胜迹》云：平乐粤东会馆“建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之间”。

③ 张智林、罗玉槐：《平乐县志》卷二，《社会民族》。

④ 谢求聚等：《阳朔县志》第二十一章，《商业》。

⑤ 道光八年《新建粤东会馆碑记》。碑存白沙圩会馆旧址。

⑥ 引文见华本松：《百色厅志》卷三，《社会民族》。会馆事据《广西市县概况·百色市·文物胜迹》。

⑦ 据1986年7月21日在瓢里粤东会馆旧址见到残碑，同时在湖南会馆旧址看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的建馆碑记。

⑧ 刘继辉等编：《宁明县志·贸易志·商业》；童健飞等编：《大新县志》，第十八章，《商业》。

⑨ 参看桂平永和圩《创建粤东会馆序》；苍梧《重修粤东会馆题名碑记》。

数多，分布广。谚云："无东不成市"，诚非虚语。

其次是湖南商人。他们通过恭城的龙虎关与茶江，富川的岭南古道与临水，全州、兴安的湘桂走廊与湘江、灵水，以及源于全州西延地方（今资源县）的资水，由北而南，深入广西城乡，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在桂北、桂中的许多州县，也出现了不少湖南会馆。①

福建、江西、浙江和山西等地的商人，来广西经商的，远逊于广东，也不及湖南。江西商人主要在桂北各州县经营。② 福建商人则多在桂北、桂中及西江沿岸的一些州县活动。而山西、浙江的商人仅在桂林、柳州等几个城市从事商贩或金融业务。③

商贸内容和商人的封建性

直至19世纪前半期，广西市场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地方土特产。如西江流域的谷米，左右江的牛皮、八角、木耳等山货，黔江和桂江沿岸城乡的竹木、桐、茶产品等等。而西米东运，素为商业经营大宗，不但直接关系到广东民食，而且直接影响到广西市镇盛衰。有记载说：

> 粤东民食，全赖西省谷米源源接济，一有阻滞，客贩便稀，民食有碍。

这里说的是乾隆末年广东商人常到桂平县之永和、大宣、南渌、石咀各圩市贩买谷米远销东省的情形。④ 而贵县的东津米埠，苍梧戎圩的谷米集散，

---

① 如临桂县及六塘圩、恭城县、平乐县、荔浦县、永安州等皆有湖南会馆；全州、兴安、灌阳等处只有湖南会馆，而无粤东会馆。

② 在兴安县有江西会馆和庐陵会馆，临桂、全州等亦有江西会馆。恭城县有评论各省会馆的民谣云："湖南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福建会馆平平过，江西会馆烂冬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商人的实力。

③ 据1986年3月下旬调查，临桂有新安会馆、四川会馆，全州有江南会馆。而临桂的福建会馆可与粤东会馆、湖南会馆相媲美。

④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奉督宪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也都是以运往广东为大宗。平南一县，每年运销广东白米，估计在20万石以上。[①] 谷米以外的农副产品，地方土物，也充斥当时的广西沿江圩镇，如苍梧戎圩，竹木、猪牛、鸡鸭、蛙螺、山味以及“各江土物”，无不入市。[②] 桂平大湟江口，除石咀、新圩、南渌与平南思旺、鹏化圩之农副产品外，“复有瑶山土货云集”，在近200家商店中，仅花生行就有31家，[③] 平南大乌集本地及藤县、容县之“百货并臻”，复以经营大宗桂皮、桂油，形成自己的市场特色。[④] 临桂大圩则以地方加工的草帽、面条为主。[⑤] 融县长安圩以土产蔗糖换取湖南洪江大布，形成了除竹木、桐茶外的土布市场。[⑥] 邕宁县的蒲庙圩，除谷米外，还有猪牛、花生、蔗糖、牛皮、牛骨等十多种商品，各自形成交易“行口”。[⑦] 贵县的龙山，由于开矿和矿产冶炼的发展，促使客商工徒往来络绎，居民熔冶矿砂，圩期兑换，银饼贸易较称繁盛。[⑧] 又具有矿产商市的特色。

进口商品，以广东的食盐为大宗，其他如苏杭布匹、海味、磁器以及手工日用百货之类。[⑨] 此外，湖南的各种铁器、土布；江西的药材；福建的纸张、文具等等，也是流通各地圩镇的重要商品。

19世纪前期，广西的商品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它所受到的阻

---

① 梁吉祥：《贵县志》卷一，《纪地·圩埠》；王栋：《苍梧县志》卷九，《食货上》；又：全文炳纂《平乐县志》卷一，《土产》，亦有大批谷米外运记载。

② 萧广钦：《戎圩竹枝词》，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

③ 道光十五年《迁旧圩义烈宫芳名银数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九，《圩市》。

④ 梁瀚：乾隆十五年《增建列圣宫碑记》。

⑤ 刘黎青：《广西土特产产销概况》（手稿），1951。

⑥ 龙泰任：《融县志》第四编，《经济》。

⑦ 嘉庆九年、道光二十三年《重修蒲庙武圣宫碑记》。碑存武圣宫前厅两壁，1960年访得。

⑧ 龚政、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矿业》。

⑨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广西部堂福公宪颁禁供应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力也很大。首先是封建势力的干扰与破坏，如蠹差土棍垂涎商人资本，常"因赊贷勒买不遂，怀挟私嫌，勾串匪徒、土娼，妄行诬扳"；"或称引线，或称买赃，或指同场赌博，或嘱娼指奸，种种设法诬陷，俾客民倾囊倒箧，卖妻鬻子，以饱欲壑"。[①] 如"遇上宪过境，岁中祀典，衙内需用各物，有卖则短价勒买，无卖则签票派办；甚或碾夫、木匠、柴炭、鸡鸭，派累难堪。差役持票百计刁难，尤为惨索。间或随堂发价，候领无期；纵蒙恩给，差扣房除，大亏血本。倘或一时难继，锁责频加，苦难尽诉"[②]。封建官差对商人的借题苛勒，常使他们亏累甚至破产！

另一种是来自商人自身的阻力。

当时，不少商民经商获利，并非把所得用于扩大商业经营，而是转向购买田地、房屋，或开设当押和放贷；有的还贱价收买女孩，从事贩卖人口生意。[③] 把商业资本转变为封建的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贵县的林大懋就是这类商人的代表。林氏祖籍福建莆田县，后迁广东番禺县五凤乡，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他的祖父林仕经，父亲林昌世到贵县。父子二人白昼经商，夜时课读，生活并不富裕。仕经死，昌世偕子大桢、大懋等继续经商，向广东贩运谷米、花生及其他土特产，再从广东贩回布匹与各种日用杂货，在县城及龙山圩销售，或转手小商经销于其他圩镇；并且开设林宝昌号以作根本，把经商所得大量购买田地、房屋和放债。到了19世纪初期，林家成了全县首屈一指的商人、地主兼高利贷者。他的子孙，不少人还通过科考、捐纳等方式，挤进封建官绅的行列。[④] 类似林大懋这样的既经商，又买地，同时开设典当或放债，集富商、地主和高利贷者于一身的人物，当时在广西其他州县

①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奉爵阁部堂福大人饬禁妄扳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②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奉两广部堂禁革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③ 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革命前夜的广西社会》。

④ 《林光远堂族谱》，民国十九年修纂。

也大有人在。① 这种情况说明：活跃在中国城乡的商业资本，“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②

总之，封建官府对商人的干扰和敲榨，影响了广西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商人和封建官绅、地主、高利贷者彼此结托，互相转化，使用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③ 既强化了商业资本的封建性质，又阻碍了正常商业的发展。这是从清初直至19世纪前期广西商业经济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三、政治、军事和文教事业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④ 我们已从农业、工业、矿业和商业等方面论述了鸦片战争前的广西社会经济，就有可能对它的政治、军事和文教事业进行探索了。

---

① 如贵县大圩郑家，覃塘宋家；桂平县竹围村陈家，盘龙村昌家，江口石头脚陈家；象州的周、陈、何、李等家。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革命前夜的广西社会》。

②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③ 以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销售为例。据横县城隍庙存乾隆三十九年的《奉上宪禁革陋例碑记》、贵县龙山圩存嘉庆四年《引盐查禁抬价掺砂碑记》载：当时广西各地额销引盐多有抬价、短秤、掺砂、灌卤、灌水或抑勒派销等弊，小民苦不堪言。

④ 《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清代广西的地方行政建置

在清代，广西是大清帝国的行省之一，省治在临桂（今桂林市）。省之下有道、府、州、厅、县、土州、土县、土巡检司和长官司等组织，其名称及具体统辖情况如下表：

清代广西行政建置表①

道	府	县、州、厅、土州、土县、土巡检司
桂平梧郁道②	桂林府	*临桂县、灵川县、兴安县、全州、灌阳县、阳朔县、永福县、义宁县、永宁州、西延分州、龙胜厅、中渡厅
	平乐府	*平乐县、贺县、恭城县、富川县、荔蒲县、修仁县、昭平县、永安州、信都厅
	梧州府	*苍梧县、岑溪县、容县、藤县、怀集县
	郁林直隶州③	兴业县、北流县、陆川县、博白县

① 主要据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三，《郡县沿革表一》，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点校本，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1737年（乾隆二年）原设之苍梧道称分守桂平梧郁道，兼理盐法，辖桂林、平乐、梧州三府及郁林直隶州。1887年（光绪十三年）郁林直隶州改属左江道，桂平梧郁道改称桂平梧道。

③ 州治在今玉林市。

清代广西行政建置表

道	府	县、州、厅、土州、土县、土巡检司
右江道	柳州府	*马平县、柳城县、融县、罗城县、怀远县、来宾县、雒容县、象州、上秀村（金秀）
	庆远府	*宜山县、思恩县、天河县、河池州、东兰州、安化厅、那地土州、南丹土州、忻城土州、凤山土州、东兰土州、永定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天峨甲
	思恩府	*武缘县、迁江县、上林县、宾州、白山土巡检司、那马土巡检司①、兴隆土巡检司、定罗土巡检司、旧城土巡检司、都阳土巡检司、古零土巡检司、安定土巡检司
	浔州府	*桂平县、贵县、武宣县、平南县
左江道	南宁府	*宣化县、永淳县、隆安县、横州、新宁州、忠州土州、果化土州、归德土州
	泗城府	*凌云县、西林县、西隆州、上林长官司、安隆长官司
	镇安府	*天保县、奉议土州②、向武土州、都康土州、上映土州

① 1870年（同治九年）升为那马厅。

② 1875年（光绪元年）改为奉议州。

清代广西行政建置表

道	府	县、州、厅、土州、土县、土巡检司
左江道	百色直隶厅①	田州土州（恩隆县）②、恩阳州判、阳万土州判、上林土县、下旺土巡检司
太平思顺道③	太平府	*崇善县、左州、养利州、永康州、宁明州、明江厅、龙州厅、凭祥土州④、太平土州、安平土州、万承土州、茗盈土州、全茗土州、龙英土州、结伦土州、结安土州、镇远土州、都结土州、思陵土州、思州土州、江州土州、上下冻土州、罗白土县、罗阳土县、上龙土巡检司
	归顺直隶州⑤	镇边县⑥、上思州、下雷土州、湖润寨土巡检司
	上思直隶厅⑦	迁隆峒土巡检司

* 为府治所在地

因为广西地处边陲，而且是汉、壮、瑶、苗、侗、回、毛南、仫佬、仡

① 1875年将百色厅升为百色直隶厅。

② 1875年，田州土州改土归流，置恩隆县。

③ 1887年（光绪十三年）设太平归顺道。1892年（光绪十八年）增辖上思直隶厅，太平归顺道改称太平思顺道。

④ 1910年（宣统二年）凭祥土州改土归流，设凭祥厅。

⑤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归顺州升为归顺直隶州。

⑥ 1888年（光绪十四年）改小镇安厅为镇边县。

⑦ 1892年（光绪十八年）升上思州为直隶厅，并从归顺直隶州改归太平思顺道管辖。

佬、彝、水和京等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所以，地方的行政建置也与他省有所不同。省之下除有道、府、州、县、厅等外，还有土州、土县、土司和峒等。巡抚[①] 是全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管一省的吏治、军政、刑狱等事。下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并称两司。[②] 布政使司专管全省财赋和地方官吏考绩等事。按察使司负责全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另有提督学政主管学务及考试，按期到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③] 道、府、州、县、厅的行政长官分别称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同知或通判。[④] 在他们之下，即里（或都、练、团等）、保、甲、牌等基层组织。[⑤] 总之，从巡抚衙门到保甲的各级行政组织，都遵奉清王朝的意旨，向清王朝负责，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政治

长期以来，广西各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患难与共，彼此声援，

---

① 巡抚别称抚台、抚军、中丞，例兼兵部侍郎和右副都御史衔。故对下常自称本部院。

② 布政使全称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又称藩司，别称藩台、方伯，专管财赋及地方官考绩等事。按察使全称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又称臬司，别称臬台、廉访，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1910年（宣统二年）改为提法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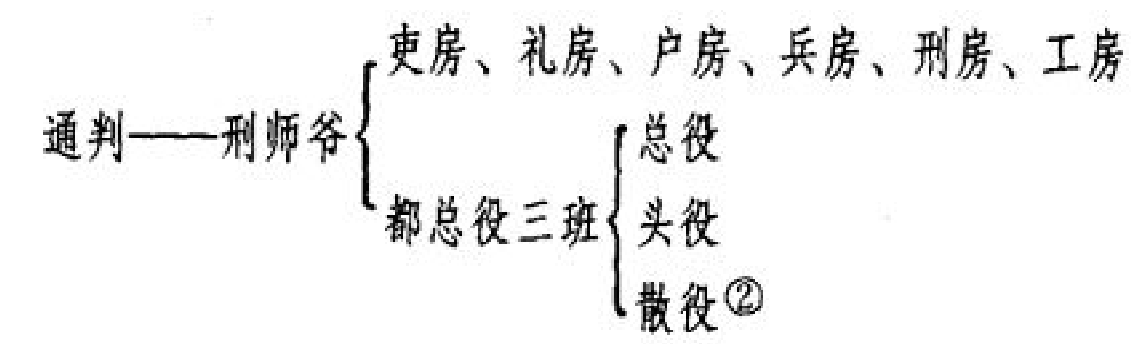
③ 提督学政简称学政，亦称提督学使，以侍郎、京堂、翰林、科道及部属等官中由进士出身者简派，三年一任。充任学政期间，不问其官阶大小，皆与督抚平行。

④ 地方行政的分守分巡道，道员别称道台，多兼兵备衔，也有兼水利、驿传、关务、屯垦的，均辅助布政、按察二使，巡察辖区政事。知府别称太守，上隶于省，下率所属州、县官；凡地方要政，报督抚批准后施行。知州别称州牧。直隶知州较知府略低，直隶于省，与府平行。一般知州、知县（别称县令、大令、县尹、邑侯、明府）与厅同知或通判分别负责本州、县和厅的地方行政事务。

⑤ 清代，广西地方基层组织十分复杂，并无统一名称，州、县之下，大都设里、保、甲，有的地方不称里而称都（如柳州），或称团（如龙胜），也有里之上为都的（如藤县），原属广东的灵山县下设练。又：十家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即通称的保甲制。

互相学习，有无相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共同推动了广西社会向前发展。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壮、瑶、苗等少数民族人民所受的苦难特别深重。千百年来，他们以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开发了居地的山水和田园，却世世代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不但受到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且还受到本民族的土官、山主、头人的榨取，社会矛盾特别复杂，人民的反抗也非常激烈，封建统治者素来把广西视为“难治之区”。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清王朝在壮族地区继续推行历史上的“羁縻”政策，设立土官进行治理。那些已经实行“改土归流”的地方，实际是流官已设，而土官威风未倒，名亡实存。一个土巡检司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土官就是独立王国里的土皇帝。在那些辖区较大、条件较好的土州、土县，土司衙门也有各式文武职官。文职内官有刑名和师爷一二人，总理、总诉、总目、管家等大小头目四人，另设吏、礼、户、刑、兵、工六科，每科设总番，俨如封建王朝的六部；科下还有门户、管卷、书班等差役。武职官有统领、参将、游击、守备等等。土州、土县之下，还分立区、段、亭、哨、都、路、屯、堡、坡、镇、甲、方等建置，有土目、甲目、哨正、保正、头人、总方等所谓外官，负责清查奸细，听理诉讼，组练壮丁，征收租税等工作。① 壮族地区如此，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且看龙胜理苗分府的“行政组织”：



壮族的土官和苗、瑶等族的山主、头人受封建王朝的承认，划地而治，

① 刘锡蕃：《广西土官故实采访》，见《广西文献》创刊号。

② 陈远坤：《龙胜县志》（手稿本），第三编《政治·行政组织》。

于法于情，他们都是王朝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他们与王朝的关系随王朝对之宽严而定，宽则松，严则紧。因为“山高皇帝远”，土民既难见“天”，也不知法。土官、山主、头人则可以不听“天”，也不讲法——他们无法无天在辖区内我行我素，借天子以制“蚁民”，种种不法之事，惨酷之情，由是层出不穷。土民既难见天日，又无法律保障，土官、山主、头人之生杀予夺，惟听之任之。有人作《土官论》，文曰：

> 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产子女，惟其所欲；苦乐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鬼戏然，莫敢有咨嗟太息于其侧者！①

有人写《苗子谣》，则云：

> 怀山苗子言：“……前岁迁老哑。佃彼县人田，称尽租禾稼。所剩难疗饥，男子为乞化。女子准为婢，吞声不敢话。嫁端诬之官，官府谁知诈？差人如猛虎，索食裂眦骂。须臾锁上颈，连累及邻舍。望中阡陌田，尽是豪家霸。永代皆如斯，流毒何年罢?!”②

上述种种表明，少数民族人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是更多层次和更加惨重的。

军事统治的加强

军队是清王朝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又一工具。清代，省的最高军事长官称提督，负责统率驻防省内的绿营兵。广西提督衙门驻柳州。③提督之下，设

---

① 刘彬：《永昌土官论》，见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职官考》二二，《直省土官》。

② 荀文曦作，转引自刘锡蕃：《岭表纪蛮》第二十四章《蛮人与汉人》三，《隔膜重重之蛮汉两族》。

③ 提督，即提督军务总兵官，别名提台、军门。受总督或巡抚节制，所属有镇、协、营、汛各级，其直接统属之兵称提标。中法战争后，广西提督衙门移驻龙州。

左、右江两镇，由总兵统率。[1] 左江镇驻南宁，右江镇驻百色。镇下为协，由副将统率。[2] 协下为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诸官分别统率。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率。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全省绿营兵计有22000人，另有土兵13800多人。[3] 以不足4万兵员，分驻幅员辽阔，地势复杂的广西全省，一旦有事，难免顾此而失彼。道光年间，广西全省"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而仅"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4] 说明即使常年钱粮征收足额，全部用以养兵，也是难以支应的。

大小衙门遍布广西全省，又加上掌握武装的镇、协、营、汛等分立各地。一个衙门就是一处贪污纳贿的场所，一支军队就是一群"戕民邀功"的盗贼。正委实任的官吏之外，还有更多候补、候缺的冗员，以及依附于各级官员的幕僚、食客。他们无不依靠榨取人民以养肥自己。这又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其实，向人民敲榨勒索的又何止官吏?! 即便封建官府中的下层兵差，鱼肉平民百姓的现象早已十分严重，这从1742年（乾隆七年）皇帝的一道诏谕中可以清楚看到：

>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其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撮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又分防塘汛之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三一，《志》一〇六，《兵二·绿营》。总兵别称总镇、镇台。

② 1655年（顺治十二年），继抚标、提标兵之后，增设浔梧、柳庆、思南三协，后又增设平乐、新太两协，继又分浔梧协为浔州、梧州协，分柳庆协为义宁、庆远协，思南协取消，另立镇安协。广西提督节制两镇，兼辖平乐、新太二协，左江镇兼辖梧州、浔州二协，右江镇兼辖镇安协，柳庆镇兼辖义宁、庆远二协。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三一，《志》一〇六，《兵二·绿营》；卷一三四，《志》一〇九，《兵五·土兵》。

④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兵丁，每驱使近村人民薙草汲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己。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①

乾隆皇帝的诏谕说明：在广西，兵差胡作非为，横征滥索之风，出现的时间既早，而且遍及穷乡僻壤，需索的范围十分广泛，百姓受累难以估量。

封建律例和教化

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还表现在名目繁多、有形无形的封建律例与规约方面。例如，关于地主和佃农的名分，道光朝的《大清律例》明白规定：

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叙，并行以小事长之礼。

至于地主与佃农的经济关系，则规定：

佃户拖欠租课，欺谩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②

这些“律例”，明显地反映了阶级压迫的性质，规定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从属性。而在基层掌握了保甲，组织了武装的地主士绅，则订立了形形式式的“乡规”、“民约”，依仗封建官府的支持，在城乡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统治，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性质。请看龙胜厅龙脊上半团所立“乡约”的规定：

（农民）对佃种田地务要工精劳力，积肥耧作，耘草洁净，不得晚迟拖懒丢荒。至秋苗熟，须告田主，均收纳谷，不得私行先取；如早（?）自己所卖之业，听凭田主或自耕，或批种。③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九，乾隆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谕。

② 引见《大清律例》，卷二七，26页，道光五年。

③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政治部分·乡约与习惯法》，见《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10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辅助力量，还有封建的神权、族权和夫权的统治。毛泽东把这四种封建权力形象地喻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①。地主阶级建妖庙淫祠，利用那些非佛非道的偶像菩萨，钳制人民的思想，干预人民的生活，真是无孔不入。据志书记载的粗略统计，仅在浔州府的贵县、桂平、平南、武宣四县，太平天国起义时就有各种神坛祠庙545处，② 其他未入志书记载的野庙淫祠，更是充斥广大城乡，难以计数。地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把人世间贫与富的出现，阶级的压迫与统治，统统说成是“神”的意旨，是“命”的安排。正是这些遍布城乡的“乡土之神”，构成了封建的神鬼系统，编织出封建的迷信网罗。它们和封建的保甲组织、乡绅势力以及伦理说教，互相配合，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广泛的统治。

至于由封建的宗祠、家祠以及家长构成的宗法系统，也充分体现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压迫，存在着残酷的阶级统治。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家长、族老主宰一切，甚至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妇女在家族中又往往低人一等。且以临桂县李家的“宗规成约”为例：合族所订“族约”十五条，族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如有违背，“重以家法责儆，再犯送地方官人罪，不得人祠”。“祭祠主祭”，“务须品行端正者主之”。“孝子贤孙送主人祠附祭者，务人田一亩五分……无田者不得滥人”。“寡妇赘夫并与随娘之子，概不许人祠。”③ 这些规例，说明只有地主豪绅才有资格入祠，宗族的大小事务也只有他们说了才算。而妇女在家族中根本没有地位，遭到的歧视和压迫更多、更深一些。

儒家学说是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当时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有清一代，广西的府、州、县学和书院、义学、书塾、蒙馆等都有较大的发展。清代的广西官学，仍沿明制。除恢复原有之府、州、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请参拙文《太平天国起义与乡土宗教》，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③ 李静岩：《李氏宗谱》，道光十五年。

厅、县学64所外，还在“改土归流”的镇安府、泗城府、奉议州、归顺州、东兰州、西隆州、恩阳州、百色厅、崇善县、西林县、镇边县、太平土州和土田州新设府、州、厅、县学14所。① 各地的学额与办学经费亦多有增加，以此提高官学的地位，笼络各方士子。② 至于书院、义学等，由于官绅的提倡和兴办，也比宋、元、明各朝有了更多的发展。据地方志书的记载统计，清代，广西全省新建书院153所，旧有书院仍存者14所。而新建的书院有三分之二以上是19世纪中期以前建立起来的。③ 与此同时，义学也有很大发展。自从1681年（康熙二十年）知州丁亮工创办永安州义学之后，布政使崔维雅撰《立义学以广文教议》为之倡导，并要求“各府州县设立义学，择宽闲公所，选取儒学中老成有学、行仪端方之士，立为社师，官给饷谷，以资赡养”④。于是，各地方官闻风响从，义学迅速替代了社学。据各地方志书记载，有清一代，广西全省义学共计201所。⑤

书院、义学等的组织管理，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虽与官立的府、州、

---

① 参见赵纯心所写的“广西官学”，见蒙仁昭主编：《广西教育史志》（内部刊物）1992（2），16～31页。

② 陈远坤：《龙胜县志》（手稿本）第六编《文化及教育·概述》云：龙胜“原属苗疆，无文化教育之可言。……到嘉庆中，始由户部议准两广总督吉庆奏设苗学二名，被取者称苗童”。说明文教设施逐步及于少数民族地区。

③ 清代广西书院数目，从无确切统计。蒙仁昭主编《广西教育史志》（内部刊物）1992年第2期发表杨新益有关广西书院的文章，列出书院名称及其所在州县者共214所，其中属于新建者有198所，兴复旧有者16所。扣除原属广东钦州及其属县的书院47所，即为本文所述之数目。又：李彦福、雷坚在《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发表的《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广西的书院》一文，表列清代广西书院共有184所，比杨新益的统计多17所。这是因为：当时有的书院只有名称而无办学实事，故杨文不录。并志此以供参考。

④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三三，《建置略·学校一》，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校注本。

⑤ 杨新益：《清代广西义学地区分布表》及《义学建置与分布》，见蒙仁昭主编：《广西教育史志》（内部刊物）1992（2），56～60页。

县学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经费筹措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却都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因为，封建时代的教育，无论官学或私学，其目的皆在为维护封建统治培养人才。所学内容不外儒家经典、历朝“圣训”。至于经费筹措，则有官府拨给，[①] 官吏捐廉，[②] 士绅捐助等途径；然后以所得购置田产或放债，以收租取息作为办学的经费。[③] 这就使办学经费得到稳定和保证，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利用封建剥削所得进行办学，而受惠者多为官宦或富厚之家的子弟，劳动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这一切，反映了书院教育的封建性质。其他如社学、义学、书塾、蒙馆等等，也类多如此。在此无需多赘了。

封建统治者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各级人才。而生徒、士子入学苦读的目的，则是“学优致仕”，光宗耀祖。达到“取士”与“致仕”目的之途径，主要是科举考试。

我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其发展演变也十分复杂。清代科举，基本沿袭明制。考试分文、武科。除按期之常科外，如遇王朝庆典，则加恩科。还有制举取士。[④] 士子参加正科考试之前，须先经童试。童试有县试、府试和院试，及格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可入县、州、府学学习，俗称入学。生员再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及格后可以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清朝规定：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八月举行，分三场。中式者称

---

① 如桂林的宣城书院和秀峰书院，每年可得官拨银1692两经费。

② 如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泗城知府宋洪源倡率僚属共捐廉200金，发商生息，以充经费。

③ 如桂平县桂邑书院，本为知县卢焜“捐廉倡建”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因“生童膏火由绅士捐助尚属不敷”，遂将前知府毛文铨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捐置浔阳书院田租9600斤，以其田广土腴，于是传谕各佃征询于庭，酌加租谷10400斤，凑成20000斤，以一半转入桂邑书院充膏火。见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一四，《纪地·学校下》。

④ 制举即制科，乃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如清代康熙、乾隆时的博学鸿词科，光绪末年的经济特科等。

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据统计，有清一代，广西的正科、恩科及加科乡试共举行199科，中式文科举人5022人，其中桂林府即占2516名，超过全省中式举人的半数。而庆远、泗城、思恩、镇安与太平五府，中式举人共计312名，不及梧州、郁林直隶州、浔州、南宁一府（州）之中式举人。武科乡试，全省中武举人1104人。

举人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的会试。清朝规定：会试每三年一次，逢辰、未、戌、丑年举行。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举行会试，称会试恩科。考期初在二月，乾隆时改在三月举行。亦分三场。考取者称贡士。一月后，经殿试（又称廷试）合格，由皇帝核定名次等级。录取分三甲。一甲限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均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者均授以官职。据统计，有清一代，广西考中进士者共581名。其中桂林府298名，也超过全省进士的半数，次郁林直隶州62名，梧州府52名，浔州府42名，南宁、平乐府各38名，柳州府27名，思恩、太平府各7名，庆远府5名，镇安府4名，泗城府3名。至于武进士，其中式可以考知者56名，其中桂林府28名，占总数的一半，余为平乐府9名，柳州府7名，郁林直隶州6名，南宁、梧州、浔州府各2名。①

清代科举考试，文科用八股文体。八股文源于唐代的帖经墨义和宋代的经义，一曰制义，又称时文或四书文。全文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诸名，故称八股。破题共两句。全篇字数亦有限制，多者则不及格。士子为了应试，往往废弃他书不读，埋首于八股文中讨生活，思想僵化，文风败坏。所以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② 封建旧学强调读孔、孟之书，注重心性义理，讲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轻视"格物致知"之学，视实证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这种片面奢谈

① 梁精华：《广西科举史话》，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

义理，鄙薄实学的历史缺陷，加以封建政治的腐败，终于把国家民族推向落后挨打的历史邪路！

鸦片战争前的广西社会，通过经济、政治、文教以及民族问题的综合考察，使我们看到鸦片战争前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没有变化，社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日益恶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旧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教等方面对汉、壮、苗、瑶、侗等各个民族广大人民的残酷压迫，使社会日益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内忧外患迫在眉睫，革命成了人民的惟一出路。近代广西的一系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鸦片流毒广西和抗英战争

正当广西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候，1840年爆发了中英战争。这是外国资本主义武力侵略中国的“亘古未有的大事变”。它虽然发生在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广西并没有直接受到鸦片战火的破坏。但是，因为它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我国坚决反对这种谋财害命的毒品贩运所引起的。所以，鸦片的流毒和战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广西社会，破坏了广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也就激起了广西各族人民的同仇敌忾，并且通过各种方式，谴责和反抗外国侵略者。

一、鸦片流毒广西的历史考察

鸦片俗称大烟，主要出产于印度。它具有强烈的麻醉性。我国原来只是作为药材使用而从国外少量进口的。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我国的时候，它们的工业品受到我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抗拒，而鸦片却成了封建统治阶级腐

朽生活的特殊需要，他们还在鸦片的贸易中贪污纳贿，大发不义之财。因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就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鸦片何时传入广西尚难详考。许多地方志书记载，皆云来自鸦片战争以后，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揣度之词，不可相信。

因为，早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向我国贩运鸦片。1838年（道光十八年），外国运进中国的鸦片已达四万又二百箱之多。① 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从广州进口，然后销往各地的。广西毗邻广东，西江是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出海的主要通道，在商业贸易上与广东形成特别重要的联系。很早以来，广西各地已广泛流传"无东不成市，有东必有烟"之说。② 这反映了广东商人在广西商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很早以来，鸦片就随着广东商人的足迹流进广西许多城镇了！

这种见解是有根据的。

1831年3月15日（道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道光帝旻宁根据御史邵正笏的奏议，以福建、广东、云南各省有人私种鸦片，有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于是命令地方督抚严厉查禁。同年11月（九月），广西巡抚祁埙奏复查禁的结果说：

> 伏查粤西山多地少，地瘠民贫，每岁民间于早晚二稻外，所种均系杂粮，借资口食。且地土硗确，不堪垦种之处甚多，是以尚无私种罂粟花、葵花熬烟兴贩情事。惟匪徒诱人服食，辗转习染，近来多有私食之人，自系奸商偷运入境，地方官查拿不力之故。……
>
> 查西省浔、梧、平乐等府，濒临大河，均与广东连界，商贩络绎，设有关卡收税稽查，向归知府专管。该府等所属河面，因常有匪徒抢劫滋事，曾经设立巡船，派委文武员弁分段查缉。广东既近

① 马士（Morse H.B）：《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② 参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

接外洋，而各该府又毗连东省，是以奸商之兴贩鸦片，自均由东省私运入境，沿河上下各关，即为私贩必由之路。①

祁埙的奏复，虽然肯定广西当时“尚无私种罂粟花、葵花熬烟兴贩情事”。但已明白承认，早在道光初年，濒临西江、抚河的梧州、浔州和平乐各府的城镇，已经不乏私食鸦片之人。只是对鸦片私运与吸食的严重程度闪烁其词，不敢明说罢了。

因为鸦片的种植和贩运都有厚利可图，是以所谓广西无人种植鸦片的历史，很快就被某些惟利是图的奸民所改变。1839年1月（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御史郭柏荫奏称：广西与四川、云南、贵州等不通洋船省份，也都有“遍栽罂粟，熬炼成土”情事。② 同年5月（道光十九年四月），广西巡抚梁章钜派员调查，证实了郭柏荫的报告，并将栽种匪犯拿获，所种罂粟全部铲除。而失察之左江道卞斌，护右江道、镇安府知府恒梧，庆远府知府文烨，思恩府知府王文凤，署镇安府知府周三锡，署泗城府知府李闲，连同梁章钜本人，皆受到清王朝“交部议处”的处分。③

鸦片进入广西，西江当然是主要的贩运之路。1839年1月6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朝根据梁章钜的奏报指出：“广西鸦片烟来自广东，全在梧州、浔州两关口查拿严紧，方可杜囤贩逃窜之弊。”④ 而从广东廉州府属合浦县龙头沙地方（今属广西），溯南流江或经陆路转运广西内地，数量也不在少数。这是御史贾臻具体揭露的。⑤

从前引祁埙的奏报说明，19世纪30年代，鸦片流毒广西，已经相当普遍，开始成为广西社会的严重问题。据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说：“道光十二三年，张嘉祥在贵县水源街咸货铺佣工，后缘耽于赌博辞出，遂与其党往

①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查禁鸦片烟案》。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谕。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一，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谕。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六。

⑤ 《清宣宗实录》卷三三三，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二日谕。

石𨧀圩掳荣和牛皮铺之子勒赎。嘉祥漏网后，随往刘公圩开卖洋烟馆。”当时吸食鸦片的，除了剥削阶级中人之外，就连天地会女头目邱二嫂的丈夫邱冬瓜二等一些下流社会的小人物，也成了终日进出烟馆之门的瘾君子。[①]

又据近人调查，19世纪40年代，在郁林的长荣圩，贵县的大圩，桂平县的大湟江口圩等地，也分别出现了一家或者十几家鸦片烟馆。[②] 大湟江口石头脚的陈家，来自福建，有名陈存良者，道光年间专以私贩鸦片为业。林则徐在广东严禁鸦片时，广西烟价大涨，陈存良因囤积居奇而发了大财。他把到手的“国难财”用以买田、经商、放债兼开典当业，年收田租由原有的30万斤猛增至80万斤左右，而且还建造了六座青砖大瓦房，成了远近知名的大地主、富商和当押老板。[③] 像陈存良这样的大鸦片贩子的存在，鸦片烟馆的随处可见，充分说明鸦片泛滥，烟毒侵袭广西的严重性。

面对鸦片烟毒在中国的日益泛滥，清王朝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它曾向各级地方官吏三令五申，要求严厉查禁鸦片。1839年6月28日（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当林则徐在广东雷厉风行禁烟之际，清政府明确向各省大吏提出要求，切望振奋精神，认真查办，以一年又六个月为限，将贩运及吸食鸦片各犯悉数破案。[④]

但是，许多官吏都和鸦片走私有关，并从鸦片的贩运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们不但不执行禁烟的命令，反把禁令作为贪污纳贿的手段。他们往往是一手拿着皇帝的禁令，振振有词地叫唤禁烟；一手却提着贪污受贿的钱袋，以禁烟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在贪官、奸商和外国烟贩子的互相勾结、利用下，鸦片是愈禁愈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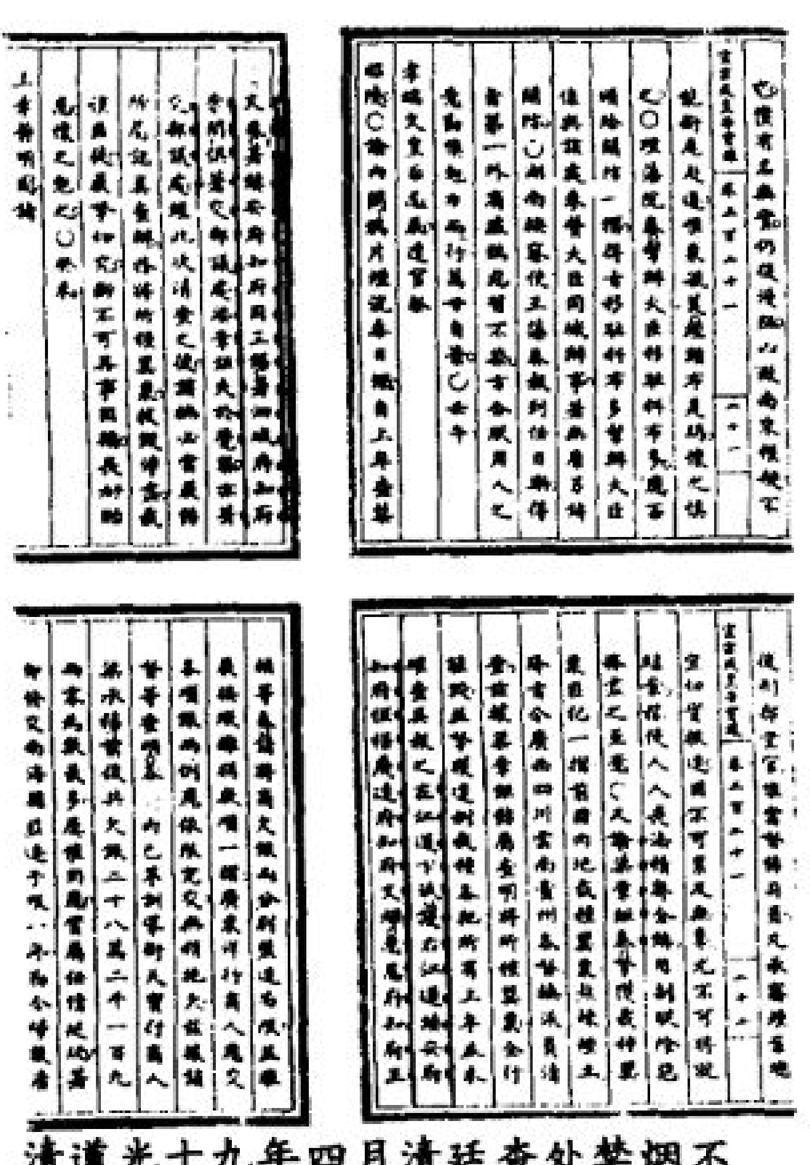
① 《近代史资料》，1955（1）。

② 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9页。

③ 参看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汇编：《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1973年4月。又参看魏笃《浔州府志》卷四六，《纪人·列传》。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二。

这种贪赃枉法的情况，在广西也很严重。



清道光十九年四月清廷查处禁烟不力之广西官员谕

1839年1月6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谕：据广西巡抚梁章钜奏："浔州府自饬查后，已报获烟土四千余两，而梧州府报获甚属寥寥，且率以宽限月日为请，办理实属迟缓。"知府刘锡方因此被摘去顶带，仍责令拿获大起自赎。① 可是，到了7月（道光十九年六月），林则徐就破获并审理了梧州知府家丁张汉三卖放烟土之案。② 实际是包括梧州知府在内的地方官吏直接参与贩毒的事件。

1840年5月3日（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二日），旻宁根据御史贾臻的奏报，向军机处发了一道谕旨说：

据奏，广东廉州府属合浦县龙头沙地方，外面滨海，内地界连高州府属及广西郁林州属，海船专载烟土停泊该处发售后，另用渔船各执鸟枪包送上岸。该县城外之周盛、长泰、英利各字号，皆积惯囤贩之家，有府书徐老官及该县门丁周六为之包庇。又该县湖廉洞地方，栽种罂粟。县丞王万春曾经履勘送县，该县韩凤翔并未查禁，又将禀稿延搁不发，意存消弭。……

这些揭发，对于有关偷运鸦片的地点、商号、人物以及情节都说得十分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六。

② 《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一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

具体，后来地方官员虽以“该处实无贩运烟土，栽种罂粟，包庇消弭等事奏闻”①。但揭发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因为，廉州濒临海洋，类似上述的贩运情形，当时在沿海许多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且看1839年8月22日(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林则徐致澳门同知着令义律(Charles Elliot)缴烟、交凶的谕稿，自可明白，他说：

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贩多名，皆已供认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凿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涨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②

这就说明，靠近广东的高州、廉州和雷州等地，当时也是洋烟贩运的重要港口，并且不是一般偷运，而是明目张胆地武装强行贩运了！

二、反对侵略，讴歌英雄

鸦片流毒广西，吸食者虽然多是统治阶级中人，而他们吸毒的各种消耗，却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这就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加速了社会的崩溃进程。因此也就引起了各个阶层正直人们的关注，群思有以补救。

广西官方的禁烟议论

1838年6月2日（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清帝旻宁在太常寺卿许乃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三三。

② 林则徐：《信及录》，见《鸦片战争》（二）。

济，鸿胪寺卿黄爵滋等先后奏陈禁烟意见的基础上，发出上谕，着各地将军、督抚就禁烟问题各抒己见，并妥议章程具奏。8月11日（六月二十二日），广西巡抚梁章钜提出的“禁烟章程折”，反映了广西官方和士大夫阶层的意见。他既反对许乃济奏请准许民间种植罂粟，从而杜绝洋船私售，挽救纹银外流的见解，[①] 也不赞成黄爵滋“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②] 针对前者，梁章钜驳斥说：

> 若内地种植罂粟花刮浆成土，即与外来鸦片烟无异。正当力除以防其弊，岂可反弛禁以开其源？如以产谷之区，听其植罂粟以害民，获利日多，则产谷日少。良田胥变为花地，其害更不可胜言。国家亦无此政体也。

对于后者，他辩驳说：

> 鸦片烟之源，不在吸食之人，而在囤贩之地。……今欲以重刑禁绝吸食之人，此不过计无所施，激为不任人而任法，谓治其流而源可清也。然臣以为不如清其源而流自息。

这就是说，解决外洋鸦片流毒这个祸国殃民、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首先在于“清其源”。因为：

> 鸦片烟之源，不在吸食之人，而在囤贩之地。试思外地之物不流入内地，则人何从而兴贩？无兴贩又何从而吸食？是必有以银易烟之奸民，即必有开窯囤烟之窝地。

所以，在梁章钜看来，“惟将死罪施之开窝口之人，则罚不及众，刑不滥施，庶已源清而流自绝”。当然，要使禁烟法令能够认真贯彻，达到“绝出口之银与绝人口之烟”，不但要讲求禁令，还要注意整饬执法的官吏。他针对当时的情形指出：

> 今日禁止非不密，处分非不严，而漏卮终不能止者，皆有治法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4。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无治人，不能实力奉行之故。

为了杜绝各级官吏、土豪、地棍在鸦片贩运中营私舞弊，买放护持，纠正官员执法中“畏难而不尽力，营私而不尽心”的局面，他明确提出：“行法必自官始，行法于庶官又必自大吏始。吏习一清，民风自然可革，此又为源中之源，而不必为疾视斯民之举也。”①

梁章钜的这些意见，自然无可厚非。尤其是“行法必自官始”一条，至为关键。但是，因为他强调“清其源”，而忽视“治其流”，这和他对当时存在广西社会的鸦片流毒估计不足有关。因此，在行动上也是查禁不力的。这就是他曾一度受到“交部议处”的原因。

在清王朝严禁鸦片的催促下，1840年夏，梁章钜曾把广西如何严厉禁止鸦片种植和贩运的情形上奏朝廷。但并没有得到道光帝旻宁的认可。他在奏报上批道：“谈何容易！若事不认真，无非空言塞责，于事何益?”② 半年以后，梁章钜自知禁绝鸦片之事无法完成，于是，两次上奏清廷，请宽限一年又六个月禁绝鸦片的期限，理由是：处置烟犯之“罪名愈重，藏匿愈深；查拿愈严，趋避愈巧”。结果，也没有得到清帝的同意。③ 这些情况表明，以梁章钜为首的广西地方官吏，对烟犯横行，烟毒泛滥的打击是极不得力的。

人民群众对鸦片流毒的批判

人民群众、下级官吏和不当权的士绅们的态度则不同，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和可能出发，或谴责鸦片毒害，或直接参与禁烟战争，或歌颂爱国英豪，表现了与内外反动派绝不妥协的正义立场。

一般平民百姓因为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无法公开发表反对鸦片的意见，也不可能组织起来，迅速形成抵制鸦片的行动。于是，只能用揭帖、歌谣等形式，表示对鸦片流毒的义愤。在梧州，面对外国侵略者利用鸦片谋财害命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三三四，道光二十年五月初十日谕。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一，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谕。

的罪恶行为，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张揭帖：

白银成担，买土百斤，
食落肚里，剥骨抽筋。
番鬼佬，冇良心，
专卖鸦片害华人。①

因为鸦片有强烈的麻醉作用，人们吸食成瘾以后，就很难把它戒掉。结果，许多人不但由于吸毒闹得倾家荡产，子散妻离，而且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昂昂七尺之躯，转眼成了骨瘦如柴、步履维艰的“鸦片烟鬼”！同是在梧州，据说还出现了一张专诋鸦片烟鬼的《白头帖》，文曰：

鸦片鬼，真难睇。
衫唔（不）换，身唔（不）洗；
面黄黄，头低低，
皮包骨，似病鸡。
烟瘾发，流鼻涕，
讲句话，唉唉唉。
行步路，难比蚁，
日夹夜，困床底（里）。
不养老，不顾妻，
不认亲，不要仔。
兵大哥，失兵威，
官大人，更没底。
财主佬，败家仔，
日子长，命丧晒（完蛋）。②

① 1960年到梧州作社会调查，据市体育场路14号陈树德老人口述。他说，这是林大人在广东禁烟时梧州传出的白头帖。

② 1960年在梧州市图书馆听李家诜老人口述。他世居梧州，熟悉地方掌故，著述亦多。

这张揭帖，把“鸦片烟鬼”的身心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从中看到鸦片的毒害，具有很好的警世作用。

鸦片吸食者既多穷极潦倒而死，所以死后也就难有葬身之地。当时，在贵县，有人把“鸦片烟鬼”和矿工的不幸做了这样的对比描述，说是：

吹烟人，死了未瘗；

挖矿人，瘗了未死。①

“鸦片烟鬼”因为吸毒，搞得死无葬身之地，那是咎由自取，和旧社会挖矿工人因为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经常被塌方活埋的悲惨遭遇，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但从根本说来，也是一种社会悲剧！所以，出自民间的这种歌谣揭帖，实乃针砭时弊之作，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抵制鸦片毒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呼声！

广西军民积极支援抗英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二十二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广西虽非前线，但也调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为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生存做出了贡献。

当英、美侵略者抗拒缴烟，蓄意发动武装侵略时，专门负责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即积极从事战守准备，坚决打击侵略者的挑衅。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五月）关天培就“殚精竭虑，寝食以之”地着手在珠江口虎门等地构筑炮台，添置大炮，并于横档海面“创造排链三道，中隔九十丈”，其横江排链所用的木材，截成各长4丈5尺的大木即近1200根，联成木排所需的横木更以数倍计之。1839年5月18日（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六日），林则徐视察了这个巨大的海防工事，十分赞赏。② 而所用的

① 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24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邓廷桢等《筹议虎门创造排链添置炮台折》；同年四月初六日林则徐《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

这许多参天大树，据说皆“采自广西”。[①]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广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调赶往广州增援。[②] 1841年春，道光帝旻宁以“湖南、广西贮存大炮甚多，足资守备”，命梁章钜“拣选大炮数十尊，听候广东调用”。梁章钜一面委员“访雇能铸二三千斤铜炮匠手来粤铸造”，一面飞咨提督薛升“饬营拣选……将省城旧存二千斤以上大炮试放有准者八尊，又南宁营二千斤大炮四尊”，以及各营所存五百斤以上之炮数十尊，经过“拣选演试”，一并解往广州备用。[③] 因为梧州是广西的出海门户，距广州甚近。为了防止汉奸勾引敌人，“窜突西境”，除再派梧州协副将周枋带兵300名赶赴广东增援外，并由薛升派拨将弁，带兵进驻梧州，以壮声势。梁章钜亦带领抚标中军参将秦定三及营兵300名，亲驻梧州督同防堵。[④] 而左江镇文哲珲亲率弁兵2000名，驻扎在离广州40里之瓜埠口、鹰咀沙一线。[⑤] 直至1842年夏，贵州、四川、江西、湖北等省援粤之兵勇已经分别裁撤，而广西兵1800名仍驻留广东，担任防备任务。[⑥] 稍后，以英军进犯浙江，浙江军务紧要，清廷又命广西巡抚周之琦挑选精兵1000名，迅速开往浙江，交扬威将军奕经差遣。[⑦]

附带说一下李百龄押解汉奸鲍鹏进京惩办的问题。李百龄，苍梧长洲人。

---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附《羊城日报七则·夜兵》；《清宣宗实录》卷三五〇，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谕。

② 王栋：《苍梧县志》卷一八，《外交纪事下》。

③ 参看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靖逆将军奕山，湖南巡抚吴其濬，广西巡抚梁章钜等奏及廷寄，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

④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梁章钜《亲赴梧州防堵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

⑤ 《林则徐日记》，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见《鸦片战争》（二），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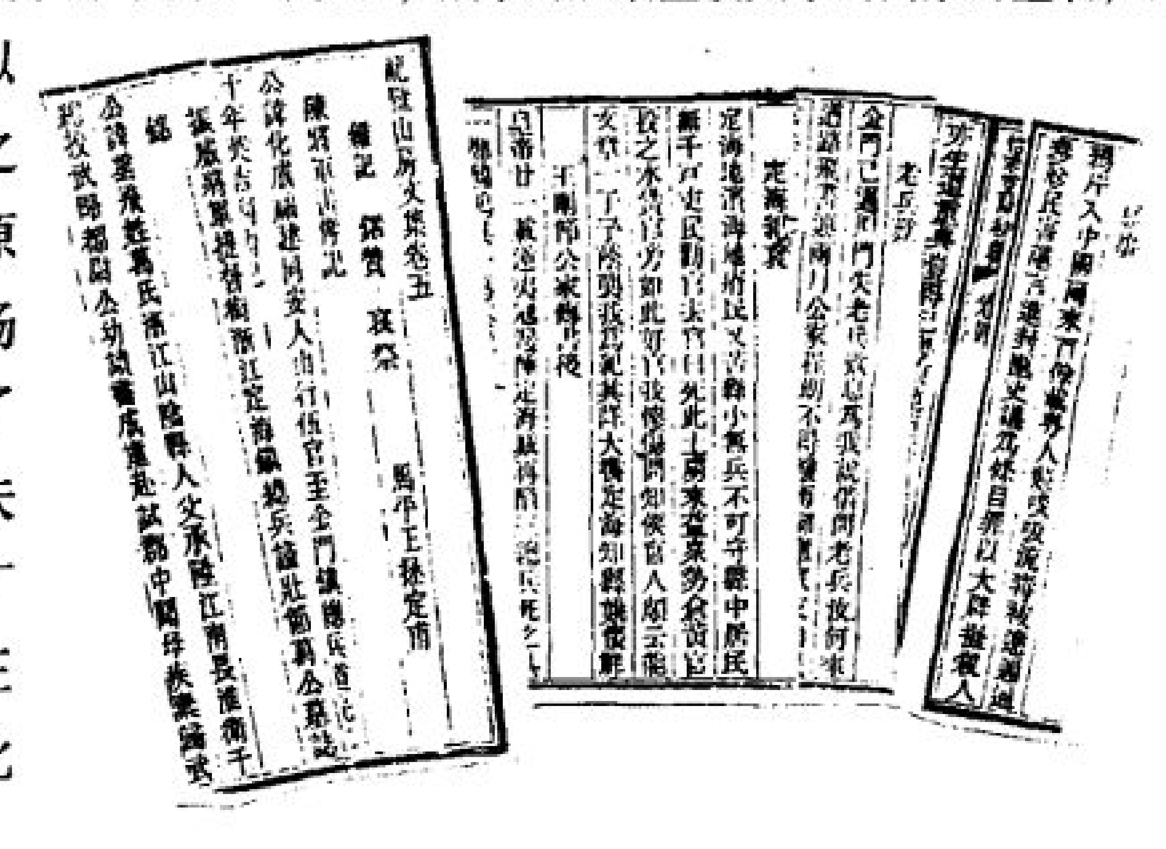
⑥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奕山、祁𡎴等《通盘筹划广东战守情形折》；同年六月《查明兵勇月需经费并现在筹办洋务情形折》，分见《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卷五七。

⑦ 《清宣宗实录》卷三六九，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谕。

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时，他任广东佛山同知，后升任嘉应直隶州（今梅州市）知州。鲍鹏，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本为美国商人买办。1836年（道光十六年）转充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L. Dent）的买办。因为贩卖鸦片，1839年被林则徐下令通缉。他畏罪逃往山东。1840年，经山东巡抚托珲布引荐，任琦善的通事，随至广东，协助琦善办理对英交涉。他在侵略者面前奴颜婢膝，甘当汉奸，把广东沿海防务及内地情况泄漏给敌人。1841年2月，琦善因对敌妥协卖国被逮捕，鲍鹏也法网难逃。而奉檄押解鲍鹏赴京的，正是李百龄。道光帝旻宁召见他，询问粤东、香港情形，"召对三次，恩奖频繁"。① 这也是鸦片战争中事关广西人士的一段小插曲。

爱国士绅讴歌抗敌英雄

由于鸦片战争的对手是"夷人"，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民族的荣辱；加以传统的"夷夏之辨"这个大原则，所以，这场战争，也引起了许多封建士大夫的密切关注。广西的朱琦和王拯，就表现得比较突出。



朱琦、王拯谴责鸦片贩运，讴歌抗敌英雄的诗文

鸦片战争期间，朱琦② 写了不少诗文，力主以严刑峻法禁止鸦片。他写道：

① 王栋：《苍梧县志》卷一五，《列传九·李百龄传》。

② 朱琦事略见本书第十八章《广西近代文化》。

鸦片入中国，尔来百余载。粤人竞啖吸，流毒被远迩。通参轸民害，谠言进封匦。吏议为条目，罪以大辟拟，杀人亦生道，重典岂得已。

他讴歌在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关天培等为代表的抵抗派，批判琦善、奕山之流的畏葸投降势力。他说：

义律尔何为？勾结饵群匪，所恃惟巨炮，以外无长技。长侯昔决战，贼酋尽披靡，艅艎坐饥困，如鱼游釜底。阻扼断其归，彼虏无完理。惜哉失其机，奔突纵犬豕，大帅殊畏懦，高牙拥嵚巇。兵骄或食人，传闻日诙诡。

琦善、奕山的畏葸投降和广东人民的英勇抵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琦由此同样看到了“民心可用”，认为如果处理得当，敌人是不可能那样飞扬跋扈的。

昨览檄夷书，疾声恣丑诋，忠义乃在民，受禄亦可耻。古人重召募，乡团良足倚，剿抚协机宜，猖獗胡至此?![1]

朱琦还热情讴歌了在福建、浙江、江苏和台湾战场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将士们。驻守厦门的清军把总林志，在“戍兵有万”，但“主帅逃归竟不战”的情况下，他独自当雄，“一呼百鬼喑”。“可惜众寡太不敌，一矢洞胸肠穿出，转战转厉刀尽折，寸脔不死骂不绝。”面对此情此景，朱琦不禁放声嗟叹：“安得防边将帅尽如此，与尔同生复同死!”[2] 浙江定海之战，王锡鹏、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经过一番血战之后，以身殉国。朱琦获悉，深情地描写了他们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情景：

……郑帅断右臂，裹创强撑楮，张目犹呼公，阳阳如平时。葛陷贼阵间，血肉膏涂泥，或云没入海，举火欲设奇。一酋自后至，刺刃裂其脐。惟时海色昏，颓云压荒陂。公弃所乘马，短兵奋突围。

① 《怡志堂诗初编》卷四，《感事》。

② 《怡志堂诗初编》卷四，《老兵叹》。

前队既沦亡，后队势渐危；将持已七日，援兵无一来。

公死犹惨烈，寸磔无完尸，亲军数十骑，鏖战同烬灰。

王锡鹏、郑国鸿、葛云飞都壮烈牺牲了！但是，为了抗击外来侵略，保卫民族生存，正如朱琦所说的：“公死复何憾，公名日星垂。”[①] 镇守吴淞口炮台的老将陈化成，因为得不到近在咫尺的友军的支援，孤军奋战，最后壮烈牺牲在炮台上。朱琦在歌颂老将英勇绝伦的抵抗之后，又不胜愤懑地揭露“大府拥兵救不得，金缯日夜输鬼国”的投降卖国的罪行。[②]

王拯则以为烈士们写墓志、家传、像赞等，歌颂在鸦片战争中死难的英雄。

王拯[③]在鸦片战争时与朱琦、姚莹、梅曾亮等过往甚密。浙江定海战后，他为葛云飞作《墓志铭》，详细介绍了葛云飞在仰攻敌阵时拼死血战，壮烈殉国的情景。他写道：

……至竹山门，方仰登，贼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径登。贼虢进间，而有炮背击公，洞胸，穴如盌。前后枪铳雨集，中伤数十，卒。

他十分称道烈士的胆识，而“独悲其谋不克施于国家大事为可惜”。[④]

他为王锡鹏《家传》作跋，以锡鹏等“持饥疲数千之卒，捍悬海之危城，当敌大队，譬犹徒手以搏豹虎”。在激战中，锡鹏“中贼炮，伤一足，乃陷于贼”。他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自“糜其尸”，诚“折冲疆场，有死难不可夺其节者”。他在表彰忠臣烈士的同时，也愤怒鞭挞了那些国难当前，但知蝇营利禄名位的“贼夫陋人”。[⑤]

他为陈化成画像作记，突出描写老将在敌人蜂拥而至，“枪铳雨集”，中

① 《怡志堂诗集·王刚节公家传书后》。

② 《怡志堂诗集·吴淞老将歌》。

③ 王拯事略见本书第十八章《广西近代文化》。

④ 《振威将军提督衔浙江定海镇总兵谥壮节葛公墓志铭》，见《龙壁山房文集》卷四。

⑤ 《王刚节公家传跋尾》，见《龙壁山房文集》卷一。

炮颠仆以后，仍挣扎复起，手燃巨炮，击杀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①

他为陈连升的义马写赞，同时讴歌了陈连升与子陈仲双双战死疆场的壮烈事迹。②

朱琦、王拯歌颂抗英斗争，礼赞在民族战争中为国死难的将士们，反映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但是，由于清王朝的妥协投降，禁烟和反对侵略的战争失败了！它激起了人民的忿怒，也使朱琦、王拯等士大夫感到失望。真是“微臣愤所切，陈义愧青史，苍茫望岭峤，抚剑独流涕”了！③

三、鸦片战争对广西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1844年，又先后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除了向英国割让香港和赔款外，还无条件地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外国在中国享有协定关税、通商、传教、领事裁判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从此，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了破坏，被迫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广东是鸦片战争的主要地区，首当欧美资本主义浪潮的侵袭。广西与广东毗邻，直接或间接受到侵略的震动也是比较大的。如何正确地估计和认识它的影响，对研究近代广西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一种错误的估计

有的论者认为：鸦片战争后几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即已大量向广西

① 《陈将军画像记》，见《龙壁山房文集》卷五。
② 《陈将军义马赞》，见《龙壁山房文集》卷五。
③ 《怡志堂诗集·感事》。

倾销，使沿江城镇如桂平县城以及江口圩等地，出现了“各种洋货充斥市场”，甚至“深入到穷乡僻壤”，“严重地破坏了小农经济，并进而瓦解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的局面。① 这种观点实乃想当然之谈，并非历史事实。因为，它低估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中国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顽强抵抗性，而又错误地把基本上仍旧属于封建社会的商业活动，理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商业活动。② 当然，通过鸦片战争，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曾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疯狂地向我国倾销商品。这是值得重视的。鸦片战争后三年间，洋货输入有显著增长。据统计：当时仅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就从1832年至1839年平均每年不足100万英镑，增至1845年的239万多英镑。其中棉布、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输入我国的总值，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长至1845年的173.5万多英镑。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仅次于英国，它的棉布出口量，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市场倾销的。但是，这种商品倾销的增长，与鸦片的倾销发生了矛盾。因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再发布禁烟命令。外国的鸦片贩运实际处于公开的、不受阻止的状态。由是鸦片进口更多。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透露：“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按：当时外国人将广州以上地方为北方）销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③ 因为鸦片进口和商品倾销发生了矛盾，加以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广东和其他沿海地区的人民广泛开展了反侵略，反卖国投降的斗争。所以，到了1846年以后，外国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出现了停滞状态。④

---

① 梁任葆：《金田起义前后广西的土地问题》。见《历史教学》1956年7月号。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太平天国开国史》中已经提出了商榷意见，见该书27～29页。如有必要，请予参阅，在此不赘。

③ 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4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参见马克思《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601～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不难理解，每年进口中国仅有200多万英镑的洋货，而又主要倾销在东南沿海的五口通商地区，要想同时充斥广西市场，或更深入到广西的穷乡僻壤，是根本不可能的。具体到桂平县的江口圩在鸦片战后的逐渐繁荣，取代了县城的商业地位，成为“全省各圩之冠”，并非由于洋货倾销，而是因为县城“设立厘厂，入口加税，船户过而不留，咸集此圩销运；复有瑶山土货大宗云集，流通东西”的原故。① 不用说在浔江上游的江口圩当时与洋货尚未结缘，就是地接广东，名闻遐迩的苍梧戎圩，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也是“各江土物”，谷米、鸡鸭与蛙螺山味而已！②

至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对洋货倾销的抵抗问题，在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资本主义商品在华滞销的情况，马克思就对此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他以大量的材料，描绘了中国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说明中国人民对日常的衣食需要并不依赖市场的情景。并且把中国和“在长期内抗拒了而现时还继续抗拒英国商品”输出的印度相比，指出英国当时没有，而将来也未必能够轻易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③

马克思所描绘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在鸦片战争后的广西，仍旧普遍地和长期地顽强存在着。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广西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只是在沿江的一些州县比较明显，广大山区则变化不大。这一点，我们将留在后面有关的章节中再做说明。

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社会性质的变化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都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生了

---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九，《圩市》。

② 萧虞钦：《戎圩竹枝词》，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革命前夜的广西社会》。

③ 《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瓦解，中国社会“逐步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性质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新经济的出现，开始于19世纪后期，首先又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开始的，社会性质的变化，也是“一步一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的。所谓鸦片战争以后，到太平天国起义的短短几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已使广西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三个方面的影响

我们说中英鸦片战争后几年间，外国商品并未充塞广西市场，更不可能“瓦解”广西的小农经济，绝不意味着鸦片战争对广西社会没有影响。应该看到，其影响也是很大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鸦片输入造成了纹银外流，银贵钱贱，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前面讲过，早在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间，鸦片已经大量流入广西，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受害最深的却是劳动人民。这是因为，在清代，农民负担繁重的田赋和种种苛捐杂税。道光年间，因为鸦片进口日多，造成纹银外流，银贵钱贱，农民缴纳地丁、漕折各税，皆须使用白银，而劳动所得多为制钱，转手之间，每多亏损。当时，曾国藩对此曾经算过一笔细账，他说：

> 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①

广西的情况也是如此。1848年，在临桂县，“银九钱五分，时价作钱一千九百文”②。但在此之前一年，广西巡抚郑祖琛在一份奏折中却谈到：“鸦片战后数年以来，钱价渐贱，银价愈昂。”1847年，银钱比价竟是“银一两，换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

② 黄泌等纂：《临桂县志》卷一七，《经政志·田赋》。

制钱一千九百文至二千一百余文不等。而民间完纳钱粮，必须易银抵柜。银贵钱贱，较从前输纳之数，几加一倍。粤西民贫土瘠，生计维艰”。[1] 而经手的胥吏趁机敲诈勒索，有的地方，“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名目，苛取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2]。根据记载，道光末年，浔州各地男工每日值钱三十文，女工二十文。当时，米每升值钱二十文左右。而“银每两值钱二千。佣工一年，只合银五两。佣值岁不过十千”[3]。说明因为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纹银外流，银贵钱贱，也使广西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而又在输纳钱粮时被迫成倍地增加了负担，迅速被推入贫困以至破产的痛苦深渊。

第二，清政府为了解决鸦片战争的战费开支，筹措战后巨额赔款的支付，三令五申各地官吏催追旧税，增设新捐。而地主、豪绅不但把他们在吸食鸦片的消费，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且借催缴旧税与新捐之机，肆意勒索中饱，大大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灾难。

鸦片战争后不久，清王朝即以“国用孔亟”为名，命令各省督抚督同司道各员严催从前旧欠钱粮，“迅即拨解”户部，否则严惩不贷，[4] 又通令各省，勒令限期追缴“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未完地丁正耗银两”，总计“征银二千三百九十余万两之多”。[5] 不久，又以“赔款未交”，“度支孔亟”为由，勒令地方督抚以及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将各省“所有着赔、分赔、摊赔、代赔、滥领、核减之款”，俱如户部所开清单，“勒限催追”，不许稍图观望，冀邀豁免之恩。[6]

清王朝为了应付战后的财政危机，满足侵略者的贪婪索赔，竟疯狂地向

①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见《清代钞档》，转引自《历史研究》，1961（1）。
②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一四，《食货志一》。
③ 吴嘉宾：《拟上银钱并用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八。
④ 《清宣宗实录》卷四四六，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谕。
⑤ 《清宣宗实录》卷四六〇，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谕。
⑥ 《清宣宗实录》卷四六一，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谕。

人民进行榨取。这种急如星火的催征，无处不落到人民群众身上！而所谓普免、豁免、蠲免或赈灾等等，劳动人民并不能身受其惠，倒成了各级地方官吏差役“侵蚀亏挪”的门路。广西素称贫瘠省区，时有“粤省（指广西）穷荒，天下所闻”之说。① 道光、咸丰年间，广西全省“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而“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是以全部收入用以养兵而尤不足”。“其关料、杂税不足十余万两，支给文官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即令常年征收足额，尚需外拨接济。② 而当时灾荒频仍，人民受害十分严重。以浔州府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四县而论，鸦片战争前十年间，就有七年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平南县到处是“尔死我饿，哀啊”的呼喊！③ 但是，即令人民濒临死亡的边缘，也难以得到王朝的赈济实惠。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旻宁死了。在他的“遗诏”中，谈到对社会灾害的处理时，是这样写的：

……至水旱成灾，朕切自愧，致累吾民，昕夕忧劳，不惜特发帑金，拯民疾苦。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从未屯膏薪泽，己饥己溺之怀，亦中外所共见。④

皇帝的这种“恩施”，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能够直接施及平民百姓，那也就微乎其微了！就广西而论，遍查《实录》、《东华录》与地方志书，通道光朝三十年，所遇大小灾害不下一千数百次。但是，很少得过封建王朝实际“蠲免”或减缓的“恩施”。正如民间歌谣所说的：“皇恩没有穷人份，赋税不派富人家。”真正受到赈济的，不是成千上万受苦的平民百姓，而是那些经手办理赈济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总之，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这种“旧税更加繁重而难以负担，旧税之外又增加了新税”的重重榨取，加上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又进一步把原来已经

①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六，《兵政》一七，道光六年。
②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③ 魏笃《浔州府志》卷五六，《纪事》。
④ 《清文宗实录》卷一，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诏”。

十分穷困的芸芸众生推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第三，鸦片战争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人，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同样在沿海和沿江地区造成了大批破产失业的人群。其中不少人纷纷流人广西，加剧了广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

洋烟、洋货的倾销，战费、赔款的搜刮，直接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战后的五口通商，使中外贸易的重心逐步北移，又使原来依靠内地商路为生的劳动人民，因为海路运输的发展而顿失生计。加上成千上万的壮勇在战后被解散，走投无路。这样，就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其他沿海、沿江地区造成了庞大的失业人群。他们丧失了一切谋生的依据，被迫流离失所，到处游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广西在鸦片战争中虽然没有首当其冲，但并不能免除欧美资本主义侵略的间接袭击。战后几年间，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运输工人以及壮勇游民等等，成群结队地向广西转移，谋求生活出路。这些人一无所有，除了佃田耕种，出卖劳力或借贷谋生之外，别无其他活命的道路。而地主、富商、高利贷者乘机加强剥削，地租增高了，利息加重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佃众田稀”的老问题更加严重，农民“乞田而耕”甚至“抢耕”的现象更为普遍。广西旧有的、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由于鸦片战争的激荡，更进一步尖锐与激化起来。

综上所述可知，国内封建主义的残酷榨取，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上欧美资本主义势力的侵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广西，都发生了一场亘古罕见的社会大震动。广大劳动人民在大震动中进一步被剥夺了谋生的依靠，形成了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除了造反，人民已经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①

---

① 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秘密结社》第1页《广西游匪投诚禀稿》说：鸦片战争后，破产失业者“力农则粒米难求，贸易则无资工作”。而官府“任意苛求，横行讹索”，甚或随意给人扣以“会匪”、“通洋”的罪名，“焚屋抄家”，“劫财勒命”，由是官逼民反。

第三章　天地会反清起义的勃兴

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以天地会为组织核心，以广西为斗争基地的湘、粤、桂人民反清起义就勃然兴起了。他们打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旗号，向封建官府、富户开展进攻。1847年10月（道光二十七年九月）由雷再浩和李世德在湘桂边区发动的反清起事，把近代广西会党起义迅速推向了高潮。

一、广西天地会的兴起

天地会述略

天地会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它的名目很多，天地会之外，还有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名。会中人自称洪家或洪门。它创立于1674

年（康熙十三年甲寅）。[①] 天地会文献《出世诗》写道："义兄问我乜生辰，岁序排来是甲寅，日系孟秋二十五，鸡鸣丑位我生身。"[②] 它本是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旧臣遗老图谋"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随着清帝国的日益巩固，在满汉地主阶级的压迫下，天地会逐步转入社会下层，成为广大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游民无产者等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的团体，主要在江南各省活动。

天地会在广西的发展

广西是天地会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据天地会文献记载，进入广西的是天地会五房中的第四房，其祖师爷是胡德帝。在《插旗诗》第四首叙其事说："湖广白旗第四枝，广西贵州共此旗；'和'字结拜来起义，快复江山主登基。"[③] 陶成章讲述天地会始创于福建以后的发展情形说：

> 明末之世，浙、闽义师相联合，故洪门之传布，由闽而先入于浙。浙人广为传布，以达于江苏，遂及于江西。……既遭挫败，伪帝康熙乃大施淫威，于是天地会之党徒，遂绝迹于浙江、江苏、江西。其在福建者，满政府反不及知。于是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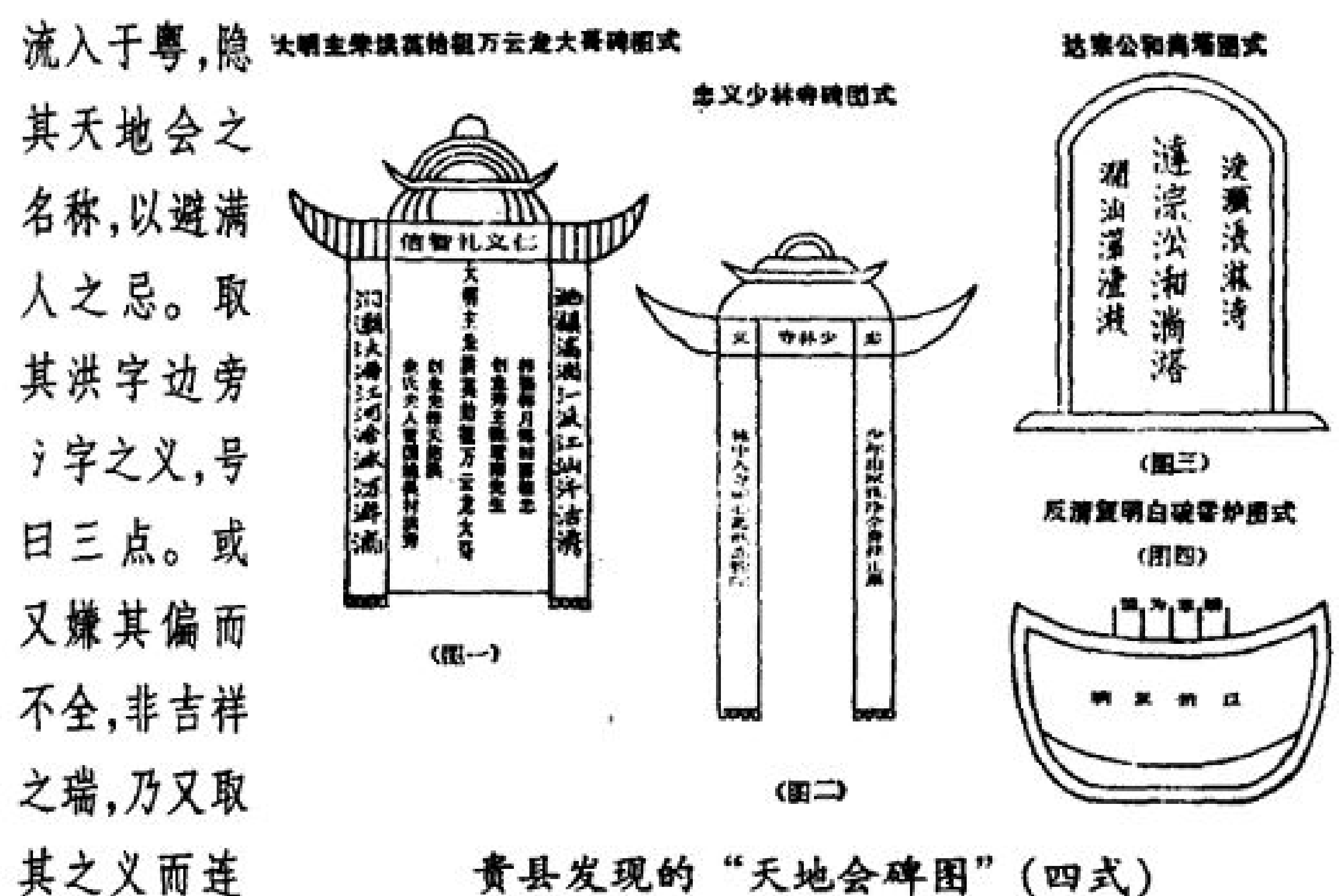
---

① 天地会创立于何时，学界有多种不同见解。从康熙《大清律例》有处罚"异姓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的条文；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部·奸徒结盟》所订的条款考察，以创立于康熙时为可信。近人徐珂的《清稗类钞》，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及罗尔纲的《水浒传与天地会》等均持此说。

② 引自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四。又《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问你乜时到》作："义兄查我何时辰，岁次年来是甲寅。孟秋吉月二十五，但逢好时便生人。"《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问八字》诗作："义兄问我几时辰，岁次年来是甲寅。孟秋月逢念五日，时交子丑生我身。"俱见罗尔纲《困学丛书》第一种《天地会文献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③ 又参见《白碇香炉插草诗》第四首。俱见《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

流入于粤，隐其天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其洪字边旁氵字之义，号曰三点。或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其之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于是由粤而赣而桂，三点、三合之势大著也。①



贵县发现的"天地会碑图"（四式）

天地会何时进入广西活动难以确切考明。但早在1729年11月27日（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清帝胤禛在一份诏谕中指出："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② 此类"妖言"和举动，和天地会的作为并无二致，而且反映了当时斗争的激烈情况。说明天地会创立半个世纪左右，广西就有它的成员在活动了。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又有苍梧县人李继久、陈兴远约集广东广宁县人仇德广，高明县人梁继舟"纠约多人，结拜弟兄，设立牙签会名目"。在县内向富户抢夺牛只、银钱。③ 因为此类事件尚不很多，而且地方官员"讳言盗匪"，粉饰太平。所以，直到1807年（嘉庆十二年），巡抚恩长仍然奏称："广西民人风

---

① 引自《教会源流考》。

② 雍正朝《东华录》卷一五。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一，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谕，据孙士毅等奏。

气淳朴，向无结会为匪之事。”但就在这一年，平乐县就捕获了天地会分子邓弗成等61名，另有“会匪首犯”李元隆、张世聪、杨开来三人及同伙34名正在“查拿”之中。这些人，据说都是“广东会匪”，潜入平乐陇家岭地方聚众“焚香设誓”，“结会拜盟”，“欲复兴天地会名目”[①] 的。与此同时，还有广东人潘老草在上林县“拈香领众，跪拜结会”[②]。1808年，又有广东南海人颜亚贵在贵县以焚香结盟的同样方式，纠集多人结会。[③] 1810年，更有沈惠平、万义兴等在宣化县（今南宁市）“纠众结拜添弟会（天地会——引者），伪称万户侯，胁逼下关地方尽人匪党，几成大变”的记载。[④] 在此之前，武缘（今武鸣）的林崇三，宜山的潘涛，容县的黎树，归顺州（今靖西县）的李添保等也集众组会起事。[⑤] 据统计，1811年，刑部奏办的“匪徒拜会起事”案共30余起，“广西之案竟有二十余起”。[⑥] 当时，因为沿海多事，而天地会屡遭镇压，其成员纷纷向广西转移，所以，到了道光初年，天地会在广西的活动已经相当普遍。全省十一府一直隶州，除太平府外，都有天地会“串同土棍勾结为匪”，反抗官府的警报。1821年2月12日（道光元年正月初十日），巡抚赵慎畛对广西的“匪徒拜会”情况做了一次汇报说：

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天地），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薄腰凭，称为大哥、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六，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谕。

② 嘉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嘉庆年间天地会组织与传会手段的演变》，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③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恩长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四，《兵事志·前事五》。

⑤ 《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四，嘉庆十五年九月初八日谕；同书卷二四九，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三日谕。

⑥ 《清仁宗实录》卷二四八，嘉庆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谕。

> 师傅；或传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情形不同，其名则一。现严饬查拿，获盗犯会匪一千二百余名。复通饬建设望楼，发给规条，守望相助，并刊简明告示，晓以利害，至土民、瑶、壮人等俱安分乐业。①

赵慎畛奏报拿获的1200余名，是1820年在灌阳、阳朔、恭城、思恩（今环江县）、宜山、贺县、郁林、荔浦、上林等州县清查出来的。在这些人中，不但有“外省游民，地方土棍”，而且还有灌阳、梧州、北流、迁江（今分属来宾县、合山市）、百色等处的县差、汛兵以及各类“在官人役”。他们入会以后，“预为通信包庇”，使官府防不胜防。② 赵慎畛在清廷“严切根究，勿留余孽”的指示下，把蒋五益、唐之莪、曹华容等十人“枭首示众”，文毓学、蒋拐头、尹锡贵等100余人“遣去新疆万里之外”。为了平息日益扩大的“结会

道光十一年清廷命地方督抚严查广西怀远等地会党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二。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三六四，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谕。

造反"风潮，赵慎畛在以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动员全省绅耆，建设望楼，刊发十家牌，编查户口，举行团练，以期守望相助。并仿古人月吉读法之意，举行乡约，"以举贡生员俊秀耆老为约长"，"以期俗易风移"，从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①]

1821年颁行的《乡约条规》，除讲述所谓"贼情"和订立"乡约"的用意之外，共订有"条规"40条。其中又以"禁盗贼拜会"为主。一面申明"结拜添弟会乃第一件犯法的事"，说"进了添弟会，便是朝廷第一罪人"；"做大哥、师傅的，先受极刑处死，拜会纠人的，斩罪处死；拜会而兼为匪的，绞罪处死……那次等问遣罪的，解往新疆万里之外"。一面用歌谣的形式，提出劝诫，所谓"好百姓，莫拜会"，"拜会结盟罪重罪。告发获破受严刑，禁押折磨贻后悔。路边圩口挂人头，都是从前逞强辈"。但是，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无论是劝戒、恫吓或镇压，都消弭不了人民的反抗。《乡约条规》颁行不久，桂林城外的大河圩，就出现了所谓"匪徒"聚众拜会，"图谋不轨"的事件。[②] 1831年（道光十一年），桂北怀远县（今三江县）古宜地方，又有广东船民吴老二以杨石有家为据点，纠约马正邦、蒋倡华等"兴会结拜"[③]。第二年，广西贺县，湖南永州与广东连州等地的人民互相联合，发动了以瑶民为主的反清斗争。[④] 鸦片战争期间，广西兴业县发生了邓亚裕等"聚众劫饷"[⑤]；桂平县"会匪"洗劫越南贡使船只[⑥] 等重大案件。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震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同时激化。天地会更成为人民聚集力量，开展斗争的组织形式，而广西成

---

① 道光元年《乡约条规》，广西桂林图书馆藏。

② 道光五年临桂《大河圩二十二村联村乡约碑》。碑立大河圩码头，1973年访得。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一九六，道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谕。

④ 参看《清宣宗实录》卷二〇九，道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谕；同书卷二一一，同年五月初七日谕。梁培瑛：《贺县志》卷五《前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十七册，《会党类》。

⑤ 《林则徐日记》，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记事。

⑥ 《清宣宗实录》卷四〇四，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谕。

了会党活动的重要舞台。请看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的描写：

> 自英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潜入梧（州）、浔（州）江面行劫，或逸出南（宁）、太（平）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外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①

龙启瑞论述鸦片战后广西“盗匪之患”，除了粤东客民入桂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之外，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的影响，他写道：

> 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毗连。……事平后，壮丁失业，猾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用是党滋益多。②

所谓失业丁壮，烟贩盐枭，多为会党中人，或在失业以后走投无路，转而加入天地会。梧州与郁林州毗连广东，对这种变动尤为敏感。且看地方志书的记载：

> 自道光二十年粤东禁烟洋务之乱，招募水勇，散而为盗，始则沿江劫掠，继则横行乡间。至是年（按：指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引者）而愈炽，陷邑破郡，扰延两省。③

郁林州属的各个州县，鸦片战争以后几年间，天地会组织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当时的情况是：

> 天地会又名添弟会……聚数十人或数百人定期结义拜盟，推一人为首，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则自称洪家，亦曰红家，逼胁乡村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曰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乙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云。④

当时，会党势力不但活动于巨州大邑，梧、浔江面，而且还深入到少数民族

---

① 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引自《粤西团练辑略序》，见《经德堂文集·内集》卷二。

③ 王栋：《苍梧县志》卷一八，《纪事下》。

④ 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八，《纪事编》。

居住的腹里山区，在那里秘密拜会结盟。1844年，封建官府专门在融县大苗山和介于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修仁与永安州的金秀大瑶山竖碑泐石，一则申明：严禁苗区“拜会结盟，窝留棍匪”；一则指出常有所谓“会匪”、“楚匪”进人活动，应予泐石示禁。[①] 广西既然到处有会党势力在活动，则“劫富济贫”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了。且举几例以证：

1845年，藤县有邓立奇、钟敏和据赤水圩“倡乱”。

1846年，又有吴英康、吴亚镜之“乱”。同一年，北流县发生了李二聚众“抢劫”大岺圩的巨案。在浔州，李观保纠众驾舟出没于黔水、浔江河面。从此，广西“会党家族”中又增添了“艇军”势力。[②]

总之，天地会势力在广西的发展，经历了从雍正至道光的100多年。其山堂“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形成了所谓“土匪纷起”，“通省群盗如毛”的混乱局面。[③] 1847年，雷再浩和李世德领导的起义，把广西天地会的反清斗争迅速推向了高潮。

二、震动八桂的“惊蛰之雷”

雷再浩湘南起义

雷再浩，湖南新宁县黄背峒瑶人。[④] 李世德，广西全州庄塘乡汉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们就互相往来，秘密拜会，成为当地有名的秘密会社的

① 道光二十四年《融县知县严禁苗区拜会碑》，碑立大苗山安泰区培科屯；同年《浔州府知府谕瑶民捕匪碑》，碑立大瑶山金秀屯。两碑拓片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②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九，光绪十五年。

③ 苏凤文：《堂匪总录·叙》；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④ 《清宣宗实录》卷四八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陆费瑔奏并清谕作“黄坡峒”。左宗棠：《江忠烈公行状》作“黄背峒”。

首领。1836年（道光十六年），新宁“瑶生”蓝正樽利用斋教组织群众，发起反清斗争，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被擒“尽法惩治”者千有余名，[①] 余众投奔雷再浩和李世德。他们“在新宁、全州界瑶山内倡习邪说，立棒棒会”[②]。湘、桂边区瑶、汉贫民踊跃参加，全州五排，新宁八峒等地，都有棒棒会的群众，声势极盛。

经过长期的联络、组织，雷再浩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先是派人在黄背峒、承天塘等处秘密铸造武器，继而派得力骨干李辉潜入新宁城中，以为内应。李世德则及时赶回全州庄塘，集合部众，建立寨栅固守，待机而动；并派子“家耀易姓名入省城，居边隅巷”，探听官军虚实。双方相约：“事起粤则再浩以一军应援，以一军缀楚兵；起楚，世德亦然。”[③] 雷再浩“纠党结会”、密谋起事的消息传到县城，官绅大哗。1847年10月，新宁知县李博会同清军把总方开甲率兵入八峒。但迫于会众声势，随即撤回县城，转与乡绅江忠源、邓树堃、邓新科等集团、募勇，把守各路要口。宝庆知府张镇南得到消息，也率兵勇赶至新宁坐镇。李博在城实行连坐，强迫居民“悔教自首”；并亲率胥役搜捕李辉。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李辉安然离开县城。

当时，雷再浩已经聚众数百人，驻扎在黄背峒、滑溪一带。面对敌人的调兵遣将，雷再浩立即“分其党为五营，给白挂红结，各以其方之色别其旗帜”，宣布起义。雷再浩、李世德同为大哥，以李尚开为中营大将，万连兴、刘祚旺为前营大将，龚卿宗为后营大将，萧富兴为左营大将，李必田、李佳柏为右营大将；李沅发为铁板，负责侦察、联络。另以陈新进、蒋武伦等分路负责策应，组成一支由湘、桂两省，瑶、汉等族人民共同战斗的农民起义

① 《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九，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抚吴荣光奏并清谕。同书卷二八二，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奏并清谕。又参同年二月二十九日纳尔经额奏，见王先谦：道光朝《东华录》卷三三。

②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光绪十五年。

③ 郑显鹤等纂：《宝庆府志》卷七，《大政记》。李家耀入桂林坐探事见黄泌等纂：《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

武装。

10月18日（九月初十日），江忠源、邓树堃等率团练进犯新宁南乡的盆溪、肖弓湾与水西一带。20日，李博、江忠源督乡勇2000人攻黄背峒。雷再浩以敌众我寡，且设防未固，避免和敌人主力接触，率队向全州庄塘转移，与李世德会合。李博、江忠源将黄背峒焚劫一空。21日，雷再浩在庄塘分兵进击盆溪村。第二天，复分兵两路，以偏师攻官家坪，主力袭全州咸水口，大败广西清兵。23日，方开甲、江忠源、邓新科等出兵勇千余人犯滑溪，企图牵制义军行动。雷再浩、李世德迅速回师庄塘，连克梅溪口、苦竹坪、邓家冲、栗岭、坐坪等地。天地会首领萧立山率众奋起响应，斩清军把总马瑞春等多名。全州震动。[①]

转战湘桂边区

庄塘紧靠湖南。义军向庄塘转移之际，清军及团勇正从四面八方向新宁集结。为了摆脱敌人的主力，建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斗基地，雷再浩、李世德决定向全州、兴安和城步之间的五排[②]进军。其地纵广百里，四面丛山峻岭，居两省三县交界边区，形势十分险要。而且是右营大将李佳柏、李必田的家乡，具有优越的群众基础。30日，雷再浩与萧立山联军入瓜岭，占五排。李世德焚毁庄塘寨栅，率队保护全军辎重、眷属，驻扎邓家冲与苦竹坪，与再浩军互为犄角之势。

湘桂边区人民起义的迅猛发展，惊动了清朝政府。它急忙命令湖南巡抚陆费瑔"飞饬文武员弁，选带兵役前往督拿，并于新宁县接壤各处，就近派兵堵缉"。同时命令广西巡抚郑祖琛"严饬全州文武员弁一体实力防堵，务将

---

① 参看曾国荃等纂《湖南省志》第一卷《上篇》；唐载生纂：《全县志》第五编，《前事》；《江忠烈公遗集》。

② 五排，旧为广西全州西延州地，今属资源县，主要包括车田、两水苗族乡和河口瑶族乡。

萧立山等上紧严拿，并各逸犯按名全行弋获，尽法严惩，不准一名漏网”。[1]在清王朝的严催之下，陆费瑔加派长（沙）宝（庆）道杨炳堃集中长沙、辰州、永州等地驻兵前往镇压。广西提督马殿甲也亲督兵勇赶赴西延，与湖南兵勇合攻五排。11月3日（九月二十六日），广西清军与团勇汇合，向五排进扑。雷再浩亲率部众迎敌，在小池发生激战，斩敌千总、外委以下官兵40余人，夺获抬枪12条，帐篷12顶，另有军火甚多。全军振奋。9日（十月初二日），杨炳堃、江忠源以兵勇千余人，从南竹分兵猛攻邓家冲、苦竹坪。李世德迫于众寡悬殊，且战且退，在转移中壮烈牺牲，雷再浩妻蓝氏等30余人也不幸被俘。[2] 雷再浩接获邓家冲义军被攻的消息，曾亲率大队赶往救援。但军未至而邓家冲已陷敌手，五排之门户洞开。于是，急弃五排，转移随滩。19日，在把火市与马殿甲军发生遭遇战。击伤敌都司何连标，斩敌守备李廷扬以下官兵80余名，缴获抬枪22条，鸟枪数十支，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把火市获胜以后，雷再浩率众进驻董家峒，直逼龙塘。25日，再克咸水口。在进军中接连与湘、桂两省兵勇交战，右营大将李佳柏不幸战死。但沿途瑶、汉贫民踊跃参加义军，队伍仍有千人以上。雷再浩、李辉等鉴于流动作战不利，决定回师新宁，以山高林密，地势险阻，群众基础良好的瑶区八峒为根据地。29日黎明，义军分兵两路，在大雾迷蒙中猛攻新宁遍西之深冲峒，直人八峒山区，设防固守。

面对深山高垒，清军束手无策。杨炳堃、江忠源转用反间之计，从起义队伍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在新宁县城找到陈新进的妻子，要她劝夫“乘间阴图再浩以自赎，且可转祸为福”[3]。陈新进见信动摇，遂与中营大将李尚开密谋叛变。他们一面向雷再浩建议：“军出八峒，北攻武冈”；一面却把进军消

---

[1] 《清宣宗实录》卷四四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谕。

[2] 《清宣宗实录》卷四四九，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初七日谕。李世德之死，《清宣宗实录》、《湖南通志》皆云被敌人“枪伤毙命”。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说是苦竹坪被陷，世德愤而自杀。

[3] 刘长佑等纂：《新宁县志》卷一六，《兵事志》。

息及路线报告了敌人，并“预约清军设伏以待”。雷再浩没有识破敌人的阴谋，于12月3日（十月二十六日）由八峒进军至毛安，遭到杨炳堃、江忠源千余兵勇的伏击。结果，义军主要将目40余人不幸被俘，队伍溃散。雷再浩走避不及，被李尚开、陈新进捆绑，送入敌营邀功。李辉在敌人遍搜山峒时亦不幸被捕。敌人把雷再浩和李辉解赴长沙，用酷刑把他们处死！但是，叛徒陈新进和李尚开也并不因此而“转祸为福”。封建官府把他们流放边远地区，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①

惊雷动八桂

雷再浩、李世德为首的反清斗争，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它组织了武装，立有旗号，公开与封建官府兵戎相见，转战两省，其影响之广泛、深远，与以前的蛰伏一地，时起时伏，小打小闹的“结盟拜会”迥然不同。它恰似一声春雷，把蛰伏各地的反抗势力调动起来，掀开了近代广西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有的论者把它视为近代“广西盗匪煽乱之始”，② 原因也正在这里。且看起义失败后广西各地的情形：

> 道光二十七年秋九月，雷再浩、李世德倡乱，各府、州、县土匪乘机窃发，先自平乐始……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肆。③

在桂东，以平乐为中心，有范连德、张八、李观生、辣椒李、欧三才、李二、廖满、何嵩等，均与雷再浩、李世德联系，并于12月8日（十一月初一日）起，由张八等率党数千，“迭扑郡城”④。

省城南边的阳朔，有“董光寿在矮山圩外之瓦缸厂起事。十一月朔，率

① 参看《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② 莫炳奎纂：《邕宁县志》卷四，《兵事志·前事五》。
③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二。
④ 张智林：《平乐县志》卷八，《前事》。

众夜扑阳朔县城。知县文滋盛惧，欲遁去。幸得营兵炮毙数十匪，败去。次夜，复袭城，亦败去"①。

光绪年间，佚名纂《修仁县志续集》纪事云："道光二十七年，逆匪罗大江（纲）、范连德乘湖南雷再浩之势，滋扰平乐、修仁、荔浦等县。"

广西东南各州县，也多受雷再浩起义的影响。在北流县，有所谓"雷再浩乱，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拈香拜盟，劫掠商旅，伙劫村落"的报道。② 在容县，发生了"冯六纠党倡乱于自良圩"。当时，也是因为"雷再浩作乱，各州县土匪蜂起。……结盟拜会，当圩设立土马、广马、大坡马诸贼馆，由是盗风四起云。"③

1851年11月7日（咸丰元年九月十五日），永淳壮人杨隆盛、黄可经等聚众拜会，以豁免官租民租为号召。次年，拥李文彩为首领，同起抗租。声言："一县之地，皆我壮人祖上开荒自种，所有租谷，全不用纳。……于是一唱百和，愈聚愈众。"④

苏凤文编写《堂匪总录》，概括了雷再浩起义后的广西形势说：

> 广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纷起……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败复聚，或旋起旋灭，或附外匪大股……负隅抗拒。少或数十人，多或数百人，数千人者。⑤

这种"土匪"纷起于全省的形势，也是雷再浩、李世德起义以后迅速出现的。

① 黎启勋纂：《阳朔县志》卷二，《前事》。
② 李士琨等纂：《北流县志》卷二〇，《纪事》。
③ 封祝唐等纂：《容县志》卷二七，《旧闻志·前事下》。
④ 《永淳县主刁汝元禀》，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下册。
⑤ 《堂匪总录·叙》。

三、李自昌、张嘉祥聚众起事

李自昌聚众横州

雷再浩起义失败不到四个月，在桂西南的横州（今横县），又响起了李自昌率众起义的号角。顷刻之间，驰骋于两粤边区与广西中部，给封建统治者以猛烈的冲击。

李自昌，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乃当地著名的天地会首领。他先在钦州率领会众，到处“勒索富户助饷，掠取屯积谷米”。对于一般居民，则“不甚掳掠”，[1] 表现了会党“劫富济贫”的精神。由于到处攻击，行动“飘忽靡定”。所以，反动统治者诬称为“流贼”。[2]

1848年3月（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李自昌与横州的谢江殿，贵县的徐阿云、张嘉祥，以及广东灵山的苏三相等，在一个风高月暗的夜晚，秘密聚会于横州大滩伏波庙内，宣誓起义。并以博合圩（今称百合圩）为据点，“竖旗聚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和“杀官留民”等口号。[3] 深受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他们在贵县、横州和灵山、钦州各地“抢劫”当铺与地主官家的住宅，并控制了浔江两岸广大地区。同年6月（五月），李自昌率众在横州南乡查抄商船20余号，缴去一万余金，使粤货入滇通路为之中断。清廷接报大为震惊，迭令广西巡抚郑祖琛等督饬“州县营员严密访查确实，不准

① 陈德周纂：《钦县志》卷一四，《纪事志·匪乱》。

② 《平桂纪略》卷一。

③ 参看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前事》；陈尔训等纂：《永淳县志》卷八，《杂记》；王辑熙等纂：《横县志》第五编，《前事》。

一名漏网”。结果一无所获。[1] 清军派队来攻，也屡为所败。灵山李士奎，合浦方晚，博白刘八以及南宁、上思、钦州等地的会党武装纷纷前来会合，队伍迅速发展至万人以上。不久，李自昌死，部众转归张嘉祥、苏三相等统率。[2]

张嘉祥崛起贵县

张嘉祥，广东高要人（今肇庆），本是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经常出入于赌博场中的亡命之徒。入贵县后，在水源街全昌咸货店为佣，暗中常与同党至石罅、覃塘各村圩“掳人勒赎”，并劫掠附城的大源、浩源诸当铺。自参与李自昌主持的横州举义以后，更着意四出活动，聚众结会。自昌死，张嘉祥独树一帜，并于1849年9月6日（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率众千余人入驻贵县覃塘圩，张贴文告，“纠人入伙”。[3] 所部皆以红巾包头，旗帜除大书“替天行道”，“借富济贫”，“杀官留民”外，更以歌谣形式，鼓动贫民入伙。歌谣是：

上等之人欠我钱，
中等之人得觉眠，
下等之人跟我去，
胜过租牛耕瘦田。

用通俗易懂的民歌语言，指出斗争的对象，稳住了中等人家，号召被封建统治者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下等人”起来，向“上等之人”造反。虽然它反映的是那些脱离农村，不事农业生产，希望到处游荡的游民无产者的思想。[4]

---

① 《清宣宗实录》卷四五八，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谕。

② 方玉润：《星烈日记》丙辰四月十九日记云：“自倡（昌）中炮死，众拥家祥为首。”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

③ 梁崇鼎等纂：《贵县志》卷一七，《前事》。

④ 参看拙文《太平军联语与歌谣口号》，见《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但对于那些缺衣乏食、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农民，也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歌谣一经提出，就在广大城乡不胫而走，激起了很大的回响。时有“强如狼，弱如羊，济弱锄强张嘉祥”之谚，或曰“劫富救贫张嘉祥”。①

经过一番号召组织，11月3日（九月十九日），张嘉祥率众自覃塘人宾州（今宾阳县）甘棠圩。浔州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督兵堵截被挫，千总段炳南，外委巫宜福被杀，全军惊散。张嘉祥乘机转攻永淳县城，缴获甚丰。与此同时，颜品瑶、吴长腰四等崛起于邕宁，王锡彬、王锡凤等起事于郁林州蒲塘圩，与宾州、永淳的张嘉祥互相呼应。清军首尾受制，大为恐慌。左江镇总兵盛筠与顾元凯被迫改“剿”为“抚”，派人往劝张嘉祥出降。这个出身无赖、有奶即娘的家伙，为了一己的功名利禄，竟然接受敌人的招抚，成了可耻的叛徒！②

招抚扑灭不了反抗之火

封建统治者招抚了张嘉祥，却动摇不了成千上万的造反者。极少数人被张嘉祥用欺骗、挟持的手段带走了，绝大多数人却继续高举反抗的大旗，把反清与“杀官留民”的斗争烈火烧得更旺。张嘉祥叛变后半年，有人向清廷谈及广西“会匪猖獗”的情形说：

> 广西自去年贼首张嘉祥滋事，官兵不能捕获而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溃（贵）、陈亚芬、陈山猪羊等，武宣则梁亚九、刘官山，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皆分股肆扰，而陈亚溃（贵）一

---

①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四，《兵事志·前事五》。

② 参看魏笃《浔州府志》卷五六，《前事》；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八，《纪事编》；王辑熙等：《横县志》第五编，《前事》；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四，《兵事志·前事五》，但说太平军在金田起义时，张嘉祥曾经参加，后因向荣用反间计，“张遂降清”。又薛福成：《庸庵笔记》，明心道人：《发逆初记》以及《清史列传》之《张国梁传》，对他降清前的事实多虚构粉饰，均不可信。

股为尤甚。值此盗风日炽，该省州县缉捕懈弛，已可概见。①

其实，这仅是当时广西部分府、州的情况。省情如此，县情亦然。且以张嘉祥曾经久踞的贵县为例：

（盛）筠以首尾牵制，遂招抚家（嘉）祥。于是，杨睿清起大圩，黎特弟起五山，汤西利起黄练，钟亚春起桥圩，郑廷辉、谭特养起三里，徐亚云、邱二娘起瓦塘，雷树春、黄阿左、黄阿右、苏十九、张渣三等起木梓、木格，杨捞家起南鸡桥，覃七大、黄老三起钟村圩，四出焚劫，民不聊生。而大井头土贼王阿壮、王兴福、王升高等遂挟制富商敛银守街，勾结巨寇卢亚相率贼船二十余泊城下，指名勒索。亚相既去，又纠杨睿清以赛衙神为名，率匪党七、八十人，手执炮械，扬扬入县署而出桥圩，木格、君子洞各匪复在瓦塘、湛江诸处攻劫城池。而大头羊、大鲤鱼、卷咀狗、麦十二等或来城聚赌，或勒银包船。烽火之警，日夜不绝。②

在藤县、苍梧县之间坚持斗争了多年的平地王邓立奇，高山王钟敏和，这时也各率所部数百人，从赤水圩出发，进至苍梧县属的思德、安平、平政、多贤等地，控制了梧州和抚河水口。另一个藤县人唐文忠，则聚众击毙城守邓绍邦，攻人苍梧县境。他们都给地方官府以巨大的威胁。③ 说明封建统治者收买了张嘉祥，并不能逃避人民起义的冲击。所谓“民不聊生”，正是那些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写照。

张嘉祥向敌人屈膝投降以后，更名张国梁，虽然赤胆忠心地为清王朝卖命，镇压了南宁等地的会党武装潘宝源、颜品瑶等二十余部之多。④ 用屠杀

①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谕郑祖琛上紧缉捕陈亚贵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② 魏笃：《浔州府志》卷五六，《前事》。

③ 边其晋等纂：《藤县志》卷二一，《纪事志》；王栋：《苍梧县志》卷一八，《纪事下》。

④ 过铸：《向张二公传忠录》。

起义者的罪恶勾当，表示自己对主子的忠诚。但是，统治者对于招抚过来的叛徒，常怀戒备之心。1851年2月，正当太平军金田起义、东出大湟江口之际，清王朝命令李星沅等齐心协力围攻太平军时，就有过这样的嘱咐：

> 所称张嘉祥带勇杀敌，未必暗与贼通。现当用人之际，若果可资得力，自当用其所长，俾得立功自效。若察看情形，反复无常，难于驾驭，则翦除奸匪内应，庶不堕其术中，总宜随时体察，勿稍游移，致有漏泄为要。①

封建统治者的如此态度，说明了叛徒的可耻与悲哀！

张嘉祥是在起义向前发展时投降敌人的。而另一位会党首领却在起义处于逆境时不屈不挠，英勇复出，向封建统治者发起新的进攻。他就是武宣联义堂的陈亚贵。

四、陈亚贵武宣誓师

东乡“盗头”陈亚贵

陈亚贵，武宣县东乡下平岭人。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壮族农民家庭里，父名陈胜，习称矮古二，又作隘古二；弟名陈火交，又名陈二。陈亚贵从小受尽地主的欺凌侮辱，炼就了坚强的造反性格。成年以后，身材魁伟，力大过人。但是，因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一年到头经常处于挨饥受冻之中，生活十分痛苦。② 下平岭北去东乡6华里。从东乡行数里，过猪仔峡，越双髻顶，就是“层崖叠嶂，深林密箐”的紫荆山。从下平岭西南行30里，可达黔

① 《清文宗实录》卷二五，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谕。

② 据1974年4月武宣东乡实地调查。又参魏笃《浔州府志》卷五六，《纪事》；庞赓辛纂：《武宣县志》第五编，《前事》。

江的勒马渡，顺流而下，穿碧滩、断藤峡，可出浔江。陈亚贵在年青时，为了生活，经常奔走于深山大河之间。1846年秋（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桂平旧峡村人李观先与任文炳、刘阿乌等“聚党劫江上”，陈亚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成了纵横于广西江河的所谓“艇贼”的一员。从此，他开始了“劫富济贫”的战斗生活，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目。①

东乡誓师，四起四落

陈亚贵初起时，曾依附于东乡团总、米饭主刘观先。② 那时候，广东钦州天地会首领覃香晚③ 潜入广西宾州，以贩卖药材为掩护，与石牙村的黄启珍联络，图谋起事。1848年4月（道光二十八年三月），覃香晚、黄启珍自宾州人武宣东乡与陈亚贵会合，誓师起事。随即率众北上，进攻修仁、荔浦。没收地主富户的谷米钱财，颇有所获。不久，回聚东乡。同年秋间，分队进入宾州、桂平。清军及团勇分路反扑。覃香晚率队占据石牙，黄启珍率众退往来宾，不幸被兵勇擒杀，独陈亚贵得免于难，退据东乡。④

这次起事失败后，陈亚贵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武宣、桂平等地重新组织力量，联络友军，力图再举。1849年9月（道光二十九年八月），陈亚贵与刘山猪箭、黄糯米四等聚众数千人，再度在东乡誓师起义，进出于禄新区，分队屯扎于河龙一带村庄。未几，率众千余进象州大乐，没收富户韦泰山家，缴获钱布甚多，以之散给部众及各乡贫苦无告者。清兵与团勇群起反扑。陈亚贵转入桂平十八山，扼险固守。刘观先竟起团与兵勇配合，自东乡追入鹏

---

① 魏笃：《浔州府志》卷五六，《前事》；《股匪总录》卷三；《堂匪总录》卷九。

②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

③ 覃香晚别号沉香晚。《平桂纪略》、《浔州府志》诸书记作陈香晚。《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作覃香晚。《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除记覃香晚与陈亚贵合作起事外，又有钦州秦兴晚与陈亚贵联合之说。其实，秦兴晚即覃香晚之误，并非二人。

④ 庞赓辛：《武宣县志》第五编，《前事》。

隘山界。未几，陈亚贵与黄糯米四、刘山猪箭联合，“寻仇东乡团”，执杀出尔反尔的刘观先。次年2月，再与黄糯米四联合，率众千余，入象州白石、寺村等地。武宣团练头目刘季三、黄廷龙等纠集团练，配合清兵出拒。陈亚贵率队于象州、武宣交界之庙旺、大林等地与团练发生激战，不利，返归东乡。旋由修仁桐木圩出头排，阻于石墙卡，遂将部众分数队突围。陈亚贵退据桂平紫荆山之二十四冲。刘季三、黄廷龙恼羞成怒，纠合清兵直入下平岭，对陈亚贵家乡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陈亚贵之父陈胜，弟陈火交及其妻子等不幸被俘，解往武宣县城严刑拷问亚贵所在，并“勒令投降免罪”，皆遭拒绝。黄廷龙等无计可施，竟将亚贵父及妻杀害。

正当清军与团勇在东乡、下平岭大肆焚掠之际，陈亚贵从紫荆山秘密西出，渡过黔江，直逼桂平县之六蒙、山心村，向桂平与贵县交界之石龙圩逼近。不幸为武平里团练所败，部众损失殆尽。武宣知县刘作肃复率团勇入东乡，在所谓“清乡”中屠杀无辜200余人。[①]

失败并没有把陈亚贵压倒。6月，陈亚贵转与郑廷威、胡亚金等联合，拥众3000余人，自桂平、武宣、象州直逼柳州府城，攻城一月，缴获甚多。广西提督闵正凤紧闭城门，不敢出城。[②] 7月，陈亚贵在李亚居率众配合下，自柳州南下，入贵县龙山圩。不久，回师武宣。8月，再率部出山，连克修仁、荔浦两县城。所过之处，“不伤居民”，只“向各巨商及当商、盐商索资斧”。[③] 清廷闻报修仁、荔浦失守，桂林省城危急，焦虑万分，急调广东兵2000名兼程入桂，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前云南提督张必禄分途赶往广西，协同郑祖琛“剿办盗匪”。旋又调陕西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并飞咨湖南、

① 参看庞赓辛《武宣县志》第五编，《前事》；《浔州府志》卷五，《前事》。但说桂平武平里石龙圩之役，清兵勇“斩首二千余级，擒获二千人”，殊属夸大。据刘策群《象县志》第六编《前事》；覃元苏《象州乱略记》记载，当时陈亚贵与猪肚四联合，共有众“千余”。

② 《清文宗实录》卷一五，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一日谕。

③ 曹骏等纂：《荔浦县志》卷二，《武备》。

贵州各省于交界处所堵御，勿令蔓延”。①

但是，清军的调度部署尚未完成，陈亚贵已经主动撤出荔浦、修仁，从四排赴寨沙、鹿寨，主力下导江、运江，另支入迁江县城，到处“攻劫”。②10月，聚众再回武宣三里圩。浔州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与舒春等率兵勇围攻三里，几经战斗，陈亚贵败退桂平、武宣交界之罗渌山中。清兵及团勇尾追不舍，深入山中搜捕。碧滩地主黎建勋率团练堵截双髻山、猪仔峡。陈亚贵在转移中不幸被俘，解送桂平。③临刑前陈亚贵仍头扎红巾，身穿绸缎衣服，谈笑自若。刽子手褫衣逼跪。亚贵坚拒，且怒斥曰：“你们不是骂我为盗头么？杀头可以，要剥衣、下跪万万不能。”刽子手怒极，挥刀劈向亚贵，鲜血四溅，随即仆倒地上，但犹圆睁两眼，至死不屈。④

陈亚贵从1846年联合李观保、任文炳等公开竖旗反清，到1850年11月（道光三十年九、十月之交）被俘牺牲，五年之间，四起四落。时而“聚众千余”或“聚众数千”，驰骋于武宣、贵县、桂平、象州、宾州、迁江、来宾、柳州、修仁与荔浦等地，攻掠城池，抄没富户，把封建官绅打得坐卧不安；时而兵败势孤，潜伏山谷，虽极艰苦，但绝不动摇。以陈亚贵为首，联合各地反清力量构成的会党武装，无疑是鸦片战争后广西会党起义的重要力量。

---

① 《清文宗实录》卷一六，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谕。

②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郑祖琛、闵正凤奏。

③ 《浔州府志》卷五六，《前事》；咸丰《东华续录》卷五，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七日郑祖琛奏；同书卷六，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劳崇光、向荣奏。

④ 1974年4月，笔者在武宣东乡调查采访时，据宁村80岁老人黄胜昌、下武兰村76岁老人梁子材等讲述。

五、李沅发再举义旗

“铁板”李沅发

1849年11月，距离雷再浩失败不满两周年，他的老部下李沅发[①] 又高举武装反清旗帜，转战于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边区约20几个州县之间，把19世纪40年代的湘、粤、桂天地会大起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沅发，湖南省新宁县水头村人。母蒋氏早故，并无兄弟及妻儿，惟与父李成周佃田耕种。因为税租太重，仅靠佃耕无法维持生活，农闲时兼打草鞋出卖或者帮工谋生。据说：他曾在县学署内充任火夫。每年夏秋之后，则以肩挑新宁特产林檎果（花红果）至广西全州出卖，以帮家用。这种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和城里的“胥吏皂隶”交通往来，而且密切了与桂北各地人民的联系，为以后发动反清起义创造了条件。

如前述，雷再浩、李世德起义时，李沅发曾经参加，在起义军中担任“铁板”，所以，他早就和会党发生联系，具有“劫富济贫”的反抗思想。他“方头大脸，身材结实，个子高大，蓄着长发，但不结辫子，头上只打一个顶髻”。为人落拓不羁。雷再浩起义时，他刚满30岁。四出鼓动联络，出色地完成“铁饭”应做的工

① 百多年来，众多的论者认为：李沅发是雷再浩的“余部”或“余党”。而《李沅发口述》（见《近代史资料》，1963（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之《清代档案史料》第二辑改作《李沅发供单》）说：“我实因结会劫富济贫，后因戕官，才起兵谋反，并非雷再浩余党。”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湖南巡抚冯德馨奏，亦说李沅发“并非雷再浩余党”（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现从他担任雷再浩起义的总铁板，后又把雷再浩的婶娘“留在营中收养”看，他和雷再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作。起义失败以后,他潜伏乡间,改用"靶子会"秘密组织群众。雷再浩余党千余人复来归附,成为湘桂边区会党的重要首领之一。

1849年夏，新宁多雨，谷价暴涨，四乡大饥。官府富户乘机囤积，只将少量宾兴义谷重利出借，多数饥民因此断粮，群情激愤。李沅发与谢有兴、刘复倡等商议，公开"兴立靶子会，结拜弟兄"，"劫富济贫"。知县万鼎恩探得消息，急调兵勇进行破坏，将靶子会的"同伙杨倡实、李世英拿去监禁"。李沅发立即聚众300多人，约定11月27日（十月十三日）进城劫狱，正式起事。三更时分，"先在东门外放火，烧毁文昌书院"。衙门差役卢万生等打开东门，接应大队进城。首先破毁监狱，救出杨倡实、李世英，杀死领兵顽抗的万鼎恩，清算前知县李博家。命令"众弟兄一律蓄发"。并派人分路召集各路兄弟，两、三日间，邀得同会并乡民近2000人进城防守。每人分给一块红布或蓝布为号。又"派多人或扮成乞丐，或充客商，分赴楚、粤两省纠人；一面探听官兵消息"，一面在城内设立五营：以谢尚兴管前营，罗沅发管后营，陈尔坤管左营，罗登爵管右营，刘复倡管中营，俱称大哥。李沅发为总大哥。此外，还有"铁板"大小头目多人分管各事。城上插有号旗，距城二三十里之要口，均派弟兄设卡把守。[1] 有一首民谣，描绘了李沅发起义据城的情况：

大哥带了六百兵，
威威武武走进城。
杀了万太爷，
发谷救饥民。
烧了义学堂，
接着放囚民。

李沅发占据县城，杀官释囚的行动，吓坏了新宁县的地主官绅。当年起团镇

[1] 据《李沅发口述》。又参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护理湖南巡抚、布政使万贡珍奏；同年十一月初四日湖广总督裕泰奏。俱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压雷再浩的江忠源、邓树堃等，匆忙调动四乡团练，围困县城，“以待官军”。[①] 新宁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也一面向上请兵，一面督办团练。他们封锁城门，“并搜捕在外余党”。把新宁四乡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接着，护理湖南巡抚、布政使万贡珍分别从永州、镇筸、衡州、辰沅、常德、长宝各镇、协，道中调兵赶到新宁，会同乡团共1万余人，围攻县城，并多次用地雷轰塌城墙。李沅发以2000之众，抗击五倍于己的敌人，“日出挑战，营兵伤者甚众”。[②] 坚守城池46日。1850年元旦之夜（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阴雨夜黑”。李沅发“派人在南门放火开炮，假意与官兵接仗。到四更时，邀同众弟兄由东北角学宫背后，用木梯爬城”，突破敌人的封锁；李沅发之叔李承奠与罗登甲率弟兄200余人在城外接应，全军安全进入城东大山。[③]“已而官军入城，骚扰淫掠，十倍于贼。”[④] 而巡抚冯德馨[⑤] 却报称：经一昼夜“冒死奋击”，“登城巷战，焚杀贼匪无算，生擒一百六十余名，夺获枪炮刀矛旗帜马匹一百数十余件，救出男妇二百余名”。“李沅发已被焚杀。”“又遍城穷搜，杀毙余匪不计其数”云云，[⑥] 清廷接获奏报，在下令奖励有“功”的同时，又提出“匪首李沅发果否已被焚杀”的问题。声称：“倘含混奏称歼毙，日后仍有李沅发其人，一经发觉，朕惟该抚等是问。”[⑦]

驰骋于湘、桂、黔边区

当冯德馨伪造战报，以败为胜，“上报奏捷”的时候，李沅发已率队进入

---

① 曾国荃等撰：《湖南通志》卷八九，《武备志》十二，《兵事四》。

② 刘长佑：《新宁县志》卷一六，《兵事志》；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据《刘武慎公遗集》本。

③ 《李沅发口述》。

④ 引自《凌霄一士随笔》。

⑤ 冯德馨于是年8月21日（七月初四日）由江宁布政使调任湖南巡抚。

⑥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冯德馨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又参《凌霄一士随笔》。

⑦ 《清宣宗实录》卷四七五，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谕。

东乡的深冲及附近瑶峒。13日（十二月初一日），大败团兵于丫口岭，连克大绢、麻林、桃盆、圳源诸峒。各地群众纷纷来归，广西猫儿山及五排等地群众，在李承莫亲临发动下，不少弟兄转入新宁参加战斗。义军队伍又增至二三千人。16日（初四日），在深冲、八角亭等地与追击的敌人发生战斗，大败清兵及刘长佑、江忠源所部团勇，擒斩数百人，守备熊钧、经历刘炳南同时丧命。随即挥军翻山入广西，连克西延、龙塘、葱坪、银矿山、烟竹坪、茱坪等地，声威大震。冯德馨谎报“焚杀”李沅发，“新宁匪徒业已剿平”的骗局不戳自穿。冯德馨虽然挖空心思，另编新词说：“现有广西五排人李元宝等，听闻李沅发已被官兵焚杀，叫伊打听官兵乡勇多少，定期纠人入股”，分路由广西“前往新宁为李沅发报复”。① 但仍逃脱不了被革职的处分。一并革职的还有提督英俊、长宝道杨炳堃等，另以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办理军务，改派戚天保为新宁知县，共同镇压革命。②

李沅发率众进入广西以后，队伍迅速扩大。于是，在军中“设立十行名目，一人管带十人，添造各种旗帜，并在‘铁板’内挑选先锋”，众称李沅发为“王爷”。③ 沅发与先锋陈瑀光、李绍书等商议，以“众弟兄都能翻山走路”，可以往来冲杀，决定在桂北边沿山区流动作战，机动地打击敌人。④ 这种注意发挥队伍长处的作战方针，自然是好的。但忽略了建立一个可以进攻退守的巩固基地，又是严重的失策。

1850年初旬以后（道光三十年正月初旬），李沅发率军南下，转战于兴安、灵川、永福等县，大败清军及各地团勇。随又北上五排，向湖南城步挺

---

①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冯德馨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② 见《清文宗实录》卷六。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谕。又：向荣于1850年3月调任湖南提督。

③ 据《李沅发口述》。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大事记》（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开明书店，1950。）记载：道光三十年四月，李沅发在新宁“自称抚江王”。

④ 据《李沅发口述》。

进，直逼新宁。[1] 因地方乡团拼死阻截，遂从城步回攻广西，大败清军于龙胜厅之潮涌山，杀敌参将马隆阿及兵勇多人。3月8日（正月二十五日），进抵怀远县北的古宜，在漫天风雨中与兵勇战于阴木坪。敌人用的多是枪炮，雨战中不能发挥作用，被义军的刀矛打得大败，都司邓宗武及守备苏秉华，千总周荣等官兵数十人同时毙命。[2] 桂北各州县的人民踊跃加入义军，队伍发展至四五千人。

义军势力的迅速发展，使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十几个州县，成了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战场。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清王朝一再命令郑祖琛与贵州巡抚乔用迁多派兵勇，不分畛域，分路向义军反扑。继又拨银20万两充军饷，集结广西、湖南、贵州、湖北四省兵力对义军进行大包围。[3] 义军在流动作战中也多有损失。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李沅发在桂北发动了第二次南下大进军。4月中旬，从怀远县思陇渡河，经三门、大罗山入融县。然后东出永宁州之三隍、义宁；另以偏师进击桂林南边之六塘圩。继又集中主力，以迅速的行动，转战于永福、阳朔、荔浦、修仁各州县。一路上“与广西、湖南兵勇打仗，不计其数，互有杀伤”[4]。

义军进抵修仁时，知县刘益模集团拼死守城。义军久攻不下，兵勇相继追来。李沅发急命全军转移，由七排进入金秀瑶山，驻屯于三角、杨柳、将军等处。因义军纪律严明，且对瑶民领袖陶胜章赠以银牌、火炮等物，得以借道南下。但不久即受阻于金秀田村及长二、长滩等处。清军及团勇亦从各地扑来。一路上高呼“好马不吃回头草，黄蜂不转旧时窠”的义军兄弟，被

---

① 戴连璧等纂：《城步县志》卷五，《武功》。

② 《平桂纪略》卷一；《李沅发口述》。

③ 参看《清文宗实录》卷三，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十日谕，卷四，同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九日谕；卷五，同年三月初一、初六、十二日谕。

④ 《李沅发口述》。

迫改变主意。① 他们考虑到湖南的兵勇多已外出作战，新宁必然空虚。于是，李沅发“商同众弟兄转回新宁，报复绅勇帮拿仇恨”，且可再次占据瑶峒，凭借优越的地形和群众基础，继续战斗。② 于是迅速撤出瑶山，沿原路经梅溪口、盆溪分两队回归新宁。

因为长期作战，义军回乡后已不满千人。在进攻新宁的战斗中，又不幸遇到敌人的伏击，形势十分险恶。李沅发被迫率队向离城十余里的金峰岭、鸡笼山转移。戚天保“传檄各村团练以锁围法困之，会向荣率师至，四面仰攻”③。李沅发率余部200人据山坚守。“官军至，滚木擂石雨下，众莫敢前。”6月3日（四月二十三日），清兵及兵勇抢占金峰岭四面山头。李沅发在危急中从山后滚崖突围，不幸碰石受伤，被乡勇俘获。④ 清廷接到李沅发被俘的奏报，喜出望外。急命将他“槛送京师，尽法处治”⑤。旋有人奏，以李沅发“身受多伤”，且远途槛送，恐有疏失，请于押解途中截回，“于犯事地方凌迟处死，枭首示众”。⑥ 后以李沅发仅受微伤，业已平复，远途押解，

---

① 参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二《政治·政治事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内有六段村苏明学藏之《三百六十皇书》，本为巫师唱本，在每个皇号下常记瑶山历史。如：“道光三十年，出李元法（沅发），人到瑶山将军、香（杨）柳村，众人打李败退，仍回九排”等等。按：从金秀南下，经六竹界入罗香、龙坪，即平南八峒山区；西南出桂田、罗运、滑坪即平南鹏化。故民间有李沅发欲借道金秀瑶山，往平南与洪秀全、胡以晃联合之说。

② 《李沅发口述》。

③ 刘长佑、刘坤一等：《新宁县志》卷一六，《兵事志》。

④ 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裕泰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⑤ 《清文宗实录》卷九，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谕。

⑥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五日云南道监察御史朱应元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清文宗实录》卷九，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五日谕。

“尚不致有别故”，毋庸截回。[1] 9月8日（八月初三日），李沅发被解至北京，[2] 由军机大臣穆彰阿会同刑部“严审”。李沅发对敌人的指控“坚不承认”，“但求速死”。封建统治者一无所获，匆忙将他“凌迟枭首示众”，时年33岁。另有316名所谓“甘心从逆者”亦遭惨杀。[3]

李沅发领导的起义，历时半年，转战湘、桂、黔边20余州县，是19世纪40年代天地会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而且对正在酝酿大举的太平天国革命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六、“艇军”和各地义师

鸦片战争后的广西会党反清起义，除了上述几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队伍外，还有活跃于江河之上，别具一格的水上武装，即通称“艇军”或“艇匪”以及纵横于各个州县、地域性较为浓厚的百余支农民起义队伍。它们此起彼伏，互为声援。时而汇集于平原大江之中，一呼百应，到处攻击;时而散藏于千山万壑之内，积聚实力，伺机再举。成了起义高潮的重要组成力量。

水上武装“艇军”

水上武装“艇军”的组成，有不少是鸦片战争后被裁撤的水手丁壮。他们不满于封建统治者的投降卖国，饱尝战后失业的痛苦，于是，联合奋起，组成武装，到处攻袭，把反动派打得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当时的反清斗

① 道光三十年六月初七日裕泰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② 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四日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③ 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初七日裕泰奏；同年八月十七日穆彰阿等奏。以上奏报，俱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前述，广西之有“艇军”，始于1846年活跃在浔、黔江面的李观保、任文炳、刘阿乌、陈亚贵、罗亚丙等“聚党劫江上商船”。以后，任文炳、罗亚丙等成了“艇军”的著名头目。1848年秋冬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罗亚丙还独自率领两千余人，攻打平南县大乌圩。第二年，张钊、田芳、梁培友等率大批人艇由粤入桂，罗亚丙即与他们联合行动，从此，“艇军”声威大震。

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他们与梁培友都是广东鹤山人，同是波山船水手出身。早在1845年，张钊就以鸦片战争后失业的丁壮为骨干，组成一支水上武装。1848年，先与任文炳联合，驾波山船纵横于广东三水、封川一带江面。第二年4月，张钊与田芳、侯志（绰号卷咀狗）、王庸（绰号豆皮满）溯江而上，进攻梧州。5月初，北上浔州，攻平南县武林堡，另以一队进击永安州。从此，往来于浔、梧江面，沿江两岸的村圩，都成了他们“劫富济贫”的战场。其他“艇军”头目如关钜（绰号大只钜或大蜘蛛）、区润、吴超、梁亚长和关福等也多来归附，逐步发展到有船数百只，拥众数千人的大队伍。

1850年8月，张钊率众再攻梧州戎圩，随即回屯桂平大湟江口，向柳江河面发展。月底，攻象州。从此，浔、梧、柳三府河面，几尽为张钊“艇军”控制。时广东三合会的陆和、李德善、黎东狗、李和、单眼德等在省内水陆各口设厂，开展“劫富济贫”，号称“八千子弟”，亦遥与张钊等互通声气。张钊等则以梧州三角咀、苍梧戎圩及桂平大湟江口为据点，将船艇“横列中流，环置巨炮”，或夺兵勇炮船，或劫州县监狱，并节制往来各路货船，势力极盛时，一度扩及滇桂咽喉之百色。

但是，由于在“艇军”的领导层中，有不少人出身于游民无产者。他们虽然“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① 他们缺乏远大的和坚定的斗争目标，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其立场正如他们的行动那样，“飘忽不定”，经常摇摆于造反与受抚之间。1850年冬，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积极进行团营起义时，张钊、田芳、侯志曾一度表示欲与拜上帝会联合。但很快就借口太平军纪律太严，难以接受，“率众离开”。最后投入敌人营垒，为虎作伥，反对革命。① 张钊、田芳等逆时代潮流而动，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②

梁培友和他们相反。他先是与区润、冯钊、吴坤等“假右江道与浔州府巡缉旗帜”，在浔梧道中驾机船“包送客货”，“屡败艇匪”。接受官府的“羁縻”，为官军应援。后来改邪归正，进踞戎圩，屡败反动官军，“广东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广西之浔（州）、梧（州）两府属股匪皆附之，水陆分路”，自称“总管”，是为“艇匪大股之始”。③

神出鬼没的“广马”、“土马”

在几支大的反清队伍的影响下，和“艇军”互为呼应的，还有遍及全省各地的反清义师。这些队伍，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即先后起来造反。由于巡抚郑祖琛与地方官吏怕负责任，不敢据实承认。所以，到了1849年，斗争浪潮一泻千里，不可遏止。由于随地蝙起，“到处攻劫”，人数众多，其实际情况如何，连反动官府也感到茫然。1850年底，广西各地的封建士绅被如火如荼的人民起义烽火烧得焦头烂额，“学臣无处可考”④，封建士子断了科举成名的门路。于是，广西的“八府绅民”纷纷“航海叩阍”，到北京向清王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又参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

② 咸丰二年九月初二日徐广缙奏：张钊被杀在咸丰二年秋间，罪名是“送火药一千余斤接济艇匪”。苏凤文：《股匪总录》卷三云：咸丰三年，张钊至容县自良圩，为团练所杀。误。《平桂纪略》卷一谓：张钊于咸丰二年“八月至藤县宁风乡被捕获以献，诛之”，则近似。田芳、侯志则于咸丰三年夏为梧州知府陈瑞芝、知县褚汝航诱杀。

③ 《平桂纪略》卷三。

④ 周天爵：《致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

朝的都察院告状。这才把“广西盗贼充斥，该抚郑祖琛专务弥缝，不据实陈奏”；以及“提督闵正凤纵贼养寇，畏葸无能”① 的初步真相揭露出来。都察院据报的情形是：

自上年(道光二十九年)至本年五月，匪首张家(嘉)祥、杨捞家等抢劫南宁府左江、柳江府右江等处，以及桂林漓江一带地方，均受毒害。首领数百人，内有广东、湖南等贼，皆用红布包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样。各项枪炮、马匹、器械俱全。②

说明当时活动于广西的反清队伍，多是天地会武装，首领数百人，不少是从广东、湖南转来的。他们人数众多，配备齐全，非寻常可比。活动范围，“延及七府一州”，拥众数百以至数千，“劫掠村圩典当”。所到之处，“旗号悖逆”。这就道出了反封建斗争的实质。

距都察院的奏报半年左右，贵州巡抚乔用迁又根据他“拿获粤西匪犯翟召保等四十名”的供词，作了进一步的揭发：

(翟召保) 等系张满股内头目，曾在庆远、河池滋扰。所有广西各处股匪，均是随地纠聚，并听人自投入伙。由广东来者谓之广马，在广西纠合来者谓之土马。其有枪炮器械并跟随多人者为大头目。随时自投入伙者，择有膂力胆识之人派为小头目……平乐、思恩、柳州、浔州、南宁、太平等处，均有股匪滋扰，立有大胜、得胜……等堂名，各携图章以为记认……各股人数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于衣带用红布、红线作记。③

即以南宁一地而论，据记载，1850年秋间，就有所谓“堂匪、土贼、流寇三种”。其中“堂匪”之有堂号者计20余部，“土贼”著名首领近30人，而

① 《清文宗实录》卷一七，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谕。

② 王先谦：咸丰《东华续录》卷四，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奏。

③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流寇”显要头目有10人以上。①

综观上引的几则记载，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嘉祥、陈亚贵、张钊等部外，封建官府一再提到的杨捞家、钟亚春与严亚左、严亚右等，同是活跃于浔州、柳州、庆远等府的所谓“劫城巨匪”②。另一位有名的会党头目陶八，宾州杨桥圩人。1850年3月与丁四集众2000余人起事，攻上林白沙圩。周四、周八、韦明恺等起为响应，活捉上林知县清泰。同年秋，陶八率众攻思恩府城，不克。移据邓圩，随入贵县、来宾活动。思恩知府马丽文集团跟踪追索，陶八经不起封建官府的威胁利诱，接受招抚，更名昌培，“随官军屡杀贼有功，保受武职。后至广东以罪正法”③。

庆远府苗人黄晚，壮人严亚文，1850年初聚众3000人，联合起于庆远德胜镇。覃兴晚率众攻忻城；严亚文与张亚曾联合攻上林。10月，黄晚克宾州，杀守备田芬；旋攻思恩，不克，北上河池，到处“打富济贫”，声势极大。严亚文、张亚曾则由上林入迁江，联合宾州、上林等地农民武装5000余人，一举攻占忻城，乘胜直逼庆远府，随入河池州城。冬初，广西提督向荣率兵练反扑。黄晚、严亚文合军拒敌，大战于庆远索潭圩，再战于宾州陶邓圩，皆不胜。“黄晚逸去匿山中”，为叛徒出卖，被俘牺牲。严亚文等亦败散不复起。④ 与黄晚、严亚文起义同时，贵县人颜八偕李四等率众占来宾县古辣圩。6月，克来宾县城，开展“劫富”斗争，“大掠而去”。同年，另有彭鲤鱼八率千余人在来宾起事，攻袭县城。知县弃城遁，彭鲤鱼八率众入城，“直趋府署，破狱放囚，劫库藏帑一空，城中居民靡有所伤”。⑤

在桂西，壮人潘宝源于1850年初起于明江（今宁明县)。9月，与黄亚陈

①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四，《兵事志·前事五》。

② 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来人记》。

③ 《股匪总录》卷一；《平桂纪略》卷一。

④ 翟富文：《来宾县志》下篇，《历史篇·兵事》。

⑤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五，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郑祖琛奏；同书卷六，同年十一月初七日郑祖琛、向荣奏。

率2000余众攻龙州。龙州同知兼理太平府事王淑元率勇练顽抗，战于城外十里之湾遵。时值大雨，勇练所用火药尽湿，“炮不及发，众气慑”。王淑元狼狈遁归州城。黄亚陈率众尾追而至，潘宝源则另率一军走间道，趁其不备，越墙入城，直入州衙大堂，杀死王淑元父子及役吏多人。① 随攻隆安，破果化州，转战于左、右两江各州县，直至战死。② 与潘宝源崛起同时，有宣化县人杜建达、雷志勇、熊振邦等设得胜堂，与义胜堂首领黄春满联合，有众数千，起于邕宁，亦一度攻克隆安县城。稍后，又有壮人颜品瑶“拥众万余人，破隆安，窜新宁，左江一带骚然”。杜建达、颜品瑶为首的两支大队伍，起义不久就因内部“各为头目”，“疑贰内斗”，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是十分可惜的！③

桂南方面，当时声势最大的起义队伍，当推以刘八为首、纵横于粤桂边区的一支。刘八，广西博白县龙潭圩人。“向为夫役长”。1848年，地方大旱，贫苦无告者到处流离失所。1850年2月，刘八与广东灵山李士奎、方晚等率众起义，“攻抄郡县”。兵勇“皆望风溃走”。6月13日（五月初四日），李士奎战败死难，刘八率领其众，“所向摧陷，众至十余万人”。同年冬，刘八率众数千至广东石城，与清军大战于青平驿，兵勇尽溃。刘八乘胜向博白、陆川进攻。次年4月中旬，清临元镇总兵李能臣自浔州到郁林。刘八复由博白龙潭出山口，谋攻石城，不利。转攻合浦属之永平圩，在花石山与清军发生大战，又不利，复回师博白。5月10日，部将黄锦泗、冯子材临阵倒戈，向

① 《广西昭忠录》卷一，《平桂纪略》卷一云：“宝源聚众称大胜堂。”考《堂匪总录》卷一一，大胜堂首领为潘大、潘七，咸丰元年七月始起于龙州、忠州、新宁等地。当时，龙州尚有广义堂，但其首领无潘姓。由此可知潘宝源的大胜堂与潘大、潘七的大胜堂非一。

② 《堂匪总录》卷十。

③ 《平桂纪略》记颜品瑶失败事云：咸丰元年七月，“布政使劳崇光督办右江军务，驻南宁。品瑶纠各贼目聚党万余屯杨关，下窥郡城。千总张国梁率众击之，不克。乃密结其党李三杀品瑶，入守新宁。贼大至，围攻数日而去。各贼且拥众各回各乡，而南郡土贼渐炽矣”！

博白知县游长龄投诚。刘八因事起仓猝，被迫率众由小路“攀崖缘壁而走”，“五日夜不息”，奔走于合浦与博白之间。7月2日（五月二十三日），被广东提督陶煜文与游长龄等率兵勇困于博白沙河镇，战败被俘，与先锋吴晚同时被杀害。①

桂东的怀集（今属广东）、贺县一带，亦处处有“流贼滋扰”。1850年7月21日（六月十三日），广东英德义军经怀集入贺县，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占据南乡。知县鹤年集团抗拒，败归县城。义军乘胜自黄田直逼城下。平乐协副将伊灵阿，富贺营都司李庆什等“闻风逃窜”。鹤年以自己“既不能谋，也不能战”，自缢身死。② 稍后，又有贺县公会、石塔等处会党进入昭平县之天门岭。清同知英秀督兵壮迎拒。义军放火烧山，焚毙同知白良栋、巡检胡成宗、外委黄俊英、武举康寿及兵壮甚多。永安、藤县、平南等处，也有会党到处起事。③

综观鸦片战争后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到1850年，已遍及全省各地，“首领数百人”，队伍数百支，众达数十万。起义者所到之处，彼此相互联络呼应，出现所谓“外匪借内匪为眼线，内匪赖外匪为声援，表里为奸，同恶相济”的局面。④ 使封建官绅处处被动，疲于奔命。他们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投降变节分子，他们的“劫富”行动，虽然也存在“劫掠商旅”或祸及平民百姓的消极行为，但其大多数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地主、官僚和土豪劣绅的。他们破城池，释狱囚，开官仓，设公库，有时还把斗争所得散给贫苦无

① 朱用孚：《摩盾余谈》卷二，《三廉纪事》；钟喜焯等：《石城县志》卷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

② 《广西昭忠录》卷一；《平桂纪略》卷一；又参见《清文宗实录》卷一五，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六日谕。

③ 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八日，同年十一月初七日郑祖琛、向荣奏。分见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五、卷六。

④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徐广缙等奏《分路缉拿两广交界各股情形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52页。

告者。他们的斗争，既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又鼓舞了人民群众，几年斗争的结果，雷再浩、李自昌、陈亚贵、李沅发、刘八等“大股”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他们点燃的反清漫天烽火，却迎来了以拜上帝会为核心的太平天国在广西的大起义。

第四章 太平天国在广西的起义进军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酝酿于鸦片战争以后，起义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参与这场起义战争的，除了汉族贫苦人民之外，还有壮族、瑶族和回族的儿女。他（她）们从金田团营起义之初，就坚持以革命的暴力向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1851年9月占领永安州城以后，正式实行封王建政，颁行各种制度。继而挥军北上，攻桂林，破兴安、全州，挺进湘鄂，东下江南，各地各族人民纷起响应，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一、洪秀全和拜上帝教

洪秀全和冯云山

拜上帝会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时期的新生儿。它的创立者是洪秀全和冯云山。

洪秀全（1814～1864），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广东花县官禄㘵客家人。1814年元旦（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①] 7岁进村塾学习，读过《四书》、《五经》一类儒家书籍，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因家贫失学，在家随父兄从事农业劳动。18岁以后，在官禄㘵及其附近的五马岭、四角围、八沥㘵、莲花塘等地设馆授徒，直至31岁。[②]

冯云山（1815～1852），本名乙龙。广东花县禾落地客家人。[③]"家道殷实"[④]。自幼诵习经史，对天文、历算、地理、兵法以及演义小说诸书，也都博览。[⑤] 科举失败以后，即在家乡为村塾师，与洪秀全过从甚密，成为他的得力的辅助者。

洪秀全与冯云山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世"，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入侵，人民革命一触即发的大变动、大激荡时期。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使他们对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所了解与同情。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生长在封建社会，接受的是封建教育，所以都希望走科举成名，"学而优则仕"，从而"光宗耀祖"的老路。洪秀全从15岁到31岁，就曾先后四次到广州应童子试，但每试皆"名落孙山"，不能如愿。[⑥] 1836年（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

---

① 《洪氏宗谱》（校补本），华南师范学院印，74页，1981。汪上铎：《乙丙日记》卷三。又参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但说洪秀全生于1813年，误。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又参《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拙著《太平天国人物·洪秀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③ 请参《太平天国人物·冯云山》。

④ 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

⑤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首逆事实·冯云山》。见《太平天国》（三）。

⑥ 韩山文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

次赴广州应试时，无意中得到一本《劝世良言》。那是基督教的宣传小册子。① 第二年，洪秀全第三次去广州应试失利，回家后得了一场大病，一连四十多日。在病中，自称“太平天子”。“所言所行都是打江山，杀妖魔的话。”而且吟咏诗歌，大声疾呼：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②

这些隐含叛逆思想的词语，说明洪秀全对罪恶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他高呼要讨伐的“妖邪”是谁，当时虽然还没有指明。但是，他声言要做“太平天子”，希望“解民倒悬”，说明23岁的洪秀全在和旧势力决裂、朝革命道路前进的时候，迈出了十分关键的一步，也反映了他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

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生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广州首当其冲。花县离广州90华里。资本主义强盗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投降卖国，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不能不使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动。在人民反侵略、反投降卖国的鼓舞下，他终于逐步丢弃了科举成名的念头，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即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洪秀全根据农民革命的需要，认真翻阅了7年前在广州得到的那本《劝

① 该书撰者为广东高明人梁发。他是中国第一个改正教的传教士。全书摘取了《圣经》的某些章节，参合中国的一些生活故事而成，乃戒恶劝善的传教启蒙读物。全书含九部小册子，《劝世良言》是其总名。1832年编印出版。另有四卷本和三卷本多种，但文字略有不同。参见麦沾恩（Mcnair）著、胡簪云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二期。关于洪秀全获得《劝世良言》时间，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 Rebellion"说在1833年。《太平天国起义记》说在1836年。《洪仁玕自述》说在1837年。并志此以供参考。

② 引自《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玕自述》。

世良言》，从中借用了基督教“独一真神皇上帝”的一神教思想，和他的同乡、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①] 表兄李敬芳[②] 等共同研究《劝世良言》，创立了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的创立和传播

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而封建统治者又总是利用各种荒诞不经的鬼神迷信，作为政权统治的补充。从天上的玉皇大帝，到阴间的阎罗天子，直至各式祠庙坛壝的菩萨偶像，无不成了他们愚弄与奴役人民的工具。即以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关的几个州县而论，“不列祀典”之寺、庙、宫、观、堂、坛、祠、阁等等，多者近300处，少者亦有一百数十处之多。[③] 因此，要树立皇上帝的权威，打倒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须批判他们宣扬的神仙圣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④]

洋教是和鸦片、洋货、洋炮舰结伴来到中国的。如同鸦片麻醉剂不曾对

---

① 洪仁玕（1821～1864），字谦益（一作益谦），号吉甫。自述“与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澳，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颇有见闻而知者”。“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习经史天文历数，遍游各洋避祸，实因我主天王金田起义，各宪严査，不能家居也。”

② 李敬芳，广东花县莲花塘客家人。应是洪秀全继母李四妹的侄儿，与洪秀全为表兄弟。据乡人传说，金田起义后，他在家乡竖旗起义，与甘先等红巾军合攻广州，在攻城中牺牲。

③ 请看拙文《太平天国起义与乡土宗教》，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④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中国“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① 一样，洋教传到洪秀全的手中，却成了他发动革命的工具。第一，他利用了洋教独尊“皇上帝”的权威，否定封建皇帝以及一切所谓神仙圣佛的权威，断然宣布他们都是“皇上帝”的叛逆，是该诛该灭的妖魔。第二，他利用基督教原始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都是“皇上帝”的子女，应该互相平等的主张。第三，他借用基督教的某些“诫律”，与中国社会的做人道德规范结合，提出了拜上帝教的条规。洪秀全虽然主张敬拜上帝，而他的思想主张与崇奉形式，却和洋宗教相去甚远。所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常被那些以“上帝”虔诚信徒自命的外国教士斥为“异端”，② 也就不足为怪了。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提出“独尊上帝”，罢黜诸神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村塾中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撤去。这个亘古罕见的、大胆的举动，立即遭到那些守旧的乡绅村老们的反对，被斥为“大逆不道”。结果是“学童惊散，书馆停闭”，洪秀全和冯云山都丢了教席。从此，他们毅然跨出狭小书馆的门槛，走向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由面向学童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传布真道”、“唤醒英雄”的活动。③ 由村塾师而成为农民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844年4月2日（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洪秀全和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一行四人，离开花县老家，“出游天下”，以拜上帝教“教导世人”。他们先到广州和顺德，然后从顺德转回，历游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浛洸）、阳山、连山等地。5月5日（三月十八日），到达白虎圩。这时候，随行的冯瑞嵩、冯瑞珍意欲回乡，而洪秀全则欲深入

① 马克思：《中国纪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② 参看《太平天国起义记》；罗孝全（Rev. L. Robert）：《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富礼赐（R. J. Forrest）：《天京游记》，俱见《太平天国》（六）。麦沾恩：《梁发传》第十四章，中华基督教会广州协会出版，1930。

③ 太平天国文献《御制千字诏》。

连山八排，到瑶人中宣传教义。冯云山坚决表示：愿与他“遍游天下，艰苦同心”。于是，两人深入八排瑶区，在瑶人中从事布道活动。① 查八排山势，周环毗连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山内“小冲七八处，烟户不下五六万”。封建统治者说是“良莠各居其半。匪瑶专事抢劫，间有汉奸窝踞”。② 数十年间，“瑶乱”迭起，是个发动起义的理想所在。但是，因为语言不通，洪秀全、冯云山只在南江排瑶民中停留几日，便悄然离开了。至此，他们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奔走了十一个州县。每到一地，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手写宣扬上帝教义的小册子，或向人讲解，或用以送人。但是，应者寥寥，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在广东的“传布真道”活动是失败的。

原因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圣经》有过启示，“先知在故乡本家没有得人敬重的”③。如果把这个所谓《圣经》所言之真理说白了，就是“本地姜不辣”的观念作怪。当然，时间太短，“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宣传工作；以及语言不通，有碍于思想交流，也颇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鸦片战争激起的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当时在广东仍然十分尖锐突出。1842 年 4 月，广州人民火烧十三行洋楼事件；第二年 1 月，广东人民反对英国阴谋在香港开市的斗争；以及 1844 年 5 月，广州人民抗议英国霸占河南大片土地为租界的大示威，等等。④ 都是这种矛盾在广东的具体反映。外敌当前，大患犹在，反侵略斗争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人民群众无暇、也不可能立即理解拜上帝教的宣传，接受从外洋搬来的“皇上帝”，是完全可以想见的。面对失败，洪秀全果断地做出下一步行动的决定：“到广西去。”⑤

---

① 参看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

②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八，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谕。

③ 参看《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起义记》。

④ 参看梁廷枏：《中西纪事》。

⑤ 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

二、拜上帝会在广西的发展

贵县拜上帝会的建立

广西与广东毗连，西江像一条纽带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西虽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冲击，但在鸦片战争流毒的侵袭下，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全省到处潜藏着人民反抗的火种。只要稍加煽动，即可大火燎原。

1844年5月8日（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广东连山，经开建、封川向广西进发。他们以贩卖笔墨筹集川资，逆着波涛翻滚的西江，走苍梧戎圩，上藤县，至平南大乌，然后经桂平木落、蒙圩，于5月21日（四月初五日）到达贵县的赐谷村，受到洪秀全的表兄弟黄盛均、黄盛爵等的热情接待。① 从此，他们把拜上帝教在广西传布，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拜上帝教在广西的传播和发展，从1844年夏洪秀全、冯云山进入广西活动，到1850年夏发布起义团营命令，六年之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在贵县赐谷村的初步发动，建立广西的第一个拜上帝会，历时半年左右。继之是洪秀全回花县潜心著述，充实拜上帝教的理论。而冯云山则深入桂平紫荆山区，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创立拜上帝会斗争基地，历时三年。最后是1847年秋洪秀全重游广西，开展捣毁庙宇，反抗地主团练的武装干涉，积极准备武装团营，历时也将近三年。在短短的六年间，由传教到组会，由秘密活动到公开对抗，由以宗教斗争的形式发展为政治、军事斗争，

① 黄盛均等本姓王，是洪秀全生母王氏的侄辈。因避天王讳，改姓黄。

由少数人的活动迅速形成千万人的大军，掀起如火如荼的武装大起义。所有这些，集中说明中国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革命的形势已经十分成熟了！

洪秀全、冯云山到达赐谷村以后，顾不得长途跋涉的辛劳，“白天教书，晚上拜会”，积极在乡民中宣传“敬拜上帝有吃有穿，信奉邪神必定受灾殃”的道理。赐谷村北有六乌庙，敬奉一男一女。乡民祭祀甚恭。洪秀全得悉，做诗斥为妖庙，时黄盛均之子为正因故被系于贵县狱中。秀全代作诉状为之申辩，终得释放归家。通过斥庙、布道和代人排难解纷等活动，终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把赐谷、长排、河湾、江背、万扬、竹马和大横等村的100多贫苦农民，其中有不少是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团结到“皇上帝”的旗帜下，建立了广西的第一个拜上帝会组织。①

为完善拜上帝教而努力

早在洪秀全与李敬芳共同研究《劝世良言》，创立拜上帝教时，他们就“定制宝剑二柄，各重数斤，长三尺，秀全与李各佩其一。剑上镌有三字曰‘斩妖剑’”。并同声吟诗一首云：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②

通过半年多的出游布道实践，说明要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动员起来，为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四海为家”、“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而斗争，仅有简单的教义是不行的。为了提出能鼓动他们起来造反的战斗口号，制订反映他们的愿望与要求的具体主张，洪秀全于11月中旬从广西回归花县，精心写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几篇理

---

① 参看《太平天日》；《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
② 引自《太平天国起义记》。

论性的诗文，进一步阐述了拜上帝教的思想主张。[①] 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以“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的宗教语言，否定封建帝王独称“天子”的特权，认为人们在政治上应是一律平等的。在《原道醒世训》里，他指出了人世间的凌夺斗杀，“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猛烈抨击封建社会存在的“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夺之念”。提出天下一家，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姊妹，在经济上应该平等，共同享有“皇上帝”的赐与。表现了强烈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思想。《原道觉世训》则毫不含糊地把秦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者，直至清朝的皇帝，一律斥为愚弄百姓、残害人民的妖魔鬼怪，是人人应当奋起，迅速予以击灭的大敌。洪秀全的这些理论，大大超越了单纯劝人去恶从善的宗教劝戒，是向封建统治秩序的公开宣战书，反映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贫苦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对于动员他们起来参加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在乡居期间，曾经应美国南方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的邀请，由洪仁玕做伴，于1847年3月到广州东石角教堂学习“真道”。但是，因为对于“上帝真道”的理解各不相同，结果不欢而散。

紫荆山基地的开辟

在洪秀全离桂返粤之前，冯云山早于9月5日（七月二十三日）由贵县转往桂平，在人地两生的困难条件下，幸得张姓客家人的热情帮助，先到大宣里古林社做工，随即进入紫荆山，先后在高坑冲、大冲村设馆授徒，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

紫荆山在桂平东北部，西连武宣、象州，东接平南，北靠金秀大瑶山，东南与金田村、大宣圩隔山并立。山区四周，峰峦矗立，海拔多在千米左右。山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西部的花雷、田心两水，与北来的大坪、大广两

①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咸丰二年）新刻《太平诏书》，含《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章。《百正歌》附于《原道救世歌》之后，未独自立篇。

水在三江圩汇合，然后破峡东南流十余里，过风门坳，出古林社，经金田、大宣圩而至大湟江口，与南渌江、鹏化水合流，注入浔江。紫荆山区面积500平方里，田少山多，林木茂密。居民有汉、壮、瑶三个民族，其中有不少是被地主剥夺得田无半丘，地无一块，长年依靠耕山烧炭为生的"烧炭佬"。

有记载说：当洪秀全在广东出游布道失败，决定向广西发展时，冯云山就曾对广西的形势作过分析，说那里"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买马聚粮"①。紫荆山区不但形势复杂险要，而且早在明代，就是瑶民义军与明军血战的主要战场。鸦片战争之前，紫荆山里发生过多次农民暴动。山外各地，"蝗灾甫息，盗贼旋兴，劫夺纷然，不胜其扰"；大湟江口与大宣圩更是"游匪外滋，土匪内迫，连村标厂，横路刀枪"，起义者"挺持凶器，耀武圩中"。地主乡绅为了自保自救，联合建社仓，订乡约，组团练，行保甲与之对抗。②冯云山正是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来到大宣圩，进入紫荆山的。

冯云山到紫荆山，在张、曾等大姓客家人的帮助下，以教书为掩护，不分昼夜，串村走寨，通过组织拜会，捣毁偶像，施医赠药等方式，深入汉、壮、瑶族贫苦山民之中，扎实细致地开展敬拜上帝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短短三年，不但在紫荆山里的每一条冲槽，每一个村寨，有了拜上帝教的信徒，总数超过2000人，几占山内居民的半数；而且在山外的桂平金田、白沙各地，以及以桂平为中心，东到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达武宣、象州，南及郁林、陆川、博白和广东的信宜、化州、廉江等地，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了拜上帝教的兄弟姊妹，不少地方还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③

---

① 《粤匪起手根由》，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史料》第四部分，45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0。

② 引文见桂平《重修宣里新圩三界祖庙碑记》；又参《安良约第一、第二碑记》,《永宁圩团练保甲社仓第一、二、三碑记》。碑在桂平新圩三界庙内。

③ 参看《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

捣毁庙坛的风波

与此同时，洪秀全在家乡创制革命理论的工作也已基本完成。1847年8月（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他带着新订的革命文书，重游广西赐谷村，旋往桂平。27日（七月十七日），又和阔别了三年的同道冯云山在紫荆山大冲村的书馆里聚会了！为了加强领导，把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迅速推进，洪秀全和冯云山认真研究了形势，决定离开大冲村，转移到“形势险固”的高坑冲去，在信徒卢六的家里设立拜上帝会的总机关，指挥各地会众开展斗争。①他们一面制定各种条规，从思想和纪律方面对会众加强组织与教育；一面继续草写各式文书，交信徒曾云正等四出传送，发动群众敬拜上帝。这些工作皆“大有功力”。同时，还亲自领导并参与了捣毁神坛偶像的活动，其中以10月底打毁象州甘王庙和紫荆山雷庙事件，震动最大。

甘王庙遍布象州城乡，大小庙宇以百计，其中以古车村附近的三江口甘王庙为首要。州官朱有莱为了统治的需要，曾给庙里的甘王爷献过龙袍。紫荆山雷庙位于高坑冲、黄坭冲和石人冲口，正当西部山乡通往三江圩的必经之地。石人村地主王东城、王作新父子不但带头立庙，而且编造了不少“雷神显灵”的神话，坑骗乡民。为了树立皇上帝的权威，洪秀全偕同冯云山、卢六、曾云正、陈利等人，不辞远途跋涉，从高坑冲径往象州三江口，捣毁甘王偶像，题诗历数甘王“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等十大罪恶，随即回归紫荆山，扫荡了雷庙和左右两水的神坛庙宇。这个疾风骤雨般的打庙毁菩萨举动，形式上是“战逐妖魔”的宗教斗争，实际却是打击乡绅权威的斗争。消息传出，震动了象州和浔州府的各个州县，“秀全声誉大起，信徒人数加增更速”。而地主乡绅却暴跳如雷，立即进行反扑。拜上帝会和乡绅势

① 参看《太平天日》。高坑冲形势请看拙文《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见《文物》，1975（1）；《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力的公开对抗开始了！①

首先出面与拜上帝会作对的是“武宣生员”王作新。②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的“罪名”，秘密调动团丁，非法将冯云山逮捕，押至雷庙，交保正曾祖光解送桂平县监狱。地主团练的暴力迫害，激起了紫荆山会众的极大义愤。在卢六和曾亚孙的带领下，会众们逐散练丁，抢回冯云山，粉碎了王作新迫害冯云山进而破坏拜上帝会组织的阴谋。

王作新作为地主乡绅势力的代表，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直接向桂平县提出控告，指责冯云山“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迷惑乡民，结盟拜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请求县官将冯云山、卢六等“严拿正办”。冯云山和他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试看广东外国教堂，尚且悬挂有两广总督奏章与清朝皇帝批示，准许传教士敬拜上帝。我们是“遵旨敬天”，有何犯法？并且从诗、书中提及“上帝”者二十余处，用以证明“敬天无罪”。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斗争艺术，把敌人批驳得哑口无言。③

1848年1月17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再次暗调团练，把冯云山和卢六同时逮捕。并将冯云山撰写的“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书馆门联，篡改为“聊将紫水活金龙”，诬作“阳为传教，阴谋造反”的证据。同时买通大湟江巡检司，把冯云山和卢六解送桂平县。④

---

① 参看《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起义记》；以及拙文《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太平天国起义与乡土宗教》。

② 据庞赓辛《武宣县志》第一编《地理》；并参光绪十年立石之《王作新墓碑》。

③ 李滨：《中兴别记》卷一；又参1844年签订之《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

④ 据笔者1972年采访王作新曾孙王朝森口述。

反击地主团练的迫害

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组织者，和各地会众有着广泛的联系，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被捕入狱，自然给起义事业带来不少困难。因此，打退地主乡绅的进攻，营救冯云山和卢六出狱，就成了全体会众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冯云山第一次被捕之前，洪秀全已从紫荆山移居贵县赐谷村。当他接到冯云山与卢六蒙难的消息时，悲愤异常，立即写了一首古风，表达对战友安危的深切怀念，渴望他们早日脱险，继续并肩战斗，"同安宇宙于太平"①。为了营救战友，洪秀全不辞千里跋涉的辛劳，于3月间赶往广州，希望根据1844年清政府在《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洋人传教的规定，向两广总督衙门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和卢六。他的这种努力，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了广东，拜上帝会顿时"群龙无首"。地主团练乘机加紧反扑，扬言要"杀绝拜上帝佬"。不少会众畏惧、动摇了！4月初旬，世居鹏隘山，以种山烧炭为业，素以"机警多谋"著称的杨秀清，假借乡间流行的"降僮"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提出挫败敌人的方法，使惶恐动摇的会众安定了下来。10月初旬，出生于武宣东乡，迁居于桂平鹏隘山，为人"勇敢刚强"的萧朝贵，也仿照他的好友杨秀清的办法，伪托"天兄耶稣下凡附身传言"。从此，他们各自取得了代表天父、天兄发言的权力。他们的做法，对稳定会众，挫败敌人虽然起了一定作用，② 但是，从此以后，拜上帝会的一元化领导却被破坏了！

为了营救冯云山和卢六，紫荆山的会众自动捐献钱财，交与"粗通文墨"、经常"出入公门"的黄玉昆到县衙门里"密计行贿"。③ 这在太平天国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洪秀全：《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天王诏旨》。

③ 《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黄玉昆》。

的历史上称为“科炭”。奠都南京以后，凡参与捐献钱财的，都追叙“科炭功”。[①] 而冯云山和卢六，虽然身系囹圄，也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冯云山力斥王作新的“捏题架控，索诈诬陷”。并做诗申辩自己所受的冤屈。由于冯云山勇敢机智的斗争，遇事因循敷衍，讳言“盗贼”的问官只好判定他“无为恶不法情事”。但借口他为“无籍游荡”，决定立即“递籍管束”。[②] 而卢六由于监禁生活的残酷折磨，不幸惨死狱中！成了第一个为太平天国革命献出生命的英雄。太平天国奠都南京以后，为了表彰卢六的功绩，追封他为蝦王。[③]

一场因“毁庙”引起的政治官司结束了。经受将近半年牢狱生涯的冯云山被迅速递解回籍。[④] 但事有意外。在押解回籍的路上，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冯云山利用各种机会，向两名解差揭露官府的黑暗，讲述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境遇的痛苦，宣传拜上帝教的主张，号召他们改邪归正。不多久，两个出身贫苦的解差果然被冯云山的诚意所感动，毅然“抛弃差事”，跟随冯云山秘密回至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⑤]

---

① 《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冯云山》；同书卷八，《隐语》；卷一二，《杂载》。

② 参见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三，《贼踪》；《太平天国起义记》。《贼情汇纂》卷一一《老贼》条记冯云山讼案说：“云山善以文弱动人，且言伪而辩，貌既不类强徒，语复娓娓可听。问官皆疑而怜之。群党复多方醵金贿脱，竟至纵虎出柙。”

③ 参看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五，《表第三·追封诸王表》，蝦王卢六，衔系“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蝦王六千岁”。

④ 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邹鸣鹤上《审议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对此案审理经过与具体时间都有交代。冯云山向浔州府“呈诉”是1848年5月30日（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署理桂平知县贾柱接知府顾元凯立即“査案讯明，分别究释具报，慎勿稽延滋累”的批示以后，“立即讯究”判决。故冯云山获释应在6月间。邹鸣鹤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⑤ 《太平天国起义记》。

冯云山获释出狱，突然回到紫荆山。会众们喜出望外，纷纷“杀牛宰马，献祭上帝”。因为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远在广东，拜上帝会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于是，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整整四年的冯云山离桂东下，谋与洪秀全会晤，共商大计，并探望久别的亲人。而洪秀全回到广东以后，因为营救冯云山的计划未能实现，正奔走在重归广西的路上。两人没有相遇。第二年2月，洪秀全再次东下，才和冯云山在家乡见面。7月，他们重返紫荆山。这时候，广西各地，烽烟四起，从一二千人至七八千人的起义队伍即达20余支。浔州地区，灾荒严重；“来土械斗”，遍及城乡，流离失所的饥民与械斗失败的客家人，纷纷投奔拜上帝会。桂平、贵县、平南、陆川以至广东信宜等地，经常发生地主团练攻劫拜上帝会众的事。[①] 整个形势十分紧张。

为了团结御侮，发动团营起义，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按年龄齿序，结为兄弟，组成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韦昌辉出身于桂平县金田村的新发地主家庭，客家人。曾“入粟捐监”，为谢、蓝诸姓地主团绅嘲弄排挤，忿而接受冯云山的劝告，加入拜上帝会。[②] 石达开出身于贵县那帮村的富裕农民家庭，客家人。因受土著地主的排挤，加入了拜上帝会。[③] 在他们的号召和带领下，各地会众开始从事革命武装的工作。桂平县金田村和紫荆山漇田村，平南县花洲村，陆川县陆茵村，以及广东信宜大寮山区等地，都有会众秘密开炉制造武器，或设大馆对会众施以战前训练。[④] 1850年春（道光三十年正月），平南的拜上帝会首领胡以晃，信宜的拜上帝会首领凌十八主动变卖田产，用以“铸造军器”。洪秀全、萧朝贵等则加

① 参看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太平天国起义记》；《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② 参看《太平天国人物·韦昌辉》。

③ 参看《太平天国人物·石达开》。

④ 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有关金田起义的一些资料》。后两文见《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

紧筹商团营起义的“军师”人选与队伍编制问题。① 为了“试探弟妹心肠”，默察各方动静，“喜用权智”的杨秀清又借耳目有疾而装聋作哑。② 因为贵县、平南、桂平等地的地主团绅加紧迫害，信宜又传出了封建官绅攻扰、拘捕拜上帝会众的消息。6月，密藏在鹏隘山的洪秀全发出所谓上帝的“默示”说：

> 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属至此。

据此，洪秀全派黄盛爵、侯昌伯赶往花县，迎接他的亲属前来广西。③

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建立，革命武装的组织和准备，所谓上帝的“默示”以及洪秀全的遣使回乡迎接亲属，这一切，预示着一场团营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

三、1850年的团营风暴

八方会众集金田

面对敌人的频繁骚扰，1850年7月（道光三十年六月），各地拜上帝会首领齐集桂平鹏隘山，接受洪秀全发布的团营命令，然后回至所在地区，采用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的方式，向会众们传递集中的讯息。④ 它像一阵电闪雷鸣，迅速传遍了各个州县，震动了四面八方。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称

---

①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

② 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程大璋：《桂平县志》卷四一，《纪人·杨萧诸人传》；《太平天国人物·杨秀清》。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

④ 参看《天情道理书》；《李秀成自述》；《中兴别记》卷一；以及光绪《平桂纪略》卷一；《广西昭忠录》卷一；《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

为团营。

团营，为的是把分散在各地的会众集中起来，进行必要的编组和武装，以利于统一行动，誓师起义。按照团营令的规定，各地会众应于11月4日（十月初一日）以前，一律到达金田村。[1] 各地会众遵照首领的命令，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首先烧掉自己的茅寮草舍，变卖所有的家产财物，扶老携幼，执杖持刀，就地集结，打贪官，除土霸，然后“闯州过县”，冲破地主团练的重重阻截，从四面八方奔向金田。整个团营的过程，也就是以革命的武装打击反革命武装的激烈战斗过程。



桂平金田营盘

桂平金田村是各路会众团集的中心。早在团营令发布之前，当地会众为了共同对敌的需要，已经集中起来。团营令发布以后，金田地区方圆数十里，大小数十村的汉、壮两族会众千余人首先入营。杨秀清、萧朝贵和韦昌辉在韦氏宗祠设立总机关，负责指挥团营事务。同时根据“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构想，[2] 在村中设立公库，接纳会众带来的钱粮和斗争地主官绅所得的财物，以保证会众“同食同穿”。因为有这种均产制度，所以前来团营的人数与日俱增，[3] 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全家乃至全村参加团营的景象。下古林村的曾天养，曾经动员400多人加入拜上帝会。接获团营的命

① 《天情道理书》。

② 太平天国文献《天朝田亩制度》。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

令以后，又带领全家老小至金田入营。[①] 会众们在团营中不但清算为非作恶的土豪劣绅，还捣毁了新圩蔡村的三界、阡陋等大小庙宇。[②] 金田村旁的犀牛岭，原有明代瑶民起义时遗下的古营盘，会众们合力加以修整，在四周构筑泥墙，挖掘壕沟，用作练兵场所并保卫起义大本营所在。

拜上帝会的老根据地紫荆山，汉、壮、瑶族的男女会众两千多人，在团营令的号召下同时动员。花雷、田泗两水的会众首先攻打石人村，向王作新兴师问罪。而王作新自知罪责难逃，早就携带家小潜往外地，到处流离，惶惶不可终日。[③] 愤怒的会众烧了他的房子，然后进驻三江圩，与大广、大坪两水的团营队伍会合，经风门坳往金田村。

以石达开为代表的贵县拜上帝会，除贫苦的汉、壮族农民外，还有龙山矿工参加。他们多是饱受压迫，久经磨练，而又年轻力壮，少有家室牵累的游民。[④] 由于采矿职业的锻炼，造就了掘壕筑垒的专长。故有"太平军穴隧轰城，实得其力"之说。[⑤] 早在号召团营之前半年，贵县会众已与以六屈村地主周凤鸣为首的团练发生战斗，攻"破其巢穴"[⑥]。团营命令既下，石达开迅速赶回贵县，在龙山奇石圩竖旗聚众。8月20日（七月十三日），率众千余人取道六乌山口出贵县、桂平交界之白沙圩，在那里"开炉铸炮"，驻留30余日。时白沙附近发生外贼勒索会众银钱事件，林凤祥、秦日纲集众进行反

①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1974。

② 罗钰：《重修三界阡陋二庙碑记》。

③ 1852年（咸丰二年），王作新的堂兄王大作写《壬子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内有句云："奸党汹汹扰四围，怦怦心动惜民依。……三载仳离居靡定，万家愁苦泪时挥"；"小民奔走几无路，强寇焚烧烬有烟。"正反映了这种情况。诗见《日新斋稿》（手抄本）。由其曾孙王朝森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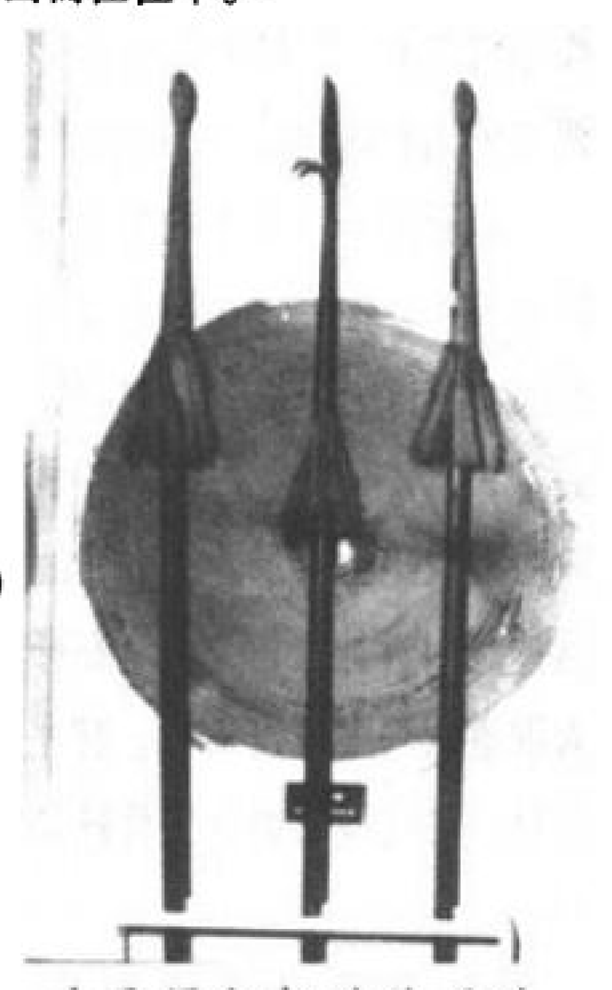
④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实业·矿业》。

⑤ 梁吉祥：《贵县志》卷一，《纪地·山川》条云：贵县龙头、六班、天平、三岔诸矿工，"尽系游民，人壮力强，孑无家室，凶悍异常，抢劫掳掠，拜会结盟，种种不法，差壮不敢入而问焉"。

⑥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

击，两场战斗，都是以少胜多。各地会众与贫苦农民投奔白沙者与日俱增，石达开有众已不下4000人。随即取“道赵里伯公坳，过大湾肚，渡北河，经姜里入金田”。①

武宣县和柳州府属的象州，闻风起义者亦大有人在。武宣与桂平仅一山之隔，会众翻山越岭即可入营。象州的会众千余人，9月6日（八月初一日）集中于中平附近的石龙村，“宰杀牲口拜上帝”。大乐巡检司派汛兵团练谋镇压，会众在谭要率领下坚拒。夜半，即翻越瑶山而往桂平。②



太平军初起时使用的矛、钩镰和藤制盾牌

桂南的陆川、博白，广东的化州、廉江等地的会众，以赖九、黄文金为首领。赖九在陆川陆茵村老家立大馆，黄文金在博白与廉江交界的佛子岭设大营，分头召集会众。博白书房屋，有黄益诚一家，“兄弟十人奉母随洪杨革命去”③。他们在各地毁神庙，烧当铺，没收地主富户的财物，冲破兵练的重重阻拦，10月，联军北上郁林州。军至州南40里之水车江时，郁林知州顾谐庚督率之练勇千人，在蛤母垌拦截，附近“各村皆假装团练出迎。讵(诓) 官军深入，遂尽变红巾，四出红旗接仗，勇练大惊溃败”。赖九催军乘机杀来，斩福绵团总唐桂攀等多人。蛤母垌各村乡民舍弃房屋、财物、钱谷，“尽从贼去”。④ 11月，经欧樟堡出安龙圩，败北流知县阮

① 石达开进军事据光绪《贵县志》卷六，《纪事》；民国《贵县志》卷一七，《前事》；民国《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林凤祥、秦日纲事据《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

② 覃元苏：《象州乱略记》。

③ 据《廉江上县黄氏族谱》卷十，民国二十年重修。

④ 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八，《纪事编》。

正惠部于蒲塘。直逼桂平县属之大洋圩，征得船只百余艘，分路于桂平上游之下湾、牛儿岭扬帆抢渡浔江，挺进金田。赖九、黄文金军号称五六千人。北上时多“露宿山野”，不入民居，“所至毁庙宇神像，民多毁庐挈家相从者”。①

平南是洪秀全“密藏”的地方。从9月2日（七月二十六日）起，他与冯云山遵照“天兄”的指示，入平南“避吉”，“沉藏”于僻静的山人冲胡以晃家。② 团营令发布以后，平南鹏化、大同、八垌、花黄水以及藤县大黎山区的汉、壮、瑶族会众共约千人，虽也遵令行动，分别向花洲团集，但并未立即开往金田。鹏化车旺村的翁振三首先集团抗拒，捉去团营会众数人。结果被拜上帝会众烧了房子，没收浮财，还活捉了他的儿子翁朝梦和翁朝球。③花良村团总陈上拔、陈宗淮祖孙二人，调动练丁数百人围攻花洲，被拜上帝会众赶入花洲冲内，歼毙大半。④ 起义会众连战皆捷，在胡以晃主持下杀猪宰牛敬拜上帝，并斩翁朝梦等祭旗誓师。⑤ 10月下旬，以花黄水一路会众数百人，在蒙得恩带领下，开往金田。11月4日胜利抵达目的地。⑥ 也就在这一天，“口哑耳聋”的杨秀清忽报康复，出面直接指挥团营大事。《天情道理书》说：

> ……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龛天下弟妹。

从此，杨秀清凭借所谓“天父大显权能”，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实际领导者。

在广西，除了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外，还有两支非拜上帝的队伍，也前

①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②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

③ 鹏化里《翁氏族谱》（不注编修年月）记：“第三十一代……振三，监生，妣陈孺人，生七子。朝梦、朝球，道光三十年洪逆乱，遇难。”

④ 参见陈运鹏：《平南鹏化里陈氏宗支部》，民国二十五年本；《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

⑤ 参见《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晃》。

⑥ 蒙时雍：《致二叔上国等家书》，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十，《其它》。

往金田参加团营。一支是贵县“来土械斗”失败的客家人。这次械斗，发生在9月间，正是拜上帝会紧锣密鼓团营的时候。双方在县北互杀40余日。战败势孤的“来人”被迫“挈家奔（浔江）南岸及桂平蒙圩等处”，到处流离失所，走投无路。于是请求拜上帝会的庇护，并“甘愿遵守教规典礼”，以“避去仇人的攻击，且得物资的接济”。这支队伍，共约3000人。[①] 另一支是以苏十九为首，活跃于桂平中都、木根、马平、罗秀等地的千余饥民。他们与陆川、博白北来的会众在浔江会合，同往金田。[②]

以凌十八为代表的广东信宜拜上帝会，早在1849年冬初（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就与地方绅团势力发生冲突。第二年春间（道光三十年正月），凌十八从广西回家，即将田地房产变卖以充粮饷，将金铁田器铸造军械。同年秋，信宜知县官步霄调动勇练拘捕拜上帝会兄弟，进攻大寮。适凌十八从广西金田“受命”回乡，立即团集会众进行反击，屡败勇练。[③] 但直至1851年1月（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誓师以前，凌十八并没有率师离开信宜，北上广西团营，而是在原地与官绅兵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草创营制，主动出击

自从1850年7月发布团营命令，到同年11月，汇集金田的各地男女会众已达两万人左右。金田团营以后，一律按照两个基本制度行事。一是把团营会众按地区依性别组织起来，“俱立首领”，男女别营。二是实行圣库制度。私人财物尽数归公，衣食所需由圣库按规定供给。团营时的军事组织，有军长、百长、营长和先锋等名目。而各“长”又有前、后、左、右、中之分，

①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
③ 参见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徐广缙、叶名琛奏稿，见《近代史资料》总五十六号；梁安甸等：《信宜县志》卷八，《纪述三·兵事》；朱用孚：《摩盾余谈》卷二，《信宜凌十八之乱》。凌玉超、凌十八变卖田产契纸，现存信宜云开村彭德元处。

并设立正、副职。[①] 至1851年秋驻军桂平紫荆山时，始改为军帅、师帅、旅帅等职。[②] 军事组织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军从两司马至军帅，须将所属官兵编造《兵册》，官兵个人须填写《家册》，记录本人年龄、籍贯、职务、参加革命及家庭成员情况，以备查考。这种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给养的统一供应，正是太平军能够“众心坚如金石”，“所至无不胜捷”[③] 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将近半年的团营斗争过程中，拜上帝会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地方上的练勇，还没有和反动官兵展开正面战斗。其中原因甚多。就拜上帝会而言，因为组织比较严密，行动比较迅速。团营之前，各地会众与地方团练虽已剑拔弩张，日有争斗，但锋芒未毕露，不为官军所重视。《贼情汇纂》卷一二《老贼》条云：拜上帝会初起时，“当事者视同草芥，初不料其猖獗至于此极也”！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及团营一起，势若溃川，又把反动官府打个措手不及。从反动官军方面说，当时天地会的反清起义、饥民暴动和“来土械斗”到处发生，把反动官军搞得眼花缭乱，疲于奔命，一时无暇、也无力顾及基本上还处于蛰伏状态的拜上帝会。此外，在反动派内部，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如浔州府顾元凯与桂平县李孟群，因为争夺俘获陈亚贵的“功劳”，两相交恶，“积不能平”。拜上帝会在金田“竖旗集党”时，“乡团走告县官，谕令解散”，不得要领。迨各地会众云集，陆川、博白大队直逼浔江南岸时，乡团再报府县，而“府县各怀意见，竟听贼于离城三十余里渡江”。“里绅复走诉县，县谒府，辞以病，再三弗获见。”[④] 府与县如此，巡抚与提督亦然。临桂状元龙启瑞当时与友人谈拜上帝会起义，曾有“地方官相与为难，噫气填胸肺间，因自戒执笔，恐发摅太过，以益时忌”[⑤] 的话。1850年10月12日

① 参见《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卷二。

② 《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

③ 《洪仁玕自述》。

④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

⑤ 《经德堂文集》卷三，《致梅伯言书》。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清廷据袁甲三奏劾广西巡抚郑祖琛“酿乱欺饰”，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秉公查复，据实奏参”，同时“确查（广西）提督闵正凤纵贼养寇，畏葸无能等情”。[①] 11月27日（十月二十四日），徐广缙复奏说：

> ……抚臣郑祖琛抵任后，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总之郑祖琛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广西官绅，即有谓其赏罚不明，人心涣散之语。[②]

这种府县互相推诿，上下粉饰弥缝的结果，造成清廷在很长的时间内，只知广西有天地会而不知有拜上帝会，更不了解拜上帝会的首领为谁。因此，也就无法认定必须调集兵力与拜上帝会作战。

拜上帝会风起云涌开展团营时，清廷虽然几次向广西调兵遣将，但其目标并非拜上帝会而是天地会。如1850年9月13日（八月初八日）命徐广缙带兵二千兼程入桂，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黔兵三千往广西，会同郑祖琛“剿办盗贼”。9月30日（八月二十五日）调陕西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10月中旬，从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调兵勇六千增援广西；并于17日（九月十三日）起用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要他从福建老家“星驰就道，悉心剿抚”广西“贼匪”。[③] 所有这些调度，其镇压的主要对象也不是拜上帝会。

广西拜上帝会和清军正面交锋，始于1850年12月平南思旺之役。时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在平南知县倪涛配合下，调兵练围攻花洲。洪秀全一面命会众固守抵御，一面通报金田出队夹击。23日（十一月二十日），花洲会众主动出击鹏化里花良村。第二天，转攻罗掩村，大败各村乡团。25日（二十二日）杨秀清命蒙得恩带精锐数百人，从金田东出平南。27日（二十四日），与花洲友军配合，直捣思旺圩，杀平南、桂平两县团练头目朱名扬、吴尚宪

---

① 《清文宗实录》卷一七。

② 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五。

③ 参见《清文宗实录》卷一五、一六、一七。

及兵勇数十人，李殿元、倪涛仓皇败走，秦川司巡检张镛被俘处死。[①] 28日，洪秀全、冯云山与胡以晃从花洲移营思旺，与金田前来增援之友军会合，随即分两路西进，同回金田。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迎主之战”。

平南思旺大捷，洪秀全、冯云山胜利回至金田，万众欢腾，声威大壮。当时，张必禄已经病死浔州，所部交署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接统。1851年元旦（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凤岐以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率贵州兵千余人，在地主团勇配合下，进犯金田。洪秀全、杨秀清分兵三路迎战，围困敌人于鸡母氹与蔡村之间，激战终日，清军大败。地方志书记载清军溃败情况是：

> ……（清军）七营相率宵遁。伊克坦布策马回走，坠于桥下，贼取其首而去。千总田继寿，把总潘继邦、杨万福、刘洪海、保定清、何其壮，外委彭昌镛并亡于阵。凤岐驰援之，堵御一昼夜，围始解。[②]

说明历时两昼夜的蔡村江之战，实乃拜上帝会团营以来所经历的规模最大、斩获最多的一次战斗。它大长了团营会众的志气，大灭了清方兵勇的威风。从此，金田村这支新兴的革命势力，引起了清廷朝野的注意，认定它“实为群盗之尤，必须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了。[③] 而投奔在拜上

---

① 光绪《广西昭忠录》卷一《张镛传》说他“力战死”。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云：“镛被执，骂贼死。”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说：清军败退，张镛“匿轿中”，被矛刺死。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三联书店，1956）59页记：张镛“见清军打败后就坐轿逃跑，被太平军捉住，杀于现在思旺圩东街坑木山瓦窑附近。杀他的时候，太平军拿掉他的帽子，放在他的面前说：‘这是你的功名，也是你的下场。’说完就劈头一刀”。

②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又参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劳崇光，向荣奏《进攻金田失利伊克坦布等战死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③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劳崇光、向荣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伪示正筹进剿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帝会大旗下的千万会众，却用战斗的胜利，迎来了誓师起义的伟大节日！

四、1851年的起义进军

金田起义，占领江口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是洪秀全38岁诞辰。桂平紫荆山前的田野上，旌旗蔽天，欢声雷动。成千上万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领导下，拿起刀矛，汇集金田村，“恭祝万寿”，庄严誓师起义了！[1] 当时的情景，真是“万民响应，四方乐从”[2]。在万众欢呼声中，洪秀全申明军律五条：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3] 同时命令会众一律“蓄发易服”，命名革命武装为太平军，全军以五条军律作为生活与战斗的基本准则。

金田誓师起义后的第三天，即1月13日，太平军移营东进，一举占领浔江北岸的要地江口圩，洪秀全、杨秀清在圩北的石头脚立大营，命令全军依江择险，设防固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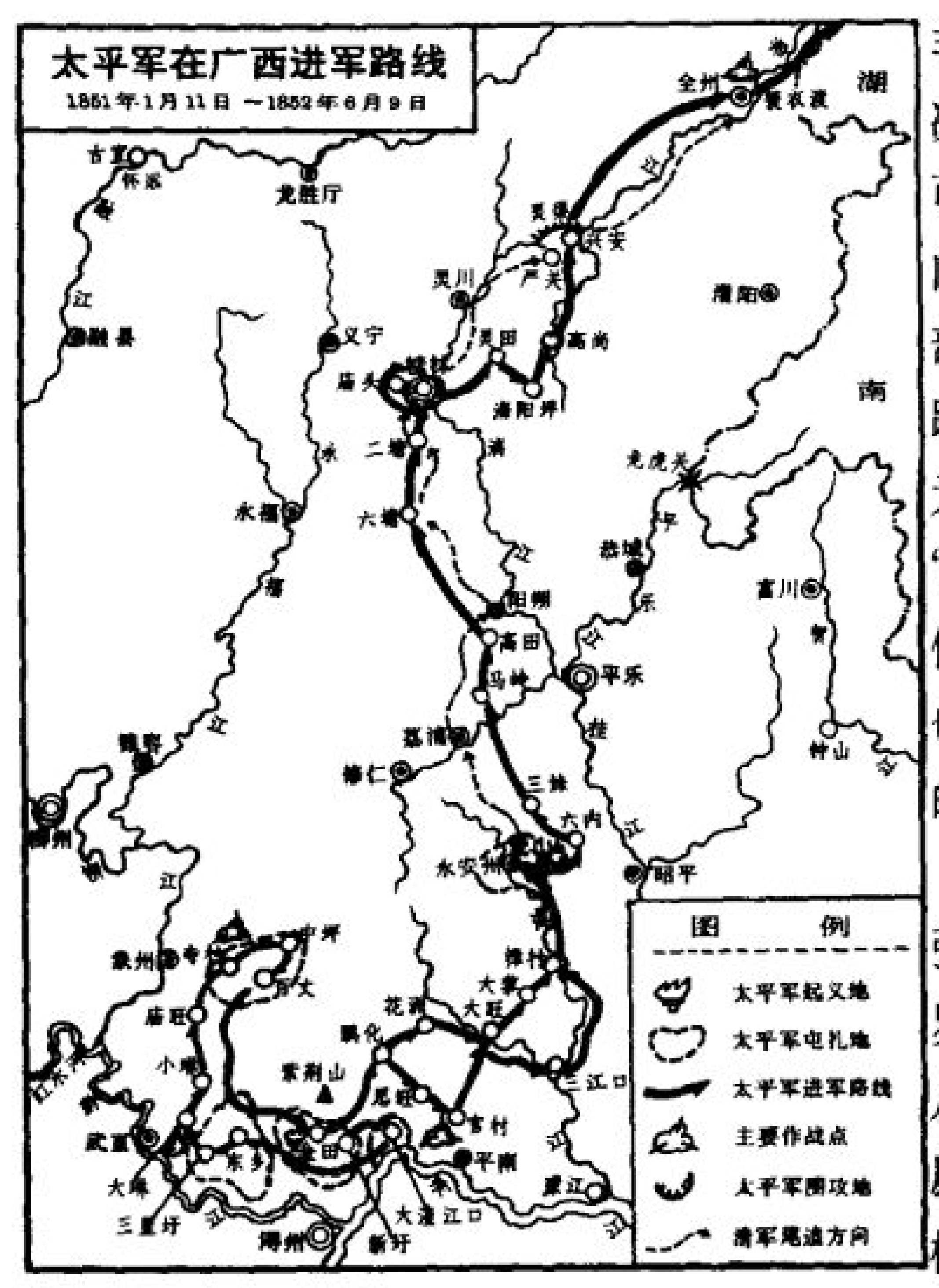
江口圩旧名大湟江口，又名永和圩。位于金田东南10余里，正当大湟江、鹏化水与浔江的汇合处。他上通桂平、贵县及柳州，下达平南、藤县与苍梧，交通便利，明清以来，即为重要圩市，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金田团营时，曾因缺粮“概行食粥”[4]。起义后迅速占领江口，既可获取

① 《洪仁玕自述》。

② 洪秀全：《太平救世歌》。

③ 见太平天国文献《天命诏旨书》，颁于“庚戌十二月初旬，时在金田”。

④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庚戌十一月初旬“天兄”在金田下凡圣旨。又参《天情道理书》。



丰富的物资供应，解决粮草匮乏问题；还可以与刚从信宜西出，向广西进军的凌十八部相呼应。而解决盘踞在江口一带、“叛服无常”，为虎作伥的“艇军”张钊、田芳、侯志等的破坏活动，也是太平军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金田起义之前，张钊、田芳、侯志与罗大纲等会党头目曾从江口到金田，表示愿与拜上帝会联合。杨秀清、萧朝贵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出十六名老兄弟分至各部，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制度和纪律。事毕，张钊等赠以巨金为酬劳。其中十五人皆遵照“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条律，把所得酬金交圣库，独有一人私藏不报，且曾偷卖军中藤盾，购买鸦片吸食，因而被处以死刑。贼性未除的张钊、田芳、侯志等七人得悉，借口拜上帝会纪律太严，不易遵守，叛变离去，改投清军。独有罗大纲“爱其纪律之严及治军之教理”，愿意率所部千人加入太平军。①

拜上帝会团营起义时的这场斗争，反映了它和天地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革命的盛衰成败。且看《天情道理书》的记载：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

> 金田起义之始……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我们若随其徒，必致中其计，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网罗，那时悔之将何及乎？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懔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未受其害。

在这场关系重大的斗争中，萧朝贵伪托天兄下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金田起义和太平军占领江口圩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反动营垒。当时，新任广西提督向荣虽于1850年11月中旬带兵入桂，但不久，从福建仓忙就道的林则徐即病死于广东普宁途次，数日后，张必禄又病死浔州。清廷被迫于12月中旬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要他们会同向荣等“悉心筹商，督饬文武相机兜剿，务期擒渠歼丑，净绝根株，勿致窜逸勾结，方为不负委任”[①]。1851年1月3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李星沅从湖南到桂林，同月中旬，到柳州。向荣亦率兵从横州经贵县入桂平。他们一面密饬金田周围的永安、平南、象州、武宣和桂平五个州县，加紧组织团练，封锁山梁渡口，断绝太平军外援之路；一面向清廷要求增调兵勇，加拨钱粮。同时制定“先灭金田一股，再分路捕剿”的反革命方针。一月之间，从云南、贵州、福建、湖南、广东及广西各地调至浔州兵勇共计万人左右，均归向荣节制。叫嚷“擒渠扫穴，在此一举”。[②] 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2月18日（正月十八日），向荣分兵两路，从东西两方向江口进犯。东路

---

① 《清文宗实录》卷二一。

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劳崇光、向荣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伪示正筹进剿析》，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清军计云南、贵州、湖南三省兵各2000人，配以两粤兵勇，分作三股，由向荣、李能臣和周凤岐督带，从平南马鹿岭出动，主攻石头脚太平军大营。西路由候补知府刘继祖带张钊、田芳等水勇数百，署陆川知县张琳所部壮勇1200余名，从石咀顺流而下，配合东路主力作战。①

面对近万敌人的疯狂夹击，太平军也早作战守准备。他们利用江口地方“江河分汊，山径丛杂”的有利地势，到处埋置地雷，驻扎重兵；并在石头脚、牛排岭外围安装伏炮，暗设陷坑。所有据点，俱“以男妇大小守之”。②临战时，洪秀全、杨秀清更精选青壮战士2000人，组成九支机动灵活的战斗队，由冯云山、萧朝贵、罗大纲统率，分驻要地，相机反击。

清军开始进攻之际，太平军皆隐伏不出。清军以为有机可乘，径直向牛排岭、石头脚扑来。待敌人逼近营垒，石头脚望楼忽出黄旗。霎时间，牛排岭伏炮齐发，隐伏各地的太平军同时杀出。清军大败狂奔，死伤枕藉。向荣逃归平南官塘卫，守备王崇山被杀。另部清军退往盘石村，亦被太平军伏击，死亡300余人。③ 3月初旬，太平军连日出击清军营垒。5日屈甲洲之役，清军被杀数百，弃尸遍地，“洲坑为满”④。

江口之战是金田起义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太平军以少数兵力，挫败数倍于己的敌人，把李星沅、向荣经过几十天的谋划部署全部打乱，粉碎了他们所谓“一举擒渠扫穴”的狂妄野心。李星沅虽然要向荣失败勿馁，“激励将士，同心协力，重振军威”。而亲身经历败仗的向荣却无可奈何地供称：经此

①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进攻大黄江牛排岭遇伏失利情形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② 咸丰元年正月初四日李星沅奏《筹剿金田片》；又参见《李进富供词》。俱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③ 谭熙龄：《桂平历年群盗事迹》，见魏笃：《浔州府志》卷二七，《平寇略》。

④ 清·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六，《纪事》。又：《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据民间传说：屈甲之战，太平军“杀得贵州兵都跪下来喊：‘不是我自己来的，是师爷要我来的呀！’”

一战，“官兵大半心寒，已难得力”了。[①]

进军武宣、象州

太平天国虽然在战斗中屡获胜仗，但缺乏盐粮硝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3月10日（二月初八日）夜，洪秀全、杨秀清命令全军撤出江口，经新圩越紫荆进武宣，以便团集未及随营的会众，解决盐粮硝药匮乏的问题，并打开北进的通路。

太平军进入武宣，兵分三路。12日（初十日），前锋进驻三里圩，直逼武宣县城。洪秀全在东乡立大营。主力驻莫村、灵湖、台村等地。左路军进驻西乡、平田、贝贡；右路军进驻北下、沙安、朋村。顷刻之间，武宣东乡“烽烟四起”[②]。东乡位于双髻山西麓，“东西六、七十里，复山重岭，水陆俱通省城”[③]。太平军来势既猛，且尽得地利，清军一片慌乱。武宣城内，官绅到处逃亡，弄得“一县皆空”。知县刘作肃被吓得六神无主，全无战守准备，手中拿着一条上吊用的绳子，急得“掩袂大哭”。14日，周天爵带勇200名，从柳州赶至武宣，以百名守城，另拨百名在城东的彰钟桥扎营。只因太平军进驻三里圩以后，即顿兵不前，否则活捉周天爵与刘作肃，占领武宣城，是完全有把握的。16日，向荣率大队清军赶到武宣，在三里圩附近的东岭驻扎，局势始稍见缓解。19日，太平军三路猛攻东岭，与向荣军激战于台村、灵湖之间，敌方“各勇先溃，镇筸兵大奔”；向荣身陷重围，狼奔豕突一个时辰，亦无法逃出重围。周天爵与知府张敬修带兵勇赶来救援，被太平军集中火力猛击。周天爵在慌乱中跌落轿下，险被活捉。向荣则乘机突围逃走，仅

①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九日《与向欣然提军书》，见《李文恭公文集》卷一二。

② 庞赓辛：《武宣县志》第五编，《前事》；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

③ 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见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

免一死。①

在连战皆捷，人心振奋的大好形势下，3月23日（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称天王，建号太平天国，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② 洪秀全建号、称王和设立五军主将制，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了领导，有利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洪秀全"东乡登极"后一周，凌十八率军围攻郁林州城，与武宣主力军南北呼应，更加震动了清廷朝野，鼓舞了义军士气。

1851年1月，凌十八率军杀出信宜，经茂名、化州进入广西博白、陆川，一路上斩关夺卡，不但青壮赴战，妇女从军，连儿童也腰"佩雪白长刀"，冲锋陷阵。③ 3月31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与北流天地会梁十八部共约5000人，"蜂拥蚁附望（郁林）州而来"，酉刻至城下，"分踞西南街，猝急攻城，炮声震天"。这是金田起义以来起义者第一次直接攻打城市。凌十八督率所部，围攻郁林城36日，曾经使用各种办法，"百计攻城"，英勇壮烈。它给封建统治者造成极大的威胁。清帝奕詝惊呼："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借以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④ 可惜由于凌十八长期顿兵郁林，没有及时率

①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

② 《洪仁玕自述》谓：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即"正号太平天国"，并"封立幼主"。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向荣等奏，只说洪秀全韦正等"擅帖伪号伪示"，并未明言为何号。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改历诏云："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联登极节。"十月十四日天王改历诏又云："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说明洪秀全正式称天王，应是在武宣驻军时，在此之前，所谓洪秀全称伪号，极可能是"太平王"。故中外不乏史籍记载起义时事，皆称洪秀全为"太平王"。至于太平天国之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象州人覃元苏所写的《象州乱略记》，说太平军在象州，"其伪太平天国王居新寨村，前锋居中平圩、仁义、谢官等村"。说明洪秀全在武宣称天王，同时建号太平天国，当可成立。

③ 杨霁、陈道彬：《高州府志》卷五〇，《纪述三·事纪》。

④ 《清文宗实录》卷三八，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谕。当时清廷误认韦昌辉是太平军首领。

师北上金田、武宣与主力队伍会合，坐失战机，反被敌人得到从贵县、桂平、兴业、北流、博白以及广东廉江等地调兵遣将，向郁林集结的机会。4月底，清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副将王锦绣率滇、黔两省兵5000余名相继赶至，逐步对郁林形成反包围。在激烈的反围攻战斗中，凌十八的军师王晚英勇战死。5月5日（四月初五日），全军撤离郁林，经陆川、化州回师信宜。7月底（六月底），进占罗定州之罗镜圩，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鏖战经年，战士数千人，虽面临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逆境，仍“相从饿死而不变”，壮烈牺牲在战斗的岗位上。①

就在洪秀全“东乡登极”的那一天，李星沅、周天爵和向荣联合向清廷上奏，哀叹“广西贼事披猖，官兵不敷策遣”，请求“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否则全局殆不可问”。② 李星沅更是悲观失望，一再写信给徐广缙表示：“贼氛方炽，军事多艰，必得统帅主持，非不才所能负荷”；哀叫“愿与力违，钜荷难堪，惟屏息以待雷霆”。③ 说明身为清军主帅的李星沅，经过与太平军的几场较量以后，已经彻底认输了。

4月3日（三月初二日），武宣第二场大战在东岭、台村、三里圩一带展开，关于这次战况，周天爵在《致周二南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当时清军的部署是：

> ……于一军之后置一队杀手，斩退走者，四路出兵置四队杀手，皆有将弁领之。一股刘守（继祖）攻东陵（岭）；一股张守（敬修）攻台村之伏，接应攻东陵；一股向提军攻三里圩之西；一股贵州秦镇军（定三）新至之兵攻三里圩之北，再由此而南，抄贼之后。

他们颇为这个四路围攻的部署所陶醉，“自谓胸有成算矣”。谁知这些谋划早

---

① 梁安甸：《信宜县志》卷八，《纪述三·纪事》；杨霁、陈道彬：《高州府志》卷五〇，《纪述三·事纪》。

② 《请特简总统将军来粤督剿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③ 咸丰元年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二日《与徐仲绅制军书》，见《李文恭公文集》卷一四。

为太平军侦悉。4月2日晚，洪秀全、冯云山即亲率大军，从东乡衔枚疾走30里，增援三里圩，分路进人伏击阵地，待机歼灭敌人。战斗发生后：

> 洪泉（秀全）、冯云山皆亲身督战。南弟一股刘守所领之大头军先至东岭，而贼营寂无人声，发火箭数十支燔其房屋，贼始出数百人，两下对炮，对战方酣，忽出二千余将我兵围裹。东勇系张守敬修所带，福勇系县丞褚汝珩所带，共千余名急救之，而贼又出两倍之众，统围三股。向提军欲统大军冲贼两半，不意贼又并麾军围之。而贵州兵欲攻三里圩之北者，贼伏大林距其中。一股劲（劲）贼遮其前，一股大众出其后，贵州兵击死穿黄衣红战裙者，孰意贼视死如归，赤身赴敌，立刻杀死黔兵二十四人，沈伤八人，黔兵始大奔矣。此战我兵用命，伤者七十余人，死者共三十余人，自午逾申，真血战也！

这是一场清军围攻而太平军采取反包围，清军分数路进犯而太平军从数路截击的战斗，双方投人的兵力都在万人左右。激战半日，结果又是清军以败仗告终。洪秀全、冯云山不但对战斗全局作了正确的部署，而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面对太平军的英勇善战和洪秀全、冯云山的巧妙指挥，周天爵不胜惊叹："综观所有大帅，无与敌者。"①

清军在武宣连吃败仗，内部矛盾重重。5月4日（四月初四日），李星沅被迫从柳州移营武宣。因为连忧带病，8天后即死于武宣军次。为了扭转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清廷又一次大规模调兵遣将，加强反革命的政治、军事部署。先是，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带火器营人桂"助剿"并帮办军务。4月10日（三月初九日），命大学士赛尚阿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宜。随即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并调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侍卫开隆阿，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等为将，协同指挥队伍；调顺天府尹邹鸣鹤

---

①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

为广西巡抚，同时从四川、安徽、贵州三省增调援军4000余名开入广西战场。另由国库拨银300万两，从四川运米5000石备用。① 幻想以此挽救败局，取得反革命战争的胜利。

经历两个月与武宣驻军的战斗以后，太平军的粮食、弹药供应又日见困难。5月15日（四月十五日）夜，全军撤离武宣，经大林北上象州。清军秦定三部虽见大林一带灯火如龙，只是目迎目送，不敢骚扰。太平军直前冲击，数日之间，连占象州庙旺、古城、寺村、中平、百丈、新寨和大乐圩等地。洪秀全、杨秀清在新寨村立大营。②

清廷接到武宣前线失败的消息，立即下令处分周天爵、向荣、秦定三等人。③ 5月初，乌兰泰率军到武宣，他认定太平军实为广西心腹大患。17日，他与向荣分别率军5000余人入象州，围困中平。乌兰泰偕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古州镇总兵李瑞，威宁镇总兵重纶带兵4000余人，从罗秀逐步进驻中平西北之马鞍山、独鳌岭、梁山村一带；向荣率本部官兵由桐木窜至中平东北之界岭；云南昭通镇总兵经文岱，知府张敬修各带滇兵、壮勇盘踞中平西南之寺村附近；刘继祖督张钊等水勇驻中平西面之运江；另有象州举人韦仁元带团练驻中平东南之大樟。各路清军兵勇与太平军相距，皆不出十里内外。④ 他们摆开四面合围的架势，幻想把太平军在象州吃掉。

6月8日（五月初九日），乌兰泰先以贵州古州、威宁两镇兵4000余人，从独鳌岭、梁山村直逼中平。太平军出动600战士迎战，逼敌退踞独鳌岭。第二天，石达开率战士千余，分作数队，与乌兰泰军展开激战，从早至晚，不分胜负。天黑以后，太平军七勇士赤膊提刀，绕道摸上独鳌山，猛攻敌威

① 参见《清文宗实录》卷二九、三〇有关清谕。

② 《东华续录》卷九，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周天爵、向荣、乌兰泰奏。

③ 《清文宗实录》卷三三，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谕。

④ 参看《东华续录》卷九，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初一日周天爵、乌兰泰、向荣奏；同月二十日赛尚阿奏。又参同年六月初七日赛尚阿《奏报抵粤日期折·附件》，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宁镇大营。因战启仓猝，敌人纷作鸟兽散，被杀及落水淹死者共计300余人。乌兰泰承认“一千官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向清王朝“自请治罪”。[①]从此以后，太平军连日主动出击，屡获胜仗，且看覃元苏《象州乱略记》的记载：

> 五月初……贼来攻营。官队半道迎击，罔不北，有跪受贼刃者。乌都统一军于独鳌山侧，被贼兜胁，入水死者半。又有周中丞（天爵）兵数千，自州城督队来，欲攻其后，逆党前迎，直犯周师，兵败数十里，不能驻，仍回城，无何，回省。

中平大战以后，周天爵、向荣、乌兰泰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为此，清廷把“刚愎自用”的周天爵调离象州。7月2日（六月初四日），接代李星沅“专责办贼”的赛尚阿赶到桂林。他在给皇帝的第一封奏折中，即表示要竭尽心力，“多购间谍，解散党与，计诱贼首，自相携贰”。[②]妄图破坏太平军内部的团结，达到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的胜利。但是，就在赛尚阿到达桂林那一天，洪秀全、杨秀清放弃了从象州北上的意图，命令全军从象州分作三队，翻山越岭，南向紫荆山与金田地区挺进了![③]

回师桂平、平南

太平军回师桂平，军分两部驻防：洪秀全在冯云山、石达开的协助下，以紫荆山茶地村为总部，在猪仔峡、双髻山、花雷、大坪等地设防固守。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则以大宣里莫村为中心，在新圩、盘龙、安众、金田等地扎营，控制了从思盘河至鹏化水之间的几十里平川。回师桂平的目的，

---

①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日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②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奏，见《东华续录》卷九。

③ 据调查，太平军从象州回师桂平时，一队从象州大樟过东温，越双髻顶到花雷，再进十八山；一队从象州王田过红水界到紫荆山；一队从象州奔腾到落田，经古朋、古董到武宣东乡，再入紫荆山。见《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政治·政治事件》。

一是甩开敌人的主力，打破敌人的“坐战”、“围剿”阴谋，重新寻找向外发展的时机与道路。[①] 二是抢收新圩平原即将成熟的早稻，解决全军的赀粮匮乏问题。敌人对此也有所察觉，迅速调集约近30000之众，从西、南两方向紫荆、金田地区压缩。向荣与巴清德以武宣东乡为据点，由西向东猛攻紫荆山。乌兰泰、达洪阿等以南渌为据点，由南向北进犯莫村、金田。[②] 于是，双方又接连发生了历时70多天的激烈战斗。

向荣进攻紫荆山太平军后路，经过多场鏖战以后，于8月11日（七月十五日）抢占猪仔峡和双髻山要隘，紫荆山西方屏障洞开。15日（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移营诏令，号召“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总不要慌”。并对全军的移营编组与行动作了重要安排：

> 今行营，其令各军各营，队伍宜整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前军主将贵妹夫，左军主将达胞同统戊一监军、前一军帅、前二军帅、左一军帅、左二军帅开通前路；中军主将清胞统土一总制、中一军帅、中二军帅及前选侍卫二十名护中；右军主将正胞同统右一军帅、右二军帅、后一军帅、后二军帅拥后。每行营匝营，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③]

太平军遵令撤出紫荆山以后，在风门坳凿断山梁，筑垒安炮，保卫新圩。28日（八月初二日），清兵三路进犯风门坳，太平军奋勇反击，血战终日，被迫撤出。与此同时，乌兰泰加紧从南渌向新圩进犯。太平军一面分路反击敌人，一面扎造排筏，故作顺流东出江口的态势。敌人接得探报，急忙调兵增强浔

① 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力主以“坐战之法”对太平军作战。见《东华续录》卷八。

② 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赛尚阿奏：“其（太平军）所以死踞新圩者，因晚（早）稻将熟，计图掠获入山。”清谕：“现当早稻登场，难保不意图抢掠，自应迅速合剿，断其粮食，使贼进无可掠，退无可守。”见《东华续录》卷十。

③ 见太平天国文献《天命诏旨书》。

江沿岸防务。同时加紧围攻新圩。9月4日至9日，太平军在新圩平原与敌人血战六昼夜，颇有斩获。11日（八月十六日）夜，太平军以2000精壮战士，分作二队，一支扼守紫荆山口以阻向荣军，一支从新圩东北的水枧头渡江，踏破敌人哨卡，尽斩哨卒百余人，然后沿山僻小路，经上窑越百步顶，上马鬃界，进人平南鹏化，一举攻克思旺圩。大队人马依次继进。当时，清总兵李瑞带兵驻王举崖，副将王锦绣率兵驻龙古城，目击太平军突围向平南前进，惊恐非常，急令所部"息鼓灭火，而不敢议其后者"①。

太平军虽然安全突出重围，但未能摆脱敌人的追扰。两天以后，乌兰泰以近万之众，在平南莫村驻营，截断思旺出平南之路。向荣率大队由平南县城北上，直逼官村。15日（八月二十日），萧朝贵、冯云山亲率精锐数千，分路迎击敌人。一路由思旺圩经西尾岭迂回官村，直攻向荣部，一路由思旺直插莫村，牵制乌兰泰军。窜至官村的向荣部"扎营未稳，遽被冲扑，致帐房军械"及随营粮饷，丧失殆尽，几至全军覆没，他狼狈逃回平南县城，不敢复出。事后自言："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② 乌兰泰军被杀数百名，亦不敢轻举妄动了。经此一战，太平军重操战争主动权，于是整队由思旺北上大旺圩，然后分水陆两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向永安州的进军。

五、在永安州的建设与斗争

攻克永安州城

平南官村大捷以后，清军的攻势被暂时刹住。为了迅速向永安州前进，

---

①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

②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

洪秀全在大同里把队伍重作部署：以茶地移营时的后队韦昌辉部并入前队，在萧朝贵的统一指挥下，辅以石达开、秦日纲、林凤祥、罗大纲等著名将领，率主力从陆路向永安州前进。以后队冯云山部加入中军，随洪秀全、杨秀清保护辎重及老弱妇孺从水路前进。

水路军从大同江东南行。江上船队，两岸陆师，并肩前行。至藤县三江口，再溯江而北，沿途冲破平南、藤县练勇的拦击，乘风鼓浪前进。萧朝贵率领的陆路军，从大同里翻山越岭东去。9月20日（八月二十五日），攻占藤县北面的大黎。大黎地处藤县、平南和永安州边区，“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金田起义前，山民参加拜上帝会者已经不少。太平军在大黎驻扎五日，前军主将萧朝贵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整个山区的贫苦农民闻风而动，顿时掀起了投奔革命的热潮。① 与此同时，萧朝贵又秘密派出一支行动迅速、善于攻坚的千人劲旅，在熟地利、得人和的罗大纲指挥下，翻越龙头界，突出藤北的樟村，渡湄水北上，以迅雷般的快速行动，向永安州挺进！

永安州在广西东部的丛山峻岭间，居浔江与漓水之间，北通桂林、平乐，南出浔州、苍梧，形势十分险要。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永安州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早在金田起义以前，这里已是所谓“土匪啸聚，声息相通”的重要地区之一。② 州城东南的六樟岭、古眉峡一带，不少山民与活动于平南八峒的胡以晃有了“联结”③。1850年冬初，数百名饥寒交迫的农民曾经发生暴动。知州吴江虽然调兵练进行疯狂镇压，杀害了饥民首领何洪基，但并不能把人民的反抗之火扑灭。

罗大纲进军永安时，潜伏在古眉峡、六樟岭的暴动饥民立即起来响应。在他们的配合下，太平军于9月23日顺利攻占了州南的水窦。守军阿尔精阿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三。

③ 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载：“（平南）八垌武生胡以晃，多财好斗，洪秀全因之，以联结平南大同、永安诸山民。”

部400多名兵勇狼狈逃回州城。第二天黎明，罗大纲率军直逼州城，在东门外的晒布岭陈兵架炮，并于当晚出动马队绕城环攻。守城兵勇在黑夜中滥施枪炮，实力大损。25



永安州城南门

日（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大队驻屯州城东、南门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经过半日战斗，终于打破了州城南门，歼灭苏保德率领的团勇数百名，捕杀知州吴江与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等官绅多员，取得了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攻克城池的伟大胜利。①

军民和协，扩大战果

太平军攻占永安州，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清王朝接到永安失陷的消息，立即下令把“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下部议

---

① 太平军攻克永安城，清·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六《纪事》说：“闰八月初二日”城陷，“江投井死，阿尔精阿毙于炮”。《平桂纪略》卷一则说：吴江投井、阿尔精阿毙于炮在“八月初一日”。光绪《永安州志》卷四《兵志》说：“八月初一日”酉刻州城失陷时，阿尔精阿与吴江同“至关帝庙再拜自缢”。时间与事实皆误。姚莹在《中复堂遗稿续编》卷一《报赴永安收城剿贼状》说：永安失守，“文武被难”。秦焕撰：《吴江墓志铭》说：吴江夫妇“俱惨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酉时”。1974年蒙山文物部门挖掘武庙眢井土坑，发现铁镣铐、棕绳及被刀砍矛戳之头骨，而从眢井土坑中移尸埋葬的吴江夫妇墓，不见头骨、牙齿或头发。说明是被处死了的。

处；革提督向荣、都统巴清德翎顶”①。而洪秀全却满怀胜利的喜悦，于10月1日（闰八月初七日）在万众欢呼声中坐轿进入永安城，并且针对可以取城缴获的新形势，当众发布诏令说：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②

在攻克城池以后，洪秀全发布“各宜为公莫为私”的命令，重申缴获归公的纪律，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及时的。它对巩固太平军的圣库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洪秀全等首脑人物进城以后，太平军的最高统帅部就设在州城里。州衙门成了洪秀全听取“诸臣随时奏事”、指挥全军进行战斗与建设的“天朝”。③

太平军在永安州，驻军193天。在洪秀全、杨秀清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团结群众，军事设防工作，为扩大胜利成果而斗争。其主要情况如下：

团结群众，斗争地主。④

太平军攻进州城以后，立即“占据州署”，捣毁监狱，戕官释囚，把“监内班房共有三十三人全行放了”。并把他们全部编入军中，驻扎在“州城南门外长寿圩上天福杂货铺内”，共同开展对敌斗争。⑤

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动员他们起来支援军队，参加革命。太平军认真贯彻执行金田起义以来颁布的各项“条规”与纪律。进驻永安州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群众，全军上下，总是众口一词，宣称“天兵是来

---

① 《清文宗实录》卷四二，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五日谕。

② 见《天命诏旨书》。“一条草”，即一条心。

③ 《洪大全自述》，见《太平天国》（二）；又参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记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

④ 参见拙著《太平军在永安》，24～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⑤ 《覃汉阳口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又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大事记》，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470、479页。

杀老妖的，绝不伤害百姓”。[1]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明确表达了太平军的基本态度。对于那些受了封建统治者的欺骗宣传，或者不明真相，仓皇逃离家园，躲进深山密林的群众，太平军则想尽办法，甚或亲自前往喊话，劝他们从速回家安居乐业。凡愿追随天兵的，有吃有穿；不愿参加的，“只要不帮妖凑勇，不动不理”。在发布的“安民告示”中，还号召群众为革命“捐纳粮饷”，“输送军火”，“探报妖情”；切勿“帮妖藏妖”，“凑勇反逆”，“奸淫妇女”与“掳掠杀人”。还规定：群众只要用竹篾为圈，悬于门首，即被认为兄弟姊妹之家，可以得到天兵的保护。[2]

在永安，太平军执行“秋毫莫犯”，“不扰百姓”的严明纪律，和清军、勇练到处奸淫掳掠，滥杀无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州城北路，清军驻扎的新圩、古排一带，“沿途村落被焚已尽，惨气逼人”。[3] 还有人对当时盘踞在永安四乡的清方兵勇的表现，作了这样的记述：

>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洪秀全占踞州城，林林总总。官兵一二十万，扎营在村，遍野如林；高山峻岭，无不踏光。食品昂贵。壮勇淫掠，拆屋抢财。又遇数年凶馑，蝗虫灾害。各属州县，四方寇起，多如蜂密。焚烧屋宇，掳掠财物，六畜无存。奸淫妇女，捉人杀人，男人子女稚，尽被勒捉，不可胜数；妻离子散，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4]

有比较才能鉴别。清军与勇练的奸淫掳掠，以及由此造成的盗匪横行，百姓遭殃，使人民群众迅速从正反、善恶的比较中认识了太平军，也使太平军迅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社会秩序很快趋于稳定，而且在附城

---

①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太平天国改字，到南京后，改老字为考。此处称“老妖”，得自群众口碑传说。

② 太平军在永安优待百姓的具体情形，参见《太平军在永安》，24～32页。

③ 《从军日记》，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事。

④ 永安州壬山村《陈氏族谱·后序》，光绪年间修纂，民国年间抄本。现存壬山村平岭陈乃才家。文字照录不改。

的70多个村庄，方圆400多平方里的区域内，出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打击地主豪绅的热潮。

因为在攻城的战斗中全歼了苏保德为首的地主武装，而在进城发布的“安民告示”中又明确提出了“带队归顺的有赏”，“凑勇反逆的必斩”的政策，① 从政治上给地主团绅以猛烈的一击。于是，在永安，出现了“未闻有团练御贼杀一人报功者”的现象。② 地主团绅势力的削弱，又为太平军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富户开展经济斗争创造了条件。斗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没收地主富户的浮财；二是抢割地主的田禾。

没收地主富户浮财的斗争，是从点名要地主富户“捐钱献粮”发展而来的。太平军进城初期，即派人四出，指名捐钱献粮。地主乡绅多数采取抗拒态度。因此，从指名捐献发展为群众性的没收斗争。这种斗争，历时一个多月，遍及太平军占领的东平里70多个村庄。没收的程度视地主富户的态度而定。没收存粮（“出谷子”）最为普遍，没收衣物、牲畜、银钱等也相当多。至于拆屋、捉人或处死，则是对少数坚持顽抗态度者的惩罚。斗争的成果是巨大的。太平军所得“积谷”，据说可供“三、四月之守”。③ 对于参与斗争的贫苦农民群众，也都分享了斗争的果实，兑现了“愿从天兵者，有吃有穿”的诺言。并为转入大规模的“抢割地主田禾”做了重要的准备。

“抢割地主田禾”的斗争，是紧接没收地主富户浮财展开的。所谓“抢割”，既包含有对地主封建所有权的剥夺；又包含了对“广积粮米，以充军储”时间的争取。“抢割”的范围也很广泛，举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甚或接近清军驻营的边沿地区，如州城西南的北荡垌一带，也出现了“边打仗，边抢割”的情况。太平军先是发动群众，特别是那些佃耕地主田地的农民，在他

① 太平军在永安明定了“四赏四罚”。即“带队归顺的有赏，探报妖情的有赏，捐纳粮饷的有赏，输送军火的有赏。帮妖藏妖的必斩，凑勇反逆的必斩，奸淫妇女的必斩，掳掠杀人的必斩”。见《太平军在永安》，25页。

② 姚莹：《中复堂遗稿续编》卷一，《示谕永安州士民文》。

③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三，《至荔浦言事状》。

们的直接配合下，查实田亩的归属，然后在地主的田地里插上竹签，把稻田一分为二，一半归太平军收割，一半由佃户自收。同时宣布严禁地主向佃户再索田租，坚决保护佃农收获所得。通过抢割地主的田禾，太平军的收获也十分丰富。1852年春间，姚莹向上峰报告军情时曾经透露说：

> 兹查逆匪粮米，自去年闰八月抢割之后，仓廪甚丰。自去岁获犯即供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①

稍后，谈及何以未能断绝太平军的粮食接济时，他又无可奈何地报告说：

> 伏思断贼接济一事，本司自去秋即严行拿禁，前后获犯不少。贼之接济实已无多，其粮食则自去秋贼到之时，州民尚未刈割，所有附城近处禾稻，皆为贼收，是以充足。②

由上述可知，太平军在永安州没收地主浮财，抢割地主田禾的斗争，无疑是解决军需供应的重要途径。通过没收与抢割，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官绅的顽抗，安定了社会秩序，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因而也就加强了太平军与百姓之间的团结协作。

围攻与反围攻的较量③

武装斗争贯穿在永安州驻军时期的始终。在战略上，太平军是四面设防，以守为主，适应休养整补的需要。有的论者把太平军在永安驻留称为“休战”期，④ 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

太平军在永安的军事设防，始于攻克州城之日。最初，主要是修整城池，加强城防保卫。9月30日（闰八月初六日）以后，即大力动员军民力量，在城外的莫家村、高堆村、团冠岭、瞭望岭等地修造营垒，树立寨栅，建筑望

---

①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四，《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

②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四，《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

③ 参见《太平军在永安》，53～78页，110～119页。

④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卷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楼，挖掘壕堑，并用泥石冲砌或借“生根活树，间以杉木竹篙编成墙壁”①。把各个重要攻守据点有机地联结起来。这些直接拱卫州城的长墙、营垒，与流经州城东、西门外的通文河、长寿江并行，其建筑之牢固，形势之险要，即敌对者亦赞为奇绝，自愧不如。以团冠岭的西炮台而论，太平军“所设望楼、炮台、炮眼及一切竹木土墙并竹签，门户曲折，沟水甚阔，其所据实系险隘，处处可以拒敌”②。与此同时，太平军分别以州南的水窦村、西浮岭，州北的龙眼塘、上阳村，州东的大塘村、窝池岭，以及州西的六庙村、圂岭等地为中心，相度形势，择要建造战防工事。水窦村及其外围的中营岭、黄绞岭、仙台岭、古坳岭、古海岭、西浮岭与古眉峡七处营垒，除古眉峡营孤立湄江南岸外，其余“各营，（皆）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③。州城东、西、北三方外围营垒，也都各有墙、栅、壕、井，周围遍布竹签荆棘，非常复杂稳固。清军及练勇最感头痛的“鱼网暗沟”，“铁钉、蒺藜、梅花坑”，就是指这些说的。④

太平军的战防兵员配备，根据“先外后内”的原则，把精锐主力摆在第一线。进城初期的具体部署，《覃汉阳口述》是：

> ……罗大光（纲）住州城南门外长寿圩上天福杂货铺内。圩上共住三千多人，城内约有几千人。太平王坐轿进城。大头人俱在城内。水窦有一千多人守口子，莫家村有二千余人，城内外……男妇共有一万多人。

清军探报掌握的情况是：

> 贼由大黄（旺）圩分两路攻扑永安州，闰八月初一失守。……贼分守城南水窦村为犄角，洪秀全等均在城内，余贼分列四营，在东、西、南、北四门外屯扎。萧朝贵、石达开、冯云山、罗大纲各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营垒》。
② 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记其所见。
③ 《乌兰泰函牍》附：《致赛尚阿禀》。见《太平天国》（五）。
④ 《清文宗实录》卷四八，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谕。

管一营，与城中相接应。①

其实，在整个永安州的攻防战斗中，太平军的布置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萧朝贵率重兵负责西线防务。他以团冠岭西炮台为总部，负责指挥长寿河以西，北起龙眼塘，西及圂岭、龙虎岭的攻防战守。面对的是以乌兰泰、向荣为头目的南北路清军主力。是永安战事最频繁、战斗最激烈的战场。秦日纲率军驻水窦中营岭，指挥周边各营，保卫州南门户。冯云山率军驻州南莫家村，策应西、南两路友军作战，直接卫护州城。韦昌辉、罗大纲率军驻城东，各以立山旧县与瞭望岭东炮台为据点，警卫州城东北一线。石达开率军驻扎州东大塘，警备古苏、古带诸冲渠要道，并动员东平里各村屯群众，从人力、物资上支持保卫州城的斗争。如此的军事设防，兵力部署，即使清军头目也不得不连声赞叹："此善用兵者也，不可以小寇目之。"②

与太平军设防固守的同时，清王朝也仓促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开赴永安州战场，积极谋划围攻太平军的战争。

9月26日，即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城的第二天，乌兰泰率秦定三、经文岱等部兵勇6000余人，由平南进人永安境。两日后，潜至州城西南12里的佛子村扎营。这是清军投人永安战场的第一支主力。10月初旬，刘长清、李能臣率川、滇兵4000余名开人州北16里的古排塘，是为清军围攻永安州城的又一支主力军。它与龙眼塘太平军阵地相距不到10里。稍后，巴清德、长瑞、董光甲、邵鹤龄等相继率领所部开人北路。清军摆在北线的兵勇超过2万人。州东一带，清总兵李瑞在向荣的指使下，于11月中旬一度率军从昭平偷出古苏冲口。但阵脚未稳即被太平军劫寨烧营，"军械尽失"③。州南一线，直至11月中旬，张敬修、许祥光才带东勇、潮勇以及藤县的翼勇共9000余人，驻

① 樗园退叟编：《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见《太平天国》（四），357～358页。

② 《中复堂遗稿》卷三，《至荔浦言事状》。

③ 《从军日记》，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记事；《中复堂遗稿》卷三，《请参李瑞状》；《乌兰泰函牍》卷上，《向荣致乌兰泰函牍》第十。

扎在新开与六黎冲口，远在州城60里以外。据统计，截至1851年底止，清军投入永安战场的兵勇、团练，总数在4.6万人左右，比太平军总人数多了一倍。从战力而言，清军是人多饷足，装备精良，而且陈兵外围，形成围困态势。但是，仔细考察清军的围攻格局，却是破绽百出，极为脆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兵勇的素质太差。各路清军，“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①。彼此“勇于私斗，怯于临敌”。军数“虽众而心不齐，诸将各人自顾而无彼此策应之心”。② 是以斗志极低，远非“纪律严明”，“固结甚坚”，斗志昂扬的太平军的对手。

二是各路队伍或为大山阻隔，或被太平军切断。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互相配合。而且多僻处山隅，交通不便，非但粮食供应困难，又因受山岚瘴疠，以致转成疾病者亦复不少。③

三是在将帅之间，对于应该采用何种战略战术对太平军作战，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赛尚阿、乌兰泰与姚莹等人主张“围而击之”，幻想“兵围四面，聚而歼之”。④ 而“坐拥重兵八千”的向荣却坚决反对，独唱“纵而掩之”，“攻之使走，从尾后追”的反调。⑤ 就是在主张“围而击之”论者之间，后来又出现了“先攻城”或者“先剪外”的意见分歧。这种在战略战术上的争吵迟迟无结果，“将不齐心”、“兵不用命”的弱点就始终无法克服。因此，在实际行动中也就无法做到统一指挥，步调一致。结果必然是屡战屡败。

双方在永安州的正式交锋始于9月28日，即太平军攻占州城的第四天。此后一周内，太平军连续出兵三次，攻打首先开进永安西南的乌兰泰军，把

---

① 江忠源：《致彭晓杭学博书》，见《江忠烈公遗集》。
② 《中复堂遗稿》卷三，《至荔浦言事状》。
③ 《乌兰泰函牍》卷上，《向荣致乌兰泰函牍》第九、十一。
④ 苏凤文：《广西昭忠录》卷一，《乌兰泰传》；徐子苓：《诰授通议大夫广西按察使司姚公墓志铭》；《清史列传》卷四三，《江忠源传》。
⑤ 《中复堂遗稿》卷三，《向提军开路放贼言不可恃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一，《王梦麟守昭平兵不宜动状》。

它阻止于佛子村一线。10月14日（闰八月二十日），南北两路清军互相纠合，发动了第一次所谓"夹攻州城"的战斗。乌兰泰军担任主攻，从佛子出兵水窦。刘长清军南扰龙眼塘，策应乌军作战。太平军从水窦、莫家、龙眼塘三路出队迎敌，经半日战斗，清军狼狈败走。偷袭龙眼塘的北路清军也被太平军伏击，死亡百余人。当时，双方都还处于调兵遣将、筑垒设防、筹集粮草的紧张备战阶段，还不可能集中主力，发动大规模的攻防战斗。而且，太平军进驻永安以后，为了适应休养整补的需要，也有意改变过去常用的以进攻为主、以防守为辅的作战方法，而改用以守为主，以逸待劳，非确有把握，绝不轻易出击的战术。这是太平军在战术运用上的一个重要改变。姚莹面对太平军的战术转变颇感忧虑，他说：

> 贼此时惟死守营盘不出，待我兵饥疲之后，乃出而抠我，诚善用兵者也！此之谓以逸待劳。而我兵既疲于往返，又疲于战斗，此兵家之大惧也。①

在清王朝方面，朝夕祈求的是所谓迅速"扫穴擒渠"，彻底消灭太平军于永安州。10月底，咸丰帝奕詝再三颁布"严旨"，要赛尚阿与巡抚邹鸣鹤等"严饬各路将官，或合力堵截，或乘机设伏，诱而歼之"，从速收复州城。②远在桂林的赛尚阿转向永安前线的清军头目施加压力，同时移营阳朔，加强指挥调度。因此，在11月上半月，又接连发生了两次围攻州城的战斗。

11月2日（九月初十日）一战，南北两路清军数万人全部出动。北军以巴清德、刘长清、长瑞、李能臣四支人马担当主力，由古排塘南下，进攻龙眼塘、西河村至圞岭一线，乘隙攻扑州城。南路的乌兰泰、秦定三军则分扰水窦、莫家村，牵制太平军北援，掩护北军攻城。但太平军早有戒备，凭借长墙、壕垒坚守，待敌深入，再予反击。当北路清军南下时，太平军伏兵齐出，首先剪除敌军两翼，然后再由龙眼塘正面突进，三路击敌。清军阵势大

① 《中复堂遗稿》卷三，《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

② 《清文宗实录》卷四二，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谕。

乱，互相践踏，死伤甚多。南路清军亦被太平军奋力击退。叫嚷多日的所谓“夹攻州城大战”，不到半日即以清军的惨败告终了。[1]

11月11日，清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州城。它的战斗部署是：由北路清军担任主攻，战场选在长寿河东岸，企图避过太平军驻龙眼塘与团冠岭西炮台的主力，乘虚而入，袭取州城。为此，刘长清、李能臣与长瑞把队伍分作左、中、右三路，同时并进。太平军仍采用老战法，诱敌深入，伺机出击。清军南犯时，故意纵其中、左两路，集中力量击其右队。然后回军绕至敌后，与州城守军夹击中、左两路清军，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尽扫三路来犯之敌，又一次取得了反围攻战的大胜利。

清军两次直攻州城的失败，证明“必先攻夺州城”之路不通。“先剪外，后取城”的主张趁机抬头。据此，接着就有所谓“十月乌都统攻莫家村”的战斗。这次战斗是由乌兰泰军发起的。在一个初冬的黑夜里，乌兰泰以千余兵勇，企图秘密绕出太平军圌岭驻地之后，抢渡长寿河，攻占州城南门外的莫家村。谁知刚出佛子村大营不远，就被太平军包围于三石村与灯挂村之间。清军一触即溃，全部被赶入灯挂村背的旱冲。太平军猛追不放，分路入山搜杀败逃的敌人，擒斩大半。乌兰泰虽然把大败渲染为大胜，[2] 但几经失败以后，对于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也“未尝不触目惊心”。他被迫承认：“贼之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他还承认：在太平军的坚固战防工事面前，清军的盲目攻扑，只是“以人与木石相打”，得失自可立判。他还历数当时两军攻守的利弊说：

> 我以重兵远路跋涉，千防百备，以明击暗。贼以数百人坐地严防，远以炮轰，近以枪打，以暗击明。不得利则死守不出，稍有隙

---

① 参看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一，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赛尚阿、邹鸣鹤奏。《中复堂遗稿》卷三，《会商分派官兵攻城状》，《我军进攻龙眼塘未克攻城状》，《初十日进攻情形状》，《亲至古排查询军务状》。

② 参看《清史列传》卷四四《乌兰泰传》；《平桂纪略》卷一；《平定粤匪纪略》卷一。战斗的具体时日不详，但肯定在前两次攻城之后。

则乘空扑袭。我兵进之十分涉险，撤之尤切严防，劳逸之势，又不得不计较者也。①

事实说明，太平军虽然采取守势，但战争主动权始终握在手中。当时，身当南北两路清军、肩负两战场指挥重任的萧朝贵，曾经借天兄耶稣之口，豪迈地对会众说过：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各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过也。②

他所讲的天父天兄，实际是革命农民的化身。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是当时斗争的实际。

清军屡战屡败以后，又一次大力增兵添饷，并重新起用革职留营的向荣，由他统率北路兵勇。幻想依仗人力和物力的优势，实现其所谓"扫穴擒渠"的目的。1851年底至1852年初，向荣催促北路清军向南进逼，分别在凉亭屯、石龙冲、上阳村、程村垌和壬山村等地筑营驻兵，与龙眼塘太平军大营相距多在5里左右。同时以李能臣率滇兵进据龙眼塘西南的二岭、朝占一线，从侧背牵制龙眼塘、团冠岭太平军大营。接着，乌兰泰也于1852年1月中旬率队从西南方向州城进逼，战斗十分频繁和激烈。在各路清军加强进犯下，太平军为了集中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主动把西南防线后退数里。2月下旬，又将古眉峡口的守军撤至江北的水窦。乌兰泰从此占据了水窦西南方的独松岭，与太平军隔江对峙，相去仅2里左右。而张敬修与许祥光率军从新开、六黎冲至古眉峡口，在水窦东南的独手庙、蒙排垌扎营，与驻防罗瓮村、西浮岭的太平军仅一水之隔，相去不到2里，是整个永安州战场两军对峙最近的战线。这时候，赛尚阿也从阳朔、荔浦赶至永安，在上龙横岭安设大营，以便"与向荣及各镇将密商事宜"，加紧对永安州城的进攻。

① 《乌兰泰函牍》附：《致赛尚阿禀》。

② 《天命诏旨书》，辛开十月二十日，时在永安。

1852年，两军对峙形势的新变化给永安战场的战斗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战斗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急于求胜的清军完全处于盲目的滥攻滥战状态。正面近战败北，则改用2000斤至8000斤的各式巨炮猛轰太平军阵地。2月中旬以后，炮轰枪打，日必有之。最激烈的时候，竟有一个时辰发炮300余发的。① 在清军的疯狂炮击下，城内房屋，颇多损坏。太平军罗瓮村与西浮岭阵地，尽被清军炮火夷为平地。驻守在那里的太平军，被迫移居西浮岭的地道中，坚持对敌作战。② 直至4月破围北上时，这种艰苦的战斗，在州城南北两方都在继续进行。

挫败封锁与用间阴谋

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的，还有经济战线上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③

采用经济封锁的手段，配合军事上的围困，是清军的一贯策略。随着军事搏斗的日益激烈，清军的经济封锁也就加紧进行；兼以太平军占领区日益狭小，而又在战斗中大量消耗。因此，军需匮乏的危机随之发生，并迅速成为全军最感棘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硝药、弹子奇缺，食盐供应不继。为此，太平军在战斗中不得不“惜药如金”，稀放枪炮。④ 在生活上，则每馆每日仅供给盐二两，其后“惟管数百人头子，每饭有些少盐斤，众皆淡食”⑤。全军的生活与战斗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

困难压不倒太平军。他们上下同心，一面厉行节约，尽量减少消耗；一面积极想方设法，自力更生。为了解决“众皆食淡”的问题，他们挖掘城中盐馆泥土，熬煎食盐。为了解决硝药奇缺的危机，他们掘取多年陈壁墙土，

---

① 《东华续录》卷一三，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赛尚阿奏。

② 丁守存在《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初三日记事说：“（水窦、西浮）贼营数日无炊烟，探有地道馈食。”又参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三，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赛尚阿奏。

③ 关于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参见《太平军在永安》，103～110页。

④ 华翼纶：《寄邹中丞》，见《中复堂遗稿续编》卷二，附录。

⑤ 《中复堂遗稿》卷四，《查复断绝贼人接济状》。

熬制硝药。同时定出优奖办法，鼓励四乡群众“由山僻间道暗为转运”，从外间取得盐斤、硝磺等物的供应。[①] 此外，太平军还利用敌方兵勇惟利是图，嗜财如命的弱点，在战场上和他们做买卖，彼此“苞苴互投，各取所需”[②]。有时甚至在战场上拾取敌人打来的炮子，再以之回击敌人。

刀光剑影的拼杀和密如网罗的封锁之外，当时还有一条无形的战线在激烈搏斗着。那就是清军的“设谋用间”和太平军“肃奸防谍”的斗争。[③]

“设谋用间”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太平军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很早就与军事围攻、经济封锁互相配合，同时使用。永安州战争期间，这种暗害活动特别猖獗。除了到太平军占领区秘密投毒、放火之外，主要是收买奸细，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的阴险手法，进行破坏与瓦解革命的活动。太平军军帅周锡能叛变投敌，接受敌人的指示，混回州城，阴谋刺杀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人，以颠覆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巨案，[④] 以及利用胡以晃之弟胡以旸再三投书致其兄的策反事件，都是清军头目赛尚阿、乌兰泰和姚莹等人一手策划的。[⑤]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密切注视着清军的暗害活动。1851 年 12 月 4 日（咸丰元年十月十二日），洪秀全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向全军发布了诏令，号召人人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诏令写道：

> 通军大小众兵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据眼前论，众兵将今知得妖魔多端诱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兹今特诏大小众兵将千祈坚耐，莫被诱惑。……妖魔诡计百出，众兵将千祈

---

①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三，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赛尚阿奏。

② 龙启瑞：《经德堂诗文集·浣月山房诗集》卷三。

③ 关于清军设谋用间与太平军的反间斗争，参见《太平军在永安》，78～90 页。

④ 参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⑤ 参见《中复堂遗稿续编》、《乌兰泰函牍》以及《从军日记》的有关信函与纪事。

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1]

正是这道诏令，为全军胜利开展反间斗争树立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粉碎了周锡能与清军里应外合、谋攻州城的阴谋，平息了乌兰泰、姚莹等对胡以晃的策反活动，从而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广大会众，加强了全军的战斗团结，为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太平军在永安历时半年的反围攻、反封锁与反暗害的斗争，是极其复杂、艰苦和激烈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迎接敌人的疯狂挑战，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封王建政，增订规制[2]

金田起义初期，由于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太平军中已有军长、侍卫诸名目，而且根据各人的特长或所司职务，相继设置了国医、典硝、典圣粮、典刑罚、巡查、监斩官等官职。[3] 在领导层中，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以后，又设置了全军主将制。军师制的酝酿亦甚早。1848 年 11 月 19 日（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洪秀全与萧朝贵在桂平鹏隘山，就秘密议论过起义以后谁可以做军师的问题。而且初定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都可以担任军师。[4] 到了 1851 年 9 月太平军从象州回师桂平大宣里时，杨秀清就以军师的名义发布文告。[5] 说明这时太平天国既有主将制，又有军师制了。驻军永安以后，在原有的官制上再予增订，具体见于 1851 年 12 月 17 日（辛开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发布的封王诏令上。诏令规定：

通军大小兵将，各宜认实真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前此左辅、

① 见《天命诏旨书》，辛开十月十二日，时在永安。
② 请参见《太平军在永安》，90～103 页。
③ 参见《贼情汇纂》卷二《剧贼姓名下·剧贼事略》。
④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
⑤ 《清文宗实录》卷四〇，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谕。

> 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

在此同时，与官制相适应的袍服制度，也作了初步规定。② 至此，太平天国的国家体制与政权组织形式及其统属关系，已经基本确立了。

太平天国崇奉拜上帝教，因此反对人们称上、称帝、称圣、称爷。③ 否则就是违背真道，冒犯天父。这实际也是对封建帝王的申斥与否定。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洪秀全不可能抛弃这种“凡间歪例”，另立新章，结果仍旧是称王而治。天王之下，尚有五王，他们之间，仍旧存在着等级差别。杨秀清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际当权者。在永安形成的、这种特殊的国家政权结构，直至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并无重大变化。至于太平天国的袍服制度，在永安时虽然规定了各种制式，但是，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并未能依制实行。即令是“洪秀金、杨秀清等，亦止红袍、红风帽而已”。至于圣兵及新入营的兄弟，都头扎红巾。官员与老兄弟，则扎黄巾。而且规定：旅师以下扎黄布巾，以上扎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百姓男女概令包蓝布巾。”④ 比较正规地执行此种袍服制度，当在1852年冬占领武汉以后。

与封王建制相辅而行的又一重大创建，就是颁行天历。

太平天历是一种特异的历法。它以366日为一年。单月31日，双月30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16日，余俱15日。它既不依

① 《天命诏旨书》，辛开十月二十五日，时在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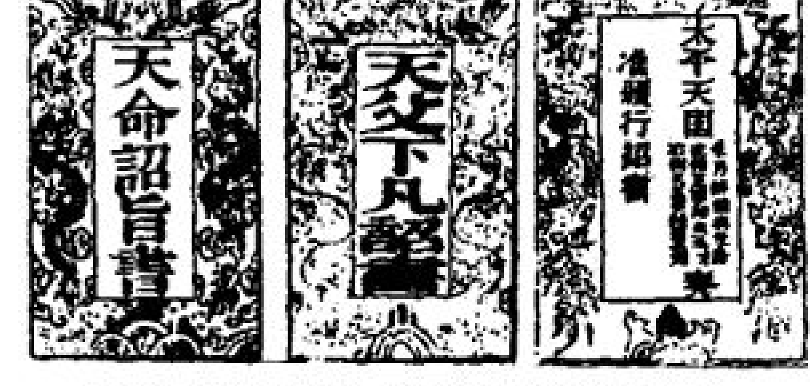
② 参见《天命诏旨书》，辛开十月十二日天王诏令。又：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十七、十八日记事。

③ 见《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伪服饰》。见《太平天国》（三）。

阴历合朔望，又不与阳历相符同。在封建时代，臣民实行王朝历法，藩属国崇奉宗主国正朔，乃天经地义的事。太平天国颁行天历，自立正朔，实质具有否定封建王朝的意义。故被视为“罪大恶极”之举。[1] 太平天国颁行天历时，揭露和批判了旧历书中的封建迷信说教，把它斥之为“邪说歪例”，“皆妖魔鬼计迷陷世人”的毒草，必须“尽行删除”。认为“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无须选择。这种大胆去旧更新的措施，表现了革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对于长期受封建迷信束缚的劳动人民，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或生产上，都是有益的。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刊刻颁行的官文书

刻印和颁行各种新书，是太平天国在永安建政中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洪秀全和冯云山深知文书在“传布真道”，教育会众中的重要性。发动革命初期，他们就以“抄书送人”为宣传拜上帝教的重要手段；[2] 此后，无论在革命的秘密活动时期，或者在起义后转战各地的军事倥偬岁月，他们都不忘文书的利用与保存。进驻永安以后，生活相对地得到了稳定。于是，他们组织力量，或编写新书，或整理与辑录旧稿，并加紧刊印颁发。在永安州，太平天国刊刻与颁发了哪些书籍？目前尚无法确知。但在它所印发的书籍中，属于“辛

①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三，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赛尚阿奏。
② 参见《太平天日》。

开元年”至“壬子二年”的有:《幼学诗》、《太平礼制》、《天条书》、《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等。太平军进驻永安之前，或者破围北上以后，战斗频仍，动荡不安，刊印新书，似非易事。由此推断，上列各种书籍的刊印颁发，多在永安驻守时期，想无疑问。

细读太平天国这时所印行的新书，多以宣传拜上帝教教义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故宗教色彩特别浓厚。在文字上，不少是领导者口授诏令的记录，所以“不避俚语俗词”，“不加藻饰”，取其“明白流畅，以便人人易解”。①又因发号施令或从事文书工作者多为客家人，或者是精通客家话者，所以，许多文书，又多是采用客家话形成的。这些都体现了太平天国文书的特点。②而当时构成太平天国的基本群众，多是贫苦的客家人。用客家话写成的、通俗易懂的文书，正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是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犀利武器。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三令五申，要求全军认真贯彻执行“男女别营”的规定，加强战斗纪律；健全“圣库制度”，做到“同家食饭”，“同打江山”。天王洪秀全39岁生日时，臣民们还以比试诗联与演戏等活动，恭祝万寿和起义一周年。③

总之，太平军驻留永安州半年，在团结群众，斗争地主；封王建政，增订制度；反击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粉碎敌人的阴谋暗害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它不但使金田起义以来的长期战斗消耗得到了休养整补，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上为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比较牢实的基础，迎来了1852年4月的破围北上，经略湘鄂，定鼎金陵的大进军。

---

① 《天命诏旨书》。

② 参见拙文《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1)。

③ 《乌兰泰函牍》卷下，《姚莹致乌兰泰函牍》第十三；《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记事。

六、破围北上，大火燎原

向“小天堂”进军

1852年4月5日（太平天历壬子二年三月一日，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军突破了清军的重重围困，从永安州开始了进攻桂林，挥师湘鄂，东下江南的大进军。

不少资料与迹象表明，太平军的破围北上，进取江南，乃早已有之的谋划。1851年8月15日在桂平茶地移营时，洪秀全即命令全军：必须“努力扶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在永安州，又多次诏令全军，遵守天条，同心杀妖，“俟到小天堂后论功行赏”。[①] 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常公开宣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②] 太平军心目中的小天堂在江南，即后来立为天京的金陵城。永安州有民谣云：

> 金田起义出大王（湟），得了太平下永安。
>
> 转取桂林打湖广，金陵就是小天堂。

太平天国在南京刊印的《天情道理书》，也表述了类似的意思：

> ……兹蒙天恩、主恩及东王之鸿恩，同到小天堂，得受荣光，其亦历尽艰辛，坚耐到底，方得享天父大福也。

在永安州驻留时，太平军曾数次派人偷越清军的封锁线，远至荔浦、阳朔、永福及桂林等地，探索进军路径；并且扬言要走永安州东北的三妹瑶，挺进

① 《天命诏旨书》。

② 谭熙龄：《紫荆事略》，见魏笃：《浔州府志》卷二七，《平寇略》。

荔浦，进攻桂林。[①] 1852年冬太平军进入湖北时，各地纷传太平军“早有欲窜南京之说”[②]。或者“风闻伪示有‘定鼎金陵’之语”[③]。太平天国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北伐兵败被俘，在“供词”中明言：太平军“在广西便欲到南京”。[④] 综上所述可知，太平军把金陵作为战略进攻的目标，实自广西始。夏燮论述太平军向江南挺进的历史时指出：

粤西之匪，起自桂平，而猖獗于永安之役以后，然其注意于楚尾吴头者，已非一日。[⑤]

这是对上述诸说的很好概括。

打破重围的战斗

太平军从永安破围的前一天，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著名的破围诏令，他号召说：

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魂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⑥]

这道诏令，实乃突围之前统一全军思想与行动的总动员令。为了顺利突出重围，太平军在城内外各要口“埋伏地雷火炮”，抛置银钱衣物，用以杀伤

---

① 参看《中复堂遗稿》卷三，《再与向提军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二，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卷一三，咸丰二年正月三十日赛尚阿奏。
②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一八，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奏。
③ 《清史列传》卷五三，《雷以诚传》。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167页。
⑤ 《粤氛纪事》卷四，《长江挺险》。
⑥ 《天命诏旨书》，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时在永安。

和诱惑敌人，阻遏敌人的追击。①

4月5日三更时分，一场暴风雨刚刚过去，太平军两万多军民，分批分路撤出生活与战斗了六个半月的营地，遵照天王轻装前进的命令，朝着东部大山迅速突围了！罗大纲率领精兵千余人为开路先锋，用两面夹击，“冲腰剪尾”的战术，一举攻破州城东北18里处的古苏冲，大败清军及练勇数千人，平毁敌人的关卡三道及木栅、堑坑20余处，缴获火药十余担，随即攀越龙寮坳，经平冲、旱冲、崩冲出大阨，向昭平大垌疾进。两万多军民相继前行。驻守水窦的秦日纲军担任断敌任务，为全军后卫。第二天，清军发觉太平军已经人去营空，一面派兵勇进扑州城，一面调兵从南北两路跟追入山。在古苏冲与太平军后卫队伍发生激战。太平军因众寡悬殊，火器不足，且有掩护大队转进任务，颇有损失。据清方报称，在追击战中还俘获了太平军的“大头子洪大全”。②

4月7日，秦日纲率军在平冲与清军激战时，洪秀全、杨秀清等已率主力进驻昭平大垌。他们立即动员全军，修整战具，组织反击。一夜之间，太平军在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等率领下，分三路抢登南北山梁要隘，占尽平冲、旱冲和崩冲的两侧高地，在30里的山地中布下了一条伏击敌人的袋形阵地。就在太平军抢占山梁设伏的同日晚上，向荣和乌兰泰也赶到了龙寮坳口，召集各镇将商讨追剿计划。在平南官村吃过败仗的向

① 龙启瑞：《纪事诗》，见《经德堂诗文集·浣月山房诗集》卷三；《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匪纪略》。

② 《中复堂遗稿》卷四，《二十日各路进兵胜败状》；《东华续录》卷一四，咸丰二年三月初十日邹鸣鹤奏。据民国三年由焦左泉主编的湖南《兴宁焦氏续修族谱》卷五载：洪大全，本名焦玉昌，字孟春，号亮。道光四年生。兄弟四人，他居长，曾应科考不第。退而探天文，画舆图，练兵法，造阴符。“后闻太平天国起义，遂上表投焉，由是渺无踪迹”云云。清军把他俘获以后，为了掩盖战斗失败的责任，把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大头子”或“谋主”押往北京处死。造成历史上的一桩错案。请参《太平军在永安》附录，《太平天国和天地会》。

荣以战斗连日，兵勇饥疲，主张稍作休整，待探明路径，再分路追击。而骄横凶悍的乌兰泰自恃平冲获胜，“意气愈扬，明知枵腹，立令追剿”。向荣无可奈何，且恐战功为乌兰泰独占，遂“率师从之”。长瑞、长寿、邵鹤龄、董光甲等镇将各带兵勇齐进。①

8日清晨，大雨滂沱，浓雾满山。时秦日纲已率军从崩冲登大阬，与设伏的兄弟队伍会合。清军数千人在乌兰泰及各镇将的催赶下，也昏昏然从平冲向大垌方向进逼，尽入三冲峡谷。太平军抓住有利战机，居高临下，猛打跟追而来的敌人。霎时间，枪炮轰鸣，火光四射，声震山谷。清军知中伏，阵势大乱。因为山高坡陡，冲渠狭窄，且“径仄地滑，人马拥挤，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劣势。太平军乘胜向下冲杀，“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所向披靡。半日之间，清军被杀、被烧、被压或坠崖落涧与互相践踏而死者近5000人。② 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同时毙命。邵鹤龄被伤七处，身首异处。董光甲“尸已烧坏不可别”。长瑞与长寿弃尸峡谷中。③ 乌兰泰坠涧受伤，仅免于死。太平军在30里的丛林峡谷中连战三昼夜，因上下协作，临危不惧，终于化小败为大胜，变劣势为优势，非但杀敌众多，而且缴获甚丰，重操战争主动权。经此一战，清王朝恃以在广西反抗革命的主力大部被歼灭，“围剿”的计划被打乱，终至“阖营丧气”。地主阶级中人对赛尚阿“贻误戎机”深感失望与愤懑。海虞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正反映了这种情绪，诗曰：

半年贼踞永安州，
袖手何曾展一筹！
遏必隆刀铦也未？

① 《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龙启瑞《纪事诗》；华翼纶《荔雨轩文集》卷三《双忠传》。

② 清军死亡人数，有“数百”、“八百”、“千余”、“四、五千”与“杀敌兵七、八千”等说。此处据《李秀成自述》。

③ 参看华翼纶：《荔雨轩文集》之《双忠传》，以及《董邵两总兵传》。

全教先试相公头。

朝夕引领南望，企盼“扫穴擒渠”捷报的咸丰帝奕詝，接获前方损兵折将的惨败消息之后，愤怒与失望交集。他先是以赛尚阿“调度失宜”，向荣、乌兰泰“锐进失机，咎无可辞，着一并交部严加议处”。继又以“广西剿贼失败，降大学士赛尚阿四级，革广西提督向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职，均留任。拔乌兰泰花翎”。①

挥师直攻桂林城

永安破围战大胜以后，太平军在昭平大垌稍作停留，一面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富户财物，一面整顿军旅，吸收数百农民参加，并把他们编为向导、先锋，进攻桂林。② 9日，从大垌折向永安州南垌村，经三妹瑶出天平坳，走荔浦马岭，上阳朔高田、临桂六塘，直逼桂林。沿途清兵、勇练闻风溃逃，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16日，攻抵桂林城下。

桂林地处湘桂走廊南口。四面奇峰林立，河湖环绕。城垣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从桂林北行，有官道可出湘鄂；从漓水顺流南下，可达浔州、苍梧。实为湘、粤、桂三省水陆交通要地。长期以来，桂林是广西巡抚驻地，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巡抚邹鸣鹤，士绅龙启瑞、朱琦等人，早在城里设局办团练，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宗旨。“练局门前，旗枪排列”，杀气腾腾。忽报太平军兵临城下，邹鸣鹤“终日张皇，束手无策”；团练局掩旗息鼓，噤若寒蝉。无名氏写的《独秀峰题壁诗》说：“堪笑重围刚一日，旗枪收拾渺无痕”，正是官绅们色厉内荏的写照。当时，城内防守空虚，团练不可依靠，住在城里的官绅，“莫不惊惶相顾而流泪曰：‘危在旦夕，死在须臾矣！’”③

---

① 分见《清文宗实录》卷五六，咸丰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九日谕。

② 《中复堂遗稿》卷四《十八日各路进兵胜仗状》；并据1957年调查采访记录。

③ 《粤匪大略》，日本安政甲寅（咸丰四年）翻版石印本，见《太平天国史料》，493页。

向荣自永安惨败以后，即仓皇穿草鞋，戴竹笠，亲率残兵数十名从间道潜回桂林。[①] 19日（三月初一日），乌兰泰亦率兵勇从六塘向桂林赶来。至南门外4里的将军桥时，被严阵以待的太平军伏击，千总李登朝以下官兵300余名被杀死，乌兰泰肋膝皆中炮重伤，十余日后死于阳朔。[②]

太平军攻抵桂林时，因兵力不足，仅在南门外象鼻山至西门外牯牛岭一线扎营，安置妇孺辎重于斗鸡潭船上，无法堵截清军从北门获得增援。邹鸣鹤、向荣等为了保住省城，除强迫居民在团绅的监视下，“各分地段排列旗队”，分股登城防守外，还派人四出召募地痞流氓为勇。而刘长清、和春以及湖南提督余万清等先后奉命率队增援桂林，兵勇总数迅速超过2万人，约为太平军攻城人数的四倍。这些名为兵勇、实为盗贼的队伍开到桂林，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且看《独秀峰题壁诗》的揭露：

募民十万系巾红，名号衣冠总不同。
未遇贼氛先气短，纵抄民物转心雄。
江湖盗寇成都会，田里桑麻遍地空。
辱及娥眉浑莫禁，椎牛还望奏肤功。

注释说：“壮勇渡河掳掠民物殆尽”，“附郭乡村掳掠可悯”。“壮勇奸淫妇女，上莫能禁，中丞置酒大犒”。充分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

4月19日，即将军桥大败乌兰泰军之时，太平军开始在象鼻山架炮轰城，声如霹雷。巡抚衙门多处中炮，屋瓦纷飞。邹鸣鹤“怕居节署，移榻新安会馆”。向荣出于反抗革命的需要，竟先一日“将东门、文昌门、西门、南门靠

① 据马秉良：《云谷录·云谷琐录》（咸丰刻本）。马秉良于1850年9月受广西布政使吴鼎昌之命，“总办南门、文昌门外团练保甲等事”。《独秀峰题壁诗》说向荣仅率六人赶回桂林。

② 《东华续录》卷一四，咸丰二年四月初六日赛尚阿奏；《平桂纪略》卷一。黄泌：《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广西昭忠录》卷一《乌兰泰》载：“乌兰泰伤重，驰回阳朔，未越日而卒。”误。

城房屋尽行焚毁”。[1] 此后一周间，太平军连日用巨炮攻城，并于夜间进攻南门及文昌门。西王萧朝贵，左二军军帅罗大纲策马亲临前线，在南门外指挥战斗。妇女儿童也不避锋镝，纷往前线呐喊助阵。[2] 清军则凭坚城，“迭施枪炮、火罐、滚木、擂石”。邹鸣鹤且强令“各街团练暨铺户居民昼夜上城协力防御，每人给日食钱三百文。于是，贼匪外攻，兵民内御，内外炮声，响震山谷。万众惊惶，莫可言状”。这是封建团绅亲自临战的记录，[3] 说明太平军给敌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5月上旬，攻城战斗更加频繁。太平军炮毙清军参将长明于丽泽门，击杀都司额勒和泰、守备马占魁于战阵，且一举歼灭安徽兵300余名，大败张敬修军于福山脚。[4] 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回民的积极配合下，秘密在牯牛山、五里圩等处赶造攻城战具吕公车。[5] 根据记载：“攻车之制，高与城齐，宽二丈，上可用百人。每车有云梯七具，可连袂而上”。车有数层，“第二层储满火药”。[6] 5月6日（三月十八日）夜，太平军起动吕公车进攻南门和文昌门。战车逼近城墙时，太平军战士启动障板，架设云梯，冒死进攻。清军借助城墙掩护，频施枪炮，燃放火弹、药罐，并用长竿缚火炬烧吕公车。太平军战车被毁多具，主动撤走。15日凌晨，太平军发炮猛轰南城，继即推挽吕公车前进，“乘夜直扑城下，势极凶猛”。但守城清军早有准备，故“兵壮闻声”，即“枪炮频施，火罐如雨”。竹木构造的吕公车着火，“车内药发”，车毁人

---

① 参看《粤匪大略》。《独秀峰题壁诗》说：“二十九夜贼焚城外民房殆尽。”不对。

② 《独秀峰题壁诗》之十三。

③ 《云谷录·云谷琐录》。

④ 《平桂纪略》卷一；《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

⑤ 太平军从永安进军桂林时，阳朔、临桂回民加入太平军，并协助制造吕公车事，据桂林马砰街清真寺阿訇何云高、崇善路清真寺阿訇李振民以及马达学同志口述。桂林西门外与芦笛岩附近，至今仍有当年攻城牺牲之伊斯兰“拜特仑”（英雄）遗冢十八处云。

⑥ 参看《粤匪大略》；《平桂纪略》卷一；《云谷录·云谷琐录》等书。《粤匪大略》说吕公车“有数层，每层可用百人”。似不可能。

亡，太平军又被迫撤去。[①]

太平军攻城既无法取胜，清军却纷纷在城外择险扎营，并从东西两面向太平军压迫。16日，太平军出兵攻东郊福隆园、猫儿山清军营垒，在花园里、杨家碑等地发生激战。第二天，再从福隆园北上，直攻秦定三大营。互有伤亡。但正在这时，张钊水勇却从漓江下游上驶，偷袭斗鸡潭太平军船队，全军辎重与后队顿受威胁。此后两日，太平军虽然不断发起进攻，并不能扭转日益严重的劣势局面。5月19日（天历四月十四日，阴历四月初一日）二更以后，太平军"先于文昌门、西门轰打枪炮无数"[②]。并在"象鼻山束草为人，炮置药线，长绳引之"。清军"闻炮声不绝，加意防守"。第二天发觉是疑兵之计，太平军已经离开桂林很远了。[③]

综观太平军进攻桂林，一月之间，"历水陆二十四战"[④]。由于兵力不足，装备窳劣，形成围困桂林之势既不可能，加以桂林三面临水，而且"城根多坚石"，掘地道袭取亦有困难。[⑤] 于是在敌人的疑惧与错觉中，全军趁黑夜兵分两路，主动撤离桂林，安全北上。事后，太平天国领导者对这次撤离，说是天父的指使和对城内百姓施与"仁恩"。《天情道理书》写道：

> 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其时移营，冲围而出，蒙得天父化心，俱各奋不顾身，打破铜关铁卡，诛灭无数妖魔，直抵广西省城，即将桂林围困。嗣因城内百姓出城禀奏东王，禀称城内仓库空虚，粮草匮乏。东王见其势穷力尽，大发仁恩，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尔等须知，天父权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岂桂林一城独攻之不克乎？此

① 参看《云谷录·云谷琐录》；光绪《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平桂纪略》卷一。

② 《东华续录》卷一四，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赛尚阿奏。

③ 光绪《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

④ 夏燮：《粤氛纪事》卷一，《两粤起兵》。

⑤ 陈徽言：《武昌纪事》云："桂林城根多坚石。贼攻文昌门时，掘之累旬不能入，随即去。"见《太平天国》（四）。

皆天父默中使成，非人所易知耳。

气可鼓而不可泄。用所谓神的指使掩盖人谋不成，把起义进军中的这一段历史对群众做如此交代，实乃自我解嘲。

自桂入湘，大火燎原

太平军由桂林北上时，先以偏师西出庙头圩，至附近的黄塘即止，意在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安全撤离。太平军主力则从象鼻山后的斗鸡潭渡江，经卫家渡、欧家村、潮田圩至灵川县海洋坪，人兴安县高尚圩，疾趋县城东郊。西路军亦从黄塘回师，渡漓江，越乌岭，经灵田圩北上，行90里至高尚圩，配合主力攻击兴安城。清兴安知县商昌虽于半年前即大力募集团勇，并将湘桂道上的严关口重加修整，准备顽抗。忽报太平军已绕出严关之后，直逼县城。他仓皇弃城逃走。22日，太平军人城，焚毁衙署、庙宇，并在城乡“除暴安良”[①]。第二天，分水陆两路北上。25日，直逼全州城外。太平军封锁飞鸾桥，火焚湘山寺。[②] 从南北两方夹击州城。时赛尚阿尚龟缩在阳朔碧莲峰下；向荣则在桂林称病不出；邹鸣鹤余悸犹在，依旧紧闭城门，“拥兵自卫”。他们互相推诿，不敢跟追。只派刘长清、余万清率兵勇7000人向全州进扑，另以张国梁带团勇1000名从阳朔、平乐、恭城、灌阳出援全州。[③] 但是，张国梁的队伍整整走了一个月，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刘长清与余万清带队进抵全州后，在城西北的太平铺、鲁班桥扎营，再也不敢朝前推进一步。[④] 清全州知州曹燮培与楚军都司武昌显拼凑兵勇千余人，与躲进城里的少数地主团绅据城困守。

---

① 参看《平桂纪略》卷一；广西师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组编《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古严关”城门碑，“咸丰二年商昌重修”。

② 同治十□年立湘山寺《妙明塔碑记》。

③ 张国梁即1849年冬叛变投敌之天地会头目张嘉祥。1852年5月调至桂林与太平军作战。时为清军守备。

④ 参看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佚名：《独秀峰题壁诗》。

有记载说，太平军进抵全州后，原拟利用全州水陆交通的有利条件，征集船只，迅速向湖南进军，并无攻城意图。但正当太平军在城外行进时，城里的清军突然发炮挑衅，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① 洪秀全闻报，大为震怒，立即命令前军回师攻城。清军及练勇据城拼死顽抗，以桐油煮粥往城外泼洒，并“煎松胶沥糠上结为饼，燃之从城上掷下”②。太平军身冒热汤烈火，奋勇攻城历十夜。继则派人从西门外江西会馆挖掘地道，直穿城下，用棺材装火药十六石，于6月3日轰塌城墙二丈余。太平军乘虚而人，杀前全州知州瑞麟，知州曹燮培，参将杨映河，都司武昌显等官绅及兵勇共约千人左右。此即所谓“全州屠城”。

应该指出，太平军攻破全州，对城里的官绅兵勇的杀戮是比较彻底的。但是，到底杀了多少？被杀者为何许人？则所说很不相同。《粤氛纪事》说：太平军破全州，“积愤屠其城，老稚妇女歼焉。积尸一千三百余具”。而有的论者则说：太平军破全州，“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同时纵火焚烧，店户被毁者无数。大杀三日，始行封刀”。兵民被杀当在万人以上。③考曹燮培致刘长清、余万清的求援“血书”，明白写有当时全州“城中所存者只千余人”的话。④ 又何来的屠杀万人以上？而曹燮培所说的：“城中存者只千余人”，主要是指据城顽抗的丁壮以及少数地主官绅。一般平民百姓，早已远离州城，避居民间去了。事后丛葬死者的两座遗冢，习称“千人坟”，亦可

① 冯云山之死，素有两说。《贼情汇纂》卷一《首逆事实·冯云山》；《平桂纪略》卷一皆说死于围攻全州之役。《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则云死于攻破全州以后。左宗棠撰：《江忠烈公行状》、王定安《湘军记》则说冯云山在蓑衣渡中炮死。民间传说冯云山在全州中炮受伤，至蓑衣渡时仍带伤指挥战斗，后因伤重死于蓑衣渡。

② 《江忠烈公遗集》。

③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驰驱八桂》四，《全州之悲剧》。香港猛进书屋，1962。

④ 唐载生：《全县志》第九编，《前事》。

证明被杀者主要是千余官绅与兵勇，百姓的死难是不多的。①

太平军进攻全州时，曾到处“掳马掠船”，共得船200余号，尽载妇孺辎重，于6月5日黎明，由湘江顺流北去，陆师夹江护卫。② 行约14里，至水深流急的蓑衣渡，船队飞驶向前，陆师赶行不及。北去约4里，至水塘湾，湘江在此急湾东去。江底淤沙、水草极多，船队密集缓行。而湖南新宁举人江忠源早已率楚勇千人，在此拦桩设伏。太平军船队既为拦桩所阻，进退两难。楚勇则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人员辎重颇有损失。太平军遂并船为桥，向江东登岸，然后“将船只自行焚烧，遗弃辎重、米粮、器械”等物，与敌人隔江用火炮对击，相持一昼夜。③ 南王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死于军中！他自从追随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密图革命以来，“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别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坚耐到底”④。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壮烈殉国时，年仅37岁。开国元勋的牺牲，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全州水塘湾的重大挫折，使太平军从水路北出衡湘的计划无法实行，于是，改走陆路折向湘南。7日微明，太平军从蓑衣渡分批进入山区，经扁担坳行120里，于8日抵达永州府（今零陵县）城外30里之水西桥，12日，不战而克道州，声威复振。“楚边群匪斩木揭竿起而应者，东安、宁远所在皆然。虽或即时扑灭，而千百为群去而归贼，实已不一而足”⑤。太平军在湖南农民、矿工的大力声援下，连克江华、永明、嘉禾、桂阳、郴州等地。所到之处，毁衙署、庙宇，斗杀地主豪绅，焚烧粮册、债据，深受群众欢迎。两

① 据1973年全州实地调查观察。至今民间仍然流传有关当年历史的几句顺口溜，说是：“走进大山的看世界，走进岩洞的腌荞菜，走进城里的死得快。”

② 《清文宗实录》卷六一，成丰二年五月初二日谕。

③ 《清文宗实录》卷六一，咸丰二年五月初六日谕。

④ 《天情道理书》。

⑤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

个多月间，太平军在湖南又招得新兄弟五六万人，重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于是，挥师攻长沙，占武汉，进军江南，攻克金陵。起义于广西桂平，奠基于永安州的太平天国革命，仅以两年多的时间，便发展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农民革命运动了！

第五章　天地会反清起义再涌高潮

19世纪40年代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对拜上帝会的顺利发展起了掩护与声援作用。而拜上帝会在广西的起义与进军，又使经历多年斗争的天地会势力迅速得以恢复。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出桂作战以后，广西又有所谓“堂匪如林，聚散靡定”①；“堂匪、股匪、艇匪”到处起义，“水陆要津，皆为贼踞”的报道。② 有的会党分子，或吸取拜上帝会的某些口号主张，或借用拜上帝会的名号仪式，作为动员群众，激励战斗的号召，其中还有几支队伍打破天地会的老规矩，据地立国称王。在1859年（咸丰九年）石达开回师广西时，有的会党武装还直接或间接与太平军配合作战。从1853年起，他们又掀起了历时17年的反清斗争高潮。

① 《清文宗实录》卷三五，咸丰元年六月十五日谕。

② 朱用孚：《摩盾余谈》卷二，《粤省甲寅佛山陈开之乱》。

一、“山堂英雄”再接再厉

广西会党和“米饭主”

1852年太平军打出广西，浩浩荡荡向两湖推进的时候，经过三年休整的天地会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各路山堂英雄豪杰再接再厉，掀起了新的反清高潮。

这时候，天地会在广西的斗争，无论是活动的范围，或是斗争的深度，都远比40年代有所发展。“山堂林立”，遍及广西全省；烽火连天，燃遍广西和湘桂、粤桂、黔桂以及中越边区。据有人报称：1853年以后，广西有所谓“土匪、外匪千余股，互相联络”。① 封建统治者虽然把这些反清武装分作“股匪”、“堂匪”，但绝大多数都是天地会党，或者和天地会在组织上有联系，在行动上有配合。②

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广西各府、州、县的天地会中，这时出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米饭主”。他们各据一方，开堂设馆，明招暗结各路堂、股人马，幕后策划、指挥、供应，向地主富户开单攻取，而与群众分享斗争所得。据《堂匪总录·叙》说：“米饭主”最早“起于南（宁）、太（平）、泗（城）、

---

①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三。

② 据《堂匪总录》说：“股匪”即“流贼土贼”；“堂匪”即地地道道的天地会党。两者的区别在于：“堂匪不蓄发，易趋避也。间有流贼土贼亦取堂名者，易裹胁也。”这是从形式看问题。其实，“流贼土贼”亦有不蓄发的。在《堂匪总录》中，就把韦世尧、凌二妹等著名“堂匪米饭主”错认为“股匪”。而在《股匪总录》中，也把“堂匪米饭主”杨西安误认为“股匪”。

镇（安），咸丰四、五年后，浔（州）、梧（州）、郁（州）、平（乐）皆效之”。其实，最早出现的“米饭主”，当推贵县怀三里的韦三相。他早在“道光二十三四年”即“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① 继之是新宁州的吴凌云，河池州的韦世尧、韦世贵与武宣县的刘观先等，而后有活跃在桂东南的凌二妹，桂平县的张贵和，柳城县的黄昭观，东兰州的覃奉璋、覃奉琳，上思州的谭化鲤、梁明青，平乐县的杨西安等。这些人，实际都是自据一方的山堂首领，同是天地会党，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② 但是，在已见经传的十几个“米饭主”中，都出身于大户大姓，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乡团首领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一定权势，在军事上掌握一支地方武装。而这些人交游比较广阔，因而也比较复杂和富有。③ 由于他们多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所以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与影响也较大。实乃封建统治走向崩溃的又一标志。

刘长佑在论道、咸年间的广西会党与团练的关系时说：“广西贼匪之难平，多由于团练之不睦。始则土团与客团争，客团复与土团争。其胜者未必即能打贼，而不胜者已被胁而为贼矣！继则土团与土团争，客团复与客团争。其不胜者或不尽为贼，而胜者且不异于贼矣！……是彼此相寻于淫掳焚杀之中，盗贼何由驱除，地方何由安静？……有团真不如无团矣！”④《堂匪总录·叙》论当时广西团练则曰：“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兵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甚于贼者。”团与“匪”互相勾结转化，这是19世纪50年代广西会党起事异于40年代的明显特点，也是封建统治走向崩溃的又一信号。

---

① 梁吉祥：《贵县志》卷六，《纪事·寇略》。

②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三、卷八。

③ 关于“米饭主”的出现、存在、实质及其历史作用诸问题，请参拙文《“米饭主”散论》，见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一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④《刘武慎公遗书·札谕》卷二八，《谕柳州团练》。

50年代遍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山堂，有人曾经根据清方的《堂匪总录》、《股匪总录》和《平桂纪略》诸书提供的资料作了排比、统计，较大的山堂名号，当时即达120个左右。从它的发展趋势看，1850年以前为3个，1850年发展至19个，1851年为15个，1852年为9个，1853年为17个，1854年猛增至44个，1855年为10个，其余则出现在1855年以后。① 由于山堂组织多数处于秘密状态，斗争情况十分复杂。所以，这种统计自然无法完善。但是，它提供当时广西天地会发展的轮廓，为考察和分析问题提供了依据。

1852年以前的两三年，虽然出现了30多个山堂，但都还处于重新组织和积聚力量阶段，攻城掠地的行动，记载尚少。纵有动作，也是陡起陡落，影响不大。1852年以后，山堂组织直线发展，1854年到了最高峰。这也是天地会起义再涌高潮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山堂组织锐减。论者认为，此乃“人民因生活问题，反抗情绪，不如初期热烈”的结果。②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穷则思变。这是古往今来农民造反的规律。

为什么1855年以后新立的山堂少了？

原因之一是，从那时以后，广西各地会党起义的发展，已经形成几个斗争中心，这就是升平、大成、延陵等几个天地会政权。这些政权，把附近的许多山堂联系在一起，共同战斗；有不少首领，已经分别受封为王、公、侯、元帅、将军等名目。天地会原有的所谓“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局面，已经多少有了改变。尽管这种联系、受封和统属关系，还是十分松懈的，但到底异于往昔，成了当时广西天地会起义的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决定了独立开堂设馆并非十分必要了。

如果把当时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形势通盘考察一下，那么，三个相对独立的活动地区和斗争中心是比较明显的。

① 参看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第四章，《堂会名号表》及《对于堂会的分析》两节。北京，三联书店，1950。

② 《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

桂东北地区的会党

一个是以灌阳为中心的桂北与湘西南地区。这个地区，跨越湘桂两省，东起湖南的江华、永明、道州、宁远、祁阳等州县，西至广西桂林府属的临桂、阳朔、灵川和平乐府属的荔浦、修仁等州县，南至平乐府属的贺县、昭平和永安等地，北及桂林的兴安、龙胜、全州以及湖南的东安等县。纵横数百里，范围相当宽广。

活动于这个地区的堂号队伍，从1850年起，主要有朱洪英的公义堂，李良的洪兴堂，杨西安的连义堂，许英的安义堂，以及黄桂林的洪顺堂等30个左右。朱洪英后来与胡有禄合作，在灌阳创立升平天国，具体情况，下面当作专节介绍。李良，平乐沙子街人。自称兵马大元帅。平乐、恭城、阳朔一带会党推为盟长，拥众数千人，分立五营36馆。不久，李良在平乐丛木山被地主团练杀害，余众由杨西安接统。杨西安，也是平乐沙子街人。1854年冬，与安义堂许英，公义堂朱盛洪（即朱洪英）并顺义、广义、洪顺、从义各堂，以及"广匪"刘赞成、刘贵秀，武生佘觐文，廪生常振乾等联合，同创连义堂。以沙子街为根据地，拥众万余，皆扎红巾。1856年（咸丰六年）春，攻占富川县城，向灌阳及恭城北乡一带发展。1857年5月30日（咸丰七年五月初八日），攻破平乐县城，杀代理知县华元超等官绅数人，活捉平乐知府招敬常。同年冬，清军蒋益澧部围攻平乐，杨西安畏葸动摇，结果被敌人捕杀。[①]黄桂林，永安州莫村人。1854年夏（咸丰四年五月）在永安、昭平一带活动，后与何东莞晚、陈东江等人入永安水窦，并与从江南回桂的太平军罗德全部联络，自称统领兵马大元帅。1856年夏（咸丰六年三月），黄桂林被永安知州罗福杲擒杀。[②]

---

① 参看《股匪总录》卷二;《平桂纪略》卷一;《广西昭忠录》卷三。《股匪总录》说:李良"咸丰五年五月倡立洪兴堂,称兵马大元帅"。实误。李良创洪兴堂时间在咸丰元年。又许英为首的安义堂,一说名广义堂,有众万人。

②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六。

在桂东北地区活动的，还有几支没有堂名的所谓“游匪”或“股匪”队伍。如湖南祁阳的邓正高，初附于全州“第一山王益元”。1853年，王益元被杀，邓正高转与全州武举蒋正三，灌阳武生王世甲以及平乐罗福生，兴安唐包子，恭城白登先等互相联合。1854年秋，会集于恭城牛尾洞。9月25日(八月初三)，朱洪英、陈永秀等合军占恭城县城，邓正高率部与之协作，入全州，破兴安，逼灌阳。此后即与朱洪英、胡有禄联合，出入于湘桂边区各州县。陈永秀，绰号满庭科，全州建乡人，与弟陈永利聚众在灌阳、恭城等地活动。1855年10月，与纵横楚粤两省，党至数千，号称“游匪渠魁”的平乐人赵雄联合。不久，克兴安县城，而赵雄为奸细杀害于城内文昌阁，其众悉归陈永秀统率。又有全州人黄金亮，原清军平乐协千总，署麦岭营都司。1856年2月反正，归附朱洪英、陈永秀。此外，永福人陈志广，寄居永福的湖南人邓兴爵等，也是拥众数千，出入于永福、义宁、阳朔、荔浦等地的义军首领。所有这些队伍，在朱洪英、胡有禄创立升平天国以后，都直接或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①

在荔浦、修仁、平乐以及阳朔一带，还有以张高友为首的一支队伍。张高友，福建漳州人。客居荔浦，充勇目。1854年夏（咸丰四年四月)，象州黄金豹、修仁胡元隆率众攻荔浦，高友与之暗通，以“索饷”为名反正，公开号召：凡“愿入党者，给凭单赴县仓任取米谷”。于是，“饥民蜂起应之，旬日间，府城各邻邑皆变”。② 未几，率众攻平乐，杀团练头目、廪生潘元熙，直逼平乐府城。同年冬，联络陈志广、黄桂林、胡元隆、黄金豹等攻桂林，军至六塘，为清军及团练所败，复归荔浦，出入于永安、修仁等地，明令乡民缴纳赋税，并行蓄发，“方许照常耕种”③。1856年夏以后，多次率众出入柳州府属之鹿寨、雒容各地，配合陈开、李文茂的大成军作战。后以荔浦、

① 参看《股匪总录》卷二。

② 顾英明、曹骏等：《荔浦县志》卷三，《兵事》。

③ 邓文渊等：《永安州志》卷四，《兵事》。

修仁、永安界邻之莲塘为基地，“开圩市，营运贩贸”①。纵横于三州县之间，“攻破寨堡数百”，先后破城五座，地方多成丘墟。1862年12月8日（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清军攻莲塘，高友中炮死，队伍败散。② 由上述可知，以灌阳为中心，活跃于桂东北、湘西南各州县的反清武装，多是湘桂两省的天地会党。除胡有禄、朱洪英建国称王外，其余多称统领兵马大元帅一类名目，反映了他们还较多地保留着天地会的老传统。他们拥有的基本群众以汉人为主，亦有不少瑶民参加。绝大多数是破产农民，游民无产者所占的比例不大。

桂中、桂南地区的会党

另一个是以浔州为中心的桂中、桂东南和黔桂边区。这个地区，包括浔江、黔江两大流域的浔州、梧州、柳州和庆远四府以及郁林州的所有州县，南宁、思恩两府及贵州黎平府的部分州县，也有关联。由于地处广西中部繁盛之区，范围最广，故影响亦最大。

从1850年起，活跃在这个地区的天地会山堂有横州、永淳的屈承俭、李彩强为首的永义堂；由何明科领导转战在北流、容县等地的同义堂；以乔老苗为首，驰骋于柳城、融县以及黔桂边区的洪胜堂等共40余部。屈承俭，原籍永淳县，客居东兰州。初与兴隆土司的李彩强合作，继与黄二、黄三、黄四等同踞东兰州之凤凰关，聚众数千人，设馆25处，取永义堂为总名，出人于安定、兴隆土司地方。1853年春，转战宾州、迁江一带。同年夏，屈承俭在宾州败死。③ 何明科，广东信宜县人。1850年冬起事，与北流县梁二十大等联合行动。第二年冬，败于贵县，为团练杀害。④ 乔老苗，初与萧亚杞合组洪胜堂，后与韩凤的复胜堂合并。不久，韩凤叛变投敌，乔老苗、萧亚杞

① 顾英明等：《荔浦县志》卷三，《兵事》。

② 《股匪总录》卷二。

③ 《股匪总录》卷三；《平桂纪略》卷一。

④ 《股匪总录》卷三；又参见朱用孚：《摩盾余谈》卷二，《信宜凌十八之乱》。

进驻柳城上雷圩。同年冬，乔老苗、萧亚杞与太平圩颜大，永福县黄阿标、骆四、张英、吴长腰四、何阿乌等联合，十日之间，众逾万人，声势极大。于是由和睦圩攻永福城，不克，遂游动于柳州府北部各州县，所到之处，深受汉苗各族人民的欢迎。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山堂虽多，但规模较小，坚持时间短暂，而且多数在柳州府以北地区。仅据《堂匪总录》记载统计：梧州、浔州、柳州、庆远四府共有山堂40个，而柳、庆即占30个。沿浔江与黔江流域南部活动的，则是许多所谓"著名大股"。其首领不少来自广东，多在沿江活动，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也深，封建统治者多有指其为"艇匪"、"发匪"、"东匪"的。著名者除大成国首领陈开、李文茂外，还有梁亚长、关福、任文炳、梁培友、罗华观、范亚音、陈金刚、陈显良、何晚、黄鼎凤等。

梁亚长（又名西南长）、关福和任文炳，皆所谓"波山艇匪"头目。早在1850年秋，任文炳即率艇军2000余人入广西，攻平南。1852年3月25日（咸丰二年二月初五日），梁亚长、关福、任文炳率众攻梧州，"船艇横列中流，环置巨炮"，攻夺"溶潭虎勇炮船，人浔州劫狱囚"，没收官府与富户钱库，然后回屯戎圩，拥有船艇500余，部众逾万。罗亚丙率6000余人至戎圩"合股"。旋与梁培友部会于梧州三角咀，群推培友为北路总管，于是，自梧州至浔州，400里水程，沿江州县村圩，全为艇军所控制。②

梁培友，广东鹤山人。1852年以前，与区润、冯钊、吴坤等驾扒船大利号，在浔梧道中"包送客货"。同年夏，培友在梧州受推为水路总管以后，广东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各路义军多来会合，愿归培友节制。"于是，结三合会，称洪兵"。1854年，培友率众攻破广东肇庆府城，称平越侯。第二年5月，响应陈开、李文茂起义，与大成军联军入广西。从此，与陈开、

① 参看《平桂纪略》卷一。《堂匪总录》卷二说"咸丰三年十月"攻占融县城，误。

② 《股匪总录》卷三。

李文茂同为大成国的重要领导者。①

罗华观，苍梧下郢人。封建统治者说他“最狡悍，人亦最多。不轻出掠，而分掠者之所得，数必取盈。设馆以食群匪，无赖悉归之，驱使惟命者，纵横数百里，久不能平”。实际是苍梧地方的大米饭主。在行动上，则是个摇摆不定、见风使舵的人物。1854年夏，梁培友屯兵戎圩，威震浔梧，罗华观始公开露面活动，与梁培友相呼应，并助攻藤县。1857年，梁培友在平南死难以后，罗华观一面接受苍梧知县彭昌集的招抚，一面又与陈开秘密联系，“一脚踏两船”。同年6月，陈开率军围攻梧州，罗华观踞下郢，“依违以观成败”。彭昌集与知州倪涛请华观为梧州清兵输粮饷。华观杀倪涛，擒彭昌集。9月，陈开大成军克梧州，以罗华观守之。1858年5月，清军陷梧州，尽杀罗华观家属。华观去下郢得免。1860年冬，清军陷戎圩，华观易名罗禄，入浔州与陈开联合。因为动摇多变，难以取信于众，遂不复振。②

范亚音，广西容县人。出身贫苦农家。道光末年参加天地会，常在城乡向富户“打单”勒赎。1854年，容县自良圩天地会首领卢十二攻占县城，活捉知县王政。第二年春，亚音以白银500两赎回王政，“借以钳制四乡绅士”。亚音进驻县城，“遂称总头目，立洪胜堂，发仓谷供粮”。并以屡试不第的冯骥为军师，尊举人杨朝枢，③平南革生袁镜为幕客。甘木、揭三、封超英等皆从之，亦“各筑馆舍，竖红旗，招文士为幕客”。在容县与地主团练展开频繁的斗争，破毁地主团练寨堡40余处。1855年9月，陈开、李文茂从广东率军入广西，在桂平建立大成国。为了巩固浔江南岸广大地区，1857年春，陈开主动遣使封范亚音为荣国公，从此与大成国配合作战。④

---

① 《股匪总录》卷三。

② 《股匪总录》卷三。

③ 杨朝枢，容县人。道光二年中举，二十八年为横州训导。时年已70余岁。

④ 封祝唐、黄玉年：《容县志》卷二七，《旧闻志·前事下》；又参《股匪总录》卷三。

陈金刚，或书作陈金缸、陈锦光。广东开建人。1854年，广东天地会到处起事，陈金刚与陈四虎等亦于三水、清远一带活动，自成一支。第二年，与广州城北的周春、甘先等率众北移，与韶州府属的20多支会党武装联合，众号数十万，围攻韶州，不克。7月入湖南，克郴州、桂阳州并茶陵等十余州县，进军耒阳，声言欲与太平军结合。不久，因陈金刚与何六意见相左，加以湘军王鑫部的压迫，遂率部由桂阳州西进，占广宁、江华等地，与朱洪英呼应。同年冬，再率部南下，转战于粤北连山、阳山、英德、清远各地。1857年9月，陈金刚占怀集，称南兴王。随即率众克贺县、广宁、开建、封川、德庆各州县，四会、清远、高要等地为之震动。为了配合陈开回攻梧州，陈金刚出师肇庆以作呼应。1859年，石达开回师广西，陈金刚奉其称号，是以敌人诬其为"开建发匪"。1860年，陈金刚始以怀集、贺县为基地，联结粤桂边区十余州县，用南兴王名义发号施令，与浔州大成国政权互相呼应。是时"上富川，下广宁，千里皆贼垒矣！"① 1861年秋，陈金刚因外受清军之压迫，内受同党之攻击，怀集、贺县基地尽失。于是，率部向苍梧、藤县、岑溪、容县等地转移。1861年初占信宜，复于两广边区十数州县"盘踞千余里，纵横跳荡"②。时大成国已经败亡，原受陈开封为荣国公的范亚音，以及活跃在该地区的多支会党队伍，多接受金刚封号，有公、侯、元帅、将军、军师、都督、司马或知府、知县等名目。彼此或"互相声援"，或"通款相勾结"。③并在各地向地主征收土地税，名曰交"洪租"。征收率为产量的十分之四。④但是，由于在南兴王政权内窃踞高位的郑金、刘超等的叛变投敌，杀害了陈金刚。1863年8月，南兴王政权彻底瓦解。⑤

---

① 周赞元、植自森：《怀集县志》卷八，《县事志》。

② 陈兰彬：《高州府志》卷五〇，《纪事三》。

③ 梁安甸等：《信宜县志》卷八，《兵事》。

④ 封祝唐等：《容县志》卷二七，《前事下》；《信宜县志》卷八，《兵事》；以及1960年修之《岑溪县志》（初稿）。

⑤ 《股匪总录》卷三。

陈显良，绰号豆皮大，是所谓“岑溪枭匪之一”。史载：他“初附长发东匪，洪逆余党也。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土匪之著名者如冯六、戴九、覃亚率、张华光等皆下之”。[①] 实则，1854年夏，广东各会党合攻广州府城时，陈显良即在广州城东活动，与城北的李文茂、周春、甘先，珠江北面的关钜，三水、清远的陈金刚等配合作战。1857年春，陈显良聚众2000余人从苍梧、藤县而入岑溪之思劳坡，与县城隔江对峙。张华光亦于西宁集众至岑溪之永业乡，与陈显良相呼应。清岑溪知县宋炳璜一面“榜示各圩，凡数千言”，幻想以劝说瓦解群众；一面以岑溪大旱，借“发仓谷以赈饥人”为名，暗募壮丁。随即督勇练“一鼓渡河，趋进思劳坡”。陈显良以偏师出敌后，大败勇练，杀宋炳璜等多人。不久，显良即率所部加入艇军，转战于西江两粤间。[②]

何晚，又称何满，广东东莞人，人称东莞晚。1852年充东勇，随营至广西柳州、庆远等地。1853年冬，与柳州张英率众起事，屯于洛垢。不久，张英率众赴柳城，何晚合何亚乌等经修仁、荔浦东出，攻占富川。适有谢亚三、莫祥泰率数千人由恭城来会。何晚回修仁，纵横于象州、武宣、桂平、平南、藤县与永安之间。1855年夏，随李文茂攻浔州，转攻武宣，竟率水勇600人投敌，更名松亭，盘踞北河，为虎作伥。部将何维、杜洪起而反对。1856年3月30日（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何维、杜洪等在梁培友支持下，“群起鼓噪，称松亭复蚀饷项，攒杀之”。同时被杀的尚有清右江道黄辅相，武宣知县茅本蕙等多人。[③]

黄鼎凤，广西贵县覃塘青云村壮人。小名特旁，又名黄三。七岁为人放牧做工，生活非常艰苦。及长，曾入张嘉祥部为伙夫，随军至湖北。1852年，鼎凤24岁。从湖北回广西，在覃塘与周十二共建“英雄馆”（壮丁馆），独踞一方。1854年9月与黄全义、汤聘三、冯二等合攻贵县城。知县李嘉年弃城逃走，鼎凤、冯二等率军入城，声威大震。旋联军攻浔州，不克，回守贵县。

① 《股匪总录》卷三。
② 《股匪总录》卷三。
③ 《股匪总录》卷三。

1855年6月，李嘉年纠集兵练攻陷县城。9月，陈开、李文茂率众入浔州，占府城，分军至贵县罗泊湾，与黄鼎凤、黄全义互为声援。10月，鼎凤等再占县城。陈开封黄全义为威国公，以黄鼎凤为将军，回守覃塘。从此，受命于大成国，征战各地。①

从上述可以看到，以浔州为中心的桂中、黔南地区，起义队伍又可分作南北两部。浔州以北的柳州、庆远等处，多有山堂会党，队伍构成多汉、壮、苗各族人民。南部的梧州、浔州、郁林以及西江沿河两岸，多有广东西上的所谓"东匪"、"游匪"、"发匪"和"艇匪"。这些队伍，以汉族人民为主体、内多游民无产者。他们虽然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不少人在斗争中发生动摇、变节与叛变，给反清运动带来巨大的损失。

桂西地区的会党

第三个活动地区在桂西，主要据点有新宁州与上林县两地。它涉及思恩、南宁、太平、镇安、泗城五府的四十多个州县和土州、土县；庆远府西边的几个土州、土县也属于这个范围。整个区域辽阔，地形复杂，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壮族人民。

仅据《堂匪总录》记载，当时在上述五府出现过的山堂名号，就有101个，另有所谓"土匪"、"外匪"123支。其中镇安府有山堂名号39个，居第一；南宁府34个，居第二。思恩府的"土匪"、"外匪"48支，最多；泗城府24支，居第二。② 活动于桂西广大地区的这些队伍，与桂东、桂中地区相比，一般说来，人数较少，规模较小，而且发动较晚，彼此缺乏联系，多是各自为战，时分时合，旋起旋灭。但是由于基本群众是当地贫苦的劳动人民，甚少游民无产者，因此，破坏性较小，动摇、变节与投降的事也较少发生。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

① 《股匪总录》卷三。

② 这里统计的山堂名号，凡《堂匪总录》或有关方志有记载，不论其后来是否合并了的，皆列人。

在这些反清队伍中，坚持最久、影响最大的，当推新宁州的吴凌云，上林县的李锦贵，宾州的宋扶杆和永淳县的李文彩等几支。吴凌云创立了延陵国政权，后面当作专节加以介绍。

李锦贵，上林东关人。本为地方团首。1855年夏，与覃国香联络，倾向反清。知县杨培堃为此撤去团局，独揽一切。李锦贵遂设局于家，与黄元锣（黄三）、李绍理等创立大勇堂。1856年夏，自称大元帅，建三军司命旗帜，支应各路义军，公开反抗官府，成为远近知名的大米饭主。1857年春起，先后与“宾州逆绅”谢秉彝、贵县义军首领黄鼎凤联络，攻城略地。8月15日（六月二十六日），占领宾州城，杀知州翟景禧。① 随与谢秉彝联军攻上林，围城数十日。9月25日（八月初八日）破城而入，杀知县杨培堃。改上林县为澄江县，自称明义将军大司马，以黄元锣、李绍理为左、右指挥，浙江人鲁铨、武缘人张立忠为军师。谢秉彝分兵守宾州。所部皆蓄发易服，用太平天国年号，遍张告示，出令安民。黄元锣等各于本团分立营伍，“制如官署”。并且出队严惩贪官劣绅，杀清同知衔周秉钺、监生周启修等数十人，民心大快，起而从之者数千人。1858年春，上林举人韦庆祚强迫各乡附义者薙发，反被群众所杀。同年夏，清军陷宾州，谢秉彝死难。其弟秉坤与杨社福等率义军反攻，杀署理知州任秉钰，守备韦廷忠、韦启贤等多人，宾州光复。1859年夏初，破宾州思村，活捉代理知州何兆葵，为谢秉彝报了大仇。同年秋间，石达开部将赖裕新、石镇吉先后率军由贵县、桂林至宾州，入上林。李锦贵亲出迎接。1860年2月，石镇吉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黄元锣、李绍理等亦受封号。从此，锦贵部尽归太平军节制。②

宋扶杆，宾州黎村人。1857年，黄鼎凤在李锦贵、谢秉彝配合下，自贵县攻宾州，扶杆起众接应，为后队先锋，同破宾州城。于是，以黎村为据点，调部将谢必飚、陆炳南等于平山、甘棍等处屯驻。时思恩府属各地反清斗争

---

① 据《股匪总录》卷一；朱昌奎：《宾阳县志》第六编，《前事》。

② 《股匪总录》卷一。

蜂起，迁江张其旋、覃锡恩，上林周定邦、李有联，武缘韦纯新、林汉宗等，分别向宣化、隆安发展，纵横数百里。宋扶杆与之联系、应援，直至1865年初始为敌人所败。①

李文彩，本名李七。广西永淳县狮子村人。以理发为业。② 1851年11月7日（咸丰元年九月十五日），永淳十三屯壮民为“豁免官租民租”，争取“自耕自纳”，在杨隆盛、黄可经、陆锦钦等领导下，结盟拜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租斗争。知县韩起凤以众怒难犯，佯称代报求免，旋即逮捕杨隆盛、黄可经等为首者九人，拟加严办。抗租群众闻讯，立即汇集数千人，蜂拥攻城，且乘势杀掠各乡业主。永淳城乡，顷刻间“刀枪耀日，炮火连天”。南宁知府黄辅相被迫释放为首者。而城东十余客村因被抗租壮民攻杀，亦联村与之对抗。壮民屡战屡败。③ 1852年，李文彩已与横州平山村宁晚暗通，招各佃户入伙，攻掠富户，并拦截大江往来客船，从水陆再攻横州，相持20余日，又不利。第二年4月，攻广东灵山。被廉州知府沈棣辉、参将廖达章率数千兵练击败。④ 1856年3月，李文彩因平朗圩老营失守，被迫率众东走浔州，受陈开封为定国公。协助定北王梁昌指挥西征军事。

以上所述，就是1852年太平军出桂作战以后，广西天地会反清斗争再涌高潮的基本形势。它以广西为基地，由广西、湖南、广东等省反清力量互相配合，组成100多个天地会山堂，1000支反清斗争队伍，大致形成三个斗争

---

① 《股匪总录》卷一。

② 王辑熙等：《横县志》第五编《前事》。但《永邑十三屯壮为逆暨李七作乱纪略》（见《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下册）说李文彩“系新铺头目”，咸丰二年正月经南宁知府黄辅相招安，充勇目。

③ 据《永邑十三屯壮为逆暨李七作乱纪略》。黄天锡、陈尔训等：《永淳县志》卷八《杂记》说当时知县为韩凤栖。

④ 王辑熙等：《横县志》第五编《前事》说：咸丰“五年三月，贼李七率党攻陷灵山城”。而刘运熙纂：《灵山县志》卷八《经政志·治乱考》，以及陈尔训等纂：《永淳县志》卷八《杂记》，皆说李文彩攻至灵山上东练，踞烟墩圩，旋即败走。

中心，由桂东、桂中逐步向桂西发展，战斗历时17年，其斗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所发展。其中还出现了升平、大成和延陵国三个天地会政权。

二、从“反清复明”到“立国称王”

“反清复明”是天地会斗争的宗旨之一。在起义队伍中非朱姓称王者极少，独自立国建政者实属罕见。但是，这种传统，到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却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许多天地会的首领不但在起义时以称王指挥所属，而且有的还立国建政以号令四方。1854年10月胡有禄、朱洪英在灌阳建立的升平天国，第二年9月陈开、李文茂在桂平建立的大成国，1860年9月吴凌云在新宁州建立的延陵国，就是这时出现的三个天地会政权。此外还有陈金刚自称南兴王等等。这种变化，显然是受太平天国影响的结果。它说明，时代的发展，斗争的要求，已经远非空洞的“反清复明”口号所能适应的了。① 因此，有必要逐个加以介绍。

胡有禄、朱洪英与升平天国

胡有禄、朱洪英领导的起义，主要力量是广西、湖南两省的天地会党。活动范围以桂东北的灌阳为中心，扩及湘桂边区的十几个州县，影响极大。

胡有禄，广西武宣县人。② 是当地有名的天地会首领。早在1846年，胡

---

① 参见拙文《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思想制度上的关系》，见《广西日报》1961年5月3日；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

② 《骆文忠公奏议》卷四《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逆首折》。亦有说：胡有禄是广西阳朔人的。

有禄即由广西入湖南宁远县，策划反清起义。时宁远会党纷起，贫民入会者极多。每次“放马”（拜台入会仪式），与会者“顷刻云集”。9月15日（七月二十五日），胡有禄集会众数千于宁远北乡之柏家坪，谋攻县城，人数虽多而炮火不足，主动撤去。兵勇以“搜会党”为名，杀害无辜百姓90余人以泄愤。① 攻城虽告失败，但影响极大。继之而起的有左广秀、李魔旺、蒋学泰、何其先等聚众攻灌阳，“杀伤差役”及官绅多人。② 1847年，胡有禄自湘回桂，与其兄有福相会，暗结在荔浦活动的罗大纲、李亚佑等攻打阳朔县城。胡有福战死，胡有禄、罗大纲等分别散去。从此潜伏不出，秘密往来于湘桂之间，积聚力量以图再起。③ 1853年，胡有禄与朱洪英联合，在湘桂边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朱洪英，④ 湖南东安县渌埠头人。⑤ 木匠出身，曾在湘桂边区各地做木匠谋生。后入天地会，与胡有禄结合，在桂东北、湘西南地区活动，“以绛巾包头，称红巾”⑥。

1853年6月15日（五月初九日），胡有禄、朱洪英率众自恭城龙虎关入湖南，攻永明城。“县城及村乡民房填扎皆满，尚若有难容之势。……团勇莫敢撄其锋。”⑦ 8月28日（七月二十四日），弃永明，上嘉禾、蓝山、临武，

---

① 欧阳泽闿纂：《宁远县志》卷六，《武备·纪事》。

② 《清宣宗实录》卷四五〇，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谕。

③ 《骆文忠公奏议》卷四《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逆首折》云：1852年秋，朱洪英与胡有禄合作，在广西南宁聚众数千，发动起义，应者三四万人。但广西有关志书并无只字记载。我疑南宁乃宁远或新宁之误。如果确有南宁起义，集众盈千累万，何以转战千里，而有关州县竟无半点记录？胡、朱乃桂北、湘南人。从地理、人事分析，欲在桂南聚众万人起义，亦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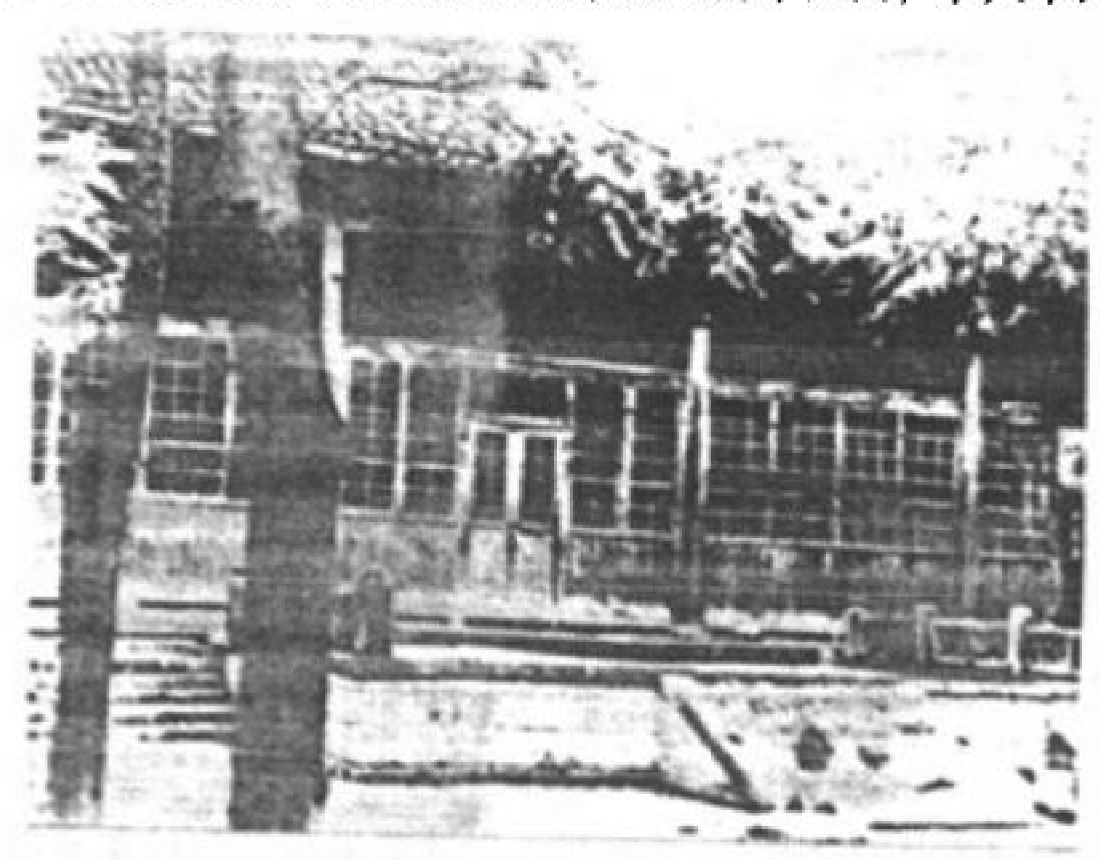
④ 亦有书作朱逢英、朱胜洪、朱盛洪或朱世雄的，或云朱洪英本姓邱。

⑤ 亦有说朱洪英为祁阳人、江华人的。此处据《骆文忠公奏议》卷四，《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逆首折》。

⑥ 《广西昭忠录》卷二；《股匪总录》卷二。

⑦ 周诜诒：《永明县志》卷二三，《武备志》。

谋与入江西的太平军会合，没有成功，遂归广西。1854年9月25日（咸丰四年八月初四日）占恭城，焚衙署，毁庙宇，封建官绅逃避一空。① 10月7日（八月十六日），朱洪英与陈永秀等自恭城破灌阳，杀典史斐泰、把总潘胜荣等。毁衙署淫祠，改文庙为王府，建立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胡有禄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封官设职，蓄发易服，创建了第一个天地会政权。②



朱洪英、胡有禄在灌阳建立“升平天国”的王府遗址

升平天国的出现，激发了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先是，大荆源瑶民约集境内外瑶人千余人“焚烧老石桥、官田、南江等处”③。临桂县属大圩之数万“土匪”继起，突入桂林附近之铁沙圩，直逼桂林省城。清巡抚劳崇光，团绅龙启瑞急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全州西延枫木山人扶添启在松岭竖旗自称太平总管。以向兴发为首的顺义堂攻占阳朔葡萄圩，西及临桂横山堡。荔浦张高友亦率所部东出，直逼平乐府城。他们与升平天国遥相呼应，到处攻掠，把地主官绅打得坐卧不安。

是时，太平天国西征军深入江西、湖南。为了夹击敌人，太平军利用罗

① 《平桂纪略》卷一；光绪《恭城县志》卷四，《武功》。

② 《骆文忠公奏议》卷四，《东安窜匪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逆首折》；蒋良术等纂：《灌阳县志》卷二三，《纪事》。

③ 代汝霑：《咸丰同治寇事始末记》，见《灌阳县志》卷二三《纪事》。

大纲与胡有禄的老关系，派人携函约胡有禄、朱洪英“前往会合”，共同作战。① 10月，胡有禄亲率大队攻全州，以邓正高率军占兴安，并分军消灭灌阳冠山等地团练多股，巩固了后方基地。② 11月，胡有禄、朱洪英率军入湖南，猛攻道州。湘军王鑫部拼死抵抗，遂回师恭城，出湘与太平军会合的计划无法实现。灌阳知县邓树恭乘虚猛犯县城，起义军退守栗木，待机再举。

1855年3月，胡有禄、朱洪英与邓正高合军万人由恭城攻富川，连下沙坪、古城等地，直指县城。县役毛遇春开门迎接，杀知县济昌，典史宋履元，贡生周召南等大小官绅兵勇数百人。③ 4月，清军来犯，洪英借大雾率众劫敌营，擒斩过半。洪英乘胜再入湖南，攻永明，中伏失利，遂弃富川，由恭城再占灌阳县城，杀团绅乡勇数十人。④ 5月，主动撤出，再攻湖南，一举占领东安县城，与湘军及团勇连战数日，终因邓正高叛变投敌，东安城于9月被敌攻陷。胡有禄率军转战新宁，向祁阳、邵阳转进，不幸在四明山被俘，与监军潘大兴、前营都统何文华等在长沙就义。

胡有禄兵败身亡，朱洪英率部重归广西，与全州、兴安天地会孔亚福、邓兴爵等联合，声势复振。11月初，攻敌副将周云辉军，破兴安县城。旋即乘胜东征，三克灌阳城。不久，挥师四进湖南，于12月占永明城，杀周云辉与把总周佑德等。⑤ 湖南巡抚骆秉章以永明失守，急调兵勇反扑。1856年1月，朱洪英撤离永明，南走江华，与会党首领焦玉晶（即焦三）、李石保等联

---

① 罗大纲函约联合事见：《骆文忠公奏议》卷四《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首逆折》；同书卷二《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折》云：清军曾“夺获镶黄大黄旗一面，太平军后营龙凤旗一面，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万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英大黄旗共数十面”。说明太平天国当时已有人加入胡有禄、朱洪英的队伍作战。

② 参看《平桂纪略》卷一；陈济南：《新建忠义祠兼义学碑记》，同治五年二月立石。碑在兴安溴川中学内。

③ 《平桂纪略》卷二。

④ 《灌阳县志》卷二三，《纪事》。

⑤ 《骆文忠公奏议》卷六，《广西贼匪窜陷永明郴桂逸匪窜扰宁远折》。

合，清军四面围击，洪英率众连日苦战，皆不利。2月，朱洪英、焦玉晶、李石保等由江华南下，于宁远、蓝山、嘉禾屡为敌人所败，损失极大。① 洪英在湘粤边山区潜伏不出。清廷迭令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着意查拿”，皆无所获。直至1874年（同治十三年），因“耒阳莠民滋事”，湖广总督王文韶“檄陈宝箴师勇前往”镇压，朱洪英与刘福隆不幸被查获，“濯去其红印，斩于市”。② 洪英余部多走归其部将陈永秀。

当朱洪英于1856年初从湖南向粤北转进时，陈永秀另率一军由湖南攻富川。清麦岭都司黄金亮起为内应，遂克富川城。③ 8月，陈永秀、黄金亮合军再入灌阳，仿效太平军编制，在文村、高家坪等处将部众编为前、后、左、右、中五营，以陈永秀领左营，卢维新领右营，郭二嫂领前营，廖四嫂领后营，黄金亮居中营为首；属下设师帅等名目。1857年1月（咸丰六年十二月），黄金亮、陈永秀分军出击。陈军自灌阳占兴安，破灵川县城。黄军北攻全州，不利，南下与陈军会合。同年夏初，由灵川进驻甘棠渡，占领龚家村，筑土城七座，直逼桂林，斩清都司松龄，全城震动。6月，清按察使蒋益澧率湘军来犯，激战月余，义军失利。永秀由灵川入兴安，旋折向平乐与杨西安联合。10月，平乐城内粮尽，西安出城降敌，被敌人处死。④ 永秀率残部走贺县、昭平，与贺县的陈金刚互相响应。6月，清军来犯，激战于平乐、贺县边界山区，丧师3000余，兵部尚书安定侯王鼎新，左翼都统平靖侯龙坤树等阵亡。永秀率残部走贺县附于陈金刚。此后去向不明。⑤

---

① 《骆文忠公奏议》卷六，《永明江华克复南北肃清折》。

② 光绪《湖南通志》卷八九；胡元士等纂《东安县志》卷二，《事纪》。

③ 黄金亮，广西全州人。《永明县志》卷三二，《武备志·兵事》云：咸丰“四年九月初，广西麦岭营都司反，降于土匪头目朱洪英，分其众百人由龙虎关入永明”。“反、降”时间错了。

④ 据张智林：《平乐县志》卷八《前事》说：永秀与杨西安联合时，“蜂屯蚁聚有十万余众”。平乐城被清军攻破后，“骸积成山，血流成川”。

⑤ 据《股匪总录·陈永秀传》说，陈永秀在贺县兵败后，“或云：永秀随金刚毙于广东；或云：为石达开作向导，败于贺县之桂岭，为石党所杀”。

黄金亮自灵川败后，即率所部经义宁、永福、雒容人柳州，与大成国李文茂军会合。李文茂授黄金亮为龙城知府。1858年初，随李文茂攻桂林，与蒋益澧军战于永宁、永福等地，不利。4月，文茂退归柳州，金亮由龙胜人怀远斗江、古宜至融县长安，一度进至贵州黎平。1859年，石达开回师广西。黄金亮率所部回桂附之，驻于柳州北之太平圩。因与陈戊养有隙，于8月12日被戊养杀害。①

综观胡有禄、朱洪英领导的升平天国起义，时间虽然不长，但活动范围极广，且曾多次攻占灌阳、富川、兴安、灵川、恭城以及湖南的永明等县城，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影响极大。在起义斗争中，还多次与太平天国发生联系，期望联合作战。结果虽然不能如愿，而事实的本身说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系统的升平天国，是积极争取并且期望合作的。

陈开、李文茂与大成国

胡有禄、朱洪英在桂东北建立升平天国不久，在浔州又出现了以陈开、李文茂为首的大成国政权。它更广泛地联络了广西中部地区的几十支天地会武装，在西江和黔江流域各州县开展反清斗争。

陈开，广东佛山镇人。"驾船为业"②。李文茂，广东鹤山人，艺人出身。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天地会首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国内封建主义压榨日益深重的迫使下，1854年6月18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陈开以500余众，首先在佛山蒙清冈举起反清旗帜，火烧城门及大基尾官卡，逐杀官吏及土豪劣绅，攻占衙署，光复佛山。③ 于是筑土台，树围栅，置军械，守

① 《平桂纪略》卷三。

② 陈开的家庭出身，《浔州府志》、《贵县志》说是"驾船为业"。《广州府志》、《南海县志》、《德庆州志》说是"博徒"、"无赖"。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说是开杂货店小商人。

③ 陈开起义日期：《南海县志》、《德庆州志》及《粤东剿匪纪略》等记为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广州府志》记为六月十二日；朱用孚《摩盾余谈》作五月二十三日。

津隘；以“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相号召，所部蓄发易服，头扎红巾，自称“洪兵”或“红兵”，称清军为“白军”。设官分职，有元帅、将军、军师、先锋、防御使诸名目。

陈开在佛山举旗起义，各地会党群起响应，势如星火燎原，要者如：陈松年起于新会，陈吉起于花县，邹六起于龙门，陈光隆起于广州河南，关钜、何博春等统大小船艇千艘环逼广州。李文茂、陈显良等拥众数万起于广州北郊佛岭市。广州、肇庆两府，义军遍于城乡。他们或与陈开呼应声援，或直接与陈开联合战斗。“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贼垒相望”。义军声威所及之地，“膏粱之族，挈妻子，辇资财，移居走避，省垣内外，骤增万余家”①。

各路义军合攻广州，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极大的打击。为了保住省城，巡抚叶名琛到处纠集兵勇，拼死守城。盘踞在广州、黄埔等地的侵略分子，或伪扮商人，明火执仗，为龟缩在城里的清军运送武器、粮食和兵员，甚或以船舰直接阻止义军攻城。1855年2月10日(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显良以统领水陆兵马大元帅名义，照会英、法、美三国公使，义正词严地警告他们，勿以“艀艇装载火药、粮食等物，卖与奸官所用，以及火船载奸兵进省”；如欲从事合法贸易，“俟我进城然后通商便是”。② 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可贵精神。

由于起义军缺乏必要的攻城器械，加以中外敌人狼狈为奸，顽强抗拒。陈开、李文茂等决定放弃围攻广州的计划，集中力量向广西发展。当时，梁培友已从广西东下，占领德庆州。陈开、李文茂在他的接应下，统率大军4万余人，船艇千余艘，于1855年5月23日（咸丰五年四月初八日）浩浩荡荡进入梧州，继即溯江而上，破藤县，越平南，6月5日（四月二十一日）抵桂平，分水路两路夹攻府城。清知府刘体舒，桂平知县李庆福闭门死守。激战多时，终不能克。9月中旬，清按察使张敬修，参将尹达章督水师至平南，

① 《南海县志》卷二六《杂录下》，卷一四《列传·伍崇曜传》。又光绪《清远县志》载：“广州、肇庆、韶州三府，先后陷城者二十九州县。”

② 《李文茂资料汇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1959年编印。

企图西援浔州，被起义军大败于石咀江面。时浔州城内粮尽援绝，守城兵勇“饥不能战”。起义军在小南门挖地道攻城，轰塌城墙数丈，27日（八月十七日）破南城，尽歼刘体舒、李庆福以下官兵，光复浔州府城。①

浔州既克，陈开、李文茂立即着手政权建设，改浔州为秀州，改桂平县为秀水县，以浔州府城为秀京，定为国都，立国号曰大成，建号洪德。随即发布告示安民，严明军队纪律，制定各种制度。陈开自称平浔王（原称镇南王）。稍后，李文茂称平靖王兼陆路总督，梁培友称平南王兼水路总督，区润称平西王，梁昌（大口昌）称定北王。各王之下，分设公、侯、将军、司马等职。并铸“洪胜通宝”流通乡市。② 这些措施，较其他天地会队伍前进了一步。

为了巩固秀京，扩大斗争成果，陈开、李文茂在建政定制的同时，对秀京周围的地区发动了进攻。10月22日，李文茂、梁培友、梁昌率领大军西进，在黄鼎风、黄全义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贵县城。改贵县为怀城县。11月东出平南，环岸排列炮船击县城，水陆激战，延续数月。清提督惠庆乘隙率军入蒙圩，署右江道黄辅相率军入武宣，妄图水陆并进，夹击秀京。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1856年春，陈开遣覃七率军入郁林蒲塘圩，出示安民，杀富济贫。大成国声威远播桂南各州县。

3月，李文茂、梁培友亲率水陆大军溯黔江北上，一举攻克武宣县城，俘知县茅本蕙及黄辅相等，改武宣县为文兴县。③ 5月挥师入象州，驻运江。

---

① 清·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六《纪事》。又：魏笃在《浔州长叹歌》写大成军攻城有句云：“惊心艨艟飞如电，豕泣狼嚎环四面。时州西下湾、蒙圩皆先占领，浔、黔两江亦尽为大宁军船艇分泊，大兵环攻州城。”郑献甫：《补学轩诗集》卷五《闻浔州府失守感赋》写李文茂攻城云：“桂海虞衡新略地，黎园子弟又登场（闻贼首系优人）；歌声自断刘三妹，（浔州土神，善歌）龙孽谁收李二郎。”

② 陈开称王在先，李文茂等封王稍后，据《平桂纪略》及《股匪总录》诸人传。

③ 清·佚名《浔州府志》说茅本蕙巷战死。实则被俘后与黄辅相同解浔州处死的。

当时，起于永淳的李文彩部已入浔州，与大成国联合。活跃于荔浦、修仁的张高友部亦西进永福、鹿寨，与李文茂、梁培友遥相声援，为拱卫秀京北部起了重要作用。

大成国的建立，大成军对秀京反动势力的扫荡，大大鼓舞了四乡群众。附城的拆岭，县东的社坡，县南的水柳，以及县西的蒙圩等地农民掀起了抗租和夺田斗争。[①] 城乡坛庙，多被毁弃。府学“宫墙殿宇，灰烬之余，芜秽不堪”[②]。书院“屋宇墙垣，均为茂林”[③]。应指出的是：某些庙宇的毁弃，并不说明大成国禁止崇拜鬼神。在“大成洪德元年季冬”，秀京内就有“众士商修都城隍庙”的事。庙前石刻门联云：

城复於隍，鉴善恶以分明，昭彰报应；

都因有庙，司阴阳之燮理，赫濯声灵。[④]

但他们对于封建教化的不够尊重，却是事实。

起义唤醒了群众，群众支援了起义，并把斗争推向前进。正是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直接参加下，1856年下半年开始，大成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北伐、东征、西讨与南卫的进军，把起义推向更广阔的地区。

大成洪德元年，秀京城隍庙大门刻石拓本

先讲北伐。

早在1856年5月李文茂、梁培友攻占象州、屯兵运江不久，即分军进入柳州境。11月，李文茂亲统大军在柳州城外连营数里，部署攻城。张高友率众自荔浦出雒容、洛垢与江口牵制清军。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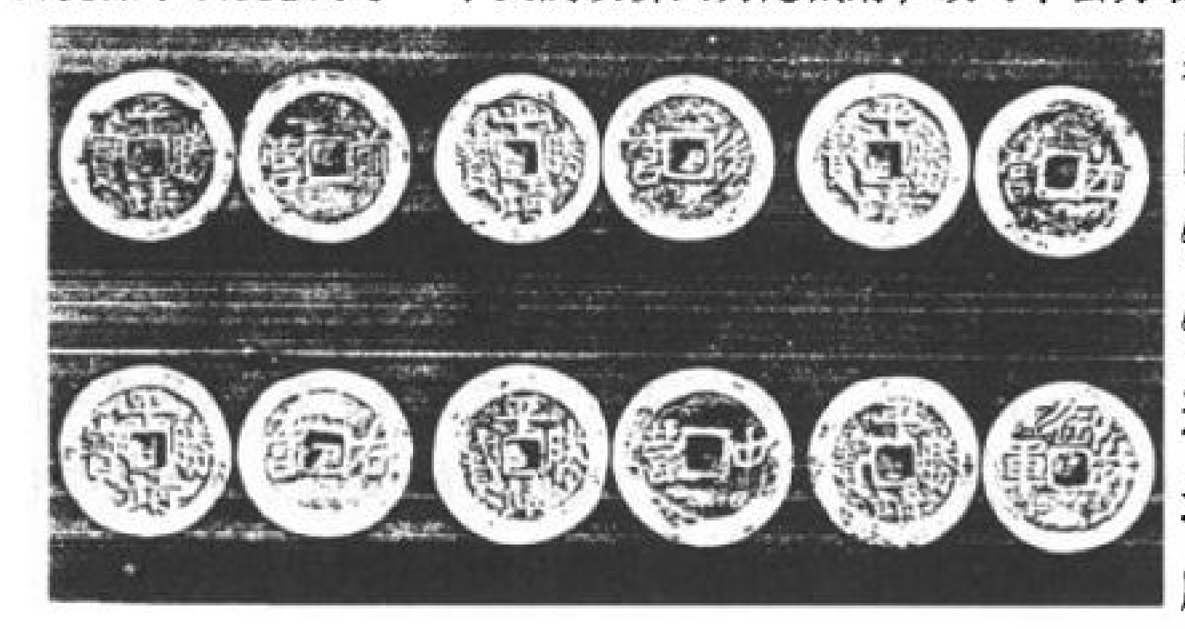
① 徐延旭：《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同治六年立。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存拓片；又参清·佚名《浔州府志》卷三四，《纪官·学制》。

② 徐延旭：《重修浔州学宫记》，见民国《桂平县志》卷四七《纪文·文录》。

③ 周鲁铿：《重修浔阳书院碑记》；陆煐：《桂邑书院纪略》；林有席：《浔阳书院祀周程三先生对》。见民国《桂平县志》卷四七《纪文·文录》。

④ 庙在今桂平镇第一小学处，1972年访得。

历4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1857年3月15日（咸丰七年二月二十日）轰塌城墙，攻克柳州城。清水师管带张彪率部出降；右江道孙蒙，知府志曾，知县倪韶书顽抗被杀。[①] 李文茂改柳州为龙城府，改马平县为瑞龙县；以平靖王名义发告示安民，号令远近；铸“平靖胜宝”钱方便商旅，以通有无。柳北天地会陈土养、陈戊养兄弟率队自义宁来归，愿听节制。[②] 文茂封土养为陆路将军。4月，文茂以降将张彪为前导，北攻庆远，不克。6月1日，攻占罗城。改罗城县为朝阳县，设官治理。“一时政治聿新，民风为之一变。”[③] 7月25日，攻克融县，改名玉融州，以陈安泰为知州，陈洪韬为城守。随即移师再攻庆远，10月19日克之。文茂以张彪为都督，黄池、雷公掌为元帅，梁胜为知府。与此同时，还一度攻克思恩县城。至1858年底，李文茂统率的北伐军几乎占尽柳北的广大地区，为巩固柳州，进军桂林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成国平靖王李文茂在柳州铸造的“平靖胜宝”

1858年1月，李文茂挥师攻占永福县城。3月，进抵桂林西面60里之苏

① 李文茂克复柳州时间，据《平桂纪略》卷二。《广西昭忠录》卷三作二月十九日；萧殿元等纂：《榴江县志》记在咸丰八年，皆误。又：文茂围攻柳州时，清守城游击韩凤在城内恃功骄横，自称大元帅，以捐输军饷为名，勒索商民，强掳妇女，到处登门抢劫，虐杀无辜，百姓怨声载道。郑献甫作《惊闻柳州失守》四首，其一云：“闻外未摩强寇垒，城中先破富人家；人无异种都如草，地有空林尚作花。”见《补学轩诗集》卷六。

② 《堂匪总录》卷二载：陈土养，柳城上蔚洞人。咸丰七年与戊养率部入义宁东坂。

③ 潘宝箓纂：《罗城县志》卷十，《前事》。

桥圩，毙清守备阳元胜，千总潘正万。时陈开率领的东征军已由梧州抵昭平、永安，分别向平乐挺进，形成两路攻击桂林的态势。可惜两军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反被敌人各个击破。5月，陈开军被蒋益澧湘军败于阳朔、平乐交界的季鱼塘。李文茂败于苏桥，退守永福的鸡石湾。6月经雒容退归柳州。月底，柳州陷敌，文茂退往融县，直上贵州黎平，期与苗民起义队伍联络。7月以后，清军趁机大肆反扑，连陷迁江、庆远等地。11月中旬，李文茂率军自黔回桂，大举反击敌人，再克融县、柳城及柳州城，以元帅冯添书、[①] 将军李火秀、知县王山公等共守之，军威复振。但就在这时，李文茂因连年征战，劳累过度，病死于怀远山中。北伐军失去指挥全局的统帅，而敌人加强反扑。1859年夏，柳州再度陷敌。北伐战争从此一蹶不振。

紧接李文茂北伐的是陈开领导的东征。

大成国建都秀京以后，梁培友是拱卫东路的主要负责者。他以平南为基地，在平南至梧州的西江沿岸辗转征战，给清军与地方团练以沉重的打击，对捍卫秀京起了重大的作用。1857年3月，梁培友在平南的思贺村、廖洞堡的攻战中不幸战死。6月，陈开乃亲率大军沿着当年进军广西的路线开始东征。[②] 6日，克藤县，22日（闰五月初一日），直逼梧州。清副将蒋福长早在对河三角咀构筑炮台，并调拖船防守。大成军善水战，避过敌人炮火，抄入敌人后路，断浮桥，夺炮台。罗华观率众从下郢来援，切断城中粮道，与大成军联合攻城。7月27日（六月初九日），苏海率水师从广东西上，妄图援救城内清军。当时洪水猛涨，大成军乘江流“疾涨汹涌，倏忽直下，首尾夹击，官军遂溃，军士皆赴水死亡”，苏海亦被洪水吞没。[③] 梧州城内缺粮。浔州知府倪涛、苍梧知县彭昌集出城筹粮，被罗华观擒解戎圩军营。藤县乡团护送

---

① 它书亦有作添喜或天善的。

② 据《平桂纪略》。王栋《苍梧县志》说梁培友、区润率军攻梧州；清·佚名《浔州府志》说是梁昌和区润；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说是李文茂，皆不确。盖梁培友已死，梁昌在南宁，李文茂在柳州。

③ 《广西昭忠录》卷六，《苏海传》。

粮米数万斤解至抚河口外，又被义军所夺。[①] 9月27日，经历三个月的包围攻打之后，大成军终于占领西江重镇梧州城。杀蒋福长与代理知县王锡惠等。陈开改梧州府为秀江府，改苍梧县为秀平县，以罗华观率军驻守。

1858年春，陈开率军溯抚河北上，谋攻桂林。3月，入昭平，分兵出永安。4月，攻平乐、阳朔，与李文茂的西路军相呼应，两广总督黄宗汉适于是时督兵自粤入桂，[②] 梧州危急。陈开被迫回师救援。5月底，梧州失守，罗华观退守平南，以为秀京屏障。历时经年的东征战事至此结束。

以梁昌、李文彩、黄鼎凤等主持的讨伐西路战事，是从1857年春开始的。

早在1856年12月，梁昌、李文彩即自贵县率军西出。第二年3月，入永淳。李文彩旧部及早年抗租农民4000余人蜂起响应。22日，占县城，知县刁汝元由勇目拥护出走，在那坛村畏罪吞金自尽，练勇悉降。[③] 大成国改永淳县为峦城县。4月27日（四月初四日），一举攻占西南重镇南宁府城。清知府兼知县苏在中，兵备道吴德徵，总兵色克精阿闻风弃城先逃，富绅亦狼奔鼠窜，杀沙棠村顽抗之团练头目雷高瞿等男妇数百人。[④] 远近震惊。于是，改南宁府为南安府，改宣化县为永宁县。6月初，梁昌分兵攻武缘，封建官绅闻风惊逃，不战即克。数月之间，大成军西讨队伍拓地纵横数百里，所到之处，告示安民，号召农民“抗租承粮”，提出公卖公买，严禁淫掠等主张。南宁既定，李文彩即遣部将李启人率数千人从右江水陆北上，进攻百色。由于

① 郑献甫《补学轩诗集》卷六有句云：“老熊不卧城中道，流马犹催境外粮。”就是描写这件事的。

② 时两广总督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

③ 参看民国《永淳县志》卷八《杂记》；《广西昭忠录》及《平桂纪略》。或云刁汝元被杀。

④ 卢鼎亨：同治十二年仲春《重修沙棠村男妇殉难碑记》，1976年2月15日访得。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四，《前事五》说“杀数千人”，实属夸大。

远途攻袭，孤军深入，无功而返。[①] 8月7日，清军攻陷武缘城。9月底，清军及团练犯南宁。梁昌、区润率军血战三昼夜。10月2日（八月十五日），被迫撤出，游移于南宁外围继续战斗。不久，梁昌与区润意见相左，互相火并。梁昌败退广东合浦，不幸被地主团练捕杀。[②] 区润亦逐步向浔州转移。1858年秋，当陈开率军屯象州之际，“区润潜位于浔州”，为其部属所杀。[③] 从此西讨军声势大挫。

南宁陷敌以后，李文彩率军退守广东灵山，坚持对敌斗争。后经永淳、横州北上，于1860年从怀远进入贵州，先后与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及贵州苗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坚持12年始告失败。

与梁昌、李文彩等水陆军西进同时，1857年5月，黄鼎凤统陆军万余人，从贵县向宾州进攻。宾州团总谢秉彝反正响应，地方农民军宋扶杆等大小二十余支共约数万人络绎来援。8月14日，占领宾州城，杀知县瞿景禧、参将钟庆猷等。改宾州为临浦州，以谢秉彝为知州。[④] 随即移师攻上林，李锦贵、黄元锣起众响应。9月25日破城而入，杀知县杨培坤，改上林县为澄江县，李锦贵自称明义将军大司马，黄元锣、李绍理为左右指挥，鲁铨、张立忠为军师。他们遍贴告示，提出“除暴安良扶社稷，救贫济苦救民生”的主张。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号召蓄发变服；没收地富浮财，救济贫苦农民；禁止滥杀耕牛，建工场制造武器。[⑤] 11月，黄鼎凤分军四出，回攻贵县，进军永淳、迁江，占有广大城乡，声势益壮。陈开晋封鼎凤为隆国公。1858年春，

---

① 华本松：《百色厅志》卷七《人物》、卷八《补录》。黄诚沅纂：《隆安县志》记六月攻百色，恐为闰五月之误。

②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四，《前事五》；《平桂纪略》。

③ 《平桂纪略》卷三；同治《藤县志》卷二一，都说区润为其部下所杀在咸丰八年八月。《藤县志》具体说是“八月初三日”。清·佚名《浔州府志》说：“咸丰九年四月，区润在浔州伏冥诛。”时间有误。

④ 杨椿、陆生兰：《宾州志》卷一三，《前事》。《平桂纪略》卷二。

⑤ 文森主编：《上林县志》第三章，《主要兵事纪略·李锦贵起义》；《平桂纪略》卷二；《股匪总录》卷一。

义军占迁江县城。改迁江县为思冈县，旋改双河县。① 义军所到之处，皆设官治理，社会安定。且看黄鼎凤控制下的来宾、贵县各地乡圩的情况：

> 就地置粮台，归附者岁纳保护费若干即无事。失盗以实闻，先偿如数。捕得窃赃，辄处极刑。惟捏虚反坐亦甚酷。以故境内约束严明，几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县属南乡，距鼎凤山寨不远，多归附之。编户登籍，谓之“写耕夫”。所取比曩昔反轻二三。豪酋亦依附鼎凤。②

同年6月，清军攻陷临浦州，谢秉彝被俘死难，余众突围走。12月，鼎凤再克临浦州，杀清宾州知州任秉钰及守备韦廷忠、韦启贤等。18日，鼎凤以黄庆蕃为临浦州知州。③ 1859年11月，太平军石镇吉、石贵忠部入宾州，黄鼎凤退守贵县覃塘，坚持抗清斗争。

在大成国向秀京东、西、北三面拓展的时候，南方各地起义军也起为声援。其中最主要的是活跃于郁林地区的范亚音部。

1856年，范亚音与甘木等在容县集众起义。为了拱卫秀京南路，陈开于1857年主动遣使封范亚音为荣国公。2月18日，亚音联合浔州陆亚昌，平南覃亚儿晚以及冯六、戴九、曾五等2万余人围攻北流县。3月2日破城，杀知县萧煊，典史施源等。改北流县为陵城县，以戴九为县令。四乡百姓多“长发转红”④。清军及团勇自郁林来犯，被洞心村、平石坑、大路排各地义民所阻。6月初，清博白知县邹德润率勇扑来。被义军大败于北流城外。8月，亚音率军自北流攻郁林。郁林周彩观，桂平谢四，北流陈之茂等分别聚众响应。可惜范亚音行动迟缓，战斗胶着于北流、郁林边界。1858年2月，邹德润再犯北流。范亚音回军救援，与戴九闭城坚守。改北流县为铜州府，以杨朝枢

---

① 《平桂纪略》卷三。思冈州，亦有记为思刚或思江州的。

② 翟富文纂：《来宾县志》下编《兵事》。

③ 《平桂纪略》卷三。

④ 李士琨：《北流县志》卷二〇，《纪事》。

为知府，以袁镜为陵城知县。[1] 杨朝枢出任知府后，"盛仪仗，变衣冠"，并发布檄文说："本府束发爱书，壮年幸厕孝廉之列，弹冠筮仕，耆年谬膺太守之荣。四知旧懔家声，三辅尚资筹画。"[2] 表示绝不贪污，革新政治，为民谋利。4月，义军围攻博白县城，邹德润率勇练赶回解救。范亚音乘机攻郁林，激战十余日，不克。7月，清军攻陷北流。范亚音率主力回守容县；杨朝枢另率一队驻屯西山，筑铜州寨扼守容县、北流通道。另有数千余众转入桂平，与大成国北路大元帅姚新昌会合。1859年春，姚新昌自桂平罗播遣众2000余人入郁林州，曾"均分田地"以给耕者。[3] 至此，亚音所部基本处于分散蛰伏状态。

综观以大成军为主力，以秀京为中心的各路进军，从1856年到1859年是它的胜利发展时期。四年之间，东起桂江，西及右江，南至郁林，北至贵州黎平地区，纵横桂、黔两省数千里，光复过柳州、浔州、贵县等大小城池数十座，其声势之壮，胜利之大，给封建统治者打击之沉重，在三个天地会政权中是首屈一指的。可惜，这种胜利势头十分短暂，占领地区也极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与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4] 加以在军事上缺乏全盘的战斗计划和统一的指挥调度，结果，反为敌人各个击破。1860年起，斗争逐步走向低落。当时石达开虽然率军回师广西，但大成国存在"主不让客"的偏见，而石达开

---

① 唐代，容县、北流均属铜州。封祝唐等：《容县志》卷二七，说改县名同时置铜州府。《平桂纪略》说置"桐州府"。《股匪总录》说置府在咸丰七年夏。《容县志》、《郁林州志》说此时知县为袁镜或袁某。《北流县志》说知县仍为戴九。

② 李士琨：《北流县志》卷二〇，《纪事》。

③ 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八，《纪事编》。

④ 1959年9月29日《光明日报》载梁任葆：《太平天国时代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提出黄鼎凤在所占地区曾实行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及奖励生产，保护工商等措施。经查，所谓《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乃赝品，所言不足征信。

对争取地方友军亦欠积极，因此，面临共同的敌人而不能密切配合，共同对敌。

随着石达开回师广西，清王朝加强了在广西的军事部署。除以蒋益澧的湘军南下贺县、梧州外，更以刘长佑为广西按察使，调楚军入桂协同作战。1860年1月31日（咸丰十年正月初九日），刘长佑军攻陷柳州，大成国元帅冯添书、将军李火秀、知县王山公等死难。2月2日，柳州沦陷。陈开虽率军多次反攻，但劳而无功。

柳州是秀京的重要屏障。柳州既陷，秀京形势危急。9月，蒋益澧湘军从贺县犯苍梧，1861年1月，败大成军于下郢、四篓，罗华观率部走浔州。时刘坤一又率大批湘军入桂，自柳州沿黔江南下。4月，陷武宣。蒋益澧则乘机从苍梧西上。6月，与广东碣石镇总兵李扬升军水陆并进。7月，至平南。8月12日，大成军与刘坤一湘军大战于武宣、桂平间之红石、勒马一带，不利。蒋益澧湘军犯平南，李扬升军水师200余船艇列营平南丹竹江面，并以铁链横江。陈开亦集中水陆大军万人（一说7000）作最后决战。19日，陈开与罗华观率战船400余号（或说300余与700余号），卸帆去桅，蔽江而下，乌江口陆师数千人同时杀出。清水师以大桅船30艘居前，另以战船百余艘为中军，布阵迎战。陈开命先锋大舰发龙凤炮炸断横江铁链，并毁敌大拖船十余艘，水军直冲下驶。清水军亦乘风上驶，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大成军药库中弹炸毁，战船沉没多艘。另有200余号被敌人掳去；陆路军亦伤亡惨重，几至全军覆灭。陈开突围回走秀京，平南落入敌手。20日，清军分两路夹攻秀京。21日城破，陈开率从数十骑向贵县转移，途中被叛徒出卖，在横州大滩被俘，妻子与随从张安、陈见等数十人在内，被解回秀京，壮烈牺牲！①

陈开败死，历经七年的大成国宣告覆灭。受命于大成国的抗清队伍，留在广西较为主要的只有黄鼎凤、范亚音了。

---

① 据《平桂纪略》、《股匪总录》，民国《桂平县志》、《贵县志》以及《粤东剿匪纪略》诸书。

范亚音1859年与盟友分军作战以后，仅在北流、容县一带活动，军事上无大进展。1862年4月，揭二进攻广东化县获胜。亚音忌其势大，暗令心腹梁七把他杀死。甘木不服，亚音又杀梁七以息众怒。由是亚音与甘木不和，势益衰，转投陈金刚。6月，金刚派郑金入容县，封亚音为鲁国公，封亚音部将甘木为镇容侯，谢雷公为大都尉，罗九为副都督。联军转战容县、北流各地。是年冬，亚音部将曾五与苍梧、容县、藤县、岑溪、平南、桂平各地起义军会于容县自良圩，歃血誓盟，公推覃亚帅（税）为“六县盟主”，称开国公，戴九为建国公，曾五、蒙大、冯毓经等为郡侯，袁镜为军师。改自良圩为万安府。众推亚音为镇容公。亚音不受。1863年8月，清军及练勇万人攻容县。姚新昌应范亚音约自桂平率众来援。而甘木、封超英等竟公开投敌，反戈攻击范亚音。姚新昌、陈金刚派军增援，又为清军各个击破。10月27日，容县陷落。亚音率众南下广东高州，谋与陈金刚联合，至岑溪南渡接获陈金刚败死消息。于是回师北走，潜往藤县改投覃亚帅。而覃亚帅此时已向清军投降。11月25日，覃亚帅把范亚音并妻儿等拘捕，解送清军。12月28日，范亚音与妻、儿在容县被杀害。①

黄鼎凤自1859年退出宾州后，即以贵县覃塘为中心，转战于上林、武缘以及灵山等地。众号5万，马匹3000。黄全义、周十二等忌其势大，合攻鼎凤，反为鼎凤所败。1861年大成国覆灭以后，黄鼎凤与黄全义等于9月接受清军招抚。12月，全义被杀，鼎凤逃去。收陈开遗部4万余人，于1862年元旦重回平天寨。罗华观、大口扒、王星福等十数支队伍齐至覃塘，愿从鼎凤指挥。6月，再克贵县，更名怀城，以黄庆蕃为知县，发布“安民告示”，申斥“胡虏”盗窃神器，酷吏、墨官残害百姓，号召“合邑士绅军民人等”各安本业，但并无实际兴革内容。旋率大军5万进攻浔州，距府城仅10里，先胜后败，退归贵县，分兵驻守四方要隘。黄鼎凤自称建章王，置宫室于小平

① 光绪《容县志》卷二七，《旧闻志·前事下》；周寿祺：《平南县志》卷一八，《团防录》。

天山。清军集中兵力攻扑贵县。1863年6月，县城陷敌。8月，覃塘失守。鼎风率众坚守大、小平天山。军师周竹岐（锡龄）代撰“檄文”传布远近，内容与黄庆蕃“安民告示”并无二致。时清军自根竹、覃塘掘濠筑垒围困小平天山，并以一军入龙山，断鼎风后路。义军所据险要尽失，接济亦断。1864年5月，清布政使刘坤一命总兵陈本志登山寨向鼎风劝降。6月，鼎风与周竹岐等下山，被刘坤一逮捕杀害，同时死难的还有黄庆蕃、王星福以及鼎风二子等百余人。黄鼎风坚持十三年的抗清斗争宣告失败，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①

吴凌云、吴亚忠与延陵国

继升平天国、大成国而起的，是以吴凌云、吴亚忠父子为代表、战斗在桂西南广大地区的延陵国政权。

吴凌云，本名元清。广西新宁州渠卢村（今属扶绥县）壮人。本为“新宁州附学生，家素丰”②。但早与山堂人物相往来，乃地方上的米饭主。③1851年，被渠钱村的乡绅告发，知州庆祺敲榨不遂，架题陷害，把吴凌云逮捕。他乘间逃脱，乘夜奔回渠卢村，凭借家乡“山石巉岩，林木丛密”的有利形势，与弟元高、元禄“竖旗聚众，号曰全胜堂”。1852年6月，庆祺调集兵勇合围渠卢村。10月，破寨而入。元高与部众百余人战死，吴凌云与元禄率众突围而出，转与“土贼”雷四大、傅大等联合，以陇（东）罗村为根据。不久，会党四起，“揭竿扬旗，有大胜堂、得胜堂、友胜堂、广胜堂、义勇堂、广义堂、忠义堂、联义堂等名号”，齐与陇罗吴凌云相呼应，声势复振。④时义军已初步分工任事，有十长、百长、千长、先锋、大将诸名目。

① 光绪《贵县志》卷六，《纪事》；民国《贵县志》卷一七，《前事》。

② 《平桂纪略》卷一。

③ 张灿奎纂：《新宁州志》卷四《土属志》云：“道光季年，路多伏莽。凌云世为窝主，代贼销赃，家以此致富。”

④ 光绪《新宁州志》卷四，《土属志》。

《平桂纪略》卷三记载说：

> （吴凌云）据陇罗时，土贼皆附之，筑土城，署伪官，遣诸头目分据各乡，纵横数百里，沦陷殆遍。

第二年，宣化之林九大、农大、农晚等率众数千人与吴凌云联合，义军声势迅速播及南宁府与太平府地方。1854年冬，龙州义军首领陆成泰攻太平府，被知府刘作肃杀害，余部"悉归吴凌云"①。同年夏，吴凌云遣部将曾十大、雷大把挝等率众攻南宁府城，被阻于亭子圩，不胜而还。② 凌云则仍以陇罗为根据，分兵守渠卢，屡败清军。封建文人作所谓《草寇吟》记其事，虽然诬诋义军为"草寇"，却也暴露了兵练在"草寇"面前欲战不敢，欲和不能的狼狈相：

> 红尘近地白日动，冥冥氛祲起岩洞。
> 津林有鹗喧恶声，四野初闻胆易惊。
> …………
> 蚩氓如羊贼如虎，择肥而食患方起。
> 红旗一竖胁从多，不言战守但言和。③

在敌人怯于言战的有利形势下，1856年10月25日（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吴凌云在梁日高、萧二、萧晚等部的配合下，一举攻破新宁州城。吴凌云委梁日高率队伍驻守，并出告示安民。文曰：

> 我父老兄弟，遭满奴之蹂躏久矣！严刑苛税，鸡犬无宁日。凌云目不忍睹吾父老兄弟之倒悬，因是联合各异姓之兄弟，同举义旗，专讨满奴，以复汉室。尔等不必意外猜测，别生异心，其各安堵如故。有明大义来附者，吾必礼而用之；持戈反抗者，族诛不贷。仰阖州人士，凛遵勿违，特示。④

---

① 陈必明纂：《龙津县志》第十二编，《纪事》。
② 民国《邕宁县志》卷一三，《职官志五》。
③ 光绪《新宁州志》卷六《艺文志》。
④ 韩水：《吴凌云·附吴亚忠》，见莫乃群主编《广西历史人物传》(6)。

吴凌云在“告示”中，不提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口号，而主张“讨满”与“复汉”。其民族革命主旨，与天地会多少已有差别。

1857年4月，吴凌云撤出新宁州城。当时各路义军与兵勇的对抗相对沉寂。1859年，回师广西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分路向桂林、柳州等地挺进；大成国的各路进军也分别和清军激战中。桂西南的清军防御相对空虚。吴凌云再度分军出击。1860年9月2日（咸丰十年七月十七日），由陇罗乘夜疾进，直抵新宁州城。从西北隅爬城而入，杀守城壮勇数名，并执代理知州郑元振。州“属村圩并忠州、迁隆、罗白诸土属，皆被胁从留发，月纳钱米”①。随即分兵攻克养利州，乘胜围攻太平府。因城中无储粮，守城兵勇惊恐万状，纷作鸟兽散。9月18日，义军乘虚破城。知州刘作肃，左州学正蒋应奎，西隆州州同冯应镛等被活捉，与新太协副将多禄、都司黄耀麟、千总李为梁等同时被处决。吴凌云以长子吴亚忠守太平，次子吴朱元守养利。10月，复分兵进击，连克太平土州、宁明州以及广西边防重镇龙州城，控制了左右两江的广大地区。这时候，龙州四近的“汉土州县皆其势力，诸堂匪、土贼皆归附之”②。吴凌云义军的声势所及，已经不止“纵横数百里”了。

吴凌云攻城略地的胜利，使陇罗成了各路义军依倚的中心。1861年2月17日（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吴凌云在太平府正式建立延陵国，自称延陵王，铸印文曰“延陵玉玺”，颁布诏令，封官设职，修建宫室，蓄发变服。以梁国桢为军师，罗品光为元帅，黄万年为辟疆侯，梁谦之以下数十人亦拜官封爵。并分兵驻守要隘。③

1860年，吴凌云义军入新宁，破养利，克太平，占龙州，进而在1861年

① 光绪《新宁州志》卷四《土属志》。

② 叶茂茎纂：《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王由贤等纂：《凌云县志》第七编《前事》；《平桂纪略》卷三。

③ 参看《平桂纪略》卷三、四；光绪《新宁州志》卷四《土属志》。但说“吴凌云僭称延陵国主”。羊复礼纂：《镇安府志》卷二二《宦绩志》说军师为谢国贞。并志此以供参考。

建立延陵国，是他自起义以来势力发展至最高峰的时候。但是，从广西全局考察，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开始走向低潮。战斗在广西中部的大成国，这时受到清军的南北包围，处于十分艰苦的斗争阶段。转战在广西各地的石达开所部太平军，由于政治上无甚作为，军事上屡战多败，也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可怕局面。留桂或离桂，举棋不定。桂西南一隅形势虽好，但失去各方的呼应支援，也很难维持长久。1861年8月，陈开兵败被俘，大成国政权覆灭。10月，石达开率部离桂。于是，封建统治者得以集中力量，加紧对广西西南地区进逼。吴凌云虽以太平府为中心，命梁国桢、梁谦之等数十人分兵驻守各要隘，但并不能制止敌人的大举进犯。7月30日（六月二十三日），左州被清军攻陷。8月3日（六月二十七日），养利州失守。太平土州、宁明州及思州又相继陷敌，三百余村壮、汉附义人民被迫"薙发归团"①。清军乘机大举向太平府进逼。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清军猛扑太平府壶关，双方展开激战。13日，太平府城被清军攻陷，军师梁国桢战死，元帅罗品光负伤，吴凌云与子亚忠率师回守陇罗，加强防务，休整军旅。12月，清军筑长围数百圈围攻陇罗，并于外围安设伏炮，"昼夜环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吴凌云率众誓死抵抗。1863年2月，义军弹尽援绝，吴凌云率众突围。"清军伏炮于隘击之，出者皆死"。吴凌云"中途遇伏，炮轰伤重"，壮烈牺牲。清军及勇练冲入陇罗，大肆烧杀淫掠，吴凌云经营十年的斗争基地，顷刻间夷为一片焦土。②

吴凌云战死之后，吴亚忠率领余众突出重围，向桂西北转移，联络各地抗清义师，继续高擎反抗旗帜。1863年1月，进驻镇安府地，声势复振。《平桂纪略》卷四说：

> 吴凌云之子吴亚终窜小镇安，土贼皆应之。……土股黄二晚、

---

① 《刘武慎公遗书》卷二，《克复养利州进图太平府城折》。

② 《刘武慎公遗书》卷三，《官绅克复太平郡城乘胜进捣贼巢折》；《清穆宗实录》卷二七，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谕；又参《平桂纪略》卷四；光绪《新宁州志》卷四，《土属志》。

邓佩锦、卢裕伦、黄景贤等闻亚终复振，群起响应。

第二年1月，吴亚忠与活跃于桂西北的小张三联合，共率大军攻镇安，不克，军师黄添然死难。2月，再攻镇安，连战两月有余。又据《平桂纪略》记载：

> 自此左右两江，贼匪纷踞，各自雄长，不可胜纪。吴亚终、黄崇英踞归顺郎家圩，梁天赐踞北岩，黄付胜踞马隘，皆天保县属。黄十据山老坡，牛头二据波洪塘，皆奉议州属。群酋推吴亚终为长，张三次之。

在这些起义的队伍中，除所谓“土股”者外，黄十、牛头二等是被封建官军称为“发匪”或者“发逆余党”的。实际是没有追随石达开离桂，坚持留在广西抗清的太平天国队伍。说明艰苦的斗争形势，把所有的抗清力量集中到一起来了。

吴亚忠入归顺州，以城西60里之三台山为基地，择险布防，且耕且守，与各地义军呼应声援，伺机出击敌人，以壮大起义力量。但是，好景不常。1866年初，当南宁的抗清力量基本被镇压以后，广西巡抚张凯嵩立即提出要对太平、镇安、泗城各府义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一面选调“精卒万人，分道疾驱，相机剿办”；一面“设法解散余党，以盗攻盗”。这些构想，都得到清廷的批准，认为“深合机宜”。① 而就在这时，张凯嵩“遣把总黄廷芳，凌云生员黄赞襄”向吴亚忠劝降，使他接受了“招抚”，并且更名顺宽，随清军开入云南。其后虽说是“反而复叛”，② 重归抗清队伍，但已威望大减，难以驭众了！

吴亚忠接受清军“招抚”以后，小张三率众4万余人，于1866年5月入西林县境，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战斗，不克。9月，黄崇英与黄玉锦等联军攻入泗城府城。知府陈燮珽被捕处死。12月，清军陷泗城。③ 时吴亚忠已自云南反正回桂。1867年3月，再“以归顺三台、德安为老巢根本，分据城东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一七二，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谕。

② 《平桂纪略》卷四。

③ 民国《凌云县志》第七编，《前事》。

郎家圩，城北新圩，城西南旧州、鲁利等圩，互为犄角。复分党屯龙仰、白都、那孟、谷蜡、版朝、渌冲、剥隘及越南之木马、保安等处，纵横数百里”。[1] 与转战在奉议、归顺等地的小张三、黄崇英再度配合，声势复振。7月14日，吴亚忠遣谢八与龙州义军彭元隆部联合，攻破龙州城。太平知府杨廷屿退三宝闸，“陷入贼中”。黄崇英亦率所部进驻龙州。[2]

面对反清力量的再度发展，清政府又一次拨款增兵，加紧镇压。一面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以及湖南省筹饷五万两，迅速解往广西；一面命令原在庆远、南丹等地“剿办土匪”即将蒇事的冯子材“即日拔营，亲带所部得力之师，驰赴左江，专办南、太军务”。并令“所有现扎南、太各营弁勇，均归调度”。[3] 是年冬，冯子材拔营至左江。年底，陷龙州。清军副将杨安龙入城，“逢人便杀。有以良民告，则曰总杀。良莠不分，即婴孩遇之亦不获免”[4]。

1868年夏，冯子材以优势兵力猛攻天保旺峒、陇洞以及归顺郎家圩等地。小张三败入归顺州城，在城外列营三十八座迎击敌人。6月11日（闰四月二十一日），清左江道覃远琎攻陷归顺城，小张三死于乱军中。[5] 不久，冯子材督兵攻三台山，吴亚忠自焚营垒辎重，突围而出。7月底，安德圩又被敌人攻破，亚忠率众转入越南，以木马为基地，分屯附近各村圩，绵亘200里，众至数万。8月，复自越南高平反攻龙州、太平等地，一度占领凭祥，进窥宁明，入太平土州，攻击下冻。离龙州不及十里。[6] 冯子材率重兵驻龙州抗拒。1869年1月，吴亚忠再入越南。5月，冯子材督兵“分道并进越南疾

① 《平桂纪略》卷四。

② 民国《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徐延旭：同治十年正月《重修（太平）府署记》。

③ 《清穆宗实录》卷二一二，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谕。

④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

⑤ 颜嗣徽：《归顺直隶州志》卷五，《记事志》说：覃远琎陷归顺州城及小张三死难在4月13日（三月二十一日）。此处据《堂匪总录》卷一一。

⑥ 徐延旭：同治《重建（太平）府署记》。

攻”，在“越南夷兵”配合下，两面夹击吴亚忠军。亚忠因部将吴贵征、韦二叛变投敌，被迫率部退回左州，在那宥等地筑垒坚守。清军围攻甚急。10月31日（九月二十七日），破垒而人。亚忠中炮身死，部将谢八、彭元隆、邝二、黄建新、黄标等英勇战死。亚忠母及妻儿等亦不幸被俘牺牲。[①] 发动于1852年，转战在中越边境十个州县的吴凌云、吴亚忠的反清斗争，经历了18年后，至此也宣告失败了！

延陵国的失败，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天地会抗清斗争再涌高潮走向衰落的标志。但人民反抗斗争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左州那宥被清军攻破以后，吴亚忠的部将梁天锡率部投敌，接受清军副将吴天兴的改编。当营官陈信监督收缴军械时，广大义军战士拒绝放下火器，奋起杀死陈信，冲出清营，奔赴越南太原。[②] 其他抗清队伍突出敌人的重围以后，也纷纷转移到滇桂边区或越南地方，重整队伍，聚集力量，继续斗争。15年以后，挺立在援越抗法第一线的刘永福黑旗军，就是这些打不垮、杀不绝的英雄汉组织起来的。

升平天国、大成国和延陵国的出现，许多会党中人的称主称王，是19世纪中叶广西天地会抗清高潮中的新鲜事。但是，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缺乏建树。这种短而空的政权是名难副实的。然而，这种立国称王的现象表明：它打破了天地会凡非朱姓不称王的老规矩，也以此否认清王朝的合法存在。可惜的是，他们义旗刚举，功业无多，即因为立国称王而匆忙建王府，封官爵，不知天高地厚，甚或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到头来仍旧难免兵败身死的命运。其教训也是至为惨痛和深刻的。

---

① 《清穆宗实录》卷二七三，同治八年十月二十日谕。《平桂纪略》卷四。
②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

三、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①

太平军离桂后的广西天地会起义，无论在斗争的形式或表现上，或在斗争的内容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种变化，无疑是得到太平天国的启示，向太平军学习的结果。

天地会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前面提到的立国称王，就是明显例子。

如前所述，天地会初起时，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奉明朝后裔为君主，“天德皇帝”是他们理想中的小主，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在天地会中，非朱姓者举行起义，多自称“元帅”或“都督”、“诸侯”、“统兵”、“大司寇”等名目，少有称主称王的。而这种老传统，到了19世纪50年代，却明显地被广西的天地会起义打破了。具体事例前面已有说明，无须赘述。当然，在当时的天地会中，也还有许多食古不化的守旧分子，自己不以王位自居，又不以别人的称王立国为是；②或者仍口口声声说“愿为明代之忠臣”的。③但无论如何，有人在起义时打出“立国”的旗号，越来越多的人称主称王，说明天地会坚持了近200年的“反清复明”的老传统，其中“复明”的宗旨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应该看作是对太平天国反对“复明”，主张“开创新朝”④的一种学习。

有些天地会的山堂，虽然没有立国称王，却纷纷以能与太平天国“沾亲带故”为荣耀，自称太平天国的同党，或者直接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到处活

① 参见拙文《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思想制度上的关系》。

② 《洪大全自述》，见《太平天国》（二），778页。

③ 《天德王贴柳州告示》，见《太平天国》（二），891页。

④ 参看《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六），873页。

动。所以有记载说：

咸丰二年，洪杨进据金陵，称太平天国。两广在野会党咸乘机起，奉太平天国正朔，转相号召；或攻陷城邑，或据地雄长一方。①

金田起义后不久，在侗、瑶、壮、汉各族人民聚居的三江县，就有人以“太平天王先行”的名义，发布反清文告，指出：“乾旋坤转，乃历代之恒情，革故鼎新，实历朝之常事”。而“金夷僭窃，腥膻称尊，玉食中原，夜郎自大，屈正才而沽爵，草野之珠宝皆空；纵贪官以害民，间阎之脂膏尽绝。科粮重赋，今日免而明日收；法律更纷，旗人宽而汉人刻。父老受累，困厄久矣！民人望治，振救甚焉！”号召大家“一德同心”，“以征妖孽”，事成之后，“耕者免赋三年，犯法者宥宽十世”。② 这种历数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压迫的罪恶，提出对百姓“免赋”、“宥罪”的主张，无异太平军从广西挺进江南时所发《奉天讨胡檄》等文告的姊妹篇。

1852年夏，在桂北兴安县的南乡，又有周凤岗、侯尔宇等“拜会聚众马平村，以石生仁、薛老九、王苟晚、蒋方隆等为元帅，头裹红巾，自称洪秀全余党”。并于6月28日攻占兴安城，杀知县蔡映符。旋又攻下灵川县，并乘胜分兵两路，一路与湖南东安县蒋志得部联合攻全州，一路出海洋攻桂林。③

此后，随着太平军向江南发展，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天地会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而广西的天地会起义，更是所在多有。1854年从南京“僭回”广西的罗德全，聚众结盟于永安、藤县、平南，至平乐自称定国王。被人视为“洪秀全余党”，自是情理之常。而同年活跃于平南，到处“纠众拜

① 民国《来宾县志》下编《兵事》。

② 《太平天王先行文告》，见姜玉笙：《三江县志》卷五《文化》。《告示》无发布具体时间。但细按文告内容及三江县史事，当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发布的。

③ 《平桂纪略》卷一。

会”，立有王侯、元帅诸名号的覃阿儿满，也着意“改元太平”。[①] 1851年起于上林的李锦贵与谢秉彝，公开“用太平天国年号”发布文告，号召百姓“蓄发变服”。[②] 直至1869年，转战在中越边境的天地会首领黄廷英，也公开打着洪秀全的旗号，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时人称为“洪秀全余党”[③]。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活跃在广西的许多山堂人物，在思想与行动上对太平天国的向往。所以，他们宁愿崇奉太平天国或者它的大首领洪秀全，而不愿再崇奉一个空洞的、于实际无补的明代后裔“天德皇帝”了。

“顺天行道”、“劫富济贫”，是天地会有关经济斗争的传统口号。除此之外，并无更加鲜明、更为具体的斗争纲领。这种长期落后的状态，直至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才明显地发生一些变化，多少有了一些进步。李文茂在大成洪德三年发布的《平靖王李谕》，提出了他们的斗争目标是：“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大成国威远震，大齐共享太平”[④]。这同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的要变“凌夺斗杀之世……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主张相类似。因此，李文茂在柳州、罗城各地，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出现了“政治聿新，民风为之一变”的清新局面。

纵横于粤桂边区的“开建发匪”陈金刚，1860年率众攻人广西苍梧、岑溪以后，在发布安民告示中，提出了“天下之父母皆我之父母，天下之兄弟皆我之兄弟，天下之田地钱粮皆我之田地钱粮”之说；痛斥“满奴窃踞中华，置我民于水火；豪门复恃势以戕贼人民，是皆天道之不容也”。从而号召人民奋起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陈金刚和拜上帝会凌十八的关系极深，是一个了解太平天国革命主张的天地会首领。他的主张，无疑是太平天国革命影响的结果。

---

① 《平桂纪略》卷一。
② 《平桂纪略》卷二；《股匪总录》卷一。
③ 梁明纶：《雷平县志》第七编，《前事》。
④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编：《李文茂》，15页，1959年11月。

蓄发易服是太平天国实行民族革命的重要标志。金田起义之始，即明令所有拜上帝会众蓄发易服，恢复汉人装束。在杨秀清、萧朝贵联名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首先指出：

>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在《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中又指出：

> 本军师又实情救尔等，尔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剃发从妖，胡衣胡服，甘为妖胡奴狗；足上手下，尊卑颠倒，尔等知否？

可见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蓄发易服。而天地会并不如此。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天地会一般不蓄发，也不注意易服。《堂匪总录·叙》中说："堂匪不蓄发，易趋避也。"这种现象，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就逐步改变了。据骆秉章报告，朱洪英、胡有禄在称王立国同时，即下令部众蓄发，其装束更多仿照太平天国。① 又据有关方志记载，陈开、李文茂、吴凌云等起义时，皆令部众蓄发易服。桂平一带义军，响应大成国蓄发易服号召的，即达数十部之多。黄鼎凤在其发布的檄文中，亦有"满夷入主，汉族含羞，变我衣冠，形容非旧"，因而号召"变服蓄发"的话。1855年，活跃于郁林州，并与大成国暗通消息的天地会周彩观部，也到处号召乡民蓄发。结果，"南则塘岸一带，北则抚康一乡，转红蓄发者已二百村"。② 陈金刚对蓄发做得尤为彻底，以致他及他的队伍被反动派诬为"发匪"。而至今天，广西的陆川、博白与广东高州等地，仍有不少人把陈金刚部误认为"上帝佬"的。总之，如果我们翻开《堂匪总录》一类书籍查看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在广西及湘、粤各地，许多天地会武装因仿照太平军蓄发易服，被反动派诬为"发匪"

① 《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四，《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逆首折》。

② 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八，《纪事编》；卷四〇《宦绩》。

者大有人在。

对待封建神权，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天地会本来崇奉多神，和太平天国的独尊上帝，反对一切神佛有所不同。太平天国起义后，天地会中人虽然不拜上帝，而不少人对原有的神坛庙宇，改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会党武装，就到处"烧毁庙宇"。而陈开、李文茂人桂平，也派人四出"毁坏神像"。大宣里蔡村的三界庙和阡陋庙，就是大成军进驻桂平时派人捣毁的。[①] 类似的情形，在太平军进军江南后也多有出现。如太平军攻克金陵前夕，就有会党中人以"特授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的名义，发布告示说：

> 其有各处庙宇，俱属僧道及嫖赌之资，何如令分与乡里平民之为愈也。现今拿获各处僧道斩首，并查出首领重修之人，亦并查究。[②]

天地会支派的小刀会，更直斥僧尼为品行不端、不耕不种的懒汉。劝人"毋再尊拜偶像，再进庙堂焚香烧纸"，以"樽节无用开支"。[③]

以上种种说明，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当时的天地会起义，不仅在广西，而且在江南各省，都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这在天地会的斗争史上，是一个进步。由此考察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从思想上说，天地会的"反清"主张和为实现这个主张所开展的斗争，曾给洪秀全、冯云山等以鼓舞和影响。这是很自然的。而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它那适应时代潮流和斗争需要的许多新思想，转过来又影响了古老的天地会，并为天地会人物所吸取。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他们接受太平天国新的思想，途径主要有两条，

---

① 罗钰：《重修三界阡陋二庙碑记》；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② 蔡树香：《略纪古事》，引文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本。参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8（11）。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一部分，《小刀会起义文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一是太平军中的某些成员直接参与了天地会的斗争。例如：永安州的罗德全，桂平县人黄舒锦，思恩石塘的韦特七、黄特五、张维常、黄亚七以及湖南人何贱苟等，都是追随太平军出桂作战而后折回广西，转与天地会发生联系的人物。更广泛的途径是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打开了天地会山堂人物的眼界，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认识到从中汲取营养的必要。陈开、李文茂、黄鼎凤、李锦贵等，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者。

四、石达开回师广西的斗争

回师广西的战斗

1859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咸丰九年），正当广西天地会起义逐步走向低潮的时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号称20万的大军，从湖南回师广西，战斗两年半，先后攻占过府、州、县城近30座，掀起了反清斗争的又一股高潮，给封建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

1856年9月的“天京内讧”，造成了洪秀全与石达开之间的“重重疑忌”。为了解决君臣之间的矛盾，石达开采取了“率师远征”以“表忠”的办法，[①]于1857年6月率领号称20万的精锐之师，从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进入湖南，计划取道湘黔边区直入四川，以为立足根本。[②]但在1859年军抵湖南宝庆以后，由于清军的拼死抵抗，几经激战，皆不能克。于是，临时改变作战计划，改道南下广西。

石达开率主力进攻宝庆时，即以军略赖裕新与朱衣点等率偏师游击于湘

① 《石达开布告》，见《太平天国》（二），694页。

② 参看《石达开自述》；《骆文忠公奏议》卷六。

桂边区的东安、全州之间，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作战。清廷急命曹澍钟为广西巡抚，以蒋益澧为广西布政使，率湘军驻防柳州，声援桂林。7月底至8月初，国宗石镇吉、经略何名标率军与敌人激战于湖南江华、永明及广西恭城、灌阳一带。石达开趁机移师南下，由东安入桂北与石镇吉军会合，陈兵于兴安、灵川，并在桂林西、南城外布阵百余里。8月27日，石镇吉以数万之众，围攻桂林。曹澍钟一面率兵练顽抗，一面急调蒋益澧军自平乐回援。由于“勇多疲病”，桂林城内“人皆震恐”，形势本极危急。但石达开不明敌人虚实，迟疑不进。继而敌人援兵四至，迅速形成内外夹击太平军态势。9月2日至13日，太平军在桂林大圩、柘木圩、魏家渡以及兴安之塘埠、百子铺等地为敌所败。于是，放弃围攻桂林，分兵数路，另图发展。[①]

分兵攻略，胜少败多

陶金汤首先率军万人南下，经阳朔、荔浦，与张高友联合，于9月16日攻占永安州。不久，张高友觊觎陶金汤资财，“起意吞并”，乘黑夜将陶金汤杀害，“尽掠所有”。[②] 陶金汤所部被迫撤离永安，转战于平南、藤县、昭平、富川等地，沿途被反动兵勇截击，伤亡惨重。1860年初，由富川转入湖南江华，复被楚军所败。残部“转贺县开山，沿怀集至广东连山，为官军歼擒几尽”[③]。张高友吞并陶金汤部的倒行逆施，不但造成了石达开回师广西的重大损失，也使自己迅速陷于孤立，终至身败名裂的结局。

陶金汤军攻占永安时，石达开亦于9月19日率军自桂林西进，数日之间，克义宁城，入龙胜厅境，随即折向永福县地。时楚军刘长佑部已入全州，萧启江部扑至桂林附近。17日，石镇吉以战斗失利，决定撤桂林之围，于10月初向永福转进。从此，石达开与石镇吉分兵两路，各自为战，未能统一部署、调度，共同对敌了。

---

① 光绪《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平桂纪略》卷三。

② 光绪《永安州志》卷四，《兵志》。

③ 《平桂纪略》卷三。

石镇吉进军之际，石达开已率主力号称10万人，从永福取道永宁州，攻克融县城。“其时世乱已久，(居民) 死亡过半，其存者均伏匿山岩，徙居遥远村落，田野荒芜十之七、八，粮食甚艰”①。为此，石达开率众向西南挺进，于10月15日攻克庆远府城。随又分军向桂黔边区推进，“自罗城至落墨坡，连营二百余里”②。11月29日，分军由六合圩渡河，进驻德胜，逼近南丹。而清王朝认为：石军“偏近黔省都匀，意图由黔入蜀”。惊呼“设令窜入，不惟川省完善地方，遭其蹂躏，即陕西、湖北亦将震动，于大局甚有关系”。③ 身在前线的刘长佑，对当时形势也做了分析。他说：

> 石逆窜匿一隅……若顿兵养寇……使石逆养精蓄锐，将来窜黔窜蜀，锋不可挡；如今留居粤中，勾结诸匪，则粤不能独支，即吴楚亦将多事，大局不可复矣！④

清方上下既然把形势估计得如此严重，其拼死顽抗自不待言了。

但是，石达开并没有集中主力，积极向川、黔发展的打算。而是滞留一隅，以庆远府署为翼王府，居留八个月。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军事上的胜少败多，加以供应日见困难，激起了将士们的失望以至不满。1860年1月13日，左队前精忠先锋陈荣，右队后永忠先锋谭星，中队前精忠先锋周星等首先率队离开庆远，间道经富川向广东连山厅进发，期望万里回师，重归天朝。3月，后旗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也欲离开广西，杀回天京。余忠扶加以阻拦，被部众杀死。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也准备率队东归天京，因事机不密，被元宰张遂谋杀害。但并不能平息广大部众的不满情绪，遏制日益高涨的离队风潮。⑤

---

① 龙泰任纂：《融县志》第六编，《前事》。

② 《清文宗实录》卷三〇二，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谕。

③ 《清文宗实录》卷三〇五，咸丰十年正月初六日谕。

④ 《刘武慎公遗书》卷二，《附陈粤西军情片》。

⑤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三。

石镇吉自10月初撤离桂林之后，在永福稍作驻留，随即率数万之众，从永福走间道，于11月初突入永安州。时州城为张高友所占。为了避免陶金汤事件重演，特令部众不入州城，尽住村圩或“露宿郊野”①。数日后，即分队翻山越岭，经大瑶山西出武宣、象州，向宾州进发。原驻宾州城的黄鼎凤被迫撤出。11月23日，石镇吉进驻宾州城。12月，从宾州分兵出击，赖裕新部入迁江，另以偏师入贵县，石镇吉自率一军攻上林。原归黄鼎凤之李锦贵转与石镇吉联合，受封为澄江县大令。②

1860年2月，石镇吉在永淳县会党首领李文彩的导引下，进攻永淳苏、梁、张三村，不利。遂以国宗石达德率军攻思恩府，镇吉率主力在国宗石镇常、石镇发、石镇全与宰制陈玉良等协助下，自宾州远程奔袭百色厅。3月4日围攻厅城。清左江镇总兵富顺，同知陶兆恩等据城死守。石镇吉虽然奋勇作战，并两度以火药轰塌城垣，但皆未能破城而入。激战一月，石镇常死于城下。宰制曾广依率所部数万人自百色厅北上，先后攻占西隆州与泗城府城。随即分兵两路，一由西隆渡红水河进入贵州兴义府；一由西林直趋云南广南府，转战在滇、桂、黔边区各州县。石镇吉因部众“自相猜忌残杀”，亦率部从百色东进，谋与庆远石达开会合。③ 军入安定土司境时，被土官潘凤岗据险隘堵截，镇吉与陈玉麟等兵败被俘，解至桂林杀害，时年26岁。④

石镇吉率领的太平军，本属英勇善战之师。回桂两年间，攻城掠地，“破大小村寨几千数百计”⑤。但自桂林分军后，即处于独自奋战状态，对地方友军又多采取驱逐或排斥行为，终致全军败散！

---

① 光绪《永安州志》卷四《兵事》。但把石镇吉误记为石达开。

② 《平桂纪略》卷三；黄诚阮：《上林县志》卷九《武备部》。李锦贵受封在1860年2月。

③ 华本松纂：《百色厅志》卷八《补录》；《平桂纪略》卷三。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卷九八，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刘长佑奏；《刘武慎公遗书》卷二《土司擒解贼渠片》，《截剿石逆余匪疏》；光绪《百色厅志》卷八《补录》；《平桂纪略》卷三；卜永春：《安定司潘世侯墓表》。

⑤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兵增饷绌疏》。

众叛亲离，弃桂入川

石镇吉兵败被俘后两个月，即1860年6月8日（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石达开也因“庆远文武厚集团练，坚壁清野，随在截杀”，以致“缺乏粮食”，处境“日益穷蹙”。而队伍长期“回翔游移于宜山、思恩、河池、东兰各属，屡为黔、粤土练所败”。“入黔不能，入楚不敢”。[①] 形势极为不利。于是，被迫放弃驻留了八个月的庆远府城，经忻城南下，抵达迁江县之翔河，以精忠大柱国朱衣点率军攻环村；随又分军入宾州，另有一军在李锦贵接应下进驻上林县。26日，赖裕新率军万人占领武缘县城。各地反清首领如宋扶杆、谢必魁、李青靛等皆率所部与之联合。7月18日，太平军万人取道横州进占兴业县之土狗圩与寨圩等地。陈开率大成军南下，占领兴业县之长盈圩以为呼应。不久，被清军及团练分别击败。

石达开进军兴业，攻取郁林的计划既不能成功，部众的离队情绪再次抬头。7月31日，驻扎迁江良塘之观天燕童容海与精忠大柱国朱衣点、军略彭大顺等合军，包括正统戎张志公、鲁子宏，观天豫郑忠林诸部共约五万人，脱离石达开折回柳州，经雒容走永宁，希图杀出湖南，往江西与太平军主力会师。《平桂纪略》记载这次离队的情况是：

> 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各散贼从之，众数万。六月十五日至永宁，为楚军所败，入怀远板榄圩。七月初五日，分股入古宜。兵练扼河而守，贼不得渡，折入晚田。其在板榄者走永宁三隍，经中渡出扰永福。晚田之贼又分为二：一由灵川七部经兴安、全州入灌阳，逾岭出永明、江华，逃回江西。一由晚田走永宁，使人通款降于巡抚刘长佑。遂汰其老弱及不愿充勇者八千余人，给资遣送回籍。留精壮者三千余人，分五营，以其首张志公、郑忠林、鲁子宏、黄周亲、姚盛甫领之。

①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收复庆远及柳北防剿情形疏》；《兵增饷绌疏》。

张志公为首的队伍共约五万人。他们是到达桂林西北60里的灵川潭下圩时，在敌人“遍发简明告示，准其投诚”的诱惑下叛变投敌的。① 其中多数人反对缴械，自成一军，于9月18日攻入兴安，活捉知县荣志与把总蒋显扬。② 张志公丧心病狂，在刘长佑的指使下袭击这支义军于大榕江，造成“死伤甚众”。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因此而对张志公之流寄予信赖，仍以其“心志未定”，加以改编，“以分其势，而安反侧”。③ 这是一切甘当奴才者的必然下场！

朱衣点、童容海、彭大顺领导的大队伍，8月1日在怀远分兵数支，转战于柳州北部各州县，击败清军及练勇的重重阻拦，于11月在融县合军，攻入湖南绥宁，一路斩关夺卡，“杀妖无数，妖崽闻风多丧胆”者。1861年春至福建汀州及各属县。彭大顺不幸“被妖侵害升天”。至江西后，童容海又“陡起贪心”，杀害同僚。直至同年9月，大队才在江西铅山与从湖北回师的忠王李秀成部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天京，天王洪秀全大喜，给这支“万里回朝，出江扶主”的队伍赐了一个美号，称为“扶朝天军”。④

石达开进军兴业、袭取郁林的计划既已失败，各地部众又纷纷离队远去。为了打开僵局，重振军威，他以赖裕新部为主力，从宾州马岭、上林思陇出昆仑关，谋攻南宁府城。宾州、上林、武缘与宣化各县团绅早在昆仑关设立联团机构，据险扼守。赖裕新军入关后，被敌人分路伏击，未能通过。乃转攻武缘，由伊岭出痕口，于8月10日围攻南宁。时兵数5万余人，妇女居三分之一，战马近3000匹。赖裕新命战士在城东开挖地道攻城。因天雨兼旬，

①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石逆余党窜近桂林剿抚兼用疏》。

② 《平桂纪略》卷三。按：这支队伍数万人，属石达开后旗。9月2日离队，自柳州攻雒容、中渡，东出义宁，9月18日攻入兴安。月底，与左旗一部义军会合，从龙虎关相继入湖南之道州、江华、永明，沿途被敌人袭击，损失殆尽。

③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剿办石党由柳进攻疏》；《石逆余党窜近桂林剿抚兼用疏》。

④ 《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

地道积水，仅挖数丈即止。清左江道吴德澂急调四乡团练入守，太平军则环城树木栅、筑战垒为久围之计。攻战相持几个月，终因粮食匮乏，"野无所掠"。遂自动撤围，转据城外之五塘、六塘、八塘与九塘，经略武缘、上林。①

各地部众纷纷离散，围攻南宁徒劳无功，而大成国势力日益衰败，整个广西的抗清斗争已经转入低潮。石达开的处境更加孤立和困难，部众"十不存二，徒倚宾州谢必魁、上林李锦贵、宣化李青靛互相勾结"②。1861 年 3 月，石达开从武缘入上林，加封李锦贵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大力扫荡县属各地团练武装，以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基地。③ 但是，"达开攻韦村，筑木城六座以困之，不能下。举人周建勋等毁其吕公车，募敢死士袭之，达开大败，辎重尽失"。6月，又相继发生李锦贵病死，谢必魁、李青靛叛变投敌的事。太平军内部，也出现多起互相残杀事件。④ 7月，石达开被迫退出上林、宾州，向贵县转移。⑤

贵县是石达开的家乡，又是天地会活动的重点地区，具有"人和"、"地利"的优越条件。但石达开屡遭挫败以后，常有"隐居林泉"之想。⑥ 昔日的"窥蜀本志"，此时"或亦潜消默夺矣"。⑦ 而敌人"到处悬赏严拿"，使他"无地藏身"，"欲罢不能"。但回驻贵县后，人民群众纷起响应，众至数万。石达开"设翼王府于水源街"，并在城外"连营百余里，北至覃塘、石龙、武

① 《刘武慎公遗书》卷二，《督军追剿石逆余匪疏》；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四，《前事五》。

② 《平桂纪略》卷四。

③ 《股匪总录》卷一。

④ 《平桂纪略》卷四；《股匪总录》卷一。

⑤ 石达开回贵县时间，众说纷纭。民国《贵县志》记在咸丰九年十一月，误。此处据《平桂纪略》卷四；《刘武慎公遗书》卷二。

⑥ 《石达开自述》。

⑦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兵增饷绌片》。

宜，南至桥圩、兴业，壁垒森严，置递相望。[1] 时清军正集中兵力，从黔、郁两江向大成国的秀京进逼。陈开在极端危急之际，曾向石达开求援。石达开派兵进驻距离秀京不及50里的大圩，即顿兵不前。8月21日，秀京陷落，陈开被俘。余众3万余人转投石达开，另部4万余人走覃塘，与黄鼎凤联合。

大成国覆灭以后，石达开的贵县基地顿失屏障。清军迅速集中兵力向贵县攻扑，地方练勇亦加强骚扰。石达开匆忙从贵县西走横州。大成国威国公黄全义又献城投敌，旋被清军所杀。9月18日，石达开率军数万转至融县，在浮石被刘长佑率楚军伏击，身中数枪坠马，险被敌人俘获。10月18日，由怀远越青林界入湖南，开始了向四川的进军。[2]

综观石达开回师广西的战争，开始是浩浩荡荡，众号数十万。但不到3年，却是众叛亲离，势孤力弱，仓猝离去。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农民战争形势，无论在全国，或者在广西，都逐步走向低潮外，还因为回广西是临时变计。所以，入桂以后，既无通盘的攻战计划，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也缺少攻坚取胜的胆略与信念。而且，面对的敌人除清军外，还有遍布各地、据寨坚守的团练武装。加以军纪松弛，既无法处理好军队与百姓的关系，又无法维护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军民之心不齐，军需供给不继。如此等等，都是致败的重要原因。[3]

石达开离桂以后，残留在广西的太平军，或受太平军影响的抗清武装力量，仍然在艰苦中坚持战斗。1862年5月，曾充当石达开向导的壮族西隆州生员韦玉书，聚众攻入西隆旧州，改名定江府，设职封官，以白旗为号。贵州册亨、贞平等地回民、苗民群起响应。[4] 与此同时，太平军余部李七、黄生福等率众驰骋于桂西的田州、东兰、凤山、泗城等地。1863年10月初旬，石达开部宰制李福猷、元宰李辅、军略曾贵等率众从贵州回广西，一度攻占

---

① 《石达开自述》；民国《贵县志》卷一七，《前事》。
② 《平桂纪略》卷四。
③ 参见拙著《太平天国人物·石达开》。
④ 《平桂纪略》卷四。

龙胜厅城，杀清总兵胡元昌。17日，自兴安趋灌阳，转战于湖南道州与广西富川、贺县、怀集以及广东连山等地。而从广西深入贵州的李文彩部，一直坚持斗争到1872年。

清王朝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曾经为自己的死里逃生而欢欣鼓舞，讴歌为所谓“中兴”。但历史说明：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石在，火种是长存的。

第六章　“中兴”声里有惊雷

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者死里逃生，自以为迎来了一个“中兴”的时期。为了修补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疯狂地向人民反攻倒算。因此，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这时候，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魔手已经伸向广西，新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人民虽然无法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战斗，但各种各样的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息，广西大地，依旧是惊雷四起，地火漫燃，世界并没有太平。

一、所谓“同光中兴”

一篇自欺欺人的奇文

1883年（光绪九年），广西巡抚倪文蔚作了一篇《皇清中兴圣德颂》，请人摩崖勒石于桂林象鼻山东壁上。它使用美好的词藻，颂扬清王朝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所谓的“中兴功业”，认为从此以后清王朝的天下可以永保太平。为

了便于说明问题，容先节引如下。文曰：

咸丰初元，洪秀全倡乱广西，踞金陵伪都，纷扰十有六省；岛夷乘之，京师震惊。穆宗毅皇帝嗣位时，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改元同治，奉两宫皇太后临朝，首诛奸佞，任贤兴功。既收金陵，各行省次第奏凯，群盗悉平。举山陬海隅，胥纳轨物，越十有三年。今皇帝冲龄继统，上秉懿训壹准故事，中外熙熙然以升平为乐。臣幸际时会，巡抚是邦，进问父老肇乱所由，时移俗易，旧染维新，益知圣德神功，无远弗届矣！

于是，“拜手稽首而作颂曰”：

於铄圣清，重离继明，垓埏砥平。三管[①]之隅，实生枭徒，揭竿一呼。凶焰鸱张，逾岭浮湘，遂趋建康。中原沸羹，外患潜萌，首尾纵横。天兆中兴，明示休征，三光烛腾。桓桓穆宗，祗奉两宫，罚恶赏功。庙谟同参，既收江南，余孽用戡。恩威所加，覃及欧巴，殊俗一家。星纪刚周，克集大猷，钦哉睿谋。我皇绍基，端拱无为，式是母仪。于今九年，寰宇晏然，惠敷穷边。诗美车攻，书纪祭肜，羞与比隆。作此颂辞，万祀咸知……[②]

只要把这篇颂词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相对照，不难看到，它不过是封建官绅盲目的歌功颂德，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奇文。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中兴”幕后的衰象

清帝国的咸丰、同治两朝，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对外投降卖国，苟且偷生，哪有什么可供赞颂的“功德”？而经历两次鸦片战

---

① 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六〇载：唐咸通三年（862年），以岭南道分置岭南东道与岭南西道。广西与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属岭南西道，以邕州为治所。下设桂州、邕州、容州三管经略使。史称“三管”。

② 引文见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内部资料）下册，363～364页，1977。

争和借“洋师助剿”太平天国革命，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但进入沿海主要口岸，还深入长江内地，国家主权丧失，半殖民的灾难日益严重；就在歌颂所谓“中兴”的1883年，法国势力已经侵入越南北圻，侵略者贪婪的眼睛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的广西、云南，边防危机四伏，后顾堪虞！凡此种种，又哪里有什么“中兴”可言?!

就广西而论，自从雷再浩、李世德起义，至吴凌云、吴亚忠失败，20多年间，人民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从未间断，战火遍及全省广大城乡。两相较量的结果，造反的人民被打败，社会的生产受破坏；封建统治被削弱，进一步濒临崩溃的边沿。经历长期战乱以后，人民或死或逃，广西人口锐减。同治中期以后，虽云战乱略有缓和，而人民仍难得到有效的休养生息。到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全省人口回升至510万，仍比1851年（咸丰元年）减少270多万人。① 两年以后，几经招抚，全省人口增至“一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九户，大小男丁四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三十九名，妇女三百四十一万四千八十七口”。合计750余万，② 仍未达到1851年780余万的水平。人是社会生产力首要的和能动的要素。人口锐减，劳动力大量丧失，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的衰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早在1852年，清刑部主事郑献甫就明确指出：清廷滥征丁壮和清军纪律败坏，已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他写道：

> 频借民兵代客兵，荒郊从此少深耕；
> 大盗自梳兵自篦，明珠为米桂为薪。③

刘长佑于1860年（咸丰十年）出任广西巡抚，专责镇压广西农民起义。6月15日（四月二十六日），他在给清王朝的奏报中也说：

> 粤省连年贼寇纵横，百姓流离转徙，不安其生。间有筑寨固守，差可自保。然田野益荒，庐舍为墟。死于锋镝冻馁之下者，亦不少

① 据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卷，129页。

② 马丕瑶：《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一，《奏复广西民数谷数片》。

③ 《补学轩诗集》卷四，《壬子书事八首》，咸丰十年刊本。

矣！……至贼过之后，地方无官弹压，则又受虐于团总之贪暴，被戕于土客之仇杀。日朘月削，莫有底极，此生民之困也。[①]

在另一份奏报里，刘长佑还谈到：从桂林府属之永福县，到思恩府属的迁江县，五六百里间，官马大道两旁，“绝少人烟，遍生榛莽”[②]。他把造成社会残破的原因，首先归咎于“盗寇纵横”。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封建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才是社会残破，民生涂炭的主要原因。类似刘长佑所说的社会现象，当时遍及广西广大城乡，绝非出现在个别地区。且看事实：

桂北的融县，咸丰中期以后，境内“日行焚杀，路无行人”。百姓被迫“停耕，多避异域”。东乡一带，同治以后，田亩“久经荒芜”，昔日产粮之区，到处“一片蓬蒿”。饥民在战乱中“携女偕男力作，将人代犊扶犁”，也逃脱不了饥寒交迫的痛苦。[③]

桂西北的凤山县，咸丰中期，已是“田地荒芜，人民饥馑，逃散一空”。时人有“干戈扰攘万民艰，翻新十里埋千冢”之叹！[④] 还有泗城府所在地的凌云县，自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也是“善良安身无地，豪恶大胆包天”。百姓“吞声忍泪，不知凡几；荡产倾家，诚无数矣”！[⑤]

桂西南的太平府，经历20年的战乱以后，城厢内外，“颓垣断壁，荆榛灌列”。府衙破坏，“瓦砾之外，宿莽过人，猛兽毒虫踞其中……鹗鹏昼号，蝮蛇当道”，一片残破景象！[⑥]

桂南的永淳县，大乱以后，“生民涂炭，无家可归，无田可种，父子或不

---

① 《刘武慎公遗书》卷二，《兵增饷绌片》。

② 《刘武慎公遗书》卷二八（上），《札谕》，《札议垦荒复汛》。

③ 据融县大良石大亨：《天桥岩团寨碑》，见拙文《几件有关石达开回师广西的碑刻》，载《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 黄文观纂：《凤山县志》第七编，《前事》（二），《兵革上·事迹》。

⑤ 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姚复蛟、向祖基《立禁约碑》（抄件）。王熙远同志抄示。

⑥ 徐延旭：《重建（太平）府署记》，同治十年正月立石，碑存今崇左县太平镇南街。

相见，兄弟、妻子离散；间有相聚者，多在河岸搭棚而居。贫者相继死亡，富者资财日尽，凄凉万状”①。

桂东南的平南县，咸丰年间，各乡已出现了“田野抛荒，米价腾贵，且无路籴买”的现象。其后“乡民逃亡初归，灰烬之余，颓垣败井，荆榛丛生。栖身于剩瓦之檐，求片箔遮拦不可得。豺狼枭獍杂然嚎嗥，日将夕村巷已绝行人，重以冻馁，无贫富贵贱。少壮老弱死亡相继，虽邻舍不遑吊问。有力者或得一薄棺，否则藁葬而已！乡民穷极困苦，团费更无可筹”。②

苍梧毗邻广东，因为战乱，“省河道绝”，粮道中断，“城中粮尽，饿毙者大半，饥民至析骸以爨”。③

省城桂林，从咸丰至同治年间，多次发生地震，灾害频仍，是以连年谷贵，“饿殍载道”④。

上述种种，源于封建统治阶级压迫造成的社会创伤，既然十分严重，而且遍及全省，绝不会因为造反人民的失败而迅速得到医治，正反映了封建统治危机的更加深重。“中兴”云云，岂非梦呓?!

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从封建统治内部考察，所谓“中兴”，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粤西地瘠缺累，州县不能赡给者十常三四”。这本是历史上的老问题。而州县官“明目张胆贪索”，遇事“有司讳匿不报”；吏治不饬，亦由来已久。咸丰以后，“江面不靖，关税短缺”；“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州县不愿到任视事”。是以“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又常令统治

---

① 《永淳县主刁汝元禀》，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下册，315页。

② 周寿祺纂：《平南县志》卷一八，《团防录》。

③ 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一八，《外传纪事下》。

④ 黄泌纂：《临桂县志》卷一八，《前事志》。

者太息不已！[1] 统治阶级中人各为一派、一己之私，同床而异梦。遇事彼此推诿，趋利则互相倾轧，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时人有句云：

救灾恤邻古大义，此道今人已全弃；
纷纷同室尚操戈，何况生居各异地？[2]

至于官贪吏索，亏空短缺，更是普遍现象。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根据前任广西巡抚李秉衡的参奏，追查“亏缺交代”的地方官员，一次就查出了已卸、已革或已故的容县、荔浦、富川、阳朔、昭平、义宁、迁江、恭城、柳城、北流、西隆和郁林十二个州县的知县或知州共十三人，勒限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在四个月至半年内完缴“前在各本任、署内亏欠银米，以重库款”。[3] 而那些尚在任内，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亏欠银米”的州县官僚，谁也无法参奏。1898年出任广西巡抚的马丕瑶，发了一通《禁地方官苛项告示》，他说：

民间疾苦，厥有积弊数端：一为游亭苛敛；一为到任占口；一为查办保甲，按户勒费为难；一为差役奉票，要夫猛如贪狼。全行一律示禁，通饬佐杂印官，无许再蹈前辙，须知体恤民艰。本院不时察访，有犯定即究参，并许来辕控告，惩治决不稍宽。[4]

“告示”虽然振振有词，但也是见雷无雨的官样文章。苛法积重难返，岂是一纸公文能够解决的。

当时，因为广西处处有事，而财政极端困难，故每有警报，“调兵则不敷分拨，募勇又难筹经费。于是专以堵剿之事责诸乡团”[5]。但团练内部，也是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② 王南鹏：《赠北流隆盛局绅士七古一篇并序》，见封祝唐等纂：《容县志》卷二七《旧闻志·前事下》。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八七。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谕。
④ 《马中丞遗集·杂著》。
⑤ 《劳崇光手札》（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致王拯函）原件，藏广西桂林图书馆。

矛盾重重。“办贼不足，为匪有余”①。说明非团不可，有团亦难。而中英战争以后，鸦片流毒失禁，官僚、地主直至军队的官兵吸毒者日多；在少数民族地区，烟毒的泛滥也十分严重。据有关方志记载：桂西镇安府各地，“自鸦片盛行以来，饮吸逾半。凡宋之峒丁、明之土兵、狼兵称为犷悍强壮、屡资调遣者，今则尪羸瘦弱，面目黧黑，半归无用”②。清王朝在地方的统治基础被腐蚀，封建的国家机器也被削弱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隐忧还来自国外。就在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大开杀戒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侵略者继入侵沿海口岸之后，正处心积虑进窥广西腹地，把梧州、桂林、浔州等处作为下一步的侵略目标了。

1859年2月24日（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突然有英、法船艇五艘，在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 S. Parkes）、提督斯托宾齐（V. Straubengee）的率领下，载士兵约300名，以“游览山川”为名，闯入梧州三角咀河面，约见驻扎在梧州，专责镇压大成国起义军的广东北路提督崑寿、已革梧州知府陈瑞芝，梧州协副将王海清，以及苍梧县知县邵凯等文武官员。随即登岸，取出所带之广西舆图，到处察看，并询问桂林、浔州途程、河道。复“赴各街市游行，在城外五显庙码头步量街段，又至郡城对岸登大山顶，照千里镜，绘画地图，旋即回船”。第二日始开船而去。这种举动，显然是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已经攻陷广州，另支侵略军已经直逼津沽。清王朝被迫与英、法、美、俄诸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约文虽有英人、法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士可入内地传教的规定。但条约尚未互换，不能视为有效，而且条约并无允许外人驾驶兵船深入内地的规定。可是，面对这种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地方官员崑寿等非但不予抗议，坚决制止，反而登船拜晤“夷目”，复在衙署接待“夷目”的答拜，还“差人致送猪羊等物”，以示慰问，而不以丧权辱国为耻！无怪乎

① 《刘武慎公遗书·札谕》卷二八（上），《谕柳州团练》。

② 羊复礼等纂：《镇安府志》卷八，《风俗》。

“夷目”深意地表示“现经议和，即系一家，不妨到处行走，俟秋冬之间，尚须出游”了![1]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等侵略者阴谋把梧州增开为通商口岸虽然没有实现，但1897年梧州开埠时，外国的领事馆正设在他们曾经登上“照千里镜，绘画地图”的白鹤岗上。说明开放梧州，早在侵略者的贪婪谋划之中，这是陶醉于所谓“中兴”的封建官僚无法察觉的。

总之，当清朝封建统治者从农民起义的漫天烽火中死里逃生，弹冠相庆，侈谈“同光中兴”之际，正是它的统治在政治上更加腐败，经济上更显萧条，军事上更见虚弱，人民生活更加困难，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之时。这些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清帝国在同治、光绪之际，并非“中兴”，而是进一步走向大衰大落的灭亡之路。

二、开办厘捐，误国病民

广西厘金税的开办

封建统治者一面高歌“中兴”，一面却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其中最关重要，而且为害最大的是推行厘金税制，实行所谓的“抽厘助饷”，残酷地剥削人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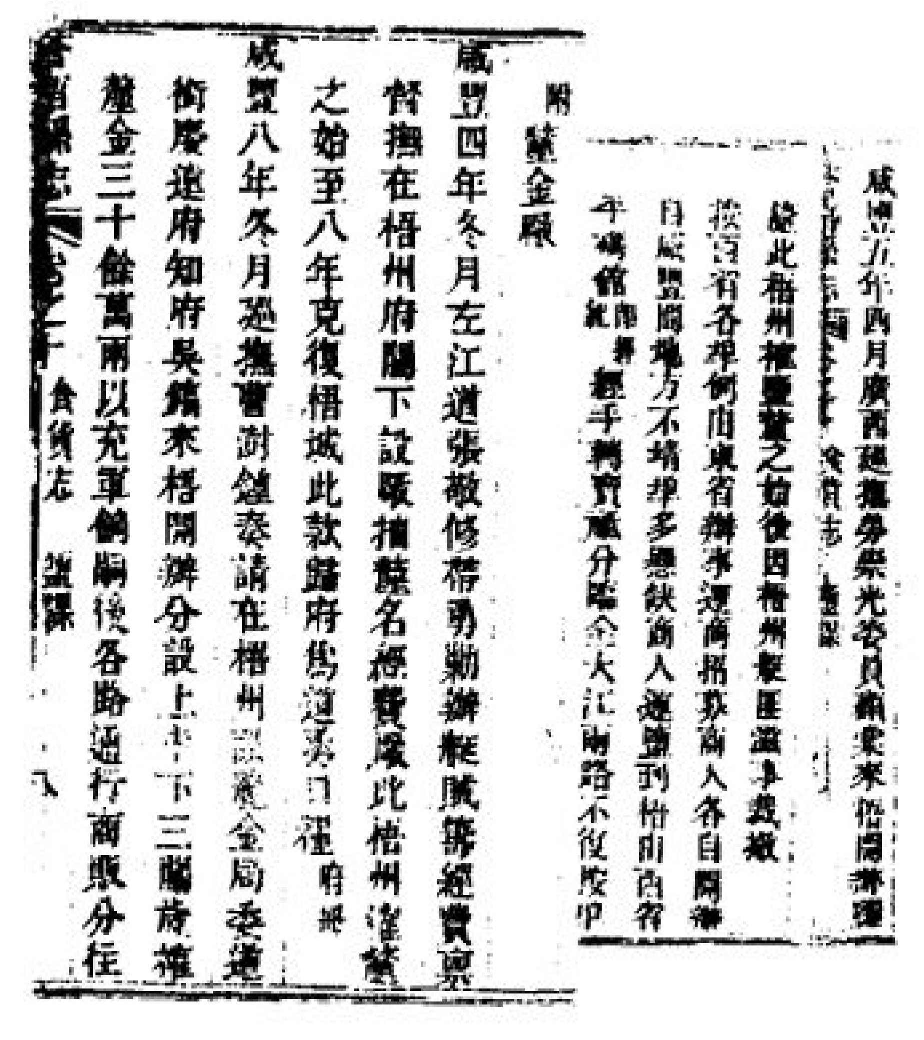
厘金税创于1853年10月（咸丰三年九月）。清朝帮办江北军务雷以诚以军饷不继，在江苏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的米行首先开征厘金税，作

---

① 参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五，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广西巡抚劳崇光奏。

② 关于广西推行厘金历史，参见拙文《广西厘税史略》，见《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为募勇、养勇，镇压太平军的饷源。[1] 第二年夏初，征收范围从米行扩及各商行铺户。清王朝以“抽厘助饷”能应付财政危机，特谕令江南、江北各大吏商酌办理。同年冬，清钦差大臣胜保奏请用兵各省开征厘金。于是，全国各地纷纷仿行。从此，厘金税成了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税制。它破坏社会生产，为害人民生活，阻碍社会进步，影响极坏。


咸豐九年四月廣西巡撫勞崇光委員赴粵來梧開辦釐
錄此梧州權釐之始後因梧州釐廠滋事裁撤

附 釐金廠
咸豐四年冬月左江道張敬修帶勇剿辦艇賊籌經費稟
督撫在梧州府關下設廠抽釐名經費廠此梧州設釐
之始至八年克復梧城此款歸府為道署口糧
咸豐八年冬月巡撫曾對鹽奏請在梧州設釐金局委道
衔慶遠府知府吳錫來梧開辦分設上中下三關
釐金三十餘萬兩以充軍餉嗣後各路遍行商販分任
蒼梧縣志 卷之十 食貨志 雜課

广西开征厘税的记载

广西开办厘金税，据1864年10月30日（同治三年十月初一日）朱批广西巡抚张凯嵩折，谓始于1858年11月（咸丰八年十月）。[2] 但早在1854年冬或次年春间，左江道张敬修因带勇驻梧州“剿办艇贼筹经费”，即禀请在梧州府关下“设厂抽厘，名经费厂”。据认为“此梧州设厘之始”。[3] 但是，因为“艇贼”活跃于江河，商旅却步。设厂抽厘，“办无成效”。而广西在雷以诚倡办厘金仅一年，即在梧州

---

① 据雷以诚：《请推广厘捐助饷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七。但杜文澜在《平定粤寇纪略》卷二中说：雷以诚“因江都之仙女镇各会馆旧有抽厘金章程”，遂于咸丰三年六月仿行。并志此以供参考。因为当时是向日用必需品抽取货值百分之一的税款，故名厘金。

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22页云：广西厘金创于1858年11月劳崇光任两广总督时。创行时间想即本此。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从此说。按：咸丰八年两广总督为黄宗汉。劳崇光于咸丰九年四月始以粤抚兼署两广总督。

③ 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十，《食货志下·杂税》。

设厂抽厘，却是事实。它比江苏以外的许多省份都要早一些。① 说明这种误国殃民的税制一经提出，广西的封建官僚为了镇压人民，挽救垂危统治的需要，即竞相效尤，推行惟恐不速了。

1855年夏，广西巡抚劳崇光仿照户部有关抽厘助饷章程，命顾棠在梧州开办盐厘。② 不久，陈开、李文茂率大成军入广西。蒋益澧督湘勇入桂镇压。以勇饷不足，常有停兵待饷之优。劳崇光乃饬所属司道局员，于桂林、平乐、梧州三府出入要口设卡征收盐货厘税，以济军需。1858年冬或次年初春，复参照湖北省抽厘章程，于郁林、浔州二处设卡抽收厘税。③ 1863年，又于柳州、南宁、庆远等府续设厘卡，抽收盐货各税，以济饷源。第二年，北流亦设厘局。④ 至此，广西大部分属府，都在“济饷”的名义下开征厘金税。

因为厘税之设，主要出于军事需要，所以开办之初，多由各地粮台、军需局或筹饷局等机构经理其事。1868年（同治七年），广西厘金总局在桂林成立，专司厘税事务。总局之下，于全省各府及主要州县与交通要口，另设局卡，局卡之下，再设分局、分卡等，具体经理地方厘税事务。例如：1869年，百色同知姚翔之设卡抽厘，“由省遴员专司其事，正卡东滨江，别置南卡、北卡于水陆要道。东卡于恩隆县南门外”⑤。藤县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设厘金局于北流江口，专抽绣江过往商税。另于濛江圩口设饷捐局，为全省税收主要局卡之一。⑥

---

①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载，清代各省创行厘金时间，湖南、江西、湖北、四川在1855年，奉天、新疆在1856年，吉林、安徽、福建在1857年，直隶、河南、甘肃、广东、陕西、山东在1858年，山西在1859年，贵州在1860年，浙江在1861年。

② 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十，《食货志下·盐课》。

③ 参看清《盐法志·两广志》卷一七，《征榷》，广西巡抚张凯嵩等奏。

④ 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北流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事。

⑤ 华本松：《百色厅志》卷五，《经政·榷税》。

⑥ 何亮辅纂：《藤县志稿》（手抄本）卷三，第九章《经济》，第一节《税收·国有税收》。

广西开办厘税以后，全省到底设了多少局卡？人言言殊。据官方统计，至1872年，全省设立的厘税正卡与分卡即达86处之多。第二年报裁分卡27处，也还有59处。① 实际上，征收、稽查及缉私机构远不止此数。因为，征收厘税不但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也是各级官员借“抽厘助饷”之名，行勒索中饱之实的重要途径。在机构设置上，局卡之外，还有所谓分巡、巡卡以及巡船、炮船直至“税筏”等稽查、缉私机构。而官设机构之外，活跃于各地的山堂、帮口，也多有私自设厂抽厘征税的。② 所以，咸丰以后，广西的厘税之征，真是厂外有厂，卡外有卡，公设私立，遍布全省，构成对商贩与广大升斗小民“密若网罗”的朘削网。③

“抽厘助饷”，百物俱税

厘税初设，不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其后，迅速发展为“遇物抽捐”。按照清政府户部规定，厘金税共分四大类，曰百货厘、盐厘、土药厘及洋药厘。④ 广西开办厘税，以百货厘及盐厘为最早，而百货厘征收最为广泛。通常所谓厘金，主要指货厘而言。据《广西省财政说明书》上册《省税部》记载，广西课百货厘，共有谷米、竹料、果品、皮料、毛类、牲畜、矿产、瓷货、油类、食品、颜料等29种，1942项。其中杂货类分项最详细，计货物

---

① 刘长佑：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厘卡未便尽裁片》，见《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一六。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上册第362页中说：广西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停办厘税前，除厘金总局外，全省共有局卡56处。

② 据《藤县志稿》（手抄本）载：与濛江设厂抽厘同时，又有“匪盗”设厂于老鸦塘征收出入商船税的。

③ 宣统元年《广西谘议局第一届决议案》。

④ 按清政府户部规定：四类厘金应自成系统，不得相混。但在广西，除盐厘创办伊始即自成一系外，土药厘与洋药厘都曾一度与百货厘相混。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洋药厘归入海关税项。1890年，土药厘与土药税并为一税。封建统治者对鸦片征税，称进口鸦片为洋药，土产鸦片为土药。

355项。次为药材，有271项。再次为服饰、服用、木器、纸类，各100余项。少者如谷米类，5项；茶类，5项；烟类、竹器类，各6项。由此而观，何止百物俱税？

厘金初创，只分活厘（又称行厘）、板厘（又称坐厘）两种。其后江苏、安徽、湖北、甘肃等省，演变为遇卡纳税制。广西的一些地方，虽有抽厘“分为三等，曰出山、过境、落地。出山、过境则抽收，落地则免税”之说。[①] 但实际执行时，也多是遇卡纳税。局卡征收厘金，都用从量纳税法。税章由厘金总局制定颁行，内列应征厘金货物种类，又于每项货物下载明数量并应纳税额。货物数量则按斤、按件、按桶、按篓、按包、按匹等计算。[②]

厘金之行，已属额外征商之税。顾名思义，利率应为值百抽一。但实际征收，则远非此数。一般税率为值百抽二。因系采行遇卡抽厘办法，货物流通，若以三、四卡计，往往高达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有些地方，也有高达百分之二十的。[③] 这是法定征收之数。正厘之外，尚有随收公费。至于额外征收，税吏贪索，更不在少数，常有“多于正税七、八倍”者。[④] 各地税卡征税时，税票由总局印制。广西使用税票，一为存根，一作报院，一呈总局，一交货商收执。为防商人私运，税吏舞弊，所经税卡，皆需查验。若发现货高于票载之数，即为商人有意带私走脱。依规定将私货充公。纵然如此，税吏受贿放纵，商人营私偷税、漏税者仍有不少。而沿途检验手续繁琐，税吏借题刁难勒索，又常使正当商人叫苦不迭。

---

① 梁培瑛等纂：《贺县志》卷三，《政治部·厘金统税》。

② 厘卡查货办法，十分复杂而无法一律。遇货首测重量，先以货舱之长、宽、深度相乘，求得货舱容积，然后乘以各项货物特定之“因头”，又称经验常数，即得该仓货物之大致重量。但同样货物之经验常数，亦因地而异，并不一致。如白米之“因头”，在贺县税卡为0.6，梧州、浔州、永淳等税卡为0.65，昭平、郁林、博白、北流、南宁、横州、龙州、恩隆等卡为0.7，庆远税卡为0.8。

③ 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二九《纪政·食货中》。

④ 宣统元年《广西谘议局第一届决议案》。

广西自1854年开办厘金，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改办统税，历年征收正税多少，随收公费多少？大多年份缺载。从《广西财政说明书》、《光绪会计录》等查考，“现存广西厘金报告，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中，仅存二十四年，余十六年俱缺。历年收数，除光绪最后两年外，俱在五十余万两之间。以增减趋势言，光绪十八年以前，各年之收数较高，年约在六十余万两至七十万两之间。十九年至二十九年，年收数较低，年仅有五十余万两，超出六十万两者仅有一年（按指光绪二十七年，各卡收入正税为639644两——引者）。光绪三十年起，征收数复增至八、九十万两”①。

食盐乃人们生活所必需，有必要说一下盐厘的问题。1871年4月至次年4月（同治十年二月至十一年二月）。广西在“酌减盐厘征收”的情况下，原定盐道递年征银75520余两。但在临桂、全州及大江征收的结果，年仅得银50020余两，尚不敷额银25499两。1872年以后，决定在贺县、怀集（今属广东）、南宁、永淳（今归横县）添设四卡开征，以资弥补。一年期满，共实征银仅11117余两，尚缺额银14382余两。究其所以，“实因各府县地方凋敝，水客贩运不前”云。②

厘捐的误国病民

厘金之扰商病民，为害社会，从它创行不久，就有人指出：“雷以諴连年以养勇为名，滥开捐局，无裨兵饷，徒朘民膏。”③ 或曰：雷以諴开办厘金，“各省皆循行之。军兴十余年，士马得资饱腾，厘捐之裨不浅。然民间百货昂

① 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附录一《统计表·第九十八表》。在该“统计表”中，还列举了同治二年及四、五、六、七年的各卡正税、随收公费与两者总计的数字。

② 《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一六，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厘增税拨补足额片》。

③ 李滨：《中兴别记》卷二六。

贵，亦困于厘捐也"[①]。广西自创设厘金以后，其重要祸害之一是破坏了农业生产，给洋米进口以可乘之机。请看1878年御史邓华熙的一份奏报：

> 广东粮不敷食，向借广西接济，自广西设立厘厂，来东谷米节节抽收，除厘金、水脚、耕本及一切费用外，略无盈余，民多辍耕。于是广西谷米来东者少，广东遂借资洋米，岁渐加多。……请饬永远停止谷米厘金。

光绪帝载湉以所奏是否可行，着两广总督刘坤一、广东巡抚张兆栋和广西巡抚杨重雅“酌度情形，奏明办理”[②]。但并无成议。五年以后，兵部侍郎许应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 广西民贫地瘠，所产谷米尚多，向来运往广东销售。近因广西厘金过重，有落地、出山、入境、出境等名目，计每万斤须完银十六两零。广东行销之米，均自洋船运来，西江米艘几于绝迹。请将广西谷米抽厘永远豁免。

光绪帝虽然认为“该侍郎所奏不为无见”，但也只是着两广总督曾国荃、广西巡抚倪文蔚“悉心体察，妥筹具奏”。[③] 而倪文蔚的奏复是：“广西谷米抽厘，尚难停办。”[④] 到了1894年，御史钟德祥进一步奏报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

> 广西谷米运济广东，自抽取厘金以来，成本更重，无利可图。复以洋来谷米，豁免厘金，日增月益，西米不得畅行下运。愚氓遂以作苦为徒劳，去田逐末，舍业改操，以致去年广西偶遇偏灾，反向湖南乞籴。

光绪帝览奏以后，依旧是着巡抚张联桂“体察情形，妥筹办理”。[⑤] 结果也是

---

①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二。典按：杜文澜时任两淮盐运使，在江北军中。

② 《清德宗实录》卷六三，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六一，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一六六，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谕。

⑤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三，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谕。

不了了之。

至于厘税扰商病民，税吏差役无恶不作，更是所在多有。且看给事中刘曾的一份奏报：

> 广西梧州府向有额征府税，该府于正额外，巧立缉捕经费名目，以供馈送上司之用，所余尽饱私囊。厘局众多，弊端更大，局员等蒙混侵吞，差役勒索阻道，以致物价腾贵，商民俱困。又：该省各府、州、县地丁钱粮，竟敢私自加增，泗城三属尤甚。纵容书役，朘削百姓，大为民害。

据说，当时官吏差事，咸以厘局为最优，委员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如当一年厘局差’之语”。[①] 亦有因开设厘局争权夺利者。[②]

1898年，变法维新的大首领康有为在西江旅行，即曾目睹并身受其害，他写道：

> 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
>
> 夫厘税之征……积弊日深，害民日甚，卡厂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托为巢穴。每省厘卡百数，吏役数千。……以二十行省计之，不下十万人。皆仰给于此，吸民脂血，倚势作威，胁索诈赃，肆其荼毒，无所不至。臣为粤人，奔走四方，躬常目睹。佛山、三水之厂，以小民携带鱿鱼、墨鱼数斤，或洋伞、洋毡……固民间之常，即全船扣留，诈罚无数。搭客数百，皆为阻误。胥吏咆哮恐吓，锁拿逼辱。小民畏罪，如数而偿。得赃放行，饱其私囊，否则船货充没，锁禁反加，或且鬻卖子女，以偿罚款。如斯之类，殆难悉数。

---

①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曾奏，分见《清德宗实录》卷一〇六；《光绪朝东华录》卷三二。

② 如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北流日记》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记云：“赴关回署，适（郁林）州局函来，欲借关局为厘局，意欲与县官争利也，草书却之。”

臣尝带有洋布大帐，亦遭扣罚。臣犹如此，何况小民？厂役手持铁条，逢货乱扦，颠囊倒箧，破毁器物。若预贿私，一视即行。否则虽无私货，无可诈赃，而货物散毁，失败更甚……①

西江下游的广东佛山、三水如此，则西江上游的广西各埠也难以例外。龙州为边防水陆重镇，乃昔日左江商贸繁盛之区。自清咸、同间开办厘金以后，②官绅役吏亦多借机贪索，以致民怨沸腾。1871年，冯子材驻防龙州，商民纷纷具文投诉徐延旭等贪勒劣迹。冯子材写道：

自徐任事以来，广揽旁搜，大开利薮。凡龙属边卡，如平而、水口两关及哥村汛坳，分设厘卡三座；又在州街水陆要口设立船埠，派官亲赵廷元充当委员；私设公局，派劣绅苏成春等充当司事。见船见货，逐款抽厘，违者加十倍罚，按月解回府署需用。每年所获，何止万金？迨左江道周誉委员清查，徐则谓去年业已停抽，而官亲司事仍勒收如故。臣每一公出，辄有商民纷纷叩马投缴私厘票照数十张。哀怨之声，哗然在道。③

1909年《广西谘议局第一届决议案》也指出，厘金、统税之扰商病民，非法重征者凡十，曰留卡、短期、勒票、更名、谷米、猪只、板木、扣留、拦截及土货，“其于商民之脂髓，敲剥殆尽”。厘金“百物皆征”，而百货产自工农。抽厘所得，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于加强封建国家机器，所有借厘金横征暴敛产生的一切恶果，无不直接或间接转嫁到百货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上。康有为在前引的同一奏折中写道：

若夫土产杂品，农民备极困苦而成之，赢利微末，而密卡搜刮，得不偿失，故以土产寡枯，农工束手。

“农工束手”，必然使社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痛苦。至于这一特殊税制的推

① 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奏请裁撤厘金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

② 叶茂茎纂：《龙州县志》卷七，《经政略上·盐法上》。

③ 《冯宫保军牍》卷七，《特参知府劣迹折》。

行，阻碍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洋货的入侵，从而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等等重大问题，当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再作论述。

总之，厘金税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镇压人民起义而兴办起来的。这是地主阶级向人民敲榨勒索，进行反攻倒算的重要手段之一。误商病民，为害极大。而其结果，又势必招致人民的广泛反抗，把清王朝推向难以解脱的政治困境。

三、反攻倒算种种

面对社会残破，民生困顿的局面，清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与民生息。而是变本加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疯狂地向人民反攻倒算。

夺田与增租加赋

夺田，是封建地主阶级向人民反攻倒算的重要手法。

农民起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土地。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地主或死或逃，农民乘机夺取了地主的土地；或变佃耕为自耕，拒绝交租纳粮，是起义高涨时期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地区，地主团绅为了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或者为了筹集“团练以护身家”的经费，被迫以极低贱的价格，出卖土地，从而出现了“富者骤贫”、“贫者骤富”、“贫富陡然易象”的事。[1] 这种情况，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广西是相当普遍的。

---

① 石大亨：《天桥岩团寨碑》说咸丰年间融县的情况：“南亩久经荒芜，西畴一片蓬蒿，请锋团事费难逃，贫富陡然易象。”注云：团费“无从出处，将田变卖，价极低，按咸丰七年，（每亩）二、三百文不等，或一百，或数十文，故富者骤贫；而贫者买获田数千（斤），多有拍（白）手起家，故贫者骤富”。

但是，当太平天国离开广西，进军江南以后，各州县的地主卷土重来，使用各种手段，抢夺已经失去的土地。例如，贵县六屈村地主，拜上帝会的死对头周凤鸣，[①] 就使用强制的手段，从石达开亲戚的手中，夺走了石家的田地。陆川县团总陈栋龙、伍铁钱，将所有追随赖九起义的赖姓人家的田地充公，作为祭祀被杀团勇的祭田，或作“元宵会”的会产。博白县的地主团绅把参加拜上帝会者的田产没收以后，或充作东岳庙香油田，或充作宾兴田。郁林州蛤母垌张姓人家参加了太平军，田地亦被没收，充作“义勇祠”的祭田。[②] 至于桂平县金田韦家200多亩田地被没收，全部充作宾兴馆的产业，那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官绅联合夺田的罪证——「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碑照

有些学田、庙产，由于变乱，租佃关系一时无法确认，地主团绅则通过“查田”的办法，从所谓“隐匿”或者“占据”的佃户手中夺回去。桂平县浔阳、桂邑两书院的田产，金田起义以后就有半数以上转归佃户所有。大成军在桂平失败以后，桂平知县徐延旭立即纠合士绅，亲临实地查核，强迫佃户将田地点清，并“丈量绘图”，勒石为记。[③] 这种官绅联合，向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当时遍及广西全省。1875年6月18日（光绪元年五月十五日），

① 《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年（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事。

② 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九，《太平军北上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的迫害》。

③ 徐延旭：《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同治六年初冬立石。参看由笔者执笔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见《文物》月刊，1975年第1期，收入《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一书时，对个别字句作了修订。

广西巡抚刘长佑在《清复州县粮额请奖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写道：

> 粤西兵燹叠经，地方凋敝，田土荒芜，各属应征钱粮多半缺额，而南宁府属州县为尤甚，亟应召垦清丈，以复旧额。……现任藩司履任后，查各州县征册，因被匪扰，多有毁失。……以致应纳钱粮，隐匿拖欠，完者寥寥，相习成风，几不知完粮为何事，若再任日久蒙混，不但无可催科，且于民风大有关系。是清查粮额，实为善后一大端。迭经该司严饬各该州县会同委员设法实力查办，以清正赋。……将各处田亩分别清查丈量，侵占者饬归本业，隐漏者补造花名，荒芜者随在召垦。该邑绅等竭二年之力，始得粮赋清复旧额。……①

伴随夺田倒算而来的是疯狂、残酷的杀戮、驱赶，或剥夺造反者及其亲属谋生、受教育的权利。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无需赘述。

封建神权的强化

建祠修庙，恢复封建神权统治，是地主阶级在文化思想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又一手段。

太平天国崇奉拜上帝教，反对一切菩萨偶像，军行所至，“遇庙辄毁”。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许多天地会的队伍也在不同程度上照抄太平军捣毁神庙的文章。桂平县大宣里蔡村三界庙和阡陋庙，就先后被洪秀全的太平军和陈开的大成军捣毁，请看同治年间罗钰撰写的《重修三界阡陋二庙碑记》：

> ……(道光)庚戌，邪术倡狂，粉神骸，灰殿阁，二庙之栏槛凭楹无不悉毁，士民于此靡不叹失所祀焉。……咸丰初间，岁次乙卯，民困未苏，强为举复，未敢侈以雕甍山节，只草复其庭坛故体，惟愿以明禋勿替，吾人之冀幸足矣！无何绸缪未几，复经前辙，又十余年而事竟不果，遂至二庙荒凉，悲人驻足，行人每之过者，莫不酸心。②

---

① 《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一七。

② 1974年夏作者在桂平访得，拓片现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拙文《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曾经引用，可以参考。

碑文明确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封建统治者立庙和农民军毁庙反复较量的事实。地主阶级依靠宣扬神仙圣佛，大搞封建迷信，对平民百姓进行文化思想控制。仅在太平军起义的一些州县，地方志书入载的神坛庙宇，其名称，就多得十分惊人。例如：桂平县有为各种坛、庙、宫、观、庵、寺共达297处。① 贵县仅县城及近郊，就有各类寺、庙、宫、观、堂、坛、祠、阁67处。② 平南县有各类宫、坛、祠、庙、寺、阁、观、堂141处。③ 武宣县的各类宫、观、庙、殿、坛、祠、寺也有67处。④ 象州的祠、庙、坛、寺、阁等，仅州城及近郊就有16处。⑤ 桂南的陆川县，名目更多，有所谓寺、观、祠、庙、庵、府、楼、堂、宫、殿、阁等共计250处之多。⑥ 应该指出，这些庙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就有了的。而许多被洪秀全与太平军捣毁的庙宇，如贵县的六乌庙，桂平大冲的盘王庙，三江圩的朗厂庙，蔡村的阡陋庙，紫水西岸的河马庙，以及武宣的九仙庙，等等，既不列入祀典，地方志书亦缺载。太平军离开广西以后，封建统治者立即刮起一股修庙风，还建立了不少“忠烈祠”、“忠义祠”等新的祠坛，用封建的忠烈观与神鬼迷信相结合，配合封建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这种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攻倒算，影响也极坏。⑦

① 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一五，《纪地·坛庙》。儒学系统的庙宇不计，下同。

② 梁崇鼎等纂：《贵县志》卷五，《祠庙》。

③ 周寿祺纂：《平南县志》卷十，《建置·坛壝·祠庙》。

④ 庞赓辛纂：《武宣县志》第三编二十六章，《建置·坛庙》。

⑤ 刘策群纂：《象县志》第九编，《杂记·祠庙·坛壝》。

⑥ 吕濬堃等纂：《陆川县志》卷五，《建置·坛庙》。

⑦ 如：咸丰二年三月辛酉谕，为长瑞、长寿建专祠，附祀同时阵亡各员。同年同月丙子谕，为永安州殉难之副将阿尔精阿，知州吴江，龙州同知王淑元，署隆安知县高延祉等立专祠。分见《清文宗实录》卷五六、五七；又：参见拙文《太平天国起义与乡土宗教》，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四、并非“寰宇晏然”的十五年

由于封建统治者在“天下大乱”之后不是与民生息，而是加紧压榨，加以严重和频繁的人祸天灾，激起了广西社会新的动荡不安。据清王朝公布的材料统计，从1868年（同治七年）到1883年（光绪九年），即从吴亚忠的义军被打败，到中法战争爆发的15年间，广西报灾求赈的州县即达384个（次），年均超过25个州县之多。而清王朝对受灾州县的赋税并未予以大力赈济，仅给“蠲缓”而已。① 在天灾人祸频仍，人民走投无路之时，聚众抗争也随时随地都有发生，天下并不太平。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寰宇晏然”，实际是一种虚伪的现象。

首先，随着厘金税的推行，人民群众砸厘厂，打税吏，抗抽捐的事件层出不穷。还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融县因奉命设卡“抽厘助饷”，顿时“四方哗然”。望枧村民伍之才愤极，立即“率党数百人将卡捣毁”。伍之才虽被逮捕，“备受诸刑，肢体已残毁”，尤“痛陈地方艰苦状”，无所顾惜。② 设于1864年（同治三年）的北流厘税局，也因为“办理不善，致触众怒”，于第二年即被市民烧毁。③ 1875年（光绪元年），马平县（今柳江县）又出现了以蓝生翠为首的抗捐风潮。蓝生翠本为廪生。因为知县滥加捐税，遂约同吉村富户韦文通、韦世光父子以及广荣村韦国兴等，起而请愿，要求减轻征收幅度。

---

① 参看《清穆宗实录》卷二一九、二五四、二六二、二七二、三〇二、三二八、三四八、三六三；《清德宗实录》卷三、二四、四五、六五、八四、一〇五、一二五、一四〇、一五六。

② 龙泰任纂：《融县志》卷二，第九编，《杂记》。

③ 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北流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事。

结果，被扣上“借要挟减粮为名，煽惑乡愚，纠党滋扰”，“聚众抗官”的罪名，惨遭杀害。① 继马平之后，思恩、梧州、藤县、南宁等地，也出现了反厘捐，毁税厂事件。而像蓝生翠的要求减粮、轻税，竟也遭杀身之祸，惟一的道路就是和封建统治者刀枪相见了！

与蓝生翠聚众抗粮的同时，广西罗城三防（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地方发生了“客土争田，各招滥练械斗”的事件。顷刻之间，“游匪麇集”，众至二三千人，“分投窜扰”于广西、贵州与湖南三省边界，陷城略地，使官军疲于奔命。②

1878年是广西“多事之秋”。先是，全州、兴安接壤的长洲地方，有所谓“外来游棍纠合土匪、散勇”，并于两县“沿途裹胁，不下二千余人”。时粮价腾贵，民情浮动。清廷由此承认“广西伏莽尚多，深恐乘机窃发”，一再命令有关各省地方督抚“协同防剿，毋任窜越”。③ 同一年，桂北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有所谓“斋匪诱胁民苗”滋扰事件。④ 宾州（今宾阳）、来宾、兴业、永福等处“匪徒乘机蜂起”⑤。桂西南则发生了记名总兵李杨才募勇万余，“出兵滋扰”。所有越南之谅山、长庆，广西南宁府属和钦州沿边各县，都被波及。清政府调兵遣将，入越“剿办”，历时四年，始克蒇事。⑥

1879年，桂西北的西林县有白苗首领王幺，以窦三、马三、李福等为元帅，聚众“谋劫附近民团，进攻县城”⑦。浔州贵县，又有周馨弟与桂平县捐

① 张延禧：《广西提督冯勇毅公（子材）军政事实记》；《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涂宗瀛奏并清谕；又参《柳江文史》，1983（1）（2）。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四，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黎培敬奏并清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七一，光绪四年四月初四日杨重雅奏并清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七九，光绪四年十月初五日杨重雅奏并清谕。

⑤ 《清德宗实录》卷九〇，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杨重雅奏并清谕。

⑥ 分见《清德宗实录》卷七九，卷一五一，李杨才初起，据光绪四年十月初六日清谕并杨重雅奏；其败亡事据光绪八年九月初八日清谕并倪文蔚奏。

⑦ 分见《清德宗实录》卷一〇六、一〇七，光绪五年十二月己未，光绪六年正月乙亥清谕并张树声奏。

职守备覃启瑞，捐职府经历覃迪父子等“聚众抢劫，抗拒官军”①。

1881年，百色厅属恩阳（今属田阳县）境内，有已革土官与“匪徒刘兴佳等纠党起事”②，果化土州（今属平果县）官族赵苏奇、赵铎等“纠党”响应，并为之接济粮饷。③临桂县则因知县张秉铨与局员汤宗泰等“借查赌博、私宰，冀索规费”，激发民变。④

1882年，象州有冯长孙，郁林州有吴晚大等起事。他们“啸聚党与，占据坚巢”，以敌官军。⑤而同在这一年，柳北的思恩县还爆发了一场极不寻常的秀才武装造反。

缘五峒才院村秀才莫梦弼，与葛姓合股开办铁厂。由于利益纠纷，双方发生械斗，旋又互控至省。但县官袒护葛姓，将莫梦弼系解桂林监狱。不久，梦弼越狱逃归，愤然举兵反清，顷刻之间，众至数千人。梦弼自称顺德王，传檄四方，历数清王朝罪恶。文曰：

> ……君则狼主不仁，喜猜忌而屠戮文士；官则虎冠贪酷，肆锻炼而搏噬小民。久伤虐政，十八省之元气无存；长围倒悬，二百年之膻腥未洗。自笑汉家臣子，反蒙胡虏冠裳。反清复明之计早存，用夏变夷之谋宜就……⑥

用这样明确的语言，斥责“帝酷官贪”，必欲去之而后快。在广西，除了太平天国之外，其他反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虽然，莫梦弼揭橥的仍是“反清复明”的老调，而且很快就遭失败了。但比起蓝生翠的请愿以求减粮轻税，自是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反清处于低潮时期，他以秀才的身份举旗造反，对所谓“中兴”也是辛辣的讽刺。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一〇，光绪六年二月二十日清谕并张树声奏。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二六，光绪七年正月初五日清谕并庆裕奏。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三九，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十日清谕并庆裕奏。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一三八，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谕并庆裕奏。
⑤ 《清德宗实录》卷一五一，光绪八年九月癸巳清谕并倪文蔚奏。
⑥ 吴瑜纂：《思恩县志》第三编《政治》。

以上所举，只是各地方官无法掩饰的“叛乱”事件。当时广西的形势，正如御史秦钟简在1881年所说的：“闻近年合省秋审案十起内外，即本年亦止十三起。以六十七州县劫抢命案层见叠出，地方官任意消弭，详办者少，被抑者不知凡几?! 小民含冤莫诉，易滋事端。”①1883年以后，因中法在越南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张，广西内部的问题也就更多掩饰不报了。

封建统治的另一隐忧，即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代理者的土官，这时迅速走向衰落，而土官与土民的矛盾也日益加激。主要表现在：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广西各地土官及官族占有的土地，因为“改土归流”或自身生活的奢靡无度，大量移入流民或汉人、富商、高利贷者之手。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广西巡抚姚棻向朝廷奏报庆远、思恩、南宁、太平、镇安各府的土司，因“生活渐习奢靡，用费无节”而典卖土地，其中庆远属的南丹、那地、东兰三土司，忻城土县，永定土司及永顺正、副土司的“祖遗田产，历年典当殆尽”，以致生活十分艰难。② 因此，土官对土民的“鱼肉斥戮”，更加“任性妄为”。土官与土民的矛盾因之进一步激化。是以土民之“从贼者日众”。③而同治末年田州土官岑森与岑铉因争袭挑起的数千人大械斗，其焚杀抢掠，罹害万众，“更使民不聊生”，社会残破。④ 凡此种种，亦必削弱了封建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实际上，在土官统治的地区，那些被封建统治者视之为“蚁”、为“虫”的小民们，虽然没有拿起刀枪聚众造反，却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之气，用“向上控告”的办法历数土官的罪恶。太平府万承州的土官许荣，和父亲许绍纲及弟三人，残酷成性，同恶相济，百姓称之为“三虎同恶”。光绪初年，州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三三；《光绪朝东华录》卷四二，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日清谕并秦钟简奏。

② 王言纪、朱锦修纂：《白山司志》卷一七，《诏令》。

③ 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第四册，431页。

④ 《刘武慎公遗书》卷一七，《查办田州官族片》；《土田州归流片》。又参羊复礼等纂：《镇安府志》卷二〇，《纪事志三》。

民在联名控告他们的文书中写道：

> 天见许荣，日月不明；地见许荣，草木不生；官见许荣，弟兄相亲；人见许荣，九死一生。

随又历数许荣的十大“恶款”：

> 今主许荣……无恶不作，惨毒万状。遇案不分曲直，各遂其欲。怡已属民，而虫民等历遭恶主，两代相沿，戕残挟害，灭门者无人申理，避祸者逃越邻封。民等因庐墓难抛，强忍强受，于光绪十二年迫得九甲村民始敢冒死联名上控，李抚宪粘叩在案：钱粮定额，加倍勒取，一也。有例倍勒，无例勒派，二也。豢养盗贼，充当勇役，三也。纵勇为盗，焚劫善良，四也。见色纵淫，淫民妻女，五也。酷刑无罪，毙命匿尸，六也。贪贿纵盗，反罚失主，七也。擅卖民妻，逐夫奴子，八也。纵使族目，霸民田产，九也。拆民房屋，添营私宅，十也。此尤著者，恶款列十，每款必有数见，其余贪枉，不堪枚举。①

十大罪状，五毒俱全！其实，虐民恶款，何止十端，又何止万承州许荣一人？这些土皇帝独霸一方，哪有王法哪有天？被压榨得家破人亡的“虫民”们走投无路，不堪坐以待毙，只有拼死愤怒控诉了！在此前后，广西巡抚衙门虽然发布过严禁土、汉官吏藉端勒索土民之类的禁革令，② 但只是一纸空文，并未能发生实效。“虫民”们的控诉得不到回答，拿起刀枪再次造反，也就为期不远了！

最后指出一点：这时期的人民反清活动，虽然处于低潮，但出现的许多抗捐、抗暴事件却是秀才、廪生一类人物倡首的；即令是“虫民”们的控诉，

---

① 摘自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组：《广西大新县壮族调查资料》。1957年11月铅印本。又参《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②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其背后也多有乡绅在。乡绅阶层多“知书明礼”之辈，原是清王朝在地方进行统治的依靠力量。而这时候，这类人物也起来造反，还谈什么“寰宇晏然”？只是表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更加动摇了！

第七章 民教纠纷，反帝新潮①

洋教势力的侵入，从另一方面嘲弄了所谓“同光中兴”的鼓吹者。在广西，因为洋教士非法潜入内地，施展各种欺骗手段，发展“信徒”，建立教堂，进行各种与中国法律以及地方民情风俗相悖的活动，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各个方面与地方官府、士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发生了矛盾冲突，并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教案”，掀起了广西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新风潮，有的还引起了中外交涉，直接关系到我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化。因此，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必要列出专章，予以介绍。

① 本章在第三次修订时，适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三同志编的《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承蒙编者赠阅，得以见到许多珍贵资料，特别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外文资料，如和为贵的《广西天主教史》，以及有关天主教在广西引起“教案”的外文资料。谨表感谢。在征引时，为免冗繁，除必要者外，恕不一一注明。

一、洋教势力在广西的发展

洋教入桂的历史回顾

我们说的洋宗教，主要是指欧美的基督教。基督教又分为三大派：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①] 在它们之下，还有名目繁多的教派，在广西活动的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洋教传入中国，始于唐初。据《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有教士自波斯携其经像至长安，献于唐王朝。太宗李世民优礼之，是为景教。自是流行约200余年。至武宗李炎时（841～846），景教与佛教同时被禁，遂绝迹。直至明万历初年，洋教始再度传入我国。先是，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于1579年（明万历七年）到达澳门。第二年，另一名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也来到了广东，继之有意大利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和德国的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all）等，他们都先后到了北京，受到了明神宗朱翊钧的礼待，得以建立天主教堂，并与大臣徐光启等互相往来。尽管利马窦从所谓“传播福音”的观点出发，宣称他

① 天主教即基督教旧派。公元16世纪初，德国有马丁·路德（Matin Luther）批评罗马教廷在德国的横征暴敛，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从事宗教改革，形成路德教派，即通称的基督教新派，我国人又习惯地称它为耶稣教。东正教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会亦逐渐分裂，在东罗马帝国的称东正教，即希腊正教；在西罗马帝国的称罗马公教，即天主教。1054年，东西教会为争夺意大利南部的控制权，正式分裂。东正教流行于东欧的波兰和沙俄等地。

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开展一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①] 但也带来了一些欧洲的科学知识，如数学、天文、历法，描绘世界地理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被视作“西方异物”的三棱镜、自鸣钟和西琴等。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早进入广西的洋教士就是罗明坚，约在1586年或1587年（明万历十四年或十五年），他就到了广西的省城桂林，想在那里居住并开展传教活动。但很快就被官府驱逐，从湖南狼狈逃回澳门。[②]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人关，明帝国灭亡。1647年（清顺治四年），朱翊钧之孙朱由榔建立南明政权，年号永历，驻守桂林，史称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母亲、妻子及左右官员，早与天主教有接触，遂在宫中接受西教士瞿沙微（Andreas Xauir Koffler）的洗礼。“永历嫡母王太后，圣名赫肋纳，生母马太后圣名玛利亚，王皇后圣名亚纳，新生太子名慈烜”，朱由榔圣名公斯当定，希望“率臣民奉教，以再造中国也”。[③] 1650年（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请葡萄牙籍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为专使，携王太后及宦官庞天寿的书信分致罗马教皇和耶稣会总长，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④] 当然不会成功。南明王朝仅延续了十五年就失败了！接着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严厉禁教。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外国

---

① （法）裴化行（H. Bernard）著，王昌社译：《利马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1~3页。

② 参看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耶稣会创立四百周年纪念（1540~1940），中华书局；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③ 引文见圣教杂志丛刊《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又参莫炳奎：《邕宁县志》卷四三，《古迹志》。林辅华著，沈武候等译的《基督教人名词典》（广学会出版）译瞿沙微为瞿安德。又法国加勒利和伊凡合著，徐健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124页注⑤写道：“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后是个基督教徒，教名烈纳，曾与教皇有长期的书信往来。”又据沙不列撰，冯承钧译：《明末奉使罗马教徒耶稣会士卜尔格传》（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版）可知：烈纳是桂王永历帝的母亲王太后。

④ 参见《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教士能够进入广西省"[1]。

天主教势力在广西的扩张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宗教也被殖民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与鸦片、商品、炮舰并用，而宗教往往担任对华入侵的"开路先锋"[2]，更多地发挥精神侵略的作用。

在近代，进入广西活动的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大教派。

法国天主教进入广西最早，势力也最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亟思对我国西南地区扩大侵略。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就把两广教区划分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作为传教活动的范围。1852年（咸丰二年），通过巴黎外方传教会，以该会派驻香港的总会计师、神甫李播（李莫瓦，Labbe Libois）为两广教区的主教。他立即采取措施，派教士肋诺（Reniu）非法潜入广西，了解当地的宗教活动情况。几个月后，他向李播提出的报告说：

> 广西境内还有几个广东籍的天主教徒。他们分散在几个大城市经商，流动性大，行踪不定。至于广西境内的本地人，则找不到一个教徒了。[3]

在李播出任两广教区主教的时候，另一名法国教士马赖（Augast Chapdelaine）[4]到了香港。1854年（咸丰四年），他在李播的指示下，从香港潜入贵州，得到教士李翁士（李万美，Lions）的帮助，从兴义府的教徒中了解到：广西泗城府西林县山区，有不少从兴义迁去的农民，其中有三个已经受洗入教。而"西林附近有很多村庄，愿意听福音宣道"。马赖在教徒白满与曹桂英

---

① 和为贵（Cuenot）：《广西天主教史》。

② 1935年，陈法言（W. H. Oldfield）出版了一本讲述洋教士在广西活动的书，即名为《开路先锋在广西》（Pioneering in kwang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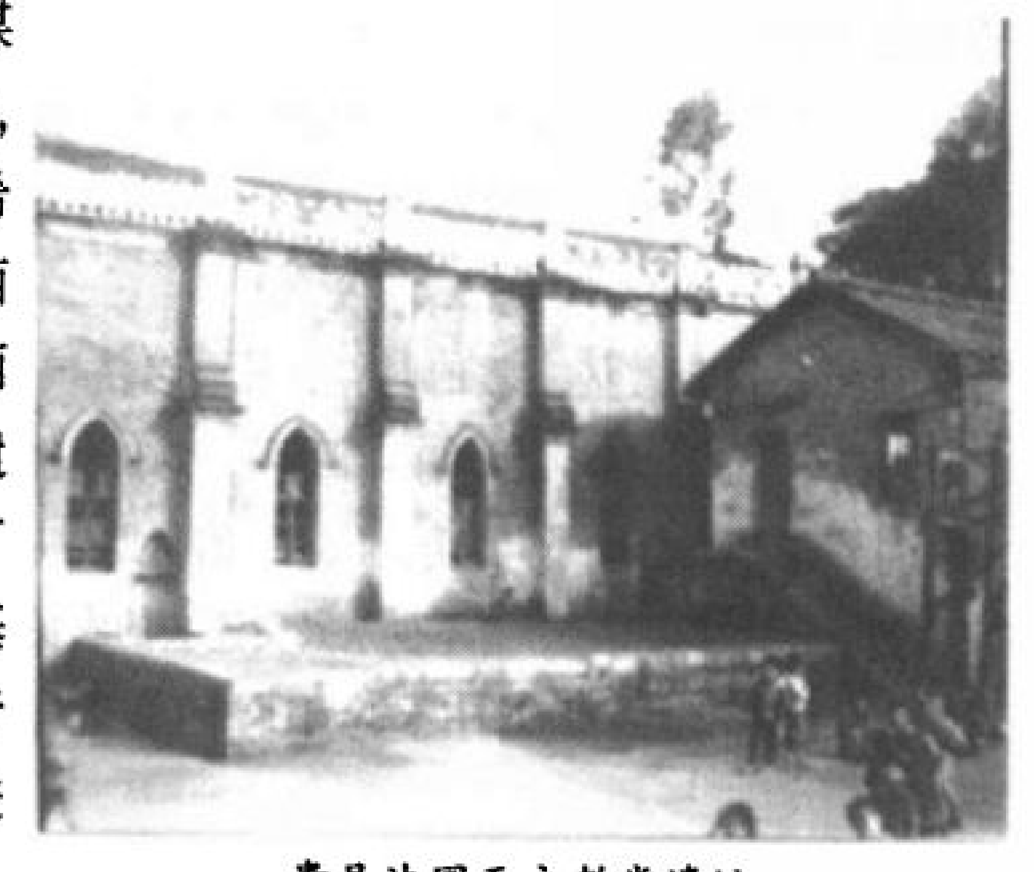
③ 引自和为贵：《广西天主教史》。

④ 清朝官文书多称马赖，它书亦有译作马奥斯丁的，即通称的"马神父"。

（一个年青貌美的寡妇）的陪同下，于当年夏天从贵州到了广西的泗城，随又转至西林县白家寨。他探知桂林省城还有三名鞋匠崇奉天主教，于是准备转至桂林活动。但是不久，因为有人检举他所做的种种不法行为而被捕。释放以后，遁回贵州。1856年12月14日（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再度潜至西林县的板坡村。[①] 西林知县张鸣凤下令把他和白满、曹桂英等逮捕，经审讯后予以处决。由此发生了中法之间所谓“西林教案”的交涉。

马赖的活动，为法国天主教势力闯开了进入桂西北的门户。而他的被处决，也给法国作为扩大对华侵略的借口，于1857年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在1860年10月25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中，强迫清政府晓示天下：“任由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②]

但是，马赖的被处决，确实使法国天主教势力在广西的扩张受到了遏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活跃在广东和贵州的那些法国教士，再也不甘心这种“传布福音”的停滞状态。他们怀着“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广西省”的野心，积极进行扩张宗教势力的谋划。1868年（同治七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任命梅希满（Mihiere）教士为广西副主教，专门负责在广西发展教务。先是，他派遣教徒前往桂林，希望在广西省城建立一个传教基地；接着，又亲自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交涉。但都没有成功。



贵县法国天主教堂遗址

① 参看马赖当时给李播、李翁士等人的信件（抄件存在广西通志馆），以及《广西天主教史》。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147页。

1869年（同治八年），他改派在广东传教多年的富于道（Foucard）进入梧州，在那里租赁房屋，建立据点。由于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强烈反对，梧州知府把租出的房子查封了。1872年（同治十一年），富于道从越南北部进入广东灵山（今属广西），转至上思十万大山瑶区。第二年，在米强“建立一个小殖民地教会”。但也一度受到地方官员的拘捕。经过两年多的活动，他终于在上思县城建立了立足点。1875年（光绪元年），天主教广西教区成立，以法籍神父文芍理（Jolly）为首任主教。与此同时，富于道从上思转至贵县，在县城建立了一个小传教点。四年以后，因文芍理病死，富于道被选为广西教区的主教，成了天主教会在广西的实际领导者。他以上思和贵县为据点，逐步向宁明、龙州、崇善（今归崇左县）、武鸣、南宁、桂平、郁林、武宣、象州、修仁（今分属荔浦、金秀两县）、荔浦、柳城和永福等地扩展。从此，法国天主教势力由桂西逐步推向桂东地区。

永福县是天主教势力向桂东北扩张的重要据点。先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法国教会司铎卢安德（Pelamougues）潜入该县土养槽瑶区传教。第二年，在瑶族头人盘国祯的帮助下，由卢安德与唐定球（Dalle）在土养槽建教堂一座三间。发展教徒40余人。同一年，另一名法国天主教神父赖保理（Renault）也至永福县城进行传教活动。1908年，由他保送12岁的女教徒李德荷赴法国学习，回国后成了修女厅圣母军宣传会的负责人。在她的配合下把教务向附近的州县以及桂东北的全州等地扩展。1910年，唐定球在永福城内购屋传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天主教士也到永福进行传教活动，并在1921年接管了法国在永福的天主教堂。①

从上述情况可知，法国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首先是在地方僻远，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少数民族地区立定脚跟的。根据教会中人的统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法国天主教在广西拥有的教徒及其增长的情况大致是：

---

① 永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福县志》（油印稿）第二十四编，《习俗·宗教·帮会》1991年9月。

1878年（光绪四年）有教徒508名，①

1891年（光绪十七年）增至1110名。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增至1806名。

1911年（宣统三年）猛增至4524名。

1921年（民国十年）又增至5119名。②

1919年，天主教在广西建立的教堂共有71个。就全国而言，略多于甘肃、新疆、西藏三个省区。发展教徒5000人，则“为全国天主教友人数最少的一省”③。

总之，从19世纪50年代马赖潜入西林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法国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已有70年的历史。如果从他们在广西成立独立教区，由文芍理出任广西教区的主教算起，也将近半个世纪。他们尽管发展了数千名教徒，但和在中国建立的其他教区相比，其成绩是微不足道的。1923年，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第20期上，刊登了一篇对广西教区工作带有总结性的评论，其中写道：

> 广西教区自成立为一个独立教区，至今已快有五十年的历史。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这样说，她算是本会中一个较落后的教区。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她所取得的进展，若与其他新近成立的新教区相比，那就显示出来她所取得的成绩是微乎其微的。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因受战争的创伤，再也无力派出更多的教士

① 当时，广东灵山属广西教区。这时的教徒主要集中在灵山、上思和贵县三地，计灵山350名，上思100名，贵县41名，少数在别处。

② 《广西天主教史》。

③ 《中华归主》第323、608页。又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提供的资料：1949年，广西解放时，法国和美国在广西共建了138个天主教堂，神职人员240人（其中外籍主教、神甫54名，修女14名，中籍神甫20名，修女15名），吸收教徒多达38000人。30年间教堂增加近1倍，教徒增加近7倍。

④ 《广西天主教史》。

进入广西活动。而美国天主教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则凭借其在经费和人力上的优势，于1919年进入广西，并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手中取得了梧州及其附近的岑溪、容县、北流、陆川、博白、藤县、平南、怀集等八个县作为它的活动范围。从此，结束了法国天主教在广西"一统天下"的局面。[①]

基督教各派在广西的发展

英、美等国基督教势力进入广西，时间稍晚，但发展很快。

1862年（同治元年），美国浸信会牧师纪好弼（R. H. Graves）从广东肇庆进梧州，从事所谓"开荒播种工作"。成了基督教在广西传播的"开山祖"。[②] 最初，他租船而居。不久，在竹椅街租得店铺一间，作为施医布道之用。但租约订明，铺屋不准居住西人，晚上仍须回船歇宿。1865年（同治四年），他一度"沿抚河上桂林"，企图在省城发展教务。但还没有登岸，就激起"全城耸动"，人们到处书写揭帖，提出"如有人胆敢租屋与洋人或接受其书者，定将家产充公"。结果，纪好弼狼狈逃去。[③] 第二年，纪好弼才在梧州得到两个受浸洗的"归主"。当他们从冰井冲"施浸"出来的时候，"市民千百成群跟随，辱骂耻笑"。[④]

1871年（同治十年），广东、湖南等地因为"神仙粉事件"爆发了广泛的

---

① 参看《广西天主教史》，以及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所存有关资料。

② 《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1949年12月铅印本。

③ 参看刘粤声编《两广浸信会史略》，1934年版。又参《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杨滨沂：《梧州浸信教会史略》；牧冕撰、余和善译：《上帝在广西所成就之事业》；以及拙文：《桂林人民的一次反洋教斗争》（署名文尔），见1962年6月8日《桂林日报》。又据杨滨沂：《梧州浸信教会史略》一文说：与纪好弼同往桂林的还有壁摩博士。

④ 参看《梧州浸信教会史略》。据梧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史料》（1959年油印本）说：受浸洗者为梁福南、梁寿南兄弟。

反教会斗争。[①] 梧州民众也起来驱逐教士纪好弼，拆毁他设在竹椅街的“诊疗所”，没收了“室内的药料杂物”。此后，美国浸信会改由仕文（E. Z. Simmons）牧师接替纪好弼，负责“梧州复员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仕文以华籍牧师汤杰卿为“先锋”，企图重振梧州教务。但汤杰卿到梧州，同样受到群众的围攻，住屋被拆毁，头部被击伤，狼狈逃回广州。为此，美国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曾国荃，“催请按律结办”。仕文亦亲自携带领事致梧州府的函件，请求予以保护。结果，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更大公愤，10月29日（九月十八日），梧州街市遍张申斥教士的“告白”，且“聚集千有余人，用砖石、木棍殴击并驱逐仕文回船”。旋即逃回广州。[②] 梧州绅、商、学各界人士，继又召集众人开会，共决议两条：

1．永远不准西人入广西境内；

2．永远不准西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③]

面临扩张一再受挫的困境，美国女教士牧冕（M. Mcmins）无可奈何地哀叹：“从此以后，非特此商业重镇之梧州，即广西全境，不睹福音之光，几数十年焉！”[④] 实际的情况是，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

---

① 1871年粤、桂、湘等省群众传说：洋教士借施药治病之名，散发有毒的“神仙粉”，坑害百姓。于是，群起反对。佐佐米正哉编的《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附录当时反教会揭帖27件，其中广东20件，湖南7件。如第四件《佛山揭帖》云：“番奴屡日毒心狠，立起邪心落四乡，话名仙粉随街派，毒药将来害女娘。男妇食吞膨肿胀，半年之内见阎王。……叫人进教真难想，合者齐心拆教堂，先杀汉奸后杀鬼，为民除害透心凉。”1960年我到梧州调查，许多老人也说：“同治年间闹神仙粉，拆教堂，满街都有白头帖”。可惜已经不存在了。

② 1883年6月12日（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 R. Young）为此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力行查办”所谓“违法之事”。照会见《清季教案史料》（二）。

③ 参看牧冕述意，余崇信笔记之《广西浸信会概略》；又参《梧州浸信教会史略》。

④ 引自穆（牧）冕撰，余和善译：《上帝在广西所成就的事业》。按：这只是就美国浸信会在广西的遭遇说的。

年）的33年间，美国浸信会除了纪好弼在梧州找到梁氏兄弟两个“归主”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信教的人了。① 他们把这30多年看作浸信会在广西活动“最困难的时期”。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加激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洋教势力也乘机如潮水般涌来。就在这一年，美国浸信会通过华籍教徒、平南客商包文华的活动，首先在平南惠政里石塘村余宝光家中建立了第一个福音堂。开始了这个教派在广西扩张的所谓“进展时期”③，石塘成了美国浸信会“桂南联会工作伸张人内地的据点”。从此以后，一批男女教士如湛罗弼（R. E. Chambers）、帖威林（W. H. Tipton）、美约瑟（J. G. Meadows）、麦惠来（T. Mecloy）以及牧冕等，纷纷来到广西，开展所谓“兴旺福音”的工作。1895年到1918年的24年间，继石塘之后，又在梧州、贵县和桂平的江口圩建立了三个教堂，另在灵山、横县、贵县、桂平、平南、藤县、郁林、南宁、容县、象州、修仁、荔浦、平乐、昭平、贺县、富川等地城镇或乡村建立了27个基地，发展教徒达5000余人。④

桂林是浸信教会在广西官话区发展的基地。1912年5月，美国教士卢信恩（C. F. Lowe）到了广西桂林，他以讹诈的手段，购买了城中区李子园的大片土地，用以建造房舍。12月，他在桂林召集荔浦、修仁、平乐等官话区的传教人员开会，决定在1913年5月建立桂林教会，作为官话区的传教中心。1913年和1917年，永福县桃城和满堂村也相继建立了美国浸信会福音堂。桂林教会建立以后，平乐、富川、贺县、荔浦、修仁和象州等地的浸信会传教基址，悉归桂林教会管辖。1919年，浸信会在广西成立桂南和西南和

---

①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史料》，1959年油印本。

② 余益山：《桂南福音最兴旺时期的亲历》，见《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牧冕慨叹说：“传教士入驻中国十八省，以广西最为艰难”。

③ 《广西浸信会概略》。

④ 《桂南浸信会联会史略》。

会，梧州与桂林分别是桂南和西南和会的基地。[1]

美国的宣道会也把广西看作“向福音关闭的省份”。1892年（光绪十八年，加拿大籍的宣信（A. B. Sinkson）博士来到中国即声言：等待“补充的生力军一到，宣道会必须进入（对洋教）关闭和仇视的广西省”。1895年春，被宣信目为“生力军”的白礼贤（A. Burien）到贵县东津，完成了“在广西设立第一站的工作”，为宣道会在广西“建立了一个前哨”。第二年冬，斐约翰（John. E. Fee）也在梧州找到了立足地，并把梧州作为“在华南工作的总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藤县也出现了宣道会的“驻所”，并作为“训练新来的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的地方”。[2]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孔道宏（J. R. Cunningham）到了桂林，在南门租屋传教，并从桂林迅速向附近的县乡发展，临桂的六塘、会仙、塘头、秧塘和油麻，[3] 灵川的董家、甘棠和海洋，永福的罗锦和矮岭，兴安的高尚，鹿寨的黄冕等12个乡镇，都建立了宣道会所谓“传布福音”的网点。[4]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后，邕宁、雷平（今属大新县）、龙州、郁林、北流、容县、陆川、博白、融县、罗城、宾阳和三江等地，也都建立了宣道会的“传教基地”[5]。

循道会本名惠师礼会，直属设在广州的华南教区的领导，最高机构是设在英国伦敦的循道总公会。1897年，英籍教士麦路德（J. J. Macdonald）夫妇先到梧州，在华籍牧师梁立修的协助下，几年之间，购地25亩，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先于三角咀建屋作教堂、诊所及书塾。通过传教、施医、

---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广西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史》，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永福县志》（油印稿）第二十四编，《习俗·宗教·帮会》。

② 陈法言著，刘恩厚译：《开路先锋在广西》。

③ 油麻传教点建立不久，即迁两江圩并建立教堂。

④ 桂林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基督教在桂林地区进行侵略罪行史料》。

⑤ 参看《开路先锋在广西》；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梧州广西宣道会《宣道消息》。

教读等方式，召人入教。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麦路德被人杀死，教务由晏夏理（H. E. Andorson）负责。他积极设法向内地发展。1912年，（民国元年），分别在苍梧县的长洲、戎圩、人和以及平南县的大乌镇设立教堂。①

中华圣公会属于湘桂教区，北起湖南湘潭，南至广西桂林，皆其活动范围。1898年，英国教士斐乐义（Lauio Byrde）夫妇首先进入桂林，赁船而居，借施医赠药为手段，接近群众，乘机传教，终于建立了教堂，成为桂林圣公会的奠基者。接着又在灵川、兴安、全州、灌阳等县建立了近20个传教点，在外国教士视作“荒地”的湘南、桂北地区，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②

在广西活动的，还有几个建立较晚、规模较小的教会，如：1913年由美国教士谭保罗（T. V. Thomas）和华籍教士刘剑在梧州建立的安息日会。它发展比较迅速，从梧州建堂后的30年中，分别在南宁、藤县、岑溪、桂平、武宣、贵县、柳州、横县、龙州、容县、北流、博白和迁江（现属来宾县）等地，都建立有教堂或传教点。主要活动在广大的粤语地区。③ 还有信爱会和马内利医药普会，分别由两对外国传教士夫妻所建立，前者“在广西工作了六十多年，在城市与乡村逐家布道”，先后“开设了十一个教堂”，并有举办瞽目女子学校的“善举”。后者建立的教堂和传教点只有三处，还办了医院、孤儿院和两处“主日学”。此外，还有基督会、神的教会、五旬节会、信义会和长老会等等。它们不但建立较晚，规模较小，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多由华人传道。④

同样是根据教会的统计，到了1919年，新教各教派在广西共建立教堂62

---

① 参看《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罪行活动史料》；李金铨：《梧州循道会史料》（政协广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藏）。

② 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桂林市年鉴》一六，《宗教》，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民国三十五年；李繁滋等纂：《灵川县志》卷四，《人民一·宗教》。

③ 参看民国三十五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民国二十二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开路先锋在广西》；以及有关地方志书。

④ 《开路先锋在广西》。

所，仅多于贵州、蒙古、新疆和西藏，在22个比较省区中居倒数第五位。新教徒4722人，仅多于新疆、甘肃、蒙古、西藏四个省区，在全国22个比较单位中也排列倒数第五位。① 有男女教士120人。②

追随“上帝”而来的是魔鬼

综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到1919年，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共建教堂133座，发展教徒共计9728人；到了1949年，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建立教堂的总数增至207座，发展教徒共达4.5万余人。在洋教势力向广西入侵的过程中，法国操纵的天主教，以东南亚为主要依托，从西向东在广西扩展；美、英两国支持的基督教，则以港、澳为跳板，从东到西向广西内地渗透。这就形成了桂西以天主教势力为主，桂东以基督教势力占上，而桂中则为新、旧两教派交错共存的格局。③

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点，从纵向观察洋教近百年来在广西的扩张，则后期的30年比前期的60多年，无论是教堂的建立或教徒的发展，其增长势头和数目都要迅猛得多。尽管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不断被揭露，人民群众觉醒的程度不断提高，反抗斗争从未停止。但是，由于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教禁”不断开放，且于1901年与德、英、美、法等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对洋教完全开禁；而国民党政府在与各有关国家签订的关于“庚子赔款”的来往外交文件中，承认并遵守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辛丑条约》

---

① 《中华归主》第595、608页。又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提供材料，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新教的14个教派共在广西建立教堂169个，发展教徒7000多名。比30年前教堂增加近2倍，教徒增加近一倍。

② 据前广西通志馆1933年的调查资料统计，见广西文史馆编：《广西近百年历史资料》（初稿，下编），1959年油印本。

③ 仅以天主教而论，情况也是如此。据陈法言在《开路先锋在广西》一书中反映：至1919年，法国巴黎差会以广西西部为主，保持广西全省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其余三分之一的东部地区，归于美国的马利诺差会。

中所取得的权利，这就给洋教势力深入内地完全敞开了方便之门。[①]

在广西的教会势力，如果以国别论，主要是美、法、英三国，其中以美国教会最多，法国次之，英国又次之。法国主要是天主教，英国主要是基督教，美国则两者兼而有之。这三个资本主义国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百余年来一直以输出商品，继而输出资本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而以宗教的侵略扩张作为辅助手段。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法国，则十分重视宗教在对外侵略扩张中的作用。它吞灭印度支那半岛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如此。而美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推行鸦片贩运，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外交讹诈等手段的同时，也从不放松传教活动。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过：

> 美国人是狂热的传教士，让别人易宗改教对他们来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诱惑力。[②]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 Denby）在《中国及其人民》一书中谈到教会教育时，则清楚地说了传教与商业扩张的关系，他写道：

> 传教士……是商业的先锋。本着神圣的热忱，他走入白人足迹所不能到达的内地。他在所到的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教堂，一个诊疗所，一座学校和一座工厂，就这样在中国的心脏内居留下来了。鼓手跟着来到，外国的商业也就跟着开始了。[③]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开展传教活动的要害所在。他说：

> 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

---

① 各有关文件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第三册。

② 李光耀：《人权外交是错误的》，见日本《诸君》月刊，1993年9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1993年9月29日。

③ 见该书第一卷第220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2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事业和文化事业。①

美国在广西传教的历史，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追随“上帝”足迹而来的，还有形形色色坑人害人的魔鬼。

二、教会和教士在广西的活动

“布道者”潜入广西的花招

讲明了洋教势力在广西的扩张历史以后，有必要回过头来谈谈“布道者”玩弄了哪些花招，居然在一片反对声中站稳脚跟，“开基布道”的。

洋宗教独尊“上帝”，排斥世俗的神仙圣佛，它既与中国“敬祖追远”的传统观念相抵触，又与民间的多神崇拜习俗相冲突。为了克服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端”，以利于洋上帝走进广西这块古老、封闭的土地，它的“差使”们机关算尽，采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潜入广西活动。

第一，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使进入内地传教“合法化”。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伎俩。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成了中外交涉的重点问题之一。法国的要求尤为迫切。1844年10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在法国专使剌萼尼（M. M. J. Lagrene）的要求下，就有法人得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的规定。② 但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坚持要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任他们在中国各地传教。因此。《黄埔条约》刚刚签订，取消教禁的交涉就开始了。1844年12月14日(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耆英奏报当时交涉的情况说：

---

① 《“友谊”，还是侵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参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2～63页。

天主教弛禁一节，亦屡以往复辩难，告以法度，谕以情理，不吝舌敝唇焦。无如驳诘愈严，请求愈坚，中间龃龉情形，几成决裂。

在法国专使的“坚请”和炮舰的威胁下，清廷被迫于1846年1月17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宣称：“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内地青莲、白莲、八卦教迥不相同，自不妨俯为所请。”随即张挂告示，晓谕各通商口岸地方。①

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把宗教侵略从中国沿海推向内地。在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中规定：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到了1860年10月25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法国在中法《续增条约》的第六款中，除规定清廷应“晓示天下”保护传教、信教和发还教产外，法国传教士还在条约的中文本内擅自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② 这些有关保护传教的规定，虽然只订立在中法两国的约章中，但英、美等国完全可以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同样享有这些特权。从此，“中国二十三省皆有传教士足迹，内地教堂林立，习教之徒，愈衍愈广；传教之案，愈办愈难”了。③

发生在广西的“西林教案”，是法国用以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因此，上述条约有关传教和保教的规定，也就成了法国天主教势力向广西扩张的“根据”。特别是1897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是洋教势力在广西扩张的一大转机。美国教士牧晃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曾说：

尚有一值得追述之事：当一八九七年北京政府与英国缔立通商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外人享有经商及居留之机会，消息宣传之日，吾人心中大快。……于是本会兄弟及宣道会、广州惠师礼

① 引文分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二四。
② 引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107、147页。
③ 《教务纪略》卷首，第3页。

会教士，急不及待，即行觅择住宅地区及工作地点。……吾等遂在久被丢弃之广西门户，寻救丧失之群众。①

就在这一年，美国浸信会教士湛罗弼、斐约翰，英国惠师礼会教士麦路德等人纷纷潜人梧州，其他如南宁、藤县、桂林、桂平等处，也有洋教士的传教处所。

第二，利用中国教士或教民为前驱，到各地开展传教和建立宣教场所，也是外国教会与教士经常使用的手法。

如前所述，法国传教士马赖以贵州教徒白满、曹桂英为向导，潜人西林县活动。美国教士纪好弼利用两名受浸的“归主”者潜人梧州；仕文以华籍牧师汤杰卿卷土重来，企图重兴梧州教务；美国浸信会依靠华籍教徒包文华、余宝光，在平南石塘建立了第一个福音堂；美国教士谭保罗在华籍教士刘剑的帮助下，在梧州创立安息日会教务，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而牧冕进入平南鹏化、象州寺村等地活动，也分别得到了余华粹、余仕珠和仇月清等教徒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洋教士不但凭借华籍教士或教徒为前驱，深入广西各地，而且很早就想方设法，物色广西青年，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培训，使他们在本乡本土生根发芽，成为“上帝事业”的忠实使者，且看法国教士和为贵(Cuenot)在《广西天主教史》中的一段记载：

广西教区成立之后，传教士就执行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规，开始对本地青年教徒进行培训。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广西教区共拥有一千多教徒，从他们中推选十名较热心的青年，组成广西教区一个修道士苗圃，由教会保送他们前往南洋槟榔岛大修院学习深造。随后十二人中仅有四人培训成功，经罗惠良（J. M. Lavest）主教祝圣为神职人员，这是有史以来广西教区首批中国神父。

第三，为了直接进人广西内地活动，洋教士还乔作华人装扮，改用华人姓名，以掩人耳目，减少疑虑。这种做法，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1580年

① 引文见《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1949。

(明万历八年)，意大利天主教士罗明坚到中国传教，就是本着“到什么地方，随什么地方”，“到中国成中国人”的原则，“为的能得到大众”，“使中国人归服耶稣”。为此，“他不但脱离欧洲，废除欧洲的习惯，在饮食礼仪上完全中国化，并且还肯依照佛教僧侣的名称及服装，而消灭彼此的分别”。[①] 罗明坚的晚辈们虽然不像他那样干得灵活、彻底，但是，也有不少类似之处。1895年春，美国教士斐约翰与关牧师（L. B. Zuick）由澳门到贵县东津，就是“留起辫子，穿起长袍马褂，戴起瓜皮帽，售经布道”的。[②] 同年，牧晃也“乔装华妇”，潜入桂平江口圩活动。1898年，孔宏道仿效斐约翰的办法，在桂林创立了宣道会基地。而法国天主教的许多传教士，也多采用这种手法在桂西南各地活动。[③] 至于外国教士给自己取上一个带中国色彩的名字，换取人们的宠信，尤为普遍。如：法国的刘志忠(M. Ducour)、周怀仁(Heraud)、黄永彰(Poulat)、顾元俊(Creuse)、沈士杰(Albouy)、马维良(Peyrat)等。英、美教士如翟辅民(R. A. Jaffray)、梁华田(M. Landis)、蔡仁和(Child)、李爱华(Eligabeth E. Rea)、廖纪和(G. W. Leavvell)、苏慕华(L. Scarlett)等都是。

第四，给群众施医送药，或在经济生活方面施以小恩小惠，更是洋教士潜入内地活动普遍使用的手法。一个华籍牧师总结基督教“振兴广西教会”，发展传道事务时，就把“借医务传道”视为重要经验之一。当他谈到19世纪后期洋教士在广西租买铺屋，“开基传道”，屡遭失败之后说：“那时风气未开，租铺不易，每借施医赠药之名，才可租得铺成。至租得铺时，开办必须兼施医赠药，不然难免风潮呀！”[④] 说明这种手法的重要性。

---

① 斐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269页，商务印书馆，1936。

② 《宣道消息》第一七卷第一、二期，1948。

③ 民国《邕宁县志》卷四〇《社会志一·宗教》，记法国教士赖保理于1899年在明德街建立教堂时说：“当赖之来也，避免当地人乍见面怀疑，效吾华服而辫发云。”

④ 余益山：《桂南福音最兴旺时期的亲历》，见《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

“布道者”在广西的胡作非为

应该指出，外国教士到中国来，有少数人的确是诚心充当“上帝”的忠实使者，不惜背井离乡，飘洋过海，胸怀传布“福音”的激清，希望把所谓“上帝的荣耀之光”，善施于人。他们在传布“福音”时，也介绍过一些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但是，也无可讳言，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需要，不少传教士的布道活动，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侵略、扩张的需要服务的，他们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先锋。1882年，第一个为浸信会在梧州搞“开基”活动的华籍教士汤杰卿，就得到教会赐予“先锋”的称号。

百余年来，为外国侵略充当“开路先锋”的传教士，在广西干了许多超越“传播福音”的勾当。

首先是借口中外约章有“发还教产”，并在各省“置买田产，建造自便”的规定，用诱骗、讹诈、威胁等手段，大量占有土地，建造教堂，从事各种剥削和侵略活动。以天主教而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法国传教士在桂西的西林、西隆、龙州、上思等州县，建立了天主教堂近20处，每处教堂附近的田地、山场，都被他们或霸占或收买。西林县的定安区天主教堂，拥有水田85亩，分布在常井、定安、八罗等地。常井屯全部水田仅92亩，其中41亩被教堂所据有，占全屯水田面积的44.5%。而传教士还公开声言：教堂周围十里的田地、山林、皆为教堂所有。①

上思厅城和米强、那蒙等地的法国天主堂，也以蒙骗、强迫等手段买了不少田地和山林。② 19世纪60年代在象州龙女村建立的法国天主堂，亦“置有田产，年收租谷二十余万斤”之多。③ 19世纪70年代在贵县建立的天主教

---

① 林新隆：《西林教案始末》（油印本）。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三部分，《中法战争后侵略和反侵略斗争·上思教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③ 刘策群：《象县志》第二编，《社会》。

堂，据不完全统计，占有田地近700亩。仅大圩一地，教会年收租谷数百石。[①] 而法籍教士周怀仁于光绪初年进入武宣，除在乐梅经堂村“买得横直约三华里的荒地，建造大小房屋数十间”外，还买有田地200余亩，年收租谷约400石。[②] 清同治初年，法国教士潜人北海活动。1889年（光绪十五年），即在涠洲岛盛塘村建立天主堂，至20世纪初年，霸占耕地1000余亩，几占全岛可耕田地的五分之一；利用封建地租形式，剥削农民。[③] 教会占有田地、山场，以较低的利率租与贫民耕种，作为入教的条件。有的教会，同时出租耕牛，放高利贷，通过这种封建的剥削方式，榨取教民的血汗，达到养教和发展教务目的。教会成了洋庄园，教士成了洋地主。英、美的基督教会，虽然和这种封建剥削较少联系，但是，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城市掠夺土地，也是十分惊人的。1897年，英国教士麦路德勾结地方劣绅，购买了梧州三角嘴下教场的大片土地。宣统初年，美国教士用同样的手段，占有了襟江带河，形势天成的梧州螺山。[④] 1912年，另一个美国教士卢信恩买通地方官府，强买了桂林李子园民地近百亩。[⑤] 许多外国教士掠买土地，事前既不向我国有关地方当局申请，事后亦不办理登记手续，而是通过他们的领事馆，据为“教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行政主权。

洋教士侵犯中国主权，更多和更严重的是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少洋教士自以为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目无中国官府。建立在上思城内的法国天主堂，居然于1875年（光绪元年）在大门上挂起“奉旨颁行宣传天主教圣教”的匾额，堂内立有“教皇钦使”，“管理广西全省天主教事务全权主教”等高脚牌。建立在全州的圣公会，于光绪末年也挂起了“奉旨传教”的匾额。他

① 《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天主教在广西各地的概况》。

② 庞赓辛：《武宣县志》第六编《文化·宗教》；又据1974年在武宣三里、乐梅、榜村、赖村、典村的调查记录。

③ 罗威编：《北海市志》上册（初稿），1979年油印稿。

④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史料》。

⑤ 政协广西文史资料《浸信会卢信恩牧师强买李子园点滴》。

们视教堂即官府，举凡地方上的民教相争，竟多由教士审理，地方官府不能过问。在边远的西林、西隆、龙州等地，更多有这种侵犯中国行政主权的行为。① 且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关于龙州地方的一则报道：

桂抚李仲帅（经羲）以法人于龙州民政厅虽未设立，而其甲必丹已越境干涉民事。初尚为借口天主教民，嗣则虽非教民之事，亦出面干预，致民心不平。②

至于传教士借口保护教民，包庇匪类、肆意破坏中国法令的事，更是所在多有。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贵县团绅滕致祥奉命"查缉匪类解县，中有天主教徒一人"。知县陈景华把他们"骈戮之"。法国教士周怀仁以所谓："四品顶戴管理浔梧教务"的名义，向巡抚王之春提出"抗议"。结果，滕致祥反以"擅杀教民罪"含冤而死。③ 四年以后，又有"贵县天主教民吴秀芳，入教后恃势横行"，掳人勒赎，被官府提讯。法国教士丰永超（Humbert）以"观审"为名，闯入公堂，"及见该犯当堂供认，丰永超竟在堂怒喝，立即将犯带去"。县令忍气吞声，"不敢阻遏"。④ 这种教士骄横，官吏庸懦，平民受屈的情事，也是各地都有。在象州，由于"清廷诏谕地方官保护传教，遇有讼事涉及教徒者，神父辄为之请托要求。清吏庸懦，无敢与争，动辄偏袒。因此，无赖之徒，纷纷以入教为护符，而诉讼纠纷不已，平民冤抑甚多"⑤。天主教传入武宣以后，"歹民常借入教为护符，间有人民与教徒交涉争讼，教民常得优胜，良民常苦压迫"⑥。不少教士，直接听命于所属国领事，目无地方官府。1906年，广西布政使与按察使会衔，通令全省调查教会情况，列表上报。各地教会非但借故刁难，抗拒调查，且公开声称：如要调查，必须得其领事的

---

① 参看《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291页；《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基督教在桂林地区进行侵略罪行史料》。

② 引自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东方杂志》二卷，十一期，《外交》。

③ 梁崇鼎：《贵县志》卷二，《社会·宗教》。

④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东方杂志》三卷十期，《宗教》。

⑤ 刘策群：《象县志》第五篇，《文化、宗教》。

⑥ 庞赓辛：《武宣县志》第三编，《政治·外交》。

批准。结果调查工作无法进行。①

洋教士在中国各地的胡作非为，使中国地方官员的尊严受到很大的损害。长期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承认："传教士……亲自干涉或插手中国的地方政务，这是对地方官职权的一种干预行为，激怒了清朝官吏，一次又一次造成地方不安，使中国的百姓和官吏都不愉快。"② 这样，他们不但把中国的平民百姓，而且也把地方的官绅推向了"反教"的行列。

洋教士还经常打着传教的招牌，深入广西内地，搜集有关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情报，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服务。这一点，就连外国学者也是公开承认的。美国人斯贝杰（J. Speicher）认为："在美国领事与美国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谅解存在，即后者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他又说："这些先锋队（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 L. Stinson）说："我们对中国最普通的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③。在广西，从1901年起，美国领事即以梧州白鹤岗领事馆为据点，定期召集在各地活动的教士至那里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前面多次提到的陈法言，他的公开职业是美国宣道会牧师，后来又想方设法弄到了《广西年鉴》英文编辑的头衔，自命为"广西通"。他常以传教与游历为名，遍游广西三次，深入僻远边区和少数民族住地，到处采访、拍摄、绘图和收集图书文物，凡有关广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习等等，皆收揽无遗。所得资料，辟专室储存；暑期则至梧州"度假"，整理后向领事汇报。他的《开路先锋在广西》一书，总计200余页，就是一部有关广西各类情报资料的汇编。英国

① 广西文史研究馆编：《广西近百年历史资料》下篇（初稿），1959。

② 《中国问题论说集》，161～162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③ 斯贝杰：《十字架征服中国》，175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253页。

教士侯礼敦（John Holdan）是圣公会有名的"老主教"，也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和翟辅民、祁理扶（H. Lechmere Cliffe）等人，也经常收集广西的各种情报，通过领事，送回英国。英国循道会教士谭福道（Charleg Gaff）于1921年抵达梧州传教，也"经常到白鹤岗与宣道会的美国教士往来，每周都有一份英文的活页情报，内容都是一些公开的有关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电文"。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传教士竟秘密勾结匪类，组织反动武装，谋为内应。中法越南战争时，窜入上思州的法国教士就是这么干的。"该州教堂三处，徒党繁多，平日行踪已极诡秘"。1884年初，法军进犯越南北宁被阻。法国教士竟于上思"遣人四探"，并"添修坚房，勾引匪人执持军器，不服盘查"。3月1日，（二月初四日），又"有教士马若望（Barrier）、周绍良（Lacaille）来自钦州、灵山，辎重甚多，并不许人过问，形迹愈觉可疑"。还传闻"教士富於道有阴带悍匪入援河城之语"。经地方当局急调兵勇防备，马若望等"慑于兵威"，始连带辎重概行搬避。②

应该指出，在教民中间，依仗洋人的势力，欺压自己的同胞，为虎作伥，背叛祖国的是极少数，众多的教民是遵纪守法，热爱祖国的。例如：在廉州府属的涠洲墩（今属北海市），教民颇多。1885年初，法国侵略军阴谋进攻我边防重镇龙州，双方正酝酿一场血战。为了牵制我边关的军事行动，法军于2月底派出船舰，封锁北海；同时使用各种办法，串诱涠洲墩上的教民与之配合，进攻廉州，企图从腹背给我边关守军形成威胁。但是，遭到墩上教民的坚决抵制，对我军于3月痛歼法军，夺取镇南关大捷，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③

所谓文教和"慈善事业"

与传教活动并行的是开办学校和医院，从事所谓文教与"慈善事业"。

---

①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所藏文史资料。

② 参看《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九，7~10页。

③ 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五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抚戢教民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六〇。

百余年来，外国教会在广西办了多少学校和医院？一直缺乏精确的统计。据自诩为“广西通”的陈法言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天主教在广西共办了各类学校23所，孤儿院2所。而美国天主教则办了小学11所，另有主日学24所。[①] 主要者如：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法国传教士富於道在上思开办了一所训练教徒的学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法国教士罗惠良和苏安宁（Bertholet），分别在贵县和象州龙女村成立初级小修道院和初级修女院。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南宁开办法中文学院（即苏安宁学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法国天主教圣母会在桂林也开办了法中文学堂。而在北海，法国天主教于1898年办了法国学堂；德国则于1901年办了德华学堂。稍后，美国办了建光小学。此外，还经常搞一些施医送药的活动。

基督教更重视办学工作。据教会的统计，从1895年至1919年的25年间，新教在广西办学的情况如下：

初级小学49所，多于甘肃、新疆、蒙古、西藏四个省区；

高等小学6所，多于甘肃、新疆、西藏三个省区，而与蒙古相同；

中等学校2所，多于陕西、甘肃、贵州、云南、新疆、蒙古和西藏。

在中等以下的学校中，学生总计为1513人，多于甘肃、新疆、西藏和蒙古。中学生170人，多于甘肃、新疆、贵州、云南、蒙古和西藏。[②]

此外还有书局、书楼、护士学校、幼儿园等多所，以及各类传教书报刊物多种。要者如：1906年法国天主堂在南宁明德街创办的传教图籍印务所，1909年和1913年美国浸信会分别在梧州、桂林创办的真光书楼，稍后又在梧州创办了浸信书局，并在梧州、桂林等地先后出版了《真光旬刊》、《和会季刊》、《福音报》、《晨光报》和《由道月刊》等布道刊物。[③]

---

① 《开路先锋在广西》。

② 《中华归主》，612页。

③ 参看《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广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广西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史》，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桂林市年鉴》十六，《宗教》，民国三十八年；以及《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等。

1895年，美国浸信会在平南石塘开设的培德学校，是基督教会在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学校；严格地说，也是广西有新式学校的开始。但是，论其影响，则以梧州培正中学为最著。1889年（光绪十五年），浸信会首先开办培正中学于广州。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梧州浸信会办开明学堂。1905年，改名培正分校，1920年，更名梧州培正中学。此校教学质量较高，在当时全省私立中学中名列前茅。而贵县、永福、罗锦和平乐同安等地也先后有培正分校。另一所影响较大的教会学校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开办的梧州建道圣经学院。它和湖北的武昌圣经学院，是美国宣道会在中国开办的两所著名经院。它的任务是专门培养教牧人才。课程以研习圣经为主，兼修中外语文和史地，和培德学校、培正中学等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主修科目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它的学生，来自华南十省，以及香港、澳门、安南（越南）、暹罗（今泰国）、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美国等地。开办50年，学生以千计，毕业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从事传教工作。它在广西所有的教会学校中，可说是历史最长、影响很大的教会学校。①

天主教所办的学校，除了在本地招生外，还注意选送一些“热心”和“诚实可靠”的年青教徒到南洋的槟榔岛神职学院“学习深造”。这项工作，从1884年开始，至1923年，从不间断。“培训成功”回国以后，即授以“神职”。② 如果基督教宣道会所办的经学院兼招海外学生来广西留学的话，则天主教的学校更注重派广西青年教徒出洋留学。这些，在广西留学史上都是开风气之先的。③

外国教会在广西开办学校的同时，还创办了医院、药局、瞽目院等所谓

① 1903年又办建道圣经女子学院，至1938年男女学院合并为建道圣经学院。1951年正式宣布停办。参看《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第204、273～279页。

② 参看廖简生译：《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1903年第13～18期，又参看《开路先锋在广西》。

③ 请参拙文《史志读札·广西最早的留学生》，见广西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社会科学探索》，1988（4）。

"慈善事业"，要者如：

1899年，英国循道会在梧州办的西医院。

1902年，美国浸信会在梧州办的思达医院。

1907年，英国中华基督教传道会创办的道救医院，法国天主教创办的玫瑰医院。前者在南宁中山路，后者在南宁明德街。

1911年，英国圣公会在桂林办的道生医院。

1914年，美国安息日会在南宁办的小乐园医院。

1916年，美国浸信会在桂林办的浸信会医院。

此外，在其他传教地区，还有不少诊所和所谓施医、施药点。①

说到教会学校，不能忽视它对广西近代教育的影响。教会学校采用的分年级学习制与班级授课制，在教学中注重实验方法，为后来兴办近代新式学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自然科学、外国语言、史地以及音乐、体育等课程的开设，也以教会学校为最早，而且介绍了某些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教会创办的各类女校，也是广西最早的女学。据统计，在1907年清政府正式准许设立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之前，教会已在广西办了多所女子学校，要者如：1898年由英美宣道会创办的梧州建道圣经女校，1906年美国浸信会创办的梧州宏道女校和安道女学；稍后，美国浸信会于1914年在桂林创办了培真女学、培贤女学；培真女学还在平乐同安设立了分校。② 这些教会女子学校的开办，对于广西女子入学接受教育，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在广西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

① 参见朱名遂等编：《广西通志·宗教志》第一、二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广西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史》；陈雄林：《山城风暴——"五四"运动前后在梧州的见闻》，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等。又据罗威编：《北海市志》中册（初稿）十六，《教育和文化》载：北海开埠不久，英国教会即在该地建立普仁医院，1886年和1890年，先后在医院内附设男、女义学，分班教学，1905年男女学童增至140余名。

② 参看《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广西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史》、《山城风暴——"五四"运动前后在梧州的见闻》等。

但是，由于教会办学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直接或间接地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相联系。因此，他们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是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而是为了适应欧美列强对华侵略的需要服务的。这一点，无论是外国的传教士，还是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都是直言不讳的。《开路先锋在广西》的作者陈法言写道：宣道会在梧州开办嘉密小学和幼儿园，其目的是"特别为保护信徒的儿童而开设的。使学龄儿童避免从政府学校而来的迷信毒害之影响和唯物主义教育，给予宗教教育"。

1890年，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享有"基督教教育专家"之称的英国教士狄考文（Calvinw Mateer）公开宣称：

>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有的统治地位。①

说明教会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要用他们的文化思想，造就一批所谓"新式的知识分子"，以战胜中国的旧式士大夫，进而替代他们所占有的统治地位，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会学校的主持者是教士，办学的大计方针操之于教会，《圣经》成了学生的主修科目。他以《圣经》中"你们不属于世界"的说教，妄谈基督教徒有两重国籍，要人们爱所谓"永久的天国"，忘却地上的祖国。但是，历史证明，大多数的中国人，在接受教会学校传播的西学知识以后，并没有忘记祖国，而是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奋发进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和教会办学的初衷相悖的。

① 参看曾钜生《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见《光明日报》1988年2月10日。亦有说狄考文为美国籍教士的。

至于开办医院、药局等“慈善事业”，把西医、西药和科学的医疗诊断手段传入广西，同时在梧州、桂林、南宁等地培养了一批新式的医护人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① 但是，毋庸讳言，他们开办的许多“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传教以及侵略扩张相联系。一位华籍牧师说过：教会办学，是为传教育人才；兴办医院，可“借医务传道”。② 法国天主教则认为：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教外人士了解和接近教会”。而收容那些“被抛弃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婴儿入孤儿院，“可以成为不幸的婴儿进入天国的桥梁”。③ 在教会所办的许多医院、孤儿院里，也同时设有专职的布道者。梧州的思达医院，就被视作“推广福音工作”的一根“钢筋支柱”④。1899年，英国安立甘教会的裴乐义（Lauio Byrde）到桂林，因群众反对，数月未能登岸。后来就是通过“施医赠药”，始得上岸租屋传道的。⑤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教会就把医药卫生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认为它可以“改善中国人俗世的、社会的状况……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⑥ 1838年2月，他们在成立“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更直言不讳地宣称：其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间行医”，通过这种手段，“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将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⑦ 说白了就是通过医药和传教，推倒中国人的民族思想的长城，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开辟道路。

---

① 按：广西最早兴办的西医院，是1925年的梧州公立西医医院。30年代以后，西医才逐步在广西推广。

② 余益山：《桂南福音最兴旺时期的亲历》，见《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

③ 《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第250期。

④ 《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

⑤ 《桂林市年鉴》一六，《宗教》。

⑥ 《中国丛报》，1835年12月，386～389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⑦ 《Chinese Repository》，37～44页，1938年5月。转引自张力、刘鉴堂：《中国教案史》，273～274页。

我们还必须指出，有些外国教会开办的所谓“慈善”机构，实际是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人民的牢狱！以英国教士在南宁所办的育婴院为例，每年养活率不及收养儿童数的四分之一。英国教士在桂平所办的孤儿院和瞽目院，一些孤儿、盲人也经常受到残酷的虐待。这是解放以来不断被人揭露的事实。①

总之，外国教会和教士在广西的侵略活动，和他们在中国各地所干的一样，也是无孔不入的，而其危害也极大。如果借用《圣经》的话说：许多洋教士“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伪善和不法的事”。外国教堂和他们开办的所谓“慈善”机构，“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因此，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

三、“民教纠纷”和“教案”

翻开近代广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反对外国宗教侵略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对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惩罚，也受到全国反帝斗争形势发展的制约。地主、官吏、士绅和平民百姓，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这些“民教冲突”之中，情况十分复杂。根据对中外各种有关史料进行梳理，近代广西出现的“反教事件”不下数十起，有的还引起了国家之间的交涉，形成历史上的所谓“教案”。为了说明情况，容先列表如下：

① 据《北海市志》上册（初稿）记载：1951年8月，经群众检举，在法国天主教开办的涠洲岛育婴堂（两所）和在北海开设的“法国医院”内进行挖掘，共发现被残害死者的骸骨2580余具之多！

广西近代民教冲突简表

(1856~1919)[①]

时间	地点	原因	教派	简况
1856~1858 咸丰六~八年	西林	反对法国教士马赖非法入境传教	天主教	处决马赖。法国提出交涉，清政府革西林知县职，赔款20万两。
1857 咸丰七年	西林	教民恃势起衅，民教冲突	天主教	绅民执教民卢是美、王炳、林昭（女）送官处死。
1862 同治元年	梧州	反对美国教士非法潜入梧州传教	基督教	驱逐教士纪好弼出境。
1865 同治四年	桂林	反对美国教士纪好弼、璧摩潜入桂林传教	基督教	群众发出揭帖，相约不租房屋，不接受传教书籍，焚毁教士所雇船只，教士遁走。
1869 同治八年	梧州	反对法国教士富於道租屋传教	天主教	官绅查封房屋，驱逐教士，富於道隐居龙华塘。
1871 同治十年	西林	反对天主教神父租屋，企图恢复传教基地	天主教	西林县城教堂被拆毁，法国教士索赔不遂。

① 本表主要参考广西各府州县地方志书，各地文史资料，《清季教案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中外旧约章汇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以及教会和私家的记载制成。

时间	地点	原因	教派	简况
1871 同治十年	梧州	反对教士贩卖“神仙粉”欺骗群众	基督教	捣毁纪好弼竹椅街诊所，袭击仕文所雇乘船，并驱逐出境。
1872 同治十一年	上思	富於道潜入十万大山，建立“殖民地教会”	天主教	县官逮捕富於道，并予以痛责。
1878 光绪四年	西林	法国陈神父（G.B.Chanticlair）潜入西林，激起众怒	天主教	陈神父被击伤腹部及腿部。
1880 光绪六年	南宁	反对法国教士赖保理在南宁传教	天主教	击毁赖保理坐船，拆毁教堂房屋，驱逐赖保理出境。
1880 光绪六年	西隆	陈神父非法潜入西隆	天主教	将神父驱逐出境。
1880 光绪六年	十万大山	民教冲突	天主教	法教士被击，狼狈遁走。
1880 光绪六年	贵县	衙兵受教堂贿赂，勒抑平民，犯众怒	天主教	殴毙衙兵，攻击教堂，署贵县事李宗庚以衙兵“死由自取”，不缉“凶”、不详报。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1881 光绪七年	百色	反对法国顾神父潜入西林、百色活动	天主教	顾神父在船上被杀，县官疑为船主行凶，予以拘审，船主自杀。
1883 光绪九年	梧州	反对教士在梧州设教堂并干涉中国内政	基督教	8月，群众围攻华籍教士汤杰卿，拆毁教堂，汤杰卿逃往广州。9~10月，美教士仕文入梧州交涉，群众议禁教，逐仕文。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按约处理”。
1883 光绪九年①	贵县	反对法国李神父、罗惠良图谋不轨	天主教	群众没收三板桥教堂教产，逮捕李神父与罗惠良。法国提出交涉，乃释去。同年，木格、飞上坪、东碑、沙塘亦有反教事件，洋教士惊呼为“教难”。
1884年1月 光绪九年十二月	上思	法国教士周绍良等密藏武器，勾结匪徒，图谋不轨	天主教	兵勇盘查教堂三处。教士将武器转移，周绍良、马若望亦潜逃无踪。官府勒令暂停传教。

① 民国《贵县志》卷二记三板桥事件在光绪八年。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1884 光绪十年	贵县	反对法国教士趁中法战争之机,图谋不轨	天主教	三板桥群众再次冲击教堂,教士罗惠良逃避香港。
1884 光绪十年	北海	法国教士聚集教徒近300人，谋往越南助乱	天主教	练勇奉命查封教堂，限令法教士出境，教民闻风散去。
1884 光绪十年	柳城	反对法国教士擅入内地传教	天主教	驱逐教士出境。
1884 光绪十年	武宣	群众反对法国教士入境传教	天主教	拆毁三里圩教堂
1885年1月 光绪十年十一月	上思	为防教士勾串匪徒谋乱，策应法军侵越	天主教	拆毁上思主教堂及教士住宅，教士赖保理、司立修以及贵县座堂的黄永彰逃往香港。
1886年5月 光绪十二年四月	桂平	美国教士富利惇非法擅开医馆	天主教	群众拆毁医馆，地方官派兵弹压并护送教士出境，美领事索赔5000元被驳回。
1886年5月 光绪十二年	郁林	群众不满法国发动侵略越南战争	天主教	法国教士罗惠良被殴伤，教堂产业被没收。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1887 光绪十三年	罗城	民教冲突	天主教	法国马神父在龙安教堂被击伤，逃入柳城沙浦，死于武宣三里圩。
1895 光绪二十一年	贵县	反对教士乔装华人潜入内地传教	基督教	美国教士斐约翰、关牧师乔装华人潜入东津被识破，被驱逐出境。
1895 光绪二十一年	桂平	反对教士乔装华人潜入内地传教	基督教	美国教士牧冕乔扮华妇，潜入江口，被群众驱逐。
1896 光绪二十二年	平南	美国教士李惠良包庇匪徒胡为	基督教	教堂被毁，清政府允赔偿千余元结案。
1897 光绪二十三年	凌云	游勇痛恨法国侵略	天主教	游勇首领游维翰执杀法国教士邓神父于乐里，清廷捕游维翰正法，下令保护教士、教堂。
1898 光绪二十四年	永安	法国教士苏安宁借口受乡民侮辱，私设公堂，审讯并殴打乡民	天主教	群众捕杀教士及随从二人，清政府在法国提出交涉后撤州官，斩“凶”手，并赔款4万两。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1898 光绪二十四年	平南	民教纠纷	天主教	法国教士周怀仁座堂被毁，教产被没收。
1898 光绪二十四年	武宣	民教纠纷	天主教	群众捣毁法国教士住宅。
1899 光绪二十五年	桂林	反对教士借行医为名传教	基督教	美国教士斐乐义夫妇从香港抵桂林，群众不准登岸，教士困居船上数月。
1900 光绪二十六年	合浦	居民反对传教	天主教	德国教士巴顾德购民房传教，居民聚众拆毁，德国派兵舰至北海交涉，廉州知府高纯允偿兵费6000元，并同意易地另建教堂。
1901 光绪二十七年	永福	民教纠纷	天主教	法国教士傅泛济（Rue）、唐定球在寨沙被击伤。
1901 光绪二十七年	桂平	民教纠纷	天主教	法国教士周怀仁被人击伤。
1902 光绪二十八年	贵县	官绅处死为匪教民	天主教	知县陈景华令团绅滕致祥缉拿匪类，中有天主教徒，景华骈戮之。法国教士周怀仁“抗议”，景华又将滕致祥处死。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1904 光绪三十年	桂林	民教冲突	不明	有西教士二人行经桂林地方“被匪杀害”。
1904 光绪三十年	平乐	民教冲突	基督教	美国教士花友兰（W. A. Farmer）在平乐租屋立教堂，居民群起反对，禁止租屋，驱逐教士出境。
1906 光绪三十二年	梧州	英教士麦路德被人误杀于从广州回梧州途中	基督教	英政府向清廷交涉，清廷允赔款800两，地方官为死者送殡致祭。
1906 光绪三十二年	柳州	民教冲突	基督教	美国教士花友兰、陈法言至柳州租屋传教，居民群起驱逐教士。官兵驱散群众，保护教士。
1906 光绪三十二年	龙州	民教冲突	基督教	美教士希乃锡（Isac L. Hess）、戴牧师至龙州租屋传教，群众将教士驱逐出境。
光绪年间①	象州	民教冲突	基督教	寺村教民仇月清与朱秀才发生争执，数儿童扯破仇月清的长衫。教士麦惠来以报告领事相威胁，州官判朱秀才烧炮道歉，下跪“认罪”结案。

① 据牧冕《广西浸信会概略》说寺村教堂的成立在1906年。

时　间	地点	原　　因	教派	简　　况
光绪末年	全州	群众反对传教	基督教	英国教士班为兰(W. M. Banister)租屋传教,群众反对。英领事出面交涉,州官发布告示,保护传教。
1909 宣统元年	桂林	民教冲突	天主教	1907年，法国圣母会修士开办法文学堂。两年后被迫停办，教士离去。
宣统年间	梧州	反对教士勾结劣绅私买公地	基督教	美国教士与劣绅勾结掠买螺山公地。群众反对，非法卖买被制止。
1913 民国二年	全县	民教纠纷	基督教	圣公会在全县开办福音堂，群众反对，英国向清廷提出干涉，要求保护教堂。
1915 民国四年	西林	民教纠纷	天主教	刘家屯教堂被查抄，死教徒二人。
1919 民国八年	梧州	教士干涉学生爱国运动	基督教	教会学生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美教士希乃锡、霍济群（Alvin W. Field）出面干涉，激起公愤，教士被迫让步。

综观上表可知，从1856年到1919年的63年间，广西出现“反教事件”有据可查者49起，其中涉及天主教者31起，涉及基督教者17起，另1起归

属不明，没有见于记载的一般“反教”、“逐教”事件肯定还有，因为史料不全，只有留待以后查考了。

“民教纠纷”原因的分析

激起这种广泛的、接连不断的“反教”事件，从全国范围而论，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也至为复杂。1898 年初，驻美使臣伍廷芳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

> 教案之所以多者，推原祸始，则由昔年之订立条约，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实则通商利多害少，传教则不然。盖富商硕贾，身家既厚，爱惜体面而不肯为非。传教者阳托劝人为善之名，广为号召门徒之举。……及来中土，气焰倍张，内地不逞之徒，又从而煽惑，为之羽翼，每借入教以抗拒官长，凌轹平民，群受其害，则归怨于教士，积忿既久，衅端乃成。①

义和团运动以后，有人曾以《论教案之由来》为题，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教案”发生的原因。这就是：

> 道光二十三年通商以来，教案问题，遂为中国前途第一大事。六十年间，凡有西洋交涉之事，割地赔款，莫不因之。……自传教以后，传教载入条约，宗教始与政治相连，而滔天之祸从此始矣！寻教案之成，千因万缘而得之，则必以六端为质干。一、各国政府虽不信教，而常乐保护其传教人，以为扩充权力之地也。二、各地神甫非必甚信其教民，而必以招纳棍徒干预词讼为招徕也。三、各地教民亦非真有见于其教，而徒以教堂为词讼之保险行也。四、各地平民亦有所深仇夙忿于教民，但因教民之有恃无恐，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使之吃亏也。五、各地地方官亦非真有恶于其民也，实以

①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使美伍廷芳奏教案迭起内治无权请变通成法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

朝廷保教之谕言之至切，欲求名位之长保，必得神甫之允可，必需教民之愉快；欲博教民之愉快，必需平民之受亏也。六、朝廷亦非不知民教之不相平也，但以畏兵队之故，不得不畏驻使；畏驻使之故，不得不畏神甫；畏神甫之故，不得不畏教民；畏教民之故，不得不重压官吏也。①

这篇评论，把半殖民地国度里发生"教案"的诸种原因刻画得淋漓尽致，合乎历史实际。

广西的情况也不例外。但美国传教士牧冕谈到广西"教案"时却说：广西人民普遍"反教"，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经常有外国人到广西收买苦力，即常说的买卖"猪仔"。因此，人们把外国教士也看作他们的同伙而感到厌恶。二是由于洪秀全利用耶稣的名义，发动反清的太平天国革命。因此，官府把相信基督教的人也视为"造反者"而加以反对。三是因为曾国藩当时最有权势，经常刊刻各种书籍传入广西，反对"基督真理"，"遂使人越发顽梗"。"所以，反对真理最力，而传道人入驻十八省中则又以湘桂二省为最难"云云。②

牧冕的见解，只能部分地反映初期的反教情况，"西林教案"就是个典型例子。

1856年，广西西林县发生处死法国教士马赖事件，是地方官与洋教士的直接冲突。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六年。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号在广西聚众造反，封建官绅记忆犹新。所以，要防范人民革命，也必须防范外来的宗教活动。西林县官逮捕法国教士马赖与白满、曹桂英三人并处死以后，法国政府向清廷提出交涉，声言要"为保卫圣教而战"。两广总督叶名琛处理此案时，就始终把洋教士潜入内地活动与人民造反相联系。他说：弛禁洋教以来，"内地会匪，相习成风，一经查拿，多称系该国（按指法国——引者）教

① 该文分上、下两篇，见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中外日报》，转引自《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期，《宗教》。

② 参看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1934。

内之人。伏思连年倡乱，蔓延数省，即由广西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① 其实，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所宣扬的“上帝”，和洋教士宣扬的上帝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他们硬拉在一起是不对的。但是，害怕人民造反，因而也害怕洋教传入内地，这却是当时官绅们的普遍心理状态。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宗教与政治相连。特别是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或发动武力侵略的时候，官绅和百姓的“反教”情绪更加激烈，民教纠纷也更加频繁，而“反教”所反映的反帝色彩也愈加鲜明。让我们把63年间广西“民教冲突”发生的时间及其次数加以考察，自可明白。

19世纪50年代，只有2次。

60年代，发生3次。

70年代，增至4次。

80年代，猛增至16次。

90年代，共有10次。

20世纪头10年，也有8次。

20年代，减至3次。

另有3次，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的对外掠夺竞争十分激烈。中法战争就是这种掠夺在中国的反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广西的安危存亡。战争发生前夕，桂西的南宁、太平、泗城等府的士绅，已经从法国在越南建堂传教的后果中，察觉到建堂的危险性。他们指出：洋教士“必将里外勾通，蚕食为害，不可不防”，② 中法战争期间，在上思、北海两地发生的多次“教案”，就是因为教士利用教堂，“勾引匪徒，暗藏武器”，图谋滋事；或者明目张胆地唆使教徒扰乱地方治安，策应法国在越南的军事侵略而起的。其他如贵县、桂平等地的“反教”事件，直至90年代的凌

① 咸丰五年八月十八日叶名琛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

②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广西巡抚庆裕奏《法人欲在南太等府建堂传教预筹防范片》，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八页。

云“乐里教案”、“永安教案”，也是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对侵略者的惩罚。民国《田林县志》第六编《宗教》条论“乐里教案”说：

有游维翰者，龙州水口人。初隶冯子材部下，参加中法战役，有众数千，后归苏元春统属。光绪十二年，中法议和，游极愤慨，因私攻法营不利，不容于苏，饷糈断绝，遂率众西来，抵乐里时，法新来教士三人甫至三日，游愤恨，捉教士杀之。

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而“反教”，这是洋教士也承认的。和为贵在《广西天主教史》中写道：游维翰在乐里“谋杀教士的动机，表面看来是由于贪财害命。但司立修主教指出：‘罪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怀恨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所引起的。’”广西人民“反教”斗争的矛头主要针对天主教，而“反教事件”在19世纪80年代迅速形成高潮，是和中法战争、民族矛盾高涨息息相关的。和为贵在同一本书中指出：“1885年，中法战争后造成了很不利的后果。在黑旗军的故乡（指广西）的老百姓，对法国人以及一切意味着法国的事物都怀着深刻的仇恨，社会人士都不约而同，好似遵守公约一样，都抱有报复、怀恨的心情。”

90年代的情况更为复杂，继北海、龙州的开放，梧州于1897年也正式开放。美、英等国在梧州设立领事馆，加紧和扩大对广西的侵略。而清政府自从中法战争以后，认定泰西之教，“在劝人为善”。“凡在中国或崇奉，或传习天主、耶稣教之人”，皆应保护。① 再就是1898年的“永安教案”，西太后那拉氏更迭颁懿旨，声言“中外一家，谊应不分畛域”，各国传教士之在内地者，应“实力保护”；且指责人民群众“反教”为“造谣生事，轻启衅端”。命令各直省大吏应“劝导绅民安份自守，毋得逞忿启衅”，否则从重参办。②第二年，总理衙门为了使民教相安，便于“保护”起见，还专门拟订了地方官吏上自督抚，下至府厅州县等，应各依品位高低，对等地接待总主教至司

---

①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总署奏《各省教案迭出请旨饬各省督抚迅速筹办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

②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懿旨，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四。

铎等各类教士的规定。[①] 从此，洋教士更有恃无恐，在各地为所欲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加以清政府的“袒教抑民”，因此，90年代以后的“反教”斗争，出面参与者主要是平民百姓，表现为“民教纠纷”，而且多数具有反帝和反对封建官府的双重色彩。

四、官绅、百姓、洋人与“教案”

在讲述近代广西“教案”史时，考察一下官吏、士绅、百姓和洋人在“教案”中的态度及其变化，是极有意义的。

在近代，当外国传教士潜入内地活动初期，官吏、士绅和平民百姓多采取反对的态度，全国如此，广西亦然。在许多场合，官绅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前面说过，1856年的“西林教案”，就是以张鸣凤为首的地方官绅直接同洋教士的冲突。而从叶名琛到劳崇光等地方督抚，在处理“西林教案”的交涉时，无论是向朝廷奏报，或答复外国的诘难，也多为地方官绅进行辩解。[②]“西林教案”交涉的结果，清廷以惩官、赔款实行妥协。虽有“自此传教、习教之徒，虽在华民，亦明目张胆，恃外洋领事为护符，而弁髦官吏矣”之说。[③] 但是，实际上，官绅并不因此却步，而是更加痛恨教堂和教士。张鸣凤被革官充军之日，地方绅民夹道相送。不久，张鸣凤又先后出现在平乐府和南宁府的衙门里了。而且，就在马赖被处死的第二年，西林县的绅士，又逮捕了三名华籍教徒，交由官府严厉惩办。[④] 说明当时大多数的官、绅、民在“反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七。

② 参看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叶名琛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

③ 岑启沃：《田西县志》第六编，《文化·宗教》。

④ 《黔疆诸证》卷四七。

教”上的立场和行动都是一致的。

60年代发生在梧州和桂林的三次“反教”事件，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地方士绅。他们带头反对洋教士登岸传教，遍张揭帖，号召居民“绝不租屋与传教洋人”，“不听传教，不受洋事”。正是由于地方士绅出面倡导，官府可以放心不问，群众可以放手行事，终至群情激愤，人人相约抵制洋教。①

在近代中国的反洋教史中，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由于曾国藩在处理1870年的“天津教案”时，以所谓“惩凶”、道歉、赔款及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等办法，对法国侵略者妥协。从此，在滨海和中原内地各省，地主、士绅逐步退出了“反教”的行列，而不少官吏，在清王朝三令五申“保教”的指使下，也纷纷走上了“袒教抑民”的道路。但是，在广西，情况并不一样，不少地方官吏，仍旧站在“反教”的前列。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清政府根据条约，也曾明令各省地方官吏昭示百姓知晓，而广西地方官吏并未认真执行这个命令。直至1877年，法国公使白罗尼（N. B. Montmorand）在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还特意指出：“法国的和约条款，（广）西省各州县尚未张贴，传教士无人保护。”② 和为贵讲述法国天主教在广西发展的历史，就把1875年至1899年称为天主教的“艰苦磨折”时期。他写道：

> 广西教区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问题是如何争取当地官员的赞助，求得进一步发展。为了使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关于保护天主教的条文精神如同在全国其他省份那样，能早日在广西实现，富于道副主教虽然运用了许多巧妙手腕。但由于中国政府及地方官员居心不良，此外也由于法国驻华大使的软弱无能，致使上述条约的条款仅能获得一半成效。……允许所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教堂，

---

① 参看《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拙文《桂林人民的一次反洋教斗争》。

② 《刘坤一遗集》第五册，2409～2410页。

购买或租用土地。……在广西省仍长期不生效，变成一纸空文。[①]

说明洋教在广西传播，受到地方官员和绅士的抵制是十分普遍的。它所发生的遏制作用，与全国其他省份也不完全一样。70年代以后，广西有些地方的官员，虽然没有公开出面“反教”。但是，他们痛恨洋教士干预地方事务，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是支持“反教”的。前述1880年贵县衙役受教堂贿赂，抑勒良民，触犯众怒，被群众“共殴毙命后”，县官李宗庚以衙兵“死由自取”，既不“缉凶”，又不详报，[②] 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反映。1882年，倪文蔚出任广西巡抚，在奏报接篆日期的“附片”中，一面指出“洋人设堂传教，颇拂舆情”；一面又认为：洋人传教乃“条约所开，何敢显背”？表示对民教争端，“惟有劝谕妥办”。而不是严禁或严办“反教”者。[③]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教士富于道、司立修等千方百计想在桂林建立传教基地，并为此先后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直接听取法国公使、领事的指点，与清政府的有关官员进行交涉，但都因广西“从省级到县级政府的阻力”，“一切都徒劳无效”。[④] 直至1898年“永安教案”发生，清政府革去知州何臻祥官职，并发布谕旨，明确指出：教案出现，由于地方官吏对洋教“意存歧视，畛域未化”。严令“地方官实力保护”教士及教堂，“以后不许再有教案”，否则“依章从严惩办”。[⑤] 以后，各级官吏才逐步改变“反教”立场，走上“护教”或“袒教抑民”的道路。1901年，素为“教案”多发区的西林县，竟出现了县官参加法国天主教的祝圣典礼。[⑥] 第二年，另一个“教案”热点的贵县，又发生了前面讲述的县官命团绅缉匪，杀了为匪的天主教徒，因教士抗议，竟又“冤死”团绅以见好于洋人的事件。这些，

---

① 《广西天主教史》。

② 梁吉祥：《贵县志》卷三，《纪官·列传·功勋》。

③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光绪八年四月十二日。

④ 《广西天主教史》。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⑥ 《广西天主教史》。

都是地方官吏从倾向“反教”到走向妥协的典型事例。而1906年在西江发生的英国教士被杀案，梧州道台以下地方官员向英国国旗与死者行“三跪九叩”大礼。[1] 更是被迫彻底转变立场的表现。总之，20世纪以后，由于地方官府对洋教态度的转变，“外国教士与中国政府的交往越来越亲善”，广西从省会桂林，直至全省各府、州、县的大门，已向外国传教士开放了！[2]

士绅则不同，他们界于官与民之间，近官而非官，近民而又与民有别。他们不是地方政务的直接负责者，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们的“反教”立场变化不大。1883年发生的“梧州教案”，知府对洋教士的要求本来有意承诺，而士绅却坚持反对态度。“激动人心，出有极恶告白”的是他们；继而“聚众千百余人”，掀起群众“反教”风潮的也是他们。[3] 1898年的“永安教案”，实际上也是在地方士绅的鼓动组织下发生的。[4] 进入20世纪以后，不少“反教”事件仍有士绅参加，有的公开出面，有的暗地支持。合浦、平乐、柳州、龙州、全州、梧州等地反对教士租赁房屋，买地建堂传教，也多是士绅出面主持的。所以，论述近代广西反对外国宗教侵华史，不应低估士绅的作用。但是，由于士绅的特殊地位，当“反教”引起对外交涉，清廷严令查办责任者时，士绅又往往成了当官的替罪羊。前述的贵县团绅滕致祥的冤死，象州秀才朱某被迫向教士低头认罪，以及在查办“永安教案”时黄政球的被革职，就是证明。

20世纪20年代以后，陆荣廷旧桂系逐步失去了对广西的统治权，全省“群雄无首”，局势大乱。过去，官护教不力吃尽了苦头，故民间有“若要不丢官，出力保教堂”之谚。而在军阀混战，全省处于无政府的乱世，官绅为

---

① 参看《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史料》。

② 《广西天主教史》。

③ 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杨约翰致奕䜣照会》，转引自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429页。

④ 参考钟文典、萧辛《1898年的永安教案调查》，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5)。

了自保身家，进一步倾向教堂，祈求洋势力的帮助，屡有发生。如：1921年7月，粤军入桂，旧桂系战败，桂平县官绅入教堂"避难"，人满为患。10月，粤军败于贵县石龙、覃塘，法教士黄永彰、陆文思（Labully）竟受委托为调停代表。同年秋，粤桂军在上思州交战，军行所至，到处洗劫，独那蒙教堂安谧如常。地方官绅请法国教士居间调停，并委以代管地方事务，"充当他们的头目"，还把地方的3000杆枪也交给洋教士。在桂林，也一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时除了教堂，似乎从城市到乡村，已无一处是安全地带了！那些平日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县官，师长、军长、司令等等，一旦失意或战败，多把教堂作为自己的避风港，[①] 而洋教士则趾高气扬，"逢官高一级"，"人见怕三分"了！

至于平民百姓，除极少数"吃教"、"从教"者外，绝大多数对教堂始终持反对态度。每遇教士欺压善良，干下侵权辱国的不法行为时，真心实意坚决起来抗争的，正是这些村夫和城镇平民。随着封建官府的日益转向"保教"，国家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重，平民百姓的"反教"也日益兼有"反官"的性质。在全国反帝爱国浪潮的推动下，青年学生也加入"反教"斗争的行列。这是后话，将结合"五四运动"在广西的历史加以叙述。

总之，洋宗教的侵入，洋教士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也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的。它对广西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极坏。而人民的"反教"斗争，构成了反帝反封和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广西历史的重要篇章。

---

① 参看《广西天主教史》。

第八章　援越抗法，设防实边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两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又逐步向我国边疆和周边邻国发起进攻。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就是这种侵略的重大事件之一。法国侵略越南，其目的也在侵略中国。“越桂原来是近邻，情同兄弟一家亲。”① 当法国发动侵越战争的时候，地处陆战前线的广西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援越抗法的战斗，他们与越南军民以及国内各路友军通力合作，在越南前线，在西南边关，痛歼法国侵略者，取得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中西战争第一大捷”②。战争结束以后，广西军民经过10年的努力，从事千里边防建设，对捍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① 1984年10月25日黄文欢给《广西日报》的题诗，后两句是：“豆箕七步吟诗短，唇齿千秋道义深。”见《广西日报》1984年10月26日。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冯将军歌》。

一、中越关系和法国侵略阴谋

源远流长的中越关系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烟波浩渺的南海，拥抱着两国东南边境。众多的大小河川，共同哺育着两国人民。长期以来，中越两国人民互通有无，患难与共，彼此声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纵观悠久的中越两国人民交往史，正如毛泽东所说：

> 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①

胡志明也认为：

> 越中两国人民早就有过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近百年来，两国人民都曾长期饱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兄弟。②

两位历史巨人的论断，讲清了中越关系史的主流。

当然，在两国封建统治者之间，长期以来，也有过所谓“宗藩”的隶属关系，甚至有过兵戎相见的时候。但那绝非两国关系史的主流。即以近代的“宗藩”关系而论，也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有原则的区别。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附属国，往往是武力强占，灭人之国，派遣官吏，设置警察、监狱直接进行管理，控制其内政、外交，掠夺其财富资源；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毫无自主与自由可言。而中国在历史上与“藩属国”的关系是

①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转引自《人民日报》1967年12月9日。

② 1955年6月26日在周恩来总理招待越南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人民日报》1955年6月27日。

互有义务的，主要表现在："藩属国"对"宗主国"应奉其"正朔"和定期"朝贡"，其中并不存在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而"朝贡"所得到的"赏赐"往往是更多的。至于边界通商，也是自由和互利的。"宗主国"对"藩属国"则负有"兴废继绝"、或曰"继灭存亡"的义务，同时保护所有的"藩属国"不受外国的侵略。在国际上，两国是互相依存、互为保卫的。因此，历史上的这种"宗藩关系"，在很长的时间内，往往出于双方的需要，不存在什么强制与压迫。远的且不说，就以中国元、明两朝而论，交趾[①] 因为变乱纷呈，王位迭更，交趾当政者即纷纷向中国请封求助。清王朝建立以后，安南国王黎维祺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主动"遣使上表来归"。两年后，维祺病死，其子维禧继位，向清王朝"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清康熙帝封其为安南国王。[②] 18世纪80年代，黎氏王朝国王被阮氏驱逐，阮光平一再遣使向清王朝"进表"、"进贡"。清乾隆帝敕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③] 所谓"宗藩关系"，不过是两厢情愿的封、贡关系而已。说明这种关系的实质，了解所谓"宗主"与"藩属"各自所负的责任，对理解清王朝当年在"保边"、"护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中法战争就是中越两国共同反抗法国侵略，互为护卫两国权益的正义战争。就清王朝而言，也就是履行"宗主国"对"藩属国"应尽的义务。

法国侵略中越的阴谋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以来，法国资产阶级就把他们贪婪的眼睛转向远东了。特别是18世纪后期，法国在北美与印度的势力受到英国的排挤以后，他们就把吞并越南，进而侵略中国作为向远东扩张的基

---

① 越南古称交趾。我国古代典籍如《尚书》、《墨子》等皆有关于交趾的记述。公元679年（唐仪凤四年，调露元年），改交趾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故又称安南。

② 参看《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谕；卷一九，康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谕。

③ 参看《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三，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谕；卷一三三七，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谕。

本方针。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法国大主教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凭他长期在越南各地传教与调查所得,就实现这个侵略目标向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提出奏议,他写道:

> 按着我的意见，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实在说，如果考虑这个国家的出产和它的埠口的位置，我们便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些利益就是这个国家的天然富源以及从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所将获取的莫大的利益。建设中国中部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中国）的财富。①

不难看出，百多禄建议法国占领越南，同时也是为了侵略中国，而且在战时可以利用越南的特殊地理形势，封锁从印度至中国的航线，使它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处于优势。据此，法国确立了创建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并且处心积虑地加紧把它付诸实现。

18世纪下叶,越南内乱迭起,黎氏王朝被阮光平取代前两年,即1787年,盘踞在农耐(今嘉定省)的阮福映竟以百多禄为代表,与法国路易十六王朝签订了割地和允许法国商船、战舰航行越南各省的《越法凡尔赛条约》,换取法国出兵帮助他“复国”。1802年(清嘉庆七年),阮福映在百多禄纠集的武装力量帮助下,占领河内,推翻阮光平之子阮光缵的安南国政权。第二年,清王朝应阮福映的“纳贡请封”,册封他为越南国王。从此,安南改称越南。②

---

① 张雁琛译:《1787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363~364页，1954。

② 请参《清仁宗实录》卷一〇二,嘉庆七年八月初六日谕;卷一〇六,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谕;卷一一一,嘉庆八年四月初五日谕;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谕;九月初十日谕。阮福映最初以“南越”二字请封。清廷认为:“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界亦在其内。阮福映边徼小夷,此时即令有越南,亦不过交趾故地,安得遽称南越?”旋以“该国先有越裳之地,今并有安南,不愿忘其世守,袭用安南旧名”。故用“越南”二字。

19世纪的越南，分为南、北、中三个部分。南部十省称南圻，中部四省称中圻，北部十六省称北圻。国都在顺化。发源于我国云南的湄公河（上游称澜沧江）、红河（上游称元江），分别流经越南南圻和北圻入海。法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美梦，先是把侵略势力逐步由越南南部向北推进，再以越南为据点，向中国扩张。

《越法凡尔赛条约》订立后两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9世纪初期，拿破仑第一（Napoleon I）的侵略和欧洲各国反侵略联盟的战争，使越法条约并未得到认真的实行，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以武力为后盾，逐步加强传教、设领和商品倾销等手段，在越南加紧扩张和掠夺。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法国侵略者以越南反教为借口，多次派遣海军远征队东来，向越南勒索赔偿。1856年（清咸丰六年），法国舰队炮轰越南土伦港。第二年，向越南提出割地、开埠、保教和派使驻顺化等要求。同时，借口“西林教案”，与英国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又联合西班牙武装侵占越南的安海、奠海等地。通过这些战争，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取得了占有南圻的边和、嘉定、定祥三省与昆仑岛，以及赔款、开埠、传教和自由航行湄公河等特权。接着，又迅速向北推进，企图从湄公河进入中国西南，与从中国沿海、长江的人侵联成一气。

1866年(清同治五年),法国以特拉格莱为团长,安邺(F.Garnier)为副团长,组成所谓“调查团”,从西贡沿湄公河进入我国云南“探险”,在澜沧江和元江各地进行了两年多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云南的金、银、铜、锡、煤等矿蕴藏十分丰富,可资掠夺;而澜沧江流急滩多,不利航行,元江至红河则极宜舟楫。于是,把侵略的重点从南圻转向北圻,其矛头同时针对着中国。

久居中国上海、汉口等地，并在云南一带从事军火买卖的法国人堵布益（Jean Dupuis），在法国政府陆军部的指使和支持下，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率炮舰到达海防，借口为云南采办军火，乘机纠集亡命，企图以武力通过红河，受到越南政府的制止。驻西贡的法国总督杜白蕾（Dupere）立即把深入

中国长江上游的安邺召回，给他配备兵船武装，于1873年11月攻击河内。12月，攻陷了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这些举动不仅严重损害了越南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二、黑旗军助越抗法

刘永福与黑旗军

首先奋起援助越南人民抵抗法国侵略的，是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


屡败法国侵略军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刘永福，本名刘二，后改二为义，号渊亭。祖籍广西博白县。[①] 1837年（道光十七年），生于广东钦州防城司小峰乡。少年时代，“家运不济，频遭困厄”，被迫随父刘以莱迁往广西上思州平福圩，“架茅作舍，批坡而耕”。但劳作终年，依旧“一贫如故”。17岁时，母亲及父亲先后去世。“其先人所负各债，屡被逼讨”。永福忍痛变卖所有家产以偿债。由是“兄弟二人，一身外别无长物，无以为家”。[②] 1857年（咸丰七

① 博白县东平《刘氏家谱》。1925年刘天高抄自广东老谱，现存东平富山村刘先浚处。

②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法战争》（一）。或云：刘永福十三岁时曾在船上做工，不久，成为熟悉河道水情的引水滩师。

年），刘永福投奔迁隆州（今宁明县）会党首领郑三。第二年，与郑三等参加新宁州吴凌云为首的反清起义，成为天地会抗清队伍的小头目。吴凌云败死以后，所部归其子吴亚忠统率，转战在左右江之间的广大地区。1864年，刘永福率300余人加入吴亚忠的队伍，驻于安德（今属靖西县）。以安德北帝庙的“七星黑旗”能消灾赐福，于是仿制“七星黑旗”作为所部旗帜，故称黑旗军。[①]

1865年，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吴亚忠。刘永福因粮食短缺，决定转往越南地区以谋发展。部众皆表示“愿听指挥”[②]。先据越南六安州，在那里创建“中和团黑旗军”。1870年，率部转至越南北部，以与我国云南、广西毗邻的保胜为根据地。其地群山矗立，交通不便，既远离清王朝的压力，也是越南阮氏王朝统治的薄弱之区。刘永福率众在那里开辟山林，屯垦耕牧，并护商征税以自给。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击败了盘踞六安州的白苗“顺天王”盘文义，盘踞保胜的土霸何均昌，以及盘踞河阳的黄旗军首领黄崇英[③] 等地方割据势力，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越南阮氏王朝亦以刘永福代“除巨患”，授予“七品千户”的封爵。经过刘永福的召唤、争取，各地群众来归者甚多。闭塞荒凉的保胜，从此“生齿日繁”，“各处屯田之所，悉成巨镇，烟户稠密，合数万家”。[④] 刘永福挑选精壮，扩充军旅，建立左、右和前营，以黄守忠为

① 刘永福黑旗军后来使用的旗帜，据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记载：还“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所有旗帜“纯黑”。徐延旭密陈：“刘永福旗帜尚黑，法军惮之。”见《中法战争》（五），180页。

② 《刘永福历史草》。

③ 黄崇英绰号盘轮四，原与刘永福同属吴亚忠部下，率所部黄旗军入越南后，在河阳一带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且为法国侵略者收买，充当法国侵略越南的走狗，后被中越两国军队及刘永福黑旗军联合击败，将他处死。

④ 管斯骏：《黑旗军刘大将军事实》，见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399页。

前营管带，吴凤典为左营管带，杨著恩为右营管带。[①] 从此，刘永福在越南北圻站稳了脚跟，声势扩及红河两岸，成为抵制法国侵略越南北圻和进窥中国云南、广西的重要力量。

河内之战，阵斩安邺

1873年11月，安邺督带的侵略军进攻河内时，越南阮氏王朝无力抵抗，急忙向驻扎在越南高平、谅山的清军与保胜的黑旗军求援。清军奉命不许介入；而刘永福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十分痛恨，虽身居异域，仍不忘家国之忧。他认为：法国的“所作所为，不独虐越南，实欺中国也。且以助越抗法，保卫北圻，亦可自保。于是，闻召而起，亲率所部精锐数百人，绕过宣光大岭，迅速出现在河内城外。正在城里与阮氏王朝使臣谈判的安邺闻讯，立即调动大炮向城外轰击，同时率兵300余名出城抗拒，其中欧洲人27名，亚洲雇佣兵125名，另有云南清军将领马如龙护送军火的兵士百余名。一个月前，安邺曾以士兵80名，打败越南守军7000人，占领河内城。他满以为如此的以少胜多的战斗会重演。而刘永福深知，对待装备精良的侵略者，只能以计取胜，不可硬拼挫敌。于是他“设伏以诱斩安邺，覆其全军”[②]。十年后，刘永福回忆当年的战斗时写道：

> 同治十二年十月间，法人已得河内，仅只法兵百余人，香山勇百余，回子勇百余。永福来援之兵亦只数百。至离城数里，法人出城接仗。其队伍零星，数人一起。专以火器见长。自辰至酉，永福设伏，刀矛齐出，毙法官五人，真洋兵十余人。永福只亡一队目并勇六人。[③]

---

① 黄守忠，本姓罗，其父入赘黄家，改姓黄，号荩臣，广西迁隆州北江村人。吴凤典，号雅楼，广西迁隆州平旭村人。杨著恩，又名智仁或著仁，号肫卿，外号老快九。武监生出身，钦州沙尾街人。

② 《清史稿》卷四六三，《列传》二五〇，《刘永福》，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一），330页，1882年刘永福致清军提督黄桂兰函。

1873年2月的河内之战，是刘永福黑旗军和法国侵略者的首次交锋，虽然战斗规模不大，歼敌不多。但是它的政治、军事意义却很大。因为在此之前，法军数百人即能横行越南北圻，从未受到任何惩罚。刘永福在河内重创法军，阵斩安邺，也就打破了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越人民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① 从此之后，刘永福“名传遐迩”，黑旗军声威远播。而“夷见黑旗，相率惊避”。② 且“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③。清朝统治者由此认为刘永福可以“为我藩篱”。传旨云南、广西地方督抚，“阴结刘永福，许以暗助”。鼓励刘永福努力坚持，以阻止法国侵略者的“诡谋”。④ 越南阮氏王朝则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命他镇守宣光、山西和兴化。从此，刘永福的黑旗军开始得到中越两国王朝的承认，成了在越南抵抗法国殖民者的重要力量。

纸桥挫敌，声威远播

安邺在河内惨败后，整个越南北部仅有法国士兵40名困守海防，其余皆被驱逐。当时，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而且“碍于刘永福固守（红河）上游”，所以在军事上未敢轻动，改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于1874年诱逼越南阮氏王朝先后签订了所谓《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和《法越商约》，取得了进一步控制越南的政治、军事、外交和传教、通商、

① 黑旗军的这次胜利，越南“士人吟诗赞颂者颇多”，其中一首云：“癸酉年腊月，八日天平明。蓐儿贼骁将，乘胜向西行。纸桥才过马，炮声轰一声。黑旗伏兵起，先锋刘伯英。挥刀冲杀到，贼众皆魂惊。群如鸟兽散，蓐儿倒地横。壮士夺贼去，满地犹血腥。壮哉此一战，敌忾鼓军情。”原注云：“这首诗系山云先生供给的。”据陈辉燎撰、范宏贵译：《关于中法战争的几首诗》，原载越南《文史地》杂志1957年第9期。按：蓐儿指安邺；刘伯英当指刘永福。

②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43页。

③ 1881年云贵总督刘长佑奏，见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2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4。

④ 《刘武慎公遗书·致沈意文观察》，见《中法战争》(一)，128页。

领事裁判等特权。到了1882年3月（清光绪八年二月），法国为了占有越南北部并强迫开放红河，竟指派其驻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威利（Henri L. Rivière）率法军500余人卷土重来，于4月25日以武力强占河内，南定相继失守。在敌人的步步进逼下，越南统治者一面向清王朝请援，一面飞檄刘永福率军重返前线，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这时候，以"绥藩固边"说向清廷"请缨"出关的唐景崧已到保胜[①]，在他的劝说下，刘永福再次率军开往抗法前线。1883年5月10日（光绪九年四月初四日），军至河内郊外，随即向法军侵略者送去"战书"，痛斥"法寇……奋其诈谋，逞其凶暴，无土地不垂涎，无财税不思恣噬"的贪婪本性；声言"本将军誓率三军，歼尔丑类"，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并"约以旬日，共决雌雄"。这些掷地有声、气壮山河的誓言，大大地鼓舞了中越群众，那些对抗法怀有疑虑之心的越民，也对黑旗军"奉箪壶惟谨"。[②]

当时，开赴河内前线的黑旗军官兵共约2500人。其装备除少数抬枪与火筒炮外，多是刀、矛一类原始武器。而法国侵略者投入战场的兵员约在500人左右，但武器装备多是新式快枪和配有重炮的军舰，远比黑旗军优越。黑旗军在河内城西5里的纸桥附近扎营。15日以小队夜袭城外的法国教堂，揭开了纸桥战斗的序幕。19日黎明，李威利率法军向黑旗军阵地反扑。越南人民早向刘永福通报法军出动的消息。黑旗军严阵以待。右营管带杨著恩请当

①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一作薇卿，广西灌阳人。咸丰四年乡试解元，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1882年向皇帝上书自请赴越，得旨"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1883年转至保胜，会同刘永福抗法。

② 《黑旗军檄告四海文》乃唐景崧手笔。《请缨日记》光绪九年四月十六日记："为渊亭作檄文，布告天下。"见《中法战争》（二），78页。《中法战争》（一）收录《刘永福檄文》多篇，此处引用，乃综合各篇而成。又：李威利接到刘永福的"战书"后，认为这是"中国式的吹牛"。见马罗尼（Marolles）：《李维业远征记》，载《中法战争》（三），341页。李维业即李威利。

前敌，他说："见洋人面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刘永福允其所请，命率所部设伏于纸桥右侧的关帝庙。以前营管带黄守忠率军扼守大道，从正面迎敌。以左营管带吴凤典率军设伏于大道左侧，伺机出奇制胜。刘永福自率亲兵居中，以利指挥调度。部署甫毕，敌人已蜂拥从桥东扑来，并用大炮猛轰关帝庙黑旗军阵地，打得瓦飞砖落。杨著恩分兵三队，互为攻守，打败了敌人的首次冲锋。李威利急命兵士席地狂饮。然后以十人为一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乘醉直冲关帝庙而来。杨著恩在激战中被炮弹洞穿两股，仍坐地指挥战斗。继而右手中炮折断，则以左手开枪击敌，毙伤敌人十余人。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法军乘机冲上大道，被黄守忠军迎头痛击。吴凤典率伏兵适时杀出，猛冲敌阵，"势如波涌涛翔，一齐振臂大呼，枪弹射出，甚似飓风暴雨"。法军被前后夹击，阵势大乱。黑旗军乘胜从四面进逼，用大刀、长矛奋力砍杀。敌人一片慌乱，有的弃械丢戈，狂奔乱窜；有的呆若木鸡，引颈就戮。李威利中枪落马，脱帽跪地求饶。"顷刻间已被脔割，寸肤不留。"① 经过半天战斗，又以法军的惨败告终。

刘永福黑旗军纸桥大捷，战果辉煌，综计"毙敌酋李威利等军官五人，匪党二十三名，教匪一名。炮毙四圈匪首一名，三圈匪首一名，匪党八十余名，伤数甚多"。而黑旗军"右营管带杨著恩，右营哨长何承文，左营哨长陆天球俱阵亡。左营管带吴凤典被炮重伤，计死亡勇丁四十七名，受伤五十五名"。另夺获洋枪、马匹、刀剑、鼓角、时辰表、千里镜不可胜数。捷报传出，边关欢动。② 黑旗军以劣势装备，屡败武装优良的敌人，充分表明了全军将士的同仇敌忾，英勇善战。也鼓舞了那些主张抵抗法国侵略的人们。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丁振铎在一份奏折中说道：

> ……即以法夷情势而论，彼与永福相角，已阅十年。屡折渠酋，频歼丑类，智穷力索，伎俩不过如斯。而我铁甲炮船，海防机器，

---

① 《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77～78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二），920页。

岁费以千万计；若竟不能御敌，又何必以无限之财，空掷之洪涛巨浪，曾是中华全力，乃永福之不如乎？亦太自馁矣！①

刘永福黑旗军屡创敌人，对侵略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纸桥战斗以后，法国的残兵败将龟缩在河内城里，"夜辄自哗，惊呼黑旗来，敌胆已落"②。李威利的助手马罗尔在法军惨败以后，撰写所谓《李维业远征记》，谈到刘永福和黑旗军时，先是说："黑旗军是广西的一个叛变的残余，被逐出中国。"随即承认："黑旗军很勇敢，由一位有精力的领袖刘永福指挥。……在黑旗军身上，找到一种足以反对我们的可怕力量。"③

"助刘抗法"，再传捷音

自河内之战以后，越南阮氏王朝虽然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但对他常"窃窃疑之"，"吝赏忌功，诸多掣肘"；"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这种态度，当然使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感到不快。纸桥大捷以后，越南统治者又一次得以从法国的压迫中解脱出来，他们迫于舆论的压力，改封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以酬其率军帮助抗法的功劳。④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者当时的态度。刘永福率部人越初期，中越两国的封建统治者皆以"盗匪"目之。由于清王朝四次应越南政府之请，派兵人越帮助"剿平匪患"，刘永福都给清军以支持。而在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又创造了两败侵略者的光辉纪录。这就引起了中越两国统治者的重视，对之另眼相看，不少人认为刘永福黑旗军不仅是越南宗社的理想依靠武装，也是云南和两广边防难得的屏蔽力量。因此，继越南王朝于1874年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之后，第二年，清王朝也接受云贵总督岑毓英的保奏，授予刘永福四品顶带。从此，在围绕越南问题的中法两国交涉中，除李鸿章等少数人

---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44页。
② 《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81页。
③ 《中法战争》（三），327～328页。
④ 《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43、72页。

“视刘永福为眼中钉”，“恐以一刘全局受累”，力主剿除刘永福黑旗军外，①多数督抚、将帅、臣工皆视刘永福为不可多得的、“保藩固圉”的借助力量。1881年12月6日（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清廷命疆臣议论越南问题及应取对策时，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清派驻英、法大臣兼充驻俄大臣曾纪泽等复奏，都主张利用刘永福黑旗军抗法。而与光绪关系密切的工部尚书翁同龢也持同一见解。但是，因为刘永福黑旗军的“来路不正”，所以也有人在主张支持、利用的同时怀有戒心。四川总督丁宝桢在1882年6月19日（光绪八年五月初四日）的奏报中说：

> （黑旗军）由滇、粤各省酌筹，明为抚恤越南，暗则资其接济，俾其为法国别树一敌。倘该匪幸而获胜，越南既感代筹之德，而我并不居保护之名，法国亦无以借口。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

署理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在同年10月24日（九月十三日）的奏报中，也对利用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怀有戒心。他说：

> （刘永福）首鼠两端，惟知自谋其穴，未必终为我用。……一旦势迫，彼将输我情款以附敌人，即不然抗拒难支，迫而内窜，既已曾相引用，亦难禁其来归。纳之则敌且寻仇，拒之则彼复生变，于边防制敌之策似无所益。③

但是，一个月以后，岑毓英又提出了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利”的构想。④广西巡抚倪文蔚也担心：原为“漏网匪徒”的刘永福及其黑旗军，设若“一旦无归，仍肆故伎，法人得此消息，不难广为收募，横行北圻”。⑤只有唐景

① 《翁文恭公日记》，癸未年正月十五日，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记事。分见《中法战争》（二），1、3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

⑤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

崧的态度比较明朗和坚决。他以为："所以必用刘永福者，以其为越官而行越事，无虑外人之阻挠耳。"① 为此，他向清政府建议，请命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督抚，准刘永福日后回籍，以"坚其奋发"，并由两粤与云南共同接济刘永福黑旗军以军火，使这支"能耐烟瘴，悉风土"的劲旅，担当保卫越南的长城，亦属"将来固圉绥藩长久之至计"。如此办理，则远胜于李鸿章与法使宝海（F. A. Bouree）在天津的口舌之争了。② 由于法国在纸桥之战后的扩大侵扰，③"助刘抗法"之议占了上风。刘永福黑旗军在国内的"暗助"下，又于1883年秋在越南怀德和丹凤之战中大败法军，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1883年夏，法国茹费理（Jules Ferry）内阁吞并越南、进犯中国的部署已经完成。8月中旬，法兵1800人，兵船12艘，分两路进犯。一路由波滑（Bouet）将军率领，由河内进犯北宁、山西；一路由海军提督孤拔（A. A. P. Courbet）督带，进攻越南首都顺化。15日，波滑率领的法军进犯红河之滨的怀德府。刘永福以黑旗军五营设伏反击，与敌人血战终日，毙伤法军200余名，余敌狼狈逃回河内。第二天，法军冒雨再度猛攻黑旗军阵地。援越桂军都司黄云高等营扮成黑旗军加入战斗，拦腰冲入敌阵，法军又狼狈败走。17日，法军决堤灌水，怀德地势低洼，黑旗军辎重全被水淹。越南人民自动驾舟赶来救援，全军得以安全退往距离怀德30里之丹凤。

波滑在怀德惨败时，越南阮氏王朝因国王阮福时病死，王室发生争权夺位的内讧。孤拔趁机于8月18日进攻顺化。新王阮福升向敌人乞降，于25日在顺化签订了《法越新订和约》（即第一次《顺化条约》），公然否定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侵略者的保护之下，于是法国加紧了

① 《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6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153页。

③ 据《赫德致金登干书简》说："法国对于在越南的军事失败，李维业阵亡和派遣铁甲舰东来的反应，都说明法国觉得丢了面子，而准备在这里蛮干下去。"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3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在北圻的军事行动，策划入侵中国。

9月1日，法军出动舰艇20艘，陆海军共3000人，围攻丹凤。黑旗军在越南人民的大力配合下，奋起反击。丹凤四面环水，有河堤直达河内。敌人扑近河堤，黄守忠手提大刀，指挥战士据堤击敌，两军相距仅5米，互相对击达两昼夜。3日，黑旗军以火炮击毁敌船5艘，用刀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敌海军以船毁人亡，撤出战斗。陆军失去支援，也纷纷弃械逃窜。三日激战，黑旗军歼敌官兵80余名，伤敌200人左右。黑旗军虽然也有较大伤亡，却再一次打乱了敌人占有北圻，进攻中国的侵略计划。

从1873年夏法国武力侵略越南北圻，刘永福指挥黑旗军首次在河内挫败法军，到1883年的怀德、丹凤之役，黑旗军虽然四战四胜，但是，这支飘泊异国、缺乏坚实根基的农民队伍，并不能从根本上粉碎法帝国主义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丹凤战后三个月，即1883年12月，法国以更大的兵力向越北发动进攻。长期以来"暗助刘团"以抗法军的清王朝，被迫从"暗助"转向公开应战，中法两国军队的正式交锋终于爆发了！

三、誓用敌颅建国门

围绕越南问题的中法交涉

由于中国和越南地处近邻，唇齿相依，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具有悠久、密切的联系。法国侵略越南，也是为了侵略中国。因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举动，必然引起中国的关注。而法国在向越南动用武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向中国进行外交讹诈。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交涉始终不断。

1874年法国强迫越南订立《和平同盟条约》以后，即于第二年以新约内容照会清朝政府，并要求允许法国在云南通商，以及制止黑旗军进入越南。

总理衙门的答复是：越南自古即为中国"藩属"，中国有保护它不受外国侵害的责任。不能同意在云南通商，早已向法国公使说明。至于黑旗军，是应越南国王的请求而去"代平内乱"的，自然不便加以制止。①

关于越南问题的对法交涉，在清王朝内部一开始就存在"坚拒"与"退让"两种意见分歧。持"坚拒"论者认为：越南乃我国"藩属"，如果"听其自存自亡而不以援手"，则其余属国必生连锁反应，这是个大局攸关的问题。1882年5月12日（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在《法越兵端已起亟宜通筹边备折》中陈述的意见就很有代表性。奏说：

> 北圻各省多与我滇粤毗连，若待法人尽占北圻，而始为闭关自守之计，则藩篱全撤，后患将无有穷期；且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②

既然要"保藩"，首先就不能示弱于法人。公开出兵进入越南，顾虑既多，亦尚非时候。因此，维护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发挥作用，就十分必要。奕䜣对法国公使的答复，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些考虑的。

而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见，则与此相左。1883年5月7日（光绪九年四月初一日），他在《密陈越南边防事宜折》中写道：

> 去冬宝海过津，请在保胜设关通商，亦欲中国为之设法疏通，而滇、粤各省既不谓然，法国复翻前议，度其添兵攻取南定，查封越粮，又遣新使赴越勒订新约，无非胁越以必从，非志在全吞越境也。

而且，在他看来，越南北圻沿边各省，地土最为贫瘠，加以万山丛杂，"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法国侵略者是不会冒这种危险的。③ 对于黑旗军在越南挫败法军，他则认为："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

① 曾纪泽：《曾惠敏（劼刚）公遗集·奏疏》卷四，《复陈法国大概情形疏》。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17页。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提出《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见同上书，卷二，第3页；唐景崧亦有类似见解，见《请缨日记》卷三。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3~4页。

未必各口皆守。"[①] 基于这种认识，他的结论是"退让"。即使越南丧权亡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越南统治者迫于法国的步步进逼和人民对丧权辱国的坚决抵制，先后于1876年、1877年和1880年，多次派遣使臣经广西到北京，请求清政府给予援助。1882年2月，清政府正式向法国外交部声明，不能承认《法越和平同盟条约》。[②] 法国侵略者一意孤行，决定扩大侵越的军事行动。1881年底至1882年初，清政府以"办匪"为名，命广西、云南清军分路开入越南。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桂军6000人驻北宁，云南布政使唐炯率滇军700余人驻山西。一在河内东北，居中越大道；一在河内之西，扼三江水口，皆与河内隔江相望。但清政府明确指示入越清军：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办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③]。更"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④]。仍寄希望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的谈判桌上。[⑤] 谁知谈判尚未了结，法国即以"先发制人"的手段，于1883年底向驻越清军发起攻击。清政府这时才被迫下令入越清军与刘永福黑旗军共同抗法，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法国发动战争，清廷仓促应战

1883年12月（光绪九年十一月）爆发的中法战争，分两个阶段、两个战场进行。第一阶段是从1883年12月开始，至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止，战斗主要在越南北部进行。第二阶段是从1884年6月至1885年6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战斗除了继续在中越边境进行外，中国的福建沿海和台湾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23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14～15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27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一六三，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谕。

⑤ 1883年1月，李鸿章与法使宝海订了所谓《越南事宜三条》，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越南向法国开放保胜，中法两国以红河中间之地为界，共同"保护越南，共御外寇"。如此，则法国声明对越南无侵占土地及削贬越南国王治权之意。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25页。

岛，也发生了激烈的陆战和海战。

广西军队负责越北东线的战防任务。主帅徐延旭是一个徒有“主战虚名”的老官僚。他善于招摇撞骗，曾经六次上书清廷请战，扬言“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不难收功于一旦”。为此，他颇得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琛和张佩纶等人的赏识，纷纷向清廷奏请他负责边防重任。1883年，左庶子张佩纶在《奏越事趋重粤西请简边材折》中，就极力贬抑广西巡抚倪文蔚，吹捧徐延旭。他说：“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材，非将材也。”今“时事多艰，人材难得”。倪文蔚“内不能用徐延旭，而欲移之粤东；外不能用刘永福，而欲委之越南。声名损于治郡，将略殆非所长”。而“徐延旭前在关外捕盗，甚得交人之心”。请令其“出关治军，经划北圻，大修战备，与黄佐炎、刘永福联络声势，所有关外事宜，即令专奏，以归机速。如此则粤西之军声稍振，然后越南、云南水陆各军得与合力，即法兵果增，法使果撤，我有成谋，屹然不动，以战则可胜，以守则可固，以和则可成矣”。①

徐延旭既被吹捧为知己、知彼，能战、能守亦能促成体面和局的能员，清廷自然喜出望外，于是立即下诏：

> 法越交涉一案，现在尚无成议。敌情叵测，亟应先事绸缪。越南北圻为粤西门户，若能保护北圻，即以固吾疆圉。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颇为熟悉，着即出关，相度机宜，预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该藩司务当与黄桂兰、赵沃等和衷商榷，妥慎筹办，并将布置情形，随时具奏。②

随又命令倪文蔚增调桂军出关。援越桂军总数约50营、15000人。③ 同年10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一，23~24页。黄佐炎，越南北圻总督。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五九，光绪九年二月十五日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六三，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谕。桂军编制及在越北驻防情况，可参看《徐延旭往来函牍》中之《徐延旭吕春蕨笔谈》，见《中法战争》（二），483~484页。

月，授徐延旭为广西巡抚。清廷如此调兵遣将，其目的并非主动出击，而在“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①。

其实，被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派人物吹捧为能员的徐延旭，不过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庸员。他以镇压大成国以及桂西南各地的农民起义而官至知府、布政使。他曾不止一次向越南官员讲过：一杆施放方法“与鸟枪同”的抬枪，可容数十炮子，远胜于只容一子的洋炮数十门的外行话。② 他率兵入越，“仅出关数日，即折回龙州避暑”，并一再称病，逗留数月，不敢亲临前线，把前方军事交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负责。③ 而黄桂兰也缺乏近代战争知识；赵沃则一再强调自己“年力就衰，实非所任”④。用如此的领兵大员指挥抗法战争，失败自在意料中。

抗法战争中的越北战场

法军自从在怀德、丹凤惨败以后，也积极谋划卷土重来。1883年10月25日（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国政府任命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陆海侵略军，阴谋夺取山西、北宁，以巩固对河内的占领。12月初旬，法军在河内地区增至9000人，与驻北宁及其近地的桂军30余营相对峙。徐延旭亦在此时从龙州出关，但至谅山即止，并未亲临前线。山西方面，只有刘永福黑旗军3000人，桂军两营以及新到之滇军三营，合计5000人左右。

---

① 光绪九年十月初十日《军机处密寄广西巡抚倪文蔚等上谕》，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27页。

② 《徐延旭往来函牍》中之《徐延旭吕春蕨笔谈》。光绪十年四月初四日李鸿章奏谓：“去岁广西抚臣徐延旭慷慨请兵，尝称欲尽歼法众，克复西贡。乃未已而一蹶不振。臣未尝不壮其志，而又深悯其不知彼己，不近时宜也。”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四，2页。

③ 《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徐延旭逗留关内请严行申饬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六，39页。

④ 《徐延旭来往函牍·黄桂兰、赵沃来函》，见《中法战争》（二），323～404页。

而奉命负责西线军务，力保山西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尚在昆明，唐炯远在滇西。山西驻军群龙无首。

12月1日（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法军6000人分水陆两路从河内进犯山西。水路军以大小炮舰10余艘、民船数十只载兵3300余人溯红河西上，陆路军2600余名并弹药车500辆，走大路至丹凤渡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进逼。刘永福探知法军大举出动的消息，立即将黑旗军分作三队，配以少数桂军，分别扼守山西南、北及东城，而以滇军负责城西警卫；另有越南黄佐炎所率越兵约2000人，驻守南门郊外。刘永福深知守军装备窳劣，决定“纵敌入我重地，始能痛歼”①。14日上午，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进攻山西。黑旗军奋起抵抗，另从东城守军调出五营，秘密向敌人侧后迂回，突入敌人陆军与船队之间，使敌舰不敢肆意发炮。这是十分高明的一招。② 面对黑旗军的前后夹击，法军集中炮火向黑旗军轰击，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一番肉搏拼杀，黑旗军歼敌军官22人，士兵200余名，然后撤出城北堤岸阵地。16日，放弃山西，向兴化转移。

山西失守,北宁危急。广西又添调兵勇20余营赶往增援,北宁守军增至20000余人。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12营共4000余人,由刘永福与唐景崧统率,开往北宁。1884年2月,法国以米乐将军(General Millot)接替孤拔为远征军司令,纠集兵力共达18000余人,编为两旅,分别由波里也(Briere de L'Isle)和尼格里(Negrier)指挥,盘踞河内、海阳和山西等地,伺机进犯北宁。

1884年3月7日（光绪十年二月初十日），法军分别从河内、海阳出动，进犯北宁。12日，尼格里督带的第二旅在舰队炮火支援下开始发动攻击；米乐、波里也统率的法军第一旅则从北宁城西向城南迂回，与尼格里军互相配合，从南北两面猛烈攻城。他们在城外架炮，“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

① 《请缨日记》卷三，见《中法战争》（二），99页。

② 法军中的英国随军记者斯各特（Scott）在《1884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中说：“他们（按指黑旗军）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见《中法战争》（三），360页。

奔，越官张登檀等开城遁”①。正在指挥作战的黄桂兰、赵沃睹状，也仓皇逃离前线，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各路清军随之溃散。黑旗军被迫撤往太原。不久，由太原回驻兴化。

北宁之役是中法双方主力的一场决战。法军攻陷北宁，立即分军向前追击，数日之间，谅山、郎甲、太原相继失守。4月初旬，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亦被法军占领，红河三角洲要地尽失。驻守东线的20000桂军及勇练，其“有家室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粮概以资敌”。结果，“粤西五十余营，自北宁败后……只归得十余营”。而溃败之兵勇退至谅山、镇南关一带，因无粮可办，四出掠取民食。② 北宁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以徐延旭败师辱国，传旨将他和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解京严加议处”。改以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将苏元春统带之防军2400人全部调驻关外。③

暂用敌颁建国门

法国侵略军占领红河三角洲要地，基本实现其初期战略目标以后，立即转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诱和。1884年5月11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负责外交、主张退让求和的李鸿章，通过德籍税务司德璀林（Gustav Detring）从中捏合，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F. E. Fournier）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2)中国从越南撤兵，并对法越所订条约一概不问；(3)法国不索兵费，但可从云南、广西向中国自由输入商品；(4)中法两国在三个月内指派全权大臣，就上述各节详议条款。④

---

① 《请缨日记》卷四，见《中法战争》（二），115页。

② 潘鼎新：《接据谅山军报请饬催后军继进及筹划饷械各情形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34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七九，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谕；同书卷一八〇，同年三月十七日、二十四日谕。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55～456页。

李鸿章的出卖国家主权，受到朝野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斥他"通夷卖国"，直如秦桧、贾似道。清王朝迫于舆论压力，给李鸿章"传旨申饬"，并以主战的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命岑毓英、潘鼎新坚守原防。而法国总理茹费理却给李鸿章致电祝贺，吹捧他是"为国名臣"，对他的退让、卖国表示"曷胜欣幸"。①

但是，法国侵略者在"议和"幌子的掩盖下，积极向中国和越南调集船舰、军队，并且在6月下旬向北黎（观音桥）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还击，歼敌百余名，缴获军用物资甚多。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7月，法国又把炮火引向中国福建沿海。8月26日（七月初六日），清廷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清政府在宣战诏谕以及相继发布的几道诏谕中，除命令广西、广东、云南、福建各省督抚"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外，又命令户部与粤海关以及广东、四川等省筹备军需，接济前线。而广西战场所需军饷则多仰给于广西厘局。②

在越南战场，法军把广西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而清政府则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作战方针。因此，命令岑毓英、潘鼎新各率云南、广西军队迅速开入越北战场，合力攻取北宁、河内。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记名提督方友升率军22营，分东、西两路向船头、郎甲挺进。10月上旬，郎甲、船头陷敌。但侵略者以两地"离中国的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指清政府——引者）受到严重的警告"③。叫嚷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

①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一），11页。

② 钱仲联：《黄遵宪年谱》第32页记黄遵宪之父黄砚宾，中法战争时正"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清师联翩出关，飞刍挽粟，羽檄交驰。粤西故瘠地，南征军饷，皆挹注于南宁、梧州两厘局。砚宾力筹调拨，士饱马腾，无失时也"。又参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广西巡抚潘鼎新奏并请谕，见《清德宗实录》卷一九〇。

③ 《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见《中法战争》（七），267页。

进，才能“有利地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①]。于是，继续向远东增兵。

1885年1月，法军主力7000人向广西边境大举进犯。潘鼎新遵照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的指示，[②] 消极对敌，是以“号令屡改”[③]。2月12日，法军攻谅山，潘鼎新闻讯，乘夜逃入镇南关。各路守军随之溃散。[④] 23日，尼格里指挥的法军第二旅进犯文渊，守军浴血抵抗，提督杨玉科中炮牺牲。法军乘机前犯，攻陷我国边防要口镇南关。但是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而且受到我武装群众的不断攻击。25日，法军将镇南关炸毁，退驻文渊、谅山。波里也傲慢地命令法军在镇南关的瓦砾废墟上竖一根柱子，上面用中文写着：

> 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

中国的军民与侵略者针锋相对，迅速地“用另外一句威胁的文字”回敬狂妄的敌人：

> 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⑤]

英勇的中国军民，很快就用事实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

① 《茹费理致巴德诺》，《法国黄皮书》，见《中法战争》（七），269页。

② 《寄龙州速递潘中丞》，见《中法战争》（四），202页。

③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7页。

④ 《克复谅山大略》记潘鼎新不战而逃曰：“潘入关，即退幕府，旋退凭祥（在关内五十里），又退海村（在关内百里，距龙州四十里），又退龙州。民大哗，始乘船由水路还海村，日驻岸，夜驻船。”见《中法战争》（三），78页。

⑤ （法）加尔新（Carcin）撰：《在侵略东京时期》，见《中法战争》（三），530页。（法）黎贡德（Lecomte）在《远征谅山》中说：木牌文字的大意是“保卫国境的不是石头的围墙，而是条约的履行”。它“是对北黎事件破坏天津条约而发的”。是波里也“在离开谅山让人预备好了的”。同上书，432页。

四、镇南关大捷

冯子材临危受命

潘鼎新临阵逃跑，侵略者攻破镇南关以后，广西震动。据时人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 法既入关，各军多溃逃，无复队伍。淮军大扰龙州，商民迁徙一空；营官乘乱攫饷还省。电报局移至舟中。转运粮饷军装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陆肆掠，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关内大震。沿江自南宁、梧州、浔州达于桂林省，无不惊扰，纷纷告急请兵，南宁戒严。①

在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刻，张之洞决心起用年近70的老将军冯子材，请他再度率军出关，联合各部，共同抗敌。

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一作翠亭，广东钦州沙尾村人。② 早年参加刘八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后投清军，至南京、镇江与太平军作战，因“功”官至提督。在出任广西提督期间，曾三次应越南政府之请，出关“代平内乱”。是以“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③。1882年，因刘坤一、徐延旭等人的诬陷、排挤，冯子材自请还乡“治病”。1884年初，越南北宁陷敌，黄桂兰畏罪自杀。清廷曾拟起用他出关统率桂军，遭到李鸿章的反对，

① 《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8页。又参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彭玉麟、张之洞等奏《越防各军克敌情形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五七，25页。

② 都启模、郭启光：《粤帅萃亭冯公事绩纪实》，上卷，光绪二十九年稿本。

③ 《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8页。


镇南关大败法国侵略军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冯子材

说他“年已七旬，前在镇江仅能守，嗣往越南剿匪有声，然非法人之敌也”。[①] 不久，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曾致书冯子材请问机宜。冯子材大喜，复书建议在越南应对法国侵略者“先发制人”，大举征伐，并请求给他统率15000人入越，驻守越南东北的广安、海阳等地，伺机歼敌。[②] 结果，受命督办高、雷、廉、琼四府25州县团练。虽无实权，也无专饷，但是，经过冯子材几个月的惨淡经营，先后有9个州县成立了团练。他亲自选训的钦州500练勇，成了颇具战斗力的劲旅，在抗法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884年12月，法军犯船头、郎甲时，张之洞即指出：法军专注谅山，而“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③]。于是，他命令冯子材统率粤军10营，总兵王孝祺统率淮军、粤军各4营，分别从钦州、梧州出发，开赴越南。后以谅山吃紧，冯子材先拨所部8营径直从上思进驻越南东路，与王德榜部联合作战；自己仅率中军两营开往龙州，筹办粮械并招募新军。而王孝祺所带8营因中途滋事，溃散近半，到龙州时只有2000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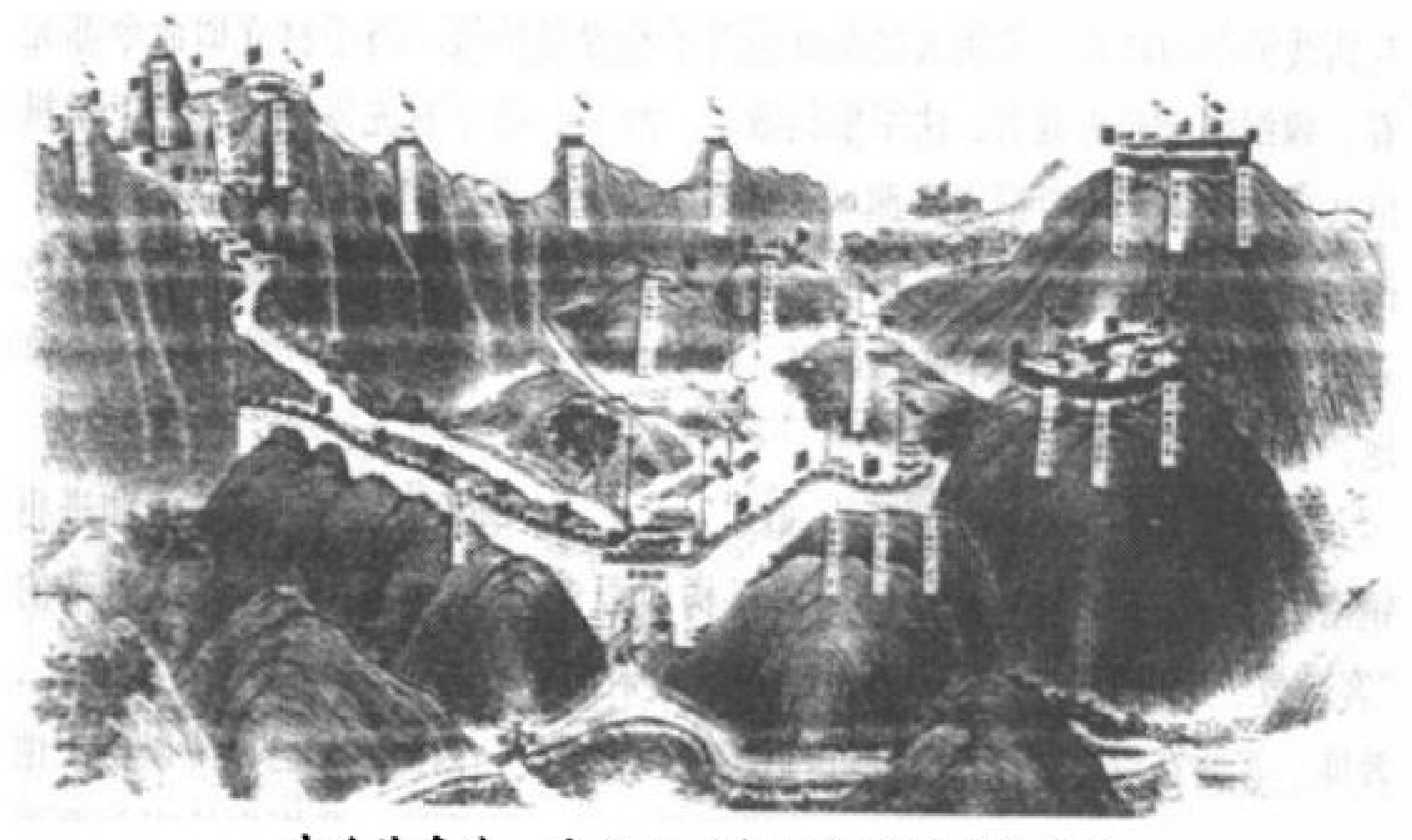
谅山失守以后，冯子材自请往守镇南关，并从龙州率粤军第一营迅速赶到；同时命令驻守东路的8营粤军同守关口。但为潘鼎新所阻，着令“仍顾

① 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光绪十年三月初二日。
② 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张制军来书》；同年七月十三日《复张制军书》。
③ 张之洞：《照会右江镇出关援剿》，见《中法战争》（四），439页。

东路"①。直至镇南关失守，冯子材与王德榜始率军疾驰200余里，从东路回师，分别驻于镇南关及关外东面30里之油隘一带。其他各路友军亦相继集中。冯子材仅有旧部及招募之新军10营。因潘鼎新已逃离前线，全军缺乏统一指挥。广西臬司"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②。

南关报捷，威震敌国

冯子材既经众人推举为全军主帅，他立即着手收集散兵游勇，团结各路友军，并亲临实地勘察形势，积极布置防务，选定关内10里之关前隘为歼敌战场。在隘口构筑长墙两道，横亘峡谷，切断关道，决定采用短兵相接的战术，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兵力的具体部署是：



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镇南关布防形势图

冯子材自率萃军10营，扼守长墙后两面山险，以当大敌。王孝祺所部8营屯于长墙之后，与冯军仅距250米左右，随时接应主力作战；

①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3页。
② 《清史稿》卷四五九，《列传》二四六，《王孝祺传》。

苏元春与陈嘉统率桂军18营，驻守关前隘后4里之幕府，作第二梯队；

蒋宗汉接统杨玉科所部10营与方友升所部4营屯于凭祥，作第三梯队；

王德榜楚军10营驻关东油隘，保障南关东路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

魏纲率鄂军8营驻镇南关西面50里之平而关，保障龙州安全；

马盛治率熙字军6营屯扎越南之高平、牧马，牵制敌人进退；

潘鼎新率淮军5营回驻海村，以安后路。

边关各地各族人民也自动组织起来，全力支援越南抗法、保家卫国的斗争。越南人民亦踊跃前来支援战斗，他们探敌情，送情报，当向导，或者直接参战杀敌。军民的互相支援，并肩作战，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885年3月9日（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尼格里率法军从文渊进扰关西之艽封、牧马，妄图越出镇南关之北，进犯龙州，并切断北圻东线桂军与西线滇军的联系。越南人民及时给冯子材提供情报。冯子材立即命令苏元春、魏纲率部迎头截击，法军狼狈败走。21日，冯子材先发制人，与王孝祺出兵夜袭敌人之重要据点文渊城，破敌人二垒，遂主动撤回。① 尼格里为了挽回劣势，不顾援兵未到，粮械未备，决定按照自己既定的原则行动，这就是："如果他们（中国军队）进攻，我们必须反攻。跟踪追入他们的一个阵地，在击溃他们后随即回来。"②

23日凌晨，尼格里纠集兵力3000人，在三个炮队的配合下，从文渊进犯镇南关，直逼关前隘。尼格里的队伍构成复杂。他害怕用威胁利诱而来的"客、教、越民皆与冯通"，所以，在进攻时"以真法鬼居前，西贡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后"。③ 冯子材料定尼格里必来报复，因此，早已严阵以待。他亲率萃军驻守长墙及东岭，以王孝祺军驻西岭，另派兵一营扼守镇南关西侧之马鞍山，以牵制来犯的敌人。

---

①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9页。

② （法）黎贡德：《远征谅山》十，《尼格里给波里也的报告》，见《中法战争》（三），438页。

③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9页。

是日清晨，大雾满天，障人视眼。尼格里亲率法军主力千余人潜入镇南关，分两路向关前隘进逼，一路沿隘口谷地前进，一路攻东岭，阴谋从东岭抄关前隘后路，夹击中国守军。另有法军千人进驻镇南关东南，牵制中国油隘驻军，并与进攻隘口的前军相呼应。冯子材立即檄调驻幕府的苏元春军前来增援，命令油隘王德榜军向敌后出击，以制进犯东岭之敌。同时悬重赏激励将士英勇杀贼。午前10时，雨雾逐渐消散。法军猛攻东岭，两军发生激烈争夺战。午后3时左右，东岭先锋三垒次第被敌人攻占，关前隘东侧遭受严重威胁。正在这时，苏元春与陈嘉、蒋宗汉、方友升等统率各路援军及时赶到。苏元春军人守长墙，陈嘉、蒋宗汉军抢登东岭，飞身直人第四、第五堡垒，拼死拒战来犯之敌，“枪弹积地盈寸，彼此死伤相当”。这时，油隘的王德榜军正向文渊出击，切断敌军补给之路。尼格里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激战至夜，双方皆未收队，趁黑夜重作战斗布置。

尼格里因为所部伤亡惨重，粮弹俱缺。为了解除困难，他连夜派人赶回谅山搬运弹药，限令天明之前解送至镇南关备用。而盘踞在关前隘峡谷中的法军，因害怕萃军夜袭，擅自放弃关道阵地，向东岭转移。结果，弹药并不能及时赶到，而军士的违令转移，又打乱了尼格里的战斗部署。[①] 冯子材除命令战士抓紧时机，就地休整外，另派人持大令至扣波飞调杨瑞山、麦凤标率领的五营萃军，限24日午刻到达关前隘，协同主力作战。另选勇士300名，各佩大刀与先锋堡，越出长墙，潜伏于沟坑草丛之中，伺机歼敌。

24日清晨，四山大雾。未巳雾散，“大开晴霁，风日晴明”[②]。尼格里先以一军偷袭东路大青山堡垒，并以重炮猛轰关前隘长墙，为法军从正面冲扑开路。霎时间，“炮声震天，山谷皆鸣”。尼格里催军直薄长墙，有的已越墙而人。冯子材与苏元春誓死决战，通令各军将士曰：“凡败逃者，无论何军皆

① （法）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二，《Banq－Bo之战》，见《中法战争》（三），451～452页。

②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6页。

诛之”，并于各隘设卡，专杀逃者。时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于是，首先跃出长墙，向前冲击，各军将领睹状，无不感奋力战。王孝祺以淮军前在龙州时为官民笑骂，各军皆轻侮之，甚感羞忿，亦率部奋勇力战，“誓与长墙俱死”。他的坐骑中炮，换马再战，并亲手斩杀败退者数十人。预伏长墙外的300敢死士乘机突起，杀入敌阵，肉搏冲击。杨瑞山、麦凤标军及时从扣波赶至，直入龙门关，截住敌人逃窜之路。陈嘉、蒋宗汉军猛攻东岭，经过七进七出的奋勇冲杀，陈嘉身负四伤，终将东岭三垒夺回。而王德榜军亦自敌后杀来。“关外游勇、越民千余人，闻冯亲出战，皆自来助战，伺隙邀击”法国侵略者。①法军四面被围，狼奔豕突，争相逃命。有记载说：

法人前后受敌，乃败走。南方卑湿，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辄颠入草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我军战胜，气益猛，乘日光穷追，斩馘法人数千级。法人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军士恨法人甚，卒杀不止。②

再看一个法国随军记者描写中国军队全面反击，法国侵略军狼狈溃败的情景：

中国军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展开旗帜跑来，发出同时把枪炮的音响都遮断的喊杀声。他们因成功而胆子加大，奋力狂怒地向我军驰突前来。如果战事不立时中止，惨祸怕就要立时来临了。

敌军（指中国军）四处纵横驰突，愤怒作践我们的战死兵员，将他们斩首，把他们的头掷在空中，发出野蛮的呼喊，奋身抢夺我

---

①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9页。

② 李岳端：《春冰室野乘》，见《中法战争》（三），120页。关前隘大捷情形，又参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5～456页；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萃军进剿法匪先获小胜随会诸军鏖战三昼夜大获全胜会奏咨》。

军冲锋前放在地上的军袋。[1]

一个直接参加战斗、死里逃生的法军上尉，回忆当时惨败的情形时写道：

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的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2]

镇南关、关前隘之战，中国军队战果辉煌。据法国人黎贡德（Lecomte）的报道，两天战斗，法军死亡 74 人，其中军官 7 人；伤 213 人，其中军官 6 人；炮兵还损失了 12 匹骡子。[3]

而另一个法国人加尔新（Carcin）的报告则说：战斗发生“半点钟以后，第一一一队中主力，则已倒落四分之一。被困的五个大队，曾被减到九百二十五人，这次或死或伤，损失该数中之二百七十五人”[4]。至于军需的损失，他们则很少提及。

中方对战果的估计则不同。彭玉麟奏报说：法军败退时，因为“教匪路熟先遁，法兵多歼”。计“所毙真法兵、黑兵千余，法酋数十，客匪、教匪数百”。[5] 也有人说：“阵斩三画、二画、一画数十级，歼真法兵千余，教匪、客匪数百”；“夺其军火、饷银、驮马无数。”[6] 冯子材对战果的估计是：“毙

---

① （法）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二，《Banq－Bo 之战》，见《中法战争》（三），459、457 页。

② （法）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四，附录《谅山的退却与陆军中校爱尔明加（Herbinger）的任务》，见《中法战争》（三），531 页。

③ 《法军谅山惨败》二，《Banq－Bo 之战》，见《中法战争》（三），464～465 页。

④ 《在侵略东京时期》四，附录《谅山的退却与陆军中校爱尔明加（Herbinger）的任务》，见《中法战争》（三）。

⑤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6 页。

⑥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79 页。

匪千余，擒斩数百，并夺取枪、炮、干饼不计其数。”① 李鸿章对他们的报告予以证实，说是潘鼎新“亲加查验，皆系精壮洋人”；“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②

前方乘胜追寇，清廷乘胜收场

镇南关、关前隘大捷，其歼敌之众，缴获之丰，真是“中西战争第一大捷”。英雄的中国军民，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豪壮誓言。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帝斗争的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整个战局发生了变化，我军由防守转入了全线反攻。

就在关前隘大捷这一天，潘鼎新以“调度乖方”，致使“广西关外各军上年十二月暨本年正月迭有挫失”罪，被革去广西巡抚职，改以按察使李秉衡护理；同时以“屡著战功，任事勇往”之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③ 据彭玉麟等报告，“潘鼎新平日抚驭将吏军民，诸多不洽，屡次挫退，民怨军离，威令久已不行”。而李秉衡“素有清望”，当时在龙州主持诸军后勤工作，处事“至诚至公”、“自奉刻苦”；对待主客各军，则“苦心调和，视同一家”。故“护抚命下之日，欢声雷动，桂省官吏军民若庆更生。无论桂军，即广东、楚军诸大将，无不虚心相听，愿为尽力”。④ 军民一心，兵民欢洽，大有助于抗法战争的发展。

法军自关前隘惨败以后，连夜经镇南关向文渊、谅山方向逃窜，余众不满2000人。到谅山后，会同援兵共约4000余人，在谅山对江之驱驴圩仓猝布

---

① 《军牍集要》卷九，《萃军进剿法匪先获小胜随会诸军鏖战三昼夜大获全胜会奏咨》，并云：南关之战，“为该匪入越以来实罕有此大败”者。苏元春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奏报战果，与冯子材同。见《中法战争》（六），439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寄译署》，见《中法战争》（四），240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二〇三，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谕。

④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附片》，见《中法战争》（六），459页。

防，妄图固守待援。冯子材则乘胜挥师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3月26日，萃军10营会同王孝祺之勤军同时出关，王德榜亦率所部抄小路向文渊挺进。法军"倾巢齐出，奋力拒战"。冯子材分兵四面环攻，战约一时，法军败逃，冯子材挥师直前涌入文渊街。王孝祺、苏元春两军先后赶来。27日，合军占领距谅山15里之界牌。①

谅山"为越南琚边要省"。冯子材认为："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但敌人据江而守，"并扼对河北岸之驱驴圩，圩有四堡甚固"；"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于是，与苏元春、王孝祺等商议，决定"以正兵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28日夜，兵分三路齐出，杨瑞山军先从小路抄至城外潜伏。经一夜激战，终将谅山攻克，歼敌不下千余，其中军官百人左右，尼格里被击重伤；缴获各式火炮四门，火枪400余支。② 从南关大捷到谅山攻克，大长了我军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越南的论者认为："此次黄种的军队第一次同欧洲人短兵相接而没有丢脸。""这场战争无疑会加强中国的力量"，而且"谅山的克复也许会扩大为一般西方人被逐出远东"的胜利。③

与镇南关、谅山大捷同时，北圻西线的黑旗军、滇军在越南军队的配合下，也大败法军于临洮，越南山西、兴化、南定等省数十州县的人民纷纷武装起来，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驻高平的唐景崧、马盛治两军亦攻人太原，鲍超统率的援越军队，则乘胜从谅山分路进剿。3月31日，陈嘉军占谷松；冯子材军克屯梅（即长庆府），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诸军追杀，获

① 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各营攻剿法匪克复越南文渊州并将出力各员弁请具奏奖励咨》，见《中法战争》（三），94页。

② 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萃军攻克谅山夷省大振军威折》并附《杨瑞山夺获军械禀》，见《中法战争》（三），95～97页；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6～457页。

③ （越）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中译本，178页，转引自《中法战争论文集》（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法兵极多，尽复去年官军所驻边界。”冯子材正拟厚集兵力，会同越南各地义军，向北宁、河内挺进，尽逐法国侵略者。[①] 但是，就在这时，清政府受所谓“乘胜即收”错误思想的影响，下达了停战撤兵的命令，把前线军民乘胜前进，追歼逃敌，彻底打败侵略者的作战计划破坏了！

五、挥泪班师

胜利声中的失败外交

中国军队在镇南关与谅山痛歼法国侵略者之际，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复杂。

在军事上，北圻东西战场的战事虽然进展顺利，中国军队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大有直捣北宁、河内，尽复北圻之势。但在中国东南沿海，法国海军继摧毁福州船厂和福建海军之后，于1885年春进犯浙江镇海，且于3月31日占据了澎湖，台湾形势危急。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上下一片骚乱，议会内部争吵不休。1885年3月30日，巴黎的工人和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茹费理”，痛斥他是“国家的蠢贼”、“战争的罪人”，反对血腥的殖民战争。当晚，茹费理内阁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告垮台，法国统治集团陷于四分五裂之中。[②] 但是，腐朽的清王朝和坚持退让、求和的李鸿章一伙，非但没有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和外交上加强对敌人的进

①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57页。

② 谅山惨败后的法国政情，可参看毕乐撰：《茹费理内阁倒台》一文，见《中法战争》（七），383～391页。

攻，而是借前方胜利之机，作为在后方进行妥协求和的资本。当李鸿章得悉前方将士克复谅山的消息之后，立即向清廷奏议说：现在“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①！他认为，“当借谅山一战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害怕中国胜利会危及他们在华的既得权益，也加紧进行所谓“调停”的活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早就派他的助手、另一个英国人金登干（J. D. Campbell）到巴黎和茹费理秘密谈判。只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清政府赔款和占地抵押发生争议，迟迟无法谈妥。③ 及至法国在北圻前线惨败，急于趁势收场，放弃赔款要求，加强对中国诱和之时，李鸿章等也强调“乘胜即收”。1885年3月31日（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内称：“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④ 急于议和的清王朝与李鸿章接获此电，遂以金登干为代表，于4月4日（二月十九日）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停战协定》。⑤ 其主要内容有：

1. 重申《中法简明条约》有效。中国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开放广西、云南通商；

2. 双方下令停战。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清军撤退；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清军撤退。法国解除对台湾、北海的封锁；

3. 停战后双方派代表商订详细条约，并确定法军从台湾海峡撤退日

---

① 《寄译署》，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五，24页。

② 罗惇融：《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一），26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甲申七月十四日（1884年9月3日）记事云：“是日，奉懿旨一道，有‘战局已成，若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之语。”见《中法战争》（二），25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五。

⑤ 中法谈判内幕及签约过程，可参看法国外交部次官毕乐撰写的《内阁的危机与初步协定的签订》一文，见《中法战争》（七），293～310页。

期。[①]

如此的停战协定，使法国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竟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他们高兴地说道：“谅山退却并不像人们臆想的那样重要，因为它没有阻碍和约的立时缔结。这个和约是早经以巧妙的手腕预备好了的，并且对于我们是很有利的。”[②] 代表法国与金登干谈判的毕乐认定：“中法业已媾和。从此，法国对全安南，包括东京在内，其专有的保护权，已得到承认。”[③]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不败而败”了！

停战令下，挥泪班师

清政府既没有等待“和约”的正式签字，更不顾全国人民抗法援越、反对侵略的强烈要求，就匆忙于“协定”签订的第三天，即4月7日，发布了停战命令，强令前线各军按照“协定”的规定，于4月15日停止战斗，25日撤军。正在向前追击、大有“灭此朝食”之慨的前方将士接到命令，真如晴天霹雳，无不愤慨万分。“举军拔剑斩地，恨恨连声”，甚至“痛哭太息之不已”。[④] 正在郎甲指挥战斗的冯子材，4月14日夜接到停战命令，愤慨尤甚，“不愿撤兵”[⑤]。消息传出，“将士环跪恳求，愿出死力灭此法夷”[⑥]。4月15日，冯子材、王德榜代表前线将士致电张之洞，内称：

> 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⑦]

---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63～464页。
② （法）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见《中法战争》（三），529页。
③ （法）毕乐：《内阁的危机和初步协定的签订》，见《中法战争》（七），410页。
④ 胡传钊：《盾墨留芬》卷八，《中法战争》（二），602页。
⑤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80页。
⑥ 都启模等：《粤帅萃亭冯公事绩纪实》卷下。
⑦ 《冯帮办来电》，见《中法战争》（四），489页。

并愿立军令状，请“假以事权，期以一年，肃清全越”侵略者。① 主战的彭玉麟、张之洞、左宗棠亦上奏反对撤兵。张之洞还致电李鸿章提出质问：

奉电转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战。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等因。此次进和议者为谁?②

正奉命出关支援前线的各军将士，接获“停战撤兵”的命令以后，也都慷慨陈辞，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且看鲍超所部将士的反映：

……将领忠勇性成，闻之皆捶胸跌足，怒目竖眉，恨未能战。统领徐连升、李金声、向世珍、周鹏举并诸将俯伏帐前，力请一战；营务处何应钟则求迅速拜折请战。奴才以君命为重，再三慰退。及闻我兵退而法不退兵，诸将愤怒，又环列帐外，擦掌摩拳，同声请战；战如不胜，先立结状，甘从军法。

将士们的同仇敌忾，决死报国之心，使“受三朝之恩，当五旬之后”的鲍超，亦深以此时不能“诛夷”以“报国”，乃“中心之恨事”，亦即“毕生之恨事”了。③

但是，法国处心积虑也要维护这位谈判“权威”。与李鸿章长期打交道的谢满禄（M. de Semalle）说：“虽然李鸿章有他的许多弱点，但在中国人中，谈判上，他会对我们最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重新树起他的威望。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还是不毁坏这个权威比较好些；现在，最好是恢复这个权威，如果可能的话。”④

外有帝国主义者的赏识，内有清朝西太后的支持，使李鸿章一意孤行，

---

①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附片》，且云：“当闻旨罢兵之日，冯子材以兵机方利，敌患方长，机会可惜，力持不愿，电函并至，忠愤填膺，力请阻止，谓必须责法人以越地还之越王，方可班师。”见《中法战争》（六），459页。

② 胡传钊：《盾墨留芬》卷八，《中法战争》（二），610页。

③ 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会办云南军务鲍超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67页。

④ 谢满禄：《北京四年回忆录》，见《中法战争》（七），417页。

置爱国军民的呼吁、请愿于不顾。李鸿章回答张之洞的质问时，把“进和议者”说是赫德，而自己“不过随同画诺而已”。[1] 清廷则对张之洞等反对议和撤兵公开申斥说：

> 中国素以信义为重。法已电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台湾、北海封口，并令在越统领定期停战。我若失信，致生他变，不特兵连祸结，且为他国所不直。嗣后交涉事件，益形棘手。……若此时复饬进兵，此等举动，岂中国所可为？幸而获胜，尚觉得不偿失；一旦蹉跌，更伤国体。……务当懔遵严谕，饬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此事关系重大，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而贻误全局，该督返而自思，亦当不敢出此。懔之，慎之。[2]

清廷决意向侵略者退让、出卖，强迫爱国将士遵令执行，已经昭然若揭。“君令难违”。张之洞、冯子材等只有挥泪班师了！“撤兵之日，越民挽辔乞留，痛哭不舍，随之入境者甚多”。冯子材率军“凯旋龙州，商民香灯爆竹欣迓者不绝”。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临阵逃跑，弄得“民怨军离”的潘鼎新，被革官离开龙州之日，“军民沿河追骂，以砖石遥击舟中三十里”。[3] 贤佞忠奸，千秋功罪，人民自有公正评说。

清廷一面强令前方将士撤军，一面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公使巴特纳（Jules Patenortre）根据《中法停战协定》商谈条约细则。5月4日，出关作战的军队分批撤回关内。6月9日，李鸿章与巴特纳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

---

① 胡传钊：《盾墨留芬》卷八，《中法战争》（二），610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〇四，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谕。

③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附片》，见《中法战争》（六），459～460页；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80页。又李光汉：《战交趾诗》：“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勿生期。战骨累累在，秋风飒飒吹，莫论交趾役，故垒有余悲。”也是对罢战撤兵的一种评论。见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80页。

约》十款，[①] 主要内容有：

1. 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

2. 中国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及设立领事馆；

3. 法国货物进出广西、云南需纳各税，应轻于现行税则；

4. 日后中国如建造铁路，应向法国商办；

5. 法国从基隆、澎湖撤军。[②]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既已签订，遗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刘永福黑旗军的去留了。

刘永福黑旗军的去留问题

基于刘永福黑旗军成长的历史，它既与中越两国有关，又相对独立于两国管辖之外。从他在助越抗法中的表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需要利用他，而又常怀疑忌之心。对于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扩张，他早就是一大阻力。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人自蚕食越南以来，所最畏忌者止一刘永福耳。"[③] 所以，在中法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等早把刘永福黑旗军视为"眼中钉"，与法国侵略者的观点如出一辙。例如：

1883年9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谈判时，脱利古出语要挟，"必欲剿除黑旗。李意亦谓恐以一刘受累；并斥边吏只论目前胜负，不思日后利害"[④]。

1884年7月28日（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曾纪泽与法国公使巴特纳会晤，"巴索三事：一、革刘永福职；二、索偿款，较原说减五分之一……。[⑤]

---

① 简称《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或《李巴条约》。巴特纳，亦有译作巴德诺。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66～469页。

③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再陈议和流弊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4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癸未正月十五日记事，见《中法战争》（二），1页。

⑤ 《翁文恭公日记》，癸未八月二十三日记事，见《中法战争》（二），3页。

当时，据冯子材在关内探得消息，越南与法国交涉时，也有“法人必欲该国（指越南——引者）将其首相阮文祥、统督黄佐炎、副提督刘永福送与法人，方能议和”的无理要求。①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订立以后，为了顺利兑现条约的规定，避免节外生枝，清王朝与法国侵略者都急需解决刘永福黑旗军的去留问题。由于刘永福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保家卫国中的赫赫战功，采取武力消灭的办法既有困难，亦必激起公愤，② 于是，他们采用软的手法，给刘永福连下九道命令，要他率领黑旗军回国。岑毓英、张之洞迫于朝廷的意旨，也连接二十多次给刘永福去函去电，劝他执行清廷的命令，率黑旗军入关。1885年6月初旬，岑毓英路经保胜，还面劝刘永福入关。黑旗军战士和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民听到消息，站立沿河两岸，愤怒大呼：“雷打死岑毓英咯！”吓得岑毓英“面色皆变，魂不附体”。③

然而，这时的刘永福黑旗军，不但背后有清王朝的巨大压力，而且面对法帝国主义这个不共戴天的强大敌人。法国既已占有全越，则黑旗军占有保胜，依靠收税维持生存的途径已被切断。而保胜贫瘠多山，只靠耕收是无法立足的。在内外交迫，困难重重的新形势下，刘永福于1885年6月（光绪十

---

① 《翁文恭公日记》，甲申六月初八日记事，见《中法战争》（二），19页。

② 如光绪十年四月初十日通政使司吴大澂《奏和议不能允从约有数端折》说：“刘永福与法人嫌隙已深，此时中国罢兵，黑旗无所依托，法人欲得而甘心焉。……然欲中国枭其首以谢法人，海内人心所不服，此必不能允从者。”又如：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再陈议和流弊折》云：“……若刘永福退入滇粤边境内，法人即向我索取叛人，不与则和议甫成，又将决裂；与之则自坏长城，塞天下忠义之气，以后再求如刘永福之效力者，不可得矣！”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1、4页。

③ 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法战争》（一），284页。

一年五月）率领部众3000余人回国了。[①] 第二年，清廷据张之洞提出的“安插、保全、任使三义”兼顾的原则，[②] 任命刘永福为广东南澳镇总兵。[③] 但是，他的队伍几经裁撤，最后只剩下300人了。[④]

刘永福接受清王朝人关的命令，成了封建王朝的总兵。虽说他有“仰慕名器之心”[⑤]，但他的民族正义感与强烈的爱国心并未泯灭。“扶妖江左成遗憾”的冯子材，因为南关抗法有大功，受后人赞颂为民族英雄，我们又何须对这位出身草莽、同样在抗法战争中立了大功，而后成为清王朝总兵官的英雄多所指责呢？

应该指出的是：大批兵勇入关以后，多数被裁撤遣散；[⑥] 没有入关的，散落在越南。这些平日靠“当兵吃粮”为生的哥儿们，有的“解甲”而不愿“归田”；有的虽“归田”而无田可耕。他们既痛恨法国侵略者的横暴；又不满封建统治者的出卖。于是，携带武器，拉帮结股，使用自己在抗法战争中学到的本领，终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以游勇为主力的广西会党大起义。

---

① 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张之洞奏报刘永福回国情形说：“（光绪十一年）五月间由保胜移至滇境文山县南溪，八月初由滇起行入桂，九月间由百色抵南宁，十二月间由南宁率部赴广（东）。”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二，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二二五，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谕。

④ 《普天忠愤集》卷一，《刘永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云：“窃福越南劲旅实有数万，入关之初，只准带一千一百人……自到粤以来，频年裁撤，福屡次哀求，未能获准，今仅存三百人矣！”

⑤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一。

⑥ 李秉衡谈广西裁撤兵勇云：“兹于本年正月（1886年2月）起认真汰留，裁去八营，并为二十四营，以十二营专防镇南关中路，以四营分防东路，六营分防西路。裁兵节饷，每年可节饷银二三十万两。”见《李忠节公奏议》卷三。

六、设防实边保南疆

战后的驻防与划界交涉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越南，中国边疆出现了危机。建设边防，以保边疆，成了中法战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法战争时的广西提督、战后督办边防建设的苏元春

中国从越南撤兵初期，所有军队仍多驻中越边境。据受命督办边务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在1885年5月8日（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报告，停战后拔队撤回的计划是：将前敌左路、谷松中路、观音桥所驻各营先撤至谅山、邱𫘦。后路各营先于巴坪、文渊、那阳、峒朴等处分屯，而后撤进南关，驻扎于关前隘、陇寨隘、幕府塘、凭祥土州与宁明州等处。右路牧马各营，亦令先移至邻岭，继扎归顺、镇安厅各隘。所有主客各军，除淮军鼎字五营已经遵旨遣差，尚有广、桂、楚、鄂等军80余营应如何去留，仍待奏明办理。[①] 半个月以后，广西军基本已经撤回国内。当时，广西的边情和边关驻军的情况是：

> 查粤西边界，分隶南、太、镇各府，幅员辽阔，几及千里。除镇南、水口、平而三关之外，隘卡纷歧，指不胜屈，设防贵扼其要。因派记名提督安义镇总兵陈嘉率毅新、镇南全军扎镇南关，而以记

① 苏元春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14页。

> 名提督方友升率亲军二营继其后；又派记名提督蒋宗汉率广武全军扎关前隘，同扼谅山来路。其抚标中军各一营，扎罗隘以杜间道。总兵马盛治率熙字各营扎归顺州之平孟、陇邦各隘，总兵蔡简宸率简字一营扎镇安厅之那坡、百南各隘，分扼牧马、保安来路。此为主军。

而其他客军，如冯子材之萃字营全军，初扎平而关。5月14日冯子材奉命督办钦、廉一带防务，随调广东。“王德榜定边楚军全扎由隘，以扼文渊来路。王孝祺勤军暂扎杉桥，兼顾龙州后路。唐景崧景字十营，分扎下冻土州一带，以通镇边声息，亦便于策应太（平）边。”① 这是战后边境防御的第一步。

根据《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第三款规定：自“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1885年8月29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根据法国公使巴特纳的照会，正式奏请派员解决勘界问题。清廷随命“鸿胪寺卿邓承修② 驰驿前往广西，会同张之洞、倪文蔚、李秉衡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广东督粮道王之春，直隶候补道李兴锐随同办理”；另以内阁学士周德润③ 驰驿前往云南，会同岑毓英等办理中越云南段的勘界事宜。要求他们“各委干明之员，带同熟悉舆地之人，周历边境，详加履勘，绘具图说，以备考证”。“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

---

①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苏元春奏折，见《中法战争》（六），464～465页。

②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历任御史、给事中等职。中法战争时，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1885年夏，赴天津协助李鸿章与巴特纳谈判订约。在中法战争期间，邓承修被外国人（赫德）视为“五虎”之一（五虎：张佩纶、宝廷、张之洞、邓承修和刘恩溥）。1883年12月9日《赫德致金登干书简（23）》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三章，《谈判内幕》（二），146页。

③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县人。同治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

就”。[①] 说明划界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了。但是，由于边界的详细勘定关系重大。所以，11月18日，清廷又发指示：“必须慎之于始。”考虑到“各处所绘地图详略不一”，与对方“难保不互有异同”，是以“目前分界，自应以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主”。应力争在谅山分水岭之东，“划归粤界”，否则“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以免争端，最为相宜”。[②] 一个月以后，清廷根据张之洞的建议，明确规定：

此次桂越分界设关之处，必须力争以文渊州为限。发议之始，尤宜先争驱驴；驱驴不得，再议文渊。并应议定法人不得于此筑炮台。[③]

界务和商务是互相关联的。清廷在布置界务谈判的同时，又要经办者同时注意开口通商的问题。清廷命令邓承修等对此务必“设法辩难，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④]。

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实际是西太后那拉氏），对于划界交涉的心理是十分虚弱的，总害怕谈判破裂，衅端又生。这从1886年1月17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廷电寄广西划界大臣邓承修的诏令中看得清清楚楚。内称：

法办北圻费手，又避弃地之辱，取舍正两难。我若逾约而争，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二，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谕。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七，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谕。按：中法划界请设“瓯脱”之议，首先倡自暂护广西巡抚李秉衡。他在1885年4月16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给总理衙门的密电中说：“秉衡博采众论，拟请在谅山、高平一带之地仿古制瓯脱。两国皆不置兵，听越民杂处，使我与法隔，既免时起衅端，遇事较可措手，请总署代奏。”（《中法战争》（六），404页）这个建议，受到清王朝及地方督抚如张之洞等的重视，而且提出了各种关于划分“瓯脱”的具体建议。但由于法方反对，未能实现。

③ 《桂越分界宜以文渊州为限片》，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九，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七，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一日谕。

彼或借口罢议退去，则衅端终归未了。该大臣等守定“改正”二字辩论甚是，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借端生衅为主。①

既要力争多得，又要设法速了，这就使邓承修、周德润等在实际谈判时左右为难了。

邓承修负责中越边界谈判，主要任务是广西、越南界的东段（即从平而关以东至吞仓山止），以及广东、越南段（即今中越边界的防城段）。谈判的主要内容有：中越边界的瓯脱；北仑河口划界；两国沿海附近岛屿的划分；以及白龙尾、江平、竹山的归属等问题。谈判的对手是法国代表狄隆。从1886年1月12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邓承修在镇南关会晤法国代表，② 至1887年3月29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五日）两国在广东钦州东兴签订《粤越边界勘界节录》止。③ 历时一年半。

谈判初期，邓承修根据《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第三款有中国与北圻界限“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有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的规定，以及“设法辩难，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利益”的指示，就改正旧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与法国代表的辩驳十分激烈。由于法国公使和赫德的干预、恫吓，清政府惟恐谈判破裂，要邓承修“履勘原界，新界暂置有论。……切勿固执己见，贻误大局，自干重咎”。④ 邓承修、李秉衡欲再据理力争，而清政府却给他们以“交部严加议处”，并且警告说：“倘再玩延，致误大局，着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二一。

② 从邓承修《中越勘界往来电稿》卷一得知，他于1885年11月27日到龙州，12月23日抵南关，次年1月12、14两日与法国代表在南关、文渊会晤。见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07～510页。

④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寄办理勘界事宜邓承修等电旨》，见《中法战争》（七），47页。

英治罪成案俱在，试问该大臣等能当此重咎乎？"① 结果，邓承修、李秉衡被迫服从，于1886年4月（光绪十二年三月）将镇南关一带界线会勘完毕，而议订新界则毫无所获。② 同年9月7日（八月初十日），巡抚张联桂奏称："广西边界，绘图立石暨全省舆图测绘，一律完竣。"③

继之是广东与越南边界谈判，集中讨论江平、黄竹、白龙尾等地的归属问题。因为双方同意"按图划界"，而邓承修提出了总理衙门提供的英、法两国所绘地图，与中国地方志书记载一致，所以谈判比较顺利。1887年3月29日，双方订立了《粤越边界勘界节录》，分四段绘制图界。④ 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六日），中法两国签订《续议界务专条》，总理衙门以龙州开口通商为条件，收回了江平、黄竹和白龙尾等地。⑤

建设边防保南疆

在中法边界谈判过程中，边防建设随之提到日程上了。尤其是广西的千里边防，更显得重要。1885年4月16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清政府刚刚下令停战撤兵，奉命暂护广西巡抚的李秉衡就指出："云、桂、广三省皆与越接壤，云以互市重，广以海防重，桂以守边重。"而"桂与越界，自小镇安、归顺州、下雷、龙英、安平、上下冻、凭祥、思陵、思忠各土州以达龙州、上思，自南贤东绵延一千八百余里，历镇安、太平、南宁三府，所辖计

---

①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处寄办理勘界事宜邓承修电旨》，见《中法战争》（七），50页。

② 1894年6月19日（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中法两国勘界委员会在龙州道署会齐，签订了中法《桂越条约》，"将广西与越南界图共有二百零七块界石，勘过立约"。代表中国监立界石并画押的是广西太平思顺道、镇南关监督蔡希邠；代表法国的是督办界务、越南谅山第三道总督格依哥乌厘、帮办界务、帮办越南第一、二道总督法明。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83～594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六。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07～510页。

⑤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2～514页。

大小隘共一百数十处，犬牙相错”，形势复杂险要，必须及早设防固守。他的见解，立即得到张之洞、苏元春的赞同。他们从战后广西面临的实际出发，认为“如将谅山、高平越境悉听法屯兵，则桂防处处可虞，敌或背盟压境，我将何以支？似不能不预筹防限”。[①] 苏元春在奉命撤军之时，也认为“此后边防倍关紧要”，正反复筹谋陈兵边境各隘，以保安全。[②]

而李鸿章却持反对态度。如前面曾经指出的：中法战争开始时，他宣扬法国利害论。到了法国占领越南，帝国主义势力直逼国门的时候，他又宣扬法国无害论。他说：“法人之于越南，久已形见势绌。滇边以外，乱起如麻，彼应不遑，岂有余力及我内地？败盟之事，目前断无可虞。桂边较为清平。”“现在惟以稽查宿莽，严禁门关为第一要义。”亦即当前祸患不在外而在内，首要工作在于肃清“内乱”，而不是预防外敌侵略。[③] 这种看起来似属和平麻痹的思想，实际是在建军时淮军应优于他军；在设防上海防应重于陆防的老调重弹，理所当然地受到张之洞、李秉衡和苏元春等人的抵制。

然而，要在绵延近2000里，地形复杂险峻，素有三关百隘五十卡的边境[④] 设防，实在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把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放在身为广西提督、兼任督办边防的苏元春肩上。

设防必需经费。在战争甫息，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是不可能，也不愿意拨出如此巨额款项的。而广西经费拮据，长期入不敷出，人所共知。

---

① 见《中法战争》（六），404页。又参《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四，《电奏二》，15页。

② 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苏元春等奏，见《中法战争》（六），444页。

③ 黄嘉模：《清季广西边防概略》（上、下），见台湾《广西文献》第21、22期。

④ 据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二四《关隘略》统计，桂越边共有三关、一一七隘、二十三卡。但王之春、徐延旭：《广西关隘卡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载，则是三关、一〇四隘、四十一卡。又：徐霞客亲临下雷、湖润寨、鹅槽隘等地考察，在《游记》卷四上记其形势：“内有峭壁而外悬枝，上倒崖而下绝壑，飞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极险矣！”

为了筹措设防经费，张之洞首先于1885年7月取得清政府同意，在所借“洋款”内拨出10万两，作为桂边炮台购买洋炮之用。[1] 其余部分，除向各省筹措外，苏元春只有大量利用廉价的军力、民力，削减所部军饷，同时开办制造局、火药局、砖瓦厂、石灰厂等以自筹工料，减少工费、原料开支，直至拿出自己的“薪俸收人，尽以分赡部曲”[2]，完成设防实边的艰巨任务了！

针对陆防的特点与需要，从中越边境复杂险峻的山形水势出发，苏元春进行边防建设时，主要抓了建关隘、筑炮台、造兵营、修军路和移民实边等几项大工程。在施工中则分中路、东路和西路分别进行。中路以镇南关为中心，内延至关前隘与凭祥土州一带。东路从镇南关往东至上思州的百伦隘、剥机隘等地。西路由镇南关西至龙州厅辖之平而关、水口关，下冻土州管辖之布局隘、花更隘，归顺州属之频洞隘、陇邦隘，小镇安厅属之平孟隘、洞隆隘、那平隘、百怀大隘等处，而以镇南关及其附近的要隘为建设重点。

前面提到，苏元春在遵旨撤军进关以后，曾将边防驻军情形向清廷专折奏报。清廷表示满意。接着，苏元春与李秉衡以及驻防南关之记名提督方友升、副将陈桂林等着手修复镇南关的工作。他们共同“勘估工程”，查看南关旧基，以其地势低下，未得形势。但“关东数十武，有土山；关西里许，有石壁，皆高耸可俯瞰关外诸峰”。于是，分别在土山石壁之上“筑炮台，并在两山之间添建用土筑城身，外包砖石，高近二丈的东西关城三里许”。因为“工程浩大，需款甚巨，急切难筹”。故“凡除道、筑墙、伐木、运石等役，悉以责成各营队合力助工，量予犒赏。但于内地雇觅木、石、泥水各匠数百名”，连同“购买砖瓦、灰油等物”，共用工料银三万两左右，历时半年，于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〇，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谕。据苏元春于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奏：“粤西库款支绌，筹饷无从。”关外用兵两年，复赖各省协饷源源解济。现计“光绪九年份协饷，四川一省欠解银二万九千五百两有奇，十年份协饷，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江西五省共欠解银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两”。惟望各省迅筹速解，共恤兵艰。见《中法战争》（六），414～415页。

② 《清史列传》卷六二，《苏元春传》。

1886年初，重新建成了祖国西南锁钥的镇南关城。①



中法战后新建的镇南关门及其城墙

龙州是维系镇南、平而、水口三关的重镇，地处左江北岸，松吉河和高平河的下游，和越南水陆相通。中法战争以后，法国要求在云南、广西开埠通商，“首列龙州”。为此，清廷先是设太平思顺道一员，驻扎该处。旋将广西提督衙门从柳州移驻龙州。1886年春，李秉衡、苏元春等鉴于龙州未建城垣，经与各方筹商并细加勘测，决定在龙州筑城。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动用八万两银子，全部用砖石灰砌，垣周5里，大小城门8个的龙州城，终于1890年2月建造完成，并经派员验收认可。② 素为祖国南疆军事、政治与经济重镇的龙州防务，从此得到加强。

与建设镇南关及龙州城同时，苏元春在凭祥和龙州附近建造了大小连城。凭祥近郊的大连城及其附近，建有兵营、练兵场、演武台、弹药库、枪械修理工场以及碾米厂、圩场等等，是镇南关边防第一线的指挥、供应中心。小连城在龙州城西北十里的将山，“左当镇南关孔道，右临水口关，外达平而关”③。苏元春在此屯兵积粮，并建行台于其上，作为龙州边防指挥所在。

在千里边关上建筑炮台，安置巨炮，是苏元春巩固边防计划的重点所在。由于“广西边防一千七百余里，处处紧连越境，三关百隘，防不胜防”。所

①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六)，626~627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八〇，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马丕瑶奏并清谕；又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236页。

③ 陈必明纂：《龙津县志》第九编，《文学》。

以，炮台的选址与建筑，“必一台足顾数隘”，以期发挥“层层联络，节节应援”之效。因为工程浩大，需费甚多，只能分期、分批建造。第一期建筑的炮台、碉堡集中在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龙州、凭祥附近的险要山岭上。第二期兴建的炮台、碉堡，则从镇南关左右延伸，直至思陵、归顺沿边的重要山梁隘口。苏元春穷10年之力，动用白银50万两，综计建造大小炮台82座，碉台83座，购买并架设各式火炮119门。这些炮台、碉垒，均用大小石块与三合土砌成，“台式变通中外新法，因时地亦制宜；药库兵房，务藏于密，勾结暗巩，高爽灵通”。[①] 至其建造具体情形，从《凭祥小青山炮台碑》文的记载可见一斑。文曰：

> 群峰之顶，以为炮台；拓地百亩，被乳突以为深凹，沿凿如蜂巢形，嵌镶砖石，砌结如寞，前后洞然；左右洞壁，门相对而不窥见；顶拱如圜，盖以三合土，筑坚楼覆其上，足御风雨，且肆远望焉。其外垒土垣为捍卫，台内可藏甲士数百人。[②]

建筑所用工料，“凡半砖滴水，皆工匠、勇丁等如蚁载粒，出人于蛮烟瘴雨之中，往来于累巘重冈之上。其胼胝情形，甚于他处，有难尽以言语形容者”[③]。再以安置大炮而论，把一门重数吨的大炮，依靠数百人乃至千人的手拉肩扛，运至数百米高的峻峰绝顶之上，往往费时数月，其艰难辛苦，可以想见。爱国军民为了巩固祖国边防付出的辛劳，能不教人肃然起敬?!

1886年，苏元春奏报修建炮台告竣。两广总督谭钟麟受清廷之命，派广东候补道萧炳堃前往验收，其结论是：所有工程，“委系工坚料实，远近形势相联，大小高下得法，规模大备，战守有资”[④]。充分肯定了边防工程的质

---

①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督办广西边防广西提督苏元春奏《修筑炮台已竣折》，原件存北京故宫档案馆，转引自萧德浩、蔡中武：《苏元春评传》，7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②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35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③ 《屯甲山（今称大青山）炮台碑记》，见《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354页。

④ 《谭文勤公奏稿》卷一八，27页。

量。

苏元春率领军民修建边防工事时，为了工程运输的需要，还大力修筑道路，结果也自然把各处关隘、炮垒、碉台、兵营连接起来了。这些最初主要为军运而开的道路，通称“军路”。据记载，十年之中，苏元春在边境共“修筑军路千里”。[①] 它以龙州为中心，主要干线有：龙州经归顺至镇边的西线；龙州至思陵、爱店、那黎的东线；龙州至镇南、平而、水口三关的南线；龙州至太平、南宁的北线。这些军道，战时利于军运，平时利于商贸，且为广西日后建设近代公路的滥觞。

与修建军路同时，苏元春还整治了龙州境内的左江、明江等河流，使昔日“逶迤纡曲，巨石峋嶙”，“滩口出入仅容小舟”的险滩，变成了“大川利涉”的水上通途。[②] 而龙州由于水陆道路的修建，也很快成了“烟户相望，商贾辐辏”的大市镇了。[③] 国防建设促进了南疆边区商品经济的繁荣。

驻军保边，巩固国防，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桂西边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食息荒凉”。[④] 惟有移民实边，开展边地生产，驻军才有可靠后盾。为此，苏元春鼓励官兵亲属至边境随军，并动员人口密集的钦州、廉州、郁林州等地的贫苦农民至边境落户，在安家与生产上给以必要的帮助。还建设圩场，鼓励商贩前来贸易。是以各驻军重点之地，如水口、凭祥等军营附近，经过“招待垦辟，流亡集聚”，久之，居然成市矣。归顺的葛麻圩，镇边的平孟圩，也是移民实边，以满足驻军需要而繁盛起来的。边境设防与边区农耕、商贸发展相辅相成，促进了桂西沿边社会的进步，应予重视和肯定。1892年，马丕瑶奏陈边事时指出：“数年以来，殚虑经营，不遗余力，克成此屹立不摇之势”，而“人和地利，隐堪大壮边声”。[⑤] 苏元春面对边防建设的成就，欣

---

① 陈必明：《龙津县志》第十编，《人物》。
② 《创建邑耀滩之碑文》，转引自《苏元春评传》，76页。
③ 凭祥市隘口《伏波庙碑文》，见《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359页。
④ 马丕瑶：《会奏边防各员仍照异常劳迹奖励折》，见《马中丞遗集》卷三。
⑤ 马丕瑶：《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二，22～25页。

喜之余，也情不自禁地高歌吟唱："穷边自此为根本，化外何能再抗衡"了！①

七、抗法战争中的八桂儿女

前线爱国将士的英勇抗敌，战后的千里边防建设，都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广西既地处前线，各族人民在抗敌与建设中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抗法的越北战场，西线滇军统帅、云贵总督岑毓英，籍隶广西西林；自请赴越会同刘永福抗法的唐景崧，籍隶广西灌阳。刘永福在发布《告四海檄文》中则明确声称："永福中国广西人也。"② 刘永福黑旗军来自广西。他手下的三员大将，杨著恩来自钦州，黄守忠籍隶宁明，吴凤典乃上思州人。所以唐景崧说他们"皆属粤人"，与自己"谊属桑梓"。③ 在北圻东线作战的中国军队，当时有所谓客军和主军之分。客军如王孝祺的淮军，王德榜的楚军以及冯子材的萃军。而萃军在上思州添募八营，故军中广西子弟亦不少。主军即桂军。桂军中的主要将领苏元春和马盛治，是广西永安州人，陈嘉是荔浦人。他们都在抗法战争中身当前敌，立下赫赫战功。至于直接投入抗法战争中的桂军50营15000人，除由原来的防军调拨外，还有不少招自居留关

---

① 苏元春歌颂大连城要塞诗，见《中法战争历史调查记》（油印本），广西通志馆，9页。1907年11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粤西》月刊第一号，载有老龙的《广西之去病复元论》一文，谈及广西边防时说："广西边防，不过一直掩耳盗铃之工具，法人心目中直视若无物也。"作为唤起人民危机感之鼓动则可，以此否定当年边防建设，则未免言重了！

② 《刘永福历史草》附《刘永福檄文》，见《中法战争》（一）。

③ 《请缨日记》卷一，《中法战争》（二），44页。

外的农民，取其“熟谙技勇，能耐炎瘴”。① 有的召自太平、镇安一带边民，亦取其“朴实精悍”，“能耐炎瘴”。② 有的招募越南边民，但在“越营”中亦“本多内地游民”。③ 当时，人民群众以能到边关当兵吃粮“打番鬼”为无上光荣。苏元春、马盛治命人回乡招募兵勇时，永安州群众踊跃从征。

妹莫忧，
哥去龙州当勇头。
到了安南打胜仗，
英雄盖过永安州。④

这首歌谣，正反映了人民群众踊跃从征，英勇赴战的壮志豪情。刘永福的祖籍博白县，“随刘永福参加黑旗军的先后共计1200人以上。其中在1883年夏纸桥战役之后，刘永福派人回博白招兵，东平车路田村青年都应募从征”⑤。该村秀才刘荧楼拟携子应召，其妻激励曰：

方今国家多难，正种族存亡所系。大丈夫当乘此时奋起，为国宣劳，安可郁郁久居此作秀才以终老耶？至于家中事务有我主持，可勿以为念也。

荧楼“乃投笔而起，人福军门任管带，屡立战功”。其余乡中子弟，亦多“闻讯奋起，自裹糇粮……间道出关，从黑旗家军门永福”抗法。⑥

紧临边关的凭祥、宁明、左州直至镇安、归顺等地的群众，一听说“支

① 光绪九年六月十三日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探报关外法越军情折》，见《中法战争》（五），176页。
② 光绪九年七月初八日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密陈出关扼守并剿办情形折》，见《中法战争》（五），182页。
③ 光绪九年六月十三日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探报关外法越军情折》，见《中法战争》（五），第176页。
④ 程英：《中国近代反帝反封歌谣选》。
⑤ 李建源、李旭：《黑旗军中的博白子弟》，按东平车路田村乃刘永福的祖居地。见《中法战争论文集》第四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⑥ 《刘氏家谱》卷一一，民国二十三年修，现存博白县三滩乡良坡塘村。

援前线打老番，谁都愿意去，不用什么动员”。“方家村在前线，老番打到镇南关时，全村的后生哥都去投军了。”这些人打完仗“都销差回家”，“不讲酬劳”。[①] 1883年，桂军副将黄履高在小镇安募兵三营，其中多壮族子弟。北宁失守后，奉调出关作战，不少人为保卫边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②]

总之，人民群众踊跃应征赴战，以援越抗法，保家卫国为荣耀，在当年的八桂大地蔚为风气。

更多的没有应征入伍的群众，当敌骑叩关，家乡危急之时，也都自动拿起刀矛棍棒，奋勇参战。有的直接配合军队，冲锋陷阵；有的犯难冒险，侦察敌情；有的三五成群，搜捕逃敌；有的给军队通消息，充向导，他们都为歼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法国侵略军窜入镇南关，猛扑关前隘的当晚，冯子材急调远在扣波的杨瑞山、麦凤标所部萃军赶来增缓。手持大令，连夜跋山涉水前往搬兵的，正是关前隘摩沙村村民陆善康、陆善珍兄弟。[③]

繁重的后勤运输供应工作，也流淌了八桂儿女的大量血汗。当时，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所需的战斗物资和生活用品，多是经过广西从南方各省运来的。军运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凡武器、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多从广州溯江而上，运至南宁；军粮运输主要从湖南经桂林、柳州而下南宁。然后用小船驶入左江而至龙州，再由龙州分两路运抵越南前线。一路出镇南关，沿大道运至谅山、北宁；一路出水口关，经高平运抵北圻西线。由于山水阻隔，运输手段落后，是以困难重重。水路多靠木船运载。而西江、左江的险滩极多，逆水行舟，非纤夫水手牵拉而行不可，常有一船而用夫数十以至百人者。[④] 陆路则靠肩挑背负，牛载马驮，其艰苦劳累，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且看倪文

①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关于《人民热烈参军》的记录。

② 《徐延旭来往函牍》，见《中法战争》（二），273、280页；又参《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有关人民参战部分。

③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148页；又参沈奕巨：《镇南关大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④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人民群众担负运输》部分。据统计，龙州至南宁有险滩70余，龙州至鸭水滩有急滩18个。

蔚谈从湖南至广西的陆运情况，即可概见其他。他写道：

> 鄂省委员解到协饷念万金，可感可佩！惟军火搬运甚难。永州存械重数十万斤，刻已抵全州。然陆运既无夫，水运又太缓，俟其到省，再作计。省城局存军械，尽解前敌矣！
>
> 军火已抵全州。冬令水枯，舟运不能计程，陆运雇夫不易。此次军火如强（镪）水、电线之类，着地起肩，皆须得法，非仅有力能举也。①

在关外，以牛载运枪械，大者每头可载二十杆，小者每头仅载十余杆。但仍需夫役妥为照顾。② 至于军粮的就地加工，肉菜的采办供应，就多依靠边关人民的大力协助了。③

历史告诉我们，中法战争在陆战中痛歼法国侵略者的胜利，是全体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和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参与分不开的。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以那拉氏西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求和，竟在前方节节获胜的有利时刻，又一次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越南侵入了两广和云南，进而深入内地的广大地区。就广西而论，中法战争以后，社会经济和政治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被迫迅速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化。

① 《徐延旭往来函牍》中之《倪文蔚来函》，见《中法战争》（二），281～282页。

② 《徐延旭往来函牍》中之《吕春葳等禀》，见《中法战争》（二），465页。

③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中之《从生活上协助军队》部分。

第九章　中法战争后广西社会的变化

中法战争以后，法国占有越南。与它毗邻的广西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由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广西开埠通商，大量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攫取开矿、航运和修建铁路等特权，把持广西地方海关，操纵金融业务。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下，广西社会的自然经济明显地被破坏，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开始被卷进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加以人民反对侵略的推动，新式的通讯和交通运输业也逐步兴起。因此，如果把中法战争后广西出现的这些变化视为近代化的开始，那么，这种近代化也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而来的。

一、帝国主义对广西的侵略和扩张

强迫开埠通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中法越南战争前夜，40年间，中国被迫和外国

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等共达119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约章在中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各种特殊权益。但是，直接涉及广西的约章并不多见。而从1884年4月4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起，到1898年4月中法关于《越南邻省不割让来往照会》止，仅在14年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章程、合同以及往来照会等共计101件，其中直接涉及广西的就有19件之多。① 这些有关广西的约章虽然主要限于法国和英国，而其他帝国主义者凭借早已取得的最惠国待遇，同样可以享有。它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深入，也加速了广西社会半殖民、半封建化的进程。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在广西扩张侵略权益，首先表现在强迫开埠通商，并以通商口岸作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对此，毛泽东曾经作过论述，他说：

>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

广西的对外开埠通商，有一个逐步明朗化的过程。1885年6月9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越南条款》，其第五款规定："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生意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

① 参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8～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①

1886年4月25日（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其第二款又提出了广西、云南边关某两处通商的问题②到了1887年6月26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中法两国在北京订立了《续议商务专条》，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通商。③

龙州开放后十年，英国又强迫中国把梧州开放为通商口岸。

1896年1月（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英国在缅甸问题的交涉中，借口发展中英商务，以要挟的手段，向中国提出"请开西江"的要求。④ 第二年2月4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了《续拟缅甸条约附款》，在所附的"专条"中规定：中国"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驻扎处所"。⑤ 这是广西近代被迫开放的第二个通商口岸。

梧州开埠虽在1897年，但如前述，早在1859年2月（咸丰九年正月），英法两国派遣炮舰溯西江而上，直人梧州，沿途勘测航路，绘制地图，表现出染指梧州的意图。到了1862年11月（同治元年十月），又有英军乘黄浦号轮船溯西江而上，深人藤县河段，再次勘测沿江航道，并对前两次所绘海图进行订正，作出准确的文字说明，为英国日后的商务及军事深人广西作了重

---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67～468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78～679页。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5页。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四日，粤督张之洞曾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开龙州通商云：法国"欲在龙州通商，此事有损边防，其害甚巨，断不可许"，否则"镇南关之险全失"。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一。

④ 龚照瑗：《致总署猛地不能挽回英认改缅约商务界务二事须允其一电》，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

⑤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90页。

要的准备。[1]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日本在提出和约的底稿中，也有开放广西梧州为通商口岸和航行西江的要求。4月8日，李鸿章向日方答复说："梧州士民，向来最恨外人。万一开口，易滋事端，地方官实难保护。"日本于是不再提开放梧州的要求。[2] 而英国紧接日本之后，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梧州和割让云南野人山等地的问题。清政府却认为："西江通商，虽于厘金有损，尚有洋税抵补"，而"野人山地则系云南屏蔽"，关系重大。[3] 于是答应了梧州通商，允许外国在梧州设领事，以及英国轮船可以在香港、三水和梧州之间航行的要求，以换取不割让云南野人山。

龙州为广西边防重镇，地连左右江流域广大地区。法国强迫中国开放龙州，其目的"是改变商旅们原来经过北海往来南宁及滇东地区的商路（每年约有三百万银元的贸易），而使它转向龙州"。[4] 明显具有与英国控制的北海港口竞争的意图。[5] 而梧州在广西东南，乃黔江、郁江和桂江的合水口，是广西、云南、贵州三省从西江水路下广州出海的主要港口。英国强迫中国开放梧州通商，则是对法国要求开放龙州的反击。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从东、西两方面向广西全省加紧扩张和侵略了。

龙州开埠以后，清政府根据广西巡抚沈秉成的奏议，于1888年2月21日（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在桂林巡抚衙门内设立洋务司，以"熟习洋务之臬

---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六，《寄译署》。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

③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六。

④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税务司报告·龙州关署税务司客格纳报告》，23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⑤ 1876年9月13日（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国借口其驻北京使馆职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事，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在该条约第五端《通商事务》第一款中规定："中国开放广东北海以及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四处为通商口岸，并作为领事驻扎处所。"

司张联桂经理其事。[1] 1889年（光绪十五年），法国在龙州圈地，设立领事馆。[2] 同年4月1日（三月初二日），龙州海关成立。[3] 梧州正式开关通商则在1897年6月4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日）。[4] 就在这一年，英国在抚河西岸的白鹤山占地建立领事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美国凭借最惠国待遇特权，也在白鹤岗占地设立领事馆。帝国主义者通过海关和领事干涉地方事务，从而出现了"各省的总督、巡抚、道台也经常和各地的税务司和领事馆商议，听其意见而行动"的局面。[5] 海关关署和领事馆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侵略广西的据点。

操纵海关和减税免厘

海关征税，是一个主权国家抵抗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本国工商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关税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每个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权随时调整各种货物进出口的税率，以达到通过征税加强竞争，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目的。但是，在近代中国，自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就丧失了海关征税的自主权。1843年中英在广东虎门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中国对进口、出口货物的关税率压低至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6] 远低于从前海关的征税率。

1858年，中英订立《天津条约》，其二十六款规定：凡进出口货物，"每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五。

②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一四，《职官志》。领事馆先在蒌园角，后移驻县城对河之黄家村。

③ 《帝国主义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关税务司报告·龙州关署税务司客格纳报告》，235～236页。民国二十二年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对外贸易》说："龙州关于十九年（1893年）开关贸易"疑误。

④ 《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对外贸易》。

⑤ 马士（Morse H. B）：《中华帝国关系史》。

⑥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3～50页。

价百两，征税五两"①。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又比1843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六十五。② 这种税率，远低于世界各国。例如："法国西贡进口重税，有值百抽四十者。""即英美各国进口税，亦有值百抽十，未闻有值百抽五者。"③ 即令如此，也仍为帝国主义列强所不满。

法国通过中法战争，对广西关税权的破坏最为严重。1884年5月的中法《简明条约》，其第三条规定：双方应派使臣议定中越边界详细税则，"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④。1885年的中法《越南条约》第六款规定：三个月内双方订立越南北圻至中国广西、广东、云南各省陆路通商章程，所运货物进出广西、云南边界，纳税应照现行税则较减。⑤ 第二年4月25日签订的《越南边界商务章程》，其第六款对边界通商做了具体的规定：凡各项洋货进入广西、云南两处边关，照中国通商税则减五分之一收纳正税。第七款规定：法商到广西、云南等中国内地购买土货，先征收内地子口税，再照中国通商税则减三分之一征收出口正税。第八款规定：洋货到此边关完成进口税后不卖，准于36个月内转往彼边关；如原货未动，可以免税。第十五款规定：米谷等粮食，不准贩运出中国边关。如系进关，准其免税。⑥ 可见法国在桂、滇边界贸易取得的减税，远胜于中国其他口岸。

可是，在1887年6月订立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又对前约作了更多减免的修改。其第三条规定：1886年的中法《越南通商章程》第六、第七两款所订税则，改为：凡由北圻入广西、云南通商处所的洋货，照中国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出口至北圻土货，按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这就比前约规定洋货进口减收正税五分之一，土货出口减征正税三分之一，

---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99页。

② 参看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59页，表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55页。

⑤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68页。

⑥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77～480页。

又有大幅度的削减！而第四条规定：中国土货过北圻到越南出口运往它国，照法越税则纳出口税。① 以此与第三条的规定相比，双方所享受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鸦片和免厘问题。据前约第五条规定：中国允准土药（鸦片）由陆路边界出口入北圻，应交正税银二十两一担（即一百斤）。法人或法国保护人只能在龙州、蒙自、蛮耗三处购买此土药。中国商人所应缴纳内地厘金，亦不过二十两一担之数。中国商人由内地运土药者，将此土药交与所买之人时，即与收厘凭单。而所买土药之人完纳出口税时，将凭单到关呈验缴销。② 这些规定，使法国在广西、云南等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贩运鸦片等方面，都得到了减税、免厘和转口贸易等特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关的管理完全掌握在洋税务司手中，且以中法战争前后一段时间而论，北海海关税务司为英国人惠达（F. W. White）。龙州海关税务司为美国人客格纳（C. Clarke）和法国人富日阿（Fougenst），富日阿还曾一度充任北海海关税务司，并以税务司兼管邮政。梧州海关税务司为德国人斯泰老（E. A. W. Von Strauch），兼管邮政事宜；挪威人魏尔士（G. K. Wilse）则为头等邮政副司事。③

被迫大量的对外减税免厘，海关管理权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这就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主权，破坏了经济落后的广西、云南等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掠夺航权、路权和矿权

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夺得了在中国沿海五口通商贸易的权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又通过《天津条约》，取得在长江内河贸易的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4～516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5页。

③ 参看《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五章；丁进军，王澈《清末在华邮政洋员名录》，见中国第一档案馆《历史档案》，1991（4）。

权利。据此，也就取得了在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从而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航运业。

至于广西航运权的丧失，则在中法战争以后。1887年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其第六条规定：所有法国及北圻船只，从谅山至高平，复从高平至谅山，经过龙州至高平并高平至谅山之河道（一名松吉河，一名高平河），此项船只，每次路过，即每吨纳钞银五分。惟船内所载货物，一概免税。[①] 从此，法国取得了从越南高平与谅山通过中国龙州的内河航运权。

而英国在梧州开埠的第二年，也立即夺取了西江的航运权。[②] 当时，已有名为“龙山”与“龙江”的两艘外轮，不定期行驶于广州至梧州航线；另有名为“镇安”与“镇威”的两艘外轮，不定期航运于梧州至香港之间。[③] 1899年1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的天和洋行首先向梧州保甲局承租天后宫水位，“年租银六十两，租期六十年，立有界石为记”[④]。1902年以后，又有英商渣甸洋行与人和洋行相继在梧州购买水位码头，设水筏经营西江航运业。[⑤] 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利用新式的轮船运输，排挤广西内河落后的木船簰筏的水运事业。为在广西内河沿岸圩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帝国主义攫取在广西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权利，则是同时进行的。

早在1885年6月中法签订《越南条款》时，其第七款就规定：“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6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五〇，《交通二》载：光绪二十四年，广西西江“许外轮行驶”。44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梧州史话》（连载）90《旧梧州航运概况》见1982年1月3日的《梧州日报》。

④ 李衡宙、李家诜：《苍梧县志》三，《经政》六，《洋商、教会租地附》，1959年抄本。

⑤ 《梧州史话》（连载）90，《旧梧州航运概况》，见1982年1月3日《梧州日报》。但把天和洋行租设水位亦记在1902年。

尽力襄助。”①

伴随铁路修造权的掠夺，是矿产开采权的攫取。1895年6月20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其第五条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而越南已有或日后添建铁路，可以接至中国界内。② 当时虽在广西修路并非“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其开矿事宜，仍遵中国本土矿政章程办理”。但到了1896年6月5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时，却首先由法国的费务林公司承办了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所需土地及经费，由中国依限交付。筑路所需之一应材料、实物、机器、车辆器具等件，一概免纳各种关税及差费。龙州至越南沿路使用之电讯亦可不纳电费。铁路全长60公里，至多三年完成，以期与越南之法国铁路相接。路成后之客货运价，由费务林公司拟实，与越南之法国铁路运价相同。③ 法国的这些举动，首开了列强在广西掠夺铁路修造和矿山开采的先例。从而激起了英国与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铁路和矿产权的激烈争夺。

1897年6月18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按照对方要求，应允“俟同登至龙州铁路修竣”，可由费务林公司接造龙州至南宁、百色。同时议定：中国如在广西、广东、云南三省开矿，应“延用法国矿师、矿商商办”。④ 1898年，法国公使毕盛（Pichon）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如同登至龙州合同”一样，同意从北海至西江由法国公司修筑铁路一条，其路由北海至广西南宁，或修至别处。对于这些要求，清政府也都答应了。⑤ 在1899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的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第七款中，法国又取得了从广州湾的赤坎至安铺的铁路和电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468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23页。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52～653页。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722页。
⑤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484～485页。

线建造权。①

法国对我国南方路权的掠夺，引起了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指出：法国此举的目的，是把广州湾的铁路与越南的铁路“一气相联”，以巩固其在两广边海各地的势力范围。② 1904年9月11日和13日（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二、初四日）出版的《警钟报》，有人分别以《论法国在中国之举动》与《论中国南方之可危》为题，指出法国争夺中国西南及南方三大铁路之敷设权，即自越南海防至河内、老开以达中国之云南，是为西线；自河内经谅山至中国龙州以达南宁、百色，是为中线；由广东北海直达广西之南宁，是为东线。又拟延长中线东至梧州，与邻江水运相辅，以推广西江沿岸之商业，以与英国势力抗衡。此乃法人近岁之惟一政策云。③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④。在近代的广西，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只是掠夺铁路建筑权，而没有建成他们所想望的铁路。但是，指明这种掠夺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

干涉地方行政和金融

伴随开口通商和领事馆而来的，是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事务的领事裁判权的侵夺。1886年4月25日（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其第十六款规定：边关通商处所，华人与法人、越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930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八。
③ 据《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期，《社论》。
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见《列宁选集》，第二卷，7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人诉讼案件，归中法官员会审，法国及法国保护之人在通商处所犯法，照1858年所订中法《天津条约》第三十八、三十九条规定，概由法国官员办理，中国官员不必过问。侨居越南的华人命案、赋税、词讼等，亦由法国官员办理。① 这些规定，实际是法国人以及由它保护的其他人等在中国犯法，可以不受中国官府和法律的约束，而中国旅居越南的侨民须受法国法律的约束。

片面最惠国待遇则见于前引的1887年6月中法签订的《续议商务专条》中，其第七条规定："日后若中国因中国南境、西南境之事，与最优待之友国立定通商、交涉之和约、条款、章程等类，所有无论何等益处及所有通商利益施于该友国，此等约一施行，则法国毋庸再议，无不一体照办；② 一年以后，中法两国即有"越南邻省不割让"与他国的照会，随即将广州湾租借与法国。③ 法国直把两广和云南、贵州等地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与此相关的是：1896年5月7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国还借口共同防范"匪徒"，胁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其第一条第十节规定中越边防设立对讯处十所，大部分在桂越边界。法国可以据此在对汛处驻兵，④ 进一步控制越南和干涉中国事务。

在中国设立银行，操纵地方金融，对广西的冲击也很大。

外国银元流人广西，早在18世纪即已经出现。但为数不多，且与商品、鸦片输人以及原料出口关系不大，与中国的制钱、纹银也保持正常的比值。19世纪初期，外国银元流人广西者渐增，但在广西的流通领域作用不大，未能对广西地方金融起到控制作用。

---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6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16页。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743~745页。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44~647页。十所对汛处是：一、芒街与东兴，二、北市与里接，三、横模与洽洞，四、越南峙马与中国峙马，五、同登与南关，六、越南平而与中国平而，七、那烂与布局，八、驼龙与水口关，九、越南里板与中国里板，十、溯江与平孟。以后又时有更迭。对讯处督办驻龙州水口。

中法战争前夕，法国为了加紧侵略越南和我国西南地区，于1879年6月6日（光绪五年四月十七日），公开致书我国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法国新议铸造大圆银钱，为安南之用，并拟用之于附近各国。法国“甚望贵国收受此钱，通行天下，并望贵国海关衙门准其使用。此等方便之处，以前既准美国之多拉（多拉即美国通行之花钱）通行，现在法国新铸之钱，贵国亦可收用”云云。同年8月11日（六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向清廷奏称：美国花钱每圆重合广东市平七钱二分，银色约九成有余，流行中国沿海各省，垂数十年；其非沿海省份如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处，近因茶叶贸易，花钱亦渐通行。今法国所铸银钱，“成色重轻与美国花钱大略相仿，则事同一律，久之商民必有与美国花钱搀杂互用之一日，目下自不必设词拒之，只当俯顺商情，可与花钱一律看待，而不能格外要求利益也。至所谓海关收用一节，与中国各项课税征收之定例不合，亦与美国花钱只有中国商民通行之例不合，似难照准”。[①]在曾纪泽的只准商贸通行，不许海关收用的建议下，法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合法化了。

中法战争以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行，其目标在越南和中国，主要业务是存款和发行钞票，并进行商业和企业贷款，据此吸收巨额资金和利润，为他们向中国和越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服务。

1887年的龙州开埠，法国银元大量涌入广西市场。龙州、南宁以及左、右江各地，成了“法光”流通最多的地区。梧州、郁林等地，则因接近香港，也大量流行包括港洋、港币在内的英国货币。[②] 而法银因其含银成色较高，故在桂西一带流行甚快，各地城乡不仅作为商业交易的主要媒介，而且可用以交租纳税。于是，法国侵略者利用法洋的优势，肆意抬价压价，操纵市场贸易，进行种种盘剥。“到了光绪二十多年，一元法洋，有时要值银一元七、八角”。不少地方，法洋取代了原有的货币，“凡是大宗交易，甚至通婚受聘，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39～40页

② 郑家度：《广西百年货币史》，14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都以法洋计值”。对广西金融是个极大的打击和损害。①

此外，法国还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广西取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教权，大大助长了其文化思想方面的侵略。这在前面的洋教侵略专章中已有论述，此处不赘述。

总之，法、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下叶对广西的侵略，是帝国主义列强阴谋瓜分中国的重要表现之一。从这时开始，广西社会遭到直接的和严重的破坏，迅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二、广西自然经济的分解

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

19世纪下叶，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对广西的直接侵入，使广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受到强烈的冲击，使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表现了顽强抗拒作用的自然经济，在沿江地区明显地受到破坏，加速了解体的进程。

19世纪下叶，虽然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但是，这时外国对广西的侵略，依旧是以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为主。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有关开埠、减税、免厘、内河航行和操纵海关等特权，加紧向广西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侵略。且看19世纪下叶先后被迫对外开放的北海、龙州和梧州三口的外贸情况，即可明白。

北海：北海当时虽然不属于广西，但相距甚近，而且有南流江水路可通郁林及桂东南各地，从钦州经上思或邕宁，走陆路可至桂西广大地区，在经

①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316～318页。

济生活中与广西有密切的联系。北海通商，初无关税，只设一卡，入口除抽收棉花、洋药（鸦片），出口除抽砂纸、八角之税外，其余货物均免抽收。1869年（同治八年），因税卡放枪击毙商民，被土人将卡拆毁，并殴毙税卡委员沈懋林。事平后，设常关，每年收税5至7两左右。1876年（光绪二年），北海设厘金厂，只向华商抽厘，洋商进出口货皆免。[①] 同年9月13日（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其第三端“通商事务”第一款规定：“中国开放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该地设领事驻扎，洋货进口免收厘金。”[②] 第二年4月1日（光绪三年二月十八日），北海正式开埠通商，同时创办洋关。[③] 从此，外国利用北海港加紧对广东西部与桂西南广大地区的侵略。据统计：

1877年，洋货从北海关的进口值为7900海关两，土货出口值为3814海关两。

1893年，洋货从北海关的进口值为3386494海关两，土货出口值为876631海关两。[④]

在短短的16年中，北海关的洋货进口值增加了430倍，土货出口也增加了近230倍。据北海关税务司惠达对1882～1891年十年度的贸易报告，北海“开埠之初，贸易非常消沉。经过了三年，才略见活跃”。1880年，洋货（鸦片、棉布和杂货）进口增加，“轮船已有一〇五次进口（共87436吨）和同样的出口”。但下一年度的船舶进出口又“各减少了一八九七吨”，而“税收仅减少关平银三二四五两”。到了1885年3月7日（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法国因越南战争封锁北海港，进出口贸易完全停止。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北

① 梁鸿勋：《北海杂录·官廨》，香港日华印务公司，1905。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349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北海关税务司惠达的报告》；又参《北海杂录·官廨》。

④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海的贸易“从强制停止活动期间得到了新生的力量，而更形活跃了”。[①] 说明北海开埠贸易对广西社会的影响，主要也在中法战争以后。

龙州：在对外开放以前，只是广西边关的一个小镇，镇上“包括大片的空地，却并无一间可观的房子”。全镇人口最多时不到2万人。每月有9天的定期圩市，以粮食、牲畜、菜蔬、肉类为交易主要商品。北海开放以后，开始有洋货运到贵台，翻越十万大山至上思，改由明江水道至龙州。法国所以要求开放龙州，目的在“改变商路（每年约有三百万银元的贸易），而使它转向龙州”。但是，由于水陆路运输都极困难，而越南进入龙州的铁路迟迟未能建成，所以龙州开放初期，其贸易额极为有限。据估计：1891年以前的几年，“龙州的洋货与广货贸易估计每年约值银元二七五〇〇〇元（这是龙州两家最大商号的估计，也是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洋货主要是印度棉纱（十六、二十、三十二支纱），各式标布，白市布，少量的花布，日本及瑞士火柴，低级的美国煤油和贱值的玻璃器皿，分成小批，经小贩和船户分销到北圻和龙州附近的村落中去”。[②] 从此以后，龙州关洋货进口与土货进口的增长就十分迅猛，据统计：

1893年，龙州关洋货出口值为10863海关两，土货出口值为1708海关两。

到了1894年，洋货进口值为108361海关两，土货出口值为44772海关两。[③] 仅一年之间，龙州关的洋货进口值增长了近10倍，而土货出口的增长超过了26倍。

当时，进口广西的洋货，以洋纱、洋布为大宗。这从1897年梧州开埠以后的进口情况可以得到说明。

梧州：因为它有西江与广州、香港紧密相连，而上游的浔江、郁江、桂江、黔江以及左右江水系又如网状般贯通广西大部分地区，水流四通八达；

---

① 《帝国主义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税务司报告》，233～235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关税务司报告、龙州关税务司客格纳报告》。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1635页。

加以轮船运输的使用，使梧州很快跃居于北海、龙州之前，成为广西的主要进出口商埠。一个外国传教士描写梧州开埠初期，外国商人争先恐后前来从事商贸活动的情况说："外国商号（在梧州）开设支店，向内地通商，在河中停平底船，船上部分作码头用，部分为货仓、旅舍，或用作办公室。船民人口甚众。"[①] 据《光绪二十三年梧州口华洋贸易情形略论》记载：梧州"自开关至年底，出口货物共关平银四十七万两，而入口货值关平银一四四万两，入口货值比出口货值多至三倍"。其中外国棉纱从梧州进口，开埠以后也有大幅度增加。具体情况是：

1897年，"外洋棉纱入口，实为大宗，计入口共二万七千一百四十担，共值白银六十二万四千二百余两。土纱亦为畅销。只因洋纱织布仅觉滑净，不及土纱厚而且暖，故织工两样兼而用之"。

1898年，印度洋纱从梧州"进口六万二千担"。第二年，即1899年，洋纱进口猛增，"计有八万九千担，约值关平银一百五十七万两有奇。云、贵两省所用洋纱，向由本省转运；若非道路梗阻，运输不灵，则进口之数，尤不止此"。[②]

当然，如果把它和全国同时期的洋纱进口量及其所值相比较，则仍为数甚少。[③] 但是，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到：梧州开埠仅三年，洋纱进口即翻了两番多，而且大部分是在广西倾销。洋纱、洋布进口初期，"因为洋纱便宜，乡村的人多买来自织土布。而土布比洋布耐用，农民很喜欢穿它"，[④] 所以，洋纱进口以后，多被织工与土纱"两样兼而用之"。因为洋纱逐步取代土纱，必

---

① 陈法言：《开路先锋在广西》。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216～2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③ 例如：1897年，全国洋纱进口为1570652担，值34272961海关两，分别为广西同年进口的57倍和55倍。1899年，全国洋纱进口为2744829担，值54607213海关两，分别为广西同年进口的31倍和34倍左右。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6，216～217页提供的数字计算。

④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三部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影响》，309页。

然对“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瓦解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土货出口和原料掠夺

至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广西土货的掠夺，使谷米、牲畜、油料、竹木、玉桂、八角、茴香、药材、豆类等农副产品的大量出口，并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需要，也是19世纪下叶，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的重要变化。

广西谷米出口，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时有商人将西米东运，“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图市利”之说。① 清代前期，“广西所产谷米，除本地食用尚有余；东省即有收，亦不敷岁食，向来资商贩运”东省。② 有人估计，清代前期，西米东运年约二三百万石。③ 乾隆末年，“粤东民食”，仍“赖西省米谷源源接济”。虽受蒌差土棍的重重干扰，但浔州各地“开铺贸易，贩运谷米接济东粤以营生”者仍大有人在。④ 到了近代，“西米东运”始终不衰。广西粮食商品化的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地方年有余粮，而是人民在自然经济日益瓦解时被迫以杂粮为主食，或者忍饥挨饿，而以所获之谷米投入市场，换取必需的其他生活物资而已。

谷米虽然主要运销广东，而花生、豆类以及其他土特产品则由北海、广州大量运销海外。且看1890年至1899年北海港出口的情况。

---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田土门·常平》。

②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广西巡抚鄂宝奏，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一。

③ 罗一星：《略论清代前期的西米东流》，见《学术论坛》，1987（3）。

④ 乾隆五十七年《奉宪加禁抽买铺贩谷米并短价派累遏籴肆扰碑记》；乾隆五十八年《奉督宪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十、《碑记及其它》。

1890～1899年北海出口土货统计表①

年份	水青靛	牛皮	花生油类	糖	八角油	八角	出口总值
1890	60000		10500				831003
1891	70100	7000	10000	52400	350	5900	809916
1892	77400	10600		58900	1250	12900	1099366
1893	33000	16000	8000	70000	1050	9300	876631
1894	48000	15300	5500	51100	1770	6300	144454
1895	54800	20300	53000	52000	490	3465	1009991
1896	60828	29200	38290	45300	2000	6600	1516803
1897	82000	31200	36560	28000	1600	4700	1512750
1898	69000	20800	7200	84000	1570	2000	1786950
1899	91770	10112		82670	675	580	1662790
合计	646898	160512	169050	524370	10755	51745	11250654

龙州开埠后数年，土货出口量及其价值以数十倍的速度增长，已于上述。而梧州开埠的第二年，即1898年，土货出口值接近关平银115万两，1899年增至193万两，出口土货以茴香、八角、桐油、桂油、牛皮、猪鬃、鸭毛和食糖为大宗。经广州、香港运销各地。② 其他地方土特产品出口的也不在少数。如：

① 本表据1890年至1899年《华洋贸易关册·北海口》资料编制，参看顾裕瑞、李志俭等《北海港史》，109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出口各类土货计量单位为担，土货出口总值计算单位为海关两。

② 《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通商各关贸易论略·梧州口》。

百色盛产之八角，素为广东商人贩运出口，经加工而成八角油，“分市泰西诸国，其值颇昂”①。

同治年间发展起来的昭平竹纸，光绪以后，以其质地优良，成为特产，运销云南、贵州及广东廉州、钦州等地外，且多有运至越南或销往世界各地的。②

桂平县出产的桂油，因能治风寒痛疡；而“西人以造香水及军家物品，故数十年来，为出口大宗”③。

容县盛产肉桂，以桂皮、桂枝、桂叶蒸馏而成桂油。后从平南传入“以蒸薄荷油法制为桂油”，色泽好看，香味纯正，质高而值大，故“乡人争效之，业此者数十家”，以所产桂油鬻于市场，贩运外洋，“颇获厚利”。④

这些传统的土特产品，物美而价廉，其销售往往为商人所操纵，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需要。且以桂平县所产的优质紫荆山玉桂为例，据地方志书记载：“1834年（道光十四年），紫荆玉桂每担售价为7美元。1863年（同治二年），每担价为15美元。数年后，猛增至250美元。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猛增，商人蜂拥而至，争相购买，桂树被滥伐剥取，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紫荆桂竟被砍伐殆尽。⑤说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对我国生产兴衰的影响，已经波及一些山乡了！

广西土货出口，以谷米、粟豆、油料、牲畜、木材及其他经济作物为大宗，且多为原料，故生产者所得甚微，厚利尽为商贩所得。以茶叶论，容县产“珠茶”，春末，山人摘其芽鬻于市，东商复拣而研之，焙炒成珠，转运出洋，业此者数家，颇获厚利。故云：“出口货物，虽有增加，然均为多财善贾

---

① 华本松：《百色厅志》卷三，《舆地·物产》。

② 李树枘等：《昭平县志》卷六《物产》。

③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食货中·民业》。

④ 封祝唐等：《容县志》卷六，《舆地志·物产下》。

⑤ 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桂平县志》第十编，《名优特产·玉桂》。

者垄断焉。"[①]

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不但沿江城镇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即经济比较落后的桂西地区，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市场。光绪年间的镇安府奉议州有市场14个，天保县有市场27个，[②] 进出这些圩市的商品，虽然仍以土货为主，但也多少出现了洋纱、洋布和洋油等舶来品，而且经营者多为外地商人。如光绪年间的太平土州，12家较大的商号中，外地商人经营者占四分之三，本地人经营者只占四分之一。[③] 由此而观，商贸的发展，也没有给广西社会带来应有的效益。而外国资本主义对广西的掠夺，造成广西社会经济的瓦解，则是十分明显的。

"自给自足"经济的逐步瓦解

洋纱、洋布进口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取代土纱和土布，造成了广西城乡经济中的自纺自织，耕织结合的生产，走向纺与织的分离，继之是耕与织的分离。这种变化，从沿江城镇逐步扩及乡村。同时，由于洋布不如土布的厚实耐用，兼以交通运输的不便，更因为人民生活的贫困，购买力低下，所以，这种变化，又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在北海开放初期，"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④]。龙州、宁明、靖西各地，也有类似的情况。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因为进口的洋布既好看，又宽幅，而且价格比土布便宜。据说，当时"土布一角多钱一尺，只有一尺二寸宽；三丈布才做得一套衣服。而洋扣布每匹六元多。可做四套衣服，便宜一半"。因此，"最先是城镇的人买洋布穿，后来连农村的人见种

① 封祝唐：《容县志》卷四，《舆地·风俗》。

② 羊复礼：《镇安府志》卷一一，《舆地志·村圩》。

③ 刘锡蕃：《岭表纪蛮》，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1354页。

棉织布不合算，也买洋布做衣服”。于是，“土布越来越少了”。[1] 洋布取代土布，又使广大农村的自耕自织生产结构，走向耕与织的分离，“牛郎织女”联姻的自然经济，首先在这些地区被瓦解了。这种情形，在通商口岸附近与沿江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

地处浔江之滨的贵县：自古以来，即以织布著称。其所产之郁林布、纻布、吉贝布、葛布，“俱见载籍”。直至“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彻。……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而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但因“墨守成法，织以矮机，纺用木车，工艺转逊。光绪年间，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光绪季年，衣料寝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绩之工业，遂渐消灭”。到了20世纪30年代，“欲于乡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2]

浔州府城所在的桂平：19世纪末年之前，“工业所出，但备日用。凡田间所需，多以农隙自行修造。外如石工、缝工、木工、泥工、铁工，非习之不熟者，亦皆以力穑之家兼营其业。妇女则中馈馌耕，采樵汲水，陆居者更力作田亩，每日黄昏，则纫麻出棉（以车绞棉条或纱名出棉），夜分乃息。农事既毕，机声轧轧，与小儿啼笑之声相杂。大家闺阁，勤于针黹，物不外求”。19世纪末年，“轮船既通，外货充斥，古风邈而难追……市有巧侈之品，路有游荡之夫”。光绪初年，“县属覃放圩有弹棉铺七间，染布铺三间”。自洋纱、洋布输入以后，“弹棉之声，消沉不作，碾布之石，横卧当阶”。[3] 即乡圩之棉纺织业，亦被洋纱、洋布迅速排斥而歇业。

桂南的陆川县：居民“向习勤耐苦，农家之妇女，当耕耘收获时，日则

---

①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三部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影响》，309～312页。

② 梁崇鼎：《贵县志》卷二，《社会生活状况》；卷一一《实业·织造》。

③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九，《纪地·圩市》；卷二七，《纪政·食货中·工业》。

作田工，夜则纺绩……自少至老，绩纺不稍息。清季洋布洋纱盛兴，且无人不着洋布，无家不购洋纱，棉麻稀种，贫家尚能绩麻者，问以纺棉，不知何谓，富家多不织而衣。利权外溢，数亦巨矣"①。

与陆川相邻的郁林州：州属之福绵村，向以植棉纺纱著称。然"自洋纱入口后，土纱无人购买，本村棉花亦以需要无人，种棉者改为它业，'福棉'之名，不副其实"②。

桂中的宾阳县：清光绪以前，冬棉夏麻，原料皆有土货，自给自足，所织之布，结实耐用。"自海禁开后，洋纱洋布，源源输入，充斥市面。织布者多用洋纱，家庭纺纱工业逐渐归淘汰。"③

柳州南边的来宾县："自洋纱输入，种棉者渐稀。"④

桂西北的凌云县："光绪以后，洋纱入口每捆卖价约毫银二元有奇，群喜其价廉工省，多为购用。习而久之，遂废土纱而用洋纱。"⑤

桂西南的同正县：光绪年间，民间"所用衣服，唯自种土棉以为之。……棉业颇旺，县内各处皆种，不但敷内地之用，且又有出售外境者。近洋纱、洋布流入……棉花每斤六毫，纱布每斤一元一、二毫。……土货用人工纺纱一斤，至捷者需有四日之工，每日至少工价二毫。……比之机器工价，相异天渊，且不如洋纱、洋布出于机器较为精细。是以人们多用洋货，而种植土棉亦不如昔日之盛矣"⑥。

黔江上游，柳州之北的融县："昔日盛产油糖，以之易外地棉布。但自洋纱、洋布输入，土布消灭，外江布输入亦少，布店歇业，油糖亦受影响。"⑦

上引的史料说明，19世纪下叶洋纱、洋布输入广西以后，对各地的棉麻

① 吕濬堃：《陆川县志》第四卷，《舆地类三·风俗》。
② 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③ 朱昌奎：《宾阳县志》第二编，《社会·起居饮食》。
④ 翟富文：《来宾县志》下编，《食货二·农工商业》。
⑤ 王由贤、王彭年等：《凌云县志》卷六，《社会·社会问题》。
⑥ 曾瓶山、杨北岑等：《同正县志》卷六，《物产·植物》。
⑦ 龙泰任：《融县志》第三编，《政治·实业》。

种植和手工纺织业是个极大的冲击，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从沿江到内地逐步被瓦解，使广大城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他洋货的进口，也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广西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例如煤油：梧州开埠之年，"煤油入口甚旺，以七个月申算，一年之内可有二百万加仑，皆由内地无税，又因花生歉收，油少而贵，故点灯现多用煤油代替，恐将来常用煤油则不用花生油。因煤油比花生油更为光亮，其价亦不甚低昂"故也。[①] 煤油民间习称洋油、火油或水火油。它取代土油（花生油、茶油、桐油）也有一个从城镇逐步扩及到乡村的过程。桂西南的江州、左州、罗白县和崇善县，[②] 和宁明州、思陵州、思州、明江厅[③] 以及凭祥等地，在中法战争后不久即有煤油进口。民间喜其"价钱比生油便宜，又光亮"好用，逐步改变以生油、茶油或桐油点灯照明的习惯，于是煤油进口越来越多。[④]

总而言之，自从北海、龙州、梧州开埠以后，轮船既通，洋纱、洋布、洋油以及其他洋货大量进口。于是，在广西沿江的许多城乡，昔日"尚无洋油时多榨工，无洋布时多染工，无洋纱时多弹棉工，无洋式凳椅、屏槅时多木工，无洋衣时多缝工"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渐被破坏，是以"外货愈辏，土货愈寡"，大批手工业者也因之破产失业。而往昔所谓"物不外求"的生活，真是"邈而难追"了。[⑤]

---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170页，

② 俱在今崇左县。

③ 均属今宁明县。

④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三部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影响》。

⑤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七，《纪政·食货中·工业》。

三、某些新式实业的兴办

植桑养蚕业的发展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广西土货掠夺的增长，使广西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日益发展，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突出表现在种桑养蚕方面。

在广西，较早发展蚕桑业的是贺县和容县。1871年（同治十年），贺县知县张联桂把他老家江苏的植桑养蚕获利的经验，向城厢内外的绅民进行宣传。秀才严文德首先响应，出资往广东购回桑苗500株，并觅熟习蚕事者经理其事，同时“传授男妇络丝各法”。仅一年，所植桑树，“枝无丑条，叶大如掌，其色光润”；所养新蚕，“丝肥而润，虽不能比江浙之净丝，亦与广东所产无异”。试验既获成功，张联桂遂于第二年9月正式发布《劝兴蚕桑片》，号召有力之家，有志之士，起而效之，以期“男耕女织，家无坐食之人；为疾用舒，各尽生财之道，不数年而富可甲各郡”。①

1873年（同治十二年），容县知县陈师爵曾设桑蚕局，派专人到广东选购桑种，学习植桑养蚕技术。1886年起，每年可得蚕丝银万余两。1887年冬，又派人赴广东选购桑苗，全县种桑者近百余家，多则植桑万余株，少则千余株。②

1889年（光绪十五年），马丕瑶以广西布政使授任巡抚。当时正值中法战争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计无着。他在当政的两年半时间，大力提倡

① 张联桂：《问心斋学治杂录》卷下，光绪十一年刻本。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432页。

植桑养蚕，发展实业。认为这是处理战乱“善后的第一要事”。他在一篇题为《蚕桑实济序》中写道：

> 饥寒迫而盗贼起，衣食足而礼义兴，教养通筹，为民父母，职当如是。况粤西通南海，达重洋，蚕事畅行，利倍他省。凡我同寅，尽一份心，民受一份惠。为闾阎开利乐之大源，即为朝廷培边荒之原气，而循吏之子孙亦将食报于无穷也。①

为了在全省发展植桑养蚕事业，他要求各府、州、县的地方官认真办理，并对办理卓有成效的官绅请求清王朝给予六、七、八品顶带的奖励。② 为了使所得蚕丝在对外贸易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他还请求清廷给予减免新产蚕丝的厘金税。③ 为了让百姓了解植桑养蚕的知识，理解植桑养蚕的的好处，知道政府的有关政策，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一篇题为《广西劝民种桑歌》：

> 养蚕先养桑，无桑空自忙。山脚水旁，下湿平冈，城市村庄，近岸沿墙，凡有空地，植桑皆良。岭南和暖，一年六、七造，较北省尤强。男三棵，女四棵，急（及）早种桑秧；水旱无伤，常收胜稻粱。问道机坊，茧愈出愈好，丝愈染愈光。又道税场，厘则一文不取，丝则四处通商。非止老人可衣帛，贸易利无疆。缫出一把丝，换得两月粮；织成十匹绸，起得三间堂。勤耕勤读兼勤织，这才是善良人家丰乐乡。劝我民、快种桑，莫将本业等寻常。富丽从来说苏杭，多靠养蚕金满囊。粤西贫瘠何难富，家家丝茧，户户筐箱，只要桑株百万行。④

---

① 《马中丞遗集·文集》。

② 《马中丞遗集·奏稿》第三卷，《请奖蚕桑出力绅民顶戴片》。

③ 《马中丞遗集·奏稿》第二卷，《请免广西新丝厘税片》。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谕：“广西新出细匹，着准免税厘。办理有效之官绅，准其择优酌保数员，毋许冒滥。”见《清德宗实录》卷二九二。

④ 《马中丞遗集·杂著》。

与此同时，马丕瑶还积极搜集有关植桑养蚕的书籍如《养蚕实际》、《蚕桑宝要》等，重加刊印，分发省内各府、州、县。同时开办各种蚕业学堂，对群众晓以蚕桑之利与植桑养蚕之法。在他的大力提倡和认真推动下，广西的植桑养蚕、缫丝织绸业得到迅速发展，行销各省以至远销外洋，获利亦多。且举数地情况以作说明：

桂林、梧州两府，1890年即相继集资，购置器具，开设机坊，缫丝织绸，收获颇丰。据年底统计："桂、梧两局，约各得丝两万余斤。"①

柳州、庆远两府，前者以"种桑最多"著称，后者以"教民得法"见长。而两地"所出绸线，质厚色光，最便民用；货精价廉，不胫而走"。与桂林、梧州"所织花绉、纺绸、官纱，自蒙恩免税厘，成本减轻，商贩见利争趋，转运达于楚、粤、滇、黔各境"。②

容县、藤县两地，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办桑蚕业。容县桑农"始种于旷土，继植于田间，遍野桑条，其叶沃若，获利颇厚"③。两地绅民，也都集资开设机坊。据报：1890年底，"容、藤两县，共得丝五万余斤"④。

平南县于1890年开办蚕业学校。种桑则以"沿河一带为多，用以饲蚕；蚕茧缫丝，为农民最有利益之副产品"。1891年，平南"植桑最盛，甲于全省"。⑤

崇善县的桑蚕事业亦颇可观。1890年，"县中集股筹办，以三千钱为一股。当时集有千余股，分赴梧州采用桑秧，在城内各处荒地开垦耕种；又在考棚设立蚕桑局，雇募工匠，教民学习，实力开办，务期收效也"⑥。

镇安府自1890年开办植桑养蚕，两年之间，府内"各属共种（桑树）二

①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二，《请免新绸税厘并择奖员绅折》。
②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三，《酌保蚕桑出力员绅折》。
③ 封祝唐等：《容县志》卷五，《舆地志·物产上》。
④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二，《请免新绸税厘并择奖员绅折》。
⑤ 郑湘畴：《平南县鉴》第一编，《物产·蚕业》。
⑥ 林剑平等：《崇善县志》第三编，《政治·实业行政》。

百五十七万余株，芳山官局植十八万余株，府县官舍皆种植，称丝献茧不下东粤，每年可得六造。……从此遍地皆桑，丝茧广出”①。

1892年，宾阳知州王方田发桑秧1万株，由民间领种。第二年，官绅集股，设立宾州机房，收买民间蚕茧缫丝织绸。②

由于官府的大力提倡，当时广西植桑养蚕，缫丝织绸而取得较好成效者，遍及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庆远、平乐、思恩、镇安等府以及郁林州属共30余县。据马丕瑶1891年（光绪十七年）奏称：各处“领种桑秧约二万七千六百余万（株），复广购葚子给种，以补桑秧之不足。民间桑事大起，商贩蚕种，给价倍昂，体察情形，已有渐推渐广之势”③。通省各府、州、县“合共出丝二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余斤。……绸绉纱绫共得二千六百九十余匹”④。以致湖南、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商贩云集，仅“东省来梧设栈收买者，不下八九家”⑤。据税务司报告，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西蚕丝仅从北海销往外洋者即达“五千四百余斤，它处行销尚不在此数，年来当更倍增”⑥。中法战争后广西桑蚕业的盛行，推动了农副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这时桑蚕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一般而言，桂东南地区比桂西地区发展较早，进步较快，收效也较大；而滨河平原，又胜于边远山区。有些地方，条件虽然较好，但因为经营不力，技术力量薄弱，其效果也差。如贵县，1890年（光绪十六年），贵县知县龚乃诚设蚕桑局于县城，并在罗泊湾、大圩、木梓等地种植桑树。又有“桐岭龚香山以良田十数亩种桑，建蚕室六，蚕簇蚕架之属咸备，聘教师二，教授养蚕缫丝，成绩颇著”。于是，全县出现了官办和私营并起经营植桑养蚕的局面。但好景不常。

① 羊复礼：《镇安府志》卷一二，《舆地志五·物产》。
② 朱昌奎：《宾阳县志》第三编，《政治·实业行政》。
③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三，《酌保蚕桑出力员绅折》。
④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三，《择保桑蚕著有成效出力官绅折》。
⑤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二，《请免新绸税厘并择奖员绅折》。
⑥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三，《酌保蚕桑出力员绅折》。

因为“饲蚕未善”，“未及数年，官办和私营悉行停顿，后遂无问津者”。[①]

龙州也有类似情形。光绪中期，“虽然马中丞（丕瑶）至山筑园种桑，设局缫蚕，伍厅主保棠创设农政局，力行开垦，以及各宪开设实业学堂，蚕业养成所，女子学校附设养蚕科，提倡不遗余力。然旋兴旋废，毫无成效”[②]。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广西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桑蚕业的发展，丝绸产品的销售，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厘税的加征，[③] 因此，想要获得正常的发展和持久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一部广西近代的桑蚕业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新法采矿业的议论和尝试

19世纪后期，广西的采矿业也日益受到官绅们的重视，急谋设法开采的议论甚多，有的地方，绅民集资办矿日见踊跃。例如：

1880年（光绪六年），由贵州补用道叶正邦创办的富川、贺县煤矿，招商集股，官督商办。资本不详。机器开采能力很低。开掘煤窑三座，月产原煤3000吨左右。初采时，据说“煤质火力不减洋煤，足供轮船机器之用”。故在香港、上海名噪一时，《申报》、《捷报》、《益闻录》等均有报道。但不久即发现煤质低劣，矿藏不旺，矿井积水太多，土法无法开采，且运输困难。“所产之煤，仅敷工本，以致商情不甚踊跃。”遂于1886年因亏损停办。[④]

1885年，兵部代递主事谢光琦条陈：以“广西贵县平天寨银苗最著，矿徒聚众私挖，易酿事端，尤恐凶徒煽惑贻患。拟为官商合办之法，以缉恶徒

---

①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实业·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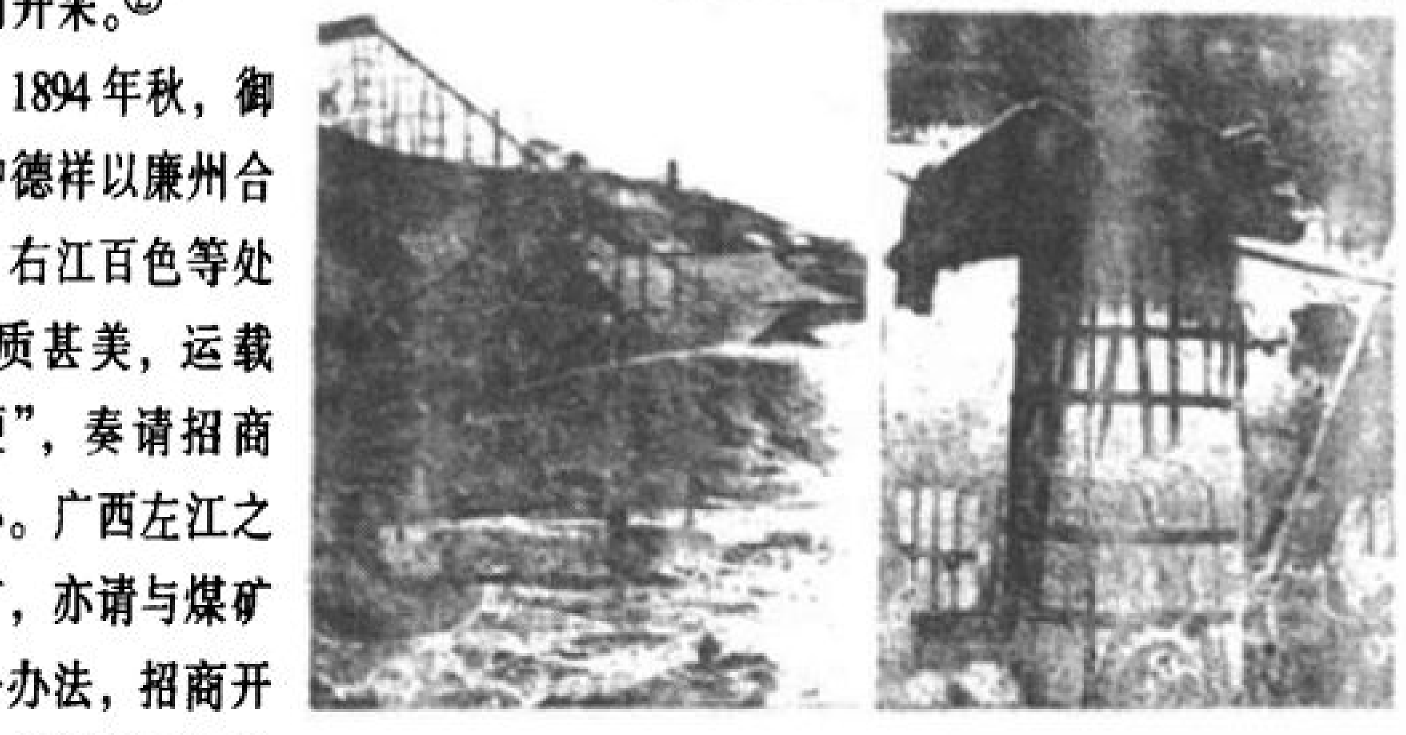
②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二，《舆地下·实业》。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戊戌广西巡抚黄槐森奏：“粤西出产土丝，请照旧行则例，酌抽厘税，以利饷源。其发卖新茧，仍照前奏案免税。”从之。

④ 《刘忠诚（坤一）公遗集·奏疏》卷一六，46页；《李忠节（秉衡）公奏议》卷三，28～29页；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一辑下册，1095～1097页。

而充饷项。此外，如临桂、义宁、平乐各府、州、县金、银、铜、铁等矿，请一并开采”。清廷命张之洞、李秉衡等奏明办理。[1]贵县平天山银矿的开办，资本不详，实际属商办性质。经过四年的筹备，至1889年始成立公司开采。[2]





近代广西矿业的采炼。上图为开沟引水冲洗矿砂；左下图为以发动机提水冲洗矿砂；右下图为提炼矿砂的炼炉

1894年秋，御史钟德祥以廉州合浦、右江百色等处“煤质甚美，运载尤便”，奏请招商开办。广西左江之铁矿，亦请与煤矿同一办法，招商开采，“并请将煤铁免厘轻税”，以与入口洋铁竞争。同年10月25日，清廷颁旨认为煤铁之用，所需最广，亟须讲求开采。命巡抚张联桂派员考察，踏勘确实，然后“妥立章程，设法开办，以兴矿务而开利源”[3]。

1896年，巡抚史念祖奏报广西开矿，“招来绅商，拟定缴课章程，即可开办”[4]。同年，广东的谭日章、陈庆昌集资40万元，组织华兴公司，开采贵县平天山银矿。以留美习矿之严迪光为矿师，采用新式设备与方法开采，日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四，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谕。
② 《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中册，31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〇，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三九三，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谕。

产矿砂5吨左右，其中多杂石质。经营未久，即告亏折。1897年，由南洋巨商张振勋（弼臣）集资60余万元接办。他聘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博士容觐（容闳之子）为矿师，并与巡抚黄槐森会同矿师深入实地勘测，发现三岔山蕴藏优质乌梅银矿，欣喜若狂。于是，一面购进抽水、鼓风、运矿、冶炼等机械；一面修筑道路，建造厂房，安装冶炼设备，召雇矿工2000余人入山采掘。平天山银矿之名于是大噪。开采虽有所获，但因机构庞大，冗员太多，开支漫无限制；加以管理不善，盗取偷售矿产与设备的现象十分严重。而进口机械不适合山区使用，故多弃置山野路旁，形同废物。不久，李立廷率众起义于陆川，浔州地区局势混乱，矿区亦被波及。经营两年即被迫停办。①

1897年，史念祖以广西各属煤矿颇多，拟于百色之下兰、渌江一带，上思厅之迁隆地方，派员勘矿，一律试办；并谕商民一律多开洞口，以期保守利源。清廷得奏，下部知之。②

与此同时，广西的丰富矿藏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目。先是，美国地质学家毕克莫尔曾至广西，进行路线地质考察，绘制地质草图，并有文字著述。1897年，法国政府借派员调查中越铁路之机，以地质学家勒库黎同行，曾由贵州顺融江而下，至融安、柳州、宾阳、南宁、龙州、宁明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也写有调查报告，绘制了地质图。③ 美国和法国地质学家对广西地质、矿产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广西矿产的掠夺之心。当然也就引起了国人的警觉，增强了自办矿产的要求。

---

① 区鸿泽：《平天山银矿与张弼臣》，见《贵县文史资料》第五辑。张弼臣（1840～1916），广东大埔人，青年时离乡赴东南亚，后转爪哇、马来亚等地，成为拥有资金百万的华侨企业家。又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002页；《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册，140页。都说：该矿自1896年接办后，“历八年余而无所成就，将近损失四十万两”。并志此以供参考。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〇五，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谕。

③ 翟佑华主编:《广西通志·地质矿产志》第六编,《地质勘查》,第二章《区域地质调查》,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广西官绅的采矿倡议和绅民们的采矿实践，虽然实效尚不明显，但与19世纪前期的情况相比已多有变化。首先是许多开矿倡议出于地方官绅，并把兴矿务与开拓利源相联系，与前期之把开矿同“聚盗藏奸”相提并论，并多主禁止开矿有所不同。第二是省外商人或海外华侨以巨额资本，采用某些新式技术设备，开发广西矿产，已有多起；与前期之主要由于官办或者官商合办，亦不一样。第三是经历所谓“求强”与“求富”的洋务运动，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清廷对于采矿的奏请多表支持，而且还多次把那些办理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不力的地方督抚加以申斥。[①] 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为20世纪初年广西的收回利权、兴办实业奠立了一定的基础。

新式航运业的开办

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式航运的开办和有线电报的使用，对广西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海开埠之初，香港等外埠富商前往经营者极少。“至1879年（光绪五年）底，轮船‘海南号’开始到北海试做生意成功后”，其他的船只很快也就接着来了。[②] 中法战争结束以后，英、法、德、日、俄和丹麦等国纷纷以北海作为进入远东从事经贸活动的中转站，先后开辟了北海至香港、海口、广州、汕头、上海和新加坡、越南海防以及台湾基隆等八条定期或不定期的轮船航线。从1890年至1899年的十年中，抵达北海的外轮达2000余艘（次），船舶吨位达116万吨。其中1890年一年，外轮进出北海港245艘（次），船舶吨位12.2万吨。所有船只“挂中国旗者绝无，惟挂德国、丹麦旗者居多，其

---

① 如1898年8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清廷下令责备办理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不力之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同年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复降旨申斥谭钟麟阻挠商人开矿、筑路等事。分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四二五。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关税务司报告·北海关税司惠达报告》，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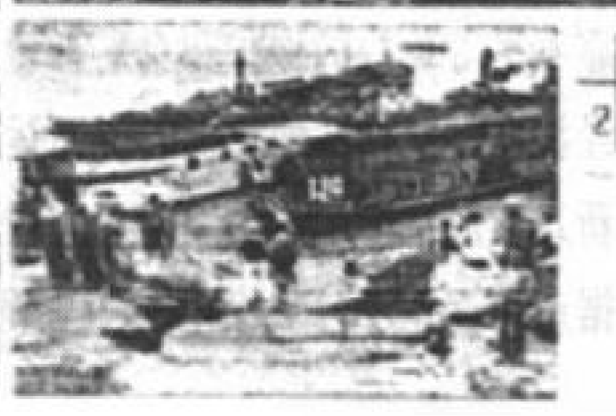
船只220艘，合计10万吨”。直至1895年，北海轮船的进出口运输，仍然为德国和丹麦所垄断。1896年以后，法国轮船进出北海迅速增加，其轮船吨位所占进出北海外船的比例，从1895年的3%猛增至1896年的29%，1899年又增至63%，超过德国而居首位。①

龙州由于地方经济的落后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轮船运输并不因对外开放而发展起来。由南宁至左江的航运，直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仍“属华式小船，并无大船来往”。从龙州取道左江、郁江、西江出海的航运，在龙州境内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拖渡和船簰。1891年，龙州成立邕龙车渡公司，所用车渡也主要是广东造的木船。②

梧州乃广西“水上门户”。法国修建越南谅山铁路，德国为分其利，亦加紧争夺西江航行权。清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于1888年提出利用招商局轮船由西江行驶梧州，以其“费轻利旺”，亦“可分河内、谅山铁路之利”。







近代广西的航运业。图1：梧州河面之船筏。图2：行驶在柳江的小火轮。图3：平乐码头一角。

并以此商于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定章试办”。③ 同年10月19日（九月十五

① 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五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关册·北海口》。

② 《光绪二十七年华洋贸易论略·龙州口》。

③ 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总督致李鸿章电》，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六。

日)，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同意法国在“谅山开路，乃分它国之利，非夺中国之利”；德国要求在“梧州行轮，乃欲漏广东之厘，非方便中国之商”的观点。但他又认为：尽裁西江厘税，粤人难以应允；而西江行驶轮船，“渡夫失业太多，必然生事。是以万难允从”。[①] 因此，招商局轮船行驶西江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1897年梧州开放以后，如前述，第二年即被迫允许外轮行驶西江。[②] 前面提到的外轮“龙山”、“龙江”号开始不定期航行于梧州与广州之间，“镇安”、“镇威”两轮航行于梧州至香港一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1898年，来往梧州的轮船吨位逐渐增大，外地航商纷纷投资造船，所“造驳船来往梧州贸易。该驳船则用大力之拖船拖带新造之船，俱浅于食水，虽遇水浅时亦可航行”。所以多用于从梧州至桂林、柳州、贵县、南宁、百色和龙州等西江航路。[③] 1899年，香港的英国怡和洋行派人从梧州乘船至南宁、百色等地进行航道考察，得出了用小轮船从梧州行驶至百色，只需六七天即可到达，比民船行驶需六七十日远为经济的结论，引起了外商投资广西内河航运的欲望。从此，郁江沿岸的藤县、桂平、贵县、平南等地，又有西江轮船公司制造的尾车轮船往来行驶。而香港怡和轮船公司则赶制新船分别定名为“梧州”、“三水”，定期行驶于梧州至香港之间。[④] 外国轮船行驶广西内河，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享受低税、免厘的优厚待遇，再加上它的运输迅速、经济而且安全，使原来的木船运输备受排斥。正如北海关税务司惠达所说：新式洋船“像楔子的尖端，一插进来就把民船贸易从它的最后的和最坚强的据点驱逐掉了”！[⑤] 帝国主义者通过在航运上的优势，进一步加速并且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七。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五五，《交通二》第十六分册，《志》，44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光绪二十四年通商各关贸易略论·梧州口》；又参梁崇鼎：《贵县志》卷六，《交通·航路》。

④ 《光绪二十五年通商各关贸易略论·梧州口》；又参马依、舒瑞萍《广西航运史》第五章第五节，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⑤ 《帝国主义与中法战争》第五章，《各关税各司报告》，233页。

扩大了对广西的侵略，因此也加速和深化了广西社会经济的瓦解。

列强操纵下的新式邮电业

广西之有电报通讯，始于中法战争期间。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创设起来的。它打破了几千年来依靠烽燧、驿站传递信息、报告或命令的落后状态。成了军队通讯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法战争以前，云南或越南北圻与北京之间，“奏折往返需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音讯”①。1881年（光绪七年）底，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正式启用。以后两三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城市之间，以及广州与龙州之间，亦建立了电报联系。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总督张树声为了加强抗法前线的通讯联络，奏请架设从广州经梧州、南宁直达龙州的电线，并与电报总局商定：广州至梧州段由电报总局招商架设，梧州经南宁至龙州一段则由官方筹款建造。在战争形势的催促下，1884年7月，广州经梧州至龙州的有线电报安设完成。第二年8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安设该路电线始末的奏折中说：该线经过7个月的分段施工，官商协力经办，委托丹麦大北公司购置所需物料，共用银102500余两，工程完竣，军报可通。②

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命令张之洞、岑毓英、潘鼎新等安设由广西龙州至云南马白关的电线，要他们“立即商办”，“勿得延误”。③

1885年8月10日（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一日），清政府根据岑毓英的报告，以云南文报由蒙自至广西南宁，驿递迟滞；而边防、商务均关紧要。乃从岑毓英所请，由南宁建设电线，直通云南。④ 第二天，又据张之洞奏，以“琼州孤悬海外，钦、廉二州海陆地面均连越南，防务重要，应设电线，请动海

①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一），第11页。

②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一二《奏议》。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〇；《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六。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一，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谕。

防经费”。亦允照行。①

1888年2月20日（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岑毓英奏请将云南电线与广西南宁接通，并拟自腾越厅至省城昆明添设一线，以通云南边报。清政府皆颁诏允准。② 第二天，又据张之洞奏：“添设广西梧州至桂林省城电线六百四十五里，广东钦州至东兴电线三百二十里……广西南宁展至滇境剥隘电线八百余里。”③ 12月1日（十月二十八日），中法两国在烟台签订《滇越边界连接电线章程》十二款，规定“中国、法国在中国与（越南）北圻边界相接电线”以及收发传递办法，各种电报收费与账目支付结算诸问题。其第二款订明，中法电线在三处相接：

1. 法国在北圻之同登地方电局与广西省之镇南关电局互相联接；

2. 法国在北圻之芒街、即蒙开地方电局与中国广东省之电局互相联接；

3. 法国在北圻之保胜、即老开地方电局与中国云南省之蒙自电局互相接线。

以上三处，待中国政府批准后，镇南关与同登两局即迅速接线；其余两处，“订明在条款批准后十八个月之内接线”。④

12月17日(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即向清政府奏报,请将“滇、粤边界中国电线与越南北圻法线相接,藉收越南、暹罗、印度等处商报之利。有时断线、阻信,乃可操纵由我”。同时“照录章程呈览”。清廷颁旨:“如所请行。”⑤

经过十年左右的议拟、筹划和安设，广西的龙州、南宁、梧州、百色、桂林和柳州等重要城市，都有了有线电报的通讯设备，与云南、广东等省及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一，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谕。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二五〇。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二五一。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41～544页，又参《李肃毅伯（鸿章）奏议》卷一一。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二六一。但两广总督张之洞以此等决定事前未与地方相商,且接线有利法人而不利我,边民难免反对。曾于1889年2月22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奏表示反对,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九。

北京加强了信息联系，而且还可由镇南关经越南同登电局，把信息通达世界的许多地方。据《海防档·电线》1289号载，仅从1896年7月至1897年6月的一年间，从龙州交河内法国电报局将内地发往外洋的电报共539次，而由河内交龙州电报局把外洋发至内地的电报共515次。无论国内或国际，信息的沟通，都比以前频繁和快速了。它在广西的电讯史上无疑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进步。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新式通讯手段的引进和使用，从设备到技术，都需要依赖外国，所谓"操纵由我"并不可能。而此类电报主要服务于军政信息传递，又多为洋商、洋员所用，它首先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掠夺与扩张，而我能获"商报之利"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国近代新式邮政，创办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从1867年（同治六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由帝国主义操纵的海关管理。中法战争前后，北海、龙州和梧州的邮政业务，即由英、法、美、德和挪威等国的税务司把持。1896年3月20日，我国总理衙门奏准开办邮政官局，先在北京及沿海通商口岸试办。国际邮政公会代表、瑞士人雷那立（Lachenal）、林循（L. Ringier）声明：中国开设邮政以后，所有"在会各邦境内所发信函寄往北京、牛庄、天津……北海、龙州、蒙自等处者，当由各该处之邮政官员代收、代转、代送，不另加费"。1897年，北海、龙州原有之寄信局改设邮局正式邮递。同年6月，梧州决定对外开放通商，邮局亦随之设立。1898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函总理衙门，除议及如何设法推广邮政及裁撤旧有驿站，将其业务改由邮局代办外，并详细议及北京与通商各省一切公私文函寄递办法。其于广西来往文函寄递办法是：

> 京中各衙门所有文函等类欲寄交广西巡抚，如交台基厂总局，约于十二日内可递至梧州邮政交由关道转寄桂林府投递。广西巡抚文函等类欲寄至京中各衙门，亦可交梧州邮局于十二日内送至京中投递。

到了1902年7月3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据赫德将邮政总办、法

国人帛黎（T. Piry）绘具的“邮政推广总图帖说”交给清政府外务部时可知，从梧州口岸经平乐至桂林；从梧州经南宁、百色与云南之广南、开化至蒙自口岸；又从梧州经浔州、柳州、庆远至贵州之贵阳三大邮路已经通行。而由桂林经湖南永州、衡州至湘潭的邮路，正在计划兴办之中。由此可知，梧州邮局创办以后，即成为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各省邮政往来的枢纽。而其业务，则侧重于转递官府文书，且把持在外国的“关道”手中。因此，一开始就受到两广总督谭钟麟、御史徐道焜等人的反对，认为邮政寄费太重，且“琐碎烦苛，众怨沸腾，无裨饷需，徒伤政体”，“请将邮局一体裁撤”。[①] 这种意见，自然难以得到同意。

19世纪后期，轮船运输和邮电通讯在广西出现，因为主权不能操之于我，因此，这些新兴事业，主要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夺取广西市场，加强了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直接侵略与控制，因而也就加速了广西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四、近代化之路举步维艰

封建经济的顽强存在

19世纪后期广西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化，沿江城乡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尚不能给封建的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震动。在广大少数民族区域、边远地区和山区，旧的生产方式依旧纹丝不动地保存着，地主占有土地，通过地租和高利贷进行剥削的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即使在沿江地

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二编，《中国海关与邮政》第二章，《邮政官局的开办和发展》（1896～1911），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区，“百种两千租”的重利租佃剥削并无任何松动。① 在沿江圩镇，略具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或手工工场，也很难看到。使用原动力进行生产的，尚无一家。② 众多农户，依旧过着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生活。这种状况，是经过具体深入的社会调查证实了的。

例证之一：凌云县一区镇洪上、下屯，清光绪年间，全屯数十户人家，有纺织土机50多架。③

例证之二：“养利州五区新乡弄稔屯，共有六十三户人家，光绪初年，每家都有一至三架土纺纱机和织布机，原料自种自给。直到解放前，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家自给自足，很少依赖市场。”④

例证之三：“男耕女织，农业和纺织手工业紧密联系着，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极大的特点，直至解放以后还在南丹境内的壮族居民中保存着。在高级农业社成立以前，当地壮族农民的衣着，基本上是仰给于自给的家庭纺织。从种棉、纺纱、织布、缝制直到靛染的整个生产过程，几乎都由妇女操作，家家户户都是如此。”⑤

例证之四：万承土州昌明区新民乡西纳屯的几户中农，素以自耕自织生活，有的直至1939年，始买回少许洋纱供纺织之用，有的直至解放后的1955年，才开始“买回一些洋布缝制衣服”⑥。

类似的情况不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与边远山区，而且在汉族地区与平原大

① 参看赵燮和：《岑溪县养济院新增义田记》，光绪二十一年仲春立。

② 参看《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四编第十五章《附表》。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凌云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经济》。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④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改土归流后的养利州》五，《手工业和商业》。

⑤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册，《南丹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壹，《经济·手工业》，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⑥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万承土司》一，《经济部分》。

垌，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状况，也已通过社会调查得到了证实。[①] 它说明：广西社会虽然在中法战后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化，但它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其影响的程度在各个地区也不一样。而广西的工商业素来落后，中法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明显发展，走向近代化的路子真是举步维艰。可以认为，中法战后广西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又重于半封建化。

走向近代化障碍重重

广西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落后，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难以出现，原因甚多。主要的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之外，封建势力的阻碍和破坏也不可低估。例如：

1885年，有武员莫云成者，“制备机器，带同外洋矿师”，到贵县拟开采龙头、六班、天平、三岔诸山银矿。而该县廪生黄锡麟、蔡庆云，生员林伯棠、梁庆祥与举人徐进忠等30多人，立即具呈贵县团局，以龙头诸山“素为盗薮”，矿徒相聚为盗，“前事已有明征”为词，请求严禁开挖，以防祸害，而保地方云云。第二年，经巡抚李秉衡批示下县，所有矿山，“永远封禁”。[②] 这是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矿业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

又如：厘金之抑商病民，早已有人指出。本书第六章，也已经论及。这种封建的厘金税制，不但破坏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阻碍了各类商品出口，为洋米、洋货倾销开道，而且，由于厘金征收的“内外有别”（免外而征内），又助长了某些见利忘义者的假洋济私，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且看康有为说的：

若夫土产杂品，农工备极困苦而仅成之。赢利微末，而密卡搜

① 笔者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先后在广西柳城县上雷乡，柳江县长沙乡、六合乡，鹿寨县江口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所有农村及部分乡圩的居民，直至土改时，仍旧过着小农经济的生活。

② 《呈巡抚批示封禁龙头诸山开矿碑》，光绪十三年五月五日，碑存今贵港市公园内。

刮，得不偿失。故以土产寡植，农工束手。……江海之间，洋人树一洋旗，挟三连票，经过关津，皆可免税，何独于吾民而苦之?! 奸民见其如此，乃多伪树洋旗，或衣洋服，坐镇船头，扬翔过境；津吏亦皆瞑目熟视，不敢过问。而奸民得大挟私货，横行其间；而良民独遭苦累。相形之下，心殊不平。教小民为奸犯科，为渊驱鱼，而驱之使从外人也。①

由此而观，厘金之害，直接涉及社风民德，远非仅限于经济领域了！

再说清末典当业之多次勒捐增税。

光绪之前，广西当押每家每年税银五两，与直隶、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相同。1888年，因河工需款，户部奏请“令各省每当商一座缴银一百两，作为预定二十年当税”。1894年底，因海防筹款，户部又“奏令中外典当各商于额税外每座捐银二百两”。时全国开设典当“约共七千数百余座”。1897年，清政府以典当“开设既多，资本亦巨，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故自是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此外，当商“领贴换牌，藩司、道、府、州、县各衙门均有使费，地方官吏年节亦有陋规”。② 典当属高利贷剥削。典当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衰败成正比例发展。19世纪后期，清政府对典当业的种种预缴、勒捐和增税，最终受害者是广大劳动人民，而且也直接间接影响了社会正常商品经济的繁华和发展。

此外，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纵鸦片烟的自种自销，从中攫取大量所谓“土药税”。结果，虽云进口有所减少，而云南、贵州和广西自种鸦片却泛滥成灾。广西成为当时主要的鸦片烟转运与集散之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受害极大。光绪以后，与贵州接壤的怀远县，即有“年迈之人”，“少壮之士”，为鸦片之害者多矣之叹。③ 1885年，广西公开对“土药征税”。五

---

① 《奏请裁撤厘金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256～257页。

②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户部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〇。

③ 姜玉笙：《三江县志》卷一〇，《附编》。

年以后，清政府正式议定章税，令各省督抚对“土药”按亩开征，并明定各省年产鸦片数千担以至十余万担不等。实行“厘税并征，每一担以六十两为度”。① 从此，烟粮争地，祸害无穷。1897年，前广西巡抚李秉衡对此表示异议说：

罂粟一物，非肥沃田亩不能繁茂，愚民贪图重利，将宜谷膏腴之土栽种罂粟，驯至粮价日昂，浸为民患，故从前久悬为厉禁。嗣因利之所在，种植日多。……今若明定数目，某省担以万计，某省担以千计，将使九州之上腴，尽弃嘉禾而植恶卉，必至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乐岁既少盖藏，凶年更坐以待毙。……以害稼贼民之事，为损上益下之谋，我国家爱育黎元，重农贵粟，不宜有此政体也。②

话虽然说得十分痛切，但并不能引起清廷当权者的重视。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奏报“剿办边地游土各匪”情形时，也谈到广西的鸦片问题。他写道：

自抚臣黄槐森创立水陆队伍保商之法，滇省烟贾之往来右江者得以粗安。惟自去岁入冬后，土民勾同游匪，拜台入会，迭劫右江各处杂货商船及陆路货担。……奴才道经南宁，各商董联名禀请派兵剿办游土各匪，否则或议收庄。若烟商歇业，百色、龙州市面萧条，税厘无着，省会边防关系甚大。③

说明百色、龙州等城市的繁荣，厘税的取得，主要是依靠鸦片贸易。清政府对鸦片的放纵政策，不但严重影响了农业，而且也破坏了其他工商行业的发展。这真是一种摧残人命，败坏道德，阻碍社会进步的罪恶政策！

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是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阻力，且举一例为证。

1898年变法维新前夕，巡抚黄槐森计划创办机器局，以5万两白银交试用同知董嗣嵘负责采办机器。而董嗣嵘竟从中侵蚀巨款，为其子报捐盐大使，

①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户部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〇。
②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〇。
③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〇。

分派云南试用。机器局因此被迫停办。案发后，已故董嗣嵘虽被革职并查抄家产备抵。[①] 但它说明以贪官劣吏主办实业，是难以成事的。

当然，落后的传统观念与习惯势力，也影响了广西的工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诸如“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老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安土重迁，“无远涉以求利”的生活习性。加以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居处闭塞，声息难通。而社会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教育不发达，也难以使人有条件、有能力去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由是广西各地素有“民朴拙，不习技巧”；[②] “民性质朴，多务耕种，不喜商贸”[③]；“但知耕植，不谙贾迁”[④]；或只知“务本力农，罔识贸迁”[⑤] 之说。有的州县，虽有较多的商贸活动，亦“不过乡里小产，随处贸易，以谋朝夕”[⑥]；或因资金短缺，“只在本土贸易，不能出百里外”[⑦]。即令地处大江之滨的横州，当时也是“商之牵牛贩贾，近在百里内外而已，未闻有远涉以经营者”[⑧]。因此，直至清末，活跃于广西各地的行商坐贾，主要是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籍之人。商业如此，工业更无论矣。民国《融县志》编纂者龙泰任谈及地方工业之所以不振时发议说：

沃土之民不材。融县虽非沃土，然地广人稀，加以民风俚直，生活单简，进取之思遂形迟钝。又谚云：“融县山头一样高”。守旧心理牢固较甚。于是壶中岁月，乐而忘忧。虽有聪颖，无从用之；虽有导师，莫能助之。以视西洋青年，家置滑车，以资练习，判若

---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六，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谕；卷四三八，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谕，又参《光绪朝华东录》卷一五一。

② 黄德星等：《全州志》卷一，《舆地风俗》。

③ 谢沄等：《义宁县志》卷二，《风俗》。

④ 许之豫：《荔浦县志》卷四，《风俗》。

⑤ 封祝唐等：《容县志》卷四，《舆地·风俗》。

⑥ 路顺德：《融县志》卷三，《风俗》。

⑦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四，《舆地三·风俗》。

⑧ 谢仲龄、朱秀等：《横州志》卷二，《气运志·风俗》。

天渊。此不振之原因也。[①]

如此的民情心态，又何独融县一地？

最后，应该着重指出，中法战争后封建统治者的更趋反动，还表现在内政、外交处处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仅举两事，即可说明。

1901年4月初旬（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中旬），清政府以湖北巡抚于荫霖继黄槐森为广西巡抚。法国横加干涉。令下甫半月，即开缺，另以云南布政使李经羲调任。亦因法国反对，一月后，改由云南巡抚丁振铎接任，又因不满法国之意，一个半月以后，再以法国喜欢的前安徽巡抚王之春为广西巡抚。因为王之春早与法人“有密函往还”，是借助“法人之力”出任的。[②]

同年11月25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清廷以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湖北提督夏毓秀对调，未到任前，由柳庆镇总兵马盛治署理广西提督。[③] 命令甫下，法国即以“苏提督到任以来，招抚游匪，编充营勇，妥为约束，地方赖以安谧”为由，向清政府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收回成命。[④] 1902年3月5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清廷即颁布谕旨，正式答应法国的要求说：

> 现据法使以苏元春离任，游勇、土匪肆行猖獗，致毙该国官兵，并欲治马盛治以重罪，谓非苏元春留任不可。该督抚既不能事先预防，致令匪势蔓延，伤及法兵官，使彼得以藉词要挟，自应仍行责成苏元春统率边营，迅速剿办，以弭外衅，而固边疆。[⑤]

中国地方官员的任命也要听从帝国主义的意旨。这是帝国主义公开、横蛮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证，也是半殖民地化在广西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

① 引文见该志卷一，第三编《政治·实业》。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〇，四八一、四八二；又参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五日《岭东日报》。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八。

④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825号。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九四。

总而言之，中法战争以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势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直接入侵广西，而封建统治者从清王朝到地方官府对帝国主义势力步步妥协、退让，对人民群众加紧剥削和压迫，致使广西迅速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化，因此也激起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迅速升级，人民要求变革现状和反抗压迫的浪潮也随之高涨起来了！

第十章　变法维新在广西的回应

洪秀全创建农民“天国”的革命失败以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自己的事业，提出了“学习西方，实行变革”的思想。中法战争的失败，变革主张从经济要求逐步转向政治要求。甲午中日之战，清政府割地、赔款、求和于扶桑岛国。接着，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和领导下，要求变革的思想迅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良运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成了一切爱国者的呼声。当时，广西的社会经济还很落后，风气闭塞，文化未开，构成变法维新运动的基础十分薄弱，思想准备非常不足。但是，人们的亡国之忧，同样渴望变革、更新以致富强。所以在变法救亡风潮的激荡下，加上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两次来到广西，直接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绅商和官僚，也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在我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中，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一、康有为游桂讲学

康有为游桂的原因

广西维新活动的兴起，得力于康有为游桂讲学。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县人。幼年起即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博通经史，有志于圣贤之学，人称“圣人为”。青年时先后游香港、上海，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怀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一些外国书籍的译本和报刊，用心考究欧美各国所以富强之道。中法战争以后，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多次上书皇帝，建议变成法以图富强。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起，在广州收徒讲学，致力变法理论著述，宣扬今文经学以议论时政，阐发“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指明“考据旧学之无用”，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达到“大同”的理想世界。为培养变法维新力量，建立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奠定基础。[①]



两次来桂讲学的变法维新首领康有为

1895年初（光绪二十年腊月），康有为应龙泽厚之约旅游广西，聚徒讲学于桂林。

龙泽厚，字积之，桂林人。时在四川任知县。1892年春（光绪十八年正

① 参看梁启超：《康有为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

月），从四川回桂省亲，路过广州。当时，康有为已把万木草堂从长兴里迁至卫边街邝氏祠，继续设帐授徒，提倡新学。龙泽厚因久慕康有为之名，特往拜谒并随堂听讲。康有为对他颇为赏识，称赞他“仁质甚厚”①。临别时，泽厚以桂林山奇水秀，景色宜人，特请有为往游。有为性嗜山水，前此五六年间，已“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访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②。于讲求中外事之余，“登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③。且有为叔祖康国器于同治年间曾出任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巡抚。④ 重修设于省城的秀峰、宣城、榕湖（又名经古）三书院，嘉惠士林。同治帝载淳曾赐匾额以示嘉勉。⑤ 有为既欲饱览桂林风光，且思了解先人在桂林政绩，所以欣然接受了龙泽厚的盛情邀请。

当然，促成康有为游桂讲学的，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康有为的家乡有同人团练局。这个地方自治性质的团体，是他的伯祖父康国熹于1854年（咸丰四年）创建的。后来，团局的领导权落到了一个罢官回乡的知府张嵩芬手中。他不但不为乡人办事，而且勾结盗匪，坐地分肥，以致乡中盗窃之案经常发生。乡人敢怒而不敢言。康有为与弟子陈千秋联合三十二乡士绅，揭发张嵩芬的恶行，追回团局印信。张嵩芬则买通言官弹劾康有为，并通过南海县令杨廷槐将局印收回。同时鼓动坏人，“怀刀以待”，阴谋杀害康有为。结果，陈千秋吐血死，康有为深受打击，难以乡居。

---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

② 梁启超：《康有为传》。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④ 康国器，字友之，1869年6月25日（同治八年五月十六日）至1872年9月25日（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任广西布政使。1871年6月2日（同治十年四月十五日），广西巡抚李福泰病死，以康国器护理，至同年8月6日（六月二十日），广东巡抚刘长佑调任广西巡抚即止，为时仅两月余。

⑤ 康有为：《桂学答问序》，光绪二十年。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编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正式发行。他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指责清代古文经学家所侈谈的汉学，实属王莽（立国号曰“新”）的国师刘歆所伪造，与孔子并无关系，只能称做“新朝之学”，不配称做“汉代之学”。《新学伪经考》对古代经学的否定，打击了顽固派在思想上表现的泥古守旧，在学术上提倡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坚持的“恪遵祖训”等保守观点，为鼓励人们议论时政，实行变法制造舆论。因此，也就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1894年8月（光绪二十年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非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虽然得到同情者的代为奔走，多方营救，但仍被勒令“自行焚毁”。从此，攻击之声四起，“粤城谤不可闻”。①

正是由于康有为在老家受到土豪劣绅的排挤、打击，在北京又受到顽固守旧派的诽谤弹劾，鼓吹变法的论著被毁版，莘莘学子被停学，他只好暂时回避，而“为桂林之游”了。

在唱酬中觅取知音

1894年冬（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康有为从广州出发，溯西江、抚河，经梧州、昭平、平乐、阳朔游桂林。一路上饱览两岸风光，挥毫作诗纪游，写景抒情，自得其乐。② 到桂林时，当是腊月初旬了。③ 这次初游，据他自言：“寓桂林凡四十日，往来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绅燕会，若经年矣！”④ 说明他在桂林游兴很浓，交往十分频繁，心情也极为愉快。

但是，康有为志在变法，谋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为此，他到桂林以后，

---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 康有为旅桂诗篇请参《万木草堂诗集》。

③ 考《康南海自编年谱》谓：“甲午十一月游广西，寓桂林凡四十日。乙未正月还粤，二月初一至。”《万木草堂诗集》记咏阳朔诗有“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阳朔”句，疑误。应为十一月二十七日。抵桂林时当在十二月初一左右。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

一面拜会地方官绅，藉以联络感情，争取他们的支持。一面收徒讲学，宣传变法主张，培养维新人才，以扩大变法维新运动的影响。

桂林不但是广西的政治中心，也是广西的文化中心。文风之盛为全省之冠。设在省城的秀峰、宣城、榕湖、桂山（又名孝廉）四大书院，分别由曹驯（字谨堂）、石成峰（字子轩）、龙朝言（字小村）和周璜（字黻卿）四位翰林任山长。康有为当时虽然颇有名气，但只是举人，科名不及他们。所以，当康有为抵达桂林的第二天清晨，分别前往拜访山长们的时候，掌教秀峰书院的曹驯拒不见面。曹驯是龙泽厚的岳丈，竟以如此傲慢的态度对待他请来的客人，使龙泽厚深感不安。于是，登门婉言相劝。曹驯非但不听，还声色俱厉地发了一通议论，指责康有为：名为尊孔，实乃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有为自称长素，难道他的学问比孔子更高明不成？可见他非圣非法，离经叛道，必将为害无穷。龙泽厚苦劝不成，垂涕辞去。康有为吃了曹驯的闭门羹，却心地坦然，一笑置之。① 宣城书院山长石成峰虽然接见了康有为，但态度勉强，话不投机，稍坐即别。从此亦少来往。榕湖书院山长龙朝言乃龙泽厚的父亲，他和康有为虽有往来，但态度冷漠，不愿同他亲近。② 只有桂山书院的周璜，很佩服康有为的学问，不但时有交往，而且经常以诗词唱和，议论国家天下事，交流思想。周璜曾做七律诗赠康有为：

读书愧未半袁豹，多病翻交遇长卿。
鹿豕山中甘小隐，鲸鲵海上看横行。
杞忧空下穷途泪，边衅争寒与国盟。
却敌岂真无上策，炎疆搔首望神京。③

这篇爱国忧时之作，深受康有为的赏识。在另一次唱和中，康有为写了一首

① 参看廖中翼《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概况》，见《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② 参看龚寿昌《康有为桂林讲学记》，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张心澂、沈樾等：《康有为桂林讲学概况》，见《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③ 参看周璐《康有为来桂林讲学的动因》，见《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题为《和临桂周觳卿翰林有感》的五律作答。诗云：

兵甲满天地，苍生竟若何！
蹉跎梦金马，感怆泣铜驼。
避地梁鸿去，忧时杜牧多。
只愁好春色，无处着烟萝。

诗后有长跋曰："甲午腊游八桂，少寓风洞，日与桂中士夫相见，觳卿先生太史，剧谈天下事，忧国如家，允为襟袍相知。"①

康有为和地方士绅交往，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说明当时在桂林，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势力不容忽视，但识时务，忧国难，同情维新者，即在上层官绅中也确有人在。康有为从这些人中找到了"襟袍相知"，受到了鼓舞。

设帐讲学，宣传变法

康有为这次游桂，最重要的活动应是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和主张。

叠彩山风洞右侧的景风阁，后两室是康有为的住处，前厅即讲学的课堂。② 及门弟子除作为东道主的龙泽厚、龙应中（后改名志泽，字伯纯）、况仕任（字晴皋）、龙朝辅（字佐臣）、赵懿年（字兰生）等外，还有汪凤翔、龙焕纶、薛立之、薛佑之、王浚中、王会中、程文瀚、程式毅、赵仁农、黎尚元、汤铭三、汤睿、林



康有为来桂讲学的叠彩山景风阁遗址

① 见《万木草堂诗集》。
② 论者有谓康有为讲学于桂山书院，误。

泽普、林惠如、任祖安、胡治堂等20余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一定官职，而且都有较好的旧学根底，但又都向往新学，慕康有为之名而来执经问难的。还有年仅十余岁的龚寿昌、龙潜等人，也都得到了康有为的允许，以小学生的名分参加听讲。①

据梁启超说：康有为在桂林讲学，其教学宗旨和方法，类如广州万木草堂。② 对学生的训练，德育培养与智育、体育训练并重。讲学内容，则孔学、佛学、宋明学之外，兼及中西政治、史地、格致、词章诸学。校内以先生讲授，学生札记的方法进行，同时重视校外游历和体操锻炼。而讲经又特重春秋、公羊之学，常以春秋大义启发学生议论时政。他一面讲学，一面继续编写变法理论名著《孔子改制考》。他以今文经学的观点，结合自己所了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以及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向学生宣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实乃“托古改制”的祖师爷。用孔子早已主张改革，说明自己提倡变法维新，是合乎孔子之道的。他还借助今文经学派的“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向学生说明：我国古时夏、商、周三代不同制，皆因时兴革，并非沿袭旧制。可见“改制”、“变革”，古已有之。而人类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三个阶段循序发展前进的，而且越向前发展越好。他认为，当时中国，尚处于“据乱世”阶段，所以国家多故，战乱频仍。只有进行变革，才能去“据乱世”而人“升平之世”。康有为这些“托古改制”的说教，实际是向人们说明当时中国实行改革的必要，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有人概括康有为甲午游桂林时的讲学说：

> 有为教弟子，尊孔子之教，发求仁之义，励士子之志，开人民之智，讲救国之法。除读书作业课程外，随时以上列各端，对诸弟子讲演。③

---

① 参看廖中翼《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概况》；龚寿昌：《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② 《康有为传》云：康有为“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

③ 廖中翼：《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于那些长期只知苦读、死读圣贤书的士子们，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道理，颇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离风洞山康有为居处不远，有数年前广西巡抚马丕瑶创办的书局，内有专供士子读书之逊业堂。有为课暇，常登堂与诸士子相过从。但除了桂山、宣城各书院肄业者至堂读书外，其他来堂读书者甚少。康有为“闻而惜之”。他认为，这种读书风气淡薄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昧于读书途径”，“若为疏通证明以诱之，既有书册，又识途径，学者当亦未尝无志于书也”。加以他在桂林逗留的四十天里，慕名而至风洞山向他“问学者踵履相接”，以至“口舌有不给”者。为了满足问学者的要求，他把讲学问答整理成篇，名曰《桂学答问》。[①]

《桂学答问》万余言，“分条论述研读经、史、子、宋学、小学、职官、天文、地理、词章、西洋书等的方法，并列举书目”，还有“分月读书课程表”。[②] 这种从读书目录、内容提要、研读方法，直到学习进度的全面读书指导，对于开通学者的读书门径，增强学习信心，活跃学术风气，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康有为虽然自云甲午“寓桂林凡四十日，往来山水窟中亦四十日”，但他寄情于桂林山水与寄情于国家政治是紧密联系的。从教育角度看，他认为“徒言文学，不足以救国，必兼习武事，方能御外侮”。[③] 他把体操与游历作为学习课程，亦即培养学生习武以御侮的方法之一。所以，他每于课余，甚或雷电交加之际，率领学生登山观览。虽被某些反对者讥笑为狂人怪物也无所顾忌。[④] 因为，根据他的体会，“讲求中外之事，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

① 《桂学答问序》。

② 《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收录有康有为的《桂学答问》和《桂学答问序》，以及顾颉刚在民国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写的《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认为康有为的《桂学答问》“书中所言，有极创辟”的见解。

③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④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概况》，见《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之感”①。他寄寓叠彩山，不忘在风洞右侧摩崖题刻：

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被议，游于桂山，居风洞月余。

他与学生同游东郊龙隐岩，见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翻刻的《元祐党籍碑》，联系到自己的“著书被议”，触景生情，写下了寓意现实的《元祐党籍碑跋》，并摩崖镌刻于该碑的左下角。其跋云：

光绪甲午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侂胄、魏忠贤。其为党人者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以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亦甘从侯览魏忠贤耶？②

康有为甲午游桂林讲学，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却是很大的。既传播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又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深得士子们的好评。他的门人龙应中回忆说：

吾桂当年维知科举之学，于天下大势，国家关系，注意者少。加以清廷守旧，每以祖宗成法，不容妄议，不许变更。于是南海乃有孔子改制之作，春秋、公羊，条条皆改革之义，细看便知。而改革非一时即能办好，于是立据乱、升平、太平之义。……南海举上列诸学以告门弟子，桂人思想大变矣！

又云：

先生之学，精深博大。来桂讲学，影响颇多，人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体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变速且巨。③

这种估量，是切合实际的。广西士子在变法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 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又参林半觉：《康南海桂游石刻研究》，见《漓江文学》1980（1）。

③ 转引自《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说明。

二、广西举人与“公车上书”

1895年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旅游桂林讲学之际，正是国家危难空前严重之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分海陆两路进入我国东北，清军节节败退，领土大片陷敌。1895年2月中旬（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中旬），北洋海军覆没。清政府在日本人的要挟之下，决定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去日本谈判求和。康有为得到消息，仓忙离桂返粤。2月25日（二月初一日）回到广州。十日后，即偕弟子梁启超等赶往北京。

4月25日（四月初一日），李鸿章割地、赔款的电讯传到北京，康有为立即命梁启超鼓动各省士绅上折拒和。集中北京会试的举人首先起来响应。各省举子先是自行联名，上书都察院，呈请代奏。广西在京参与会试的举人，继广东、湖南、福建、四川、江西、贵州之后，也联名上书，反对议和、割地、赔款。从4月22日（三月二十八日）至4月30日（四月初六日），十数省举人同仇敌忾，“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但“书上数日不报”。康有为“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会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新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①] 这就是中国近代

① 参看《康南海自编年谱》；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见《戊戌变法》（四）。

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当会试的举人们酝酿上书的消息传出以后，兵部尚书孙毓汶忌之，遂指使心腹“寅夜遍投各会馆，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时北京街头“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而孙毓汶等“主和之臣”，与太监李莲英内外勾结，请西太后强迫光绪帝载湉在和约盖用御宝，发使赍行，于是，大事去矣![1] 举人救国与奸臣卖国都在抢时间，最后是那些“讨和之使，主和之臣”抢先一步，他们“胜利”了！举人们听说皇上在和约上盖了“御宝”，痛感大势已去，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的主张继续力争，以图万一；有的以为大局已定，无为画蛇添足；有的则悲观失望，消极不干了。因痛恨庸臣误国，以大事不成而请求在上书中除名或取回知单者达数百人。[2]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很快就被反动势力破坏了！

广西举人与上书题名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说参与签名者有十八省举子一千二百余人，而多数记载说是十八省“公车”一千三百余人。[3] 现在我们看到的“公车上书题名”只有十六省六百零三人。[4] 说明确有半数以上签名者因为上书不成而请求除名了。有些省，如山东、河南的举人，曾经有过分省联名上书。[5] 但到联省题名上书时，现存的题名，并没有这两省举人的名字。在各省上书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公车上书记序》。

③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说：“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公车上书记序》论者说：“集众千三百余人。”梁启超在《康有为传》说：“联合公车千余人”，但在《三十自述》（见《戊戌变法》第四册）则说“南海先生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想为“千三百”之误。

④ 见《戊戌变法》（二）。

⑤ 《康南海自编年谱》，《公车上书记序》。

时，梁启超曾经“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①]。而目前在“公车上书题名”中，广东只余九十二人。湖南当时参加会试的所有举人，曾与广东举人八十余人联合上书，而目前在“公车上书题名”中见到的只有四人，连在分省上书时出面联络、组织的积极分子任锡纯、文俊铎、谭超裳的名字，在“公车上书题名”中也不见了。[②] 在现存的“公车上书题名”中，吉林只余一人，江西留下两人，湖北也只有四人。最多的是广西，共九十九名，其次是贵州，共九十五人。这种历史现象，不免令人感到意外。

广西、贵州素称文化落后之区。有人抨击科举考试，说它“不问通否，唯额是取”，并举广西、贵州等省为例云：“广西、云南、贵州，则土风僻陋，且有童试、乡试亦复寥寥，而亦以额强取之，若欲以安慰镇抚之者。”[③] 广西童试、乡试既然为数不多，则入京参加会试者自亦更少。但竟然在目前所见的“公车上书题名”中占最多数，说明当时不参加签名，或已经签名而又请求除名者只占少数。[④] 它反映了广西举人在国难危急的关键时刻，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变法自强，是坚决和迫切的。

让我们就广西举人在“公车上书题名”的情况，做个简单的分析。

在列名的99人中，大部分是19世纪90年代的新举人，共占66人，而80年代中举的28人，70年代中举的仅5人，具体情况如下：

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人；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科）1人；

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科）1人；

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科）1人；

---

① 《公车上书记序》。

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

③ 徐勤：《中国除害议》，见《戊戌变法》（三）。

④ 据《大清缙绅全书》（戊戌冬季荣禄堂梓），“光绪戊戌科进士签分各省即用知县”，广西有临桂王希贤，陆川范晋藩，藤县黎劝松三人。王希贤即不见在上书中签名。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科）4人；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科）7人；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科）7人；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1人；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科）11人；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科）17人；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38人。

由上列情况可知，甲午年中式的新举人占题名人数的三分之一而有余。这些人踊跃参与题名并占多数是很自然的。一般说来，他们年纪较轻，属于新进分子，尚未跻身于“官”的行列，所以受官场旧习的熏染也较少。他们既有一定的老学根底，期望在科举场中有所成就；但又多少接受了一点新知识，经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比较敏感。因此，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也相对地强烈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在“公车上书”的政治大请愿中，广西举人的表现是好的，他们积极和无所畏惧地投身到群众性爱国运动的行列，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王鹏运和李文韶

“公车上书”前后，另两位广西举人王鹏运和李文韶，对促进维新运动的开展，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一作幼霞，号鹜翁，又号半塘老人。临桂人。1870年（同治九年）乡试举人。“公车上书”时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升礼科给事中，以敢言见称。康有为游桂讲学时即知其声誉。入京会试时曾专程往访，两人一见如故。1895年夏，康有为“以京城街道芜秽，请修街道”附片上奏，不能达。因思鹏运“新入台敢言”，托觅人上之，遂奉旨允行。7月30日（六月初九日），因吏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徐用仪事事阻挠变法，恭亲王奕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皆欲去之，迭经言官奏劾。徐用仪犹恋栈不去。康有为草折，请同乡、庶吉士戴鸿慈（字少怀）代上劾之。“戴逡

巡不敢上。”有为将与鹏运商量。8月4日（六月十四日）疏上。6日（十六日），徐用仪即被罢官。①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西太后那拉氏骄奢淫逸，挥霍如故。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在国家财政十分短绌的情况下，仍欲动用公款，修整圆明园，并常在颐和园款待洋人，终日游宴不绝。王鹏运又抗疏劝止，文曰：

> ……和议既成之后，财匮民离，敌骄国辱。……恭读去年四月朱谕，我君臣当坚苦一心，力图自强之策，至哉王言！今日非力持坚苦之操，难策富强之效，圣言及此，真天下之福也！

随即笔锋一转，继续写道：

> ……恐或以温清之晨昏，为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观听之新，杜外人觊觎之渐哉？……又近读邸钞，立山奉命管理圆明园。皇上两次还宫，皆至园少坐，外间讹传，遂疑有修复之举。臣愚以为值此时艰，断不至以有限之金钱，兴无益之土木，且借贷业已不赀，更何以得此巨款？②

于是，请罢修复之议，并作《游仙词》以讽之，一时广为传诵。王鹏运上奏皇上，实际是针对西太后的。西太后恨极，欲杀鹏运。幸翁同龢代为疏通，始得免。当时，康有为已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感动，特地写了《寄赠王幼霞侍御》七律诗一首给他。诗云：

> 修罗龙战几何时，王母重开善见池。
> 金翅含龙四海水，女床栖凤万年枝。
> 焰摩欢乐非非想，博望幽忧故故疑。
> 大醉钧天无一语，王郎拔剑我兴悲。③

这首诗，强烈表现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之际，西太后依然胡作非

---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 引自《半塘定稿》，京华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九月本。

③ 《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三，康有为在诗序中，称王鹏运“清直能文章，填词为光绪朝第一”。

为，独揽一切，纸醉金迷的腐朽行为的不满，而对光绪皇帝的受抑则极为怀念与同情。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王鹏运与康有为政见一致，而且在行动上给他以大力支持。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至为难能可贵的。

李文韶，广西荔浦县人。光绪举人。做过知县，还人选为觉罗官学教习。所以，他自称“教习、知县、举人李文韶”。他因为多在省外活动，与圣学会没有联系，也不列名保国会。在广西籍的维新人士中，属于“孤军”。但是，他对于变法维新的呼喊，却是虎虎有生气的。1898年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正当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他以举人身份，觅人奏请清廷降旨停捐，“以示维新，而肃吏治”。指出：“捐例一日不停，则吏治一日不肃。”朝廷既明令裁汰冗员，而又列入捐纳；既嫌其冗，复听其捐，近于自欺欺人。[①] 同年9月9日（七月二十四日），他又以官学颓废，请人代奏并省官学而改建学堂，“以储人才，而固根本”。他以自己充任觉罗官学教习的经验，指出：官学之设，不论宗室、觉罗、咸安、景山四学，抑或八旗学，皆“日久弊生，官学虽多，几同虚设”。“其斋舍，则已颓破不堪。问学生，则无人也；问功课，则无其程也。住学者一、二门斗，索规费若干而已！”“教习虚有其数，官学虚有其名。”“中国诸事有名无实，大抵尔尔。……人才安得不衰，国势安得不弱?!”为此，他建议并省官学，按大学堂章程整顿办理，建藏书仪器楼，兼学西学，“庶学校愈多，则人才愈盛”，策富强之业不难。[②]

李文韶所请停止捐纳与改革官学，都牵涉到清廷政治除旧布新的大问题，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广西举人对变法维新运动的态度。

总之，广西举人在“公车上书”时期的活动，无疑是一次变法维新的自我教育。虽然，这些活动多在省外，但它与变法维新高潮的到来，尤其是这场运动在广西的开展，关系极大。

---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2～193页。

②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86～287页。

三、圣学会和《广仁报》

康有为再游桂林

甲午战争的结果，中国不但为“小夷慢侮”，而且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①] 在封建统治者投降卖国，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险恶形势下，人民奋起抗争，国内的矛盾也十分紧张。请看康有为描写甲午战后两三年间的国内形势：

> 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依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属广东——引者）已见告矣！……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吏官差，蠹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②]

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看来，为了清除日益紧迫的内外动乱，以保持国家的安定，只有变法。要变法，必须争取皇帝的支持，并在孔夫子改制的旗帜下，组织学会，团结维新力量；发行报刊，宣传变法主张，以求“力强”、“智强”而达到自强。1895年8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康有为等在北京酝酿组织学会，开办报馆。文廷式、袁世凯、陈炽、王鹏运等十多人“相与讲求中外掌故，惟日孳孳”以应之。旋即成立强学会，以“理财”、“练兵”

① 康有为：《强学会叙》，见《戊戌变法》（四）。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见《戊戌变法》（二）。

为主要宗旨。同时发行会刊《中外纪闻》，随"邸报"免费分送京中达官贵人，影响极大。① 未几，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由，提出弹劾。强学会遂遭封闭。② 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说："强学会虽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③ 1896年3月（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御史胡学宸奏请解禁。于是，"各地闻风，兴起者益多"。参照强学会的宗旨，成立学会、学堂、报馆，合群以讲新学。广西的圣学会和《广仁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兴办起来的。

康有为在北京开学会、办报纸的时候，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御史褚成博等顽固分子群起反对。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康有为被迫离开北京，先到上海、南京，继续开展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等工作，亦不得志。旋归广州，复在万木草堂讲学。1897年初（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重游广西。2月11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到桂林，仍寓风洞山景风阁，继续从事讲学、立学会和办报纸等工作，为在广西开展变法维新积极奔走呐喊。

康有为二次来桂，已经中了进士，授工部主事，与前次的举人身份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领导了"公车上书"，在京、沪等地组织了强学会，发行过报纸，倡导变法维新，国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因此也声名远播。广西巡抚马丕瑶因受刚毅的指使，保奏市侩潘赞清为三品卿。康有为通过王鹏运上奏弹劾。潘赞清以重金贿赂刚毅，得到保护，而马丕瑶却因此被迫离开广西。④ 这件事，给人们的印象也至为深刻。如此种种，使康有为重游广西时受到更加热情的欢迎。只有那位秀峰书院的老山长曹驯，对康有为依旧采取反对态度。他对一切与康有为有关的集会拒不参加，举凡宣传变法维新的书

①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张之洞：《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代作）。又参《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邸报"又称"宫门钞"，由政府印发，专载诏令、奏章，类似后来的政府公报。

②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议论纷纭。杨崇伊参劾之衅，遂始于此"。

③ 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见《戊戌变法》（四）。

④ 《康有为自编年谱》。

报拒不阅读，对康有为的拜访拒不接待。他以顽固的“三不主义”对抗任何变革和新鲜事物。①

但是，像曹驯这样的人及其态度，在桂林是孤立的、罕见的。即许在官绅阶层如岑春煊、唐景崧、蔡希邠等人，对康有为的维新活动，都给予热情的支持。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光绪乡试中举。1894年12月28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清廷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岑春煊以太仆寺卿同时受命“驰赴刘坤一军营听候差遣”②。及马关订约，春煊辞职南归，寓居桂林。唐景崧在甲午战争期间，以台湾布政使署台湾巡抚。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台民誓死反对，成立民主国，拥戴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他曾向清廷建议，将台湾标价押与外国，将押台费赎回台湾。③ 后奉诏“内渡”，即辞职回桂，受聘为经古书院山长。但郁郁寡欢，常以管弦诗酒自娱。④ 岑春煊、唐景崧在政治中的失意，比较容易接受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当时广西的当权者如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按察使蔡希邠等对康有为



1897年康有为访桂林龙隐岩《元祐党籍碑》感赋并跋刻题名

媪相熏天锢党人，鞭鸾笞凤已千春。
只今龙隐岩边路，却为遗碑动马尘。

①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②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谕，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二三。

③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唐景崧“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二七。

④ 唐景崧诗致李燕伯同年云：“郁怀都付管弦声”；又云：“一醉雄心只酒知”。转引自周霈：《康有为来桂林讲学的动因》。

都极为推崇，并且从财力、物力上支持康有为的变法宣传与组织活动。[①] 所以，康有为骑马重游龙隐岩，抚摩《元祐党籍碑》时，尽管有“我是清都沦谪客”的吟唱，[②] 但他在桂林，却是受到各方的欢迎与尊重的。

有关变法的几件大事

在官绅、士子们的鼎力支持下，康有为在重游广西，居留桂林的五个月中，办了几件大事。

1．开办圣学会

先是，桂林士子龙泽厚等曾创设广仁善堂于王城西华门外。1892年（光绪十八年），巡抚马丕瑶、提学使赵以炯等立有庚子拜经之会，常聚众千人以讲学，极盛一时。后因有关人员离散，遂渐湮息。康有为拟立学会，先与岑春煊、唐景崧等商议，在广仁善堂基础上进行组织，得到他们的赞同。门弟子龙泽厚、龙应中、况仕任、汪凤翔、龙朝辅等亦表拥护，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开办，并积极分担筹备责任。巡抚史念祖拨善后局万金为经费，游智开亦自捐千金相助，蔡希邠则积极为之宣传推动，并撰写《圣学会序》。从他所了解的中外古今历史，说明成立学会，乃“国势政教盛衰所关，非细故也”[③]。康有为则亲自草拟《圣学会缘起》及《章程》，号召“独尊孔子以广圣教”，“以文会友”，“发明圣道”。创设学会，“扩见闻而开风气”。由是“上以广孔子先圣之教，中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下以开愚氓蚩漏之习”。圣教日昌，则国势日盛。《缘起》之后，附以《会章》，举其要事有五：

（甲）庚子拜经。规定“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

---

① 桂林老人写康有为二次来桂历史，俱云当时巡抚史念祖已被议离职，布政使游智开亦已告老，实误。《光绪朝东华录》载，史念祖缘事革职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癸丑。又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广西圣学会成立时，史念祖、游智开曾分别拨款、捐款以助之。

② 《南海诗集》卷五；《万木草堂诗集》丁酉四月游龙隐岩。

③ 《圣学会序》原载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三十一册，引自《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章以昭尊敬。其每逢庚日，皆为小会，听人士举行，庶以维持圣教，正人心而绝未萌”。实际是通过庚子拜经的活动，宣扬孔子的“义理学术大道”，把赞成变法维新的官绅士子们团结起来。

(乙) 广购书器。1891年 (光绪十七年)，马丕瑶奏开桂垣书局于叠彩山下，翻印经书，购置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定有章程，供士子阅读，是为广西有公共藏书、读书局馆之始。惟其地太偏，士子就读为难，且“官局森严，乡间士庶，每逡巡而不敢进”。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官书局藏书，都是中国经籍，缺乏介绍泰西新学之书，图谱、仪器之类更谈不上了。为此，提出“广购书器”，要求“中国图书陆续购钞”，亦鼓励士家大族，名士硕儒捐献藏本，但必“先搜其经世有用者”。对于西学，举凡“西人政学及各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以备研求”。其义有难明者，则购图谱；其体有难明者，则购仪器。在购置书器同时，“各省书局所印及西学时务有用书，皆可存堂中代售”。总之，旁搜广采中外有关经世致用图籍的同时，对于“天球、地球、视远、显微镜、测量艺学各新器，皆博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从而为变法维新造就人才。

(丙) 刊布报纸。为了陈述办报、读报的重要性，《会章》先举广西乡贤陈宏谋[①] 劝士子阅读“邸报”以知时务；林则徐翻译《澳门月报》[②] 以觇敌情为例。而桂林地处僻远，尚无报馆，为了“开耳目而增识见”，必须学习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的经验，创办报纸，“专以讲明孔道，表彰实学，次及各省新闻，各国政学”。“凡于治术、学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其目的，也是为变法维新传播消息，制造舆论，鼓吹呼喊。

---

① 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清雍正进士。乾隆时历任陕西、湖南、江苏各省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

② 1839年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为了了解外国情况，派人翻译外文书刊，并将英人在广州办的《广州周报》 (Canton Press) 及其他外文报刊，进行择译整理，辑为《四洲志》。魏源将其中重要论述，收入《海国图志》卷八一、八二。

（丁）设大义塾。广西义学始设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陈元龙任巡抚时。[①] 在城坊设义学11所，在东、南、西乡设义学20所，以贫士为师，量给修膳。至光绪年间，仅存爱日、培风、蒙泉、兑泽四塾。广仁善堂创立以后，曾立义塾，但效果不大。圣学会设大义塾，"课以经学为本，讲义理经济，旁及词章与泰西各学，日有课程，月有考校，岁有甄别"。特聘通人掌教；高才特出之士，酌资膏火，世家子弟愿备赀来学者听，以育冠髦之士、兴起人才为目标。

（戊）开三业学。指出中国之所以"四海困穷"，在虚谈经义，不求实学。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故其操农工商业者，能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我欲富强，亦应"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

《会章》说明，上列五项，先在桂林开办，然后次第推行于各府各州县。学会成立以后，凡应办之事，如"创讲堂以传孔教，立学堂以育人才，派游历以查地舆、风俗、矿务，设教养以收乞丐，教工艺"等等，都应努力去做。[②]

综观《圣学会缘起》及《会章》，基本承袭了京、沪强学会的办法与精神。梁启超论学会的意义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而地大人众的中国，只有一个学会是不行的。四万万人之中，"忧天下求富强之士"，随地皆有，必须广立学会，力争做到"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遵此而行，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③] 如此，则变法图强也就有办法了。

---

① 陈元龙，字广陵，号权斋，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五十年八月擢广西巡抚，五十四年疏请于桂林贮谷平粜，修灵渠旧闸，设义学、育婴堂及粥厂赈穷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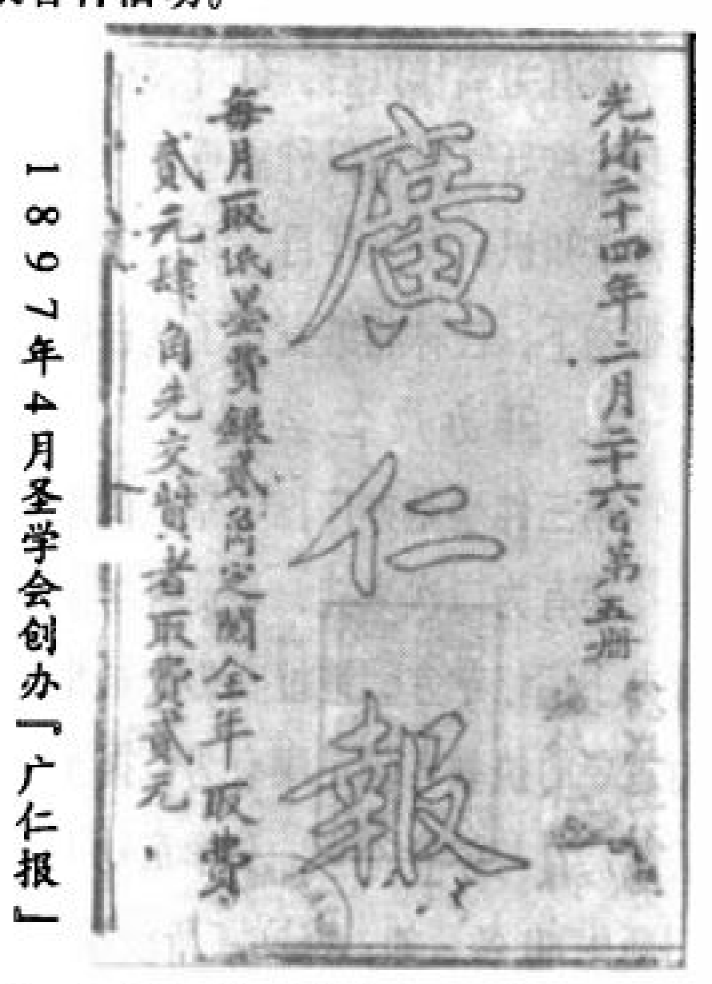
②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会章），见《戊戌变法》（四）。

③ 《论学会》，见《戊戌变法》（四）。

经过一番酝酿筹备，在“尊孔教，救中国”的宗旨维系下，广西圣学会于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在广仁善堂开成立大会。“臬道以下，首府首县，及各候补人员，阖城士绅，皆集会场，崇祀孔子，鼓乐行礼，极一时之盛。”不久，以广仁善堂地方狭隘，不符使用，商得蔡希邠同意，迁至依仁坊之彭公祠为会址，[①] 开展各种活动。

2．创刊《广仁报》

第二件大事是公开出版、发行《广仁报》。



1897年4月圣学会创办「广仁报」

报纸是为变法造舆论的主要工具。圣学会成立一周，即4月15日（三月十四日），《广仁报》创刊发行。报馆也设在彭公祠内。由康有为的门生、广东南海人曹硕，湖南武陵人赵廷飏以及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辅等担任编辑、出版及发行事务，[②] 唐景崧写了《发刊词》。[③] 初为两日刊，旋改周刊，再改旬刊、半月刊，最后改为月刊。[④] 字用木刻，土纸印刷，线装成册。[⑤] 除少量赠阅外，余公开发售，报费月取洋一钱。[⑥] 内容分论著、时事、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栏目。除宣扬圣教外，多议论时政，宣传变法图强，激发

① 参看《康南海自编年谱》；又见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知新报》第十八册关于《圣学开会》的报导，引自《戊戌变法》（四）。

②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

③ 见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知新报》第十八册。

④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知新报》报道有：“两日一次，已于前月中旬出版。”后人回忆，或曰周刊、旬刊，其实因为经费及刻印等原因，有个逐步改变的过程。

⑤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⑥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第三十册。

民族自尊心。如龙朝辅为该报撰文，即以《世变日亟士人宜速求自保论》（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筹桂刍议》（日期同上）；《闻德兵毁即墨孔庙践圣像布告士林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等为题，阐发变法维新，图强御侮的主张。[①] 总之，《广仁报》的创办、发行，对于"通知时务，讲求经济"，启发人心，转变广西的士气民风，多有影响。

康有为离桂以后，《广仁报》仍由龙泽厚、龙朝辅等主持出版，除继续宣传变法维新、爱国保种思想外，还开辟了"格致"、"算术"等专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令人耳目一新。广西之有新式报刊，当自《广仁报》始。在它的带动下，桂林相继发行了《官话报》、梧州发行了《广西新报》等。

3．开办广仁学堂

第三件事是办广仁学堂，讲求新学。

康有为二次来桂，聚徒讲学仍是他的主要活动之一。与圣学会成立同时，开办了广仁学堂，地址在彭公祠里。学堂事务商请桂山书院山长周璜主持，[②] 而主要的执教者仍是康有为。据他自述：学堂"设书藏、讲堂、义学，规模甚敞。日与学者论学，义学童幼尤彬彬有礼焉"[③]。听讲者除旧有弟子外，另招新生40名，如：陈文、靳汝端、靳永祚、谢宗韩、吴小濂、李承麟、龙仲修、龙季光、王乐宾、秦一俊、龚寿昌、汤铭三、林泽普、林负才、李惠生、赵福纪、陈柱、陈太龙、万言、倪育万、何化龙和马君武等。[④] 开讲课程除经学、宋元学案、朱子语录及拜经外，尚有中外历史、地理等内容，参以写

① 参《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但题目文字略有不同。又：《康有为桂林讲学记》说，尚有《教案于西人有利说》诸题。

② 周璘：《康有为来桂讲学的动因》。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④ 参看前引之《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康有为桂林讲学记》，《康有为桂林讲学概况》等篇整理而得。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桂林人。年十七，听康有为讲《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醉心于康氏宣传的"大同"之学，遂更名马同，并以马同之名投稿《广仁报》，由是知清廷之腐败无能，必须变法图存。

札记、日记或游记。曹硕等协助教务。教学以讲授与议论相结合，一般是朔望讲课，庚子拜经，皆由康有为亲自主持。他好习古礼，课余常率门徒习“乡饮酒礼”、“投壶礼”、“揖让周旋，率依古制”，① 课外则以与学者论学为乐。至于札记、日记、游记评考及郊外游历，则由曹硕等负责。而教学注意联系实际。据从学者回忆：康有为曾于雷电交加之夜，率弟子持雨具、风灯，穿风洞山，登望江亭，观赏雨景，讲解声浪、光浪、电浪之原理，并谓：“此种宇宙之自然现象，西人悉心研究，成为声学、光学、电学之原理原则，应用于人间，是以西国日进于文明，我等亦须精心研究。”② 尽管他当时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有限，但能注意联系实际，指导学生观察与认识自然，却是十分有益的。在广西，从单纯学习旧学到兼学新学，桂林的广仁学堂，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第一家。③

老书院开设新课程

在广仁学堂的带动下，当时由唐景崧主持的经古书院，也开始兼设新课《算学》一门。为此，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向万铼、候补道谢方山曾出告示，说明所以如此办理的理由：

> 广西地处西陲，迫近交趾。龙州接越南之铁路，南宁、百色将必展至。梧州又开为通商口岸，转瞬之间，西士云集，苟无通中外、周知时务之士以济世用，譬犹之盲聋喑哑，窒塞而不通，非细故也。但广西素称贫瘠，延师筑室，费实不赀，学堂之设，行将有待。且西学浩如烟海，凡光声、重力、矿汽、化电及一切格致、农工技艺

① 《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②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③ 据《京城保国会题名记》，见光绪三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国闻报》。据记载：梧州亦设广仁学堂，康有为在《两粤广仁学堂圣学会缘起（附会章）》中则说上五条（会章）先在桂林开办。“本善堂于广州、梧州皆有分局”，见《戊戌变法》（四）。

之学，非得其门径，则其道无由。欲得其道，则自算学始。[①]

说明当时有些地方官绅，在时势的推动下，开始认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这是一个进步。而数学是理、工、医、农诸学的基础，考虑当时广西的主客观条件，先从算学开始也是可取的。至其进行，则“仿广东学海堂办法，课以四季，每季由书院监统，禀请抚宪命题考试，问以算数、算理、天文、时务四项”，以定优劣，酌给赏励。[②] 这是在变法维新潮流的推动下，广西的旧书院兼开新学的先声。

为了配合办学校、开三业学的需要，购买新书、仪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先是，史念祖拨给万金，游智开捐廉千元。继之有唐景崧、岑春煊等捐款为时务课加奖，以及各士绅捐赠图书、仪器，都给圣学会和广仁学堂添设了一批有关泰西各国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书器，改变了桂垣书局只藏经籍，不及其他的库藏情况，[③] 揭开了广西教育、图书、博物与文化事业的新页。

应该指出，1897年桂林圣学会的成立，是在京、沪强学会先后被封闭的情况下，在中国南方继之出现的一个维新团体。学会办报纸，开学堂，讲求实学，反映了要求变法维新的潮流在高涨，所以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它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知新报》论圣学会“可为中国第一美举”[④]。梁启超则云：自强学会“被议中辍”之后，桂林圣学会相继兴起，“公理既成，此风日盛，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键也”。[⑤] 他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中，把桂林圣学会与强学会同誉为中国“新学的源泉”，她使“云雾跃

① 梁启超：《桂学振兴》，见《戊戌变法》（四）。

②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知新报》第十五册，《桂学振兴》，见《戊戌变法》（四）。

③ 参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八月十一日《知新报》第十八册、三十册，《圣学开会》，《桂林圣学会续闻》。

④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知新报》第十八册。

⑤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时务报》第三十八册，《会报序》，见《戊戌变法》（四）。

撤，风气大开”。[1] 说明了广西桂林圣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在中国变法维新史上具有的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四、顺应潮流继续前进

广西的变法维新活动是在康有为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康有为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却反映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是他的进步之处。广西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缺乏新兴的阶级力量。因此，维新活动只能在开明官绅和希望变革的士子中进行。活动范围不广，基础薄弱，与广大人民群众无缘。相反，他们还把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视为寇仇，直欲消灭而后快。以变法维新为己任的圣学会，也多少被利用作抵制人民抗争的工具。且看康有为的一段纪载：

>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兴安会匪大作，陷灌阳，各县蠢动。劝史抚于桂林戒严，不顾也。与唐薇卿谋，请其归乡办团，以圣学会行之。唐薇卿慷慨自捐数千金募勇，吾乃夜叩蔡臬门，请其假军械焉。时五月杪也。[2]

把变法维新和人民反抗对立起来，说明维新派与圣学会也自有其局限之处。康有为办完这件事以后，也就“还粤讲学”去了。

但是，从康有为和圣学会在广西的全部活动考察，其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经历这一场活动，为广西培育了一批主张变法或同情变法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从单纯的学习“圣人之道”，转向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舍弃科举，崇尚时务，使封建士子千百年形成的旧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确是一个

---

① 《时务报》第四十七册，《知新报》第四十册。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很大的进步。通过变法维新思潮的洗礼，多数人迈着不同速度的步伐，随着变法维新的潮流前进，把新的思想观念带到各府州县去。康门弟子：马平的王浚中，灵川的黎尚元，榴江的何化龙，桂平的程式穀，北流的陈柱，苍梧的陈太龙，容县的陈祖虞，阳朔的赵元杰等，皆各回原籍，各本所学，承其师说，宣传崇尚实学，提倡变法维新。至于转到省外工作的圣学会成员如汪凤翔、况仕任、龙应中在广东，赵治天、龙泽厚在上海，也都“本其师承，相机传布”。[①] 1898年4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变法维新的重要团体保国会，以“保种、保教”为宗旨，签名者共186人，其中就有广西临桂的龙焕纶、王瑞芝、刘永年、况仕任、龙应中、汪鸾翔，桂平的程式穀、李树滋，博白的宾宗椿，阳朔的邬绳绪等10人。[②] 梁启超筹组不缠足会，临桂的龙泽厚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广仁、麦孟华等同列名为董事。1898年7月19日（六月初一日），康有为奏请十八省各开商务局，荐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龙泽厚为副总办。[③]

在变法维新的推动下，广西的学校教育得到可喜的发展。圣学会刚成立时，史念祖因为“经费无着，骤难开设学堂”，只同意在经古书院附设算学课一门。但一年多以后，继任巡抚黄槐森却表示：国家“需才孔亟，岂可以经费支绌置为缓图”？决心督同司道筹议，“于省会首设学堂一所，为各府州县之倡”。1898年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黄槐森正式奏请开设广西经济学堂，并定出在省内15岁至25岁的贡监生童中考选60名，另选在外附课生百名入堂肄业。严定课程，优选教习，“按奉行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致六事，分门定教”。以从前创立之机器局为校址，并规定各郡邑亦应筹议设立小学堂。又令旧设之秀峰、宣城、经古、桂山四书院进行教学改革，“月课一律改为策论，并照经济六科出题课试，以广造就。膏火一仍旧贯，俾免向隅”。且“议开设学堂必须广储书籍”，决定“先于司库提银一

①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概况》。
② 《京城保国会题名记》。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

千两，遴员前赴广东、上海采办回省。其京师国文馆，上海制造局及各省书局刊行书籍，有关经济时务者"，均咨取发给学生，以供考订。[①] 此外，广西还有"保借官款"，劝办种植、畜牧各业的措施。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督理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奏事时，还请照广西之例推广办理。[②]

当然，戊戌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下去了。许多"新政"也随之夭折。广西自无例外。戊戌政变以后，圣学会解散了，《广仁报》被迫停刊，像曹驯之流的顽固守旧分子重新抬头。通过变法，清廷已明令废八股，改策论。但当他们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时，却得意忘形地以《天下悦论》为题，命学生作文。宣城书院石成峰的命题是：《盖上世论》。取《四书》"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句，要其三字，这是八股考试截下题的变相。他们采用这种手法，嘲弄变法维新的失败，发泄自己的不满。[③]

但是，顽固守旧派可以扼杀维新运动，却阻挡不了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戊戌变法以后，八股与缠足、洋烟，已被世人视为中国三害。[④] 废八股、设学校、育人才，迅速形成风气。办新学，习制艺；抑君权，倡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实行变革，救亡图存，成了众所关心的大问题。时人论政变以后的"民心"、"民智"云：政变之后，"人知危亡，不安于守旧。自废八股也，翻译书籍出版者，人人争购，市为之空。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有力者则自请舌人译之，而快新睹。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制也"。"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养成不畏强御，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之以靖国难，外之以拒强敌。""人知爱国……上与政府争，外与外人争。碧眼儿虽悍，岂能据大陆而有之哉！"人"知自主，生天地之间者，自非犬马奴隶，皆

---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66～268页。

②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02～406页。

③ 张心澂等：《康有为来桂林讲学概况》。

④ 徐勤：《戒鸦片会序》，见《戊戌变法》（四）。

有自主之权”。[①] 国人的这种觉悟，确与变法维新的唤醒有关。全国如此，广西也如此。

让我们引用康有为的一位广西门生的话，作为本章的结论吧。他写道：

> 自戊戌政变，爱国志士半已灰心，益以奸臣袁世凯上蛊女后，下植私党，恩则归己，恶则归君，人心厌清滋甚。及宣统间，亲贵揽权，势益瓦解，邑中老成学究亦佥云：非革命不可。[②]

从变法不成到转向革命，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所走的路。

① 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见《戊戌变法》(四)。

②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

第十一章　跨世纪的会党大起义

大约从1895年到1905年，即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到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多灾多难的广西大地，又经历了一场以游勇为核心、以会党为组织纽带的人民大起义。从时间上说，是跨世纪的十年。从空间上说，它由西向东推进，遍及广西各地城乡。究其原因，除封建生产关系的老矛盾外，还直接与中法战争以后，广西迅速被推向半殖民地化有关。论其性质和历史地位，则是对变法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有力呼应，是第二次人民反帝反封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反抗，出现马鞍形发展的三个阶段。结果，虽然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也从此宣告了广西乃至全国的单纯农民战争的结束。从那以后的各种农民反抗斗争，逐步走向追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一、旧恨新仇再斗争

中法战后的天灾人祸

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广西所以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仍旧是封

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同时激化的结果。

中法战争以后，广西社会并不平静，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又趋激化。1888年（光绪十四年），官方报告全省人口750万。① 考虑到中法战争后大批散兵游勇和外地游民的涌入，实际人口应不止此。而耕地面积只有896万亩，② 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19亩，基本上是4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水平。因此，人多地少，大批农民无法获得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耕地的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耕地既不能满足农民谋生的需要，而连年不断的水、旱、风、雹、虫与瘟疫等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又使虽然获得一定耕地的农民也无法安生。根据清王朝官文书有关记载的粗略统计，从1875年（光绪元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20年间，不算所谓"匪扰"或"匪害"，仅受自然灾害的州、县、厅即达350余处（次）。③ 尤其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广西全省水旱迭出，造成"饥民亿万，待哺嗷嗷，卖妻鬻子，惨不忍言"的悲剧！④ 封建官府对于受害之区，既乏钱米救济，即所谓"蠲缓"受灾年份的"额赋"或"地丁兵米"等等，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真正受益的并非劳动人民。而官贪绅索与兵勇劫掠却变本加厉，使百姓蒙受极大的痛苦。1884年夏初，潘鼎新奏报越南前方军情，有"粤西五十余营，携带妇女，临敌败退，四处抢掠，其归伍者仅十余营，逃散情形，殊堪痛恨"的话。⑤ 说明封建军队在外战中怯于临敌、勇于扰民的情状。1886年初，清王朝根据御史李士琨的奏报，说

①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二，171页。据罗尔纲：《困学丛书》第七种《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该年广西全体人口为7508726人，这是光绪十五年补报的。

② 据《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有关年份的奏报和谕旨反映的情况估计。

③ 据《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有关年份的奏报和谕旨反映的情况估计。

④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王之春片，见《谕折汇存》。

⑤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一，光绪十年四月初四日谕。

明中法战争以后，兵勇扰民是普遍现象。他写道：

> 粤西各府、厅设有防剿勇丁，岁縻饷十数万，且素无纪律，所在滋事。又各州县添养亲兵百数十名，倚势侵凌，并有逞凶讹索扰害百姓情事，请饬裁汰。①

裁汰旧兵勇，添募新兵勇，只是又给平民百姓招来了一批新的倚势讹索者。

各级官吏的腐败，这时尤为突出，而且也是普遍现象。南宁知府惠荣借口“办匪”，所至“动辙押勒”；“其兵勇下乡，往往牵人牛只……或发局用，或转卖充赏，先后所夺牛只约以千计”。② 桂林知府孙钦晃“盘踞首要，纳款招收”；生日时“演戏张筵，僚属馈遗，礼至巨万”。平乐知县徐步瀛纵子及门丁“干预公事，骫法殃民”；“办理团练，任意苛派，动辄监押；又倒悬人手足于木架上，或重杖而洒以盐水，种种酷刑，无非为索贿不遂而设。赃款充盈，怨声载道”。③ 升任广西臬司兼摄藩篆的庄爱，在粤数年，“需索陋规，吸食鸦片，倚门丁项姓如心腹，遇事招摇，潜通贿赂。省垣火灾迭见，并不周恤灾民。藩库被窃，隐匿不报”④。贵县知县陈景华，1903年1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第三日即洗监杀囚101口。同年3月带队下乡“办匪”，不问青红皂白，夷平23村，杀人700余口，即老弱孤寡亦不能免。⑤

据粗略统计，同样是从1875年到1894年，广西府、州、县等各级官吏因嗜利任性，性情贪鄙，纵差虐民，借案勒罚，私收规费，玩视民瘼，招摇撞骗等劣迹而被“言官”参革的，即达200人左右。⑥ 但是，这并不能使当时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二二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谕。
②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日初七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见《谕折汇存》。
③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掌广东监察御史蒋式理奏，见《谕折汇存》。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二二九，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四日谕。
⑤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岭东日报》记载。
⑥ 据《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有关年份的奏报与诏谕统计。

的官风政纪有所改变。因为，清王朝本身就是最大的贪索者。它可以打着“济饷”之名而随意“筹捐”，或借办理赈务之名而推广“捐输”，[①] 让那些并无真才实学的封建士绅，只要捐纳几千、几万两银子，就可以得到知县、知州、知府直至道员的显要职位。捐班大开，官场必然被铜臭所污染。捐纳者除了利用各种手段，从百姓身上刮回多于他们买官的巨款之外，还能为社会、为百姓干些什么好事？难怪当时有人直言：“广西无一好官。”[②]

总之，人多地少，苛捐重税，绅劣官贪，天灾人祸，是广西社会的老问题，也是当时所谓“致乱”的重要原因。1894年3月20日（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岭东日报》发表了题为《论广西匪乱之难平》的论文，推究广西“匪乱”之由时写道：

> （广西之乱）其起也，无非激于官吏之贪劣，赋税之苛刻，水旱饥馑之交加，而饥饿之迫身，不得已为此揭竿斩木之举，以求幸免于万一。是人民之乱，固非民之所愿，乃朝廷之粃政，官吏之朘削有以使之然也，亦安足全为民咎哉！

这是实在话，也是公道话。但它只看到“官逼民反”的一面，而忽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与侵略者的新仇方面。

列强侵略激起了新仇

由于清王朝在抗法战争胜利声中撤兵求和，激起了爱国军民的公愤。从此，官府的腐败，侵略者的横行，成了众人直接感受而又群思反对的大问题。一个法国传教士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法战争以后，中国人对法国人以及一切意味着法国的事物，都怀着深刻的仇恨，都有着报复、怀恨的心

① 参看《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一七五，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九年二月十四日谕。

②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广东监察御史蒋式瑆奏，见《谕折汇存》。

情。[1] 中法战后的15年间，又先后发生了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清政府也一再屈辱投降，在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各国和约》中，仅对外赔款即达6.5亿两。加以付息，超出10亿两。如此巨额赔款，清王朝除以海关、常关、盐税等作抵押外，即摊派至各省负责，而又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广西本为"受协"穷省。当时，全省岁人地丁、杂税、厂税、货厘、盐厘、子口半税等项共计120余万两，即供养兵亦感不足。但仍不免"每年奉派英俄、德法洋债及汇丰镑价二十二万余两，又新派偿款三十万两。"还有边防及编练新军等经费45万两。其中"奉派新约赔款每年三十万两，加以补平、补色、汇费各项，共需三十四万余两"，且"数巨期迫"。[2] 非尽力张罗不可。

广西为了支付这笔总数五十七万两的摊派，1902年7月11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巡抚丁振铎提出了七条筹措办法：

一曰官捐。巡抚、藩司、盐法关道每年捐银三千两；各府、厅、州、县"均酌定每年报效数目自一千六百两至二百两"；

二曰糖酒油领帖加税。举凡烧锅、榨房每年均须至藩司领帖缴费二十元，始准开设；

三曰浔税改章。将浔州府税厂向归知府征收改为派委员征收，长收之数，归于赔款提用；

四曰整顿税契。民间买卖田房，新契一概纳税，旧契酌令补税；

五曰押店加饷。令各押店一概呈请司帖，每帖缴银四百两，帖费银二十两，仍每年另捐银二千两，违者查禁；

---

① 和为贵：《广西天主教史·传教事业中的障碍》，见庾裕良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② 参看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丁振铎奏，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柯逢时奏，分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七四、一八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一章，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有关部分。

六曰增改厘税。除酌改出产大宗之蓝靛、蚕丝、牛皮、糖斤等项厘税则例以增加收入外，云土一项，议定每年加税二万二千两；

七曰闱姓各赌，仿照广东章程，承充公司，包商缴饷，每年共缴饷银三十万两。①

如此搜刮的结果，势必阻碍了社会正常经营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残破，造成广大人民的贫困和破产。而这一切，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恶果。

封建官绅对于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置若罔闻，或者有意回避。他们把广西“致乱”之由，归咎于某些个人身上。1903年4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周树模奏称：

> 臣维广西兵事之起……岂尽师不武而臣不力哉？揆厥所由，皆因广西提臣苏元春所部各营与匪为一，勾贯联络，根株盘亘，遂至于斯而不可图也。

他指责苏元春克扣军饷，“纵兵庇匪”，“养寇殃民”，以致“滇粤各边，日苦游匪扰害，浸淫及于内地，户口逃亡，老弱转徙，千里为墟”。清廷接奏，命令岑春煊依所参各节，确切查明具报。②

5月，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在“广西游匪隐患日深”奏折中，也提出了派人彻底查明“致乱”原因的建议。8月，岑春煊依照清廷的指示，提出了有关广西“游匪祸患”的报告，他说：

> （游匪）祸患之来，匪一朝夕，推厥原始，由于营伍废弛者半，由于吏治废弛者半。营伍之咎，实苏元春一人尸之。……吏治之咎，则前抚臣黄槐森实尸之，而王之春亦不得不分任。溯查黄槐森在任时，吏事毫不考求，用人惟凭贿赂。……由是牧令中之贤者相率引去，留者半多不肖。以不肖牧令而膺民社，小民遂不堪命矣！黄槐森又好言祥瑞，恶闻盗贼，州县望风承意，相率讳盗；凡民间报劫

①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丁振铎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

②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七九。

或获盗送官者，必任吏役勒索规费。种种刁难，始肯收禀。及票差役，又纵其肆行骚扰，贼未惩办，事主已先破家，于是民皆相戒。良善者甘受匪害，不敢控官；狡黠者乃与匪通，且求自保，遂酿此遍地皆匪之现象。

而王之春到任以后，“不知认真整饬吏治，以清匪源，一意主抚，但图欺罔。所任各守令，闻虐民而不闻保民。小民先被灾荒，继遭匪害，固已极矣。各守令尚有借办团为名，抽收团谷，较正赋多至数倍者；抽收担灶捐，盈千累万，尽入私囊者。吏治若此，就使无苏元春之养匪庇匪，民已将激而生变，况有苏军壁垒，为匪之巢穴；苏军枪弹，为匪之军储也乎”？①

其实，岑春煊所说的这些弊端，王之春也早已看到。1902年9月27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在赴桂就任巡抚途中，就从多方面对广西“致乱”原因进行过分析，认为“粤西幅员辽阔，林菁郁蟠。……故亡命之徒，多洞其中，虎啸穷山，闻风思逞”，是“地势易于薮盗”之一因。而官吏“惨刻者误用其权，或草菅而激成众怒；阘懦者不胜其任，或粉饰而职为厉阶。讼狱不以时清，贿赂习为故事”。故“民隐不达，民气不伸”，是酿成“游土交哄之局”的又一原因。而“游匪之变”，则“实由于法越一役，散勇逃卒无家可归。……嗣因法官苦其骚扰，与西防严立对讯章程”，关外不能驻足，遂陆续阑入内地，“野性习成，无业可攻，不叛奚待”？至“土匪”之起，初不过“聚为狗盗，固未敢公然揭竿”。及见官不办“匪”，反诬百姓“通匪济贼”，由是与“匪”通以图自保，“继则暗与合群，终则明树一帜”。“自是土匪借游匪之声势，游匪亦借土匪为导师，勾连一片，闯州越县，如入无人之境”矣。②

平实而论，王之春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要比岑春煊深入和全面一些。因为他接触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给广西社会带来的祸害方面。可是，当他到广

①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

② 王之春，《整顿防营电》，见庾裕良、陈仁华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4～4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西以后，又把广西“游匪之乱”，同样咬定“苏始酿之”，[①] 把其他更为重要的矛盾掩盖了。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这两大祸害不铲除，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致乱”之由就始终存在。因此，人民也就不可能安分守己了。

二、揭开大起义的序幕

外战方休，“盗风”又起

在天灾人祸的困扰下，1895年至1898年，广西中部的柳州、浔州，南部的郁林州和梧州府的许多州县，又发生了会党组织的反清斗争。其中郁林州的“戊戌之役”，是这时期斗争的高峰，并由此引发了跨世纪的人民大起义。

1895年春夏之交，界连柳州、浔州两府的来宾、武宣等县，天旱少雨，米粮荒作，民苦饥荒，而地主富商却将大批米粮外运牟利。饥民被迫聚众阻止米船出口。巡抚张联桂闻报，非但不筹粮平粜济荒，反“以该处地方为柳、浔两郡交界，伏莽素多”为由，命署柳州知府梁廷赞，浔州知府夏敬颐“会同剿捕”。武宣会党首领韦老恩与军师杨亚儿，以及陆老种、黄老十、谭老明、何老记等相率“歃血结盟”，各为头目，分据纸札、合龙、恩布等十数村，各建炮楼进行抵抗。来宾方面，则有陈沅湘、陈地金、张振鹏、余七等，亦各自为首，分据新村、勒竹、良寨、高安各村，四乡群众“咸相附从”，且与武宣韦老恩等互相联络，四出攻袭。8月12日，梁廷赞、夏敬颐率省防中营与思恩、柳州、浔州三府防营突入来宾之南泗、独村、六村等处，一面分

①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劾苏元春剿匪不力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0页。

路攻扑，一面运米平粜，并“出示解散裹胁”。经过半个月的“剿抚兼施”，张联桂报称擒获韦老恩、陈沅湘等“群匪之魁”，将多处“匪巢扑毁”，并“夺获马匹、旗帜、炮械”甚多，“余匪”皆被击散云。清廷得报，“仍着饬属合力兜捕，毋任蔓延”。[①] 说明地方并未平靖。

1896年4月中旬，横州汶井村有李亚木、李晚德等与外来帮会势力联合，“聚党藏械”，“竖旗纠胁”。巡抚史念祖电饬署南宁知府张恺带勇赶往横州，结合地方团练，于5月3日突袭汶井村，李亚木率众“放枪拒捕”失利，转往柳州、罗城等处，终至被俘杀害。[②]

同年夏初，灵川县绅民以知县陈国华“贪酷剽悍”，且放任门役胡作非为，将其劣迹列款上诉于巡抚史念祖。而盐道何昭然、桂林知府向万镤则谓“刁风万不可长，立将为首者严惩”。陈国华怀疑此事由一都生员钟毅与唐德润主使，遂把他们逮捕投入监狱。乡民闻讯不平，立即“约集数百人哄入县署，将钟毅、德润破械引归”，而署中各物丝毫未动。有亲兵从署内放枪，被乡民格毙。史念祖与陈国华在桂林闻报，立即派兵往一都纵火焚屋，并逮捕出寨救火者十余人，将为首一人处死，其余则处以永远监禁。[③] 事后，史念祖以拿获灵川县抗粮哄署，杀人辱官首犯就地正法，并严缉“在逃逸犯”龚五六等上奏。[④] 而绅民积不能平，怨恨由是更深，当事者从巡抚至知县，终

①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张联桂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二九。

②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谭钟麟等《查办兴安、全州会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87页。

③ 李繁滋：《灵川县志》卷一四，《前事》。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三九四，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谕。典按：所谓“抗粮”事，民国《灵川县志》只字未提，而“哄署杀人、辱官”事则有之。想是史念祖办理此事失宜，舆论哗然。藩司游智开亦以“民实未变”力争，反对轻易处置。而“赐假归里”之岑春煊亦如是观，并引灵川巨绅周廷绶出面“保证不变”。为了推卸罪责，史念祖乃捏造“抗粮”以抵绅民抗诉上奏。

以“徇私殃民”，“朋比为奸”而被革职。①

同年10月，平乐府属之永安州又因“地方收成歉薄，米价稍昂”，地方绅民请求署知州江鉴令各里出粜义仓存谷，并暂禁谷米出口。而江鉴不予理会，致激众怒。贡生姚泽新、牛客李亚德等聚众阻拦米船，并冲入州衙“哄闹”。江鉴调兵役开枪镇压，伤及群众多人。姚泽新乘间逃匿，李亚德走脱后潜往南洋。②

桂北大地的反抗风暴

与桂中、桂南再次掀起反抗风潮同时，桂北大地也迅速出现了两个“多事之区”。

一个在泗城府和百色厅。

早在1892年，上林县和宾州等处就发生了莫自闲、农蓄帼等“勾结党与，持斋诵经”，密谋起事。与此同时，泗城府属之西林县亦有韦正卜等“聚众滋事”，抗拒官军。地方官虽然报称迅速“将匪巢荡平”，③但会众分散转移，反抗此伏彼起。1897年4月，署西隆州知州吴楚书即因“庸劣庇匪”被革职。而进入西隆州的游勇则坚守乌冲各寨，“潜伏不常，到处焚掠，拒伤官弁”。清廷深恐“匪势蔓延为患”，急命云南、贵州两省调兵“合力兜剿”。同年秋，西隆格老寨地方又有李大成等“匪党啸聚”。官方虽报称“派兵击散”，

① 据民国《灵川县志》卷一四，《前事》载，1897年，钟毅入京，“以灵事始末白于同乡官，而省内亦有以官厅办理失宜函告京僚者”。同年5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清谕以“疆臣徇私殃民，蒙奏酿乱”，着拣派明干大员，驰赴广西，确切查访，据实复奏”（《清德宗实录》卷四〇四）。1897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清廷据给事中蒋式芬奏，将巡抚史念祖，按察使何昭然，桂林知府、盐法道向万镲以及知县陈国华等革职，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一〇。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三九五，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史念祖奏并谕。

③ 光绪十八年四月广西巡抚张联桂《查办西林会匪片》，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64~366页。《清德宗实录》卷三一一，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二日谕。

并捕获李大成等人，但“漏网余匪尚多潜匿”，西隆、西林、凌云各州县，都成了所谓“匪徒渊薮”。到底“应如何派兵往扎”，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局面，清王朝也感到束手无策了。[①]

同年4月1日（二月三十日），凌云县乐里圩又发生了游勇游维翰杀死法国教士马仙（邓神父，Lep. Mazel）的事件。[②] 在法国的要挟下，清政府一再命令地方官吏派人查拿。经过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四个多月的“合力剿捕”，先后杀害了曾国良、游维翰等人，事情才算了结。[③] 但是，它加深了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痛恨，也进一步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面目，加速了更为强烈的反抗风暴的到来。

另一个斗争热点在桂东北的全州、兴安和灌阳。

广西全州、兴安、灌阳等州县，毗邻湖南。自从哥老会[④] 的民间秘密组织在湖南出现后，传入桂北亦较早，在兴安活动者即名哥老会。光绪后期，兴安哥老会的首领有唐燕亭、王绍青、唐玉合等人。他们在县内“开堂放飘”，聚众入会。不久，唐燕亭被“拿获正法”。[⑤] 王绍青、唐玉合秘密传集

① 参看《清德宗实录》卷四〇二、四〇五、四〇七、四〇九有关谕旨。

② “乐里教案”发生的时间素有多说。此处据和为贵之《广西天主教史》，1925年香港版。又参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清谕，见《清德宗实录》卷四〇三。

③ 参看《清德宗实录》卷四〇三、四〇四、四〇五、四〇六有关上谕。又参岑启沃：《西林县志》第六编《宗教》，第七编《前事》。但说事件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误。

④ 哥老会又称哥弟会，乃天地会支派。称首领为大哥或大爷，互称“袍哥”。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参加者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失业士兵和游民，也有地主分子掺杂其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会众纷纷参加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光绪中期，哥老会已入广西腹地活动。贵州人全若宾，湖南人蒋德标在平乐、荔浦、修仁、永安以及永福等地招人“放飘入会”，并拥有记载堂名、口号、阵图之书籍，作战之刀枪及扒城之器械等物。参看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西巡抚张联桂《查办平乐哥老会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71～373页。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〇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谕。

会众，声言要为唐燕亭报仇。消息传出，兴安“居民惊徙，全州、灌阳人心亦为动摇”。时因全州、兴安官兵甚众，故于1897年6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数百之众，先攻灌阳县城。“不料城中已经有备，又遇伏兵”，攻城失利，王绍青被俘死难，唐玉合率众逸去。不久，也被团练杀害。①

当时在全州活动的秘密组织称哥弟会。它的由来也久，而且受湖南哥老会的影响也较多。首领有王名卿、胡栋廷等人。1897年5月22日（四月二十一日），王名卿、胡栋廷等以为唐燕亭报仇相号召，聚众2万余人，从全州进攻灌阳县城。一度攻人城内，放飘两日。然后回攻全州内建乡，另以一队攻兴安。内建永安团武举唐必见，武进士蒋连杰等集团3万人，于6月17日（五月十八日）攻哥弟会据点四所村。会党首领唐锦连及弟兄120余人战死，马田元、汪四十等被俘牺牲。王名卿、胡栋廷等则突围转移，待机再举。②事后，清廷因灌阳知县吴良菜“以土匪人城，讳匿不报”，予以革职。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按察史蔡希邠以及桂林知府孙钦晃等也因“哥匪阑人灌阳县城”，对情况“查报不实”，“均着交部议处”。已革兴安知县卜永春，兼有“亏欠公款，延不清完”，处以“籍产备抵”。③

兴安、全州等地的动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下去，却由此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穷优虑。在有些人的奏报中，又透露了广西南部地区某些隐藏的问题：

> 兴安、全州一带，向为匪人卵育之区，匪首至今未获，实因横州一案办理不善，以致酿成事端。近日梧州、太平等关及西江口岸，均以开通商埠，华洋杂处，更恐匪类潜藏。又闻与广东交界地方，

① 参看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同年八月初一日广西巡抚史念祖《查办灌阳会匪折》、《击溃全州四所会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74～376页。

② 唐载生：《全县志》第九编，《前事》。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谕。

山林菁密，会匪出没无常，请饬协同兜拿。[①]

果然，到了1898年，马平县发生了韦四、刘三金[②]、梁才“竖旗起事”；郁林州陆川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李立廷[③] 起义，使19世纪后期广西人民的反清起义出现了第一次高峰。

1897年岁末，马平县会党首领韦四、刘三金、梁才等在土博、里高等圩聚众数百人，“竖旗起事”。第二年1月2日，杀伤署三都巡检周澧父子及团练多名。右江道黄仁济、署柳州府知府朱鹤年率防营兵勇“分赴有匪村圩，会同地方文武查办”。适韦四、刘三金等率众2万余人从三都进攻柳州府城。双方在拉堡、双桥、竹鹅塘等地发生激战。清军及团练凭借洋枪火炮猛攻，而义军因“党目”刘月卿阵中叛变，被迫于6日分路退走，转战于柳州及庆远、桂林、思恩四府之来宾、雒容、融县、宜山、忻城、永宁、迁江等州县交界地方，“各处土匪乘机蠢动，几成燎原”。清军经历一个月的“分投剿捕”，始告平息。[④]

桂南七州县的“戊戌之变”

在郁林州起义的李立廷（1863～1935），字仕朝，广西陆川县中塘堡大园村人。“本世家子，嗜赌好胜，为平乐圩捞家头，各处会党咸奉为大哥”。先是，“中塘堡廖姓与陶姓争水圳，立亭（廷）右廖左陶，宿有积嫌。武举陶有

---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三，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谕。《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一亦有摘录，但文字较简略。所谓“横州一案”，系指1896年4月李亚木、李晚德竖旗抗官事。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谭钟麟等奏，全州、灌阳与横州“匪案”无涉，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第387～388页。

② 柳江县志编委会之《柳江文史》第二、三期写作刘三经或刘三斤。

③ 清方官文书及地方志多作李立亭。

④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黄槐森《查办马平等地会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柳江县志办公室编：《柳江文史》第二、三期，1983～1984。

芳知李立亭、廖十八等拜会，屡次列单禀报州县。知州黄桂丹本书生，年渐衰，讳言盗。知县熊轼贪懦无能，毫无办法，日益滋蔓”。①

与李立廷在陆川聚众拜会的同时，容县辛里人甘木、封禄阶，② 北流县塘岸人刘凤云，东华圩人谢华轩，兴业县沙塘人谢三妹，贵县人赵大寿、李平龙，博白人秦永年、田福志③ 亦各据一方，拜会结盟，密谋举事。1897 年冬以后，郁林州属之博白、陆川、北流、兴业，浔州府属之贵县以及梧州府属之容县等地，到处是“红巾赤帜”，成了会党人物的世界。

面对会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地主团绅惶惶不可终日，告急“禀报”纷纷送入郁林州衙门。知州黄桂丹始派州判胡绍瑗带勇赶往陆川县之平乐、马坡与北流塘岸各地查办。时李立廷在众人掩护下深藏不出，兵勇无法拿获，遂将其胞兄李仕英带回州衙拘押，勒令他把李立廷交出，同时悬重赏缉拿。李立廷忍无可忍，遂与甘木、刘凤云、谢华轩、谢三妹等密议，同时举旗起义。④ 一场被时人目为“太平军以后”的“第一大乱”，从此爆发。⑤

1898 年 6 月 28 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李立廷与廖十八聚众 2000 余人，先占平乐圩，然后围攻石狗寨。陶有芳率族人合力抵抗，相持两日。因寨中缺水，人心动摇。立廷声言：但要陶有芳，其余可不问。有芳出寨，立即被杀。会众乘机入寨，尽杀寨中丁壮 130 余人，妇女则分遣回娘家或婆家。李立廷在平乐聚众之日，谢华轩依约从北流率众经榕江堡奔袭陆川县城，尽占南、北、西街。当地会首吕士松、吕秀川等为内应，县城不攻而

---

①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② 甘木：又名甘沛棠。太平天国起义时，曾与范亚音起义于容县，后归附陈开、李文茂之大成国。石达开率师回桂时，曾封甘木为镇容侯。1863 年，甘木投降清军，转为地方团首，横行乡里。地方官绅以其出身“盗匪”，常鄙其为人。甘木因此不能自安，又暗与各地会党势力通声气，以谋自固，是个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的危险人物。封禄阶出身秀才。

③ 秦永年又名仕立，为在籍侍卫。田福志乃已革副将。

④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⑤ 《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中国秘密会党记》。

破，杀典史王锡章、团首吕振儒等，刚到任所十日的知县史从焕，以及教谕李文浩与官幕、眷属多人被俘获，衙署被纵火焚毁。7月2日，李立廷至县城。3日，将史从焕等解回平乐圩囚禁。谢华轩进城后，因与吕士松争大馆失和，亦于是日率所部回驻北流之新圩与东华圩等地。

李立廷在平乐圩起义，县内各方会党闻风响应。王秉南集众拜会于县南之大桥圩。举人冯希京于7月3日集团练围击。秉南与踞城之友军联合，乘夜回攻大桥圩，败廪生陈子坊之练勇于龙塘，直人大桥，籍没巨丰、恒昌两饷押钱物。次日，出队周埇口，没收地主富户浮财。与此同时，县北米场圩会首丘大刀五、吕亚花八，大袄堡会首梁育之、王丝蚁以及乌石圩会党，亦纷纷拜会聚众，攻掠村圩。地主乡绅或死或逃,县城及四乡大半“从红”①。

北流的刘凤云与蒙平楷、马大灵屋等，亦依约于28日集众围攻县城。因变起仓猝，城内官绅张皇失措。城守黎仁宝早与刘凤云等秘密相通。30日夜，刘凤云率众从南面破城，火焚官署，毁监释囚，杀知县金兆基、典史骥良等；团总陈兆基、陈锦图等自尽。②

容县方面，由于甘木首鼠两端，情况比较复杂。李立廷密谋起义时，甘木应允“暗助义军”。但在起义前夕，即6月27日，他又在杨业村家中宴请知县王永贞，为自己预留退路。28日，当封禄阶率众进攻县城时，甘木并不依约予以“暗助”。义军因得率团守城之波里团长杨美君为内应，一举攻破县城。而甘木竟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进攻封禄阶所率义军，独踞县城。③

兴业的谢三妹也如期在沙塘举义，与李平龙联合，攻克县城。以田福志

---

①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② 李寿祺：《北流县志》第七编，《纪事》。

③ 刘介：《容县封禄阶父子的起义》，见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27～28页。甘木的真面目不久即彻底暴露。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清廷据“有人奏：广西土匪滋事，由于甘沛棠，并有暗助军火情事。着黄槐森严密查拿，务获惩治”。同年十二月黄槐森奏：“遵查容县勾匪陷城之团首甘沛棠，已拿获正法。”分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三〇、四三六。

为首的博白会党，虽然得到在籍侍卫秦永年作内应，但因守城兵勇的拼死抗拒，并不能把县城攻破。贵县李大寿亦曾聚众起事，因为力量有限，只在县东大圩一带活动，无法大举。此外，岑溪和藤县也一度被会党聚众攻城，形势十分紧张。

当各路义军分别攻占陆川、北流、兴业与容县等城之际，李立廷已率众数万，围攻郁林州城。7月6日（五月十八日）发起攻击，经两昼夜激战，尽扫城外之州背、西街、南街等团勇据点，义军分设大馆于环城四厢，李立廷另设大馆于州背。附城数十里所有村圩，皆为义军所有。李立廷发布文告，吊民伐罪，文曰：

州官老黄，作事荒唐；不凭父老，只听有芳。虐民为盗，逼我猖狂。告尔百姓，毋用惊慌。扫平天下，福寿而康。

同时通令各路义军，严明纪律，恪守洪门规矩，勿杀良民，勿淫妇女，勿焚屋宇，勿宰耕牛，勿取百姓财物，勿搬豪富钱谷。一切行动，悉听大馆指挥。①

李立廷为首发动的起义，旬日之间，连占四城，博白、郁林被围，波及浔州、梧州两府，真是“声势浩大，两广震动”②。消息传到北京，清廷立即电饬两广总督谭钟麟，广西巡抚黄槐森等“星速剿办，毋任蔓延。如兵力不足，准即添数营，以资防剿”③。9月中旬，广东高州镇总兵潘瀛带兵入广西，在地方团练配合下，于18日攻陷陆川县城。广东绥远军则于14日赶至郁林州附近之福绵圩。16日，直逼州城，与守城的团练里应外合，夹击攻城义军。“立廷率党巷战，死千余人”，被迫“解围走，先回平乐，旋潜由北流

① 李家金：《洪门会桂东南戊戌起义》，见《玉林文史资料》第一辑；梁小克、杨权：《李立廷及其领导的桂东南起义》，见《玉林师专学报》1980(3)。

②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谕。

坡二里过（广东）信宜、罗定，奔出南洋”。[①] 另路清军从广东进入梧州，以解岑溪、藤县之围。而广西提督苏元春则调边防军在总兵马盛治、分统陈桂林带领下赶至陆川，借“清乡”之名，烧杀淫掠无虚日。据民国《陆川县志》记载：“陈桂林驻马坡两月，计屠杀不下二三千，焚屋数百家，抢掠牛只衣物无算。”由是发出慨叹说：

光绪戊戌之事，匪乱不满一月，兵乱将近半年；被匪害者百之一二，被兵害者十之一二。古人云：“贼梳兵篦”，信然！

李立廷的起义虽然时间不长，但它的来势十分迅猛，也的确给封建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撼。清王朝除了害怕它“蔓延”四方，难以收拾外，还十分担心它和孙中山的革命者相联系。当时就有人认为：李立廷起义所用的“军械、火药，均系孙文接济”。清政府则据此咬定：“广西匪徒，闻系孙文党羽，匪首李立亭出安民伪示，洋报内载孙文办理转运，暗中主谋，集股购械，分股窜扰”。命令谭钟麟、黄槐森等“确查孙文踪迹，据实具奏”。[②]封建统治者的顾忌并非毫无根据。事实是：李立廷起义的消息传出以后，兴中会的邓荫南即与尤列、宋居仁从澳门潜入广西密谋接应。但甫抵藤县，而起义即告失败。邓荫南等遂退回香港。[③]

在起义的战斗中和失败以后，义军的死亡是最惨重的。各路头领如廖十八、吕士松、刘凤云、赵大寿、封禄阶、田福志、秦永年、谢三妹等，或壮烈战死，或被俘牺牲。惟有“首要分子李立亭（廷）”远走高飞。这又使封建统治者耿耿于怀，寝食难安，惟恐他“再图窜扰”。为此，清王朝迁怒于地方

---

① 吕濬堃：《陆川县志》卷二一，《兵事编》。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谕。同年十八日，清廷又电饬广西提督苏元春，以“著名匪首李立亭、田福志等均未拿获，并闻逸匪孙文自海外潜归，为之区画接济。是否属实，着苏元春严密访查。如在中国界内，务期设法弋获，以杜隐患”。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邓荫南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

官吏防范未周，镇压不力，分别给予广西巡抚黄槐森、容县知县王永贞、兴业知县唐汝霖、郁林知州黄桂丹、博白知县吴国梁、陆川知县史从焕等以各种不同的处分。[①] 并且在镇压起义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连续发布了20多道缉捕李立廷的谕旨。[②] 而李立廷流落南洋以后，接受了孙中山宣传的革命思想，逐步从旧式会党的地方首领，转变为拥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士了！

三、大起义的重要转折

游勇之起

广西李立廷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我国北方的冀鲁大地，爆发了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从1899年至1901年，19世纪向20世纪跨越之际，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表现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而广西的会党起义，这时的斗争势头虽然稍有减弱，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值得我们的重视。

从起义的空间考察，在1899年至1902年的四年间，桂林、平乐、梧州、郁林、柳州、庆远和浔州六府、一直隶州，起义斗争的势头相对减弱；而南宁、思恩、太平、镇安、泗城、上思、归顺五府、二州厅，即广西与越南，广西和广东南路，以及广西与云南、贵州交界的西部广大地区，却成了起义斗争的热点。

从起义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考察，1899年以前，起义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

---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四二九，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同年九月初四日谕。

② 参看《清德宗实录》有关部分。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廷有"以缉获郁林会匪首逆李立亭出力，赏翰林院侍读欧德芳四品衔"之谕，未免自欺欺人。见《清德宗实录》卷四四五。

民、矿产手工业者、游民以及某些失意的地方士绅与兵勇团练，他们多以会党为组织纽带。这时在广西活动的会党，虽有三合会、三点会以及哥老会、哥弟会或斋教等等名目，但多源于昔日的天地会或白莲教。其斗争口号不外"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和"官逼民反"、"劫富济贫"。1899年以后，进出于广西南、北以及西部边区的会党、游勇，与各地起义的农民武装相联络，登上了反清起义的前台，并在起义中涂上几笔反帝斗争的色彩。会党的组织虽仍被采用，而失业的散兵游勇却逐步成了斗争的主力。1893年2月22日(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日)，广西巡抚张联桂在"筹剿会匪折"中说："只因军兴以后，游民散勇无地无之，若辈平日既无恒业，衣食靡所取资，狼性难驯，困而思逞，或持斋诵经，或拜会结盟。粤之会匪，大都类是。"① 正反映了中法战争以后散兵游勇与旧有会党结合的情况。

其实，游勇之起，源远流长。远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某些抗清队伍即转进越南活动。他们虽然几经挫折，但并未被消灭。② 1876年9月，清浔州协副将李扬才在钦州、灵山招党人越南，独自为政。1879年兵败身死，其余部亦多流为游勇。中法战争初期，岑毓英指挥的西路军兵败，20营损失过半。徐延旭率领的东路军50营，溃者40营。这些溃败的官兵为了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或者另谋出路，也多转为游勇。更因中法战争后的大批裁撤兵勇，这些靠"当兵吃粮"为业的人顿失生计，回乡既无寸土可耕，即有亦多不欲重操旧业。他们中的不少人坚持留在越南，继续与越民并肩抗法。清廷与法国侵略者对他们皆感束手无策。③ 1896年，中法签订并实行《边界会巡章程》④ 以后，原在越北活动的大批游勇纷纷向中越边境或内地转移。游

---

① 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67页。

②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云："广西自洪杨创乱，遍地皆盗，窜及越南，官军出关旋平旋起，则游勇之为祸烈也。"

③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十。游勇早期在越南的抗法活动，可参《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周德润致总署电；卷六九，苏元春、张之洞、邓承修，以及卷八一，张之洞等人的有关奏报。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44～647页。

勇也就迅速成为广西社会的一大问题。有人以所谓《广西匪乱病民论》为题，具体论及了这个问题的因果关系说：

> 迨中法一役凯旋后，遣散各兵勇不下万余人，流落边区，悉成盗贼，于是游匪之名乃彰。及苏元春部下统将陈桂林、苏元瑞辈缺额蚀饷，纵勇为匪，四出劫掠，皆有利械，而游匪之势日大，不数年酿成不可收拾之祸。①

这些盈千累万、曾在抗法前线出生入死的兵勇，一旦被清王朝下令遣散以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也不再受官府的约束；他们没有固定的基地，拿起手中的武器，自成帮股，到处游离，飘忽无定，和过去的反清武装各据一方，称王称霸又有不同。有人把两者作了比较，说是：

> 近世之匪与昔不同。昔之匪类有群奉之渠魁，有一定之巢穴；今则渠魁百出，居处无常。②

这一比较，也反映了游勇的组织和活动特点。

游勇势力的消长与抗争

游勇从越南北部向广西转移，先由中越边境退入左江下游，再转右江下游。初期主要在隆安、归德、果化、武缘等地活动。在转移过程中，接纳沿江各县的无业游民，由是人数日众，势力日大。随又分数路向南、北和东、西的广大地区发展。其南路延及宣化、宾州、横州、永淳、贵县、郁林、兴业以及广东的灵山、钦州、廉州、防城等地。东路则向上林、那马、忻城、柳州、大苗山等地扩展。另一路则由龙州、镇边、归顺、镇安、敬德向西北入云南的富州、广南、文山、西畴、马关等地。还有一支则沿江而上，分据思林、田州、奉议、百色、西隆、西林、凌云、凤山、东兰、天峨渡红水河而至贵州的黄草坝、兴义府、册亨州、贞丰州以及罗斛、独山直至都匀一带。

---

① 见《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0日。

② 陈尔训等纂：《永淳县志·庚子匪乱附记》。

再一支则由恩隆、恩阳经凤山、东兰、河池、南丹、宜山而至鹿寨各州县。①这种发展趋势，自然形成了两粤边区，桂、滇、黔边区和中越边区几条带形的斗争热点区。

游勇初回内地，虽然仍保留军队组织，留有号牌、号衣，手握快枪火炮，而且习于战阵，但是，由于环境改变，情况未熟，尤其是广西提督苏元春、云南临安开广道员刘春霖、安边道员邹声兰等对游勇采取招抚政策，数千游勇重新投入清军营伍，他们的家属暂时得到安置。因此，成为游勇而向各地转移者并不太多。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甚少攻城掠地举动。1896年至1897年，粤桂边区发生所谓“绿营游勇之乱”②；1897年在泗城府又发生了“乐里教案”；同年，武缘县“游匪欧恒山”的“劫掠商船”；③那马厅“游匪杀官劫署”④；以及1898年西隆州黄牛角山“游勇窜入滇界肆扰”事件等。⑤除“乐里教案”因为杀的是法国教士，引起的震动较大外，其余实际都是小规模动作。

1899年，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一年，封建统治者在镇压了桂东北和郁林州等地的起义以后，一再以“伏莽未尽，勿容疏忽”告诫地方官吏。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清王朝在迭颁谕旨，奖励有功，惩办失职官员，优恤死难奴才的同时，又与地方督抚反复筹商应付局势的办法。为了解决粮饷问题，黄槐森提出办理积谷，有人则建议鼓铸制钱。对于前者，清廷降旨：“即着督饬藩司，随时认真查察，毋任日久生弊。”对于后者，黄槐森则认为：“筹议广西鼓铸制钱，体察情形，尚难举办。”为了安定地方，防范百姓造反，黄槐森奏请“严查保甲，整顿团练”，并议定章程八条，饬令各属遵办。为此，清廷降旨：“团练保甲，原以卫民，

---

① 林宝航：《广西的游勇》，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② 黄知元等：《防城县志》（初稿）第十四章，《纪事》。

③ 曾唯儒：《武鸣县志》卷十，《前事考》。

④ 林锦臣：《那马县志草略》第九章，《前事·灾异》。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三，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谕。

切勿反致扰累。所拟章程，仍须随时酌量变通，以杜弊端而收实效。"[①] 为了防止团练与游勇"勾结为患"，黄槐森又奏请"将广西团练归并保甲办理"。[②] 于是，督办广西团练的唐景崧遵旨撤去团练总局，将团务归并保甲局，"并裁遣招募各团丁"[③]。从此，被裁团丁转与游勇结托，反增强了造反势力。为了"保护商贾"，黄槐森还奏请在广西"募勇制船"，购械练兵，以利攻防。但因练饷难筹，几经努力，也只能增练新兵1200名，根本无济于事。[④] 鉴于广西、云南与贵州三省边区形势日益紧张，清廷三令五申有关督抚"合力截拿，毋留余孽"。可是"各分畛域"，互不协作的老毛病始终无法破除。

至于各地的会党起义，1899年以后走向了短暂的低落期。这一年，进入桂西北、以西隆州为大本营的游勇武装，多向云南的丘北、广南等地转移，败则游走于滇桂之间。故在省内比较著名的起义，只有武缘的苏松贞和宣化的王和顺为首的两支队伍。

据地方志书记载，1899年，苏松贞与武举周治国在武缘"勾结客匪"联合起事，县官多方"缉捕未获"。于是县西的坡造、四塘，北路的小良圩等地的团练，也纷纷拜会结盟，"势颇猖獗"。苏松贞的势力因之日益壮大，地方官绅"无敢与敌者"。[⑤]

宣化县二塘的王和顺，出身于壮族贫苦农家。青年时曾投军参加抗法战争，后被裁遣回乡，在宣化衙署充当衙役，旋人捕盗营。他兄弟五人，多因抗租抗税被官府杀害，因此萌发了反抗思想，常与"贼通"。不幸事发，被知县沈世培逮捕。初拟处斩，后得宽大释放，遂自立帮口，聚众拜会。1899年，联合县内各路会党与游勇千数百人竖旗起义。从此成为会党抗清的一方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四二，参看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谕。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三，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奏。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六，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奏。

④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黄槐森奏请增练新兵，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五三；《清德宗实录》卷四五〇，同年九月初四日制船护商奏。

⑤ 曾唯儒：《武鸣县志》卷十，《前事考》。

首领。

1900年，广西的会党、游勇起义略有发展。右江沿河水陆各处，"土民勾结游匪，拜台入会"，所在多有。思恩府那马厅，发生了通判谭鹍逮捕会党兄弟潘特琴等人。会党首领黄大立即"纠党持械，夺犯抢劫"，并把谭鹍杀死。这个所谓"戕官巨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震慑。① 不久，泗城府属各地，又出现了所谓"匪徒滋扰"。黔桂边区的游勇武装，则从广西攻人贵州的下江、丙妹、巴挑等处。② 4月29日，西隆州城被游勇攻占。③ 5月9日，永淳县会党与外来帮股联合，众至数千，围困防营哨弁，并在永淳的灵竹圩竖旗拜会。由于反抗活动遍及永淳、横州各地，而南宁府"无勇可援"。地方官绅哀叹"贼众团弱"，转而向广东钦州、廉州求援。④

1901年，两广边区，十万大山与上思县各地，"会党拜台日盛，匪势日张，几于无地不有"⑤。因为游勇与地方帮股日益走向结合，"游以土为巢穴，土以游为护符，兵来匪匿，兵去匪来"，又常使封建统治者有"鞭长莫及之虑"。⑥ 所以，这一年的会党、游勇虽然尚无大规模的举动，而地火的迸发也就为期不远了！

---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八，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谕；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苏元春奏，《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〇。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六二，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谕。

③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黄槐森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三。

④ 《横州惠守来电》，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二。

⑤ 黄步青：《上思县志》卷六，《记事志·兵戈》。

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苏元春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〇。

四、大起义从高涨到失败

1902年的广西形势

1902年，北方的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以后，广西的会党游勇起义又到处崛起，迅速恢复了高涨的势头，形成了“遍地皆红”的斗争局面。

据有人奏报，1902年春初，省城桂林就有三点会党甚多。他们到处“明火劫掠，一月数十起”。柳州以下，也是“土匪四起”。[①] 南宁、龙州等地的游勇、会党与土帮三者时分时合，分股甚多。恩隆、迁江、凌云、西林、永淳等县，纷纷告警。[②] 而苏元春早日遣散的兵勇并未放下武器，他们与广东、云南两省的散勇合计不下万人，彼此互相勾结，“到处打劫”，以至水陆“道路梗阻”。[③] 泗城、西隆等处，因无防勇驻扎，游勇趁机“攻劫”。“西隆州地方官绅，听任匪队入城，纳资取和。”泗城游勇从容渡江进入贵州兴义府属各地，没收官绅富户财物。[④] 红水河沿岸，游勇四出攻击村寨，“顺者可免”，声势极大。[⑤] 5月以后，桂、滇、黔三省沿边游勇与土帮共同行动，“边民大

---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九二，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

②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陶模奏《筹办广西游匪情形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1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九四，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谕。

④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贵州巡抚邓华熙《呈复粤境撤防不利剿办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0页；同年八月初八日清谕，见《清德宗实录》卷五〇四。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九七，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六日谕。

半从匪"[1]。活跃于庆远府的游勇则"谋攻府城"[2]。6月，太平、归顺、镇安、百色、泗城等地，游勇活动频繁；上思会党黄十与钦州黎十、谢天良等聚众七八千人，"大扰东西南北各乡"[3]。7月，云南广南府游勇"串聚粤边"。西林、西隆会党首领梁振才、杜七、苏明、黄三等遍贴告示，自称"总统忠义全军"，声言将分五路出动。[4] 7月21日（六月十七日），活跃于隆安、武缘一带的会党首领黄五肥率众反击清军的进攻，阵毙调署左江镇总兵马盛治于马鞍山。[5] 同年8月31日（七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王之春上《筹剿广西乱匪折》，谈及当时广西"匪乱情形"说：

兹据各路报称，除桂、平、梧尚称安谧外，其余无不有匪徒窜扰。综计自百色以达恩隆、奉议、武缘约分十余股。色、泗境内，均系游匪，以李二老板等为最横。思、宁境内亦十余股，均系土匪，以黄五肥等为最狡。总兵马盛治阵亡，即系剿此股匪徒。此右江一带各匪之实在情形也。自上思、宁明以达太平，下至南宁、左州、永康，均系客匪，匪首陈秀华约千有余人，最为狡悍。其余谭球章、谢天良等约亦十有余股，均系土匪，各六七百人不等，时出剽掠。此左江一带各匪之实在情形也。自宾州、迁江而上，沿红水河以近黔界，则游、土各半，时分时合，出没无常。兵至则逃窜无踪，兵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九八，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谕。

②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广西巡抚丁振铎《向外务部陈报广西游匪活动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4页。

③ 黄步青：《上思县志》卷六，《记事志·兵戈》。

④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云贵总督魏光焘《请饬广西派军会剿边境会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5～406页。

⑤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同年七月初三日陶模《呈报马盛治阵亡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6页。黄五肥，永淳县人，出身木匠。

退则呼啸复至。此柳、庆一带之实在情形也。[1]

在此之前半个月，署两广总督德寿也有类似的奏报，而且说："与广东接界之郁林州一带会匪更甚。其尚未酿成巨患者，以各匪股数零星，并不联合，无大股入一定巢穴。而剿办之难，亦即因此。"[2] 其实，王之春所谓"尚称安谧"的桂林、平乐和梧州三府，情况并不亚于郁林州，只是隐匿不报罢了。

在各地会党、游勇纷纷崛起的时候，许多兵勇也整哨、整营地倒戈起义，加入了造反的行动。1902年初，滇桂边境即有"土游联合，无所区分，甚至团目亦暗助为虐，妇女皆越抢成风，并闻弁兵畏扰，或闻有通匪买安"的报告。[3] 继之，又有管带绥靖中营广西营游击张显廷全营溃散，弃失军械逃脱之说。[4] 这些溃散的兵勇害怕遭到惩治，不少人携械"从贼"去了。几乎与此同时，广西边防管带、补用知县包怀邦、哨弁林稳志，也"暗通游匪，济以枪弹，并有两哨携械潜逃，勾结为乱"。包怀邦、林稳志虽被军前正法，而携械潜逃的"叛勇"却加入了游勇造反的行列了。[5] 至于防营员弁"暗中通贼"，更是所在多有。如守备郑德胜借病离防，"哨勇通匪"；都司雷福祥"接

---

① 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1页。因为广西的会党游勇来自四面八方，故时人又以其语言、口音分帮口。凡操纯粹广府、南海、番禺、顺德口音的伙众，称为"广帮"；其他操不纯粹粤语的，即广、南、顺、番之外，广东各府、厅、州、县的所谓"乡下话"，以及西江流域，包括浔江、郁江、左江、右江在内，各府、厅、州、县口音的伙众，称为"土帮"；原操桂、滇、黔、湘、赣、鄂诸省语言，或也能勉强讲粤语者，称为"客帮"。

②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筹剿广西会匪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09页。

③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云南巡抚丁振铎《请会剿滇粤游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96～397页。

④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魏光焘《剿办广南游匪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96～397页；《清德宗实录》卷四九八，同年四月初六日丁振铎奏并谕。

⑤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丁振铎《呈复官兵被害事件电》，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查办私通游匪员弁片》，分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98、402页。

仗不力，勇丁溃败”；守备张克纪“所带营勇，见匪先逃”。[①] 如此的兵“匪”势力消长，也壮大了起义的声势。

起义者不但杀官、劫富，也反对洋官和洋教士。1902年春，有法国官员二人，由布局对汛处前往越南，被游勇黄凤龙、黄宝齐等聚众击毙。[②] 同年9月，百色、西林又发生了游勇围困教士事件。经王之春电饬左江镇潘瀛、左江道瑞霖速行派兵保护，并竭力护送至南宁，始算无事。[③] 在广西，这是继1897年“乐里教案”和1898年“永安教案”之后的重大涉外事件。刚在《辛丑条约》上画押的清政府，接获报告后十分紧张，在此事发生后的一年之内，竟向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督抚发出有关“缉匪保教”的公文十余次之多。[④] 会党游勇仇恨洋官、洋教士情绪的高涨，是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和抗法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鼓舞的因素。王之春谈及广西会党、游勇之“愈肆披猖”原因时说：“盖自庚子联军入都，人心摇动，乘机煽惑。远袭洪杨之逆说，近鼓拳匪之余波，入会拜台，日见其众。”[⑤] 是有一定道理的。

面对会党、游勇起义的日益高涨，清军防不胜防。时全省防营水陆共24营，每营各只二三百人不等。边防20营虽有万人，而分布防线太长，且多“抽调剿办内匪”，也常有顾此失彼之叹。[⑥]

---

① 见《清德宗实录》卷五〇八，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谕。

②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初四日与三月十七日丁振铎有关电报，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398～399、404页。

③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九日王之春《护送传教士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3页。

④ 参看该年《清德宗实录》及有关督抚奏报。

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整顿防营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5页。

⑥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王之春《筹剿广西乱匪折》，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1～412页。

1903年起义的扩大和高涨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广西的会党、游勇势力进一步扩大和高涨。是年初，南宁报称"匪情吃紧"。桂中的宾州、武宣、象州等地，起义者"复踞坚巢"以抗官军。左、右江各属广大地区，"土匪到处蔓延"。① 上思和十万大山一带，皆"以拜台者为识时，纵匪殃民，贼势大炽"②。滇、桂、黔三省边区，"游匪滋扰"，且有东向湖南发展的趋势。广西其他地方，也日有"匪势猖獗"的报道。王之春虽然极力推行"招抚"政策，但因"股数甚多"，而且声势浩大，所以"旋抚旋叛，到处蔓延"。③ 梧州与百色等处，又时有起义者获得外洋火药接济的传闻，更使封建统治者感到忧虑。④

当时，负责广西军政的是王之春，他素以"历练军务"自诩。自1902年8月27日在梧州"受篆"正式接任广西巡抚以后，几个月内，接二连三地给清廷上奏十余次，请求调兵人桂"助剿"；请派唐景崧为团练大臣；报告护送洋教士脱险；整顿防营，部署兵力分路进剿；以及参劾下属"剿匪"不力等等。他以苏元春负责左右江及柳、庆等地"进剿事宜"，而自带楚军及广东绥靖军十余营"居中镇慑"。⑤ 满以为如此的调度部署，广西的"匪乱指日可平"。他从梧州先到浔州，居留11日，报称"解散鹧鸪村匪数千"；在贵县驻留12日，报称"剿平罗伞岭、大番峒、覃窑等处坚巢，统计毙匪数百，解散胁从党羽不下万余人。并派人分途剿办柳州、来宾、庆远各处匪徒，拿获首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〇九，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② 黄步青：《上思县志》卷六，《记事志·兵戈》。

③ 同见《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一，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贵州学政赵维熙奏。又参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杂俎》刊载光绪二十九年《中国纪事》。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二，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谕。

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请派军来桂助剿电》，同年八月十五日《部署兵力分路进剿电》，分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10、413页。

要各匪甚多，招抚不可胜计”云云。[①] 到了1903年4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竟向清廷声称：“桂省内地各股匪，经之春派营分途剿办，并督军亲赴各属剿平各股匪徒。”南宁各地，已经“各营渐次荡平”。庆远、思恩两郡，仅有“边外逃匪零星小股”，亦“不难立就扑灭”。“现在左右两江水陆均已畅行，与上年景象迥异。但望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则地方可无后患。”[②] 王之春报告的这些“好消息”，自然使清朝统治者喜出望外。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在王之春上奏报捷的前五天，即4月16日，南丹土州已被起义军攻占。[③] 王之春虚报军情，激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愤怒，立即对他提出质问：“昨据王之春电奏，边界内地一律肃清，何以南丹有股匪窜陷土州之事？”[④] 王之春除了把失败责任推给苏元春“会剿不力”，并对出兵扼守东兰、河池的咨商“置之不理”外，还责怪地方群众“皆系惊弓之鸟”，“并无斗志”，“一闻匪至，即大张凶焰”。[⑤] 而他自己也无法速调营兵进驻南丹。贵州军虽于6月初旬开抵南丹多平、芒场，但并无力把南丹州城夺回。[⑥] 起义军占领南丹三个半月，是清末游勇起义据地时间最长的一处。[⑦] 义军从南丹分路向庆远、东兰与贵州出击，结果是庆远警报频传，东兰州于6月25

---

①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筹办贵县等地会匪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21～422页。

②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月《派员搜剿庆远逸匪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5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四，据贵州巡抚邓华熙电奏，攻占南丹土州的，是游勇陆亚发部。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四，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谕。

⑤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四日《呈复会剿南丹游匪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46～447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六，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布政使、护理巡抚曹鸿勋奏并谕。

⑦ 据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贵州巡抚李经羲《收复南丹土州电》，清军于6月30日（闰五月初六日）“将南丹州收复”，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53～453页。

日（闰五月初一日）一度被义军攻占。① 不久，庆远府宜山县怀远镇又以失守见告。②

与此同时，边关龙州一带，又因苏元春奉命晋京陛见，地方主持无人，闹得兵勇逃散，人心惶惶。③ 法国借口保护法人性命财产安全，声言要派兵前来进驻。④ 而广东又传出消息：有英国兵轮文保礼号满载军火经肇庆驶往浔州；或说广东海面捕获私运盐船一艘，“查出洋枪420支，子弹6箱，系由香港德商卖与广西土匪”者。⑤ 王之春因“广西匪乱日益猖獗，曾与法国驻越南总督商谈借法兵入关助剿”⑥。一时间，各种传闻迭出，逼得王之春立即去电外务部，“务令法兵勿近中国边界，以免人心惶疑”⑦。但他却以“桂省匮乏甲天下”，“兵饷枪械，无一不缺”为由，一再向上海德商礼和洋行洽借外债共银30万两，半交现银，另一半购买铸造银元和枪弹机器，以及毛瑟枪码，行息七厘五，订有合同。王之春的自作主张，遭到外务部的驳斥，没有结果。⑧

因为广西的“匪乱”“屡剿不绝”，而且愈演愈烈，使清朝统治者忧心如

①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岑春煊《奏报东兰失陷电》，同年六月初四日《收复东兰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56～457页。

②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王之春《报收复怀远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53页。

③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两广总督德寿《电呈龙州人心浮动》，四月十六日署太平思顺道瑞霖《龙州人心不定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8、442页。

④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苏元春《呈报龙州治安已令防营保护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8～439页。又参《南报》宣统二年第一期，《本国大事记·外患之部》，再次提到法国这次阴谋出兵干预会党起义的历史。

⑤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期，《军事》。

⑥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六月二十五日《岭东日报》。

⑦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请阻法兵近界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9～440页。

⑧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王之春《向驻沪外商借款电》；五月初三日《再陈急借洋款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41～443页。

焚。而对封疆大吏如王之春的"欺罔粉饰"、"好大喜功"；苏元春的"纵兵庇匪"、"养寇殃民"的参奏纷纷传入宫廷，又使清王朝感到需从人事上作一番调整的必要。先是，1903年4月18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调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按照清朝回避的成例，他是不宜回本地做官的。但是，为了解救统治危机，清王朝在简任的诏谕中特地讲明："广西系该署督桑梓，更为洞悉情形，毋庸回避本籍。"责成他会同王之春以及丁振铎、曹鸿勋等邻省督抚，协同"督饬各军，策励将士，迅扫匪氛"。[①] 6月19日（五月二十四日），岑春煊到广州接篆任事。从此，他总揽两广的军政大权，往来于粤桂之间，执行清王朝交与的所谓"靖闾阎而绥边圉"的任务了。

岑春煊"剿粤"的倒行逆施



两广总督岑春煊

岑春煊在广州就任总督职刚十日，即从广州到梧州。进入广西后，首先抓的是三件事：

一是专电奏请起用"久官该省，治兵有纪，遇众有恩，军民至为悦服"的冯子材，替代"剿匪不力，治军无术，众论啧啧"的提督黄呈祥。希望"借其威望……收拾众心"。并且派专人赶往钦州，"要其来省"。同时以右江镇总兵丁槐"练悉外情，声闻亦著"，委以"边防一切专责"。[②] 但是，冯子材当时已经老病在身，到南宁不久就病死了。

二是向清王朝要钱、要枪、要兵。广西动乱多年，生产破坏，钱物两缺，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三。

②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起用冯子材、丁槐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45页。

人皆知之。岑春煊先是提出“在川库借支银二万两，备支薪饷等用”①。继又提出：“两广赈捐收数无几，请援照山东工赈案加收七项推广捐输，以济要需。”② 当时，有人以广西赌饷贻害地方，请与番摊、花会等一律予以严禁。岑春煊立即回奏说：“体察广西情形，边防裁兵万不可行。禁赌因无抵款，商矿成本较多，均拟暂从缓图。”这一切要求，清廷基本上都给予满足了。③ 至于兵械，岑春煊奏称：“广西需械甚急，请迅速解运上海制造局库存新毛瑟枪千余杆，每杆配足子弹一千颗；另添拨九响毛瑟枪子弹一百万颗，快枪二三千杆。”两日后，又请调湖北武建军8营来广西“助剿”。这些要求，清廷也都悉如所请。④ 但是，运送军械的寰泰号兵船在途中被碰沉，“所运军械全失”，而“粤东本无存械，近更空虚”。⑤

三是举办团练。7月20日（闰五月二十六日），岑春煊发出《晓谕西省绅民并办团练告示》，内称：“各属乱党，兵至则民，兵去则匪，非由地方绅民实行团练，不足以靖盗源。”因为“绅董各有身家，其自卫之心，视地方官为更迫。且地方官只有一人，而绅董则一呼百应；地方官深处衙斋，而绅董则日与民间相亲习；地方官身兼庶务，往往兼顾不遑，而绅董则可以专办一事，不致或作或辍”。所以他“责望绅董更切于地方官”。在组织上，他提出团总与理财者皆由公举，但各司其职而不兼任。办团练经费，或分资于有租之户；或商取于出货之场；或善举膏火，移缓救急；或庙会公款，酌盈济虚”。⑥ 岑春煊调动绅团势力与起义军作战，的确发挥了不小作用。

就在岑春煊处心积虑，谋划所谓“清剿”方略之际，广西的起义势力又

①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履新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32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八，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奏并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八、五一九，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同年七月初十日奏并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七，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二十九日谕。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九，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岑春煊电奏并清谕。

⑥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岭东日报》。

有了更大的发展。是年夏、秋之间，全省十一府两直隶州和两直隶厅，已无一片静土。仅据岑春煊、王之春与柯逢时的报告，6月以后，浔州至柳州，“游匪”甚多。柳州电报不通，“号令阻隔”。以永宁、雒容、融县交界之四十八岸为基地的覃老发，多次击败清军数营兵力的围攻，直至8月下旬始被敌人诱捕杀害。庆远、南丹、忻城一带，“匪极猖獗”，防兵多附城避贼，或者入扎城内；闻地方官有挈印出避者。南宁府的土忠州，太平府的永康州纷纷告急。广东绥靖军叛勇二百余，挟带枪炮、号衣，纠合广东钦州“土匪”六七百名，攻破土忠州各村，据城不去。义军头目王和顺、黄五肥、闭运培率大队人马在南宁“大肆劫掠，数郡震动”。入秋以后，所谓“尚称安谧”的桂林、平乐、梧州各府，也有“匪踪”出没了。省城南门外数里的斗鸡潭，距省城60里之六塘圩，以及永福县属之鹿寨地方，也都纷纷报警。其他州县，如“官势盛则皆民，匪势盛则皆匪”，真可谓“全省糜烂，悍匪纵横”，不可收拾。①

从所谓“匪源”说，则工农兵学商乃至官吏团绅，不乏与“匪”沾亲带故者。1903年夏初，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奏说广西情形时称：

> 粤匪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兵而匪者，商而匪者，官而匪者。与滇、黔接壤各地，几无人不匪。

岑春煊看了这份奏报以后，认为“语语皆真，字字可痛。其尤要者，则以诸将更始，与牧令更始两语”。② 当他回到广西，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他也说：

> （广西）当时有五匪之目，谓官匪、绅匪、兵匪、民匪、土匪也。聚此五匪，遂成全匪世界。③

① 参看《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以及《广西会党资料汇编》收录光绪二十九年的有关上谕和地方官吏的奏报，为免冗繁，恕不一一注明。

②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调武建军八营来桂助剿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55页；同年七月初九日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

③ 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四卷第五期。

为了解决广西早已形成的所谓“全匪世界”，岑春煊从“与诸将更始，与牧令更始”下手。认为：“惟有先除贪墨，一快人心，庶广西乱事早见转机。”他的“除贪”对象，首先是王之春和苏元春。各方对苏元春的参劾，前面已作介绍，无需多述。在1903年7月6日（闰五月十二日）参劾王之春的电奏中，岑春煊直指他“蒙蔽乖谬”，“有负国恩。且物议沸腾，怨声载道，使全省糜烂至此，该抚臣断难辞咎，非请旨另简贤员接替，无以平民怨而挽危机”。同时被参劾的还有“吏治民事，任其废弛”的布政使汤寿铭，“贿赂公行”、“赃私狼藉”的按察使蔡希贤，以及已革道员黄仁济，总兵申道发等。① 第二天，清廷根据岑春煊的电奏，下令将王之春、苏元春一并革职，以护理江西巡抚、江西布政使柯逢时为广西巡抚，未到任前由广东布政使丁体常暂行护理。7月8日，又调山西大同镇总兵刘光才为广西提督。② 据统计，在岑春煊直接负责广西“剿务”的一年又九个月中，被他参劾革职以至军前正法之大小文武官员共258员，其中府、道以上的高级官员32名。③

岑春煊在所谓大举“剿匪”之时，虽然也大举“剿官”，但并不能挽救积重难返的颓势。因为，诚如他自己所说，当时的广西，“民匪不分”、“兵匪不分”、“匪巢险固”与“山路分歧”，是他面临的四个难题。④ 这只是从军事着眼，并没有触及政治、经济和民心向背等深层次的问题。针对他所说的“四难”，他强调办团练、募亲兵和裁绿营的重要性。这些见解，和新任巡抚柯逢

---

① 电奏全文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49～450页。清谕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〇。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七；同年七月二十日谕：“苏元春纵匪殃民，所拟罪名尚属轻纵，著该（刑）部再行按律定拟具奏。”寻奏：“应按本例科断，合依监守自盗钱粮入已一千两以上者斩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见《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九。

③ 这是徐舸同志据《清德宗实录》中有关奏报及谕旨所作的统计，见《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14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④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

时的意见是一致的。①

烽火遍城乡，广西"满地红"

1904年（光绪三十年），起义继续向前发展，大小帮股的义军遍布全省各个州县。时人把这种起义的盛况说为"满地红"，或曰"遍地皆红"②。是年3月下旬，岑春煊在一份奏报中写道："广西游土各匪，往来窜扰，处处须防，处处须剿。勇营疲于奔命，而匪徒仍乘间焚劫，不能兜捕净尽。"③ 正反映了起义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首先是南宁、思恩两府及其周边地区的会党、游勇起义。

南宁、思恩和左、右江广大地区，多年以来，会党、游勇出没，地方造反势力蜂起，帮股盈百。④ 他们时分时合，游走性极强。当时，除王和顺、黄五肥、闭运培等为首的主要帮股外，还有黄大勤、陈二等各立大馆于宣化南面之珠山、巴阳山；又有韦特莱、韦桂枝、韦桂国等分踞宣化北面之大明山，自称天魔王、保国王和东鲁王，声势极盛。⑤ 1904年3月12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王和顺联络曾启初、陆四年、陆彩邦等部，围攻武缘县各处村圩，与左江镇丁槐率领的营兵多次交战，毙清军管带黄朝殷等，曾启初、陆四年也在战斗中牺牲。4月初旬，王和顺、黄五肥与潘二等聚众千余人，经武缘入隆安，沿途与清军对战多次，互有伤亡。黄五肥旋率所部自隆

---

①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三十年三月十九日柯逢时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一八六。

② 参看《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军事》中关于广西的《军事纪要》，以及岑春煊、柯逢时等人当年的奏报。

③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岑春煊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五。

④ 据徐舸同志从南宁、钦州等地26种地方志书以及《东方杂志》、《岭东日报》等刊物提供资料统计，1902年至1905年间，在宣化及其邻近地区活动的会党队伍，共计173股，其中仅宣化一地，即达41股，见《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⑤ 曾唯儒：《武鸣县志》卷十，《前事考》。

安南下，转战永康州。丁槐饬知州沈仕彦，绥远军统领和廷彪，水师统领余炳忠等分兵八路，围攻黄五肥所据山区。“黄五肥乘夜率伙逸出，窜至永康桥西二里之藏狗洞岭下，为永康团练击毙”①，部众散入十万大山。丁槐与广东军联合围攻。义军弹尽粮绝，结果，“饿死者以千数，擒斩者以千数，就抚者亦以千数”。6月，丁槐宣告“左江渐告肃清”②。王和顺自隆安突围后，转与滕正宜部联合，纵横于武缘、土忠州等地，与清军激战多次，颇有斩获。此后，即转战于宣化、武缘、宾州、上林各州县，与柳、庆各地义军相呼应。

桂东的形势也颇值得注意。

梧州府属之怀集县，与广东广宁及肇庆毗连。1904年春夏之交，怀集会党分据村庄，声言攻城。9月中旬，会党首领植亚养联盟拜会于诗洞地方，继即围攻县城及勇役驻扎之厂卡。义军愈聚愈众，攻村破寨。广东开建、广宁各邑纷纷戒严。③ 桂东北之全州、灌阳、兴安各地，入夏以后亦见形势紧张。清廷立命提督刘光才率湖北新军入驻全州。旋以宝庆、靖县一带更形吃紧，又以刘光才兼扼宝、靖一路，“借资镇压”④。黔桂边区，义军驰骋出没，而防兵单薄。清廷急命岑春煊、柯逢时、曹鸿勋等统筹兼顾，严防黔桂接壤各处。⑤ 百色、镇边、西林各地，“贼势浩大，众辄数千”。云南派军6营入桂“助剿”，军中先后发生兵勇叛变，枪毙帮带，“索取旧欠，打单银两”等事件。⑥ 边关龙州，此时“伏莽尚多”。岑春煊欲调军入内地“助剿”，亦被

---

① 岑春煊、柯逢时《会奏剿办左江贼匪折》，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军事》；引文见曾瓶山：《同正县志》卷八，《人事》。

② 岑春煊：《剿办思恩府属及柳庆南境土匪迭获著要折》，见《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五期《军事》；引文见黄步青：《上思县志》卷五，《纪事志·兵戈》。

③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五、第十一期，《军事》。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二、五三六，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七日，同年十月十三、二十六日谕。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三，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二日谕。

⑥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振铎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〇。

清廷制止。①

1904年的“柳州兵变”

1904年，陆亚发、黄留芝和梁桂才领导的柳州兵变，震动最大。它把广西会党游勇起义推向了高峰。

陆亚发籍隶宣化县，与黄留芝、梁桂才等皆为山堂首领人物，各自聚党活跃于南宁、思恩、泗城以及百色等地，彼此时分时合，逐步从滇、黔、桂边向庆远、柳州府属州县转移。1903年4月，南丹土州被占；6月，东兰州城被攻破，都是他们的队伍干的。其后，又都因与清军作战失利或其他原因，接受了敌人的招抚，并分别充当清军绍字各营的管带，驻防柳州。②

在此之前，清军杀降之事时有所闻。如1903年8月署右江道员王芝祥之杀害梁果舟；同年10月署左江道员柴照先之杀害黄飞凤；以及同年11月署柳州知府祖绳武之杀害覃老发③ 等等。这就难免使陆亚发等人常怀戒备之心。



清廷就柳州清军绍字各营之哗变惩治官员等事致岑春煊电旨

1904年，驻守柳州的绍字各营清军奉调往广东接收新枪，并定于6月24日（五月十一日）启程。陆亚发、梁桂才等深恐此乃官府“调虎离山”，借换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五，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四日谕。

② 陆亚发于1903年9月在融县三防作战失利，接受招抚。

③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岑春煊《擒斩覃老发肃清四十八弄电》，见《广西会党资料汇编》，466页。

取新枪之名，行缴械杀降之实的阴谋。是以一再向祖绳武陈述请勿东调的意见，但皆被拒绝。于是，决定发动兵变以抗命。

24日清晨，陆亚发、梁桂才、黄留芝率领绍字左营、中营和先锋营分路出动，捣毁电报局，切断电讯联系；毁监释放所有囚徒，武装进攻马平县、柳州府和右江道衙门。新上任的右江道员褚兴周闻讯先逃，而清军统领祖绳武与合城文武官员则多被拘禁。库存现银20万两，以及清军大炮10余门，毛瑟枪5000余杆，子弹60箱，全成了变兵的战利品。陆亚发、梁桂才劝祖绳武反正不得，放他出城。祖绳武因畏失职罪，行至沙湾自尽。

柳州兵变既起，府城被占，原与兵变多有往来的府、道衙门守兵，以及护商的广胜军纷纷倒戈，加入造反的行列。府属各州县以及庆远各地的山堂兄弟、散勇、土股，也乘机崛起，或率队来归，或原地呼应，数日之间，兵变队伍众至五六千人。28日，陆亚发、梁桂才、黄留芝以及广胜军统领黄庆扬（清方文书多作白毛七），各率所部主动撤出柳州城，向柳城方向转移。清军防范既疏，柳城被占的消息一日数传。清廷接获柳州兵变、府城失守的消息，先是将祖绳武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继又以祖绳武贻误大局，着即军前正法。① 署柳州知府陈嵩澧、署马平县知县向泾革职留任，戴罪立功。②待探明柳城被破为讹传，变兵已分路从柳北向外进击了。

黄庆扬率领的原广胜军，在地方帮股的配合下，从柳城大埔北上。7月中旬，连占融县大坡、浮石、长安等圩镇。月底，破怀远县城及梅寨司等地，直逼贵州的丙妹、丙梅。融江沿河村寨，皆为变兵所有。③ 由欧四、褚大率领的义军，则从柳城向庆远府属的思恩县前进。数月之前，怀远县城曾一度被地方帮股攻占。欧四、褚大从县城率众进驻县北的五十二峒，与贵州起义势力相呼应。陆亚发自率变兵主力从柳城县东泉圩东出，在地方会党势力的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一，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二十日谕。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一，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二，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初八日谕。

配合下，于7月初攻占永宁州的三湟圩，省城戒严。[①] 变兵从三湟直入柳州与桂林两府交界的四十八岽，这是覃老发活动的老基地。全境青山蟠屈300余里，峒口无数，与永福、柳城、融县、雒容处处可通。自覃老发败亡以后，“游土各匪盘踞其中者，尚不可缕数。乘间出扰，劫案无数，凡近峒之村，无人不入其会，潜为供给粮食，侦探官兵踪迹。互相煽惑，勾窜益多”[②]。说明陆亚发所据的四十八岽，具有较好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

陆亚发、黄庆扬、欧四等各自率队转战柳州、庆远、桂林三府交界之区以后，各地土股数十部与之联络，势力“蔓延数百里”。仅在鹿寨三板一地，从者多达万余人。[③] 如何对付这些风起云涌的起义队伍，成了封建统治者面临的大问题。1904年初，广西全省兵力，据岑春煊奏报，仅有马战兵257名，步战兵2020名，守兵3181名。他们散驻各地，疲弱者甚多，而且饷粮不济，要应付如此局势，实非易事。有人提出裁汰各标营兵，而以各府、州、县自募亲兵接替。但岁需饷械约银60万两，根本无法筹措。于是，奏请裁撤新设之柳庆镇总兵，将原驻百色之右江镇总兵移驻柳州。两镇镇标官兵除酌留游击、千总各1名，马兵10名，步兵各16名外，其余一律裁撤，腾出之款拨作各州、县亲兵饷需。[④] 此议得到清廷的批准。

同年5月初旬，全省共募亲兵8000余名，购买与拨解毛瑟枪8000余杆，配弹120余万发。并饬令全省各属依照丁槐在龙州建造碉堡，利用火器防守的办法，“以清内奸而御外祸”。又因漓江、左江、右江与梧州大河各处，常有勇丁“与匪潜通，接济军火，勾串劫掠”，以致“河道梗塞，非特商贾裹足，税课无征，而转运阻滞，于军务大有关碍”。于是，奏请恢复水师五军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一，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谕；《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杂俎》记载：7月25日（六月十三日），永福县被攻破。但官文书未见记载，并列此以待考。

② 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日柯逢时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八。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三，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十三日谕。

④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岑春煊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五。

制，在漓江、浔江、柳江以及左、右两江，分别设置中、前、左、右、后五军汛地，各按水程长短，定师船与水勇官兵之多寡，“划分地段，各专责成”。综计水师共船158号，官兵2088名。① 是为全省水路的攻剿设防。

由于广西问题丛集，“剿办”十分棘手，是以有关各省督抚互相推诿，彼此矛盾重重。5月下旬，岑春煊以“病势不支”，奏请清廷准予开缺总督职务。清廷下令“着不准行”。② 数日后，即以贵州巡抚李经羲与广西巡抚柯逢时对调。但李经羲托病请假不就。而岑春煊又以“广西地方重要，请将柯逢时暂缓调黔”③。结果，受到清廷的申斥，指出：“如再各存意见，借词推诿，厥咎维均，不能为该督抚宽也。”④ 广西“剿务”，仍责成岑春煊、柯逢时负责，并令岑春煊“暂驻梧州，居中调度”。随又令他“仍赴桂、柳，妥为布置，严饬各军迅速剿办”。并下令各省调兵来桂“助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到10月下旬，广西境内的主客军共达120营15旗又13哨。因为这时左江以及各沿边地区已相对平静，所以岑春煊以80余营清军驻扎在柳州、庆远和桂林府部分地区，其主要目的显然是集中优势兵力，镇压驰骋于三府之间的变兵和其他起义队伍。⑤ 其具体部署是：

以右江道员龙济光自率一军，从百色、凌云沿黔、桂边东出，进驻怀远，

---

①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柯逢时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六。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九，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九，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六、二十一、二十二日谕。

④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〇，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五日谕。又：同年七月初八日谕，据柯逢时奏称：岑春煊抵桂后，“专以调忠毅军剿庆远，责黄忠立剿峒匪，而自与司、道挟优宴饮，至灌醉统领忠毅军江瑞阊等语。当此时间，该省地方糜烂，生民惨遭荼毒，深宫宵旰优劳，寝食为之不安。该署督与司、道等如此行为，试问于心何忍？着岑春煊明白回奏。至柯逢时以遇事牵制，请派员护理抚篆，免致贻误等语，显系意存规避，希图诿卸，着不准行”。见《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三，说明岑春煊与柯逢时的矛盾也已十分尖锐了。

⑤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军事》中之《九月份广西防剿主客各军表》。

进攻五十二峒黄庆扬义军，并拦截北出贵州通道；

以丁槐率军从南宁、武缘北上柳州，进驻罗城、融县，从正面向义军发起进攻；以道员王芝祥节制柳、庆主客各军，兼及各州、县清乡事宜。①

9月，丁槐率军从南宁、武缘北上宾州，至来宾和迁江时，都受到黄飞龙、滕正宜义军的迎头痛击。来宾松柏村一战，彼此相持三昼夜。黄飞龙、滕正宜皆不幸战死。丁槐得以乘机进攻庆远府属之忻城。复兵分四路，十余日间，攻破义军驻地20余处。从此，丁槐军与龙济光军南北呼应，全力进攻陆亚发之四十八岸。8月中旬，清军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陆亚发大本营所在之油麻峒。21日，清军水师游击宋尚志、已革总兵杨发贵分兵四路，猛扑义军防地。陆亚发在战斗中肩背被伤，冒死突围。12月2日，被中渡团总张振德俘虏，解往桂林。7日，被岑春煊凌迟处死，并“传首柳州示众”②。

陆亚发败亡以后，原在柳州、庆远活动的各路义军纷纷转入贵州，数以万计。③ 历时十年的广西会党、游勇起义，从此步入低潮。1905年2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岑春煊奏称：“广西大致肃清。”同年10月19日（九月二十一日)，岑春煊又报称：“广西全省股匪一律肃清。”④

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就在陆亚发被处决以后的几年间，柳州、梧州、浔州、思恩、南宁、镇安、平乐以及郁林州等地，依旧是“处处有匪”。被封建统治者目为“巨匪”的王和顺，仍旧在宣化联络其他帮股坚持斗争。封建统治者曾设法对他进行“招抚”，而他“视伪命如粪土”。清廷传谕右江各属，有能将王和顺“生擒解交者，赏给花红银一万金；如能将其击毙者，

---

①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岑春煊奏，分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〇、一九二。又参《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二、五三三，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初二日谕。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军事》；《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七，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谕。又：陆亚发被俘及处决日期，据《广西人民起义资料》第三册，265页；徐舸：《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八，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曹鸿勋奏并谕。

④ 分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一、一九六。

赏花红银八千金”。[1] 但终不可得。1904年冬，王和顺秘密转入越南。不久，在河内参加了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从单纯农民战争的地区首领，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士。王和顺的这个转变，也反映了广西旧式农民战争的结束。从此，农民的反抗斗争，都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缘了。[2]

五、大起义的教训、特点和影响

起义的教训

清末广西的会党、游勇大起义，跨越两个世纪，历时整整十年，先后出现两次高峰。虽说是“遍地皆红”，轰轰烈烈，但仍难避免失败的命运。究其原因，则可细述者甚多。总而言之，又不外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考察，敌方兵多将广，装备优良。以兵数言，清廷抽调两广、云贵、两湖以及安徽等省兵力，合计120余营，辅以州县亲兵，地主团练，参与作战者当在10万人以上。兵勇流动“攻剿”，亲兵、团练坐地防御；处处

---

① 参看《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期至第五卷第四期有关广西《军事纪要》部分。“招抚”事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三册《王和顺防城起义文告》，台湾，1964年。

② 广西会党起义失败以后，有人谈中国秘密会党史说：1904年，黄兴曾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密谋，派人入广西联络各地会党首领。不久，陆亚发在柳州起义，也急告马福益在湖南起义响应。其结语则说：“以上哥老会之历史，三合会之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论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中国秘密会党记》。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些，但他说明自清末广西会党起义后，秘密会党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合的大趋势。

修建碉垒，实行坚壁清野，尤重剥夺义军武装。[①] 用“剿”与“抚”两手对义军进行屠杀、分化，是以从总的实力与策略对比中占了上风。

从起义者的主观方面考察，则问题甚多。首先是在起义大高涨时期，大小帮股虽说遍布全省各地，[②] 但彼此互不统属，直若一盘散沙，到处游走。而且构成的分子非常复杂，除农民、手工业者外，还有游民无产者、散兵游勇、团绅吏役等等。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汉、壮、苗、瑶、侗等各个民族，又有桂、粤、滇、黔、湘等各个不同省区，还有广帮、客帮、土帮等区别。这种多、散、杂、游的组织和行动状态，既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弱点。论者多谓清末广西会党起义，有南宁、柳州两个中心，或云南宁、柳州、郁林与桂、滇、黔三省边区四个中心。[③] 这主要是从地域划分而言的。从组织的统属和行动的指挥调度而论，哪一个地区的起义队伍都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号令各方的、强有力的中心。前期的郁林州李立廷等的起义，事前虽然互相有过联系，但在实际行动中仍旧是各有主意，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因此也就无法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反而在逆境时被敌人用软的或硬的手法各个击破，终于难免失败的命运。20世纪初期的各地起义，其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是起义者没有、也不能提出一个明确、适时的斗争口号，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团结战斗。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述和知情老人的回忆，当时的会

---

①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岑春煊奏：“广西各属办匪，以夺获枪枝，严杜接济军火为要策，尤以兼筹教养为先务。”同年七月初九日给事中熙麟奏：“广西匪势已张，请饬认真举办坚壁清野。”分见《清德宗实录》卷五二六、五三三。

② 徐舸同志在《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中，根据清方官书，地方志书以及当年报刊记载进行统计，1896 年至 1898 年，广西已有 24 个州县发生“匪乱”。1898 年李立廷起义时，北流、陆川及郁林即有会党 16 帮。南宁地区王和顺、黄五肥等天地会起义时，共有会党武装 173 股。1902 年至 1905 年，柳州、庆远地区有会党武装 198 股。

③ 前者如来新夏：《试论光绪末年的广西人民大起义》，见《历史研究》1957（11）；后者如徐舸：《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党组织，歃血结盟时的问答是："杀得光绪皇帝冇?"答词是："杀得。"平日的口号则依旧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和"劫富济贫"一套老调子。[①]个别地区的个别帮股，也提出过"上等之人欠我钱"一类歌谣式的口号。[②]实质上都是照抄19世纪中叶会党起义的老文章，并无新鲜内容。"反清"不过是反地方官府；[③]"复明"指何物，许多人并不知道。"劫富"则多"济己"而已。还有个别会党首领提出"先打柳州，再上桂林，就进北京，然后回来安民"之说。[④]苍梧、横州、宣化、武缘、武宣、象州、宜山、百色等地的会党，还传唱了一首"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的歌谣，[⑤]也是说说唱唱而已。谁也没有想过要用实践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广大平民百姓的"通匪"、"济匪"或"转红（洪）"，多是在动乱中"且求自保"罢了。[⑥]目标不明确，对事无共识，又哪来统一的行动和克敌制胜的力量?

起义的特点

至于清末广西会党大起义的特点，除了前述的在组织与行动中的多、杂、散、游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如果把它的兴起与发展和19世纪中叶的广西会党起义比较，则19

---

① 林宝航：《广西的游勇》，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② 如陆亚发兵变在恩恩县提出："上户是我冤，中户住安然，穷人跟我去，转来要分田。"义军首领黄龙廷提出"上等之人少我钱，中等之人不敢言，下等之人跟我去，取只水牛归种田"等。见《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135页。

③ 黄诚沅：《隆安县志》卷四《前事考》记当年会党拜台时，会首发问："杀得光绪帝冇?"之后，继即问："杀得（知县）李家彬冇？杀得（团总）何其爵冇?"岑启沃《田西县志》第七编《前事》记：当地会党拜台，先问："杀得光绪帝冇?"众皆肯定回答毕，继即问："杀得（左江镇总兵）陈一山冇？杀得（边防军统领）陆荣廷冇?"

④ 龙月卿：《关于刘三金与梁才、韦四的事件》。

⑤ 参看拙文：《一首被误解的会党歌谣》，见《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⑥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岑春煊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一。

世纪中叶的会党起义，主要集中在浔州，柳州、庆远、桂林、梧州和郁林州以东的桂东地区，并由东向西逐步扩展。这与鸦片战争的影响和太平国起义的推动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广西会党起义则相反，它集中在南宁、思恩、太平、泗城、百色和郁林州以西的桂西地区，并由西逐步向东扩展。这和中法战争的震动以及战后法国侵略势力迅速进入桂西地区有密切联系。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势力的侵入，促使会党起义又有杀"洋官"、洋教士的举动，个别地区的会党帮股在自己发布的"告示"中，提出"敢破番鬼大清"的豪言壮语。[①] 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特点。

其次是这时的会党起义，妇女参与特别踊跃，直接拿起刀枪冲杀在第一线的"女匪"、女首领随处皆有。如果把这时的会党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相比较，则它的组织纪律、纲领口号远逊于太平天国，亦无"巨憝大奸如金田洪杨之比"。[②] 但是，若论妇女参与斗争，则又远胜于太平天国及其同时期的会党起义。[③]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广西会党大起义，以妇女为主的队伍共有50余支，其中有姓氏可查者达32支，计南宁府3支，思恩府6支，浔州5支，柳州府10支，庆远府5支，梧州府和百色、钦州各1支。[④] 她们之中，尤以柳州府柳城县的黄九姑，思恩府白山司的韦五嫂和都安县的覃伍氏等为最著。黄九姑所率部众，内"有苗妇千余"，驰骋于柳州、庆远、桂林三府之间，专杀"麻风头"，"不掠百姓"，时人誉为"女雄黄九姑"。韦五嫂率众起义后，三攻土司衙门，转战武缘、宣化各地，曾与滕正宜、王和顺等联合作战，至死不屈。覃伍氏因丈夫被官兵杀害，忿起造反，自称"统领伍后"，高擎"代夫报仇"大旗。每临战，则"骑马背枪，手执大刀，押阵督战"，真是山堂巾

① 藤县《会党布告》，藤县沙村卢天杰藏。转引自《清末广西会党风云录》。
②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周树模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七九。
③ 参看拙文《广西妇女与会党起义》，见《学术论坛》，1988（6）。
④ 《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111～112页。

帼，不让须眉。[1]

清末广西会党起义，其兴起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失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始终与义和团运动遥相呼应，可以说是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仍旧属于单纯的农民起义，但是，有些帮股或者他们的首领人物，已经开始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发生联系，预示着近代中国单纯农民战争的终结。这又是清末广西会党起义的特殊之处。

起义的影响

清末广西会党、游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十年斗争，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仅1903年至1904年，清方兵勇伤亡以万计，五品军功以上官员被杀者逾120人，[2] 团练乡绅被杀者未计。1905年11月2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岑春煊奏称："自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各军办理西匪起，截至三十一年九月止，所用薪水、军火、杂支等项，先后支款三百八十六万余两。"[3] 这仅是岑春煊负责广西军务两年又四个月的军事开支。如果计算十年用兵支出的总账，则数倍于这个数目，当无疑义。军队与财政是支撑封建王朝的两大支柱。清王朝在镇压起义中损兵折将，虚耗钱粮，则其统治基础也就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又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已经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者，这时的清王朝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4]。所以，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也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有力冲击。

尤其重要的是，清末广西的会党大起义，促使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感到有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康有为从广西会党起义中看到社会矛盾的严重，向皇帝上书要求迅速进行变法，已于前述。1905所10月，岑春煊奏报广西"全省一律肃清"以后的善后问题

---

① 为免冗繁，恕不一一注明，参见拙文《广西妇女与会党起义》。

② 《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七。

④ 陈天华：《猛回头》，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二），151页。

时，也明确提出，必须“振实业以厚民生，设学校以开民智，兴养立教，尤善后之大端，应由抚臣随时切实筹办，以仰副朝廷眷顾南服之至意”。清廷从巩固垂危的统治出发，对奏报的批示说：

> 现在善后事宜，尤关紧要，全在地方文武兴养立教，除暴安良。着责成该省巡抚，督率各员认真整顿，切实筹办，随时考查，能尽心民事，力行实政者，即予从优保奖；其奉行不力之员，亦即据实奏参，务期吏治营务，日有起色，以安民生而绥疆圉。①

由此可知，双手沾满维新志士鲜血的封建统治者，所以在短短几年后也叫嚷要开新学、行新政、办实业，是同人民反抗浪潮的日益高涨有关的。

因在海外兴办工商实业成绩优异而致仕的张振勋，1904年12月应西太后和光绪帝之召，回答有关“招徕华商，振兴商务”问题。他在全面陈述了如何在中国招徕华商、洋股，兴办农工路矿之后，特别提到两广，尤其是广西的问题。他说：

> ……抑更有请者，广西土匪已成蔓延，广东一带，盗风日炽一日。推原其故，皆由地多旷土，民无教养。今日治两广者，筹的饷，练劲兵，以顾目前之急，不得不然。而振勋以为，开垦种植者，默化未成之匪也；教习工艺者，隐散匪之羽党也。故言商务于闽、广入手，不得仅谓善后之策也。②

这是实业界人士经历人民起义以后，面对社会动荡作出的反映。

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却在清末广西会党、游勇大起义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所在。1903年5月，章炳麟写成著名的《驳康有为书》，批评了康有为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散布的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立宪的观点。章炳麟在极论革命的重要性时，就提到了清末广西的会党大起义，认为它在“反满”问题上不但有胜于其前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六。

②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商部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〇。张振勋当时得到“候补三品京堂”衔。

的义和团运动和唐才常勤王起兵等等，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先驱作用。[①] 1904年，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的著名论文，他不但重视当时的广西会党大起义，而且对它所发挥的作用给予更为具体的肯定。他写道：

> ……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器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质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末，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②]

清末的广西会党起义，虽然不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把腐朽的清王朝推翻，但它却激励了来者，鼓舞他们为追求中国的富强前途而百折不挠地前进！

---

① 《驳康有为书》通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初发表在《黄帝魂》，以后出版单行本，全文8000余字，称赞"革命是补泻兼备的良药"，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② 论文初稿用英文撰写，成稿于1904年8月31日，原题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s,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后经改译为今题，此处所引乃据改译之文稿，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第十二章　收回利权，振兴实业

当广西的会党起义逐步走向失败的时候，一些开明的官绅、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股收回利权，振兴实业的爱国热潮。这是在19世纪下叶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我国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直接表现，也是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运动的新高涨。这场运动，不但遍及全国许多省区，而且还有海外的广大华侨参与斗争。广西的举动虽然只是全国反帝爱国大潮中的一道波澜，而从此之后，在农业、工业、矿业、交通、商贸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却出现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新事物、新气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一、收回路权和倡建铁路

兴建铁路的呼吁

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震动下，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各种利权，大

力兴办各种实业，以图富国强兵，成了举国上下、朝野之间的共同要求。1895年7月19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清廷发布了一道诏谕，正集中反映了这种愿望。内中说：

>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同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旧习，力行实业为先。迭据内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着各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分晰复奏。①

在内外臣工条陈而经皇帝“采择施行”的各项时务中，“修铁路”成了“力行实政”的第一条。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大肆攫取路权，利用铁路进行侵略，使我国一些具有先进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官吏逐步认识到，筑路和拥有铁路对一个国家富强的重要性。1894年冬，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议论》中提出“开铁路以振百为”之说。“何以言开铁路以振百为也？事有一着即行，则着着皆因之而兴；一着不行，则着着皆因之废者，今之铁路是也。”② 第二年5月2日（四月初八日），康有为在《上皇帝第二书》中，具体陈明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士庶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语言，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1898年秋，康有为更提出“废漕运，改以漕款筑铁路”的主张。③

与清廷发布上述上谕的同时或稍后，张之洞、胡燏芬、刘坤一等也都奏请从速修建铁路。张之洞认为，日本变法20年，国势已与各大国抗衡。“寻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三六九。
② 《新政真诠》第二编。
③ 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① 胡燏芬于1895年7月上《变法自强疏》，力主"开铁路以利转输"，并具体建议劝立公司以招股本，勘明道里，先筑芦汉路；多开支路，以利贸易；议定规制，择其至便至捷者为之。"今日富强之道，计无有切于此者。"② 同年8月10日（六月二十日），刘坤一更上专折奏请设立铁路公司，借款开办铁路的主张。他说："时至今日，谈国是者莫不以富强为要图，顾非富无以致强，非强无以保富。而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③

在上述诸人的议论中，虽然没有谁明确提出收回路权的问题，但强调铁路自办，而非任由他国兴办，内中就有个主权谁属的大原则。

在收回利权、兴办实业风潮的推动下，广西有识之士结合乡土实际，也逐步认识到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的重要性。如下的一段议论，就颇有代表性：

> 夫当此交通时代，铁路为国家命脉，关系重大，稍谈时事者，皆能知之。我广西虽素称地瘠民贫，风气闭塞。然平心而论，民贫则有之，地瘠则未也。盖我广西虽非膏腴平衍之地，而森林茂盛，物产丰富，只以交通不便，无以运输，一切货物，皆广弃无用。按广西之时势，谋广西之富强，舍办铁路外，实别无办法。况乎我广西入于法国之势力范围，彼之欲以铁路侵夺我广西者，已非一日。虽因条件未成，长虑却顾未敢遽发，而虎视眈眈，无一日或息。我广西之危，其要点实在铁路。际此时局逼迫，急于燃眉，若犹迟疑观望，不思挽救，是真无心肝者矣！④

说明兴修铁路，维护国权，已是朝野上下一致的要求。

---

① 《张文襄公（之洞）奏稿》卷二四。
②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一，宣统元年本。
③ 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四，3319页，宣统元年本。
④ 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广西谘议局第四次报告书》。

中法修建龙州铁路的争辩

广西境内的铁路建筑权主要被法国所攫取。中法最初拟建的是龙州铁路。在筹办的过程中，双方反复进行争辩，最后并没有修成。

争辩的第一个问题是：越南铁路应接至中国境内何处？此点在中法《续订商约》中并没有明确。法国的解释是可以接至龙州，也可以接至南宁和百色。而中国只同意从越南同登接至龙州，全长150里。经过半年多的“屡次辩驳”，法国终于表示同意。于是，具奏请示，清廷颁旨允行，并命广西巡抚史念祖设局开办，以广西提督苏元春为督办，知府唐际清为帮办，由中国自造，用法国工料。

争辩的第二个问题是铁路轨度的宽窄。法国提出“铁轨宽窄，须与越南铁轨一迈当相同，以便衔接”。中国总理衙门认为，中国铁路“酌定轨宽四尺八寸五分”，已为全国成式。且“环球通例，一国之内，轨度无异。此次龙州铁路，自应统归一律，不得参差；且于中越边境，方能划清界线”。事实上，铁路轨度的宽窄，不仅利于通行全国，而且还有国防安全的考虑。

争辩的第三个问题是估定铁路造价。按照苏元春、唐际清与法国费务林公司商定的合同，勘路、造路均由该公司负责。1898年，勘路工作完成，费务林公司第一次提出筑路估单合为库平银549.2万余两。旋又借口改变图纸，加至601.9万两。苏元春以估价太大，核减为264万余两。后依合同请中公断，订为599万余两。清政府以工价究嫌过昂，而“库款支绌，难以筹应”；但合同已经订立，势难中止。乃令苏元春与法方“商改做法，另议价值”。第二年9月15日，双方订立合同十条，主要是宽轨改为窄轨，包办工价总在320万两左右，以及铁路修建中的各项支付办法。[①]

合同画押以后，即在龙州征地动工。但是，因为经费困难，进展十分缓

①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总理衙门对龙州铁路的修建始末写了奏报，并附所订合同，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〇。关于宽轨改为窄轨问题，论者有谓出于苏元春的妥协，不确。实际出于降低铁路造价的考虑。



1896年建的龙州火车站（后被法国占作驻龙州领事馆）

慢。而法国当时并无能力与英国在华南进行竞争，原来修筑龙州铁路以分西江航运之利的构想并无把握。而早在1898年4月，中法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法国取得了从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建铁路的允诺。于是，转把希望寄托于滇越铁路的修建上。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以后，龙州铁路的修筑工程遂告停止。所以，从1896年9月至1900年7月（光绪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六年六月），三年零十一个月内，只建造了督办铁路官局、车站、码头、货栈与护勇棚等工程，并未修成尺寸铁路。① 1910年2月（清宣统二年正月），法国向清政府重提修建龙州铁路的新办法。② 但第二年中国就发生了辛亥革命，而且收回路权，归民承办，早已形成强大的群众呼声。法国此议也就无法再议了。

自办铁路的筹划

广西民办铁路之议，始于1906年秋间（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是时，在安徽、江西、四川、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绅商合力筹办铁路，保护利权的风气推动下，广西官绅、内阁侍读陆嘉晋，内阁候补侍读梁济等68人，联名奏请自办广西铁路，并拟先集股款1000万元，设立广西全省有限公司，公举广东提学使于式枚为总理，候补四品京堂左宗蕃为协理，主持公司事务。计划建筑路线为：桂林至全州以达于湘，下至梧州以达于粤为一段。此议得到工部左侍郎唐景崇的鼎力支持。同年9月5日（七月十七日），即获得清廷的批

① 光绪二十七年苏元春奏，参看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483～484页。

② 《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9页。

准，依所议而行。①

此后不久，广西留日学生也提出了筹办全省铁路的洋洋四千余言的“刍议”。他们从发展商业与增强国防两大目的出发，提出创办铁路应以商办为主，在三江总汇之梧州设立全省铁路有限总公司；慎选人才，成立执行部、监察部与董事局以及股东总会。注意发扬管理民主，用股票、募债、公利、地方及官债诸方式筹集路款。并以筹得的部分路款先行就近开采矿产，“以矿利养铁路”。至于路线，则明确提出修筑龙贵铁路与横贵铁路的建议。前者从贵县至龙州，是为第一线；后者从横州经郁林出广东北海，是为第二线。建筑两线之目光，专注于对付法国之军事侵略与商务扩张。② 不久，在日本东京的广西留学生又上书清政府，强烈要求废除所有出卖路权的条约。③ 1907年，有人在谴责清政府出卖西江警察权的同时，对清廷“路权可赎而不赎，矿权可废而不废，外债可已而不已”的忍让、出卖行径提出了严厉的谴责。④

绅商集资筑路之议提出之后，各有关代表开会集议多次，迄无头绪。直至1907年3月（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众“同乡京官”始“投筒公举”梁廷栋为协理。不久，于式枚升授邮传部侍郎，未便遥领广西路事，筹备筑路各事转由梁廷栋主持。7月24日（六月十五日），在桂林先设商办铁路办事公所。8月16日（七月初八日），又在梧州设立办事公所。一面制定招股办法，筹集筑路经费；一面征询各方意见，拟订路线，并请定商办期限为99年。修筑路线定为五条，即：桂（林）全（州）铁路，贵（县）博（白）铁路，梧（州）邕（宁）铁路（中经桂平大湟江口），邕（宁）龙（州）铁路和邕宁至云南的

①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第三册，1135～1136页。又参《广西谘议局第三次报告书》正编。

② 《广西留日学生筹办广西全省铁路刍议》，见《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期，《交通》。

③ 《本省留日同人上外务部书》，载《粤西》杂志第二号，1907年11月创刊于东京。

④ 雷霆声：《论西江警察权之关系及收回之办法》，载《粤西》杂志第二号。

邕滇铁路。①

绅商筹办铁路之议虽开，建路公所虽设，修造路线虽有，但筹办过程中问题甚多，困难重重。

首先是线路之争。各绅会议，本主先筑梧贵铁路，继建邕龙铁路，而浔州、郁林人士反对，借口“抱定防患政策”，主张先筑贵博铁路，而南宁代表则倡议先筑邕北铁路。由于何路先筑争议纷纭，以至历时四年，线路未勘，先筑何段？路经何处？亦悬而难决。②

第二是招股筹款进展极缓。即以众人瞩望之梧邕铁路而论，据《商办梧邕铁路招股章程》规定：拟集股本450万元，计分90万股，每股5元。但从1907年至1910年，招得股数不足10万。由于筹办“卒无起色”，梁廷栋只好建议“裁撤公所，另筹办法”。于是，在1910年9月（宣统二年八月），梧州、浔州、南宁三府代表集议梧州，总结了数年来修路迄无进展的原因，主要在于“团体涣散，财力薄弱”。前者表现在“争执路线，意见歧异”；后者则由于“规划宽泛，需用浩大”。决议在梧州成立广西梧邕铁路公所，公举苍梧周之济为所长，平南覃光华及广东黄凝翰为副所长，常川驻所办事。11月，请广东钟植生为工程师，正式规划预算，先行勘测梧州至桂平大湟江口线路，按部章四尺八寸宽轨设计。1911年初提出了《商办梧邕铁路招股章程》，其中有几点颇值一谈。

《章程》第三条规定：“所集股本，专收华股，不收外国人股本。如有为外国人代购股票及将股票售卖给外国人者，概不承认。”在帝国主义列强借筑路进行侵略扩张的历史条件下，明显地反映了抵制外资入侵，维护民族利权

---

① 关于1906年至1910年广西筹办铁路的议论、章程、经过等情，主要据《广西谘议局第三次报告书》和《广西谘议局第四次报告书》，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四卷各期《交通》部分的有关记载。

② 雷沛鸿在《辛亥革命的回忆》中说，1908～1909年多次在桂林召开筹建铁路会议时，也有先筑桂全铁路、梧三（水）铁路和邕北、邕龙铁路三派主张。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

的愿望。和1903年冬清廷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处处华股与洋股并提，明令“地方官均应一体保护”洋股有所不同。

《章程》第五条规定：“凡附股者统谓之商股，无论有无官职，均视为股东；所有各项权利，一律从同。”这是否认官职而尊重商股，为一般的绅商争权、保权。

《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凡认一千股以上者有总、协理之资格，二千股以上者有管理银钱之资格；百股以上者有干事及议员之资格；虽非自购而为个人经手募集如上各数者，其资格同。”这是鼓励多集股者，维护大股东在建路事务中的管理权和发言权。

以上几点，为当时的广西兴办铁路涂上了鲜明的民营与商办色彩。

梧邕铁路的修筑虽然有了转机，但不到一年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全国政局大变，广西筑路之议也从此陷于停顿了。

再说桂全铁路。

1907年，桂全铁路公所成立，旋即着手征集筑路经费。据广西巡抚张鸣岐于1909年初奏报，桂全线全长300里，约需经费600万两，“已于本省岁入各款，预为节缩，凑集银二百万两，以备全数拨用；再分年设筹一百万两，凑足三百万两，作为官款。其余二百万两，拟分招商股；倘商股实在不能足数，或更仿以地代股，以工代股之法。总期全路能成为止”①。

1909年5月19日(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张鸣岐与英国葆林公司签订《桂林全州铁路测勘合同》,订明以英金3400镑,由葆林公司聘用头等工程司两名,担任测勘从桂林至黄沙河一段线路,于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到达桂林,开始工作,否则合同作废。② 为了筑路工程从速进行,张鸣岐还拟招聘挪威人劳云祥为桂全铁路修建顾问,但因此事“未经议绅议决”,遭谘议局反对而作罢。③

当时广西官方如张鸣岐等人，所以认定修建桂全路应先于梧邕或其他铁

①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九，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三日谕并奏。

②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

③ 据《广西谘议局第三次报告书》丙编。

路，主要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桂全路总长不及梧邕路三分之一，需费较少，办成较易。二是因为桂全路乃腹地交通之路。粤汉路已拟筹筑，将来长沙、衡阳、永州、全州循序渐进，由全州至桂林，一气相承，于商业、军事皆极有利。① 因此，桂全路一开始就采用了官商合办的办法，官款占全部经费的二分之一。而商股如有不足，可以用“以地代股”与“以工代股”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就使地主与广大劳动者也有可能成为铁路股东。只是集股修路正在进行时，辛亥革命爆发。原存银行与发商生息的桂全铁路所集股本227万余两，全被陆荣廷挪用。② 因此，时人欲再议修筑桂全铁路，也就困难重重了。

当广西绅商提出自建铁路时，法帝国主义曾经横加干涉。它借口广西所议修建铁路，有与北海相关者，于是向清政府提出：“非经本国（按指法国——引者）允从，所有从前中法所订修建铁路约章，不可稍有改易之处。”清政府深恐有违法国过去提出的要求，指示广西巡抚张鸣岐：“广西官绅筹筑铁路勘路时，须不背法使允商之案，以免借口。”又云：从前允许法国造路之事，“断难改易……贵抚按照原议，饬知于查勘此段路线时，务先预留地步，以期与法使迭次商允之案不相违背”。③ 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提出修建贵博铁路而不敢提直达北海，实属“示人以弱，而仍为法人让步”的产物。④ 而原议修建的邕龙铁路和桂滇铁路，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停留在议论之中，并未见诸行动。

总之，广西官绅、商民从1906年倡议自办铁路，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数年之间，有心之士虽然“奔走呼号，声嘶力竭”，但“卒未获睹片轮寸轨出现于我广西者”。除了“团体涣散，财力薄弱”之外，⑤ 与帝国主义者的

---

① 《交通史路政篇》第二册，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1144页。
② 民国二年《广西省议会第一届第一次报告书》第二册。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九。
④ 宣统元年十月十日《广西谘议局筹划广西商办铁路议决案》。
⑤ 宣统元年三月初五日《广西谘议局第四次报告书》。

横加干涉、破坏以及清政府的妥协、忍让，也颇有关系。

二、收回航权，发展航运

西江航权与缉捕权的争夺

如果说广西的路权之争主要是针对法国的，那么，20世纪初年广西的江河航权之争，除了法国外，主要还有英国和美国等国家。

前面说过，中法战争以后，法国曾要求中越边界龙州河段的航行权，目的在“绕达西江，启桂粤水道之交通，以辅龙州铁路之弗及”[①]。对此，广西巡抚王之春于1903年5月12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提出了一个对等方案，即“中国船只经过越南境内河流者亦应一律办理”[②]。但是，由于中越边界河道狭窄，溪岸迂回，且水浅滩多，水流湍急，并不适于航运。而且，早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龙州就成立了邕龙车渡公司，从广东购回以“数人轮流蹬踩，装载货物，附搭人客，极其快便”的新式木船，取代原用的拖渡和船簰。[③] 从1892年开始营业，十数年间，常因航道水流不足，或货物稀少的限制，故营业时有旺淡。但在限制外国侵略，维护内河航权，发展地方航运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中法航权之争，远不如路权之争。

西江乃广西主要出海通道，因而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航权之争十分激烈。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时，具有强烈的“富强救国”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郑观应，风闻“和议有通商肇庆、梧州、河南、成都、北京之说”，立即向轮船

①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交通》。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一，《桂抚王之春致外部法请船只经过中国河流则我船经越亦应照办电》。

③ 马依、舒瑞萍等：《广西航运史》，102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招商局督办盛宣怀提出建议，及早派人周历各处，为与外人争利“预留地步”。1896年3月（光绪二十二年正、二月），他从广州两度乘船深入梧州考察，认为“西江通五省，总汇在梧州”。梧州不但地理形势十分重要，而且江阔水深，船艇如梭；宝藏满山，百货通流，久为法、英等国所重视。必须力图设法抵制侵略，以保国权。通过探测肇庆、梧州水程和购买码头、篷位等工作，1898年梧州对外开放通商时，招商局的轮船即顺利通航梧州，实现了十年前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等拟设广梧商轮，由招商局轮船行驶西江的计划。为维护西江航权，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西江航运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梧州被迫对外开放不久，就发生了收回洪圣庙码头使用权的斗争。

缘梧州沿江水位，自龙母庙起，至虞帝庙止，分为九十四段。其“泊水保篷七十四段，位于洪圣庙码头上，阔二十六丈零”。其“泊水警篷第七十五段”，位于“洪圣庙码头下，阔二十八丈零”。其他乃大石社、学德社和存真社居民汲水用水之地。1899年7月（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劣绅何从潮、茹善模私以仁济堂名义，租与英国渣甸洋行建造码头，经营西江航运。“三社居民闻之，大为鼓噪”。知县钱锡宝恐事态扩大，极力禁制，风潮始止。1907年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在收回利权，兴办实业热潮的推动下，苍梧知县庄炎也在洪圣庙码头“创办船行，设篷于此”。渣甸洋行向他索取租金，庄炎不与。几经交涉，始于1909年春（宣统元年二月）由两广总督张鸣岐以港银4000元向渣甸洋行赎回，② 俗称“三社事件”。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秋间，来往于梧州与广州之间的英国轮船“西南号”行至肇庆峡地方被劫，英国教士麦路德(Macdonald)中枪死亡。英国借口“西江

---

① 夏东元：《郑观应传》，130～1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② 李衡宙、李家诜整理：《苍梧县志，经政编二》，1959年抄本。近年各种回忆文字多谓：外国的渣甸、天和、人和洋行，于1902～1903年在梧州建立。但《苍梧县志》则记：1897～1903年，渣甸、天和、人和、柏礼等洋行及教会，已采用“租”、“买”等方式，在梧州沿江占有河段十处，其“租”、“买”时间、经手人、金额数目、河段起止及面积大小，皆有具体记载，故从之。

多匪”,竟于12月8日(十一月初四日)派兵舰闯入西江,非法搜查或扣留过往的中国船只。其中从梧州往来贵县的“安发号”小轮,被英兵强行登船搜查后即扣留不许放行。另有“广西号”拖油船行至封川,因未慢车缓行,竟被英国兵舰开炮击沉。梧州向来设有“三江缉捕公所”,置有木船多艘,由护商勇驾驶,日夜梭巡河面。这时也因英国的横加干涉,被迫在西江停止行使缉捕权。

长期以来，外国船舰在广西内河非法行驶，有志之士早已感到不满。而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掠夺内河航权，通过强迫或包庇中国船只悬挂“洋旗”，以偷漏厘金货税并强迫中国船只支付高薪，聘用洋人充当船长、大副，或借口查船和过磅货物等等，随意刁难、讹诈，造成中国商人不应有的损失，更使有识之士忍无可忍。为了收回西江航权，维护“三江缉捕公所”的庄严，以梧州和广州两地为中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

先是广东商船会于1907年12月对英国干预西江缉捕权提出抗议。梧州绅商亦以英国兵船非法游弋西江，奋起集会声援，并在12月17日（十一月十三日）发出《梧州自治会议组织航业要启》，抗议英国兵船“截搜商船，荷枪入市，实以属土看待中国”的侵略罪行。旅居上海的两广同乡数千人，几次在怡园集会，谴责英国侵略行径，声援家乡人民的正义行动。两广留日学生于11月25日和30日（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先在东京召开会议，通电反对英国侵略，商讨对付办法，并指派代表回国，誓死抗争。广西回国的代表有苏绍章、钟刚中和黄庆瀚三人。在此前后，广州与梧州的商、学和妇女各界，或集会，或通电对侵略者进行声讨，并且组织“国权挽救会”，进一步提出收回西江航权的要求。原在洋行或洋船服务的华人职工、引水等也愤起罢工离去，使侵略者的各项业务大受影响。①

---

① 1907年至1908年广州与梧州等地因维护西江缉捕权而起的反英斗争，主要参看《广东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是年笔者到梧州调查采访，据当年从事西江航运的老人说，在反英斗争中，有一首歌谣反映了洋船对华船的排挤，以及华人罢工对侵略者的打击，歌谣云：“洋船入大江，木船冇货装。引水唔带水，气死老番鬼。”“唔”，粤语作“不”解。

声势浩大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迫使两广总督张人骏向清廷提出处理办法。他认为：西江缉捕问题，其见端起于外人之干涉；远因则由于关卡留难所酿成。为此，应将各关卡认真整顿，嗣后如有不肖关役对商船故意留难，许商人赴关署指名控告；今后各商船重新发给船牌，如悬挂龙旗之商船领有牌照者，即与挂洋旗者一律看待。① 洋务总办温宗尧亦呈报处理办法：此后各华轮如有控案，准由商船公会代呈，不必扣船候讯，务与洋船无异。② 张人骏更一再与英国驻广州领事交涉，提出悬挂龙旗商船与挂洋旗商船应同等看待；英国领事与洋商不得以凭照或洋旗与华商使用，以杜纷争。英帝国主义迫于汹涌澎湃的人民反抗怒潮，不得不答应张人骏所提出的要求。

自办航运，维护国权

为了集中实力，有组织地和洋商对西江航运业开展竞争，真正掌握西江航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梁颂唐、郭华辉、周学贤等发起，组织“梧州航业股份公司”，提出公司的《招股章程》，主要内容有：1.“梧州航业股份公司”设在梧州，省港、河口分设代理处；2. 公司集股，每股资金5元，共招6万股，集资30万元，不收洋股；3. 公司总经理及协理由股东投筒公举；4. 公司理财由股东公举，但须有担保方能收用；5. 计划先造快捷轮船6艘，以4艘往来香港，2艘往来省梧，装货搭客，其他各埠，逐渐推广。③ 这些规定，如前述的路股集资章程一样，体现了公司的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性质，反映了可贵的反帝爱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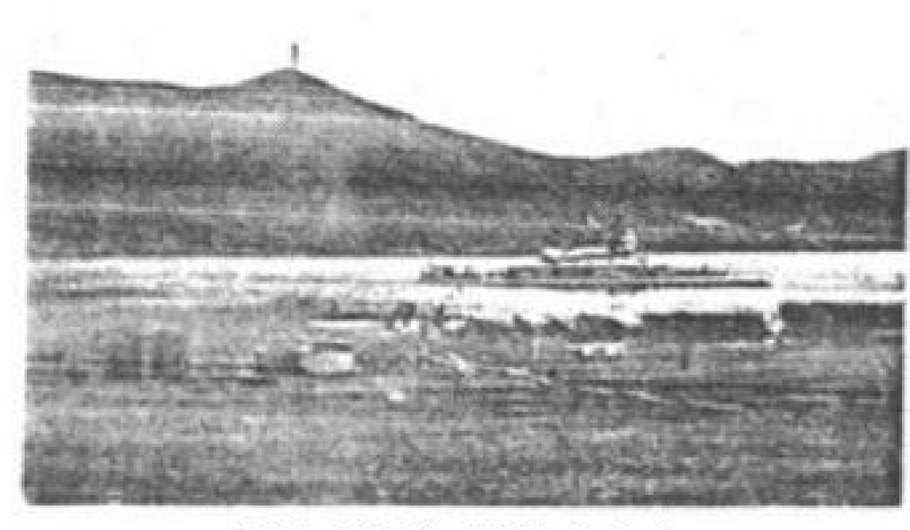
---

① 英、美、法等国私给凭照、洋旗与不法华商使用，装载货物进出口岸，抗拒检查，偷漏税厘，是个老问题。1902年4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两广总督陶模即有“妥议华商挂用洋旗”之奏，但并无定议。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四。

② 梧州商船总会成立于1901年2月（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是根据广西巡抚黄槐森的建议成立的。

③ 马伊、舒瑞萍主编：《广西航运史》第六章第二节，《民族航业在艰难中发展》，124～126页。

筹建“梧州航业股份公司”的倡议，得到了梧州、广州等地爱国绅商的热烈支持。南宁同盟会支部也竭力鼓吹工商界向“梧州航业股份公司”投资。在各地绅商的共同努力下，半年之间，即完成中型水筏两座的建造工作，先后购买了轮船7艘（一说8艘），总吨位达2046吨，分别航行于梧州至广州，梧州至香港，以及梧州至南宁诸线，经营客、货运输，和英国的渣甸、人和等洋行开展了激烈的竞争。帝国主义者自恃资力雄厚，采用降低载货与客运价格，甚或以向乘客与货主赠送礼品等等拉拢手段，妄图排挤中国的民族航运业。而“梧州航业股份公司”则提出“自货自运，中国人搭中国船”的口号，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据《光绪三十四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略论·梧州口》记载：1908年“梧州航业股份公司”开始营运业务以后，“各商货物踊跃附该公司之船载运，兼有船只挂华旗，是以本埠航业为之一振，商务并因之畅达”。经过一年多的激烈较量，渣甸、人和等外商航业逐步出现营业下降状况。原来航行香港、梧州线的人和洋行镇威、镇波两船，1908年即折价卖给“梧州航业股份公司”，更名“广威”、“广泰”，继续航行于港梧之间。1910年，渣甸洋行的水筏、水位、码头以及“连滩”、“新会”等轮船，亦因竞争失败，变卖给“梧州航业股份公司”。“连滩”更名“中安”，“新会”更名“国宁”，继续航行于港梧之间。历时多年的收回西江航权，振兴民族航运业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1]



行驶于浔江的新式电船

---

① 关于“梧州航业股份公司”的成立及其与外轮竞争的历史，主要参看《广西航运史》；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陈情整理：《梧州航运史》（一），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以及1960年梧州实地调查采访。

“梧州航业股份公司”的胜利，鼓励了各地绅商纷纷投资航运事业，和外商在内河开展竞争，促进了内河航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年，爱国航商根据广西内河河道曲折，滩多水浅的特点，大量制造并采用木船与外轮争揽生意。据1902年梧州海关资料记载：“若论民船上下水之生意，各埠与本埠有交易者，则有广东佛山，（广西）桂林、南宁、柳州、浔州、郁林、龙州等处。”这一年，“民船共进口5870艘，有货者3691艘，无货者2181艘；民船出口共6899艘，有货者6153艘，无货者764艘”。[①]第二年，在梧州进出口贸易总值关平银1744万两中，洋船货物关平银价值826万余两，民船货物价值关平银917万余两。[②] 民船运货价值超过了洋船。但是，由于广西生产落后，而且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海关管理操纵在洋员手中，使华商与洋商、土货与洋货无法在纳税、免厘等方面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内河运输的通畅，洋货进口也随之增多，而民营运输却始终在艰难的处境下缓慢发展。

南宁的对外开放

西江上游的南宁，乃邕江与左、右江交汇之区，素为桂西南军事、政治重镇。北海对外开放以后，进出云、贵两省货物多经南宁转运。龙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广西与越南的进出口货物也多由南宁中转。梧州开放以后，英商天和洋行即以“龙州号”轮船往来于梧州与南宁之间。南宁逐步成为广西对外贸易和航运的又一个中心，因此，迅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瞩目。而地方官吏也感到有把南宁作为自开商埠的必要。1899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根据广西巡抚黄槐森的奏报，转奏清廷，说明把南宁作为自设商埠的必要、条件与可能，内称：

查中外各国通商口岸，其地方一切权利，皆归本国管辖，无论

① 《光绪二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论略·梧州口》。
② 《光绪二十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论略·梧州口》。

> 何国商人，只准懋迁货物，不得干预地方。中国自开海禁，许各国分划租界，浸假而派领事，设巡捕，水面则停泊兵轮，界内则强收捐项，授人以柄，失中国固有之权，启强邻觊觎之渐。他不具论，即梧州上年新立码头，各国即索立租界，绅民颇多不服。迭经严饬地方官善为因应，虽办理幸臻妥协，而利权终虑交侵。……详察广西通省情形，当以左江南宁为要着。其地势山环水抱，虽闻有浅水滩流，而统汇左右两江，河身深阔，上控龙州，下通浔、梧，又为云、贵两省必经之路，边防倚为转运后路，诚为上游重镇。详询官绅，佥称地当四达，早年商务极为兴旺，直驾浔、梧而上，前明于此设关，为越南互市之所，后经停止。本年曾有德国商人潜图购买地基，议价未成。迩来龙州复开办铁路，将来商贾更当辐辏，若不先立口岸，诚恐他人援梧州之例，又增朝廷南顾之忧。拟请援照湖南岳州府等处成案，开作口岸，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利权。

黄槐森的这些见解，是他亲历南宁考察并征询地方官绅意见，结合梧州被迫开埠种种丧权辱国的教训而发的；且有岳州成案可据，因而得到总理衙门的重视。在转奏光绪帝时，还特别提到并援引英国公使窦纳乐（C. Mac Donal）两次催促开放南宁为通商口岸的事，说明“与其外人援例求请而后准行，转致授柄于人，不如自开口岸尚可示以限制”，请依黄槐森奏折，开南宁为通商口岸。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朱批：“依议。”[①]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还根据“自开商埠”的构想，“仿照湖南岳州光绪二十五年开办通商章程”，与各国订立了《南宁租界租地章程》十款，规定了在南宁租地建造道路、码头、栈房、屋宇和保护通商各国商民、侨寓等的具体办法。[②]

但是，南宁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对外开放。而从那以后，帝国主义要求开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六，《总署奏遵议广西南宁作为中国自设口岸折》。

②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典按：该“章程”无签订的具体日期，也没有负责订立的各方代表，似属草案性质。

放南宁的传闻却甚多。1904年，又“闻法人因龙州商务现象萧条，坚请中国开放南宁为商埠，即将法国驻龙州领事移驻南宁”之说。① 到了1907年元旦(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清政府终于宣布南宁开埠。

民营航运事业的发展

南宁开埠前一年，英商天和洋行的小轮船已经定期往来于梧州、南宁和百色一线。由于航道滩多，水浅而流急，洋船多雇用中国引水。为了和外商进行竞争，本地航商经过对洋船的结构和行驶方法进行考究，曾仿造小型轮船。虽因船小不能载重，效果并不显著，但反映了他们维护航权，勇于探索和敢于竞争的精神。与此同时，他们制造了多艘在结构和造型上都比渡船新颖，也比依靠风力、人力航行的木船先进的“扒船”，用以在南宁到梧州的河道上载货、搭客。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创新的水上运输工具了。② 1907年南宁开埠以后，航运业得到迅速发展，1908年进出南宁港的船只便由前一年的7410吨，猛增至15695吨。此后几年间，南宁航商先后开辟了邕梧、邕龙、邕百等航线，成立了西江、万生、合志等近20家航业公司，拥有轮船70余艘，航行于西江、左江和右江各线。③

地处梧州与南宁之间的贵县、桂平，从1898年起，即有外国汽轮往来于梧州至贵县、南宁至桂平大湟江口之间。在收回利权、兴办实业风潮的推动下，1909年，我国航商开始集资经营梧州至贵县的航运事业。第二年，贵县绅商集资开办“联益航运公司”，先后购买轮船三艘，取名“江平”、“福海”和“江泰”，配以轮渡三艘，客货兼运。每艘客铺50张，载运量50吨，往来

---

① 《东方杂志》第五期，《商务》，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② 参看《广西航运史》，115~117页。按：扒船即车渡，或称拖渡。车渡上“水车”的车头转轴伸向两边，人扶着横杆用脚踏轴上的踏板，带动车叶排水前进。船身中部分上下两层，可以载客或载货。

③ 《光绪三十四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南宁口》；《南宁史料》第四辑，1982。

于贵县至梧州之间。①

柳江的新式航运事业这时也有了发展。有记载说："柳浔往来一水相通，上下帆船络绎不绝。前因道途梗阻，运货船只须联帮而行，且需十余日方能抵圩。未免耽误时日，有碍行旅。近有粤商集股购备轮船两艘，一名'柳平'，一名'桂安'，往来柳州、大湟江，五日开行一次。"② 这是1905年的事。值得一说的是，柳江的新式航运，从其发始就掌握在中国航商手中。

从梧州通往省会桂林的抚河、漓江，则因航道久欠整治，不利航运，故新式航业的开办，远逊于西江、浔江、柳江以及左、右江。当时有记载说："广西内河各处，自奉谕准商人集股行轮、挽救利权后，柳河、宁河、龙州、百色均一律有商争办，惟桂林河道，河石崎岖，轮船碍难通行。近有利商公司厚集资本，定做新式浅水车船六艘，专带邮政，顺搭客旅，议不载货，务从轻快，已与邮政立约，岁缴邮资若干，以图两益。"③ 这个计划如果实现，虽然有利邮递及客旅，但不能有助于货物畅流，究属美中不足。

20世纪初年的修筑铁路、兴办航运，是和挽回利权相联系的。修建铁路虽无成就，兴办航运却取得了初步成果，这是广西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进步。

三、近代农、工、矿业的兴办

农林垦殖业的经营和发展

在收回利权、兴办实业呼声的激励下，加以20世纪初年清王朝在实行所

---

① 吴宪章、罗甫琼：《近代贵县航运史》，见《贵港市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典按：民国《贵县志》对1898年有汽轮航行贵县事缺载。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交通》，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十期，《交通》，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谓“新政”过程中，设立了商部，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等等。1907年7月，又发布奖励开办农、工、商各业的谕旨，视投入资本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少，给以五品议员、七品顶戴以至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等各种名目的封赏。① 因此，在广西，具有近代性质的农业、工业和矿业等等，到了20世纪初年，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首先是农林垦殖业的经营，这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世纪末年，清政府开放禁垦区，放垦官荒。广西巡抚衙门也制定了《招商垦荒章程》和《更正重新开垦章程》，对开垦山地者给予免收地价和暂免赋税的优待。20世纪初年，广西谘议局通过了农工商部提出的《林业实业案》，鼓励商办农林垦殖业。1906年10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广西巡抚林绍年奏：“请仿外洋商垦之法，招商垦荒，任令商人择地，报官勘丈，给照定限升科。”② 于是各地官绅和富商纷纷成立各种公司，竞相集资，从事农林垦殖业。

根据记载，早在1898年，贵县就有湖南人张通典集资设立庆丰垦殖公司，以种植豆麦为主。③ 第二年，新任南宁府知府惠荣到任不久，于署内设立农务总局，号召官商集股（每股百元），并捐俸以倡，在馒头塘建立垦殖场，招农兵300余名，以军训部勒耕丁，与垦务同时进行，种植甘蔗、芋头、花生、瓜菜等物，售之于市，颇受欢迎。1909年夏初，提督龙济光集资2万元，成立济福公司，在邕宁迁隆区棉羊（明阳）设立垦殖场，由云南人龙绍乾负责，裁营兵以充耕丁，“一面训农，一面讲武”。后因同盟会在广州起义，龙济光以耕丁成军，开往广东，济福公司遂告解散。④

1904年，梧州农垦公司成立，以种桂树为主，收取桂皮、桂油，“行销外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五，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谕。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六四。

③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实业·林业》。

④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一四，《食货志二·垦荒》。

洋"①。1906年，"梧州黄锡铨等集股15000元，在梧州设立农业公司……买定山场两处，宽广600亩，进行垦种，兼办畜牧"②。

1907年，南宁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富国强兵思想的指导下，也着重兴办实业。农垦方面，则在青山、凤凰岭、佛子岭等处开荒种植松、桐、茶、竹以及杂粮之类；并号召附近农民入股，每股资金1元，另由津头村雷家投资40两，以扩大经营。③ 同年，桂平创办了毅实垦殖公司，股本1万元。平南成立了普利公司，股金8000元。④

1909年，贵县覃慎修等集股组织同益种植公司，在附城狮子、鸡心岭等处种植松、杉、茴香、桂树共60万株，几年后，"蓊然成林"，桂油、桂皮已收微利。⑤ 同一年，有华侨集股20万元，在贵县创办庆丰公司；另集股40万元，分别在贵县和桂林设立广益公司；又以10万元在浔州创办广美公司，皆以开荒种植为主业。⑥

根据统计，到了1910年，广西全省"奏明设立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太平各属垦牧公司25处，新开水利290处，修竣旧有水利360余处"⑦。上述各种农业公司，承办者多为地方官绅与留学归国的学子，而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等也多作号召、提倡，有的还"代为招股"，有的甚至"附股赞助"。⑧ 1903年，从四川调署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就是积极的提倡者和赞助者。1905年，梧州巨绅梁廷栋报请倡办农林公司，岑春煊立予批准，"且捐助股本银三百两以为之倡"。同年夏，容县黄玉忠等具禀"请集股本广

---

① 《广西官报》，宣统三年第六八期，《实业》。
②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实业》。
③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④ 《广西官报》，宣统二年第一〇八期，《实业》。
⑤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实业·林业》。
⑥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6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5。
⑦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三九，宣统二年七月十六日农工商部奏。
⑧ 《广西官报》，宣统二年第四六、八三期，《实业》。

劝种植"，也很快得到岑春煊的批准和嘉奖，并且饬令广西布政使"酌依开荒种植章程，督率各地认真办理"；同时命令北流、容县等处"赶紧劝办，树立风声，毋任因循"等等。① 对于绅商举办各种农业垦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当时广西农林垦殖业的发展，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资本短少，多数公司的资本仅在万元左右，因而限制了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二是有的垦殖公司，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而是假垦殖之名，乘机霸占土地；或"假公司之名，垄断居奇；甚或垄断资财，逍遥法外"②。三是一些经济作物种植的兴衰，往往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需求所左右。所以，20世纪初年广西新式的农牧垦殖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综而观之，是开花多结果少。

早已具有基础的种桑育蚕业，这时在西江两岸各州县以及宾州等地，继续得到发展。以种桑育蚕著名的苍梧长洲，有百分之六十的耕地是桑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③ 20世纪初年，出现了植桑、养蚕、育种与取茧缫丝的全盛时代，私人经营的蚕种铺号不少，蚕种远销广东都城、德庆、肇庆以及省内许多州县。④ 宾阳从1893年开始，出现了植桑育蚕热潮。官绅集股组织机房，"收买民间蚕茧，缫丝织绸"。至辛亥革命前夕，经营此业之机房"获利颇厚"。⑤ 当时，以公司形式经营桑蚕种养及产销蚕种、蚕苗、蚕丝者已有出现。张鸣岐出任广西巡抚以后，继续鼓励蚕种、蚕丝业的经营，于是有关此种行业和公司日多，要者如：怀集县李恩寿、曾廷鑑集资3000余元，创立冈平养蚕社，租地100余亩，植桑20万株，兼营蚕种与制丝业务。贵县覃华昌、杨梦松留学日本，专攻桑蚕业，回国后大力提倡植桑育蚕。杨梦松

---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实业》。
② 宣统二年《广西官报》第一〇八期，《实业》。
③ 雨林：《广西苍梧农村——三乡八村庄视察记》，见《新中华》第二卷第二期。
④ 梁曜南：《长洲蚕桑史》，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⑤ 朱昌奎：《宾阳县志》第二编，《政治》。

创办普益丝蚕会，并办丝蚕讲习所，向生徒教习植桑、育蚕、制丝技术。张鸣岐给予“捐资题匾”，以示鼓励。劝业道胡铭槃亦出专款予以津贴。① 谭与济、谭绍堂等更集资成立恒和公司，在桂林、柳州等地收购蚕丝，运往广州出售，获取厚利。如果以桑蚕业与农垦业相比，则桑蚕业的经营远胜于农垦业。

近代工业生产的萌动状态

广西虽非地土贫瘠之区，但工业生产十分落后。直至20世纪初年，勉强可以称为近代工业的工厂只有两家，即1906年开办的梧州炼锑厂和1909年创立的梧州丝业有限公司。前者为张鸣岐倡办，属官营，资本27.9万元，年可炼锑砂60多万斤。它凭官拨专款10万，由官方统一在南宁、梧州和上海设立锑砂购销分局，垄断经营。从1907年8月至1909年4月，两年中共收锑砂197.2万余斤，炼出毛锑62.2万余斤，纯锑1.6万余斤。后改商办，任由商民自采、自炼、自售，锑砂出口大增。官营炼锑厂改由商营，炼锑产量亦增加10倍左右。② 梧州丝业有限公司为商办，资本43360元，工人116人。③ 梧州炼锑厂和梧州丝业有限公司，可以说是广西当时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工业投资了。在全省其他地区或行业类似如此规模的工厂，真可说是“别无分店”。1904年8月28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巡抚柯逢时在一道奏报中，谈及广西工业生产所以落后时说：

> 广西虽号瘠区，而山林川泽之所产，其输于它省而取资外洋者，岁亦数百万。惟熟货则绝无闻焉。臣到任后，考求其故。一由匪扰连年，地方官无暇措意于此；一由民情偷惰，通商大邑无经商之辈，

---

①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实业·蚕业》。

② 据北京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集，140～14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874～875页。

③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4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亦无习艺之人。凡日用所资，皆取给于外来，则其贫也固宜。[1]

奏说广西当时主要靠原料输出，熟货生产"绝无闻焉"，诚非虚语。棉麻织业本为国民生活所必需，但据统计，从1899年至1913年（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二年），全国各省兴办织布手工场有据可查考者，共计142家，其中广西尚无一家。[2] 近代化的工厂生产更无论矣！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辛亥革命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广西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百业萧条，是以"货无出口，人畏购田"。商业资本多向钱庄典当业转移，或从事鸦片贩运和商业投机活动，工矿投资极少。[3] 据统计，1912年（民国元年），广西近代工业资本只有8.6万元，和全国工业资本5500万元左右相比，仅占0.156%，如与同年广西向农工商部登记的钱庄典当业资本606.2万元相比，则工业资本仅有1.4%。[4] 因此，无论和全国的工业资本相比，或是和本省封建性的钱庄典当业相比，都是微乎其微，不成比例的。

20世纪初年，广西官绅在清政府"振兴实业"的号召下，讲求工艺，兴办实业的风气渐开。官府办工艺，其目的在"多一制造即开一利源；民间添一工师即少一游手。于乐事劝工之中，即寓化暴为良之意"。于是，许多官办的手工工场应运而生，主要的有：1904年，巡抚柯逢时以前梧州知府程道元早年曾有兴办实业之意，而且籍隶广东，熟悉各种情况，遂委派他参照广东工艺厂的办理章程，于是年5月在梧州将裁撤的副将旧署酌量改建，先办工艺厂。6月14日，又在桂林就日门之桂山书院添设一厂。桂林工艺厂艺徒200名，全部责令"各府州县，挑选土著年轻及有身家者，保送来厂，艺成后即发回各地方充当教司，以期逐渐扩充"。梧州工艺厂艺徒多少不悉，但其来源

---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八。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369～376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③ 《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卷一，《总论》。

④ 典按：这里说的工业资本，不包括采矿和冶炼等矿业资本。广西工业资本和钱庄典当业资本数，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017页。

及出路是一样的。梧、桂两厂，均以织布、织洋庄花席以及竹器、藤器四种产品。其新产成品经过检验，据说“尚称适用，较之广东工作，无甚上下”。此类工场，兼有为发展地方实业培养人才的目的。① 但据反映，这些经官府从各地挑选与保送来的艺徒，对学习“浅尝辄止，颇无恒心，成效鲜睹”②。

另一类工艺厂的开办，则把生产与改造罪犯相结合。当时，桂林办有“自新工厂”，它的前身，是1892年临桂县开办的迁善公所。全所开办工本银约400两，收纳习艺人犯120名，主要从事织布、织席、织草帽和打棕绳，所产成品，因属民生所需，所以“尚易出售”，工本亦足资周转。③ 梧州当时也有同样性质的官办工厂，把犯律应投入监狱者改拨入工厂。工厂将犯人分上、中、下三等，各等人犯待遇不同。凡能改过自新者，即居下等也可改为上等。工厂专教织布、织席及制造藤器等工艺。犯人所做工作，皆逐日登记。释放之日，分给所得余利。④ 1906年，思恩知府彭言孝招贫民并拨罪犯400名，在武缘开设工艺厂，专事生产卷烟、鞭炮等物。庆远知府王祖同也筹款建立工艺厂，招收贫民及无告者入厂学习制造壮锦等地方土特产品。浔州府也以考棚为厂房，开设平民工艺厂和罪犯习艺所。这些具体措施，目的是救济贫困，或者“化暴为良”。

据1913年《世界年鉴》的统计，当时广西全省仅有官办工艺局一家，各种工艺传习所14家，工场2家。⑤ 由此可见，20世纪初年的广西工业，尽管官府力为倡导，绅商热心兴办。但是，由于社会经济落后，技术设备条件太差，经办官商贪污腐化，社会动荡不安，以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排挤，所以，所谓工业生产只是处于萌动阶段，手工工场不多，近代化工业极少，家

---

①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柯逢时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八；又参《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六期，《实业》。

② 《光绪三十年华洋实业论略·梧州口》。

③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期，《实业》，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

④ 光绪三十一年《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梧州口》。

⑤ 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各省工业局的比较表》。

庭手工业生产仍居主要地位。因此，产品质量不高，而产值极低。产品除供民间生活所需外，欲与外国产品竞争，实不可能。

银、锡、煤矿的开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广西的资本主义经营比较发达的是采矿业。

在清代，矿业作为民政事务，由地方政府有关行政长官直接负责管理。1898年8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清廷宣布"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各省开矿筑路事宜俱归统辖"。同年8月21日，又宣布：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分别总理全国、各省农工商事宜。后农工商总局改为农工商部，广西成立农工商矿局。1906年5月21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林绍年奏："桂省遵章将农工商矿局改为农工商局，划出矿务一门，改设矿政调査局，派员办理。"① 1909年（宣统元年），巡抚张鸣岐委任留美矿学博士王宠佑为矿师，办理全省矿务，负责矿产勘探、开采等事。这个时期，资本较多，规模较大，计划开采或已经开采的有：

1905年，周平珍筹资10万金，并得岑春煊助以巨款，派员偕同矿师"设法开采"南宁、百色两属锑矿。继有绅商集股，聘请英国矿师，设局开办百色铜矿。②

具有悠久历史的河池、南丹锡矿，1905年被右江道龙济光"请领"开发。他以庆云公司名义，注册资本为3万元，垄断了新周、高峰、同车江、长坡、巴梨等十几处矿区，面积共达20余平方公里的开采和矿产的购销权，切断了矿商和市场的联系。据统计，从1906年至1911年，丹池矿区共产锡43059万公斤，每百公斤平均收购价不到70两，而每百公斤的销售价为128两，六年之间获利25万多两。直到1918年龙济光因抗拒"护法运动"被驱逐，庆云公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四二三、五五八；又参翟佑华、钟铿等《广西通志·地质矿产志》第七篇《地质管理》，第一章《管理机构》，4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②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司恃势垄断丹池锡矿的局面才告结束。①

1905~1906年间，武宣人刘统丞投资用土法开采合山岭煤矿，以牛车运煤至迁江河边，再用船转运梧州销售。因成本太高，无法与洋煤竞争，结果亏本白银4万元而倒闭。②

1907年，补用知县胡铭槃主办富川、贺县西湾煤矿，资本595000元，官办性质。所需锅炉、起重机、鼓风机俱备，且从矿井至西湾铺设了共约3公里的运煤小铁道，井口架设有8.82千瓦的双气绞盘机两部，开设条件比较先进。可惜管理者多属外行，贪污中饱之风严重。是以经营五年，出产大煤及末煤不足35000吨。③ 同年，朱博文集资10万元，在贵县成立宝兴公司，以留美习矿之严迪光为矿师，购置碾石机器，开采三岔银矿。1908年，开挖矿窿七个，一日夜出矿砂万余斤。然因多杂石质，1909年，因亏累太多而停办。④

1908年7月8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巡抚张鸣岐奏称："旅美职商叶恩等兴办实业，并请派员同往南、北美洲，周历各埠，联络商情"。又以"筹办广西矿务，恳免征收出井、出口两税五年，以裨实业"。得旨皆如所请。⑤ 第二年，遂派道员刘士骥赴海外招徕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广东侨商叶恩随刘士骥回国，与刘义任等集资300万元，组织振华公司，分别在贵县县城和香港建大厦设局，计划开采平天山银矿，兼营广西银行、梧邕轮船，梧封（川）铁路，并开垦县属七里桥荒地，计划颇大。于是建宿舍，筑道路，架电线，设医院，各种细微事项，无不讲求。但因矿师容某技术未精，开窿

① 《丹池矿务纪要》，见《广西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七号。

② 黄宗儒：《合山煤矿公司创业的经过》，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三辑。

③ 梁培瑛等：《贺县志》卷四，《经济·矿产及矿业》。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531页。《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册，141页。

④ 吴尊任：《广西矿产纪要》甲篇，22页。民国《贵县志》卷一一说：1896年，谭日章、陈庆昌等建立之华兴公司，"旋改宝兴公司"，误。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三。

口十余处，一无所获，坐耗资财。乃寻掘旧窿以掩其技，获矿砂数吨，冶以土炉，仅得纯银数十两，不足抵公司一餐之费。加以“股东内讧”，而刘士骥又忽以被刺闻。1910年（宣统二年），计损失资本数十万元，“遂哗散焉”！①

1909年，由广西地方官府投资13.6万元兴办的富川、贺县、钟山锡矿，跨地300平方公里，含五拱水、水岩坝、栗头源、望高、白沙、庙湾等矿区。除官办矿场外，仍有民办数矿。因矿藏丰富，故产量可观。据报告，1909年产量为206000斤，1910年产量为328000斤，1911年产量为194000斤，1912年产量为206000斤。每年皆有获利。只因设备陈旧，产量极不稳定。1916年，陆荣廷桂系政府以该矿有利可图，全部收归官办，结果产量与产值都一落千丈。②

1909年11月24日《申报》报道：广西“现时成立之公司，禀请开办者，贵县则有宝兴公司，办三叉（岔）山银矿；又有振华公司，办平天山银矿，河池州则有庆云公司，办南丹土州锡矿，贺县则有天腴公司，办养牛冲等处锡矿。振华资本较巨，矿师尤为得人，二三年间，当可大著成效。官办之富、贺煤矿，亦属可兴美利。……富川锡矿蕴蓄亦宏，现因煤矿工程吃紧，未克极力经营，暂附入富、贺锡矿官矿局兼办，当俟煤矿开工告成，再行推广采掘云”③。这篇报道，概括了20世纪初年广西兴办矿业的主要情况，而它对办矿效益的乐观估计，则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

从上述可见，20世纪初年的广西采矿业，集中在银、锡、煤几个矿种，

① 梁崇鼎：《贵县志》卷一一，《实业·矿业》；卷一七，《前事》。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791页。又：《贵县志》说：振华公司创办人区云高、梁应骝，皆曾受业于康有为，叶恩亦与康有旧，刘士骥则康之同年。叶恩等回国投资矿业，曾受到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保皇派的阻挠。而叶恩等则作书予以反驳，所谓“内部互相水火”，与此亦有关系。

② 据《中国官办矿业史略》，转引自《广西统计季报》，51页，1937。又参看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531～532页。

③ 转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791页。

主要属于官办或外地商人经营，真正出于本地商民股本者，实不多见。而不论官办或商办，多是重开采，轻冶炼，以出卖矿砂或原品为满足。是以产值不多，获利甚微。又因管理不善，或因运输困难，或因捐税过重，或因技术落后，或因社会动荡不安，或因官府与民争利，或因遭受外国资本的排斥，或因守旧心理根深蒂固，所以经营者虽然满怀“振华”、“兴华”之心，而其结局无不造成亏累以致倒闭，难得善果。1905年10月出任广西巡抚的林绍年，奏请将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各府锑矿统由官办，并在省内禁私炉，杜私贩，查私矿。一经查出，从严惩处。[①] 商办宝亨公司开采的富川锡矿，因为靠近官办的西湾煤矿，结果被借故收归官办。1910年，官办的富川、贺县锡矿，在商办的天腴公司界内设局收砂，侵犯民矿利益，彼此发生争执。当局袒护官局，而税局对商矿之苛索留难，也使“土货不能畅销，洋货日以内流”，严重影响了民族资本经营的事业。[②] 柳江上游的融县，矿业开采受到的种种排斥、勒索和破坏，更集中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 矿业之经营，非资本崇厚不能办。融县地瘠民贫，此等业务，无人过问。光绪初年，东区距宝兴团十余里铁矿，经商人张德隆（中渡人）设厂开采，产量颇丰。惟化炼不精，运费复重，洋铁输入后，销流遂滞。且地处荒僻，匪类出入，无法保护，因亏损而废弃。光绪末年，该商复被绑票。[③]

民办工矿企业受到来自各方的重重阻抑，内外交困，使广西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比较有条件的采矿业，也难以得到顺利的发展。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154页。

② 宣统二年《广西官报》第八十一期，《实业》；《广西谘议局第一届决议案》及所附之《整顿统税决议案》。又参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154页。

③ 龙泰任：《融县志》第三编，《政治·实业》。

四、商贸事业的畸形繁荣

帝国主义的侵略，农业、工业和采矿业的某些发展，加以抵制美国货、日本货的爱国运动先后兴起，使20世纪的广西商贸事业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对外贸易和经纪行

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从几个对外通商口岸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可以看到。

梧州：1897年对外开埠通商以后，18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621万多两；1899年为612万多两；1901年为749万多两；到了1903年猛增至1744万两。

南宁：1907年对外开埠通商时，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54万多两；1908年接近340万两；1909年接近415万两；1910年为338万两；1911年又回升至470万两。

地系西江的这两个口岸，对外开放五、六年间，进出口贸易除个别年份外，都有较大的增长。而开埠较早的北海和龙州则相反，对外贸易基本呈下降趋势。如：

北海：189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416万多两；1899年为414万多两；1900年为387万多两；1901年增至422万多两；但1902年却降至330万两、比前一年减少四分之一。全港从1898年至1902年，五年的进出口总值，仅比梧州1903年的进出口总值多220万两。

龙州：对外贸易的境况更差。18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3万多两；1899年为8.5万多两；1900年又回升至13万多两；1901年为16万多两；1902年却锐减至7.7万多两。五年进出口总值共只有59万余两，远不及梧州、南

宁、北海一年的进出口总值。[①] 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西江商业贸易，在广西对外贸易中仍居主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江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远胜于法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广州湾与中越边境的经济侵略。

20世纪初年，广西的土货出口，除谷米外，仍以桐油、茶油、八角、茴油、桂皮、桂油、牛皮、花生油、水靛及食糖等为大宗。而洋货进口，除棉纱与各色布匹继续见涨外，煤油、洋铁、火柴、肥皂、香烟等也成了进口的主要商品，而且很快占领了通商口岸附近和沿江的大小城镇市场，使土货的生产与销售受到排斥。且以纸烟为例。20世纪初年，英、美两国的"洋纸烟卷"，因其装潢华丽，价廉物美，已在梧州"销流甚广"。[②] 1911年，洋纸烟从北海港进口之多，已令时人有"纸烟活跃盛行，则水烟袋又弃之无用。年湮日久，欲往取之，或向诸博物院，抑询诸玩古家斯可矣"之叹。[③]

第二，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加以清政府对鸦片贩运、买卖采取的放纵政策，造成20世纪初年的广西商业经营十分复杂。许多富商多与洋货倾销、鸦片经营有关。

当代通称的百货业，旧称洋杂业。经营洋杂业之商号皆称洋杂店，以"专营全球洋杂商品"相标榜，以广招徕。其中洋货实居主要地位。据今人回忆，清末民初时期，梧州开设的洋杂商号即达十四五家之多，[④] 桂林的洋杂行业，当时也有五家，老板多为广东人。其中的均利、德隆、绍元兴、翰芳斋四家所销商品，百分之五十来自国外，主要是日用生活品；而英怡隆一家，则兼营洋纱、煤油等物。[⑤] 梧州和桂林的不少洋杂商号，除经营商品零售外，

① 此处所列的各口岸历年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数字，系据有关各口岸历年"华洋贸易关册"记载，以关平两计算。

② 《光绪二十九年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梧州口》。

③ 《宣统三年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北海口》。

④ 邓锡芹、邓鉴修等：《百货业的兴衰变化》，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⑤ 宋维桢：《辛亥革命前后桂林商业的概况》，见《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还经营华洋各货的批发业务。

鸦片贩卖也是当时各地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因为鸦片多来自云南，而鸦片贩卖乃贩毒行为，经常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所以商贩多把这种不道德的经营美其名曰“云茶”经销。除专门经营鸦片贩卖的庄口外，其他如银钱业、洋杂业老板也多有兼做鸦片生意的。如在梧州经营银钱、航运、洋杂和经纪行的梁颂唐，就是从事鸦片贩运的押帮发迹起来的。吕辑堂、许镜仁除代销英、美洋行的煤油外，也做鸦片生意。此外，还有曹合利、成昌泰等较大的鸦片商号八九家。据估计，仅梧州经营的鸦片买卖，每年即达1000万两之多，营业额合白银1500万元左右。梧州成了云南、贵州鸦片集散的重要口岸，也是批发洋货与国内工业品向云、贵销售的重要港口。① 桂林几家经营洋杂生意的大商号如英怡隆、安泰源、有昌和经营银钱存贷、汇兑业务的萧万昌、萧德生、罗广茂、广德安、汇裕丰、广裕、永泰、福泰林、益恒丰等，也都凭借雄厚的资本经营鸦片生意，而又在鸦片的贩卖中发了大财。②

推销洋货和贩卖鸦片，使那些金融和商业资本家既和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必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恶势力互相结托。这是他们的消极方面。

第三，由于对外商贸的发展，经纪行随之盛行，在梧州港口还专门出现了为洋商经办商品的商号和买办。

经纪行业起于元代，原称“中人行”。主要职能为介绍房屋买卖、商品交易、货物流转和契约作证等，从交易总值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至近代，因商场交易多为银两，较大的商号多设置天平，收支银两时用标准砝码，以示公平准确，两不相亏，故代客买卖的商号，又称平码行。19世纪末年，平码行以代客出售土货为主要业务。其后因中外商贸日益繁荣，平码行不但代客出售土货，亦代洋商推销洋货。于是，又以居间中外贸易，代客买卖商品

① 侯雅云：《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② 宋维桢：《辛亥革命前后桂林商业的概况》。

的平码行称为经纪行，亦即通称的买办者。

梧州的经纪行业，中法战争以前已在戎圩出现。当时代客经办的商品以谷米为大宗，月销约千余万斤，次为花生油、茶油、桐油、麸料、蔗糖、青麻、土纸、桂皮、桂油、八角、茴油以及豆类等土货。20世纪初年，随着中外航运业的发展，大批货物进出于梧州、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为中外客商居间经营买卖的经纪行遂应运而生。据近人记载，当时仅梧州开设的经纪行就有隆昌筏、鸿安筏、遂生筏、公昌、源来、惠安、恭信、同昌、仁信、仁隆、时泰、巨丰、德泰、泰隆与时昌等十数家之多。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经纪行中，有的成了帝国主义在梧州推销某种商品的、固定的代理人。如：梧州巨商陈辅臣独资开设的陈泰记商号，本是经营棉布洋杂的百货店，但从1906年起，受雇于英、美香烟公司，代理经销Good Bei牌和老刀牌香烟业务，极力向广西各地城镇鼓吹和推销进口纸烟，成了当时英、美在中国倾销各种牌号香烟的97家代理商之一，也是当时广西仅有的一家。这就大大加速了陈泰记经营业务的发展，陈辅臣也因此成了梧州四大富商之一。② 还有广东巨商吕辑堂，本来在梧州投资经营银钱业、航运业和鸦片烟贩运生意。20世纪初年起，又成了美国煤油在梧州推销的代理商。另一位广东商人许镜仁，除经营鸦片生意外，还代理英商倾销亚细亚煤油。③ 陈辅臣、吕辑堂、许镜仁等，实乃在广西推销洋货、直接为外国进行经济扩张和掠夺的首批买办人物。当时，即使在广西的边远地区，如右江恩隆县（今田东县）的平马镇，也有广东商人梁某开设的人和商号，以代香港英商经销亚细亚煤油，同时收购土特产运往香港为主要业务，组成了庞大的

---

① 陆冠芝、黄亦章等：《平码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侯雅云：《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分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八辑。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229页；《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中册，95页。

③ 侯雅云：《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

购销网络，垄断平马镇的大宗商业贸易。① 在这些平码行之下，往往还有大批小商贩，深入穷乡僻壤，为他们从事购销效劳。一副货郎担，一头装着洋火柴、洋毛线等一类小商品，另一头装的则是用洋货通过不等价交换得来的鸭毛、猪鬃、八角、桂皮等土特产品。他们既为洋人把洋货零散地向农村推销，又从农村中换来土特产和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廉价的原料，集代“客”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于一身，把广大乡村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悄悄地同外国资本主义市场联结在一起。

“商战”与商会

商贸存在着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商战”，广西商界人物深感必须跨行业、跨城乡组织起来，与洋商争，与官商和官府争，以维护自身利权的必要。

在过去，以地域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各地会馆，曾经对旅居一地的同乡起过联谊与互助的作用。以同行业为纽带结合成的行会组织，也曾经对该行业的同人发挥过联谊与互助的作用。而在华洋杂处、“商战”日烈的20世纪初期的广西，上述的旧有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同一地区，不分畛域，广泛联系各行业的共同组织应运而生，这就是通称的商会。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早期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其《商战》篇中，就提出了国家应成立工商管理部门，考其物业，制定工商例律，以便与外国展开“商战”②。陈虬也建议国家仿照泰西各国成例，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以解除“崇本抑末”的陈旧观念，达到“保商”、“护商”的目的。③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设立“工局”以负责“举国之制造机器艺术”，设立“商局”以负责“全国之商务、商会、商情、商律”

① 苏寿彭：《平马工商业概况》，见《田东史志》，1987（4）。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商战》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③ 《治平通议·经世博议》，见《戊戌变法》（二）。

诸事的建议。[1] 随即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倡导组织商会。这些发展经济的主要举措，虽然很快就随变法的失败而夭折，但是，几年之后，清廷因办所谓“新政”的需要，于1902年2月与5月，先后派载振、那桐和张謇等到欧美、日本考察商政及实业教育。同年9月，清廷正式成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张謇为头等顾问官，继即颁布《商部章程》等。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各地民族资本家以及商界人士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发展自己的事业，也纷纷在商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梧州商务总会（1916年改组为梧州总商会）遗址

1906年，梧州商人鉴于广东成立商会，在维护商界利权、应付各种竞争中卓有成效，首先倡议在梧州建立商会，并制定章程。第二年，正式成立商务总会，公举戴曾谦为总理，苏智谦为协理，并“由十三行董商向农工商部奏准立案”，发给关防。[2] 1908年，南宁因“开埠后商务日形发达”，也成立商务总会，推举黄增荣为总理，陈廷禄为协理，并报请农工商部奏准立案，给予关防。[3] 1911年，省会桂林也成立商务总会，以山西巨商、百川通钱号经理温敬甫为总理。因

---

① 即《上清帝第六书》，见《戊戌变法》（二）。

②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商务》，同书第四卷第九期，《商务》。

③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五期，《商务》。

为各地商会分别成立，各自呈报农工商部奏准立案，全省并无统一组织。[①]各地成立之“商务总会”，只是表明该地商界各行各业联合之意而已。

由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益高涨的变法图强、商战救国主张的影响，广西的许多工商业者在收回利权，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又常怀爱国之心，参与反帝的斗争行列。这都是他们的积极方面。

1905年，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执行虐待苛刻华工，旅外华侨、学生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互相呼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国货的斗争。广东全省“众情迫切，各商民自结团体谋保公益”，相与号召抵制美货。广西梧州、南宁、桂林等地人民激于义愤，也集会演说，公议购用国货，禁止买卖美国商品。不少经营洋杂业或洋油代销商也起而响应，给美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根据海关报告，销售梧州之“美国煤油，每百份短少六十份，其故系由抵制美货所致，各人多用花生油代之”云。[②]

1908年2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有日本船辰丸号私运军火来华，计快枪2000支，子弹4万发，在九洲洋中国海面被广东水师查获，即将船械扣留。日本政府非但矢口否认，反向我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而日本“各报极力辱我政府，粤民颇多愤激”。于是，纷纷聚众集会并演说，相约不

---

① 《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三期《内外时报》论《全国商务之现况与将来之希望》时，记广西当年的商会数目为：总商会八个，分会十一个。又：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统计局关于广西商会成立的报告是：广西总商会九所，它们成立的时间是：梧州（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南宁（同年十二月）、柳州（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百色（宣统二年四月）、浔州（同年九月）、龙州（宣统三年三月）、桂林（同年四月）、庆远（同年八月）和平乐（民国元年三月暂准立案，原为分会）。广西各县商会有十，它们是：恭城（宣统二年五月）、贺县（同年八月）、天保（同年十月）、全县（同年十月）、富川（宣统三年三月）、迁江（同年六月）、上思（民国四年？月）、兴安（同年七月）、中渡（同年九月）、柒善（同年九月）。又：龙一飞：《我父龙鹤龄与桂林商会》，见《桂林文史资料》第八辑，记桂林商务总会成立时间，在1908年，误。

② 《光绪三十一年华洋贸易论略·梧州口》。

买日货，“倡兴工艺”。南洋、日本等地华侨与香港同胞也起而抵制。[①] 广西的洋货多从广州、香港进口。那里抵制日货，梧州、南宁、桂林各地起而响应，日货入桂锐减，也有利于土货的生产和销售。以1907年和1908年而论，梧州、南宁和龙州各埠的土货出口，就因抵制外货而有明显增加。请看下表：[②]

货物名称	1907年出口值（光绪三十三年）	1908年出口值（光绪三十四年）	增长数（1908年比1907年）
香料、椒茶类	112746两	114137两	1391两
竹木藤类	244149两	307828两	63679两
皮毛骨角类	235843两	281259两	45416两
八角樟脑类	231320两	356277两	124957两
杂粮肥料类	24308两	91537两	67229两

但是，由于广西的农业、工业、矿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生产基础都十分薄弱，与外国或国内其他省区相比差距甚远。因此，外货进口与土货出口的比例也极为悬殊。南宁在1907年开埠时，洋货进口为739.068两，土货出口为81.573两；1908年，洋货进口猛增至1721.941两，而土货出口虽较上年增长4倍，但总计也只有33万两左右，不及洋货进口的五分之一。[③] 又据南宁海关的报告，1911年南宁土货出口值为2657.200两；1912年增至3321.500两。而从梧州口进

① 据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七日两广总督张人骏致外部电云：“日本商人志气骄慢，糊成无尾之禽兽各灯，嘲华人办事有头无尾；灯上之字，并有制服中国字样，而中字无下半截。又日本报中有一太阳，三面画犬向之而吠，犬身写香港二字。香港各商见之大愤，致有敢死会之举。”见《中外交涉史料》。

② 各种货物出口值的数字资料，均见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广西官报》第六十八期，星期版。

③ 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广西官报》第六十八期，星期版。

入南宁的洋货，1911年计银1663798两，1912年增至3028270两。时有洋货于“僻陋市集靡所不至”之说。①

从对外贸易增长的数字看，说明20世纪初期广西的商业贸易基本上是发展的。但是，其中饱含着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性质，因此，它是一种不平等的、畸形的繁荣。

金融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和深入，农业、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的发展，加以举办新政的推动，金融货币机构及其经营、管理等也随之发生了某些变革，逐步带有近代金融经营的性质。

在近代，广西金融业主要掌握在山西、广东等省商人开设的票号、钱庄和高利贷者手中，同时受到香港、广州和越南等地的外国银行的影响。票号主要经营官方和私人银钱的汇兑、存款和放款。它和官方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具有明显的封建高利贷的性质，而且有浓厚的地域帮派色彩。清朝末年，桂林的票号就有山西、广东、福建和江西四帮。钱庄的业务主要经营银钱兑换、存款和放款，其多数虽然属于民族资本的范围，但是，仍旧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投机性。高利贷者多盛行于广大圩镇和农村，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五十。②

票号、钱庄和高利贷者在组织、经营上的封建性、帮派性、投机性和高利盘剥，不利于农业、工业、矿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帝国主义的金融掠夺与控制，又增加了政府财政的困难。于是，新式金融机构的创建与经营逐步提上了日程。1903年12月19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广西巡抚柯逢时在桂林创立广西官银钱号，资本金合计55万两；以布政使刘心源为总办，补用道丁乃扬任专办。1904年2月22日（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七日），柯

---

①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交通二·通商》。

② 参看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235页，广西商业厅1990年编印。

逢时向清王朝奏称："顷在桂林设立广西官银钱号，收发司局外款。拟于梧州、浔州、南宁、柳州等府一并设立分号，凡各官经费，准其在附近官号支领；各缺入款，亦均解交官号收储抵用。"于是，柳州、南宁、龙州相继于1904、1906和1908年成立官银钱分号。①

1906年12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张鸣岐以广西布政使署理巡抚，在倡办新政过程中，着手将广西官银钱号加以改组，设立银行。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筹备，终于在1910年2月10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按照有限公司章程正式成立广西银行。这是广西有史以来第一家省营的地方银行。总行设于桂林后库街，随即在梧州、南宁、龙州和省外的上海、广州、汉口、衡州、湘潭等地设立分行。资本为广西平花银100万两，规定作为准备金，永不动用。聘请山西帮桂林日升昌票号经理王靖（荩）夫为总行经理，其他分行经理及总、分行的主要业务人员，也多是王靖夫从山西票号的伙友中招聘来的。②

广西银行成立以后，主要经营官方和私人款项汇兑，开办各种形式的储蓄，扩大商业贷款范围，同时发行期票、钱票和兑换券，调节货币流通。开业一年，即获纯利4万两。③ 但是，由于银行初办，新式银行的专业人员缺乏，主持业务者全来自旧式的票号，其组织与经营亦多参照票号办法。所以，"严格地讲，当时的广西银行，实在还没有具备现代银行的规模"④。因此，并不能有效地发挥银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至于近代广西的币制，则以小洋为本位，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经济色彩。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名目繁多，相当复杂。既有各式

① 柯逢时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五。又参见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第二章《广西官银钱号》，71～76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②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1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③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140页。

④ 黄蓟：《广西金融发展之检讨》，见《广西之建设》第二册，373页，1939。

制钱、铜元、银毫，又有咸丰初年广西官钱局发行的制钱票，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广西官银钱局发行的各种银元（两）票、铜元票、制钱票和兑换券，以及一些私营票号和自发的少量钱票、期票和凭票，还有某些典铺、商号私自发行的少量钱票。[①] 外国货币则有墨西哥鹰洋、法国银元和纸币、英国银元，以及西班牙、日本等国的银币，还有香港地区的港币。这些货币，在邻近广州、香港和邻近越南的地区广泛流通，往往成为大宗交易的重要流通手段，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这是研究广西近代金融史时不应忽略的。

附带指出：随着水陆交通运输的兴办，农业、工业、矿业和商贸事业的发展，广西的电讯传递事业也比以前有所进步，电讯机构的建设也有了改进。据1909年7月27日（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张鸣岐奏称：

> （广西）添设边防柳、邕各处电线，纵横二千三百四十五里，业已次第施工，设局通报。从前两广电报，官线、商线分归两局。现已将广西境内线路，划归本省自办，即将从前桂林电报分局改为广西官电总局，并分设分局十余所。复于总局内附设电报学堂，以期电务无乏才之虑。[②]

通讯的进步，有利于实业的发展，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综观近代广西的社会经济，直至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基础极为薄弱，以之与封建经济相比依旧不成比例。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工厂的建立与矿场的开发不成比例。而本地资本家与客籍资本家也不成比例。此外，商营工矿又常受封建统治势力的侵蚀与压制，使它在产生与发展中步履艰难。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同时，并没有向广西投资设厂和办矿。[③] 对外贸易的大量

①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235页。

②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一五。

③ 据《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册，第5~7页刊载的统计，1896年至191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投资10万元以上的工厂共91家，矿场29家，而在广西并无一家。

入超，进出口关税得不到和外商享有同等待遇，商品销售价格受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所支配。这一切，构成了近代广西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并且打上了深深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烙印。

第十三章　行新政，办新学，育新人

在变法维新的推动下，随着举办新式农业、工业、矿业和交通事业等的需要，废除旧学、兴办新学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初年，清廷居于“富国强兵”和推行新政的考虑，也日益感到办新学、习新知的必要。于是，在行新政、办新学、育新人的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各类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新式学堂，伴随科举旧学的废除应运而生。只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其发展程度远逊于沿江和沿海省区，就省内而言，各地发展的速度与高度也显得极不平衡而已。

一、从旧学到新学

近代广西的旧学

近代广西的学校教育，从19世纪40年代直至80年代，仍旧是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封建旧学的一统天下。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

战争，与此同时，天地会反清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都没有使那些醉心于科举功名的封建士子有所觉醒。洋务派的各种言谈和实践，在他们中间很少发出回应。

官学是封建教育的主体。根据统计，清代广西的府、州、厅、县学共有79所，其中的百色府学、恩阳州学和镇边县学，则是19世纪70～80年代才创建起来的。而清代广西的书院，共计205所，连同兴复前代的书院，计有221所。其中属于近代新建的即达50余所，占全部书院的四分之一左右。至于以教授识字和传授基础知识为主的社学、义学与私塾，以及教授学生学习“四书”、“五经”的经馆（又称大馆），则是为数更多。可以说，上述各种类型的旧学，直至近代，依旧遍及广西的各个府、州、厅、县，只是分布的多少不同，办学的条件与成绩各有差别而已。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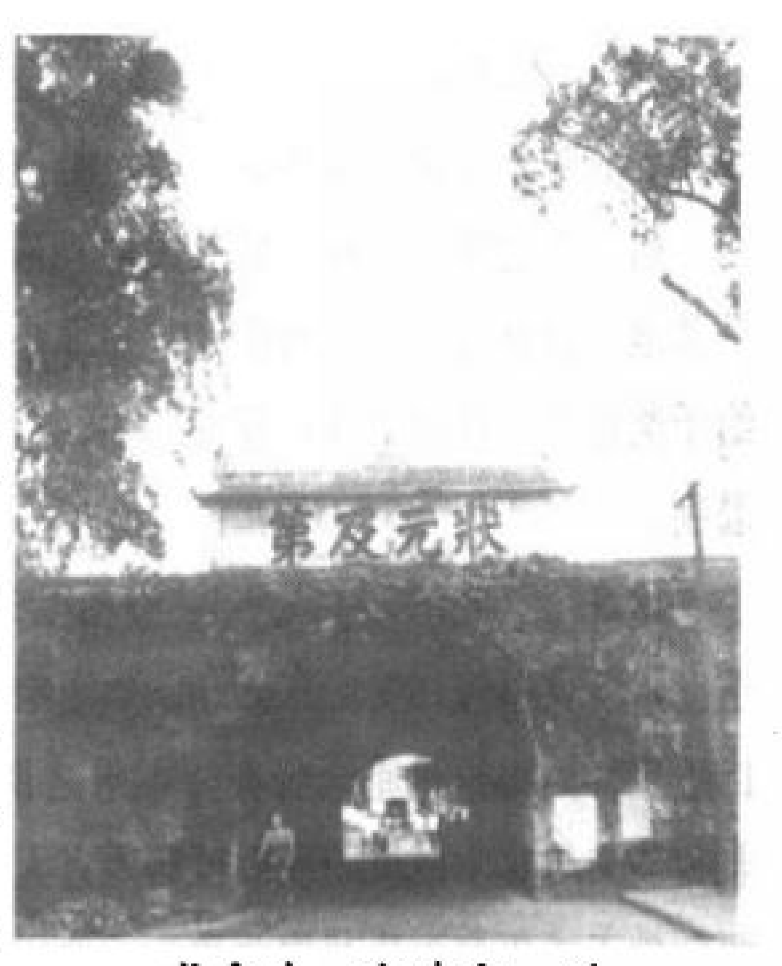
官学、书院、私塾，其生徒来源、入学资格、教学组织、教学要求和使用教材等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从蒙馆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幼学琼林》，至各府、州、厅、县学和书院所学的“四书”、“五经”等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主义的所谓“圣贤之书”，仍旧是教书育人的主要依据。片面尊崇“心性义理”，鄙薄致用实学的思想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依旧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科举考试，仍然是封建王朝“取士”和学子“致仕”的主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从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开端的1840年，到取消封建科举考试的1904年，60多年间，广西的举人考取进士者即达306人，另有恩赐进士4人，超过了有清一代广西文科进士587名（含恩赐进士）的半数。② 继临桂的陈继昌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荣获“三元及第”之后，又有他的同乡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姚先后考中了状元，于建章考取了榜

① 参看李德韩、蒙仁昭主编《广西通志·教育志》第一篇，《官学、书院、私学、科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广西通志·教育志》列近代65年间的进士303名，此处补入原属广西怀集县进士2名，以及该志漏列的灵川籍进士周绍昌（光绪二十年），共有306名，另加恩赐进士4人，合计310名。

眼。① 不少封建士子，都以他们为榜样，苦读孔孟之书，埋首于帖经墨义，醉心于科举场中讨生活。

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紧，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愚昧，造成了国家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使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非进行变革不可。于是，与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图存的同时，变法维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主张应运而生，具体落实到教育上，则是废除旧学，兴办新学。



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状元及第”坊

新式教育的兴起

广西新学之兴，如前述，较早而且影响较大的，一方面，可以追溯到洋教士在广西创办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就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在桂林成立的“圣学会”。这个变法的组织以尊孔教、传圣道、育人才、救中国为宗旨，在“会章”中虽有“集会读经”的规定，也有广购图书仪器，编辑出版报纸，设立学塾，开办农、工、商三业学堂等应办的要务，它所反映的就是教育和文化两大问题。

1898年6月，光绪帝载湉接受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下诏“明定国是”，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废除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并于7月创办京

① 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状元。张建勋（1848～1913），字季端，一字季棠，临桂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状元。刘福姚（生卒年不详），原名福尧，字伯棠，一字伯崇，号忍庵，临桂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状元。于建章（生卒年不详），字健璋，一字殿侯，临桂人。同治四年甲寅科榜眼。

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主持，以“广育人材，讲求时务”为宗旨，议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是为新政措施之一。同时命令各省会及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以及民间祠庙不列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各级学堂及地方自办之义学、社学等，一律中学、西学兼习。绅民捐资兴建学堂者给予奖励。① 百日之后，政变发生，新政中止。但迫于形势，兴学之风未可遏制。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苍梧严式镠创办梧州中西学堂。式镠早年就读于广州广雅书院，受广东开办新学影响。结业后回梧州，借传经书院办大馆。1896年，因得梧州厘金督办谭国恩之助，将大馆改为西学堂，除习中文外，兼授英文与算学两科。后因得到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严式镠始于1899年将西学堂正式更名为梧州中西学堂，改以清德观、常平仓等地为堂址，经费由官府拨给，招生人数增至120人。开设中文、英文、算学三科。教师除严式镠以学监兼授国文外，尚有胡汉民、平海兰等人。② 由于梧州中西学堂的前身西学堂已经中学与西学兼习，所以，从它的源流而论，应是广西讲求新学的第一家，而严式镠堪称在变法维新大潮推动下，在广西正式开办新学堂的第一人。

但是，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废科举时创办的新学堂，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与外国教会有关系的，人们厌恶教会，所以也都非

---

① 参看《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谕；卷四一九，同年五月十五日谕；卷四二〇，同年五月二十二日谕；卷四二一，同年六月初一日谕。

② 参看陈雄林、侯雅云：《严式镠传略》；李济深口述、张克明笔录：《李济深略历》；李煜平、韩省之：《李济深传略》；廖拓整理：《清末梧州废科举兴学校概况》等，分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第五、第十二辑。梧州中西学堂成立的时间，各文所说不同。此处据《李济深传略》及其他有关记载推定。

常厌恶和排斥学堂；入学堂读书的人，被叫做“人教仔”，遭到歧视。[1] 当时梧州中西学堂的文史教员是胡汉民。他在学校任教时，虽然还不是同盟会员，却已有强烈的“反满”思想，在教学中经常诋斥清廷的腐败统治，因而受到守旧士绅的攻讦。胡汉民为此而被迫离去，严式镠也因“包庇”胡汉民而被解除了学监职务。[2]

同在1899年，广西巡抚黄槐森仿照广东广雅书院的堂规，将桂林文昌门外机械局旧址加以改建，奏请设立体用学堂，聘请同情变法的唐景崧主持堂务，开设经学、算学等科。经学总教习由唐景崧担任，“课经艺、策论，颇能鼓励士气”。西科总教习为利文石，“课中西算学”，另设小学，课英文、算学、国文，选年在二十以下之青年学之。马君武、邓家彦、黄宏宪、曾汝璟、何锡龄和刘崛等都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体用学堂中学与西学并习，顾名思义，实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3] 由于这是官府正式奏设的学堂，所以，它在兴学堂，讲新学，开风气方面，影响极大。

---

① 李济深口述、张克明笔录：《李济深略历》，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② 陈雄林、侯雅云：《严式镠传略》，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冯自由在《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见《革命逸史》初集）中说：1903年，胡汉民应沈雁潭（赞清）之聘，充任梧州中学堂教员，主讲国文、修身等科。“汉民素擅辩才，思想新颖，议论风发，全校翕然宗之。有时议论时政，语涉激烈，则再三诫诸生曰：‘现时官吏耳目众多，文网周密，君等议论时事，只宜宣之于口，万不可形之于笔墨，致授人柄。’未几，成立梧州师范学校，汉民亦任教席。梧州府程道元到校监视被冷落，心怀不满。适有顽固士绅数人叫嚷解散中、师两校。程道元遂加胡汉民‘提倡革命，诋毁孔孟，不敬上谕等罪名’，诬告于两广学务处张鸣岐。两校学生亦派代表十数人赴粤，控告程道元‘玩视新政，蹂躏教育’。张鸣岐查阅胡汉民所编各种讲义，并无只字与革命有关。结果，程道元被‘颇以兴学自负’之两广总督岑春煊严斥，并记大过一次，胡汉民亦因沈雁潭它调失去奥援，遂辞职返粤。”并志此以供参考。

③ 《马君武君复讯》，见黄炎培辑：《清季各省兴学史》（续）五、《广西》。又：利文石，他书作利石文。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役，清政府妥协投降，于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周以后，清王朝即向全国各地方督抚发布诏令，重申兴办新学的必要性，开头就说："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继则曰："近日士学或空疏无用，或浮薄寡实。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进而命令各地方督抚、学政，"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者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术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庶几植基之本，成德达才"。要求地方官吏在"慎延师长，妥定教规"等方面，"切实通筹，认真举办"。① 接着，又在1902年秋和1903年冬，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② 这一年，还根据慈禧太后在1901年颁布的诏令，由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人员。③ 在清廷的一再命令下，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了洋洋两千余言的奏章，极言科举之弊和新学之利，请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诏准自丙午（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科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立即停止；并命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又责成各地方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各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养小学堂。④ 1906年5月，清廷下令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作为省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专责办学。清政府的这些兴学措施，其目的虽然在正人心以固大局，维护它那摇摇欲坠的统治，

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谕；同书卷四八六，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

② 《光绪政要》卷二九，1895、1902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〇，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奕劻等奏。

④ 袁世凯奏并清谕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五。按：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等已有类似奏折，见同上书卷一七八。

但对兴学堂、讲新学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它为全国，也为广西各类新式学堂的出现形成了良好的气候。

二、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

在清政府一再明令兴办新学、颁定办学章程的推动下，20世纪初年，广西官绅多有热心兴办新学的，各种类型的新学堂纷纷出现。现依学校的类型和等级，分别简介于后。

普通教育

普通教育含小学和中学教育。小学教育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以及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

广西新式小学堂的大量出现，主要在1905年清王朝明诏废除科举取士之制，讲求实学，“培养人才，以济时艰”以后，特别是1906年2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三日），根据巡抚李经羲、学政汪诒书的奏议，设立广西学务处，由巡抚与学政任督办官；各府、厅、州、县则根据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相继成立劝学所以后，办学之风大盛。同年5月，广西遵照清廷命令，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是为省一级教育行政机关，下设学务公所，分置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科。翰林院编修李翰芬受命署广西提学使，在督抚节制下，统辖全省学务，积极兴办新学。据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全省有各类学堂728所，在校学生32253人，但不及全省人口的二百分之一。[①] 到了1909年（宣统元年），全省十一府、一直隶厅、

① 萧凤韶:《广西善后刍议》,70页;《广西谘议局第一次报告书》下编,《学务条》。

一直隶州所属的77个州、厅、县的普通小学堂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广西各府、厅、州普通小学设立表①

	高等小学堂	两等小学堂	初等完全小学堂	初等简易小学堂	半日学堂	合计
桂林府	2	26	119		2	149
平乐府	1	18	70			89
梧州府	4	6	109	2		121
南宁府	1	16	23			40
柳州府		17	52			69
庆远府	1	6	17			24
泗城府		6	10			16
思恩府		15	15			30
太平府		10	37			47
浔州府	4	10	21			35
镇安府		9	9			18
百色厅		3	2			5
郁林州	12	59	89			160
合　计	25	201	573	2	2	803

① 资料来源：据宣统三年《广西学务提要》之《广西省各厅州县普通及实业学堂筹备表》（宣统二年份）改制。

从表列的数字可知，在当时设立的普通小学中，初等完全小学堂开办最多，分布也最为普遍。在77个厅、州、县中，当时尚未成立小学的只有庆远府的安化厅（今环江县）一处。其中办成10所以上小学的有昭平、恭城、怀集（今属广东）、马平、宾州、贵县、兴业、博白、龙州等地。设立20所以上者有阳朔、灵川、雒容、陆川四县。办成较多的有郁林州的40所，灌阳县的53所，而岑溪县办成80所，居全省之冠。合初、高等小学于一校的两等小学堂次之，除平南、怀集两县，钟山、安化两厅外，其他厅、州、县都有一所至数所之多，其中又以郁林州的21所、陆川县的28所为最多。高等小学堂数量较少，而且在少数民族较多的五个府、一直隶厅尚未设立。从各类学堂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桂林、梧州、平乐、柳州四府和郁林直隶州。仅郁林直隶州及其所属的陆川、博白、北流、兴业四县，共办各类小学即达160所，超过桂林府的149所、梧州府的121所、平乐府的89所、柳州府的69所，而居全省之冠。其他七府一直隶厅共有各类小学215所。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创办伊始，经验不足，加以办学经费、师资条件、教学设备等限制，真正合乎要求，并能坚持而又得到发展的，实际并不很多。以梧州府的容县为例，1906年报告成立各类小学堂60余所，但不久即停辍过半，至1910年，保存者仅7所而已。

因为小学是其他各类学校开办的基础，李翰芬出任提学使以后，即定7岁以上之学童皆有就学之义务，强调急应调查及龄学童，分区遍立小学。其后因初等教育尚未普及，“准许至十岁入学”①。但是，由于学堂有限，加以各种社会原因，欲求普及，远非易事。为了补救这种缺陷，并在节省办学经费的基础上便于乡僻子弟，“士农工商，下至厮养之役，凡有余力，皆可乘隙入学”起见，又提倡开办初等简易小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并酌照简易识字学塾办法，设立半日学堂。但是，成效甚微。1910年，初等简易小学堂只有

①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学部奏准颁行《限制招考章程》第十四条，见《广西学务提要》，27页。

梧州府苍梧县的两所。半日小学堂两所，则集中在桂林府的灌阳县内。[①]

应该指出，当时私人投资兴学也很踊跃。根据报道，仅在1905年，就有临桂廪生蒲璧等“约合同志，设立公益小学堂一所”；桂林绅士唐延芬“联合同志就地筹捐，在省城（开办）公立两等小学堂，以为各属民立之倡”；永宁州钟某“邀集绅董劝捐巨款，建设小学两区”；苍梧志士李、邓二君“捐资私立明新学社”；还有广西旅京官绅集议在北京北柳巷广西新馆开办“旅学”；旅桂粤绅石德芬提议：“创办广益学堂，俾同乡子弟得以就近肄业。”[②] 因限于经费和其他办学条件，私人办学只能以小学堂为主。

中学堂的设立以梧州府为最早。1903年，梧州士绅受广东开办新学的影响，率先创办梧州府中学堂，并将1899年设立的中西学堂并入。1905年，曾在广东任武备学堂总办的庄蕴宽出任梧州知府。在他的支持下，毁冰井寺建冰井学堂。[③] 1904年，浔州知府张祖祺倡办浔郡中学堂预备科。两年后，建成浔郡中学堂。1907年，增办桂平中学堂。同年，容县士绅就绣江书院开办公立容县中学堂。而桂林虽为省垣所在，但巡抚、学政办事皆以朝廷意旨为转移，所以直至1905年9月23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始以文昌宫内原桂林守备衙门为校址，设立桂林府中学堂，校舍全部新建。1906年，创办中学堂的有平乐、南宁和泗城三府，柳州、庆远和太平三府各于1907年开办中学，[④] 郁林直隶州中学堂则办于1908年。而思恩府之武缘县与那马

① 《广西省各厅州县普通及实业学堂筹备表》（宣统二年份），见《广西学务提要》，8～14页。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第八期、第十一期，《教育》。

③ 前引《马君武君复讯》说：冰井学堂“系私立中学性质”。民初改为省立第一师范。

④ 据张振民：《回忆“龙城求是学会”》一文说：1904年，柳州人邓子恢以科举已停，新学未办，乃创办“龙城求是学会”，召集青年30余人开会讲学，研究新旧知识。1905年，成立柳郡中学堂。见《柳州市文史资料》第三期。并存此以供参考。

厅，兴隆、白山等土司，以及宾州、上林、迁江三县，也在清宣统年间创设了中学堂。凡各府及直隶州设立的中学堂，皆属官立性质。而县办的如桂平、容县与宾州、上林、迁江三县所立中学堂，则属公立性质。至1910年，全省的府、厅除镇安府、上思直隶厅及归顺直隶州未能设立中学堂外，计有官立中学堂11所，公立中学堂3所。因泗城府中学堂系与百色厅合办，且学堂设于百色；而上思直隶厅与归顺直隶州之学生按规定可以“暂附学南宁”。所以，真正尚无着落的只有镇安一府而已。① 所有府、州、县的学堂，皆在所属的县、州、厅内招生入学。

应该指出，当时不少官绅对于兴办新学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泗城府与百色厅合办的泗城府中学，1905年4月，在两广总督岑春煊与两广学务处的支持下，筹集经费银19900余两，派人往广州购置学堂需用之仪器、标本及各种校具，另以专人分赴邕宁、恩阳等地购买木料砖瓦，并请工程师“仿照日本学堂的规模，改易华式详细绘图”，兴工建筑校舍，历时10个月，共建造讲堂、礼堂、图书室、阅报室、仪器标本室、师生宿舍以及各种生活用房近70间。② 较早地把一座颇具规模的新式学堂在僻远的百色厅建立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至于女子学堂的设立，诚属为数寥寥，且极不稳定。1904年，容县人陆宠廷因受胡汉民讲学的影响，捐资倡设女校，请黄用甫拟订章程，聘桂林高等学堂总理沈雁淡之夫人及女儿为教习，取名珊萃女学堂。③ 这当是广西较早的女子学校。第二年，容县又有龙胆女学堂成立。④ 1908年，桂林府、县

---

① 《广西省各府直隶厅州中学及女学筹备表》（宣统二年），见《广西学务提要·总务科》第7页。又据梁子桢《平南中学史稿》（上）说：1909年举子凌天衢，秀才林培材筹办平南中学堂，越年完成，先办中学预备班。见《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 田骏丰：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泗邑中学堂建筑鸠功用料始末碑》，碑在百色市第二中学内，1983年作者访得。

③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五期，《教育》；第二卷第十一期，《教育》。

④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期，《教育》。

奉抚院之命，照章创设女子师范简易科，并附女子初等小学及手工各一科。女师范生以16岁以上，25岁以下，粗通文字且不缠足者为合格。① 据《清末民初广西兴学纪略》记载，广西之女子小学堂以“苍梧、龙州、桂林最先创办，桂平、昭平、崇善、永康、宁明、下冻各属亦随之开设，截至光绪末年，共计十一所，学生五百一十一人”。此外，马平知县丁立群于1908年以县城节孝祠为校址，建立马邑女子小学堂，以杨原真为校长。② 但是，因为这些学校时办时停，不能长久。所以，《广西学务提要》之《各府直隶厅州中学及女学筹备表》，对“宣统二年份”的“女学”则完全缺载，只对各府及直隶厅、州应添或筹备创办女子学校的名称与数目提出意见而已。女学兴办之所以迟缓，原因甚多。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作祟；或因家庭的与社会的种种限制，使女子就学备为艰难。所以，女学虽因一时风气鼓动而在某些州县得以兴办，但对它进行合并甚或裁撤者亦接踵而至。如1906年桂林创办的女子小学，仅附设于女子师范内。③ 同年，桂平县士绅周秉道、黄炽昌等创建桂平女子学堂；1907年建立的桂平正则女学堂；1908年又有桂平军陵、赵里、宣一里等女学的设立。但多是昙花一现，不一二年即纷纷停办。④ 而陆宠廷捐资兴办的女子学校，因在校内“鼓吹革命，青年学生多受其感动。为清廷所忌，学校被解散”。他被迫远走南洋，继续为革命奔走。⑤

关于各类学校的教学，根据1909年改定的中小学教学章程，其开设课

①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一期，《教育》。又据同书第三卷第十期《教育》栏记载，1906年，临桂有谢刘氏禀准学务处创办桂林第一女子学堂，并有曹覃氏助银300两作开办经费。

② 刘三余：《柳江县清末教育概况》，见《柳江文史》第四期。

③ 据陈毅武在《我所知道的桂林女师》一文说：“桂林女师最初的校名是桂林道属二十县合立桂林女子师范讲习所，约创办于一九一〇年。所址设在桂林依仁路。”见《桂林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今据《清末民初广西兴学记略》。

④ 凌崇征主编：《桂平县志》第二十三编《教育·科技》，第二章《普通教育》第二节《小学教育》。

⑤ 《陆宠廷烈士》，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程、使用教材、修业年限、考试考核及升级留级，皆有具体规定。如初等小学堂完全科五年毕业，主要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体操五科，并附以乐歌、手工、图画，作为随意科目。简易科分为两类：程度较深一类定为四年毕业，程度略浅者定为三年毕业。主要课程为修身、中国文学、算术三门。学堂设在城镇者体操为必修科目，设在乡村者，体操与手工、图画皆作为随意科目。修身课本专用《孝经》与《论语》。高等小学除教习上述课程外，可以加授农业、商业等课程。

中学堂课程十二门。文科以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而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理科以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科，而以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与体操为通习。而不论文科、理科，皆以五年毕业。

女子小学堂无论高等或初等，皆定四年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课程有修身、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与音乐十门。女子初等小学无格致课，而以修身、国文、算学、体操、音乐为主课，图画与女红课则于第二年或第三、四年添设。①

从普通教育的各级学校开设的课程考察，培养“忠君、尊孔与尚武、尚实”人才是其办学宗旨。② 但在教学安排中也确实力求增添各种新的学科内容，给人以一些新的知识。而中学堂的文科与理科，小学堂的高等与初等，以及初等小学堂中之完全与简易，城镇与乡村都有不同，所设课程亦各有轻重、缓急、必修与通习等等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进行教学的正确办学思想。此外，各级学堂皆重视体育与美育，也是这时兴办新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① 普通科各级学校章程，见《广西学务提要·普通科》，1～5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五七，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谕。

师范教育

兴办新学需要大批了解新学，具有新知识的教师。为了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培养各类师资的各级师范学校应运而生，为广西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梧州开办新学最早，广西的第一所师范学堂也于1903年在梧州建立起来，名曰师范讲习班。当时，广西大学堂已改为高等学堂。1904年，巡抚柯逢时、学政汪诒书在桂林创办师范速成班，附设于高等学堂内，学制一年。时因各处急需教师，1905年，又在高等学堂内开办半年毕业的师范传习科。1906年夏，广西学务处将高等学堂正式改组为简易师范学堂，以沈赞清为监督。① 开办初期，所有学生由省内各属在举贡生员中选送考录。1907年，改由学堂自行招考，均定一年毕业。年底，简易生全部毕业，即停止续招。

小学教育是兴办新学的基础。为了解决各地急需的师资问题，提学使李翰芬决定把全省划分为三区，分设初级师范学堂：以桂林、柳州、庆远、思恩四府为一区，合设一校于桂林；以平乐、梧州、浔州、郁林四府（州）为一区，合办一校于梧州；以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归顺、百色、上思七府（州、厅）为一区，合设一校于南宁。各校学生均由各属选送，经费由各属分担。② 梧州初级师范学堂于1908年3月17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开学，称第一初级师范学堂。③ 桂林初级师范学堂于同年10月开办，称

---

① 沈赞清，福建侯官人，前在梧州办学，已于上述。时为广西候补道。广西高等学堂、桂林中学堂与临桂两等小学堂，皆其经手创办。后因与提学使李翰芬意见相左，遂调充副职。

② 关于梧州、桂林、南宁三个初级师范学堂创办的具体情形，参看唐现之：《清末本省的师范学堂》一文，见《广西教育研究》1942年第三卷第四期。

③ 梁福波在《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史略》一文中说：1905年，梧州知府庄蕴宽思想倾向维新，竭力奉行新政，将梧州东门外冰井寺拆毁，建立中学堂，旋更名初级师范学堂，再改名为四府初级师范学堂。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南宁一区因筹款与招生皆感困难，延至1909年4月始成立开学，是为第三初级师范学堂。除梧州一校招收本科生，学制五年毕业外，其余两校皆先开办预科，并附设简易科，均定二年毕业。

至于原有的简易科师范学堂，则改办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为宗旨，定额至少须满二百人”。1908年2月正式开学，先招选科生，分史地、理化、博物、数学四类，并附设体操专修科，均定二年毕业。为了培养女学师资，1907年底又在桂林以守备衙门旧址开办广西女子师范学堂，定二年毕业。这是广西创办女子师范的开始。

与此同时，省内各州县为了解决本地办学的师资问题，也多独自或联合设立简易速成学堂、师范讲习科或传习所等短期训练机构。有的独立成校，有的附设于中学堂或小学堂内。在省城桂林，还有团体或私人设立的师范学堂，如桂垣私立大成简易师范学堂、[①] 私立体育专修科等。这些短期的师资训练机构，虽多时办时停，不能持久，但至1908年全省分区开办师资学堂之前，前后总计不下34所，毕业生共2000余人，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1908年分区开办师范学堂以后，此类短期师训机构锐减，余下者仅有19所。[②] 各级师范学堂的入学资格要求极严。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以曾在师范简易科毕业，或在中学肄业二年以上，经学、中文具有根底，年龄在18岁以上之纯谨学生，则令先入预科，然后再入本科。初级师范学堂预科则取年龄尚稚、中学

---

① 桂垣私立大成简易师范学堂是一所办学时间较久、取得成绩较好的私立学校。从该校监督谭育麟于1911年3月12日（宣统三年二月十二日）发给该校“最优等生黄有熊”的毕业文凭看，它的学制、课程、考核与官立或公立学堂无异。原件存象州文物管理所。

② 此处据《清末民初广西兴学纪略》。又：《广西省教育研究》1942年第三卷三期载有《广西全省简易师范及师范传习所一览表》（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可知当时广西全省共有各类师范40所（当时已报停办者21所）。其中官费32所，公费3所，自费5所，已毕业人数见于报告者有2436人；在校人数见于报告者469人。两者可以互相参对，以见其兴废变化情况。

尚浅之学生，先行补习各项普通课程二年，再入本科。简易科则取年龄较长、中学较深，并于各学科知识有一定基础者始算合格。

师范学堂开设课程，预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英文共十门；简易科不修读经讲经与英文两门，改习教育与音乐。[①] 1906年，庄蕴宽由梧州知府升太平思顺道道尹，兼镇南关监督，统领边防全军，驻龙州。他仿照日本的办法，在龙州简易师范学生毕业考试以后，补习兵学七周，并于星期日添讲法政大意，增进学生的政治军事知识。嗣后省城桂林各简易师范学堂依照执行。这是当时的学部章程没有规定的教学内容，实乃广西新教育的又一特色。

实业教育

广西开办实业教育，时间较早。光绪中期马丕瑶任广西巡抚时，因大力推广桑蚕生产，即注意举办有关桑蚕生产的教育。其后各界官绅根据广西实际情况，亦多主张发展农科与桑蚕事业。1910年，广西学务公所制定实业学堂发展规划，又提出在77个府、州、县中，应添设初等农业学堂42所，其中17所为蚕业专科学堂；筹办艺徒学堂42所，其中宾州16所，临桂11所，已超过拟建艺徒学堂的半数。此外，还建议筹办全为农业科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17所，蚕业讲习所11所。这个筹办实业学堂的规划，全属农桑事业，而且偏重在桂东南地区，比较适合广西当时发展各种农垦和桑蚕事业的实际需要，也反映了官绅们兴办实业教育的迫切愿望。

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直至1910年，广西兴办实业教育的成效甚微。其兴办成功的主要有：1906年，梧州士绅首先成立商业学堂，[②] 同年

① 参看各级师范学堂章程，见《广西学务提要·普通科》，第1～2页。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期，《教育》。

冬，梧州府开办的长洲中等蚕业学堂，招收学制两年的本科生。[1] 1907年5月，庄蕴宽在龙州开办边防中等实业学堂，先办农业预科，随后专办蚕业本科。1909年，改办龙州中等农业学堂。梧州、龙州两校本科学生毕业后，派赴省内各地推广并改进桑蚕事业。于是，容县、贵县、隆安、左州、郁林、那马、马平等处亦相继设立桑蚕所，讲习并研究桑蚕事业。1907年冬，奉派前往日本调査农林畜牧事业的黄锡铨回桂，于第二年2月在临桂东方六合团同和村开办广西农林试验场。1909年改为中等农学堂。先设预科，不久，分设农业、林业、蚕业和畜医四科。学生由省内各地选送，以培养农林劝业员为主要培养目标。[2] 教师多从德国和比利时选聘。据统计，至1909年，广西共有实业中等学堂三所，学生410人；初等实业学堂一所，学生49人；实业预科三所，学生32人。[3]

工业教育的兴办又逊于农业。直至1907年10月，才在桂林的文昌庙、宝相庵开设艺徒学堂两所，学制二年，教以织布、织毛巾及各种洋布，并拟成立习艺所和模范工厂与之配合。为了解决师资问题，1908年10月，又在桂林开办工业简易科教育讲习所，亦以织染为主，仅办三届即结束。随后，又在铁佛寺成立速成工业学堂，仍以织染为主。但学生不多，到1909年即停办。

总之，广西的实业教育，当时还处在草创阶段。

---

① 据梁曜南在《长洲文化概略》一文（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说：蚕业学堂学生来自广西各县，学监是苍梧人欧文川。该校课程以养蚕、染织蚕丝为主科，并开设日文课，附设有织染场。又说：长洲蚕业学堂全称为“广西省立第一甲种蚕业学校”。典按：广西设立“梧州省立第一甲种蚕业学校”，“桂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是民国初年的事，见王国柄：《广西职业教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载《广西教育季刊》创刊号，1946年9月，并存此以供参考。

② 宣统《政府官报》第四六〇号，宣统元年正月二十日。前引《马君武君复讯》说：“张鸣岐初设之农学堂，设备颇佳。由闽人魏子子主持，教习皆比国人。地点在桂林东门外魏（卫）家渡”。即指此校。

③ 周谈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

武备、法政教育

讲求武备和法政教育，是强化国家机器的需要。随着裁撤绿营与编练新军，新式武备教育被迅速提上日程。1905年，广西巡抚李经羲以新军缺乏将才，于是年冬初在龙州开办了随营速成学堂，半年毕业。优秀生派充新军基层骨干。同一年，龙州开办了将弁学堂一所。不久，改为讲武堂，先后由庄蕴宽、蔡锷为总办。① 1906年，又因测绘局成立，需用测绘人才，遂创立测绘学堂。1907年3月，再在桂林设立陆军小学堂，以蔡锷为总办。学制三年，教学分学、术两科，学生毕业后可入陆军中学堂深造。1909年，桂林成立新军混成协，于是开办学制一年的干部学堂，专为新军培养下级军官。开办两期，共得毕业生200余人。数年之间，广西开办之武备教育学堂多所，主要集中在省城桂林及边关龙州两地。办学的骨干，多是由兵备处总办庄蕴宽、督练公所帮办钮永建从国内各地引进的留日陆军士官生，同时，还聘请了不少日本教官前来任教。②

建立警察队伍，也属新政之一。1904年5月26日（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巡抚柯逢时奏："筹设省城警察巡军，归并保甲，以节经费，其省外各属，俟军务粗安，拨款次第举办。"③ 这是广西筹建警察之始。

为了培养警政人才，1905年先在省城桂林分区设置警察教练所。同年9月，成立警察初级学校。1909年，又开办广西高等巡警学堂，内设高等和简易两科，各招生60名，学制分别为三年和一年。以法学和警察学为主课，余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一，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郑孝胥奏："开办边防将弁学堂，并就地添练洋操新军。"得旨："下练兵处知之。"又参甘又新：《记龙州新军》，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② 参看陈雄、尹承纲：《广西陆军小学堂》；李书城：《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新军干部学堂和新军小学堂》；以及杜誉钦：《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甘又新：《记龙州新军》等文，俱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九。

按学部规定办理。[1] 可是，因为广西地处边陲，财政既有困难，人才也十分缺乏。为此，巡抚张鸣岐于是年9月25日（八月十二日）上奏清廷，请求从三个方面酌量变通部章规定，即：第一，部章规定巡警学堂应授英文或日文一科，而广西紧邻越南，请示变通改授法文，以适应实际需要。第二，部章规定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以本省举贡生员及曾在中学堂以上毕业者考选。现拟凡有与中学程度相当，无论本省、外省，均可参与考选。第三，部章规定每厅、州、县应设一警察教练所，每所名额至少百人。现拟区分五等，或自设一教练所，或合数属共设一教练所，计全省共设四十处。[2] 由于设置省城模范监狱的需要，在开办高等巡警学堂的同时，又开办了半年制的监狱学堂。

以培养新式法政人才为目标的法政教育，则始办于1906年冬初（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倡办者为巡抚林绍年。初以桂林秀峰书院旧址为校舍，名法政讲习所。考选各地官绅100余名入所学习，一年毕业。1908年，巡抚张鸣岐命扩展校舍至定粤禅林，改办法政学堂，以骆成骧为监督。因当时广西尚无中学毕业生，乃先办讲习科和别科。前者一年毕业，后者学制三年。分别考录官绅入学，是为官班与绅班。是年9月开学。因官班学员多来自任所或属候补官员，且年长者多，所以多入讲习所，以求速成，愿入别科者极少。于是，奏请学部拣发举贡200余员，并收捐纳人员入校肄业。绅班则由各州县考送。由于1910年



广西法政学堂旧址

① 参看《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教育》；《资政院奏核议广西高等警察学堂招生办法请旨裁夺折》，见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一日《顺天时报》。

②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二〇。

(宣统二年) 即须成立“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①，所以，张鸣岐又命令法政学堂在教学上“酌加钟点，添设关于裁判各科学，以备任使”。在此期间，太平思顺道庄蕴宽为普及边民法政知识，培养佐理边防事务人才，亦于1907年5月在龙州开办边防法政学堂，分为速成与预备两班，学制均为一年半。庄蕴宽自任监督。不久，庄蕴宽去职，改由杜之秋继任监督。②

高等教育

严格说来，有清一代，广西尚无合乎要求的新式高等教育。前述1899年成立的体用学堂，虽然采取分科教学，师资的水平与教法堪称优良。但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尚未达到高等教育应有的要求。而其学制，则“是介于旧时书院与近代学校之间，新旧教法参和采用”的那一套。“所习的学科不多，有许多切实有用的学科尚未设置”。多数学生虽然是经过考试人学的生员，但是由于当时科举尚未废除，所以真正“为求学而读书的尚居少数，为博取功名而读书的比较多”。这些，都是当时在体用学堂学习者的亲身感受，应该是可信的。③

1902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奏改体用学堂为广西大学堂，以翰林陈昭常为监督。陈昭常曾留学日本，时为广西特用道。由举人刘伯铭担任提调。他籍隶广东南海，时为广西补用知县，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体

① 据宣统二年《广西官报》纪载：1910年7月9日（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桂林高等审判厅和桂林地方审判厅、临桂初级审判厅成立，同时成立了与之相应的各级检察厅。这是广西实行“新政”，具有新式司法、检察机关的开始。同年12月2日（十一月初一日），梧州商埠审判厅和苍梧初级审判厅成立。

② 参看《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十一期，《教育》；《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二〇。

③ 张瑞：《清末桂林的书院和学堂》。作者当年是体用学堂的学生，在文章中介绍了体用学堂、广西大学堂和广西高等学堂的具体情况，值得一读。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用学堂虽然改名广西大学堂，但学制依旧，教学作风“仍未能尽脱书院旧习”[1]。只是招生规模扩大，正斋学生120名，从举贡生员中择优考录；备斋学生100名，从童生考选。专修经学、史学、算学和英文四科，各科设教习一至二人。分定课程，按时讲授。正、备两斋各科又设学长一至二人，协助教习评审学生札记，拟定分数，再由教习复核。各科学长由在堂学生中选任，每月另给津贴银十两。这是广西大学堂在教学组织上不同于体用学堂之处。由于大学堂提调刘伯铭和学政汪诒书都倾向君主立宪，崇拜梁启超的言论，所以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新办的《新民丛报》很快传入校内，为学生所购阅，作文、言论多仿《新民丛报》格调，学风活泼清新。这又是广西大学堂胜于体用学堂之处。[2]

1904年5月，广西巡抚柯逢时按照学部奏定章程，并以原设大学堂仍沿书院旧习，决定将广西大学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以沈赞清为监督，仍在前体用学堂旧址建校舍。同年8月21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开学。因为当时广西各地正在开办中学堂，尚无中学毕业生，只好先办预科四班，学制四年。并附设师范速成科一班，招生40名，学制一年，毕业后充任蒙小各学校教员；又附设高等小学一班，招生50名，修业四年；由此进升中学，以解决高等学堂学生来源。高等学堂预科的学习课程，仍是学部规定的中学堂科目，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化、英文等。教学采用新制，分科讲授，按时授课，较前略有改进，向近代大学办学方向迈进一步。[3] 到了1906年，因为师资不足，生员来源也有困难，而各地中学堂急需各类教师，于是又将高等学堂改为广西官立简易师范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广西官

① 《清末民初广西兴学纪略》。

② 张瑞：《清末桂林的书院和学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广西近百年历史资料》下篇（初稿油印本），《广西体用学堂·广西大学堂》，1959。

③ 《广西巡抚柯逢时改设广西高等学堂办理情形折》，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教育》；又参张瑞：《清末桂林的书院和学堂》。

立优级师范学堂，专责培养中学堂及初级师范学堂师资。1911年（宣统三年）因时局紧张而停办。

土司地区教育

广西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省内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县、土州、土司、土峒的教育十分落后。按照封建统治者的规定，除土官子弟可以就近入学读书外，一般土民都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参加各科考试的权利。直至20世纪初期，封建官府为了便于“治理土属”，“化土归流”，稳定千里边陲。1907年12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广西巡抚张鸣岐上奏清廷，以广西土州县疆域，或“居全省之中央，为四陲之绾毂”；或“与越南接壤，沿边千余里，隘卡百余处，实为南服之屏藩”；且土性沃衍，物产丰盈。可惜文教落后，治理不得其人。于是，奏请在桂林设立土司学堂，学生由各辖有土属的府、厅、州督同承审州县，从土官宗族中择其年少聪敏，粗通文义者按年选送。经费则由所管府、厅、州转饬各官族自行筹办。① 初以原桂山书院旧址为校址，后设桂林城内崇善庵。1908年9月开学，学生60余人。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兼法政三级。初等一年，高等二年，中学兼法政三年，共六年毕业。② 这是在兴办新学、实行新政潮流中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措施。

在官府的提倡和推动下，各属府、州、县也开始注意在土司、土州兴办教育，但效果并不显著。根据统计，至1910年，全省43个土州、土县、土司、土峒中，除龙州厅之下冻土州有两等小学一所，初等小学一所，半日学堂一所，女子初等小学一所；上龙土州有初等小学六所，以及明江厅之凭祥土州有两等小学一所，初等小学一所外，其余设有两等小学一所的仅有东兰州之凤山土分州，宜山之永顺正长官司，隆安县之果化土司三处；开办初等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二。

②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六期，《教育》。

小学一所的也只有奉议之上映土州，宁明之思凌土州、下石土州和上思厅之迁隆土峒四处。[1]

私塾的改造

在兴办新学过程中，还有一个如何改造遍布各地的私塾，使之逐渐与新学同步发展，并为兴办新学服务的问题。按照“省章”的规定，当时对私塾的改造，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设立塾师研究所，使旧塾师通过学习，成为新学教师。“省章”写道：“广西师范生恒不敷用，而村儒学究所在充斥。此辈墨守故辙，视馆谷为性命。用以办学则不足，因而阻学而有余。而科举既停，谋生无路，亦殊可悯。两全之法，计惟设塾师研究所以与为更始而已。”经通饬全省依章办理之后，1908年，据省内各属报告，办成塾师研究所者有临桂及大墟、义宁、灌阳、全州、富川与麦岭、贺县、荔浦、永安、苍梧、岑溪、怀集、柳城、宜山、上林、宾州、平南、武宣、郁林、兴业、天保、奉议、龙州、宁明、养利等26所。1908年2月至7月（宣统元年正月至六月），又有灵川、永宁、修仁、昭平、马平、怀远、融县、安化、永淳、横州、明江、上思等12所。经塾师研究所训练毕业之塾师，约计1100余人。

二是严饬依照新章，从事私塾的管理和教学。规定各私塾和塾师应以对儿童进行国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养成国民独立自治的思想与能力为宗旨。私塾的教学和管理，皆应遵照新章，接受学务公所或劝学所和教育会之监督、领导，按照学部新颁布的有关初等小学完全科或简易科课程，进行分班教学。学徒少于30人者不许开班。私塾的馆室及图书、仪器，亦应量力讲求。其办有成效之私塾，经地方官派同熟悉教育者会同考验，果能合格者，准予禀报立案，作为私立初等或两等小学堂，“与官立学堂得享同等之利益；倘仍从前

① 《广西省土州县土司土峒学务筹备表》（宣统二年份），见《广西学务提要》，15～16页。

旧习，不遵轨范，当由地方官勒令该塾师改图别业，毋得违抗。如敢造谣生事，即从严惩究”①。

改造旧私塾，使之向新式学堂转化。在兴办新学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助办法。

回顾清末广西兴办新学的历史，虽说正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由于经济、文化和地域等条件的不同，发展极不平衡。但是，与过去的教育相比，可以说成绩是很大的。第一，它打破了旧教育的一统天下；第二，它打破了过去女子无校，女子与教育无缘的偏颇现象；第三，它使广西的教育出现了多层次、多学科的清新格局。总而言之，兴办新学为广西走向近代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出省学习和出国留学

在全省兴办各类学堂的同时，广西有不少青年还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外出广东、北京以至世界各国求学，接受新式教育。

1905年，清政府在广东设立两广速成师范及管理讲习所，旋改为初级师范简科，再改为两广师范学堂。时于式枚以鸿胪寺少卿督办广东学政，奏准于1906年春由两广学务处将两广师范学堂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即后来之高等师范学堂。同时开办的还有两广高等工业学堂。并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支持下，成立广西旅穗师范传习所。而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政法学堂，方言学堂，广东大成初级师范简易科，广东随军学堂以及两广陆军中学堂等，也

① 《改良私塾简章》，见《广西学务提要·总务科》，42～44页。

有不少广西学子入校就读。[①] 京师方面，有桂省旅京学堂，京师翰林讲习馆，京师进士馆等，也都设有广西公费生名额。据统计，截至1909年止，广西青年在北京、广东两地各校就读的，总数达500余人。

1872年8月1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开始了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广西青年出国学习，则始于1884年（光绪十年）外国教会保送12名青年至南洋大修院学习宗教知识。[②] 而真正怀抱报国之志，出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的，则以桂林人马君武为最早。1901年8月，20岁的马君武自费东渡日本，入西京帝国大学工科。1907年毕业，得补官费，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矿学，获工学博士学位。[③]

继马君武东渡日本之后，自费出洋留学者日多。1904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两广学务处制定考选出洋学生章程，于当年夏初考选出洋学生46人，其中考送者25人，选送者21人。广西籍占3人，他们是：获得留日学习资格的桂林人李质、象州人苏寿松；获得留美资格的怀集人李灿基。这是广西青年由官府给予官费，选派出国留学的开始。从此，陆续选派或从自费生中择优改补官费，或者由各属公费派送出国留学的也不少。

1906年，学部对出国留学的要求作了明确规定，无论官费或私费，凡出国进入高等以上学堂及各专门学堂学习，必须中学堂以上毕业，并通晓该国语言文字始算合格。而且限制学习速成科，鼓励进入高等专门学校。明定“留日学生习速成者，无论官费私费，概行停派”。据1909年统计，广西全省官费留学生分配名额为：美国10名，法国6名，英国2名，德国和比利时各1名，日本27名，合计47名，数目实在太少。而此后即以此数目为定额。

---

① 据雷沛鸿在《我的小传》中说：他在前清末年赴粤，曾先后入两广简易师范学堂，广东高等学堂及两广高等工业学堂就读。见《雷沛鸿纪念文集》第248页，广西政协文史办公室，1988；《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十二期，《教育》。

② （法）和为贵：《广西天主教史》；拙文：《史志读札·广西最早的留学生》，见《社会科学探索》1988年第4期。

③ 陈春源：《广西留学史》；马君武：《一个苦学生的自述》。

1909年夏（宣统元年三月），学部准予官费留学日本官立的农、工、格致和医学四科的学校共有34所，其中仅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5所，每年即接纳中国官费留学生165名，相当于广西获得官费留学生总数的4倍。

1910年初，清政府学部对出国留学资格的要求更加严格。规定出国前应先进行外语考试，笔试要求中外文能够互译，口试要求直接能听、能讲方算合格；试卷须送学部立案备查。[①] 对于选送赴日本学习陆军的，“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且于中学已有根底，年龄在18岁到20岁；并须填清年龄、籍贯与祖孙三代履历，方为合格。[②] 因为要求严格，而广西青年学生的文化基础又相对薄弱，所以能够取得官费出国留学的极少。据《国风报》1910年第十三期载：我国“留东学生人数，合计留日官费生1347名，广西仅占3名”。又据《时报》1911年7月7日《北京专电》，全国留美学生650名，广西仅占4名。而按照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所定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计划选派官费学生400名，分4批（每年一批，每批100名）往日本学习陆军，按各省分定选派数额，广西每年只可派3名。其所占比例实在太少了！

但是，在留学潮的推动下，当时通过各种途径，以地方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广西青年却不少。据《广西学务提要·专门科》的统计，仅到日本留学的自费、公费以及少数官费生，合计达150名左右。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地处边陲的龙州，由于中法战争的影响，在编练新军，保卫国防思想的激励下，出省学习或出国留学的青年相当踊跃。根据统计，光绪季年之前，往日本学习师范、政法、军事、理工、体育等专业，而且学成回国的即达14人之多，其中7人由武建军协饷项下给予公费，另7人则为自费出国留学。还有8人也取得公费出省学习。而民国之前到广州、上海等地学习师范、政法、陆军

① 参看《广西学务提要·专门科》，6～20页。

② 参看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清政府练兵处拟订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9年第三期。

等专业的，则有近50人之多。[1] 这在当时的广西各个州县中是不多见的。

广西青年所以到日本留学的最多，首先由于清政府的公开号召。1898年8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清廷在“迅速拟定出洋游学人员章程”的诏谕中即明确指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通，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如对所学尚须“改正精确”，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亦可。[2] 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跻于世界强国之列，在甲午战争中以区区岛国而战胜我国。因此，在时人的心目中，欲求富国强兵之术，非至日本学习不可。是以当时赴欧美学习者，多以农林、矿业、铁道、理财、银行等实学为主；而留学日本，除学习农林、蚕桑、染织、制革、理化、工业、铁道、医学等实学外，学习法政、陆军、警察等科也大有人在。他们多怀有“师人长技”以报国家的赤子之心，与封建士子把科举作为个人“登龙之术”，致仕之途，借以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日本当时对中国留学生也抱欢迎甚至鼓励的态度，因为他们另有图谋。早在1898年5月14日（闰三月二十四日），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即和盘托出他们的用心。他说：接受中国留学生，可使“受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他还具体说到了各类留学生可能对日本发挥的作用。如学习军事、警政诸武事者，“不仅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留学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至于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日本之制度。若能如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则我国之势将悄悄然骎

---

① 陈必明纂：《龙津县志》第十编，《人物·留学生》。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谕。

驶于东亚大陆”。[①] 很明显，日本是把接受中国留学生和侵略中国相联系的。我们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具有实施其侵略政策，造就顺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目的，[②] 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许多留学生成了热爱祖国、反帝反封的革命者，马君武、曾如璟、邓家彦、雷沛鸿等就是当年广西爱国留学生的代表者。这是侵略者所始料不及的。

应该看到，兴办新学，对于那些已经取得科名但尚无实职的旧士子而言，也是一种冲击。为了给这些人以出路，清政府因袭科举旧制，给他们以考送考职的机会，规定凡举荐参加考试者，除考经义、史论外，还须选考诸如算学、舆地、兵政、交涉等一门实学科目，然后根据成绩等级，授以不同级别的官职。

另一方面，为了奖励学习新学或出洋留学人员，清政府从1908年起，也采用类似考送、考试的办法，分最优等、优等、中等，赏给进士、举人、贡生、廪生、增生、附生或者进士、举人出身等奖励。对于专门人员，则按照所学科目，分别给予某科进士、某科举人等等。1909年，对于旧日的留学生，其所学科目办有成效，或“习制机器，必能发明新理，制造新器者；习文学必译著诸书，阐述精理，有裨学术者”，亦可赏给进士、举人。[③] 所有获得奖赏各科者，必须照章向学部或所在省提学使司衙门缴费领取执照，以为征信之具。[④] 广西虽无人获得赏给进士，但全州的蒋莹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以后，于宣统二年考取了政法科举人。[⑤] 昭平县的严端，原为清廪生，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亦获赏举人。[⑥] 邕宁县的杭汝

---

① 矢野文雄著、云述译：《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见《近代史资料》总74号。

②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③ 参看《广西学务提要·总务科》，29～33页；同书《专门科》，20～26页。如詹天佑赏给工科进士，严复赏给文科进士。

④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学部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八。

⑤ 唐载生：《全县志》第五编，《选举·文科》。

⑥ 李树楠等：《昭平县志》卷四，《选举部·大学毕业》。

珖和杭维斌，一个于宣统二年获部奖师范科举人，一个于宣统三年获部奖政法科举人。[①] 潘宝疆于宣统元年由广西优级师范毕业，赴部复试，亦获赏举人。[②] 还有桂平县的谭毓明和郑以惠，皆广东大学预科毕业，“领有岁贡执照”。[③] 此外，获得此类奖赏的还有：博物选科的黄尚中、李承璧；史地选科的姚干臣、黄炯；理化选科的刘斌、陶芝諭、李唯心、孙树桢、梁朝钧、靳汝端、李杨标；数学选科的黎庶、赵才贤、罗宝琮和陆存义等。他们经过一定期限的义务教学期满以后，亦可授予师范科举人，奖给相应的官衔。[④]

这种赏赐，说明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欣赏旧的科举功名的观念虽然挥之难去，但新式教育取代旧式教育，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四、新学、新人、新风尚

兴办新学和出国留学，给人们带来了新认识、新思想，不少人由此萌发了破旧立新、变革图强的要求。兴办新学初期，就有人敏锐地察觉了这个问题，论曰：

> 近年以来……梧、桂、浔、郁各郡，皆有学堂，即百色一厅，亦闻风兴起；且学生之对于国家也，皆能具一分之热力；对于公仆也，尤能生一分之动力。以视从前媚官、畏官，一班无意识、无学问之号称读书人者，相去何止万里也！[⑤]

废除科举以后，仍有授实官、奖科名之举，本出于清王朝的决定。但是，

---

①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二四，《选举志一》。
② 卢世标：《钟山县志》卷一三，《人物·科举》。
③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四二，《选举上》。
④ 《广西官报》第八十二期，宣统二年八月印行。
⑤ 李官理：《广西·筹广西一篇》，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三月。

到了1911年4月29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有江苏、广西等十一省教育总会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育界总联合的第一次会议，对这种“奖学”的举措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的害处有二：一是害吏治。因为“职官有限而学堂毕业生无穷，谋官者浮于差缺数十万倍，其将何以处之”？二是害教育。如果毕业即奖励，则“上以虚荣求，下以虚荣应，与崇实之教育宗旨相悖”。于是，通过了《请停止毕业奖励案》，要求清廷认真解决这个问题。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批青年学子的转变。自从新学振兴以后，20世纪初年掀起的收回利权、兴办实业的热潮，1905年和1908年的抵制美国货和日本货的运动，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参加。孙中山在海外鼓吹革命，并于1905年在日本组织革命团体同盟会，其基本队伍也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原在体用学堂学习的桂林青年邓家彦，就是因为反对教师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愤而离开学堂，东渡日本，和马君武等在那里参加同盟会的。此外，广西高等学堂的学生，因为反对学堂监督沈赞清拒不接受意见，以致众生敬仰的国文和历史教师离职而去，发生了一次全体学生罢课十余日的风潮，② 都说明了在新学的熏陶下青年学生的进步。封建统治者虽然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并于1907年12月25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西太后那拉氏的名义，颁布懿旨，声言要对所谓“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图谋“犯上作乱”者严加惩处，③ 但是，革命的潮流在日益高涨，封建殿堂崩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82。按：广西出席预备会议的是龚鑑清，出席正式会议并在呈文上签名的是教育总会会长唐钟元。同时通过并向清廷呈报的决议案还有：《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统一国语方法案》、《请变更初等教育方法案》、《请变更高等教育方法案》等。

② 参看张瑞《清末桂林的书院和学堂》。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二。

第十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在广西的酝酿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年，广西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不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但是，由于新学的开办、青年士子的纷纷出省或者出国留学，使他们逐步萌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先后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号召、教育下，逐步高举革命、反满的旗帜，分区组织革命团体，通过发行书报，评议时政，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清王朝的倒行逆施，号召人民奋起救亡图存。而一批地方士绅，则利用清王朝所谓实行新政的机遇，以谘议局为舞台，在争取实现君主立宪的过程中，也曾经给封建的专制统治以一定的揭露和冲击。发动革命和实行变革的呼声与实践，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广西的开展，做了重要的准备。

一、“预备立宪”和谘议局

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革命的同盟会成立前四年，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因躲避“八国

联军”而逃至西安的西太后忽于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示要和光绪皇帝一道实行变法，以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达到强国便民的目的。4月，即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组成“督办政务处”，统筹“变通政治，力图自强”。10月2日（八月二十日），又以西太后的名义，发布变法文告，重申：变法一事，关系国家安危，民生转机，她与皇帝“立意坚定，志在必行”，要求内外臣工认清朝廷意旨，努力以赴。①

1905年7月，当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人在国外积极筹建同盟会之际，清王朝也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以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②。可是，当他们于9月24日从正阳门车站出发时，载泽和绍英被革命党人吴越炸伤，是以延至12月始得成行。他们分路到达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为时半年有余。回国后整理考察所得，报请清廷实行宪政。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王朝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诏旨，定明“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原则。即令如此，到底何时实行？也没有具体规定。

但是，在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的冲击下，清王朝被迫于1907年9月命令从速设立资政院。一个月后，又令各地督抚在省会设立谘议局，各府、州、县筹备设立议事会。③ 1908年7月，公布了谘议局章程，④ 并限定各省在一年内把谘议局建立起来。接着，又宣布要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筹备工作。⑤

刚刚扼杀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两手沾满维新志士鲜血的西太后，为什么转眼间成了立宪的提倡者，并一再叫喊非变法不可

①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七六、四八一、四八六。

②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六、五六二。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七、五七九。

④ 1908年7月31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四日）的《申报》，在《特别要件》专栏用七版的篇幅，刊载了《拟订谘议局章程》十二章六十二条、《拟订谘议局竞选章程》八章一百一十五条。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三、五九四。

呢？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1907年1月的清廷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①《粤西》杂志在清廷颁布变法上谕以后发表评论，认为清廷之"预备立宪，亦不过笼络汉人，以固其本族权贵"②。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丑"八国联军"之役，加以国内人民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清王朝的统治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西太后打出变法的新招，外以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内以笼络汉人中的上层分子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其终极目的则在维护自己的统治。

尽管清王朝实行新政并非真心真意，却也给康、梁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广西虽有立宪派分子，但人数不多，能量极其有限。广西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很不发达，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更是微不足道。但是，由于兴办新学和外出留学，一批从封建家庭出身或受封建教育熏陶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在广西举办新政、争取实行立宪政治的主要力量。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广西籍的"京官"于式枚。

于式枚，字晦若（一作芾若），贺县桂岭人。1880年（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改工部主事，后入李鸿章幕，随从"历聘各国"。载洋等五大臣考察政治回国之后，于式枚奉派往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政。1907年11月29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他以考察所得上奏清廷，认为宪法之名，中国古已有之。主张实行宪政，"必以本国所有者为根据，而采取他国所有以辅益之，在求其实而不徒震其名"。他对清廷提出实行新政以来，各地纷纷请求加速立宪深感优虑，指责这种举动是"舍本随人"，有失"尊主庇民之义"。③第二年6月18日（五月二十日），他重弹"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的老调，而且对各地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深感不满。他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

② 平民：《产业组合论》，见该刊第四号《论著》。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一。

说：

> 窃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所以行者曰权；权之所归，即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在他看来，“今之言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扳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①]

于式枚把要求立宪与进行革命等同起来。他的议论显然落后于形势，因而必然受到要求立宪者的反对。7月25日（六月二十七日），政闻社社员陈景仁上奏清廷，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并革侍郎于式枚职以谢天下。而清廷以立宪头绪纷繁，需时详为斟酌；于式枚乃卿贰大员，又何得擅行请革？且政闻社成员良莠不齐，多有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匿，倡率生事，着即革职看管。[②] 清王朝实行立宪的诚意如何，于此亦不难见其一斑了。

广西谘议局的筹建

但是，在广西，要求立宪的士绅们并没有被这位“乡贤”的议论所左右。于式枚的第二道奏折上递不久，“谘议局章程”就公布了。为了应付谘议局的筹组工作，广西巡抚张鸣岐通过广西籍御史赵炳麟的举荐，奏调翰林院编修唐尚元、陈树勋和京师地方检察厅行走蒋继伊回桂，由他们与在籍的陆军部主事唐钟元、在籍四川候补道陈伟智等五人为参议，而以藩司余诚格、臬司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六。

② 《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七。

王芝祥和提学使李翰芬为总办，组成谘议局筹备处。1908年10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正式办理成立谘议局的各项筹备工作。① 陈树勋曾于1905年赴日本考察数月，唐尚元曾以官费人读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唐钟元和蒋继伊也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所以，他们对于立宪有一定认识，态度也比较积极。

谘议局是由选举产生的。按照"谘议局章程"的规定，广西谘议局议员为57名。其选举人及被选举人的资格则规定：凡本省籍男子年满25岁以上，并在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3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曾在中学堂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或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或在本省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可以享有选举议员之权。而凡属本省或寄居本省满10年以上之男子，年满30岁以上而又具有上述各项条件者，得被选为谘议局议员。由此可见，妇女是被全部排除在外的。而在"不得有选举及被选举"的8种人中，包括"不识文义者"在内。连同上述的种种条件，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是被排斥在外的，余下的就只有地主、富商、绅士和学界的上层人士了！结果，人口近千万的广西，"合格"的选民仅有42145人，只占全省人口的0.42%。② 按照各府、州、厅选民人数，以及过去科举考试的学额和负担钱粮的多少，分配议员名额，"桂林府占八名，平乐府占十名，梧州府占十一名，郁林州占四名，柳州府占四名，庆远府占二名，思恩府占三名，浔州府占五名，南宁府占五名，太平府占二名，泗城府占一名，归顺州占一名，百色厅占一名，镇安府不足一名，缺之"③。正合

①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期，《宪政篇》；《抚宪奏创办谘议局先行设立筹备处将筹办情形陈明》，见《广西谘议局筹备处第一次报告书》上篇。

② 据《广西筹办谘议局被选事项统计表》，见《广西谘议局筹备处第二次报告书》上编。《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五期《纪载·宪政编》记载广西全省选举人数为40284人，仅是全省人口的0.46%。

③ 《广西谘议局分配议员额数一览表》，见《广西官报》1909年星期报第十四期；又：《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五期，《纪载一·宪政篇》。

“章程”规定广西的议员人数57名。

因为广西地旷人稀，交通不便，风气闭塞。而选举乃新鲜事物，困难极多。因此，张鸣岐于1907年10月奏明设立全省自治局，作为筹办选举总汇之区，并于1908年4月正式成立。5月，决定局内附设自治研究所。由于经费、人才两缺，只得变通办法，将全省划作三区进行，“以桂、柳、庆、思为第一区，设所于桂林。以平、梧、浔、郁为第二区，设所于梧州。以南、太、泗、镇、归、百为第三区，设所于南宁”。考送各属“品学素优之士绅”入所研究，十个月毕业。然后回籍传习研究，以期普及。①

按照“章程”规定，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两个阶段进行。初选定于1909年7月2日（宣统元年五月十五日）举行；复选则定在同年8月30日（七月十五日）。但初选前两月，张鸣岐又以广西情形特殊、困难太多，奏请准予变通办法，“采用单纯比较多数制度”，以免当选票额不足，再选困难。获得北京宪政馆电复允行。② 初选虽然依期举行，但实际参加投票者只有33935人，弃权者几乎占全部选举人的四分之一。有效票数31496张，选出应选议员名额的10倍，共570人。然后进行复选。其选举结果如下：

梧州府：林锡畴、植自森（怀集县），李识韩、梁廷栋、陈太龙（苍梧县），陈树勋、莫汝庞（岑溪县），蒙经、苏树翰、朱景辉（藤县），黄宏宪（容县）。

浔州府：罗蔼吉、黎赓尧（贵县），甘德蕃（平南县），程修鲁（桂平县），周维宗（武宣县）。

柳州府：熊德望（马平县），吴锡龄、王钟骥（融县），韦尚志（罗城县）。

郁林州：陈国麟（郁林州），林舒升（陆川县），冯汝梅、常远昉（北流县）。

① 《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六期，《记载一·宪政篇》。

② 《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五期，《记载一·宪政篇》。但记初选期为6月22日（五月初五日），复选期为8月20日（七月初五日）。

平乐府：蒋庚藩（平乐县），姚克让（永安州），吴寿松、邱建中（昭平县），梁培煐、黄晋蒲（贺县），莫文奎（恭城县），钟廷隽（荔浦县），毛鸿济、卢树春（富川县）。

桂林府：唐尚元、廖济斌（全州），唐钟元（灌阳），苏继轼（灵川县），徐新伟（阳朔县），何俊（兴安县），秦步衢（临桂县），黄永祥（永宁州）。

庆远府：覃祖烈（宜山县），卢树芳（河池州）。

思恩府：韦先发（宾州），夏运开（武缘县），梁启彰（上林县）。

太平府：曾文鸿（永康州），许修恭（万承州）。

百色厅：宋源学（恩隆县）。

南宁府：梁书云、黄乃昌、陆步云（宣化县），古济勋（永淳县），陆杏林（隆安县）。

泗城府：岑润传（凌云县）。

归顺州：孙丞显。①

在当选的57名议员中，年龄多数在30岁至60岁之间，而又以40岁至49岁的中年人居多数，不满30岁或超过60岁当选者都是个别的。他们全都有功名，其中陈树勋、唐尚元和梁廷栋为进士，其他或为举人、贡生和生员。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大部分人与封建的土地出租有关，有的人还在城镇从事小本商业经营。在政治上，不少人曾被清政府授予各种官职，有的还在地方经办团练，成为城乡中的权势者。有一半以上的人曾经从事过教育事业，或办过新学；还有接近半数的人在国内或到日本接受过新式教育，对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向资产阶级转化起了重要作用。而蒙经、朱景辉和黄宏宪当时已

① 《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一期，《附录》。按：阳朔的徐新伟又作徐新卫，宣化的黄乃昌又作黄廼昌。

经参加了同盟会。[1] 总之，从《广西谘议局议员选举人、被选举人有职业分别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在官、士、农、商、工五栏中，初选出的570人，没有一人是属于“工”的。当选的议员自然也如此。而知识分子却占百分之百。可以说广西首届谘议局主要是由一批新的官绅组成的。[2]

10月3日（八月二十日），谘议局议案预备会在桂林中学堂开会，选举陈树勋为书记长，蒙经、黄宏宪、徐新伟与何俊为书记。14日（九月初一日），广西省谘议局在桂林王城正式宣告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常年会议，至11月27日（十月十五日）闭幕。在为期一个半月的首届常年会上，撤销了谘议局筹备处，选举了唐钟元、黄乃昌、冯汝梅、李识韩、吴锡龄与吴晋藩六人为广西出席北京资政院的议员。会议闭幕之日，选举谘议局领导成员，其结果是：

议　　长：陈树勋

副 议 长：唐尚元、甘德蕃

常驻议员：韦先发、陆杏林、王钟骥、何俊、黄宏宪、许修恭、梁书云、宋学源、秦步衢、罗蔼吉、蒋庚藩

候补常驻议员：古济勋、陈太龙、莫汝庞、苏继轼、莫文奎、陈宗荃、梁文栋、徐新伟[3]

从此，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那些不满于封建专制而又害怕暴力革命，期望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人，有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

---

① 在第一届谘议局议员中，只有蒙经、朱景辉（秀裳）和黄宏宪三人是同盟会会员。1911年议员黎赓尧出缺，补选同盟会的卢汝翼为议员，加以任谘议局秘书长的蒋敦世和秘书的封濯吾（祝椿）亦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谘议局内组成同盟会支部。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谘议局共有十余人之多。

② 卢仲维在《广西谘议局概论》一文中，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参考，见拙编《近代广西社会研究》一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③ 陈宗荃和梁文栋是因议员出缺递补的。

二、谘议局的争权活动

要求速开国会，实行立宪

广西谘议局成立以后，当选的议员都把它看做一省之中“地位最高”、“范围亦最广”的人民集合体的中心。[①] 按照“谘议局章程”规定，议员享有决议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以及讨论本省所负义务等权力。但所有决议事项，须得本省督抚同意始能生效。他们不满意这种只有建议权，而无监督权的规定。因此，经常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地方官府重视发扬“民主”，尊重“民权”，从而争取部分政治权力，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积极参加全国性的谘议局联合会，要求清政府从速召开国会，是他们争权的重要一着。

谘议局联合会又称“议长请愿团”，是张謇等于1909年10月牵头发起的，得到各省谘议局的响应，相继派出代表，到上海集会。当年12月18日至28日，10天之间就开会8次，商讨如何迅速实行立宪的步伐问题。最后决定由各省谘议局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要求清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立宪。广西代表吴锡龄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因为谘议局联合会设于何处的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江苏、山东、浙江、奉天、陕西五省代表主张联合会设于上海，而福建、河南、湖北、山西、广东、江西、广西、甘肃、吉林等十四省代表主张设于北京。[②] 因此，直至1910年8月10日（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各省

① 在第一届常年会开幕式上《谘议局议员答词》，见《广西谘议局第一次报告书》上编。

② 《申报》1910年5月19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一日）《专电》。

谘议局联合会才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广西、黑龙江、山东、江西、四川、湖南、河南、广东、安徽、吉林、奉天、贵州、江苏、湖北、直隶共十五省代表24人；广西出席的代表有吴锡龄、蒙经、朱景辉和古济勋四人，占到会代表的六分之一。各省代表公推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孙洪伊、杨廷栋、雷奋、孟森、吴赐龄等为审查员。决议向资政院提出呈请召开国会案，并联合各省督抚、民间团体、商会、地方士绅以及旅居海外人士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积极响应这次声势浩大的请愿。10月17日，谘议局全体议员通过了“呈请代奏即开国会案”，声称：“时局之最可危者，莫如今日；人心之最分离者，莫如今日。”是以必须从速允许召开国会，否则“酿成变乱，纷纭扰攘，内之贻土崩瓦解之忧，外之启豆剖瓜分之衅，乱机四触，处处发动爆烈，糜烂不堪设想”。且警告清廷，再不能“冒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以欺天下”。与此相配合，陈树勋、唐钟元等还发起了声称有8798人联名的请求召开国会的活动。广西农务总会、商务总会、教育总会、请愿同志分会以及巡抚张鸣岐，在谘议局的推动下，也分别或联合致电清政府，请求从速召开国会。① 在全国请愿大潮的推动下，清王朝迫于形势，于11月4日（十月初三日）下诏，将预备立宪期从九年改为五年。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王朝借口预备立宪，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引起了各方的不满。② 5月14日（四月十六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甘德蕃、蒙经赶往北京，与吴锡龄共同出席会议。③ 会后向清政府递上“公呈”，指出：“皇族不宜内阁总

① 《广西谘议局第三次报告书》甲编，第二类《奏折》；第六类《电信》；戊编，第七类《建议案》。

②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贝勒毓朗均为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为满人，另一内阁协理大臣是徐世昌。

③ 《申报》1911年5月15日（宣统三年四月十七日）《紧要新闻》。

理。”而奕劻以呈文“并无谘议局钤记，退出不收”，并密饬都察院毋再收递。[①] 6月4日（五月初八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与国会请愿同志会等立宪派共同组成被人认为是注重民权，主张地方自卫，在立宪活动中属于激进派的宪友会，[②] 吴锡龄被选为文书员，甘德蕃、蒙经为广西支部负责人，继续为促进宪政进行工作。

进入资政院的广西籍议员，在争取实现立宪活动中也有出色的表现。1910年10月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辩论应否从速召开国会问题。吴锡龄即席质问军机大臣、贝勒毓朗：“究竟应迅开国会不应迅开国会？今天请军机大臣当场宣布。”毓朗被问得不知所措，窘态毕露。[③] 在此后的多次会议中，吴锡龄坚持从速召开国会，坚决主张弹劾失职之枢臣，一再提出军机处搞“伪立宪”，“不推翻枢府，则解散资政院”亦不足惜，“决无以君主大权禁止人民活动之理”。[④] 吴锡龄亦因此被人们赞为“抗直敢言”，在争取立宪活动中“有杰出的表现”的议员。[⑤]

上述的事实说明，广西的资议局成立以后，议员们对于促请清廷召开国会，尽早实行立宪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的步伐，并不落后于那些号称先进的省区。

抵制地方官府的倒行逆施

广西谘议局对地方官府实行监督，对各级政府的弊政进行批评和抵制，维护议政机关的尊严，也有突出的表现。

1909年11月4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广西谘议局在第一届常年

---

① 《申报》1911年6月10日（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公电》。

②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485～486页。

③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速记录》第十二号。

④ 参看《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十二期，《中国大事记》；《资政二十二次会议记》；《所谓大臣负责》；《资政念五会议记》；《资政念六会议记》。分见1910年12月19日、22日、27日、28日《民立报》。

⑤ 张明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86页。

会中通过了禁烟公所提出的禁烟议案修正案，并决定至1910年5月9日（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止，一律禁绝全省所有的土膏店。1910年1月，巡抚张鸣岐不经谘议局同意，私自提出了分期分批实施的方案，决定将禁绝期限展至9月4日（八月初一日），并将决定上奏在案，发布全省。[①] 此后不久，劝业道胡铭槃又自作主张，将禁绝土膏之期展限5个月，且获得张鸣岐的同意。[②] 禁烟公所对此虽不赞成，但迫于胡铭槃的威势，"不敢立异"。

张鸣岐、胡铭槃随意展限禁烟之举，使谘议局议员深为不满。他们斥责这是"视决议为儿戏，等议案如弁髦"，其"侵夺权限，违背法律，置舆论之不顾，实属专制之极"。如果这种违法的行为得逞，则"不特禁烟公所可以裁，谘议局亦可以撤"。这是关系到"宪政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非起而抗争不可。于是一面发文驳斥禁烟展限之非法；一面函电交驰，向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资政院以及广西籍京官，指责张鸣岐、胡铭槃之违法，以争取各方的支援。张鸣岐、胡铭槃等虽然也在暗中活动，阴谋破坏谘议局的抗议，且以引起商人罢市，激起民变相恫吓。但是，议员们非但不为所动，更于10月初宣布全体辞职。[③] 时张鸣岐已调两广总督，由魏景桐护理广西巡抚。他面对议员的辞职抗议，"惶惶无主"，急电资政院将情况代奏，并自请议处。旋经资政院"紧急动议"，复由清王朝颁发谕旨，认定广西禁烟照谘议局原决议案执行。10月12日（九月初十日），谘议局在胜利声中召开第二届常年会议。在40日的会期内，曾以谘议局的名义，并在它的积极推动下，由广西的护抚、部院先后致电军机处和清廷，吁请速开国会。闭幕之日，选出了谘议局新的领导机构，其组成人员是：

议　长：甘德蕃

副议长：秦步衢、黄宏宪

---

① 《宣统政纪实录》卷二四。

② 劝业道成立于1910年2月（宣统二年正月），乃新设机构。见《宣统政纪实录》卷三〇。

③ 广西谘议局：《广西禁烟案汇钞》。

常驻议员：陆步云、吴寿崧、蒙经、徐新伟、姚克让、莫文奎、
　　　　　梁佐清、陈宗荃、朱景辉、梁启彰、龙黄魁

候补常驻议员：曹文鸿、孙亚显、黄永祥、植自森、卢瑞春、
　　　　　　　罗纪光、覃祖烈、林锡畴、廖济斌、韦尚志、
　　　　　　　夏运开

类似的抗争还有很多，而且议员们都把它提到维护“民权”和“宪政”尊严的高度予以看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例如：郁林州发生的州牧纵弁蹂躏议会，逮捕议员案，经谘议局抗议，州牧被查办。荔浦议员钟廷隽被统税员殴伤，谘议局立即出面向巡抚交涉，要求将肇事者“即行撤换，送县按办”。蒋体熙承建谘议局工程偷工减料，贪污中饱，谘议局也认为是“玩忽宪政”，要求巡抚予以严惩。1910年，张鸣岐未经议局同意，即批准加抽茴油、桂油新税和房捐，议员们认为这是巡抚“以命令变更法律”，予以否决。同年底，张鸣岐不经过谘议局讨论，擅自奏请借款开办广西矿业，度支部虽“有意议准”，却被谘议局驳消。这一切，都给人们以鼓舞，时论称之为“最痛快人心”的事。①

为实行地方“新政”立法

广西谘议局从法律上为发展地方实业，开办新学，收回利权，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促使广西各项新政的顺利开展，谘议局成立不久，全体议员即分赴各地，对省内的民政、财政、教育、实业等进行考察，写出汇报材料。② 在谘议局议事过程中，十分注意省内交通、农林、矿产各业的发展。在第一次常年会上，即提出了《筹办广西商办铁路案》。在1911年的临时会议上，又提出了《请拨款补助梧邕铁路开办案》等等。而于发展广西农林实业，则提

① 《广西杂志》(1910) 第六、七期合刊《本省要闻》。

② 《预备议案文件》，见《广西谘议局第一次报告书》。

出了《整顿林业试验场并拟改农林学堂办法案》；继之，又提出《农林试验场案》，对于当时农林试验场中之种种积弊颇多揭发，对广西农林试验场聘用之6名“无学无品之洋技师”，则强烈要求立予“斥退”，而且认为“广西有人，断不容此辈立足”，应另择有真才实学的我国留学生充任技师。① 至于应如何在广西发展工业、矿业和商业，谘议局亦多有建议或批评。尤其注意反对官府对工农各业的限制、垄断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发展实业，谘议局对于税务亦极表关注。在第一次常年会上，就提出了《整顿统税案》，大力揭露统税“病商病民”之种种弊端，“其于商民之脂髓，敲剥殆尽”，认为非严加整顿不可。与此同时，议员们对于帝国主义者操纵我国海关行政，利用不平等条约特权，享受减税免厘待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以及奸商借用洋旗为掩护，贩运商品进出，以致辱国丧权，深感不满，强烈要求政府严加整顿和制止。② 至于税卡之勒索病商，或因“得规而包庇”鸦片、赌博等，致令陋习蔓延，贻害社会，更表示深恶痛绝，因而也一再提出严禁之案。③

举办新学、培育人才，也是议员们关注的一大课题。在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上，他们对提学司提出的《整顿学务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修正意见，坚持“改私塾为学堂”。在第二次常年会上，议员除对提学司的《学务案》作了修改外，还直接提出《亟谋整顿全省教育案》，并批评各地不称职之学官，要求根据“学务公所议事细则”，加强学务公所的实际权力，积极解决办学经费，以利于多多开办新学。

此外，对于“整顿警政”、“限制兼差”与“裁汰冗员”，以及各地官吏之贪污腐化等等，也都有所建议或纠举，并收到一定的效果。

总而言之，广西谘议局的议员，虽然来自士绅，他们的目的在于实行君主立宪，而其思想、言论和行动，却也反映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取“民权”的愿望，对于“民智”的启迪和社会的进步，具有积

① 《广西谘议局第四次报告书》。
② 《广西谘议局第一届决议案》。
③ 萧凤韶：《广西善后刍议》。

极的作用。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专制势力是不会由于“请愿”而自动放弃权力，更不会因此而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迅速走在时代的前头，并用暴力的手段去和封建专制者进行较量。

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

广西青年学子与中国同盟会

如前面所述，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广西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旧十分落后，像样的资产阶级力量尚未形成，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在广西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

但是，也正因为广西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人民的生活极为痛苦，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十分残酷，这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变革现状，成了广大劳动者和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连年不断的会党起义，此伏彼起的反洋教斗争，以及经常发生的抗捐抗税事件，都是这种要求变革的反映。最后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号召下，终于形成了投身辛亥革命，争取广西独立的斗争高潮。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建立后的十年间，广西并

无人参加。广西籍的青年学生沈克诚，因于1900年8月参加了唐才常、秦力山组织的自立军起兵；桂林的龙泽厚，由于参加了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的中国国会，并一度因上海“苏报案”被清政府逮捕；另一位桂林青年马同（君武），因于1902年4月与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在日本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是同被认做兴中会会前期的“革命同志”。① 但是，严格说来，他们既非兴中会会员，也没有为兴中会的革命活动直接出力，所以尚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

真正得革命风气之先的是那些外出留学的广西学生。马君武的转变，就很有代表性。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孙中山与马君武合影

1901年，马君武东渡日本留学。他首先结识的是改良派的首领梁启超。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马君武即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著文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词谬论，批评以改革军械或改革政治以图存之说，提出：“欲改革中国，则必自改革中国的道德始”的主张，“否则无异执规以画方，皆南辕而北辙也”。② 此后不久，他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学说，思想主张为之一变。1903年冬，他在一篇论奥地利梅特涅（C. W. Prine

①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见《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

② 《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1903年3月27日）。原以东京留学生、桂林马悔名义发表，载《新民丛报》第二十八号，转引自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Meternich）的文章中，把梅特涅称做“民权自由之敌”。评论说：“彼之所长多矣，徒以富于保守精神之故，反对改革，抵抗自由民权思想之大潮流，果不免于失败，而为万世之所唾焉。”① 而于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J. J. Rousseau）之《民约论》，则大加赞扬。② 当时，有不少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孙中山和黄兴等在日本东京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在筹备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马君武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同盟会成立时，广西参加者只有马君武、邓家彦、卢汝翼、蓝德中和曾彦等9个人。会后，马君武被推选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③ 此后两年，广西青年加人同盟会者日多。据记载，到了1907年，广西籍的同盟会会员共计43人，分属12个州县，他们是：

临桂：马君武、邓家彦

浔州：卢汝翼、蓝德中

桂平：郑惠铭、姚芳荣、朱金钟、曾龙章、江鉴清、谭鸾翰

容县：封祝森、封高万、陈　志、陈汝援、陈汉刚、封祝椿、
封承理、黄绍原、李觉天、黄绍享、李但英、林熙奎、
刘屹、刘崛、陈世芳、陈渡生、梁汉生

藤县：杨衡、蒙衡、区冕、蒙诞、陈仙石

昭平：万武、严端

归顺：曾彦、邓鸿绪、凌群

---

① 《民权自由之敌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传》（1903年11月7日），原载《政法学报》癸卯年第四、六期，见《马君武集》。

② 《帝民说》（1906年5月6日），原载《民报》第2号，见《马君武集》。

③ 马君武在会后因忙于学业，任职不久即把这些职务辞去。广西同盟会主盟人改由刘崛担任。

平南：陈思详

象州：苏寿松

柳州：钟秀杰

柳城：林芾桢

修仁：蒋敦世①

当时，广西人参加同盟会者虽然不少，但多居住国外，或因其他原因，并没有回省内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后来担任主盟人的刘崛，在省内活动的时间也很少。这就造成了广西各地的同盟会组织，直至辛亥革命时，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同盟会在广西的发展

属于同盟会系统，最早在广西开展组织活动的，是和广西会党以及新军皆有联系的黄兴。1905年12月，他由香港秘密到了桂林，在新军中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并于第二年初春在驻桂林的新军中成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②据林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 1905年……黄兴已由日本潜到桂林，住在南门外大校场我的营本部。见情况日恶，恐影响前途，决定各自散开，各立基础；在未离桂林之前，由黄兴主盟，按各人年龄为序，填写誓书，当众焚誓。

---

① 冯自由：《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见《革命逸史》第六集。这是以同盟会总部直接收到盟书的为限，多是在东京本部加盟者，其余在香港及海外各埠、国内各省加盟者，盟书多各自保存。又：在广东省的盟员中，有顺德人陈权，注明当时“寄籍浔州”。刘崛在《回忆点滴》（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一文中说：孙中山派他为同盟会广西分会主盟人以后，经他主持入盟者有80多人，其后发展到120人。而封濯吾在《辛亥革命片断回忆》一文（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中说：1905年，广西人在东京入盟的即达70余人。并录此以待考。

②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人名次序为：黄兴、郭人漳、蔡锷、赵声、杨祖时、雷飚、胡毅生、卢竞寰、杨尊任、林虎。[①]

这些人都在新军中，而且都有一定官职。林虎当年十九岁，已是新军营长。[②] 蔡锷原与梁启超有密切关系，掌握督练广西新军大权以后，出入坐大轿子。[③] 他们9个人中，多数不是广西人。指出这些情况，对于了解广西后来的革命进程是有必要的。



1908年同盟会在柳州设立的秘密活动机关——华熙客栈旧址

黄兴在桂林建立革命组织不久，刘古香[④] 也奉香港同盟会分会的委派，回柳州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以办学为掩护，在柳州先后创办了龙城求是学会，柳郡中学堂，柳郡师范学堂，马邑两等小学堂以及蒙养小学，并在成立马平劝学所时兼任总董，负责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因为开办教育事业成绩卓著，社会风气日开，刘古香也颇为地方官绅器重，声望因之日隆。1908年，成立柳州同盟会组织，加盟者有柯汉资、蔡劲伯、胡代民、张子朔、李德山、李子廷、

① 《往事片断》，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又：《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载林虎的《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一文，明确说他加入同盟会在1906年。《李宗仁回忆录》卷二也说："1906年，黄兴发展了蔡锷、林虎、赵声等九人加入同盟会。"但王学庄、曾业英在《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蔡锷当时参加的并非同盟会，而是它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并志此以供参考。

② 林虎：《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

③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④ 刘古香，柳州人。清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后考入广东虎门将弁学堂，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在香港加入同盟会。

宋荆洲、易和尚、谭昌、杨秀芝、杨子安、杨友兰、胡柳琴、罗藩、李伯纯、王淑宾、杨文佩、周毅夫、周绍文、石龙飞、徐铁、刘震寰、柯禹臣等20余人，都是柳州地方的军、政、学各界人物。随即于对河十字街设立硝磺厂，秘密制造军火，运送军械；复于柳州四码头开设华熙客栈，在雒容高岭塘开办垦殖公司，秘密接待各方同志，联络会党绿林人物，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不久，因机密泄漏，所设秘密机关多被查封，加盟同志星散四方，刘古香、李德山等为形势所迫，分别逃往广州和香港。①

南宁有同盟会组织，应是1907年的事，但革命党人进入南宁活动则较早。1906年，反清起义失败的会党首领王和顺在越南拜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于是，他派莫继甫、黄亚贵等从越南秘密潜回南宁，开展宣传与联络工作。同年夏，雷沛鸿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他通过寄赠报刊、回乡度假等方式，首先在亲友中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南宁同盟会支部宣告成立，主要成员有雷在汉、周仲歧、周君实、潘赋西、莫继甫、杜英南、杜铁汉、杜少廷、张文灿、班继超、林百中、梁衡舫、黄简初等。他们之中，除黄简初是罗阳土司官外，其余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除了联络南宁与附近各地以及左、右江的会党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活动。而且在“富国强兵”思想的指导下，开办了“崇实种植公司”，还动员会内外的各方人士，投资“西江航业公司”，作为秘密联络活动场所，并筹集活动经费。②

梧州虽然邻近广州、香港，彼此一水相连，素得风气之先。但同盟会组织在

① 参看李墨馨：《辛亥前后柳州的革命活动》，见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铅印本。阚謦安等：《辛亥革命在柳州》，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但他们说柳州成立同盟会组织在1904年，实误。可能是把一些倾向革命的人士进人柳州活动，与后来的组织同盟会混为一谈了。

② 参看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梁亚烈《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两文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但梁亚烈说：“1905年春，冯自由、施正甫通过王和顺的关系，在南宁设立机关，组织同盟会。设立机关有可能，组织同盟会则不确。”

梧州的建立,却在桂林、柳州、南宁之后。究其原因,康、梁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较深,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阻碍作用。所以,同盟会员虽然早已进人梧州,并在那里进行活动,但并不能把组织建立起来。到了1910年,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正式派李铁汉、陈济桓人梧州,在塘基街由义巷开设“名利客栈”为总机关,掩护革命活动。不久,李铁汉调往福建,陈济桓转往湖南,工作遂告停顿。1911年4月,刘崛从香港赶回广西,在梧州石鼓街梁宅设立同盟会机关,参与活动的有蒙经、黄宏宪、苏无涯、区笠翁、甘日三与女党人陆书蕉等20余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主要利用报纸和戏剧进行革命宣传。①

浔州府属各地也是革命党人比较集中的地方。1905年,浔州中学堂学生罗佩珩赴日本留学,在那里接受了同盟会的宣传。1908年,他回到浔州府城,即与卢云川②、黄熊祥、曹启先、袁思荣等分别到贵县、武宣、平南、藤县等处联络进步人士,争取会党、绿林好汉势力,密谋武装起义。贵县的陈志轩,平南的卢殿林,武宣的廖和卿等也分别在各县秘密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郁江和黔江沿岸的城镇中得到传播。③

在新军中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在广西的组织发展,除分布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和浔州几

---

① 曾树栋《同盟会在梧州的宣传活动》。但刘崛在《我参加同盟会和回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载《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一文则说: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才从香港赶回梧州,在沈公祠设立同盟会机关。然而,在此之前他曾三次到梧州活动,与当地的同盟会员联系,只是没有谈到正式建立组织。关于女党人陆书蕉,据《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期《教育》栏记载,她是容县龙胆女学堂学生,1905年18岁时,与17岁的陆菱娟结伴赴日本游学。两人“均于普通学科略有根柢,且具有尚武精神,骑马放枪,并能娴习”云。

② 即卢汝翼,桂平清秀二里罗秀圩人。

③ 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又据罗甫琼主编:《贵港市志》之《人物志·历史名人传略》说,罗佩珩1907年在东京加人同盟会,1909年回国,但冯自由书未见其名。

个地区外，还有不少会员集中在新军中。

新军的出现始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因为参战的湘军、淮军和各省的防练军纷纷溃败，号称精华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没。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深感有建立一支新式武装的必要。而“中外臣工，条陈时务”，也多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 1894年冬，清政府以淮系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芬负总责，由德国人汉纳根（Von Hanneken）担任教官，根据德国陆军条例，开始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招募壮丁，编练新军，成立十个营，号“定武军”。“小站练兵从此始”。[②] 1895年10月，胡燏芬奉调督办津芦铁路，小站练兵由袁世凯接办。1907年，清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普遍编练新军，计划共成36镇，以各省的人力、物力、财力与军事位置的重要程度进行分配任务，限期编练完成。广西分配编练新军一镇。但直至1907年8月，除近畿四镇、直隶两镇、湖北第七镇业经编定外，其余各省皆未完成。[③]

广西新军的历史，从1901年新任巡抚丁振铎着令亲军卫队训练西操发其端。1903年，柯逢时从江西调任广西巡抚，也把带来的常备军两营，交由熟悉新军编练的王芝祥统带，并进行训练。1905年，李经羲予以裁汰整顿。第二年，仿照湖北编练新军的规制，编练新军两营和一个炮队。1907年8月，根据海军部奏定的办法，广西应限期练成新军一镇。当时，陆军小学虽已开办，而编练新军则限于经费，根本无法完成。

1909年，编练新军略见眉目。广西巡抚张鸣岐“拟令提督龙济光，总兵陆荣廷就所统旧军挑选精锐，各练新军步兵一标，限令明年将所统旧军分别汰留，悉数各编步队一协，再遴选得力之员，添练马、炮、工、辎各营，扩

① 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德宗本记二》，131页。

② 《清史稿》卷四四二，《列传》卷二二九，《胡燏芬传》云：“光绪二十年，……朝廷惘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燏芬练兵，成十营，顿小站，号定武军。”

③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三日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陆军部奏，分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八、二〇八；又：《清德宗实录》卷五七六。

充成镇"①。后因经费无着，只能在龙州练成新军一标；在桂林练成一个混成协，实际仅有步兵两营，马、炮、工、辎各一队。并由庄蕴宽、李书城等在桂林继续开办陆军小学堂和陆军干部学堂，为编练新军培养骨干。② 由于教学和训练的需要，张鸣岐慎重地留用或聘用了一批由日本学成归国的外省籍士官生，如蔡锷、钮永建、李书城、赵恒惕、尹昌衡、陈之骥、孔庚、刘洪基等；另在保定速成学堂聘来了刘建藩、杨明远、耿毅、吕公望等一批毕业生；还从军官学堂聘来了何遂等少数毕业生，总计不下70人。③ 这些年轻军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具有爱国热情，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参加了同盟会。④ 他们会集桂林以后，经过一番联络、酝酿，终于1910年8月成立了"广西同盟会支部"。由督练公所科员耿毅担任支部长，陆军干部学堂教官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军



同盟会广西支部设于桂林福棠街的秘密会所

---

① 据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三日清谕，见《宣统政纪实录》卷九。

② 陈雄、尹承纲：《广西陆军小学堂》；李书城：《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杜誉钦：《广西陆军干部学堂》。以上三文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③ 由于编练新军，外地革命党人大批进入广西，其来龙去脉，李任仁在《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一文有详细介绍，可以参考。

④ 据李书城在《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一文中说：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由非同盟会的程理堂、朱兆熊及满族人那玛善等留日学生创办，学生中不少保守落后分子和反对革命分子。

小学堂分部长，蒙经为谘议局分部长。不久，桂林商会、法政学堂、师范学堂也有了同盟会的分部。① 这应是1906年春黄兴在桂林建立革命组织以来，桂林地区正式成立的同盟会组织，而且从军界发展到政界、学界和商界，联系相当广泛。

桂林的新军直接由巡抚掌握，属省军性质。提督所在地的南宁，边防道所在地的龙州，当时也办有地方性的新军，如南宁讲武堂和步兵团；龙州先后办的随营学堂、将弁学堂和陆军教导团等。庄蕴宽、蔡锷、钮永建、农实达和李开侁等都在这些单位工作过，革命思想也比较浓厚。

值得一提的还有：1908年，广西留日学生会会长曾彦，云南留日学生会会长赵伸，与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在东京组织了“桂、滇、越联盟会”，以团结中越两国革命同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解放祖国人民为职志”。② 他们的活动，无疑会影响到国内的有关地方。

从上述可知，自1905年冬黄兴首先进入广西发动革命，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无论在广西地方，还是在驻桂的新军中，都有所发展，参加同盟会者颇不乏人。但人数究竟多少？至今仍无确切的统计。有一种资料记载：同盟会在广西发展的最初两年，即1905年至1906年，广西地区的主盟人先后是刘崛和卢汝翼，连同他们在内，会员共是9人，③ 这显然不包括黄兴所发动的那些人。另有人回忆：直至1909年，广西同盟会会员人数，共有杨蘅等48人。④ 这个数字，无疑偏少。因为，广西的同盟会会员多数在新军中，他们与各阶层的群众联系较少，而且多为外籍人，流动比较频繁，难以作出确切的统计。而在桂、柳、邕、浔以及一些州县，1909年广

---

① 参看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

② 据（越南）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孙中山史料专辑》。

③ 《近代史资料》1959年6月。

④ 陈伯昂：《辛亥革命运动》，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转引自《辛亥革命研究通讯》第五期（开封），1980年5月。

西同盟会组织已经成立，其盟员总计不止48人。但耿毅在《广西出师援鄂经过》一文中说：在桂林，经他主盟加入同盟会的就有800多人，而实际盟员数目大约有好几千人云云。① 这个数字，难免有浮夸之嫌。即把当时驻防桂林的新军官兵全数计人，恐也难以达到这个数目。

广西革命组织的派系与特点

当时，在广西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按他们来自的地区论，可分为外江派和本地派。外江派多数在新军中，几乎青一色是武人知识分子。他们比较集中，也比较活跃，对于旧派人物，敢于嬉笑怒骂，少有顾虑。但他们重武轻文，多以口头宣传激发民族感情，揭露社会黑暗以动员群众。② 但往往是游移不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本地派会员分散各地，只有桂、柳、邕、梧比较集中。除了知识分子外，还有商人、小吏、会党头领乃至个别土官，汉、壮族人士都有，组成分子比较复杂。他们除了在地方的政法、文教、商业部门活动外，因为自己"有文少武"，所以多寄希望于会党绿林中人。③ 同时比较重视利用报刊文字以教育自己，争取群众。这是他们的特点。

总之，同盟会自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它的组织在广西很快得到

---

① 耿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据他回忆，当时陆军干部学堂的同盟会会员，还有一个名叫阮焦斗的越南人。

② 如何遂在陆军干部学堂的课室里，经常借讲课之机，阐述民族大义，大声疾呼："我们要革命，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号召学生要做陈胜、吴广。许多教官常利用其精神讲话，痛斥清政府腐败，旧军无能，卖国投降，以激发学生革命爱国的思想。王孝缜还在张鸣岐的招待宴会上，借酒接过手枪，演出了即席击碎巡抚衙门玻璃窗的"壮举"。尹昌衡还借酒冲着张鸣岐说："要想中国复兴，清朝是不能存在的。"这种举动未免幼稚，但也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对反动统治的愤慨，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③ 如刘崛之深入瑶山争取绿林头目郭伯牧、陈亚槓六；到象州中平圩联络"绿林管带"白有禄。南宁同盟会会员争取会党首领王和顺、滕正宜与他们的旧部等。

发展。许多青年在孙中山同盟会的旗帜下，以极高的热情和极大的勇气，奋不顾身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省吃俭用；甚至变卖家财，尽自己所有，充作活动经费。① 有的人历尽困难，艰苦备尝，仍坚决以赴，绝不动摇；甚有因起义失败，愤而自杀，用一己之死以警愚顽，而激励来者的。② 也有不少人一闻革命号召，顿时离乡赴义，明知必死而不辞的。③ 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而英勇献身的高尚情怀，赢得了人们的永恒崇敬。

但是，广西同盟会在组织上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弱点。主要表现在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刘崛虽为广西同盟会的主盟人，自同盟会成立后的四五年间，他四次回广西活动，却仅及梧州与浔州一带，并没有起到“广西主盟”的作用。当时，省内虽有“同盟会广西分会”或“广西支部”之称，却没有一个能真正领导全省盟务，统一指挥各地组织的。桂、柳、邕、梧等地的组织，互不统属，亦少联系，基本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如桂林地方与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关系并不密切。黄兴在1906年发展的组织，与1910年的同盟会支部也没有什么先后承继关系。蔡锷是黄兴发展的老会员，却很少过问同盟会的事，以致后来的同盟会会员，“觉得他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群相起来造他的反，最后把他赶出广西。④ 孙中山、黄兴在钦、廉和镇南关发动武装起义，近在咫尺的广西各地

① 如桂平竹社乡垌心村的徐启祥，拥有30多万斤田租的田地，还在平南大乌圩经营恒丰米店。奉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回平南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变卖田租20余万斤以充武装起义经费。见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载于《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② 如柳州革命党人陈晓峰因革命机关被查封，联络四十八寨会党起义计划被破坏，愤而自杀。据解普安：《辛亥革命在柳州》，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③ 如1911年春应召专程往广州参加“三二九”起义的李德山、韦统淮、韦统铃、韦树模、韦荣初和林盛初，以及韦五洲、韦能宝、李子廷等。见韦能宝：《三·二九广州起义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④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同盟会组织，并没有积极的响应和配合。这也是十分奇怪的现象。这些组织与行动上的弱点，决定了辛亥起义和独立斗争的进程与结局。

四、革命主张的宣传

各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

同盟会在广西的发展，是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齐头并进的。在日本、香港等地加盟的革命分子，把同盟会的主张传入广西的同时，也开始了组织建立的工作。

当时的宣传工作，除了个别宣传发动外，主要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因此，宣传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据不少人回忆，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在广西青年中流传较广的有三类：

第一类是从外地传入的报刊，如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907年在东京创刊、由章炳麟主编的《民报》临时增刊《天讨》；黄藻编辑、1903年刊行的《黄帝魂》；邹容著、1903年刊行的《革命军》；陈天华于1903年（一说1904年）编写，初刊于东京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以及革命党人陈少白主编、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等。与此同时，君主立宪派的报刊如《新民丛报》、《商报》等也在广西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

第二类是“国粹学社”在桂林翻印、发行的“老书”，如：《宋遗民录》、《通鉴论》、《明遗民录》、《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荆驼逸史》、《郑所南心史》、《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江阴守城记》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的文字狱案。翻印这些书刊的目的，在于利用“明末遗民的著作，满

人残暴的记录”，“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①

第三类是广西同盟会会员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刊，根据现在可能看到的资料统计，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2年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8年间，共出书刊10种以上，它们是：

《漓江潮》。1905年马君武、卢汝翼、蒙经、万武等编辑，在桂林出版，只有两期。

《独秀峰》。《漓江潮》停刊以后，马君武等改办《独秀峰》。但仅出一期即停刊。

1907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粤西」杂志

《粤西》。1907年，李治理在日本编辑出版，先后两期。《粤西》杂志，月刊。刘崛、陆涉川筹办，卜世伟编辑。1907年11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由中国新女界社合资印刷所承印。除在日本发行外，新加坡、河内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郑州与广西的不少州、县也有流传。但只出了七号(期)即宣告停刊。内容有论著、译丛、时评、小说、选诗、文苑、杂俎、谈丛、访函、专件、来函、记事等栏目。尤关心当时广西政治和教育，对于法国侵略和收回西江利权等亦表关切。而于各种弊政也多有诋斥。但在第四号中载有求己《鼓吹抵制日货之非》一文，与当时群众的抗争唱反调，诚美中不足。

《武学报》。1908年由新军中的尹昌衡、覃鋆钦负责编辑，吕公望为经理。只出两期，即告停刊。

《广西日报》。1908年，因君主立宪派的陈太龙、林绎等在梧州创办《广西新报》，宣传君主立宪主张。革命党人甘绍相、区笠翁则创办《广西日报》

① 鲁迅：《坟·杂记》，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与之对抗，宣传民主革命。

《军人魂》。1909年，驻桂林的新军同盟会出版，未久即停办。

《指南月刊》。1909年由桂林学界人士编辑出版，每期销行3000份，仅出两期，即因"言论激烈"，被桂林巡警道勒令停刊。

《梧州日报》。1909年甘绍相、区笠翁等创办，至1913年被迫停刊。①

《南报》。1910年9月创刊，是桂林同盟会广西支部的机关报。② 赵正平（化名侯声）为编辑及发起人，也是该报主笔。何遂（化名贱夫）、梁史、蒙经、刘建藩和耿毅等是主要的撰稿人，其中以何遂撰稿最多。该报的宗旨是：以"军国主义为纲，世界、民族两主义为目"。辟有论说、史地、军事、国内外纪事、时论、调查、英雄之魂、国民之声等十六个栏目，为广西地方性综合刊物。因为赵正平和许多主要撰稿人都来自新军，所以又具有军事刊物的某些特点。着重宣传以武力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深受读者欢迎。创刊号出版后，短短一个月内即发行三版。因此引起了地方警方的注意，未能办妥注册手续，只出三期即告停刊。1911年2月13日（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



桂林同盟会人创办的《南报》及《南风报》（附插图）

① 杜誉钦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一文中说名为《梧州新报》；梁子琴、李业安在《同盟会在梧州的宣传活动》一文（见《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说是《梧江日报》。并志此以备考。

② 蒙起鹏在《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报刊》一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中说：《南报》创刊于1909年（宣统元年），误。

更名《南风报》继续出版。仍为月刊，逢农历十五日刊行。编辑和发行人为廖璋，负责日常工作与担任主笔的仍是赵正平。办报宗旨改为："灌输世界知识，发扬军国精神。"文字虽有变易，而其精神实与《南报》一脉相承。开辟栏目有论说（专著有关南方大局之文）、讲演（以白话讲述国耻小史以及东西各国兴国亡国等小史）、历史、地理、军事、传记、国民之声（专选东西亡国人民之痛史及各国宣言书等）、纪事（分本国纪事、外国纪事、广西春秋、桂林春秋等）、时论（专选中外各报所著论说）、丛录、文苑、小说、杂著共十三个，亦与《南报》大同小异。由于在广西巡警衙门办了注册手续，所以办了八期，至辛亥革命爆发即自动停刊。

柳州同盟会当时不见有创办报刊的记载。但柳州革命党人刘震寰却于1908年在桂林创办了《民铎日报》，宣传民族主义。①

南宁的同盟会人办报较晚，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同时创办了两种报纸。一种是雷沛鸿、马冠麟主编的《西江报》；另一种是蒙经、卢汝翼的《民风报》。1913年，两报皆因袁世凯政府的反动压力而被迫停刊。

当革命党人纷纷在广西创办报刊的时候，君主立宪派也办了一些报纸。除前面提到的梧州《广西新报》外，还有以陈太龙为后台的梧州《良知日报》②、1912年进步党人在南宁办的《指南报》。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此类报纸已逐渐为人们所唾弃，不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既非民主革命派，亦非君主立宪派的个人或团体，也筹办了一些报刊。如：1905年，有"粤西黄女士议设女报，命名《女镜》，月出一册，专以启发女智等为宗旨"③。1907年，官书局坐办闵剔、贺世雄以原有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光复之役》。

② 《良知日报》是1912年共和党人在梧州办的报纸，与同盟会报刊对立，见侯雅云：《陈太龙传略》，载《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王延义：《辛亥革命时期梧州的立宪派》，见同上书第六辑。周百熹在《辛亥革命期间梧州的一些情况》（见上书第四辑）一文中，把《良知日报》说是革命派的报纸，误。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教育》。

的《宏文丛报》销路极滞，请准巡抚张鸣岐创办《桂林白话日报》，已聘定主笔，即可出版。[①] 同年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一日），桂林士绅联合创办了《广西报》。[②] 1908年，桂林铁路公所发刊了《桂报》，以振兴本省路矿，提倡地方自治为宗旨。[③]

各类书报的主张及其局限

在上述同盟会人所传播或创办的报刊中，前两类刊物主要是揭露国内旧有的民族矛盾，激发人们起来革命反满。而后一类刊物则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清朝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为反对清王朝、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且举《南报》及其续刊《南风报》的一些议论以作说明。

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说明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是两报每期必有的内容。在《南报》第一号《滇越铁路开车近状》一文中，作者指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工商之侵略为前驱，以军事之侵略为后盾。工商之侵略，必首恃铁路。军事之侵略，必借口平乱”。对于铁路，“彼筑乎？我筑乎？工商主客之所关也。沿边乱事，彼戢乎？自戢乎？军事主客之所关也”。

《南风报》在《本国大事记》栏目中，每期都有《外患之部》，及时介绍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消息和情况。如该报第一期和第二期，就分别刊载了日本、沙俄、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国侵略我国各地的消息17条和20条。1910年底，英国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云南片马。该报第三期的《外患之部》，即以《英兵入滇汇录》为题，披露了英国侵滇罪行17条。同时发表社论，指出英、法瓜分中国南方的严重性：“云南危亡，则英、法必纵分其半，法据东半，则势必出黔、湘，而两广在其大包围中。英据西半，则势必出蜀，而长

① 《东方杂志》第四卷第三期，《教育》。
②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三期，《教育》。
③ 《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六期，《教育》。

江上游即在其肘腋下。是云南之存亡，实中国之存亡也。”①

在《南风报》第四期，发表了赵正平以喜马拉耶笔名撰写的《军国主义论》一文，指出中国面临列强瓜分之局。英、俄、德、法、日等国扬言，中国乃世界病重之国，上不知自强，下不知自立，灭亡自不可免。与其存在而引起列强之纷争，不如灭亡之以维持列强势力之均衡。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叫嚣，文章大声疾呼：方今英占西藏，俄占新疆、内蒙，法占广西、云南，日占台湾、福建。国民惟有团结奋起，北拒俄、日，中御英、法、日，南敌英、法，方为上策。该报还经常针对法国占据越南，侵略广西的现实，告诫人们：法国实广西面临之大敌。广西危亡，非但牵涉南方各省，亦关系整个中国之存亡。

可是，帝国主义列强何以能在中国如此为所欲为呢？《南报》和《南风报》告诉人们，这是因为清政府对内离间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结果。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把国家弄得“百孔千疮，危如累卵。满、汉、蒙、回，民族未能统一。共和专制，政体未经大定。国人心志不齐，精神涣散，财政紊乱，民困颠连。新旧海陆两军，形实两缺；科学未精，器械不利”。对外交涉，则清政府自有其“特种之外交政策，曰和平，曰退让。和平不至决裂，退让不至冲突。对于强国之交涉，诚不于为计矣。虽然，不知中国有几许地，供彼等之断送也”。②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总理的所谓“新内阁”。《南风报》对此发表评论，指出奕劻的内阁实是“非驴非马之新内阁也，受贿卖国之外交部也，乱借外债之邮传部也，防止学生干涉外事，不准人民办团自卫之封疆大吏也。无一非生产国内革命之内胎，赞助国内革命党之功人也”。③ 从内阁、各部到各地封疆大吏，不但媚外卖国，而且贪污腐化，舞弊营私，穷奢极欲，无恶不作。川汉、粤汉两路，本为民办，清政府却借口以国有化，强行收回，

① 喜马拉耶：《英国派兵占据片马问题》，见该报第三期。

② 《规定敌国论》；是我：《本国大事记·外患之部》，见《南报》第二号。

③ 分见该报第四、五、六期，《时评》。

转让外人。结果是“名为国有，实为外有”。进而发问：清政府这种“失之外人者，熟视无睹，办之国民者，唯恐其成功”的怪现象，到底是什么政策？什么居心？[①] 此外，对于西太后那拉氏的穷奢极欲，庆亲王奕劻的纵子胡作非为，盛宣怀、梁士诒等之贪吞公款，买得官衔，也都作了大量的揭露。[②]

《南风报》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曾在第四期的《本社布告书》中申明：本报“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谤清廷皇族”。但在实际上，主张“排满革命”、批评“清廷皇族”的言论连篇累牍，每期必有。在《南报》上，就有人著文把革命视做“改造中国政府之艰难事业”，“官民相争之激烈手段”。认为“二十世纪之地球列国，有一国政治尚未改良，而其政府又不极力速改，求合于天然律令者，即终不能免于革命”。[③]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指的正是中国。

为了祖国的发展“合于天然律令”，《南报》和《南风报》在大力抨击敌对势力的同时，又以大量的篇幅歌颂革命和革命者。《南风报》的社论《南风观——本报出世辞》，就以隐晦的笔法，颂扬了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事是“北要两宫，改造中国”；而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则“将以根据两广，首领独立”。其他如钦廉起义、萍乡起义、河口起义和镇南关起义，都是“声势震惊一世”的事业。这些起义，虽然被人指为“大逆不道”，但其“冒大险，犯大难”，义无反顾的精神，实乃“勇于进取，慷慨激烈之风也”。它还赞扬1903年以来的拒俄、反美运动和各地掀起的收回路权之争，“虽然旋起旋伏，不免有龙头蛇尾之讥”，但坚信：“始作简，将毕巨。循此以往，苟济之以内力，则舒展烟云，呼啸波涛之大风起矣！”对于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先烈，则赞之为“牺牲一身之壮士、侠客”，“其履险如夷，视死如归之特性”，实乃轰轰烈烈，决定未来国家种族命运的民风，亦即国民精神的体现。对于当时的禁书如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

---

① 见该报第六期，《时评》。

② 见该报第四期，《时评》。

③ 病武：《葡萄牙革命风潮记》，见该报第三期。

《訄书》等，则赞之为对革命起植根播种作用的好书；而《民报》、《复报》等刊物，则是发动革命的推波助澜者。①

然而，如何开展革命以达到推翻清王朝，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呢？他们的回答是：必须以“军国主义为纲”，实行“军事救国”。认为举国上下，“人人持黑铁，洒赤血以杀仇敌者，铁血主义也，亦即军国主义也”。② 为此，大家必须确认自己的敌国，并对它“采取攻击主义”，以鼓舞国民进取之心，激发爱国之念，国民与军士同仇敌忾，方可取得胜利，救亡图存。③

《南报》和《南风报》刊行于广西，故对广西当时的现实与过去的史事亦多论述。如《南风报》刊登明末瞿式耜、张同敞等在桂林抗清的历史，歌颂他们是“今世人心之模范”，应予崇拜的大英雄。④《南报》热情讴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指出正是这些“匹夫”、“枭杰”发难于金田，“震荡中国十六省，决斗十五年”，从而使“中原豪杰之士，始知边僻之广西，实有存亡中国之势力”。⑤

在国外出版、发行的《粤西》杂志，其宣传重点也在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阴谋，谴责清王朝投降卖国的罪行，而又十分注意在内外反动派破坏下广西社会的各种问题。如指出清王朝出卖广西铁路建设权给法国，“不啻断送广西之生命”⑥。英国对西江航权与缉捕权的“横来要挟”，实“是侵夺我西江之主权”。⑦ 帝国主义列强当时高唱的所谓“保全支那”，实质是“保全

① 该文分上下两篇，著者署名喜马拉耶，想亦为赵正平之化名，见该报第一期。

② 《南报简章》。

③ 《想定敌国论》；《攻击主义》，分见该刊第一、二期。前文认为，沙俄与法国应是中国的主要敌国。

④ 分见该报第二、三期。

⑤ 《广西军事地理概论》，见该报第一期。

⑥ 禹偈：《对于广西铁路之愤慨》，见该刊第一号，《论著》。

⑦ 雷霆声：《论西江警察权之关系及收回之方法》，见该刊第二号，《论著》。

各国于中国平均之势力，实行瓜分结果耳"。[①] 而清政府把龙州、梧州、南宁对外国开放，允许外国人设立租界，实属"开门揖盗，引狼入室"[②]。把西江缉捕权、航行权让与英国，是"博大英国之欢心。故宁挑公怒，不敢不顺大英国之圣旨"[③]。据此告诉人们："今日之政府，实对于国民不负责任之政府也。路权可赎而不赎，矿约可废而不废，外债可已而不已，颟顸了事，坐误大局。"[④] 一再呼吁广西人民起来抗争，"振起吾粤之民气"，抛弃"和平主义"，采取"急激主义"，[⑤] 大家"同心一致，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无男无女，毋恐怖，毋怯懦，大无畏，大有为，脱卸依赖根性，振起自由精神，先发制人而不为人所制"[⑥]。

揭露内外敌人的残暴反动，颂扬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国民共同奋起，以铁与血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宣传所致，的确使不少青年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⑦] 这里无疑有《南报》、《南风报》和《粤西》杂志以及其他革命报刊所做的贡献。

但是，广西同盟会人所办的报刊以及他们所作的宣传，也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弱点。

第一，由于财力、物力的缺乏，经办者的经常流动，加以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他们所办的报刊，一般是出版两三期即宣告停刊，能坚持长久者实不多见。因此，刊物的发行、传播也极为有限，多数是在知识分子圈内流

① 独秀：《论华人漂流之非殖民》，见该刊第三号，《论著》。
② 一谔：《法人对于广西之侵略政策》，见该刊第一号，《论著》。
③ 缉奸：《政府最近之大卖出》，见该刊第二号，《时评》。
④ 雷霆声：《论西江警察权之关系及收回之方法》，见该刊第二号，《论著》。
⑤ 雷霆声：《论办邮船非救警权之策》，见该刊第三号，《论著》。
⑥ 老龙：《广西之去病复元论》，见该刊第一号，《论著》。
⑦ 李任仁在《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一文，专门列举了当年广西的十几位知识青年和他本人从相信康、梁的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到参加革命的转变过程。关于他自己，他写道："我原先也是康梁的崇拜者，受过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看到《民报》《南风报》等革命报刊，和同龄人士来往接触而转变参加革命和入同盟会。"

传，广大工农群众无缘也无力问津。这就大大影响了刊物的社会效益。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孙中山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认识是肤浅的和片面的，宣传贯彻也不得力。无论是口头或报刊，只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强调民族革命，对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既少过问，也欠理解。1910年同盟会广西支部在桂林成立，誓词是：“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是在外国提出的，不合中国人的口味”。[①] 南宁的同盟会建立以后，不敢对群众宣传“平均地权”，而从古老的《礼记·曲礼》中找理论根据，说“名山大泽，先王不以封诸侯”。[②]《南风报》第一期题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插图，借画竹叶隐喻“民族主义”四字。图左附有介士作的长歌，其中心思想也是呼吁民族革命。歌曰：

> 南人志欲扶昆仑，临风高唤健儿魂。健儿奋起环银铠，阔斧齐挥扫荆榛。我忆黄帝驰逐来西北，而今神胄漫衍殖。中国朝朝仰首胫，桥陵赫赫威陵足表式，奈何众庶犹酣眠？忍令山河久变色！天涯介士思无极，彷徨漆室终宵泣。长恨中原猿鹤啼，重叹大陆龙蛇蛰。吁嗟乎，漫漫长夜几时明？忽来喔喔雄鸡声；鸡声喔喔自南夏，探首东窗才见曙光晶。

说明当时的广西同盟会人及其刊行的书刊，只谈民族，少讲民权，不论民生，基本上还是个“一民主义”者。这些弱点的存在，又在更关键处决定了辛亥起义和独立斗争的进程与结局。

---

①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②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和广西独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镇压以后，同盟会积极开展革命的组织、宣传，并且举行多次起义的基础上爆发起来的。它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大较量。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积极响应，终于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胜利。辛亥革命之前，广西的革命党人在积极开展组织、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和遍布全省的天地会势力，抗捐抗税的群众互相配合、呼应，并声援在桂西南边境地区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为促进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和广西的反清独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武装革命的政治派别势力，在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也纷纷改变原来的立场，转向革命，为促成广西的反清独立，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广西革命党人参加的多次起义

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武装起义前夕，短短几年间，革命

党人在积极发展组织，号召“排满”的同时，又相继在我国南方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其中3次在广西西南边境。而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役，也有不少广西籍的同盟会员参加，其中多人为此壮烈牺牲。这些起义，虽然屡起屡仆，但它为辛亥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奠定了胜利的基石。兹将在广西西南边境的几次起义分别论述如下：

钦州、防城之役

1902年冬，孙中山应越南法国总督之约，以参观博览会之名，到达河内，与旅越侨商杨寿彭、黄隆生、甄吉亭、张奂池、甄璧、曾济等人相结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以后，越南河内、海防、西贡各地先后设立了分会。广东会馆书记张奂池负责河内同盟会会务并与各方联络。1907年春，孙中山因清廷与日本勾结，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遂与黄兴、胡汉民等先后转往越南，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总机关，筹划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发动武装起义。①



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兴

当时，盛产蔗糖的钦州那黎、那彭、那思三乡群众因糖捐繁重，推派代表数十人，向廉钦道王秉恩请求蠲减，竟被无理拘禁。乡民大愤，立即聚众数百人，组织万人会，推举乡望素著的刘思裕为首领，冲入城内，救出被囚请愿代表。王秉恩派防军分统宋安枢率勇镇压。而请愿群众愈聚愈多，声势极盛。王秉恩向两广总督谎报“土

① 参看冯自由《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越南之党务》，分见《革命逸史》初集、第六集。


钦州那彭圩当铺——刘思裕领导群众抗捐的指挥所

匪作乱”，总督周馥立派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赶往钦州，大肆屠杀请愿群众。三那各地，“庐舍为墟，老稚之尸山积”，刘思裕等皆壮烈死难。抗捐群众遂派代表往越南河内向孙中山请援，愿为革命军内应。①

当清政府调兵镇压钦州抗捐群众时，正在越南的孙中山和黄兴即派邝敬川为代表，入廉州与刘思裕等联络；又派胡毅生潜入赵声营中，约赵声与郭人漳等乘机举义。但因联络有误，以致造成抗捐群众大流血的惨剧!② 孙中山得到抗捐群众的主动请战，又以郭人漳、赵声与黄兴早有联系，并已参加革命组织，正是发动武装起义的绝好机会。于是，一面派日本人萱野长知赶往日本购买枪械，以厚兵力。一面派黄兴赶回钦州，住入赵声营中；并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化名张德兴，深入钦州腹地，联络各乡团练，收集抗捐群众。三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和顺

① 《东方杂志》第四卷第七期，《中国大事记》；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

② 据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附东兴举义记）说：“胡毅生至赵声营时，郭人漳、赵声已带队向钦州出发，未知刘思裕、黄世钦、唐甫珠等愿率抗捐群众拥护革命。”孙中山立派陈油持书往通消息，而陈油“畏葸不敢赶递”，遂造成抗捐群众被屠杀的惨剧。

那抗捐群众代表梁建葵和梁少廷以及刘思裕之侄刘显明等各率众数百人来会合并动员乡民暗助粮饷，声势极盛。

按照王和顺和赵声最初商定的计划，由王和顺率众进攻南宁，而赵声以所部新军尾追其后，相机暗助。如攻克南宁，则用同样办法向其他地方扩展。① 但是，因为运动南宁守军作内应的计划没有成功，所以北攻南宁的计划也无由实现。王和顺率众游动于三那各乡，借助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伺机再举。

三那抗捐时，广西提督丁槐奉命派衡军二营、绥远军一营入粤“助剿”。事平后，留衡军左营哨官刘辉廷、李耀堂守防城。刘耀廷早与革命党人有约，并运动梁耀堂响应革命。伺机数月、无缘发动起义的王和顺得到消息，立即派人前往越南，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率众200余人从三那兼程向防城挺进。1908年9月4日攻城，刘辉廷、李耀堂与团总唐甫珠依约接应。第二日即攻克县城，杀知县宋渐元等10余人。② 王和顺入城后，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文告，揭露清廷罪恶，阐明革命主张，宣传军队纪律，深受群众欢迎。③

革命军攻占防城的情况，南宁海关税务司斯泰老给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

① 1907年9月13日，孙中山在《致宫崎寅藏函》中说：起义军破防城县后，“众数千人，极得民心。现已全军北趋，以取南宁”。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典按：全军北攻南宁非事实，但说明有过这种计划。

② 1908年10月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函》说：“二十七日乘胜进攻防城县，一鼓破城。生擒知县等官，责其不知大义，身为汉奸，尽诛之。”而邓慕韩在《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说：“宋渐元，湖南人。被俘后，自陈与黄兴相识，有志革命，未由入党。恳请就军中挑勇数十人，愿随同扮作解犯到钦，乘不备，先占东门，大队继至，迎城内各军降，如是则钦城可不战而得，以此自赎。各人欲从其计，惟梁少廷挟曾被宋扣留之嫌，竟并家属悉杀之。”如属确情，则任性杀俘，实不可取。

③《王和顺防城起义文告》，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三册，台湾，1964。

讲得很具体。他写道："革命军有二千人以上，携带来福枪五百余支。""革命军只杀了官员和他们的党羽，只抢政府的公款。他们待遇士兵很好，每人月饷十元。"所以，"南宁政府军的一个营有一半参加了革命军"。至于"外国人到了他们手里会受到什么待遇"？斯泰老说："我可不想去尝试。"①

防城既克，王和顺命邝敬川率小队人马留守，自己则统率主力回攻钦州。时值大雨，经一昼夜跋涉始抵城外。黄兴闻讯，与郭人漳商议谋内应。郭人漳知革命军力量单薄，而廉钦道王瑚已有戒备，乃临时变计，由黄兴以出巡为名，至城外与王和顺会商，劝改道攻南宁。王和顺深知力量不足，难以取胜，但闻灵山防务空虚，乃挥师从钦州攻灵山。沿途乡民热烈欢迎，团练多携械来投，队伍扩展至千余人（一说三四千人），但缺乏枪械装备。经多日行军，于9月8日（八月初一日）始抵灵山城外。时城外要地的六峰山、环秀桥已被敌人占领。王和顺派精兵200人携云梯攻城，但梯多折坏，得人城者仅数十人，与城内守敌血战一昼夜，伤亡甚多。城外友军苦战两日，亦无法得手，被迫向廉州方向撤退。王和顺率随从20余人退出越南，余众则分散于钦廉各地，待机再举。

当王和顺率军从钦州进攻灵山时，郭人漳竟派兵尾追而来，另以一队攻陷防城，并杀革命党人郭时安，以掩盖他曾与革命军联系的事实。黄兴目睹郭人漳背信弃义，残忍反复，深知再留无益，遂由东兴转往越南芒街，回河内向孙中山复命。

附带提一下，当王和顺率军进攻钦州、防城之际，孙中山又派革命党人钟金富（芒街帮长）和詹岐山策动驻守防城东兴镇的两营清军反正，并命关仁甫携款前往主持一切。9月，东兴清军悬挂青天白日旗，依期宣布独立。而关仁甫未能将接济按时送到，反正清军遂疑有变，撤下青天白日旗，并放排枪，伪报收复东兴。

---

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243～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镇南关之役

镇南关、平而关和水口关，界连越南，素为广西边界要隘，其中尤以镇南关为最重要，法国侵略者视为东方第二个旅顺口。

钦州、防城起义之前，孙中山即注意广西边境三关形势，以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军素在边关活动，熟悉该方地理、人情，遂命他们分别担任镇南、平而和水口三关的起义准备工作。1907年夏，关仁甫以驻守镇南关的清军营官黄瑞兴与己友善，遂派心腹携带密函劝其反正。黄瑞兴答应相机归顺。与此同时，清边防军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两人也表示赞助革命，并以游说军队作内应为己任。但因事机泄露，易世龙与陈晓峰不幸被捕杀。关仁甫于7月28日仓猝退往越南。

王和顺在钦州、防城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命他转往镇南关发动起义。凭祥土司李佑卿[①] 早已倾向革命。1907年11月10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王和顺自越南回凭祥，沿途备受法国守兵阻挠，几经周折，始与李佑卿在那模村会晤，商定18日由李佑卿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但因王和顺出身绿林，李佑卿所部游勇不听调度，起义计划又受挫折。[②]

起义计划既不能依期进行，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委素为边关游勇首领的黄明堂出任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副之，何伍为支队长，负责镇南关军事，而以王和顺另率一队往攻水口关，以为声援。同时通知散处十万大山周边各地的起义群众前来增援。12月1日（十月二十六日）夜，黄明堂等集义勇、乡团百余人，快枪40余杆，绕出镇南关之后，攀登山道，突袭右

① 李佑卿亦作祐卿或幼卿，1881年（光绪七年）生，21岁时，因父李铨去世，佑卿袭职，是为凭祥第34代土司。凭祥靠近越南，中法战争以后，佑卿对法国侵略及清廷投降卖国深表不满，被土绅诬控，在任4年即被革去土官职。1907年，李佑卿与关仁甫在越南加入同盟会，先后参与镇南关与云南河口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琼州抚黎局局长。1913年因响应反袁，被琼崖镇守使黄志恒杀害，享年32岁。

② 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



中华国民军镇南关
都督黄明堂

辅山炮台。守台清军因多与革命党人有联系，所以战斗一起，他们立即反正。① 镇南、镇中、镇北三台及十六生的大炮4门，七生半的大炮10门，步枪400余杆，全被起义军夺取。青天白日旗在炮台上空迎风招展。②

攻克镇南关的捷报传到河内，孙中山大喜。12月2日，他亲率黄兴、胡汉民与日人池亨吉以及法国退职上尉狄氏等直向右辅山炮台进发，乘夜燃火把登山，犒赏将士，全军鼓舞。清军参将陆荣廷派兵反扑，被守台义军开炮击退。4日清晨，广西巡抚丁槐亲率援兵4000余人从龙州赶来，分路向炮台进犯。当时，远在十万大山一带的义军未能依期赶到，革命军百余人分据三个炮台，凭借有利形势拒敌。在战斗中，孙中山亲自为伤员包扎创伤，并登台燃放大炮轰击敌人。事后，他对这段战斗经历深感快意，难以忘怀。他豪情满怀地追忆说：

> 余自乙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失败以来，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国之土地，与将士宣力行阵间。③

他还说：

> 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至此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④

革命者仇视敌人、热爱祖国的心情，跃然纸上。

---

① 据冯浦澄在《我所知道的陈炳焜》一文说：当时守炮台的是陈炳焜率领的荣字营付中营前哨，哨长姚子安和李矮子（忘其名）。李及其兵士多被革命党人运动，彼此早有联系。而姚子安当晚又不在炮台宿营，故革命党人一到，守军即反正。革命党人不费一枪一弹占据天险右辅山炮台，冯浦澄时为陈炳焜中营中哨哨长兼全营教习。

② 邹鲁：《丁未镇南关之役》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十四章。

③ 《支那革命亲见记·序》，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④ 见《胡汉民自传》第十一章。

5日夜，孙中山与黄兴等离开炮台，冒雨下山，经文渊、谅山赶回河内，目的是迅速筹款和购买枪械，接济守台将士。黄明堂率众与敌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援绝，缺水缺粮，乃于9日主动撤出炮台，退入越南，在燕子大山一带待命，① 而右江道龙济光和陆荣廷等则声称收复炮台，向清廷邀功领赏了。② 结果，清廷赏给龙济光头品顶戴，陆荣廷先行赏给捷勇巴图鲁名号，继又以总兵记名简放。其余大小官弁，也都升叙加衔有差。③

镇南关之役，革命党以百余人枪，冒险攻占炮台，与数倍之敌相持近十昼夜，只阵亡1人，伤4人，而歼杀敌兵200余名，杀伤者更多。④ 清军虽报称收复炮台，但对“战果”则讳莫如深，只说：“是役均肉搏相持，阵擒者均受重伤，不能讯供。据探报：著名匪首疤头梁之弟梁扒在台北击毙。此外伤毙著要，猝难查悉。获枪七十六枝，他项军装甚多。”⑤ 这些故弄玄虚的奏报，明眼人一看即知其伪。它从反面说明了革命者的冒险犯难，以少胜多，显示了勇气，创造了奇迹。

---

① 关于义军撤离炮台日期，冯自由在《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中说是黄明堂等“卒以枪弹告罄，粮食不继，不得已于初四夜放弃炮台而退出”。故“十一月初五晚”孙中山在越南河内“已得镇南关炮台失守电”。而邹鲁在《丁未镇南关之役》中说：“黄明堂于初九日率众而退入安南。”再查清军机处有关档案，见中国近代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则以12月9日（十一月初五日）为是，故从之。

② 邹鲁和冯自由在前引有关镇南关起义的文章，都说陆荣廷在革命军攻占镇南关炮台以后，曾致书革命军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邹鲁文中收录从日文译出的陆荣廷约降密函。冯自由则说陆荣廷命樵妇持密函登山求见孙中山。但孙中山在1908年3月7日《致邓泽如函》（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说：“广西边兵多暗约来降。”或曰：“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多来约降。”并未提及陆荣廷本人。并志此以待考。

③ 俱见《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和十一日清谕。

④ 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1908年3月7日孙中山《致邓泽如函》说：“我军死者二人，敌兵伤近数百。”

⑤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致军机处外务部请代奏电》，见《辛亥革命》（三）。

钦州、上思之役①

1908年3月，因清政府与法国殖民者合谋，将孙中山从越南驱逐出境。孙中山被迫转往新加坡。将行之前，以钦州会党势力可用，且十万大山仍有起义余部存在，遂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起义的任务委任黄兴和胡汉民二人负责。

黄兴对郭人漳的两面派面目虽有察觉，但仍寄于一线希望。所以，当他接受孙中山交与的任务以后，立即致函驻防钦州的郭人漳，希望他能予起义军接济弹药，并相机响应起义。同时通过法国商人和冯自由分别在河内、香港两地购买枪械弹药，并派人秘密制造木质银镶的“总统中华革命军”印章，雕版印刷“中华国民军总司令黄”告示，以及利用机器自制枪弹和炸药引线等等。② 诸事准备妥当，黄兴遂于3月28日率领党人黎仲实、詹岐山、梁建葵、梁少廷及越南华侨200余人，从越南绕道出钦州，一路上高擎青天白日旗帜，高吹号角，并以“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名义，到处张贴告示。所到之处，乡民纷纷燃放爆竹迎接。途中屡败敌军拦阻。29日，义军过小峰，驻防该地的清军误以为郭人漳到来，列队出迎。义军枪杀数人，余众皆降。大队清军继至，被义军分路击杀，死者数十人，伤者逾百。30日，起义军复与清军一营相遇，稍经接战，敌军即潜入村中，据一古屋负隅顽抗。起义军一战士中弹牺牲。黄兴闻报大怒，高声传话命屋主迅速离去，然后向屋内投掷炸药，毙敌百余人，余众解衣卸械逃走。郭人漳以清军屡吃败仗，恼羞成怒，不但背弃给起义军接济弹药的诺言，而且亲自带兵赶来镇压。但在途中与战败的另部清军相遇，误以为是起义队伍，彼此开枪对击，互有死伤，遂惊惶四散。

---

① 本节凡未注明出处者，主要根据冯自由：《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邹鲁：《戊申钦廉上思之役》，见《中国国民党史稿》。

② 清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会衔电禀粤督，见冯自由：《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31日，黄兴乘胜挥师至钦州之大桥，与清军两营相遇，经短期战斗，清军即狼狈逃走。4月2日，起义军在钦州笃山布阵，寻找战机，以定进取。清军三营来犯，黄兴亲率义军居高临下击敌。清营管事龙某中枪落马，营官廖丁拔腿先逃，三营清军尽溃，降者30余人。起义军悉令剪辫，使之归附革命。

黄兴率领的起义军自进入国境以来，六日之间，四战皆捷，毙伤敌人甚多，缴获快枪总计400余杆，子弹火药无算；而所部义军伤亡仅四人，队伍却扩至600余人。所过之处，各乡百姓箪食壶浆以犒义军，声势极盛。正拟取道那楼、大录，进攻广西。而郭人漳与参将王有宏率兵3000余人尾追而来，分路包抄义军。黄兴以寡难敌众，乃招募勇士乘黑夜携炸弹击清营。敌人被义军突袭，不战而溃。黄兴分兵进击隆雁、练塘、那误、马路圩、柳绿、凤冈等地，使清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自此一战后，清军闻革命军之名，辄望风披靡。”① 清廉钦道龚心湛与郭人漳频频发电向两广总督张人骏告急，而张人骏则电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兵“协同严剿”。

起义军进攻广西的计划被阻，乃转战钦州、上思数十乡镇以伺战机。坚持月余，终因弹药告罄，病者日多，黄兴遂下令解散部众，分途转移，多数遣归十万大山，休养整补，待机而动。黎仲实、詹岐山等走间道往越南，于4月18日抵达河内。两日后，热爱祖国、智勇双全的革命家黄兴，征尘未洗，又接受孙中山的委托，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从越南赶往云南，指挥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一大批广西革命志士，发动河口起义了。②事后，论者谈及黄兴及其领导的钦州、上思起义时写道：

> 是役也，兴以数百人，转战月余，大小数十战，所向无前，先后破清兵逾万；而数百人中，死伤不过数人，卒得安全引退。兴之威名，由此震动中外矣。③

1907年和1908年同盟会在广西边境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黄兴都追随孙

① 邹鲁：《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② 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
③ 邹鲁：《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中山左右，参与起义的谋划和指挥；起义之日，又都亲赴前敌督师。三次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而其影响却十分巨大。镇南关起义以后，孙中山曾经这样说过：

> 默察广西全局，大有可为。月来所图，较前极有进步。盖我军苦战八日，未尝少挫，军心坚定，无虑涣散；而各乡人民，视革命军如亲友，不独乡民为然，即各处团练亦多暗附。以军心民心而论，诚可无虑。盖革命之根本已立矣。①

革命促进了人民的觉醒，而人民的拥护，军民的团结，又使革命者树立了必胜的信念，为革命奠定了制胜的根本。这也是同盟会在广西边境发动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所在。

河口起义和辛亥广州之役

云南河口起义虽然不在广西，其起义主力却是由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志士百余人组成的，指挥者是黄明堂和王和顺。他们受孙中山的指派，在云南孟坝寨设立前敌指挥部，于1908年4月进攻河口。30日，与清军的反正部队会合，占领河口，击毙清边防督办王镇邦，收降卒3000人（一说5000人），缴获枪械千余支。随即分兵北上，连克南溪、新街，直逼蛮耗、蒙自。5月5日，孙中山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清军反扑，在泥巴黑、羊子街等地相持20余日，终因弹尽援绝，被迫撤退。26日，河口失守。黄明堂等率众600余人退入越南，旋被法国殖民军缴械遣散。②

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死难最为壮烈、震动最为巨大的起义。广西不少革命志士参加了这次起义，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辛亥广州起义，是孙中山于1910年11月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开

---

① 1908年3月7日《致邓泽如函》。

② 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

会议决定举行的。由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起义统筹部，一面向海外华侨筹集起义经费；一面派人分别至新军、防营、巡警和各地的会党绿林中活动，并号召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党人回国。为了接纳各方志士，特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38处。计划选拔800人为“先锋”（敢死队），在广州起义。广州攻克，即以黄兴统一军出两湖，赵声统一军攻江西、南京。广西籍革命党人李德山、刘古香、柯汉资和施正甫等人在广州参与了起义的谋划工作。李德山旋奉黄兴之嘱，派韦五洲回广西约集同志，赶往广州听命。先后到达者有韦统淮、韦统铃、韦荣初、韦树模、林盛初、韦五洲、李元芳、韦四海、韦铁、韦北、韦裕明、李子廷、韦统武、韦不吕、韦云卿和韦能宝等人，连同原在广州的李德山、施正甫等，共计20余人。①

4月15日（三月十七日），华侨革命志士温生才刺杀清广州将军孚琦案发生，而叛徒陈镜波在危急关头竟将起义计划向官府告密。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城挨户搜查革命党人。黄兴、赵声等以形势紧迫，于2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义。27日午后5时30分左右，黄兴发出起义号令，命革命军分四路出击。李德山统率的广西志士组成敢死队，在黄兴的直接指挥下，从小东营出发，



“三二九”广州起义负伤被执、壮烈牺牲的李德山（左）、韦云卿（右）

① 除李德山为罗城（后居桂平）人，刘古香、柯汉资、李子廷为马平人，施正甫为宾阳人，韦五洲为岑溪人，韦云卿为南宁人外，其余都是平南人。韦云卿是从越南回广州参加起义的。



广州“三二九”起义平南五烈士纪念碑。碑基上刻有烈士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的籍贯、年龄和事迹

直攻清两广总督衙门，毙卫队数人，杀管带金振邦。张鸣岐闻风穴墙先逃。革命党人火焚督署后即转至东辕门外，与清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遭遇，激战中互有伤亡。李德山、韦统淮、韦树模等数十人沿街与敌人搏斗，冲出重重包围，最后据守源盛米店，以米包作掩护，与大队清军激战一昼夜，终以众寡悬殊，且伤亡过重，被迫突围。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李德山负伤被俘，壮烈牺牲。韦云卿、林盛初突围后被清军巡逻队盘获，英勇就义。[①] 韦统淮、韦统铃、韦荣初、韦树模当场战死。事后同被殓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受到世人的永恒崇敬。[②]

广州“三二九”之役，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倾全党之人力、财力发动的一次反清大起义。革命党人的流血牺牲，不到半年就迎来了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

① 李德山、韦云卿被捕壮烈牺牲的情形，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各人小传。

② 以上所述，凡未注明出处者，俱见施正甫：《“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回忆》；韦能宝：《“三二九”广州起义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又参冯自由：《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见《革命逸史》初集。

二、各地各族人民的抗捐税斗争

捐税繁多，“民变”迭起

伴随广西革命党人参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省内各地和各族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事和抗捐抗税斗争。

广西的捐税繁多，税率很重，前几章已略有提及。20世纪初年，封建统治者借口练新军、办学堂和开议局等所谓“新政”开支的需要，大肆增捐加税，名目之多，难以枚举。要者如酒捐、糖捐、油捐、花捐、赌博捐、门牌捐等等。据清《度支部税课司奏案汇编》透露，广西统税征收，宣统元年几及光绪二十九年的3倍，而酒锅、油榨、糖榨贴费以及牛判、土膏、牌税捐和契税等共四项，宣统元年是光绪三十二年的8倍，三十三年的6倍，三十四年的5倍。地方役吏通过收捐增税，任意勒索中饱，更是所在多有。人民走投无路，“民变”迭起。据1910年夏秋间的报道，广西当时的形势是：

藤县：因“官吏贪酷虐民，民心浮动，全境骚然”；苍梧、平南、容县、武宣、昭平邻近各县，“半入藤县胁煽”。

归顺直隶州镇边县：“近日亦有匪耗”，群相纠合，围攻县城。“匪党广张伪示，纠人入会，大意以安国灭洋，先杀学生，后杀官吏为名。”①

平乐府属各县：“近日匪氛日炽，勾煽愈多。”

沿浔江、抚河、柳江与左、右江数十州县：“水师船艇，或因卫送商船，或因缉巡汛地，遇匪接仗，无不败挫。”以致“船械毁失，弁勇伤亡”。

---

① 典按：起事群众提出“安国灭洋”口号，并非要求反抗外国侵略者，而是由于官绅借口兴办新学，勒索百姓钱财，而群众误解新学即洋学，入学堂之学生即从洋从教，是以群起反对，造成了兴办新学不应有的阻力。

全州：知州周岸登在任一年，激成民变三次。日前又借口清乡，派试用巡检曹骏带勇数十人，伙同劣绅至各乡“骚扰勒索所需，纵兵淫掠”。因而激动公愤，乡民聚众2000余人，将曹骏置于猪笼之内，抬之游圩示众，旋又押送上省。乡民之首，均插一竹片，上书“官逼民变，绅逼民死”字样，坚请桂林府查究。“州属六乡，连合响应，宣言不重惩周岸登及清乡委员曹骏，誓不干休。”10月11日，复“纠众二千余人，将向助周岸登剥削民膏之劣绅二十六家，全数焚掠，火其庐舍，抢取财物，各绅仅以身免”。

此外，还有“南宁府属各民，因抵抗新捐，有六万余人，附入匪党，各携枪械与官军抵敌”之讯，亦时有所闻。他们游走于中越边境，或进出于滇、黔邻省，彼此联成一气，分合聚散，变化无穷。这些风起云涌、遍及全省各属的民变、兵变，以及民、匪、兵互相转化、结合的事实，直接或间接助长了革命的声威，加速了封建统治者的垮台。①

永淳、岑溪、怀远的抗捐税斗争

与民变同时发生的抗捐、抗税斗争，亦遍及全省各地，其中又以永淳、岑溪、怀远三地为最著。② 兹分述于下：

1．永淳抗捐（1909～1910）

广西横州、永淳各地，盛产谷米、甘蔗和花生等农作物，是以酿酒、榨糖和榨油业非常发达。永淳三圩甘辣泉酿制的烧酒，“色红味甘”，远近知名。

1909年初，永淳知县马钟南借口举办新政，除对旧有之地丁钱粮正杂各

---

① 以上所述各地民变，俱见宣统二年（1910年）八、九、十月《东方杂志》第七、八期、十期；以及故宫档案馆《两广民变档案》，见《辛亥革命》（三）。《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七期记当时广西的情形说：“广西民情横悍，素称难治，有今日为民，明日即匪，后日仍当兵者，以故三者混合，无法整理。”

② 参看拙文《辛亥革命前夕广西各族人民的抗捐斗争》，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3），又载《辛亥革命与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税与牛捐、猪捐等加倍或加两倍征收外，又开征油、酒等新捐。不少曾参加过早年钦州抗捐的永淳人民，多次要求马钟南收回增捐的决定，都被拒绝。群众忍无可忍，在陈世才（化龙圩壮人，牛客）、黄兆吉（木塘乡壮人，酿酒工人、拳师）、黄有昭①（木塘乡壮人，自业榨糖）和黄华甫（藤山乡壮人，自业酿酒）等人的领导下相约举行罢市，并抗击进人乡圩索征的税差。马钟南恼羞成怒，悍然采用武力收捐。群众为了自卫，也由黄兆吉出面，发信各乡，共商对策。城北、大塘、木塘、石塘、甘棠、六景、稔竹、平朗、露圩、化龙、古辣、沙江、良圻和真木等十数乡群众奋起响应，广东灵山亦有百人赶来声援。几经商议，决定推举黄兆吉为首领，设立大馆，集资开练；并制红底黑字三角旗，上书“官府害民，百姓除害”八个大字，加紧开展武装抗捐。

当时，马钟南已经调离永淳，由张融继任知县。1910年4月5日，张融与南宁府廖廷钰带兵练至化龙“弹压”。抗捐群众4000余人“拦路设防，炮轰官兵”，直逼县城近郊，并“连夜将附近电杆斩断，又截杀报信兵役”，准备大举攻城。巡抚张鸣岐闻报，急令提督龙济光率兵五队共约2000人，从南宁星夜赶往永淳，分三路围攻抗捐中心的石塘，经一昼夜战斗，石塘抗捐营寨尽被攻破，群众死亡百余人，被俘数百人。黄兆吉、黄有昭等在突围中被清兵俘获，惨遭杀害，相持年余的抗捐斗争失败了！

2．岑溪抗捐（1909～1910）

岑溪抗捐也发生在1909年初。因为知县尹正举与劣绅陈紫官、李拔三等互相勾结，借口筹备设立议事会，推行新政，肆意增加捐税。一时间，增收捐税和新设捐税主要有烟税、酒税、谷米税、柴草税、牲畜税、赌博税、人口捐、门牌捐、屠宰捐等。这种“借办地方新政，遇物加抽”的增税章程一公布，举县哗然。人民发出揭帖，历数官绅横征滥索的罪恶，表示誓死抗捐

① 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张鸣岐作“永淳县属匪棍黄有绍”，见《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三四。

到底。①

尹正举对群众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且决定实行武力收捐。各乡群众则与之针锋相对，决定以武力相对抗，并公举82岁的崇正团首陈荣安② 出面，到水汶、六山、七山、横云等20余乡、圩点团，并与苍梧、怀集以及广东信宜、罗定等县的群众通声气。以"抗捐税、解民悬"为斗争口号，一时间响应者逾万人。1910年3月，4000余抗捐者因不堪官绅和税差的压迫，纷纷自带米粮，从四面八方到崇正团所在的古万村集中，共同掘壕筑垒，准备战斗。

面对抗捐群众的强烈反对，尹正举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结合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拼凑地主武装，并向梧州知府志琮请兵入援；一面与团绅李拔三等两次三番到大湴圩对陈荣安等进行威胁分化，要陈荣安解散群众。正在此时，有同盟会会员数人从广东秘密进入古万，会见陈荣安父子，允为抗捐筹措饷械，坚定了陈荣安等抗捐到底的立场。③

6月中旬，志琮潜入岑溪，直逼大湴圩和古万村，被抗捐群众痛击。从此，街圩罢市，乡村则从抗捐进而抗租、抗粮。28日，从梧州和广东调来的清军2000余人，在地主武装配合下，分三路进攻大湴圩和古万村。抗捐群众手持火枪、大刀、棍棒与敌人展开血战。7月7日，粮尽援绝，被迫以野菜、树叶充饥。16日晨，敌人以大炮轰塌抗捐营垒，"破寨而入，兵勇乘机劫掠，

---

① 抗捐的揭帖开头说："丰熟时年怪事多，将条税款作风波。戊申、己酉皇换过，真冇错，龙殿宣统坐。未知世界怎如何？"接着申斥官绅"开税厂，狐群狗友成一党，税了圩市税村坊……诡计想到尽，勒索七乡六埠人"。进而表明："做事冇合款，百姓就冇愿。"最后提出警告："准尔同官穿条裤，去投诉，登时出文武。逼反江山知道无？江山逼反立登山，杀尽坐局这班人。"

② 陈荣安，字卓干，岑溪古万村人。父陈秀峰于咸丰年间与陈金刚进入岑溪时，在古万村立崇正团抵御。岑溪各方皆逼于形势"转红"，独崇正团得免，因此远近闻名。荣安大子启乾在大湴圩经营酒米与屠宰生意；二、三子皆入武学，故同倡抗捐。

③ 1978年11月我在古万调查时，据陈荣安的侄孙辈陈克瑞、陈克良等口述。他们当时10岁左右，是抗捐失败后的死里逃生者。

乡人死者以千计，生擒者亦数百人，情形极惨”①。陈荣安在寨破时被俘，押解县城，“枭首示众”。

清军血洗大滥、古万以后，又借口“追歼逃匪”和进行“清乡”，在各地大肆烧杀淫掠，弄得田园荒芜，灾疫流行。11月，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魏景桐报称：陈荣安父子“纠众谋乱，业经调兵剿捕，拿获首要，散胁抚良，地方一律安谧”。②但抗捐群众并未屈服，他们多“结帮成股，窜身山谷”。“岑溪、怀集各乡圩，骤添匪类万余人之多。”怀集一县，不及半年，袭击地主官绅之事即达600余起。③他们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在桂东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怀远抗捐（1909～1911）

怀远县即今之三江县。聚居在县城西北各乡，沿林溪河、武洛江及榕江两岸的侗族人民，长期以来多以垦殖桐茶和榨油外销为生。

1908年，怀远知县石家鑑与劣绅汤锡臣、潘建邦等勾结，借口创办县立两等小学堂，开征油榨捐。因为百姓出钱办学，而入学者多为官绅子弟。所以，开捐的消息一经传出，群众立即起来反对。他们推举吴吉彪(侗人，天地会首领)为首领，先在武洛江之和尚坪集会，以“抵制官厅抽收苛捐，打倒士绅从事洋教”相号召，决议捐款置械，集团抗捐。一时闻讯而集者计有121个村的侗、汉、瑶、苗、壮等各族人民4万余人。于是，拆税厂，斗税差，发揭帖，斥官绅为“麻风头”，曰可杀者有24家。抗捐浪潮激荡四乡，愈演愈烈。

在群众的坚决抵抗下，石家鑑一面宣布推迟抽捐日期，一面带兵二哨，从丹洲县署北上古宜，与团绅覃锦芳、梁兼才等同往各地，“宣导”抽捐办学。因在程阳鸣枪示威，被抗捐群众反击，殴毙覃锦芳，石家鑑与梁兼才狼狈逃走。不久，石家鑑被免去知县职，由嗜杀成性的刘壬滨继任。他以程阳聚众抗捐，殴毙绅士与亲兵为借口，向张鸣岐“力请派营洗村”。桂林援兵抵达以后，与团练合编为五哨，开往各地勒索群众，封屋捉人。程阳一带，被

①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八期。

②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四三。

③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十期。

抄家、坐族者数十家。乙、丙两区，被“罚款”多至20余万元。但并不能把人民的反抗压制下去。

1910年11月，沈秉堃继任广西巡抚。他深感事态严重，于1911年9月被迫将刘壬滨免职，改派曾建勋知怀远县事，率兵800名，配合快枪，开入古宜，仍作武力镇压之计。而这时候，吴吉彪已正式设大馆于程阳，其他天地会首领如李红林、梁月初、张三嫂、梁国安、潘文仁等亦纷纷聚众，支援抗捐斗争。曾建勋迫于形势，只能“守以待机，不敢骤发”。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吴吉彪等在柳州同盟会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举攻克丹洲县城，占领古宜，所至响应。曾建勋闻讯先逃，所部兵勇全部向义军缴械投诚。坚持三年的怀远抗捐，发展为迎接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

永淳、岑溪、怀远的抗捐斗争，是以汉、壮、侗族人民分别为主体发动起来的。他们有的是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自发反抗，有的则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生了联系，间接或直接为辛亥革命在广西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成了广西辛亥独立斗争的促进者。

三、辛亥武昌起义和广西独立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广西的革命党人也闻风响应，有的举行武装起义，有的和旧派势力进行谈判，希望不动干戈而获得廉价的胜利。而有些地区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派系势力的反复较量，形势十分复杂、多变。

柳州、浔州的武装起义

柳州和浔州是武装起义的地区。革命党人通过暴力，曾经一度夺取了柳

州和融县、平南两县的政权。

柳州和桂林、南宁、梧州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桂林乃广西省的政治中心，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驻扎的旧军和巡警不下4000人。南宁是陆荣廷的地盘。而梧州除了君主立宪派的势力之外，还有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柳州相对各地而言，阻力是比较薄弱的。而李德山、刘古香等人早在那里组织秘密机关，积聚革命力量；加以陆亚发兵变，继之是怀远各地的抗捐斗争，都大大地鼓舞了当地的群众。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以后，广西的革命党人纷纷集中柳州，常与香港、广州、武汉各地互通消息。所以，武昌10月10日起义发动以后，柳州革命党人很快得到密电，立即在柳河水师营召开会议，决定于10月12日以水师营的革命党人为主力，进攻镇台衙门。右江镇总兵兼熙字营统领陈宗棠闻风丧胆，措手不及，被迫“献印投降”，各地机关同时反正。革命党人立即组织柳州军政分府，公推刘古香为府长。第二天，派蔡劲柏赴宜山，向清军荣字营督带莫荣新说降，并任他为庆远府府长。同时决议废除苛捐杂税，整顿地方财政；扩编军队，出师北伐。①

柳州北面的融县，政权掌握在顽固效忠清王朝，拼命反对独立的知县张礼干手中。柳州独立，他无动于衷。广西宣布独立以后，他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却在地方上派出军警，检查行人，实行宵禁，刺探地方人士的言论，监视青年学生及倾向革命人士的行动，制造恐怖气氛。地方绅商向他探询对独立的意见，他也不明确表态，而是命令县警备大队储备大批火药、棕绳，图谋向革命者反扑。柳州军政分府侦知张礼干反抗独立的阴谋，决定联合当地民军，于12月1日举义。但张礼干先发制人，先向民军发起进攻。柳州民军星夜北上增援，张礼干战败投河自尽。而民军占领县城以后，却联同地方人士推举典史卜任桢权署融县县长。②

---

① 参看李墨馨：《辛亥革命前后柳州的革命活动》，见《广西辛亥革命资料》。

② 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前事》；胡佩生：《广西独立时融县的斗争》，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但说攻城在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

浔州府的武装起义，首先在平南爆发。

武昌起义以后，罗佩珩、陈志轩、徐启祥、卢殿林、廖和卿等立即从香港赶回浔州，随即派人分赴贵县、武宣、桂平、藤县各地联络进步人士，动员会党、绿林和民军力量，决定先取平南，然后会攻浔州，北进武宣，与柳州组成联军；同时约请在平乐活动的周毅夫，另率一军，从东西两路挺进桂林。由于徐启祥、卢殿林等事前已在平南设立秘密机关，筹款购买军火，并联络了桂山、八垌、鹏化等地的会党绿林千余人，安怀、六陈团练近千人，县警两队数百人，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县武装巡警60名，共有枪支千余杆。11月5日发动武装起义。县官蹇先桃仓皇出走，革命党人未遇抵抗即克复县城。由卢殿林摄理县政。①

平南既克，遂将平南民军与苏无涯率领的民军进行整编，然后由罗佩珩和从平乐专程赶来协助的周毅夫统率，分水陆三路夹江西上，进攻浔州。大湟江口、石咀各地民军沿途加入，贵县、武宣的民军亦分路向浔州府城挺进。民军与绿林队伍总计超过万人，彼此相约于11月9日会攻府城。但桂林方面已于7日宣布广西独立。桂平知县刘梁，士绅程大璋等接电后，亦于当日宣布独立。而知府贺清源态度暧昧。11月19日，民军首领曹启光人城要他交印，被贺清源拒绝。21日，罗佩珩等遂下令民军攻城，连战五昼夜。贺清源命令兵勇闭城固守，巡警队亦为士绅所阻，无法内应。陆荣廷接到民军围攻府城的消息，急调龙觐光从贵县率军反扑。27日，民军败散。陆荣廷复以官禄引诱罗佩珩，把革命军全部解散，起义遂告失败。②

平乐府属的贺县，也动了干戈，攻破过县城，但情况比较复杂。

---

① 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据他的回忆，当时筹款的情况是：除徐启祥在桂平老家变卖田租20余万斤外，还有刘古香在华侨殷商中筹得1万余元，卢殿林在平南筹得1万余元，陈志轩在贵县大圩筹得1.8万元，卢云川向桂平罗播李家筹得1.2万元，杨梦松在贵县桥圩筹得7000～8000元，他在贵县樟木、木格筹得2万元，合计8万多元。

②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

原来，桂林宣布独立之后，贺县知县向宣也“奉命布告反正”。但群众不满意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12月22日，怀集的会党头领崔文忠率众2000余人，首先攻破大宁圩，直逼贺县城。县里的会党也“乘机而起”，提出“改革政治”的口号。一些同情革命的士绅“随声附和”。有自称革命党人的邱茂英且“在水竹、梅花、青草等地放台拜会”，被县警配合团练捕获杀害。此后，会党首领邱怀信、黄十二等复四出联络，与崔文忠及广东连山会党头目冯胜利等联合，“树旗起事”。各乡群众应召“聚集十里坪，数日不散”。向宣“闭门坚守”。这时，又“有号称新党者单骑入署，以炸弹恐吓，迫勒向令交出政权，为警兵伤膀”。各方民众则大集城外，并于1912年元旦环攻县城。城里的士绅意见分歧，“和战之争”两昼夜不决。3日黎明，城内守兵内应，城遂破，士绅龙藻、严荣超等因抗拒攻城被杀，向宣被俘，先押解至黎家寨民军大营，旋又解回城内，令为贺县民政长，黄十二自称总统。6日，陆荣廷派兵入贺县，盘踞三月，肆意烧杀劫掠，“真匪不获，反以扰民”。黄十二、邱怀信等先后死难。①

桂林官绅协议的“独立”

在一片反正独立声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桂林的动静与变化。

桂林是广西巡抚衙门所在地，全省政治、文化中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桂林，革命党人十分激动，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个个磨刀练枪，准备迎接起义。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赵正平、耿毅、刘建藩等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响应武昌起义的办法。决定联络柳州、梧州、浔州和恭城各地的会党势力，扩充起义队伍，并一致决议于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进攻省城。谁知届时天下大雨，南门外尽成泽国。新军在黑夜中从李家村进抵将军桥，阻于洪水，被迫折返，攻城计划无法实现，引起内部矛盾重重。这时桂林的气氛非常紧张，清军官绅也预感到变在眉睫。布政使王芝祥是个老奸巨猾、嗜杀成性的

---

① 梁培英：《贺县志》第一编，《前事》。

官僚，旧军、巡警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本来准备顽抗到底，但是当时湖南已经独立，柳州早被民军攻占，全省各地的民军、会党声势咄咄逼人；谘议局的议长、议员以及桂林商学各界也纷纷派出代表，找巡抚沈秉堃和王芝祥分析形势，面陈利害。民军、会党准备攻城的消息一日数传，在巡抚衙门和藩司工作的同盟会会员这时也公开露面，对王芝祥做策反工作。这才迫使他放弃顽抗的谋划。11月6日，谘议局开会决议广西独立，并由议长甘德蕃找沈秉堃，要他出面当众宣布。这时，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等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先后传来。于是，连夜由藩司衙门找人制作宣布独立的旗帜数百面，上书：

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广西独立，广西国民万岁！



1911年11月7日广西巡抚、广西军政府、广西省议会发布的独立通电（告）

然后分发各衙门及商号悬挂，并于7日上午10时在谘议局演出一幕“宣布独立”的滑稽剧。① 耿毅是同盟会广西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这幕滑稽剧的主要导演者之一。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中，对“宣布独立”的经过情况有绝妙的描述，且容节录如下，以明真相：

上午十时，各单位的代表都汇集在谘议局了。抚台沈秉堃和一

① 参看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广西响应武昌起义部分；邹鲁：《广西光复》；郭孝成：《广西光复记》以及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等文。

班旧官僚仍旧戴着红顶子花翎，穿着行装，仅仅免了袍褂。谘议局的甘尚贤[1]、黄宏宪、蒙经都来对我说：

“他们不是假独立吗？你看他们还是戴着红顶子哩！”

我急得赶快找王芝祥，质问他怎么搞的？王连却叹息道：

“唉！别提了。我们有些人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哩！昨天商量也有反对的。文道台说：‘这不是不要皇上吗？’回家去一气气死了！三哥，你就将就一点吧，大家还骂我忘了君恩，是革命党哩！”

我只好算了。这时突然有人走过来问我：“什么时候下手？我们都准备好啦。”我大吃一惊，问道：“下什么手呀？”

回答说：“营长说，他们革命是假的。我们外面有两连兵已经上了子弹。只要你一声号令，就冲进来打。”

我说：“赶快把营长叫来。”

陶柏青来了。我问他：“这是你的主意吗？”

陶说：“不是。这是议长和副议长的主意。”

我又找到甘尚贤，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全省的大官都在这里，一下子全解决了。”

我说：“老甘，我看不能这样干。条件已经商量好了，不能毁掉，失信于他们，叫一般人骂我们革命党人失信义。而且现在广西的财政不能维持，库里只剩下四千毫洋，湖南、广东接济又不来。我们把事情闹乱了，不好收拾。”

甘尚贤不听，咬定独立是假的，非动手不可。我急了，只好跑到外面，站在队伍前面喊了一声：“大家注意，今天开独立大会，一切要听我支部长的命令。现在把子弹都退出来。”

士兵们都退了子弹。我命令连排长检查一下，然后对连长说：“没有我亲自下令，不许乱动。”

---

① 应为甘德蕃，又名甘曦。

说完，赶快去找王芝祥，低声说："铁老，[1] 赶快开会，快点散会。时间长了，会出乱子的。"

这样，沈秉堃草草讲了几句话，王芝祥与议长甘尚贤讲了话。我怕出乱子，没有讲话，就宣布散会，命令军队回防。

像演戏一般闹了半天，广西就算独立了。

因为桂林是广西的首府，所以，桂林的独立，实际就是广西的独立。经过"像演戏一般闹了半天"，清朝的广西巡抚沈秉堃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广西都督；清朝的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广西提督陆荣廷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广西的副都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秉堃以都督的名义，向全省官绅和军民发表的文告中宣布：独立以后，全省官员及行政机关均仍旧；原有军队及其营制、饷章与统兵人仍旧；所有府、厅、州、县钱粮、词讼仍旧；各关厂厘卡税员及税则仍旧。而对洋商、洋教，各地方官应格外保护，如有匪徒滋事或伪称国民军扰害地方人民属实者，一经拿获，严加惩处。四个"仍旧"和两个"严加"，说明这个所谓独立后的民国广西政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广西的政治、财经、军事大权，仍旧掌握在封建的旧官僚手中，真正的民主革命派并没有在独立中抓住半点权力！

南宁、梧州"独立"的反复

南宁是广西提督军门的驻地，陆荣廷一派势力的根本所在。武昌起义传到南宁以后，新旧派势力的斗争比较激烈。而在革命内部，又迅速出现了意见分歧。在新军活动的周毅军、谭昌、李应元等人，"暗布传单，集党会商，主张急进"。雷在汉则"恐事决裂，大不谓然，又因饷械运送未至，议故未决"。不久，桂林独立之公电传来，各界人士即于11月8日"进谒提督陆荣廷，请急照省电施行，维持时局，免激烈派得以借口"。[2] 陆荣廷既被桂林方

---

① 王芝祥字铁珊。

②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六，《兵事志·前事七》。

面公举为副都督，而且巡抚、布政使“独立”于前，他自然可以毫无风险地接受各方人士的要求，紧步柳州、桂林之后，于11月9日（九月十九日）“通电全国，附和共和”，宣布独立。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不改保皇本性，在思想感情上对北京紫禁城里的宣统皇帝依然是难舍难分。据雷在汉在《辛亥革命广西纪事》一文中透露：就在通电全国，表示“附和共和”之际，陆荣廷竟先在私室内秘密演出了一出向“皇上”表示忏悔，乞求宽恕的表忠戏。他身穿袍褂，点香燃烛，虔诚地朝北三跪九叩首，口中喃喃言：“老臣罪该万死，将来必有报圣恩”者，然后才让人把辫子剪掉。也就在同一个时候，陆荣廷的儿女亲家，右江镇兼新军标统龙觐光召集所部训话，公开叫嚷：“附和共和，只为敷衍目前形势。你们务必遵守清朝军令，以一军权。非然者当以军法从事。”宣布“独立”以后，陆荣廷的南宁军政副府由他的妻舅谭浩明负责主持。而在“独立”之日的下午，龙觐光即“发兵包围新军，勒令缴械”。谭昌被捕入狱，周毅军、李应元等走免。[①] 当时，南宁谣传王和顺欲回广西，与陆荣廷争夺都督位置。所以，独立后的南宁依旧戒备森严，如临大敌。[②]

梧州的独立过程比较曲折和复杂。[③] 它靠近广东，为广西主要商业城市，广东的动静对它的影响极大。10月25日（九月初四日），广州发生了革命党人炸毙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的事件。29日，广东绅、商、工、学各界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集会于文澜书院，主张独立。总督张鸣岐迫于形势，“已有允意，而满族军民各怀决死之心，运炮上观音山，以拼一死”[④]。梧州的革命党

---

① 陆荣廷原欲杀谭昌“以儆其余”，后经商会及雷在汉等保释。周毅军、李应元等于1912年因对陆荣廷篡夺广西政权，“图为二次革命”，被陆荣廷“并戮于市”。

② 参看李家诜《辛亥革命在南宁的活动》，见《广西辛亥革命资料》。武昌起义，广东独立以后，王和顺在广东任民军第一师统制官，其左右亲信有劝其回桂执掌军政大权的。

③ 关于梧州的独立，参看拙文《梧州“辛亥独立”特性研究》，见《辛亥革命与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④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人区笠翁、甘绍相、区绍璜、陈季川等得到来自广东的这些消息，利用新军中的积极分子，约集士绅及群众千人左右，于10月31日（九月初十日）借用东门外的鸣盛戏院召开大会，宣布组织军政分府，推举“赋闲家居”的士绅周之济出面维持，实行独立。①

但是，同在这一天，周之济却与梧州道台沈林一、统领宋安枢，以及士绅梁廷栋、钟葶等深感“时局危急”，且以“兵事为虑”，决定筹建武装，以应万一。除道台衙门招练丁200名外，再由商民招练商团200余名，官给枪械，商会负责饷项。更由在城绅民议练民团一二百名，以劝学所办学经费为团费。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日），梁廷栋、周之济等复集议于文昌宫，在十数名守旧士绅的操纵下，决议成立梧州保安公所，以康有为的门徒、保皇党分子林绎为所长。分电桂林、广州，请求支援饷银和枪械。清朝官吏和守旧士绅的这些联合举动，实际是封住革命党人的嘴巴，捆住他们的手脚，否定他们成立的军政分府，为旧的统治实行“自保”和“自卫”。② 所以，尽管梧州的革命党人宣布独立于前，但清朝道台衙门未去，沈林一实际大权在握。由他和守旧士绅一手炮制的保安公所同时存在。真正左右梧州局势的是他们，而非革命势力。因此，有人说梧州当时已经独立，③ 尚非事实。

旧官僚、士绅首鼠两端，阴谋保权、篡权的活动，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在广大群众中，有的“沿途演说”，倡言革命；有的聚集“保安公所”门前，“且有手持炸弹以示威者”。区笠翁、黄宏宪亲入保安公所，传达革命党人“勒要”沈林一即日交出财政，“尽行释放监犯”的要求。所有城厢内外，多为革命群众分区割据，“官军见之，莫敢过问”。沈林一、宋安枢、周之济等经过密议，宣布自11月10日以后，梧州“洋、常两关所有税项，悉归保安公所管理”。已经收管者，限三日内交清。与此同时，又分电广西都督沈秉堃、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及陆荣廷，请求各方面支持和帮助。

---

① 李家诜：《辛亥革命与梧州的宣布独立》。

②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③ 李家诜：《辛亥革命与梧州的宣布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都督府的态度。因为梧州保安公所掌握在林绎等少数保守分子手中，所以广东反对沈林一把财政权交给他们。而沈秉堃则希望梧州照桂林的模式宣布独立，由沈林一出任军政分府府长。陆荣廷这时也加紧以武力作后盾，操纵广西政局。先是，他以标统任福黎率兵三营从南宁东下，进驻梧州。继又派龙觐光率队与梧州防军“联为一气”。帝国主义分子操纵的海关也出面干预。梧州关税务司克乐司（A. W. Gross）公然声称：

> 我当清政府税差，道台系清政府命官，我只与之交接，不知其它。若有中央命令由总税务司分行到梧州，自然遵办，否则不能相强。至龙旗一事，亦须有总税务司命令，乃能遵行。若欲暴动，我唯地方官是问。我亦有对付之法。①

这种只听命于洋税务司，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蛮横行径，为梧州的官绅撑了腰杆。“而所谓革命党亦只得安于无可奈何”了。

然而，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继桂林、广州独立之后，与梧州紧邻的肇庆又传来被民军占领的消息。11月19日（九月二十九日），更有巫其祥率领的、号称“民国军”的200余人，从广东乘船艇5艘，驶至梧州，照会梧州当局交出财政、军械并释放监犯等项。② 虽然他们很快就被宋安枢的防军击败，但它所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沈林一为此赶紧与守旧官绅商讨成立梧州军政分府问题，并于11月23日（十月初三日）借用梧州绅、商、军、学各界的名义，将军政分府的关防交沈林一接收，由他主持军政分府。至此，梧州道台和保安公所形式上已不存在。梧州算是独立了！③

---

①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② 巫其祥本是肇庆“支那同志社”的成员。他率军入梧州本是刘古香、黄子庄、周兆梅等革命党人请来的，计划互相配合，一举夺取梧州。因为对守旧势力估计不足，致遭伏击，船毁人亡。

③ 以上所述，俱见《梧城风鹤记略》。

独立声中的隐忧

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分别是广西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的中心，这几个地方先后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以后，省属的、大部分长期处于犹豫状态中的府、厅、州、县，也就顺水推舟，依样画葫芦，宣布“奉命独立”了！① 至此，广西独立的局面基本奠定。但是，围绕独立问题的明争暗斗，在许多地方依旧存在。其主要表现有下列几种：

第一是顽固守旧分子对独立的反动。

所谓独立，当时的主要标志就是推翻清王朝，实行民主共和。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上是个惊天动地的变革。当时，就有一小撮顽固守旧分子拼死反对这种变革。在他们的心中，推翻王朝，不要皇上就是最大的大逆不道。前面说的桂林道台文某闻说革命不要皇上，回家后活活气死，就是典型例子。还有：桂林巡防营的旧军听说独立要剪掉辫子，也马上哄闹起来。说什么“剪了辫子就是不要皇上了”。因此，大骂革命党是土匪。在桂林宣布独立的第三天，他们公然发动兵变，开枪杀人抢劫。② 还肆意屠杀那些赞成独立、剪了辫子的群众。③ 南宁宣布独立之日，清左江道纪堪谨拖着辫子，戴着顶子去参加大会。散会时，雷鲲池从口袋里掏出剪刀，一手抓住他的辫子，一边说：“宣布独立了，纪道台，你还留辫子做什么？”话音刚落，他的辫子就被剪去了。大家都感到痛快，而他却因为失去作为清王朝奴才标志的辫子痛哭失声！④ 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农历新年，桂林秀峰书院山长、前清老翰林曹驯的儿子曹秬，还公然在自己的住宅门上贴着这样的对联：

五百年其间必有，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篇。

②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③ 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

④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

二三子何患乎无。①

明目张胆地呼唤帝制复辟，皇上再来。说明尽管皇帝被赶跑了，国体已称民主共和，但复辟帝制的社会基础仍然顽固地存在。

第二是真独立和假独立的斗争。

广西的辛亥独立，无论在桂林、南宁、梧州或其他许多府、州、县，一些旧官僚、士绅所以表示同意，甚或宣称愿意归附革命，拥护民主共和，绝大多数是出于形势所迫，"趋吉避凶"，并非出于真心实意。因此，在所谓宣布独立过程中，一开始就在新旧两派之间，甚至革命派内部，发生了真假独立之争。因此，从巡抚、布政使、提督、道台直至许多知府、知州、知县，其中不少人都是穿着清王朝的旧袍服，戴着红顶子，拖着长辫子登场的，教人一看就感到其中有假。在桂林，谘议局的同盟会会员甘德蕃、蒙经、黄宏宪等当时即指出他们是搞"假独立"，与新军下级军官及士兵主张武力解决。虽然被同盟会的负责人加以制止，但"他们始终认为广西独立是假的"。② 由于独立后的军政大权仍旧掌握在旧官僚手中，只是招牌换记，巡抚改为都督，布政使、提督改为副都督，道台改为分府长或总管而已。所以，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革命党人对此深感不满。例如：活动在梧州和浔州地区的罗佩珩，他在分析广西的形势以后就认为："广西的独立是靠不住的，政权仍旧掌握在陆荣廷反动派手中，主张革命必须彻底，仍应依照原定计划进行，攻取浔州。"③ 周毅军面对陆荣廷的迁省南宁，大权独揽，斥之为"伪独立"。于是，联络宾州一带绿林武装，"图为二次革命"。④ 广西宣布独立以后，新军出师援鄂。甘德蕃对广西今后的治理问题深感忧虑，曾声泪俱下地对人发议说："此次广西独立，实因新军威胁而成，并非一般官僚所愿。新

---

① 魏继昌：《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曹秬此联乃引"四书"中的"五百年其间必有名士者，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而来。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② 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

③ 潘乃德：《平南起义和会攻浔州》。但正如前述，罗佩珩后来仍不免被陆荣廷杀害。

④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六，《兵事志·前事七》。

军一去,这些官僚难免有复辟情事。"① 说明有的革命党人已经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限于自身的软弱,没有力量和办法把它解决罢了。

第三是旧官僚之间的争权斗争。

广西宣布独立时，沈秉堃虽以巡抚被推举为都督，但论实力，他比不上王芝祥，更不及陆荣廷。这个谙于世故的官僚深知自己实力不足，又不是广西人，在广西是无法长期干下去的。所以，在宣布独立之日，他即宣称自己是“暂摄都督篆，不久留”。两周以后，他即借口率师北伐，向谘议局辞去广西都督职，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领军入湘，而由王芝祥就近摄行都督事。王芝祥虽然野心勃勃，嗜杀成性，而且把持广西财粮大权，兼统巡防旧军，具有一定实力，但他不为广西党人所容。② 而陆荣廷籍隶广西，长期掌握广西军事大权，潜势力根深蒂固。广西宣布独立时，他以副都督兼领南宁军政分府。他素来仇恨革命党人，但在没有夺到全省军政大权之前，又故意做出一副对革命派宽容与谅解的样子。他妒忌新军，广西独立后，他即极力鼓动新军离桂援鄂。为了赶走沈秉堃和王芝祥，以便独揽广西军政大权，他暗中指使自己的亲信、部属，以及接近他的立宪派人士直至某些革命党人，提出“以桂人治桂”的口号。沈秉堃离桂时，原是王芝祥代行都督职务。陆荣廷的爪牙、前安边道陈凤昭与标统陈炳焜等却去电桂林，推举陆荣廷为都督，而且派军沿江东下，控制贵县、桂平、藤县、梧州以及桂东南的广大地区。11月28日（十月初八日），陆荣廷在南宁通电全省，宣称即日诣省接受都督职务。第二天，再次通电全省，一面声称：“迭接黎元洪自湖北来电，决议带二十五大队，星夜北征。”一面说：王芝祥“文武兼济，世界魁杰，以代都督实为允当。……万望王都督拨饷百万，以资接济”。巧妙地采用既赞扬、又要挟的手法，使王芝祥处于难堪的地位。③ 12月7日，陆荣廷离南宁东下，

① 耿毅：《广西出师援鄂经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② 张国淦编：《广西响应辛亥革命史料》，见《广西辛亥革命资料》，235～237页。

③ 参看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张国淦：《广西响应辛亥武昌起义》。

经浔州、梧州等地，沿途使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进行集权活动，然后从梧州率精兵数千径往桂林。王芝祥被迫率巡防营六大队离开广西。陆荣廷夺取了广西都督的职位。

综观武昌起义以后的广西独立运动,真可谓五花八门,十分复杂。一时间,革命党人、立宪分子、官僚军阀、乡团绅士、商界学界、新军旧军、会党绿林,无不应运而出,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登台表演,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只有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农劳工,没有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这场斗争。尽管如此,经历这一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真命天子”神圣不可触犯的神话破灭了,民主共和制度替代了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进一步在社会上传播,逐步植根于人们心中,而且在全国,也在广西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是辛亥革命最光辉、最伟大的成就!

四、1912年的“迁省之争”

“迁省”之议及其实质

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以后，接着提出了迁移省会问题，发生了“迁省之争”①。

把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往南宁，早就有过议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时，即以“广西省城僻在东北，控制不便”为由，奏请“移巡抚驻扎南宁，即南宁府治建为省会”②。但在北京的桂籍京官对此议迅速作出反应，认为“广西迁省，贻害全局”。工部左侍郎唐景崇更明确指出：

① 本节所述，除注明出处者外，请参看拙文：《1912年广西的“迁省之争”》，见《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六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岑春煊等奏。

"广西省会，弃桂林，就南宁，未可轻举。以（其）摇人心而贻后患也。"[1]不久，政务处即就两种意见考虑的结果和处理的办法作出答复说：

>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所奏移设广西省会，自系为慎重边防起见。而以全省大局计之，实有顾此失彼之虞。既据各臣工纷纷陈请阻止，应请毋庸置议。惟该省密迩越境，拟如唐景崇等所奏，将广西提督移驻南宁，原驻之右江道即改为关道；并如石长信等所奏，于南宁迁设督抚行署，以备该省疆臣随时巡阅，相机布置。[2]

这个意见，得到皇帝的认可。但石长信等人的具体建议，事后并没有认真实行。而当时的迁省议论，地域观念浓于政争色彩，这是显而易见的。

辛亥革命后的迁省之争则不同。它既出于地域利益的考虑，更具有浓厚的政争色彩，对广西的政局影响至大。要了解此次迁省争论的原因和实质，有必要先弄清楚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政治派别及其斗争形势。

辛亥革命以前，广西存在着同盟会和君主立宪派的对立，1909年成立的谘议局，和辛亥革命后由谘议局转变而来的省议会，成了两派斗争的重要舞台。以蒙经、卢汝翼等为代表的同盟会议员，在地域上代表浔、梧、郁、邕一带州县。而秦步衢、萧晋荣、曹秬等原本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有的成了共和党或民主党员，在地域上代表桂、平、柳、庆各州县。同盟会会员多数主张把省会迁往南宁，以摆脱秦步衢、曹秬等旧势力的影响。这同长期盘踞南宁，视桂西南广大地区为其势力范围的陆荣廷的主观愿望，真可谓不谋而合。[3] 因此，在迁省的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五六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九、初十日唐景崇等奏。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六二，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政务处王大臣等奏。

③ 据梁廷栋在《梧城风鹤记略》中说，1911年12月24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五日），陆荣廷从南宁到梧州时，他和周之济同往谒见，"并递有条陈节略十余事，内有关于迁省事者。都督阅及，指谓曰：'此不迁之迁也，愚意亦决如此。惟进省之行人多阻之。'因转问二绅以为何如？周绅以迁省之计已决，即不能不进省以收财政而集兵权为对。都督亦颇然之。是省不能不迁，早定于一见时矣"。说明陆荣廷早有迁省会于南宁之想。此次去桂林，目的在抓军、财大权耳。

争论中彼此互相支持,构成了“迁省之争”的一方。

秦步衢、萧晋荣、曹秬等旧派代表人物，在以桂林为中心的桂东北地区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秦步衢从谘议局到省议会，都是副议长，还长期担任省巡警道兼巡防营统领，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个实权人物。萧晋荣和曹秬则是有名的顽固守旧分子。辛亥革命，废除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对他们是个致命的打击。省会迁邕，又使他们失去利用自己在桂东北的政治、军事优势，干预全省政务的机会。他们既仇视革命，也就坚决反对迁省。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实际表现，与袁世凯处心积虑扼杀革命势力，而又惟恐陆荣廷坐大南方不谋而合。因此，他们在广西政争中总是互相支持，构成了反对迁省的一方。

当然，也有些人由于“地方主义”或个人利害的关系，以致在“迁省之争”中的表现与自己所属的政派立场不尽一致。但这是少数，而且他们所起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上述的情况说明：辛亥革命后的广西“迁省之争”，原因非常复杂，根源也至为深远。表面上是省会该迁何处之争，或如时人所说，是桂南派与桂北派之争。实际上则是当时的同盟会与立宪派，陆荣廷势力和袁世凯势力为争夺广西控制权的斗争，是当时国内政治斗争在广西的反映。

“迁省之争”与桂系专权

触发“迁省之争”，并使争论炽热化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一是1912年2月，广西省议会在桂林召开，揭幕之日，秦步衢竟带兵勇进入会场。因为讨论办团的事，他与阳朔县议员徐新伟意见相左，竟在议场动手打人，并将徐新伟“牵到团防局”。这种恃势随意侵犯议员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对新生民主政治的致命打击，理所当然地激起议员的愤慨，主张迁省的议员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第二天，议会开会时，多数议员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议员的尊严受侵害，人身安全无保障，集体通电辞职。

二是与此同时，陆荣廷以都督名义任命何宗羲为省警视厅厅长。这实际

是对长期独揽广西警权的秦步衢采取的夺权措施。为了抗拒陆荣廷的夺权任命，秦步衢一面运动桂林商界，向军政府"具禀"提出挽留他的要求；一面怂恿手下的巡警官兵要挟军政府收回何宗羲的任命。秦步衢有恃无恐地侵犯议员的人身自由，违抗军政府的人事任命，使迁省呼声更加高涨。议员们在陆荣廷的暗中支持下，纷纷离开桂林，转往南宁。桂林籍的议员魏继昌、何锡龄等虽然出面挽留，亦无结果。据北京参议院透露，当时转至南宁的议员多达70余人，留桂林的议员只剩8人。[①] 4月10日，到南宁的议员自行集会，并根据《广西第一号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在南宁成立"广西省临时议会"。会后通电中央、各省及省内各府县机关，宣告"广西省临时议会"成立。从此，广西出现了桂林与南宁两个"议会"并存的局面，随即展开"函电交驰"的"迁省之争"。

迁省利弊是论争初期的中心问题。桂林的议员认为："迁省需费浩大，而省库空虚，难以实现。且迁省势必造成桂林商业萧条，以致商借行款无法收回，公私皆蒙损失。"南宁议员则说，广西税源以左右两江为最富，迁省南宁，商业发展，收入必增。而借款有担保，公款不致有亏；商贩可以随省迁移，何来商业萧条、商店倒闭？

迁省利弊之争既难作出结论，争论的焦点随即转到迁省是否合法上。桂林议员认为：是否迁省，必须经过议会讨论，报经都督同意，中央认可方为合法。而南宁的议员则以议员多数赞成迁省，势在必行，无可更改。

陆荣廷身为都督，对这场争论最初是装聋作哑，不置可否。到了两派争论激化之后，他却以"巡边"与"度假"为名，远去龙州。倒是袁世凯政府对广西迁省极表关注。4月13日，他电责南宁"临时议会"不合中央有关通令，显"为少数人自由集会"，应予查究。而且不顾南宁方面的复电申辩，于26日责令广西军政府速令南宁议员回桂林复会，否则即将南宁"临时议会"

① 《（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六号，附录，第一册，495～498页。

解散。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命令，陆荣廷表示赞同。但南宁议员却公开以他的名义与袁世凯政府对抗，认为陆荣廷之所以赞同，是迫于袁世凯的压力，作出违心的表示，直斥袁世凯政府“摧残议会，破坏共和”。而且发动省内各地方议会、机关、团体等59个单位，同时以“十四府人民”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迁省会于南宁，宣称：“十四府钱粮，省邕则解，省桂则不解。”如果迁省不决，造成都督引退，兵士失驭，招来内乱外患，则咎在中央。最堪注意的是，陆荣廷行营所在的龙州，先以议会、商会、县长名义，通电全国，力主议会迁南宁。继于一日之间，连发两电，直斥袁世凯国务院之电令为“扰乱视听”，再次表示如迁省迟疑不决，“即以不纳租税为后盾”。陆荣廷对迁省的真实态度如何，不难从龙州的态度中找到答案。

北京参议院和副总统黎元洪的态度则不同。在5月31日参议院第十四次会议上，议长吴景濂和众多议员认为：南宁交通比桂林方便，而且接近越南，法人增兵边境，不能置之不问。而沿边“土匪甚多”，对内对外调度策应，南宁都比桂林方便。即就事实而论，各府所选议员在南宁者已有84人之多，故省会应暂定南宁为宜。但为了免于“决裂”，可照“广西都督与政府商量调和办法，以各司仍在桂林，都督、议会各局移在南宁”的办法解决。同时列举“从前直隶省会本在保定而总督则在天津；江苏总督在南京而巡抚则在苏州”的先例作为根据，说明如此解决问题是正确的。①

桂林方面获悉参议院的决议意见以后，一时函电纷驰，极力反对，请求参议院提出复议。袁世凯的总统府对此亦表示关注，要求参议院对此提出报告。6月初旬，参议院在第十七次会议中，审查向大总统提出的有关报告，仍旧坚持原议。② 9月初旬，桂林代表以景福等亲至参议院请愿，并从南宁“临时议会”提出的有关人数比较、交通便利、国防需要与政治统一四方面逐

① 《（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四十号，《附录》。

② 《（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第四十六号，《附录》。

一进行反驳和申辩，再次要求参议院对原有议案进行复议。[1] 而参议院的基本态度始终不变。黎元洪自接获南宁"临时议会"的申诉电后，也表示允许"迁省案"立即考虑解决。

这些来自北京的讯息，既给力主迁省的南宁议员以极大支持，又使陆荣廷迅速从"迁省之争"的幕后走向前台。6月初，他从龙州发出"拟南宁为行省，六司暂驻桂林办法"的通告，说明这是"处左右为难之境，于万不得已之时，询多数人之请"而拟订出来的"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接着，于24日从龙州行营致电桂林议员，说"省议会在邕成立，已经公布"，决定"七月五号至八月五号止为集会之期"，要他们按期至南宁开会。这是陆荣廷的个人决定，事前并没有和南宁"临时议会"的议员商量，难免使他们感到难堪。于是，议员们在26日给陆荣廷发了一通洋洋千言的电报，大谈民国民主政治诸问题。目的是给陆荣廷一点民主政治的训练，并以此表示"临时议会"的独立地位。但对这些"官样文章"，独断专行成性的陆荣廷非但不屑一顾，而且于7月12日别有用心地转发了袁世凯国务院以前的来电，重申"如有妄肆蜚言，混淆视听者，应由该都督办理"的决定。面对陆荣廷的软硬兼施，又摸又打，民主法理论者再也不敢多说了！7月25日，省议会根据陆荣廷的决定在南宁召开。议员张鸿治等提议政府六司由桂迁邕，以确定省会设于南宁。10月15日，议决由南宁府议会、南宁城议会并商业界合力负责，筹款10万元，作为迁省经费。17日，最后表决迁省案。到会代表83人，赞成迁省者70人，获多数通过。至此，延续了八个月的"迁省之争"宣告结束。陆荣廷随即公布六司迁邕文告，其具体办法如下：

1. 民政司主管内务、行政大部事务，宜从速迁近都督府，以便策划进行。应定一月内迁邕。

2. 司法直隶中央，其区划与行政机关不同，驻邕驻桂，应听中央命令。

---

① 《（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九月十七日第一百五十四号，《附录》。

3. 教育司因桂林直接管理之学校颇多，应从缓迁邕。

4. 财政司因筹划维持桂林公款，颇需时日，应定一年内迁邕。

5. 军政司暂驻桂林，维持现状。

所谓六司迁邕，除交涉司不提外，其余五司，只有民政司定在一月内迁移，其余四司并没有如议办理。人们不会忘记，独裁者不谈法治，害怕法律约束，重视枪杆，轻视笔杆。所以，司法、教育两司，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迁比迁更好。而1911年12月，陆荣廷从南宁到梧州时，与梁廷栋、周之济等士绅关于抓财权、军权的谈话，可知财政司与军政司留驻桂林，目的就是为了抓钱和巩固他在桂东北的权力和地位。所以，议会的决议尽管决议了，而陆荣廷我行我素，民国的什么民主法制，对他都失去了约束的力量！

1912年，在全国有“迁都之争”，在广西出现了“迁省之争”。前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了钳制窃国大盗袁世凯，主张把国都从北京迁往南京，结果由于袁世凯的反对而失败了！后者却是陆荣廷利用广西革命民主派的势力，反对袁世凯支持的广西守旧势力。在这一场斗争中，革命民主派对旧势力的斗争是坚决的，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他们虽然声称尊重民意，且以广西人民的代表自任，而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真正信赖人民群众，争取和依靠人民的支持，却是向陆荣廷为代表的另一派旧势力寻找帮助。结果只能为陆荣廷作嫁，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桂系军阀在广西长达十年的黑暗统治。无怪有人在评论广西的辛亥革命史时，颇为感慨地写道：

> 党人利用武人推倒满清，自谓成功。其实武人利用党人以济其私耳。而党人不悟，厥后尤袭用此策，用武人以推倒武人。讵知一军阀去，一军阀来，结果终以武人占其利。自国变十余年来，纷纷扰扰，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中者，党人为之也。呜呼武人！呜呼党人！①

---

①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六，《兵事志·前事七》。

这是对广西辛亥革命的总结。把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军阀专横、民生痛苦尽归咎于革命党人，虽不尽妥当，但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实际却正如所言，它所指出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第十六章　陆荣廷桂系的集权和扩张

陆荣廷利用辛亥广西独立的复杂形势，当上了民国的广西都督，又通过“迁省”、扩军和增税，以及对外勾结以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势力，对内镇压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势力等手段，确立了他在广西的统治地位，结成了以他为首脑的桂系政治、军事集团。在1915年“护国运动”和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桂系势力扩及广东和湖南，显示了他独据西南一方，左右全国政局的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的觉醒，时代的进步，陆荣廷和他所代表的桂系集团，如同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个人和集团那样，终归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一、陆荣廷和桂系

桂系首领陆荣廷

要讲桂系集团的形成，有必要回过头来简单介绍一下陆荣廷的历史。

陆荣廷（1855～1928），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县）人。1855年（咸丰五年）



广西宣布独立后取代沈秉堃出任都督的桂系首领陆荣廷

生于贫苦的壮人农家。[①]小名亚宋，发迹以后，改名荣廷，取号干卿。他幼失父母，因生活无着被迫远走边关，投入清军。中法战争时，加入三点会。1886年(光绪十二年)战争结束，因清廷下令裁军而失业，遂与韦荣昌等携械结帮为绿林。1894年(光绪二十年)接受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招抚，委充健字前营管带，以韦荣昌为哨长，在桂西南及郁林等地驻防，参与镇压会党起义。[②]1903年，苏元春因镇压会党不力被革职。第二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举荐下，陆荣廷以他原有的健字营为基干，与苏元春部将马盛治统率的熙字营、镇南营合编为荣字营十营，由陆荣廷为统领，以原在熙字营的陈炳焜主持营务处，职同帮统，并各兼带一营；谭浩明、林俊廷、韦荣昌、黄培桂、黄榜标、蒙仁潜等分别担任各营督带、管带或哨官。从此，陆荣廷在干部和基本队伍方面，为日后自成一系初步奠定了基础。1906年，广西为了编练新军，又在岑春煊的举荐下，陆荣廷以考察军事教育为名，曾东渡日本，历时半年。1907年12月，陆荣廷因破坏镇南关起义，得清廷由参将赏以总兵记名。1908年1月1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黄忠浩"因病解职"，陆荣廷即以记名总兵继黄忠浩为右江镇总兵官。[③]

---

① 关于陆荣廷的生年，有咸丰五年、六年、八年和九年诸说。此处据章炳麟：《陆荣廷将军墓表》。依惯例，"墓表"资料由死者家属提供，故可信。

② 关于陆荣廷的早期生活，《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刊有《陆荣廷早期生活》(1858～1894)一文，是作者60年代访问11位知情者提供的资料写成的，可以参考。

③ 关于陆荣廷升任清军统领及总兵时间，众说纷纭。冯浦澄在《我所知道的陈炳焜》一文中说：陆于1902年即升统领，第二年由岑春煊保升左江镇总兵。林宝航在《广西的游勇》一文中说：陆在剿平乐里一带游勇以后，即升统领，1904年镇压陆亚发柳州兵变后，由岑春煊奏授左江镇总兵。皆误。此处据《清德宗实录》卷五八四。

1909年4月，调任左江镇总兵官。[1] 1911年6月29日(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升任广西提督。从龙州移驻南宁，全省旧军三十二营悉归节制。[2] 不久，辛亥革命即在武昌爆发了。在革命大潮的席卷下，陆荣廷摇身一变，从清王朝的提督军门，登上了总揽广西全局的民国都督。

陆荣廷和广西都督府

陆荣廷继沈秉堃为广西都督以后，尚未正式就职，即于1911年11月28日(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在南宁通电全省，先是说："全省政、学、绅、商、农各界不以荣廷为不肖，俱举继任。荣廷一介武夫，智虑短浅，何足肩此重任？惟迫于大义，不敢固辞。"继即笔锋一转，指斥起义以后"各属抢劫、截饷、攻城、踞卡之案"，皆为"暴动之举"。进而声言：

> ……以荣廷为都督，即为我父兄子弟之公认，则荣廷之命令即我父兄子弟意见之所寄。倘人人各持一(己)意见以抗拒，并不先告荣廷，则彼此纷争，大乱立见矣！如有抗拒扰乱，不守秩序，以致牵动大局者，当此军事行政时代，荣廷唯执军法以从事，不敢曲为宽宥。

这份目的在于集权的通电，还附有"应行照办者十四条"，"应行禁止者六条"。三日后，又加了"应行改革者八条"。所谓应行"照办"和"改革"的二十余条，主要有：继续派军北伐；一律剪去发辫；采用黄帝纪年；各属押犯除刑事外一律开释；出门不乘舆；禁止差役需索；从前法章除于党人各命令一律作废外，余均继续有效；学堂照常上课；不得拥兵自卫；商民照章纳税；各属须办公事捐款一律照办等等。这些条规，如果真正从发展革命事业需要出发，自然无可厚非。而它们出自陆荣廷之手，无疑也是为他在广西搞独裁统治服务的。如谓不然，请看他在同一通电中提出的"应行禁止者六条"，就可明白了，那就是：

1．不服从军令者杀无赦；

---

①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十，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五日谕。

②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五五。

2. 有侵吞钱粮税项私自逃走者杀无赦；

3. 造谣生事酿成乱端者杀无赦；

4. 扰害商民生命财产者杀无赦；

5. 聚闹教堂及无故欺侮外国人者杀无赦；

6. 聚众赌博、持械拒捕者杀无赦。①

这六条“杀无赦”，如果光从字面上看，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条文的解释权在他而不属于革命人民。因此，各种条文也就成了他颠倒黑白，滥杀无辜，破坏革命，建立独裁的工具。以后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陆荣廷打着“桂人治桂”的口号，赶走了沈秉堃和王芝祥；又抬出“众人公举”为据，要求众人必须“听命”于他。为此，他首先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说成“老革命”，为实行集权独裁制造舆论。1911年12月他从南宁东下时，途次贵县，给梧州的官绅以及同盟会的代表刘蝙、周毅夫、罗佩珩等去电，内称：

> 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首倡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使同盟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革命数十年矣！其隐忍蜷伏于满政府之下者，恃有兵权以待今日耳。②

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同盟会会员的革命资格，往旧官绅和他自己的脸上贴金。他数十年蜷伏于清王朝的膝下为奴为仆，为的是掌握兵权造反。这一套“曲线革命论”，抹杀了革命者的功绩，撑了旧官绅的腰杆，也蒙骗了不少不明事理的人。

1911年12月，他从南宁到梧州，一反从前不许设立军政分府的决定，委派他的心腹人物黄榜标为梧州军政分府总长，兼理海关监督事，集广西重要通商口岸梧州军、政、财权于一身。同时，在梧州派人专程前往香港，约请李立廷回省，目的是借助他在广西会党中的威望，安定西江沿岸大小帮股势

---

① 以上所引，俱见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② 引自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力。[1] 1912年2月8日，陆荣廷在桂林正式就任广西都督职，并把军政府改为都督府，下设四司二局，其组织人员是：

都　督	陆荣廷
军政司司长	陈炳焜
民政司司长	陈树勋
财政司司长	严　端
司法司司长	张仁普
教育司司长	唐钟元
法制局局长	卢汝翼
铨叙局局长	苏寿松[2]

---

① 《广西近百年史资料》（油印本）上编。又：李衡宙、李家诜：《苍梧县志·经政编》（五）记载，1913年2月，李立廷回到广西，出任广西水师第二军统领，驻防藤县濛江圩，管辖贵县至梧州沿河一带。但1912年12月，北洋政府内务、海军两部已将广西原有的抚标中军四营、左军三营、右军四营、后军四营改为水上警察，划归内务部统辖。（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三二号《公电》）据此，有的记载说李立廷当时负责统率的只是梧州水上警察，并志于此。

② 典按：民国初年，广西省政权机构的设置，常有变动。据1912年5月30日，袁世凯国务院咨广西都督称："桂省政务，军政、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涉六司，除交涉司暂不设置，其事务归秘书厅办理外，其余各司并送备案。"同年7月12日，袁世凯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陆荣廷为广西都督。11月30日，任命陈炳焜为广西军政司司长，12月1日，任命陈树勋、严端、张仁普、唐钟元分别担任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司司长。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三〇号《公文》，第七四、二一四、二一五号《命令》。陈树勋在《广西讨袁记略》中缺记司法司，说是四司两局，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冯浦澄在《我所知道的陈炳焜》一文中，亦缺记司法司，但说有实业司，共为五司两局。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按：1913年4月增设实业司，以李春晖为司长，但1914年4月17日，民政长张鸣岐即以财政困难，非实行减政不足以维持现状为由，呈请北洋政府批准将教育、实业两司裁撤，另设教育、实业科，教育事务归内务司，实业事务归财政司办理。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三二九号《命令》、第七〇〇号《公文》。

一周以后，他即以统一广西军政为由，通令全省，将南宁军政副府和柳州、梧州、龙州军政分府裁撤，各分府总长一律改为统领，专管军事。谭浩明统领驻南宁，刘古香统领驻柳州，黄榜标“调邕练兵”，由莫荣新接任。同时委李开诜为龙州关监督，兼办对外交涉。方培恺为南宁关监督。另以陈炳焜从南宁率军进驻桂林。①

在政治上，陆荣廷网罗了一批科举出身的旧士绅在他的周围，构成所谓“智囊”班子，为之出谋划策。要者有：陈树勋、崔肇林（以上二人为前清翰林）、唐钟元、韦锦恩（二人为进士）、李开诜（举人）、苏绍章（拔贡）、林绍斐、李书城、陈继祖（三人为秀才）等。陆荣廷所属官员、士兵，除了游勇故旧，防营袍泽之外，就是同乡和亲属，而又以陆荣廷的武鸣，谭浩明的龙州，陈炳焜的马平和莫荣新的桂平老乡为多。有人做过统计，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广西全省70多个县，武鸣籍的县太爷占了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有“非龙即马，不平则鸣”之说。

1913年6月，袁世凯因感各省都督兼民政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武人专横难以驾驭。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强化自己的统治，他提出了军民分治的主张。于是，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各省都督府，改设督军及民政长，分理军、民事务。广西的都督府虽然撤销，但袁世凯投鼠忌器，仍任命陆荣廷为督军兼民政长。他趁机改编全省军队，将全部新军及巡防营改编为两师、一旅与巡防八军，其编制、人事及驻防情形如下：

陈炳焜为第一师师长，驻桂林；

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驻龙州、南宁；

黄榜标为混成旅旅长，驻梧州；

韦荣昌为第一军统领，驻上思、太平；

林俊廷为第二军统领，驻南丹（原驻龙州）；

---

①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阙晋安：《辛亥革命在柳州》；冯浦澄：《我所知道的陈炳焜》。

龙觐光为第三军统领，驻百色（原驻贵县）；

宋安枢为第四军统领，驻郁林；

刘古香为第五军统领，驻柳州；

陈朝政为第六军统领，驻庆远；

秦步衢为省防军统领，驻桂林；

黄培桂为边防军统领，驻平乐。①

以上诸人，除秦步衢自有门户外，刘古香当时在已经倒向陆荣廷的王狮灵监视之下，政治态度远不如以前。其他全是陆荣廷的“袍泽故旧”，同属一个派系。通过这次调整，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排斥异己，自成派系

陆荣廷虽然政权、军权在握，但革命派的力量仍在，民主共和观念正在形成潮流，日趋高涨。为了牢固地建立一派专权的格局，他在积极纠合派系势力，实行集权的同时，又通过鼓吹所谓“革命之目的已达，革命之名义已消”之说，② 对异己势力大张挞伐，而其重点则是消灭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他的手法是：能收买者则示以恩惠，给以官禄而笼络之，如贵县的罗佩珩，柳州的王狮灵。但因此而能得陆荣廷信任，获取善果者则不多。③ 有的革命党人，一时认不清陆荣廷的真面目，对他抱有幻想。陆荣廷也虚与委蛇，使

① 这种军事编制与部署，到1914年7月以后又有变化，实行镇守使制，分别任命陈炳焜、谭浩明、林绍斐（都督府参谋长）为桂林、龙州、浔州镇守使，继之出任镇守使的还有莫荣新、林俊廷、韦荣昌、黄培桂等人。人事尽管时有变动，但都是陆荣廷桂系的党羽（参看《（北洋）政府公报》第九八七号《呈》，以及1915年7月和1916年8、10、11月的有关《公报》）。又参1913年1月22日的上海《民立报》。

② 《广西公报》第一期《要电》，1912年2月25日。

③ 如罗佩珩，辛亥革命时听信陆荣廷解散义军的所谓“调处办法”，并接受怀集县的任命，到任不久，因有士绅二人以枪济匪行劫，佩珩不待请示而杀之。陆荣廷诬他“擅权杀人”，将他诱至南宁杀害。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革命烈士小传·罗佩珩烈士》。

之为己所用。如武昌起义以后，不少革命党人认为：散处广西各地的民军，多是十几年前反清的会党、游勇余部，他们既有反清的历史传统和战斗经验，又能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而且不少队伍曾经直接或间接与革命党人有过联系。因此，主张联络他们，以便"厚集兵力，从速北伐"。[①]陆荣廷不但同意这些建议，而且还在军政府内成立交通部，以同盟会的刘崛、柯汉资、雷在汉等分别负责梧州、柳州和南宁的民军征集所，电令各府县对联络、征集工作给予保护，提供工作方便。但规定：凡收编的队伍，"其有快枪且精壮可用者，招集编成以待；否则令其回籍，各安其业"[②]。这是借联络收编之名，一以迷惑党人；二以消除"致乱"因素；三则乘机扩充他的派系实力，真可谓一箭三雕。

对于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党人，或拒不接受收编的民军队伍，陆荣廷则大打出手，实行武力消灭。黄榜标在梧州半年，即以"办匪"为名，杀害民军400人。当他"调邕练兵"之时，还在人和与榕谭等地屠杀民军近200名。博得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喝彩，说是"大快人心之事"。莫荣新继任梧州府长以后，更对民军"大加搜缉……无日不有枪毙，甚有多至四、五十名者"。[③]

藤县的事例最为典型，也最令人感到怵目惊心。黄榜标接掌梧州分府以后，委韦文林执掌藤县政事。韦文林甫到任所，即以"搜捕匪党"为名，会同防营管带黄玉珍，到处焚村毁舍，大动干戈。不数月，竟杀害所谓"匪徒"2000余人。其中"剿办四培、河内各村会匪，诛数千人。河水为之腥秽，数日不能食用"。旋又围攻古齐塘村，"全村住宅尽被焚毁，计损失谷子数十万斤，桂皮数万斤，桂油数千斤，而邻村之民居波连遭毁者亦逾百数……各乡暴徒次第就戮，先后伏诛者以千计"。"梧州征集所中人以韦、黄杀戮过当，几度函电劝止，均置之度外。及白其事于梧州军政分府黄榜标，请调整藤县

---

①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

② 陆荣廷：《辛亥十月十二日通电》。见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③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

事，免碍征集之进行。”黄榜标“伪纳所请……而又密电韦、黄，嘱严阵以待”。当征集所所长黄子庄率革命党同志王畅云、黄次山等70余人乘船赴藤县处理此事时，“方抵县泊岸，而韦、黄等伏兵突然出击，船中死伤枕藉，独子庄、莲甫见状，知中计，急驰轮直下广州，得庆生还”。[①] 陆荣廷一伙这种坑骗、打杀革命者的事件，绝不止藤县一桩。

陆荣廷及其部众多出身草莽，他们在清朝的旧军中结成封建的帮派武装，在辛亥革命时依靠守旧的乡团势力，利用革命民主派的软弱，大肆排除异己，篡夺辛亥革命后的广西政权，终于形成独据一方的封建政治、军事集团，即通称的桂系。

二、桂系的反革命专制

愚弄民主选举

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的。当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夺取广西军政大权时，广西的民主革命派通过议院，由蒙经出面，召集了一批法政界人士，参照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宋教仁的《鄂州临时约法》，草拟了《广西临时约法》，并于1912年2月25日用广西军政府“第一号法令”予以公布。这是广西有史以来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基本法。它共分7章58条，规定了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人身、居住、言论、著作、通讯、信仰、集会、结社、财产保有等权利和应尽的各种义务。都督由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三年。议会掌立法、监督，政务司掌行政，

① 何亮辅：《藤县志稿》卷六，第十一章《人物》。又：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说：黄子庄等以韦文林滥杀事“控于都督。都督不但不直，反悬赏缉拿，遂同避于香港”。

法院独立执法，等等。虽然没有体现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却体现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的原则。

广西独立后颁布的《广西临时约法》

但是，陆荣廷既然一心要在广西建立派系的独裁统治，就必然把民主视为最大的障碍，任何不利于专制独裁的立法，他都可以置之不理，甚至把它变为废纸。辛亥革命前夕在桂林、梧州等地设置的司法和检察机构，这时有的被裁撤，有的则形存而实亡了！1912年，全国筹办辛亥革命后的国会选举。在筹办选举过程中，袁世凯于9月22日任命各省都督（民政长）为该省的选举总监督。① 身为广西选举总监督的陆荣廷，对于民主选举既不熟悉，更少热情。按照选举法规定，议员应达到法定选举票额始能当选，而陆荣廷则以广西交通不便，民智未开，手续繁琐等等为辞，于11月1日去电北京，请予变通选举办法，准以得票较多者即为当选。结果受到筹备国会事务局的复电拒绝。②

在筹办广西的选举过程中，由于陆荣廷马虎从事，以致舞弊丛生，怪事百出。对于全省的选民人数，不经仔细调查核实，也没有按照应将众议院选举人与省议会选举人划分呈报的规定，即笼统以全省“选举人总数共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上报。结果又被筹备国会事务局驳回，责令“迅速查明电复”。③

如此对待民国建立以后的民主选举，实际是对民主的愚弄，自然激起人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四六号《公电》。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八九号《公电》。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〇〇号《公电》。

们的不满。11月13日，庆远各府的代表韦光廷等首先以广西“选举调查极端舞弊”，并列举来宾、昭平、柳州、贵县、浔州、桂林、全县各初选区“有人口不满十万，选民竟浮报到五六万者；人口不满二十万竟浮报至十四五万者”的种种事实，电请筹备国会事务局责成陆荣廷认真查明，依法办理。① 接着，南宁选民代表何永福等也作了类似的检举，而且指出：“广东人口三千余万，选民不足二百万；本省人口不足千万，选民已达二百二十余万。”浔州、桂林、贵县、昭平、全县各属选区的选民，皆占人口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之多。如此浮冒，“显系有心舞弊，儿戏选政”。若听之任之，必“惹起国人不道德之思想及外国不信用之观念，民国前途，万分危险”！② 兴安县自由党支部也检举选举经办人“妄造举民”，县长“知情故纵”，以“致兴安十三万人，浮报选民六万”的违法事情。③ 如此等等，举不胜举。作为选民代表的韦光廷、何永福等未免太天真了。在醉心于独裁专制的袁世凯、陆荣廷等人的心目中，哪里有民主政治的观念？哪里还谈什么道德思想？又哪来的民族荣辱和国家前途的考虑？日后的事实证明，即使通过在他们操纵的选举中选出来的议员，如果“非我族类”，他们也是可以随时予以撤销的。无怪乎有人评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虽然由君主变而为民主，但所谓“民主国也，乃无论何事，一惟军阀作主。是又曰民主时代再变而为军主时代矣”。④ 可谓一语击中了时代的实质。

为袁世凯独裁帮凶

为了在全国选举中获胜，使同盟会在选举后成为多数党而组织责任内阁，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1912年8月，在宋教仁、黄兴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广西都督陆荣廷，山西都督阎锡山，湖南都督谭延闿等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〇二号《公电》。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一四号《公电》。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四一号《公电》。
④ 黄诚沅：《迩言·军主与财主》，见《蜗寄庐文撮》。

有名的军阀和立宪派头目，都被拉入了国民党。同年1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果然获得了压倒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民主党的多数议席。广西的参议员选举，马君武、黄宏宪、曾彦、卢汝翼、郭春森等十人当选，也是国民党占了优势。①

由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十分高兴。他出游长江各省，一面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一面声称要以国会的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而以未来的内阁总理自居。但袁世凯绝不容许分权。因此，正当宋教仁在中国实行“政党统治”的美梦方酣之际，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把他刺杀了！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宋案”。

宋教仁被杀害，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提出“非去袁不可”。而且认为：国会只是口舌之争，法律不能解决问题。他从日本赶回国内，号召国民党人与全国人民坚决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杀害宋教仁的罪行被揭露以后，也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用以强化反革命武装。6月，袁世凯借口属于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曾经通电反对举借外债，违抗中央，下令把他们免职。同时调兵南下，直入江西。国民党人被迫起兵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先在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15日，黄兴在南京策划江苏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独立。上海、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起而响应。但由于各省不能统一行动，江西、南京很快就被袁世凯军队攻陷，各省随即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再次逃亡日本。以反袁为主要内容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控制了江南广大地区。

“二次革命”时，两广的形势十分复杂。广东的胡汉民、陈炯明拥护革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三〇九、三一一号《公报》。国民党是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而成的，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吴景濂等八人为理事。党务实际由宋教仁主持。

命，但拥兵驻扎梧州的龙济光却早已投靠袁世凯，成了北洋军阀监视两广的帮凶。广东要出兵讨袁，非得陆荣廷响应革命，以牵制龙济光不可。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胡汉民等邀集驻留广州的广西籍同盟会会员，共商策动陆荣廷响应革命的方式和方法，最后决定派遣时任广东都督府参议的潘乃德专程赶回南宁，向陆荣廷转达孙中山对他的器重之意；说明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非法大借外债，实欲变更国体，阴谋帝制自为，劝说陆荣廷赞同革命。可是，陆荣廷不但拒绝接受劝告，反把“二次革命”说是“多此一举”。一面自言：“我能维持广西治安，使广西得假以时日从事建设就好了。”一面又气势汹汹地向潘乃德提出警告：“闻得刘古香等在柳州将有所举动，你与刘认识，请你告诉他不可妄动，否则我是不客气的。”①

所谓假以时日，建设广西，不过是陆荣廷反对革命讨袁的冠冕堂皇之词。孙中山、胡汉民和潘乃德并不知道，陆荣廷早以龙济光为传媒，搭上了袁世凯的反革命黑线，与袁世凯集权独裁的言行唱和、配合，并接受和执行袁世凯北洋政府关于撤销马君武、曾彦等当选议员的资格，收缴当选者的证书和证章。他一再发通电，拥护袁世凯举借外债，扩军备战；指责反对借债是不顾国家大局的破坏行为。赣、宁义军誓师以后，陆荣廷又于7月14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咒骂革命党为“乱党”，要求袁世凯“电饬各省严缉册开人员，尽法惩治”；同时要求“友邦”配合缉拿在逃人员 。② 为了共同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还以提供金钱和武器等手段，收买地方军阀为他效劳。事实证明，陆荣廷就是被他收买的一个。③ 利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机，消灭卧榻之旁的刘古香等革命者，正是他朝夕祈望的事。陆荣廷已经决心投向袁世凯，

---

① 潘乃德：《二次革命时与陆荣廷一席谈》，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三八〇、三八五、四四四号《公电》。

③ 据1915年8月21日袁世凯在通缉岑春煊的命令中透露：当年6月，在上海“养病”的岑春煊曾经致电陆荣廷和龙济光，要他们“协同湘、粤、赣各省反抗中央”，遭到陆荣廷、龙济光的“严词拒绝”。说明陆荣廷这时已经完全倒向袁世凯，与革命为敌，连十年前曾经在关键时刻提拔过他的老上司也不屑一顾了。见《（北洋）政府公报》第四六六号《命令》。

充当反革命的帮凶了。

镇压广西“二次革命”

孙中山发出“讨袁”的号召时，散处广西各地的革命党人皆跃跃欲试。他们希望通过讨袁而制陆，反对桂系军阀与立宪派势力联合，排斥和压制革命势力。1913年8月初，陈炯明致电刘古香，相约起义讨袁，并运来大批军用票及有关起义文件。刘古香当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响应办法。但因意见分歧，王狮灵又暗中向桂林的陈炳焜通报消息，所以没有结果。9月，江西讨袁军失败，整个反袁斗争形势逆转，广西的革命党人更不敢轻举妄动。谁知9月11日，刘古香的族弟、卫队长刘士雄（绰号刘麻六）发动兵变，刘古香在变乱中仓猝离开统领衙门，后为帮统刘震寰寻获，迎归驻地。

形势逼人。9月12日，刘震寰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召开地方各界人士会议，宣布袁世凯破坏民主革命，背叛祖国，决定在柳州实行独立，起兵讨袁。刘震寰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随即命令所部，向南宁进军。而陆荣廷这时公开悬赏3万元捉拿刘古香。刘军管带沈鸿英暗中煽动倒戈，并用两面派手法骗取刘古香的信任，请他移居在自己的军营中。15日，沈鸿英即在柳州叛变。刘震寰接获报告，拟回师讨伐叛逆。但一夜之间，手中仅有的600人又逃散一半。刘震寰力弱势孤，被迫化装出走。沈鸿英占踞柳州城，立即去电陆荣廷，以肃清柳州“叛乱”，生俘刘古香，听候“来示”，以便处理见报。10月9日，陆荣廷从南宁赶至柳州，按袁世凯“就地处决”的“电示”，将刘古香杀害。行刑之前，陆荣廷问刘古香：



“二次革命”时因起兵讨袁被陆荣廷杀害的革命党人刘古香

>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刘古香慨然答道：

沈鸿英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今天可以杀我，日后也可以杀你。

与刘古香同时被杀的还有原柳州同盟会支部长、亲身参与广州“三二九”起义和安庆刺杀恩铭的王冠三。①

沈鸿英背信弃义，为陆荣廷杀害了刘古香，搞垮了独踞柳州、坚持独立的刘古香和刘震寰的千人队伍。这对陆荣廷真如拔掉肉中的一根芒刺。为了进一步推行专制的需要，陆荣廷把沈鸿英提为帮统，并把刘震寰的余部加以改编，划归沈鸿英统率。不久，又把沈鸿英提为防军统领。②

陆荣廷杀害刘古香，赶跑刘震寰，破坏“二次革命”以后，进一步使用各种手段，扼杀革命民主势力。先是，解除了原同盟会会员严端的财政司司长，张仁普的司法司司长职务；停止省和各县议会的活动，由他一手颁布的《广西省临时约法》也成了废纸。然后转过手来，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杀戮散处各地的革命党人。原在南宁新军活动的周毅军、李应元等，因为对广西的假独立不满，曾秘密联络宾阳一带的绿林武装，图为“二次革命”，被陆荣廷“购缉获之”，“并戮于市”的刘古香。③ 在此前后，被杀的还有：“二次革命”时至南宁运动独立的农实达；④ 在宜山组织力量响应讨袁的李友梅；⑤ 与恭城人张继元共同出面，劝说贺县管带孟希孔勿“搜捕志士，滥杀无辜”的平乐老同盟会会员黄体仁，⑥ 以及因“二次革命”失败，秘密潜入广西，继

① 《革命烈士小传·王冠三》，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② 参看龙小凤：《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琐忆》；覃子权：《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记》。当时，刘古香掌握了陆军与水师共计千余人。十二个管带有六个姓刘，军队名册直如刘姓族谱。柳州府属各县政权皆听命于刘古香，陆荣廷曾拟调刘古香往百色分其势，刘古香置之不理。

③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四，《兵事志·前事七》。

④ 《革命烈士小传·农实达》，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⑤ 《革命烈士小传·李友梅》，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⑥ 张智林等：《平乐县志》卷八，《列传·黄体仁》。

续策动反袁的"开国元勋"蒋翊武[1]等一批革命志士。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藤县革命党人黄子庄，他在1912年逃脱陆荣廷和黄榜标的暗害之后，避居香港、澳门等处。但他对袁世凯、陆荣廷之流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大搞专制独裁的反动行径，常怀深恶痛绝之心。对此，他曾"为诗以诋之"。诗曰：



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广西被捕的蒋翊武及其致双亲绝笔书

登台百怪尽蛇神，转轴凭谁挽万钧？
天地何心容丑类，江山有泪吊斯文。
模糊黑夜愁狐鬼，惨淡黄图现爪鳞。
愿乞如来多宝佛，慈悲救世劫中人。



开国元勋蒋翊武就义处

诗成后，送广州《新闻丛刊》发表。甲辰（按应为甲寅，民国三年，即1914年——引者）秋，（子庄）入羊城，被暗探所执。越数日，陆荣廷电解梧州，加以"乱党"罪名杀害。子庄为此诗召祸，岂非新文字狱耶?！陆荣廷之亲袁世凯，亦

① 万武：《蒋翊武死难纪实》，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按：蒋翊武虽为桂林防军统领秦步衢所俘，但对他的关押、审讯和处决是由陈炳焜秉承袁世凯的"严行拿办"的命令执行的（见《广西公报》第六十七期，《中央命令》，1913年9月14日）。1913年9月9日，蒋翊武在桂林丽泽门外慷慨就义，年仅29岁。九年后，孙中山督师北伐至桂林，缅怀先烈革命勋绩，于就义处树碑纪念，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由此可见。”①

陆荣廷疯狂反对革命，屠杀革命党人，颇得袁世凯的青睐。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以后，分别设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将军。陆荣廷属于有地盘、有兵权的一类，被授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虽地位比段祺瑞、冯国璋、张勋、龙济光等上将军低了一等，却比那些既无地盘、又无兵权的“威”字号将军神气得多。② 1915年6月，袁世凯正密谋变更国体，复辟帝制之际，又对他示以恩惠，改授他为耀武上将军，等级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相同。他的儿子陆裕光也得荣加少将衔。③ 这时候，陆荣廷是十分踌躇满志了：

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就广招工匠，在南宁建筑了一座十分豪华的陆公馆，又在武鸣雷洪老家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颇为别致的花园，名曰宁武庄。紧接着，在武鸣城郊的灵水畔兴建了一座三面环水，一面接陆，亭台楼阁皆备的明秀园。被授为上将军以后，又在武鸣城南区街心处筑起了一座壮丽巍峨的上将军台，还着意修建了城郊的灵水风景区。短短几年间，仅在武鸣县城建造的园林府第，占地就有整个县城的一半；另在四乡占有良田好地4000余亩。在南宁，他以强制的手段，收买了石牌坊麻雀巷的大片瓦房，悉予平毁，建造上将军府。他的八个妻妾，分别居住在南宁和武鸣的府第、别墅里。南宁和武鸣，成了陆荣廷和谋士们从事阴谋策划，调兵遣将，统治广西和对外扩张的主要据点。④ 事实告诉人们，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桂系，是在扼杀革命，屠杀人民，疯狂向人民榨取，向社会掠夺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封建军阀集团

① 何亮辅：《藤县志稿》卷六，第十一章《人物》。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七七三号《命令》。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五一号《呈》。

④ 陆荣廷手下的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人，在南宁以及各自的家乡都占有不少土地。莫荣新在桂平占田即达2000亩。又据说：“陆荣廷、谭浩明在他们得势的时候，他的土地占着（南宁）全道的三分之一。”（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5页）上海、苏州等“通都大邑，皆有陆荣廷之巨宅”。（据《国父全书》第897页）

的基本立足点，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

三、桂系和“护国战争”

陆荣廷、袁世凯的猜疑争斗

在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时，陆荣廷和袁世凯虽然通力合作，但是，彼此之间的疑忌早已存在。因为陆荣廷并非北洋嫡系，对袁世凯吞并异己，实行独裁常怀戒心。而袁世凯则害怕陆荣廷在南方坐大，不利于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是以彼此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

辛亥革命后的广西“迁省之争”，实际也是袁世凯和陆荣廷的斗争，已于前述。此后不久，袁世凯利用广西革命党人与陆荣廷的矛盾，简派与陆荣廷有交谊，却非他的嫡系的进步党人韦绍皋为广西民政长。陆荣廷公然抗命不纳。袁世凯在难堪之余，心甚怏怏，随即改派张鸣岐为广西民政长。[①] 袁世凯深知，张鸣岐是前清的广西巡抚、两广总督，曾是陆荣廷的顶头上司。论资历、地位或关系，陆荣廷都无法抵挡，但在屈从之余，也深感不快。1914年，袁世凯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不但主管民政，而且帮办军务。[②] 这使陆荣廷更感不满。

袁世凯是帝制迷。他在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即使用各种手段，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纠结帮派，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复辟帝制。1915年初，他利用总统府美国顾问古德诺（F. J. Goodnow）和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发表文章，宣扬所谓共和国体不合中国国情。同年8月，由杨度、严复等六

① 1913年9月19日，任命韦绍皋。10月24日，以韦“丁忧免官”，改任张鸣岐。见《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五、六号《中国大事记》。

② 1914年5月，袁世凯北洋政府军令部命令张鸣岐会办广西军务。

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随后又通电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请愿“改变国体”。10月，宣布于次年元旦废除民国纪元，改为“洪宪元年”。12月，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令。

为了及时掌握陆荣廷桂系的动静，袁世凯在筹安会成立前夕，即乘广西巡按使李国筠因病请辞之机，于1915年7月特任心腹人物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在任命后的短短三个月内，先后赋予他监督全省财政、司法行政并会办广西军务的大权。① 王祖同依仗袁世凯的权势，对陆荣廷既进行监视，又从中分权，使陆荣廷深为恼怒。② 但迫于袁世凯的实力，加以他的儿子陆裕勋还留在北京，名义是袁世凯公府里的副官，在京师模范团学习军事和公府礼仪，实际是袁世凯作为钳制陆荣廷桂系的人质。而陆荣廷也别具怀抱，以儿子作为驻北京的坐探。③ 因此，直至1916年初，陆荣廷对袁世凯总是虚与委蛇，不露声色。

一出真假难分的拥戴戏

1915年，是袁世凯公开背叛民主共和，紧锣密鼓实行帝制复辟的一年。这年秋天，袁记的筹安会示意各省军政大员，要大家向袁世凯“上书”劝进。陆荣廷的态度特别认真、积极。他马上主动地和王祖同联名去电，表示拥戴，并解散广西的省议会，派出广西的劝进代表。9月下半月，广西有所谓“公民代表”周家彦等38名，在桂系政府的支持下，两次上书请愿，要求将民主制改为君主制。在继之而来的“国民代表”投票中，广西“国民代表”77名，一致投票赞成君主立宪。④ 直至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粉墨登场时，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四三、一一五一、一一五五、一二三二号《命令》。

② 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说：王祖同依仗袁世凯的权势，对陆多方掣肘，甚至“凡致陆之函，多被拆阅，或窃发之”。

③ 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以后，“对于各省将军，颇多疑忌，须以家人相质，而后得保全禄位”。

④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二一九号《咨》、一二九二号《命令》。

陆荣廷在短短的十天内，还与王祖同等联名，或者借用广西军、政、学、商与所谓耆老、绅民代表的名义，连发九电，表示拥戴。一再声称："中国国情，非立宪不能救亡，非君主不能立宪，非我皇上为君主，不能统御国家以谋长久之安。"换言之，中国只有袁世凯做皇帝，才能"创制宪法，定万年有道之基；新整乾坤，造亿兆无疆之福"。[①] 陆荣廷向袁世凯表演的"拥戴"戏，确实令人真假难辨，而其忠诚之态，也绝不逊色于其他人了。

袁世凯在所谓"举国拥戴"的假象（自然也包括陆荣廷桂系所表示的拥戴）之下称帝以后，为了奖赏"有功"，于是大封官爵。两广方面，广东的龙济光受封为一等公爵，而陆荣廷只得封为一等侯爵。论资历，两人同是前清的一省提督。论"功劳"，龙济光出任广东督军，还是陆荣廷帮助他打败了陈炯明才得实现的。袁世凯厚此薄彼，更使陆荣廷盛怒难遏，大骂"龙济光是个什么东西"，竟得宠忘本。而且暗语人曰："陆某昂藏七尺之躯"，岂甘心"北面事伪帝耶"？[②] 即令如此，他对封爵仍然去电袁世凯，表示感谢，声称"报国之诚，至糜捐而后已"[③]。直至蔡锷、唐继尧等公开发表通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以后，陆荣廷仍与王祖同迅速致电袁世凯的政事堂，以及全国各省的将军、巡按使、都统和护军使等，斥责蔡、唐等通电反袁是"任意煽惑，荒谬离奇"，并对他们"责以大义，痛切警告"；且与川、湘、鄂、粤各省相约，对蔡、唐等"合词诘责"。而于袁世凯的下令称帝，则表示衷心拥护。电云：

夫君宪大定，岂有中止之理？且国体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决定，抗者则为全国之公敌。乃唐、任（可澄——引者）为乱党作机械，不啻甘为祸首，怙乱误国，断难任其蠢动。惟桂省上下一心，士卒用命，知有国家，知有地方，并以服从中央，拥护君宪为天职。现

①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第五、八、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五、一八号。

② 陶菊隐：《近代轶闻》。

③ "洪宪元年"第六二号《奏折》。按：陆裕光则特封为三等男爵。

已通饬沿边军队，严密布置，加意防范，整饬戎行，束装已发。愿我国家扫除不庭，尚祈诸公同心协力，共维大局，荩筹如何，并望随时赐教为盼。①

陆荣廷的“通电”，成了袁世凯“讨伐”护国军的“民意”之一。②

实际上，当反袁风暴兴起之际，陆荣廷派驻北京的代表林绍斐已经回到广西，将袁氏窃国称帝的阴谋，以及国内各派势力的动向，对陆荣廷作了详细的汇报。林绍斐是陆荣廷的心腹人物，回广西后即在将军行署为陆荣廷积极出谋划策，并被任命为参谋长。③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陆荣廷任命另一个心腹人物李静诚署理耀武上将军署参谋长，并命他的义子、行署副官马济设立联络机关；派曾彦到各省做调查联络工作。由于陆荣廷桂系是当时有数的地方实力派，所以，反袁派和袁世凯对他都十分重视。前者拉他，后者是既拉又防。

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国民党反袁派就通过林虎和钮永建两人，对陆荣廷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广西支持独立，免使云南有后顾之忧；二是云南独立以后，广西最好在一个月内发出响应通电。如有困难，亦保证不让广东的龙家军假道攻滇。袁世凯公开改元称帝以后，黄兴于 12 月 22 日也致书陆荣廷，内称：

今日海内贤豪，竭智并力，以正义讨昏暴，以人民公意诛独夫，义正言顺，内洽国人之心，外博世界之同情，事之成功，不难逆睹。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④

蔡锷到云南后，也派人劝陆荣廷合作反袁。不久，与袁世凯早有嫌隙，此时

①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一月九日第四号《公电》。

②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一月九日第四号《公电》。

③ 1913 年 4 月，林绍斐即被任命为广西都督府参谋长；同年 11 月，袁世凯又任命他代理广西民政长。

④ 《黄兴集》第 415 ~ 416 页，中华书局，1981。

成为国民党右派偶像首领的岑春煊，[①] 又派林虎间道回桂，劝陆荣廷树起反袁的旗帜来。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时，陆荣廷一再得到他的提携，所以对他"颇为信服"[②]。迨云南起兵讨袁，梁启超也驰书陆荣廷，劝其出兵响应。内称："若桂军一起，粤能景从最善也；即不然，而首以偏师略定钦、廉，运输之孔道一通，则桂省何至以乏饷乏械为虑者。此又此间极秘之消息，不能不为将军告者也。"[③] 梁启超在陆荣廷的心目中素有好感。这些人出来反袁，他认为总比国民党左派要好一些。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可以和岑春煊、梁启超等人合作，而且言听计从。

袁世凯帝制自为公开化以后，也极力拉拢陆荣廷，一再电请他前往北京，共商国是，弄得他左右为难。幸好他的参谋长林绍斐急中生智，劝他装病，隐居武鸣，不见宾客，所有督军府事务，统由陈炳焜代理。随又以病危为名，迭电北京袁政府，请令其子归"省亲疾"。袁世凯知不可留，命人伴送，优礼有加。行至汉口，遂毒毙之。陆荣廷得讯，暗自忍痛，"若毫弗闻"。对袁世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载：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命再督两广。袁世凯以岑"据两广财赋之地，终不利于彼也，日谋所以陷余之计。知东朝平生最恶康、梁师弟，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语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泣下，亟谋所以处置者。枢臣固请如瞿相之例，孝钦迟迴久之曰：'岑某有庚子旧劳，毋令难堪。'遂仅以久病未痊，准其开缺调理，俾微臣得以保存始终，诚圣恩也"。（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文海出版社）又：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说："岑春煊为袁世凯及庆亲王奕劻所忌，合挤之。"

② 卓锦湖：《陆荣廷讨袁的内幕》，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③ 《盾鼻集·致陆干卿书》。

凯的“连电劝慰，伪致哀悼”，则“再三称谢”，① 和袁世凯对唱假戏。

胜局在望，转向讨袁

正当陆荣廷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之际，北洋系中的直系头目冯国璋从南京派来了吊丧代表潘博。此人惯于兴风作浪。他一见陆荣廷，就透露了冯国璋和袁世凯有矛盾的消息。加上早已公开的段祺瑞被袁世凯软禁，军权由王士珍接代等等，使陆荣廷看到了北洋内部的裂痕正在不断扩大，给他转向反袁阵线增添了勇气。1916 年 1 月，他以唐伯珊、陈协五为代表，到南京、上海等地加强与冯国璋的联系，同时邀请梁启超赶来广西，共商反袁大计。②

陆荣廷决意反袁，最初只有他的心腹如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马济、陈炳焜和沈鸿英等知道，行动十分机密。③ 云南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先是企图借道滇越路进兵云南，遭到法国公使的拒绝。于是，转向陆荣廷提出要求，借道广西进军滇东。陆荣廷不敢明拒，但以广西人民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袁世凯怕把陆荣廷“逼上梁山”，改由龙觐光率军取道广西进攻云

---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本）；陆君田、苏诗选：《陆荣廷传》均持此说。陆荣廷的儿媳刘可棐说：袁世凯派龙觐光之子、陆荣廷女婿龙体乾毒死陆裕勋于梧州船上。而黄旭初：《陆荣廷参加护国讨袁记》（见台北《春秋》156 期）；篌园在《记陆荣廷》文中，皆说陆裕勋因劝父母拥护帝制不成，心存畏惧而死于梧州，并志此以供参考。

② 关于梁启超在日本人的掩护下秘密从北京经日本、香港、海防潜往广西，以及陆荣廷派官使往海防迎接梁启超入桂的情况，请参看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174～177 页；林虎：《广西讨袁的经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③ 据卓锦湖《陆荣廷讨袁的内幕》云：陆荣廷曾经怀疑沈鸿英反对反袁，准备对他采取断然措施。又据陈树勋：《广西讨袁纪略》说：陈炳焜最初对反袁有疑虑，力主慎重。后经陆荣廷说服，始同意参与盟誓讨袁。而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曾拟拉拢陈炳焜，分化陆荣廷桂系势力，没有成功。

南。龙觐光是云南蒙自人，在滇南有一定的潜在势力。他又是陆荣廷的儿女亲家，亲家借道自然不好拒绝。而陆荣廷却将计就计，他在同意借道的同时，还去电龙觐光，请他多带军械，少带军士，建议到广西后就地招募。刚好龙济光忙于对付广东的讨袁活动，仅抽调4000人给他的哥哥带人广西。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率军抵南宁，沿途招了4000军士，凑成8000人，号称1.2万人，编为二十营，分五路进攻云南。①

2月8日，袁世凯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由百色进攻云南剿隘，同时电请陆荣廷派兵助攻。陆荣廷这时非常痛快，马上派陆裕光率军随龙军前进。而就在这时，贵州的刘显世与入黔的护国军相呼应，宣布独立。3月7日，袁世凯转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② 要他从速组织力量，进军贵州，开辟夹击云南的另一战场。陆荣廷也痛快地答应了。只是要求袁世凯尽快拨给步枪5000支，军饷银100万元。陆荣廷既然如此干脆，袁世凯当然不好拒绝。为了防备陆荣廷反复，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的同时，又以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其意自然是借陈以分陆之军权，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③ 袁世凯还给龙觐光密令，要他就近监视陆荣廷的行动。如有可疑，即在陆荣廷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有人不明白陆荣廷向袁世凯索取军饷，同意就任贵州宣抚使的真实意图，问他是否“赞成老袁做皇帝”。他的回答是：“不如此就不能调兵遣将。”④ 陆荣廷离开南宁之前，还召集心腹人物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据说，陈炳焜一反常态，在会上对陆荣廷慷慨陈词，他说：

袁世凯自欺欺人，得罪了全国人民。不值得我们责备他。为将

① 据游悔原《民国再造史》说：龙觐光在广西招募4000人，由其子龙体乾统率，手下的两个重要头目张耀山和吕春琯，都是陆荣廷推荐的。

②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第六二号《命令》。

③ 参看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陈树勋：《广西讨袁纪略》。

④ 陈树勋：《广西讨袁纪略》。

> 军打算，今日若是助袁反逆，就是对国家不忠。公子裕勋，被袁无故毒死，你不图报复，就是对儿子不慈爱。岑大帅是将军的故主，他屡次来信劝你响应云南起义，没有听到你听从，就是对主不义。将军若是即日宣布广西独立，还可以改过为功。不然的话，军民解体，恐怕将军也成了民国的罪人了。①

自从袁世凯决意帝制自为以来，陆荣廷对他的虚忠假义言行，不但唬住了远在北京、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也把近在卧榻之旁，专事监视任务的王祖同给蒙住了。只有陈炳焜的这一席“事新君则不忠，背旧主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的发议，很快被王祖同探听出来了。他以十万火急的密电向袁世凯报告，说明陆荣廷是绝对靠不住的。但是，这个情报对袁世凯来说是太晚了！

出师柳州，宣布独立

有记载说：陆荣廷听了陈炳焜关于“不忠、不义、不慈”的三事忠告以后，颇为动情，于是，即席“誓于众曰：

> 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如有违异，饮弹而死。

誓毕，率师十二营，移驻柳州，以示攻黔”。②

陆荣廷是3月11日从南宁率军抵达柳州的。就在这时，“协助”龙觐光“攻滇”的陆裕光军却奉命与马济军合作，从滇东和百色两地同时动手，缴了龙觐光的全部饷械，计机枪40挺，大炮14门，步枪5000支，现洋20万。龙

---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亦有类似记载。

② 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第六章。

觐光部的军官全部被遣散，士卒交由马济改编。龙觐光父子被俘虏，[①] 桂系的实力迅速膨胀。据估计，陆荣廷的实际兵力，1916年前至多不过2万人；1916年以后，经过扩充和兼并，总数已近5万人。他的部队以旧军为主，即前清遗下的巡防队组织，首领亦多旧军人物。因为编制复杂，即令在同一部队中，官兵多寡也不同。[②]



1915年应陆荣廷之约前来广西参与策划反袁称帝的梁启超

陆荣廷率军抵达柳州的第二天，即3月13日，他即令陈炳焜等致电袁世凯，内称："自政体改变，民怨沸腾，干戈斯起。推原祸本，实在帝制。"劝其即日辞职以谢天下，并要求于24小时内答复。[③]

15日，陆荣廷在柳州正式通电各地，宣布广西独立，自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④] 随即赶回南宁坐镇，并分兵进击。

---

① 游悔原在《中华民国再造史》第二编第十五章《龙觐光投诚》中说：龙觐光父子"前后受敌，一日五、六电求救于陆、陈（炳焜），不应。使其子转电陆妻谭夫人。谭以语陈。陈始令陆裕光转知滇、桂两军停战；逼令龙军缴械。龙乞保留卫队驳壳枪三百，不允。于是，龙军投诚"。龙觐光在百色，"汗流浃背，战栗失色"。又黄季陆编：《讨袁史料》（二）说：龙觐光捧读投降书，表示"当辞云南巡查使，赞助共和，以谢天下"。卓锦湖是陆荣廷派遣随龙"征滇"的营长。百色庆祝独立时，他请龙觐光到会对群众宣布拥护讨袁，以释群疑。龙不愿去，派其参谋段某代往。（见《陆荣廷讨袁的内幕》）

② 《黄绍竑回忆录》，3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八号；《帝制始末记》；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

④ 据林虎：《广西讨袁的经过》；陈树勋：《广西讨袁纪略》说，陆荣廷从柳州回邕时，梁启超在曾彦陪同下也到了南宁。

一路从桂北向湖南永州前进；一路从梧州向广州进发；一路南下广东钦州、廉州；其余各部则分驻南宁、泗城、百色、太平等处。同时派员用船将龙觐光从百色接至南宁。对王祖同则赠以"程仪"5万元，派人将他护送出境。[①]并再次通电各省，揭露袁世凯的罪行。文曰：

> 前大总统袁世凯，在职四年，秕政百出，神人怨愤，罪已盈贯；更怀野心，妄觊神器；欺人孤寡，恬不知耻。以民国付托之公仆，而背弃就职誓言，明犯国宪，狡不承认。

希望各省"迅举义麾，共扫妖穴"。[②] 旧账、新账一起端，表示与袁世凯誓不两立。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亦分别发表通电，表明了与陆荣廷同样的政治态度。[③] 这些通电，使正在四川前线作战的护国军得到鼓舞，北洋军士气大落，袁世凯也越发感到帝制自为的美梦难成。[④] 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旧自称大总统，企图以此缓和各方的反对。但这是痴心妄想，不会得逞。

复辟破产后的动荡政局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以后，败亡之局已定。围绕即将出现的政权真空的填补问题，中国政坛依旧是明争暗斗，扰攘不安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陆荣廷宣布独立时，即自封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说明他早就盯住广东这块肥肉，希望利用广东的物力、财力，进一步扩张桂系的地盘和实力。为此，他曾多次致电龙济光，敦促他宣布独立，并保证龙济光的安全和原有的地位不变，否则将以武力解决。陆荣廷的目的是利用龙济光作

---

① 陈树勋在《广西讨袁纪略》中说：陆荣廷所以礼送王祖同出境，是因为他向袁世凯作过"陆很靠得住"的保证，使广西从袁世凯处得到大批饷械。

② 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

③ 他们的电文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④ 《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八号，《帝制始末记》。

为牵制国民党左翼和广东民军的助力。在此前后，广东肇庆镇守使李耀汉已经宣布与广西采取共同行动；团长莫擎宇也在潮汕宣布独立；镇守使隆世储在钦廉响应独立；徐勤、魏邦平等也纷纷在广东组织反袁和倒龙武装。这些都给龙济光以极大的压力。龙济光迫于形势，表面上向广东各界人士宣告准备独立，暗地里却请求袁世凯迅速出兵南下为他“平乱”。结果，引起了广东各界人士更加强烈的反对。

按照陆荣廷和梁启超的谋划，在广东组织军务院，由岑春煊任抚军长，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这个机构未成立之前，先推岑春煊为两广都司令，以便号召西南各省，掌握两广军政大权，孤立国民党左翼，驾驭龙济光。4月6日，龙济光在各方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9日，陆荣廷和梁启超从南宁启程前往广州。正在这时，岑春煊从日本借得了日币100万元，步枪1.45万支，山炮20门，重机枪8挺，以及弹药一批，雇佣日本商船启运来华。① 并从上海致电陆荣廷，表示拟在肇庆组织讨袁武装。陆荣廷赶到肇庆迎接；同时电请各独立省区同意，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统一讨袁军政权，由岑春煊任都司令。5月8日，改变都司令部，成立军务院，公推唐继尧、岑春煊、陆荣廷、刘显世、梁启超、龙济光、陈炳焜、蔡锷、李烈钧为抚军，而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事；将两广及云南部队统一编组，成立护国军六个军，分别由蔡锷、李烈钧、谭浩明、李耀汉、莫荣新和林虎任各军军长。无论从护国军都司令部或护国军的编组看，陆荣廷桂系都占了上风，实际权力掌握在他的手里。

军政组织已定，即遣兵分路出击。以李烈钧第二军沿粤汉铁路南下，莫荣新、林虎率第五、第六军沿西江东进，会攻广州。以谭浩明率第三军从桂林、全州出湖南，陆荣廷自任桂粤联军援湘总司令，率马济武卫军十营，陆裕光军两旅及两巡防营居中；另以林俊廷、沈鸿英各率所部为左右路，分攻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云：“借得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携之回国，西师始得东下，围攻广州。”

武岗、宝庆及江华、道州。军抵衡阳时，湖南将军汤芗铭因早为湖南人民反对，被迫宣布独立，并电请陆荣廷进军长沙，借以抵制湖南人民的“驱汤运动”。而马济率军进驻长沙后，拒绝接受汤芗铭的供应与犒劳。汤芗铭惶惶不安，乘黑夜逃出湖南。广东方面，由于龙济光据广州城顽抗，战争在粤北呈胶着状态。但汤芗铭和四川将军陈宧败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原已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更形孤立，忧病日益沉重，连声哀叹：“人心已变，人心无可为。”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讨伐声中死去。6月7日，陆荣廷在衡阳接到北京的电报，内称：“袁世凯于六月六日病死。”发报署名者为“政事堂”。

袁世凯死了，湖南的拥袁势力垮了。负隅顽抗的龙济光顿时感到大势已去，于是请广东巡察使张鸣岐到肇庆求和。肇庆方面以龙济光退出广州为先决条件。但是，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出任大总统，段祺瑞做了内阁总理。6月9日，龙济光又宣布取消独立，妄图转投段祺瑞，与肇庆军务院对抗。为此，军务院决定以武力讨伐龙济光。

7月6日，段祺瑞内阁发表任命各省军民长官的命令。对南方诸省，以李烈钧调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陈炳焜为广西督军，罗佩金为广西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但在同一天，发布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的命令中，又有陈宧未到任前，特任陆荣廷暂行署理湖南督军，龙济光暂行署理广东督军之命。① 段祺瑞玩弄的这套“调李、阻陆、保龙”的政治把戏，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陆荣廷也复电坚辞督湘之命，决心全力占有广东。随即从湖南率军回桂，并于11日星夜兼程入粤。同日，黎元洪、段祺瑞即电令抗命的龙济光“妥速预备交卸”。14日，陆荣廷行抵梧州，电促龙济光办理交代。② 率军进驻广东的李烈钧，则于8月13日致电陆荣廷，表示欢迎。③ 接着，广东惠潮嘉镇守使莫擎宇也致电北京黎

---

①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第一八二号《命令》。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一八号《命令》，二二二号、二二五号《公电》。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三二号《公电》。

元洪、段祺瑞以及各部总长，直斥龙济光为“祸粤罪魁”，认为“收拾粤局，唯陆为能”。而龙济光则迭借“广东全省公民”名义，要求“拒陆留龙”。①面对龙济光的抗拒刁难，陆荣廷一面和陈炳焜分别致电段祺瑞，对他出任国务总理表示祝贺，② 一面指使桂籍议员梁昌浩等，在众议院提出查办龙济光在广西办矿的“贪酷劣迹”③。陆荣廷于9月进驻广东肇庆以后，声称自己“体弱多病”的同时，又宣布于25日接印视事。④ 龙济光既受到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又面临桂军的强大攻势，被迫率残军退出广州，转往海南岛任两广矿务督办。⑤ 陆荣廷则率军入广州就任广东督军职。广西督军则由陈炳焜继任，并兼署省长。⑥ 至此，两广皆为陆荣廷桂系所掌握，陆荣廷成了两广的实际主宰者，桂系迎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

陆荣廷一生做了不少坏事，参与反袁称帝也是别有所图，但他的步伐却是与人民反袁大局合拍的。以他当时的地位与实力论，自然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广西独立，对于打击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气焰，促进反袁护国战争的发展，维护民主共和制度，都有重大的作用。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是有功劳的。但是，如果把他称为“再造民国第一人”，⑦ 那就名实难副了。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三七号《公电》。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二四、二三七号《公电》。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三一号《通告》。
④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六八号《公电》。
⑤ 因为龙济光是龙觐光的弟弟，而龙觐光是陆荣廷的儿女亲家，所以陆荣廷入主广东以后，立即为他们向北京总统府、国务院请勋。说他们“谊属葭莩，不避嫌疑”。说龙觐光一闻广西护国义举，即通电首先赞成。龙体乾在护国战争中“同心效命，释甲输诚”。龙济光也“赞成共和，深明大义”。把“拥护帝制”说成“赞成共和”，不惜颠倒历史。
⑥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九五号《命令》。
⑦ 梁启超：《陆荣廷再造民国的功勋》，参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

四、桂系与“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纷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失去了共同的代理人。它们转而采取“分裂剥削的政策”，在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内扶植自己的走狗。于是，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① 原属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在日本的豢养下形成皖系势力；而冯国璋则依靠英、美等国的扶植，形成直系势力。盘踞东北的张作霖，依靠日本的帮助，形成奉系势力。云南唐继尧，在英、美的支持下，形成滇系势力。陆荣廷的桂系，除依靠英、美的帮助外，也接受日本的帮助。② 这些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军阀。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湖南的谭延闿，以及盘踞在徐州的张勋等。这些军阀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利益。他们不论大小，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占据着一块地盘，在自己的统治区内称王称霸，横征暴敛，作威作福，造成了民生凋敝，社会残破，国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局面。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后，孙中山曾两次致电促请“规复约法，尊重国会”③，黎元洪虽然于1916年6月29日公开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

---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在护国战争中，桂系通过岑春煊的关系，借得日本大批饷械，已于前述。又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至1919年，日本先后向桂系提供借款1500多万日元，其中1915年100万元，1916年600万元，1917年800万元，1919年76万元。而从1916年至1920年，英国向桂系借款410万港元，美国向桂系借款62万元。

③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分别在1916年6月9日和19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会”，但中央的军政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为了实现皖系的独裁统治，一开始即违背众意，主张维持1914年袁世凯炮制的“民三约法”，反对恢复“民元约法”。[①] 并在日本的支持下，压制英、美扶植的冯国璋和黎元洪。结果在中央出现了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即所谓“府院之争”。而其背后则是英美和日本在中国的斗争。

1917年初陆荣廷的北京之行

陆荣廷桂系借讨袁、护国之机，向湖南和广东扩张势力。桂系这时既是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集团，陆荣廷自然也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各在英、美和日本的操纵下，因为是否参加欧战的问题，争斗十分激烈。他们为了寻找支持力量，都把目光投向陆荣廷，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是以3月初旬，陆荣廷应邀从广州取道香港、上海北上，广东军务则交由师长谭浩明代理。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路过蚌埠时，会见了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并由他陪同，于24日在徐州会见了张勋。27日，到达北京，下榻中南海怀仁堂。第二天，分别与黎元洪、段祺瑞会晤。黎、段以及国会中的各派政团，为了争取陆荣廷的支持，纷纷设宴热情接待。黎元洪还调集北京梨园名角唱堂戏表示欢迎。广西旅京同乡亦于4月1日假座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的畅观楼举行茶会，欢迎陆荣廷和他的随员们。[②] 说明各方对他此行的关注与期望。

可是，陆荣廷此番北上，却是别具用心。对于参战问题，他逢人都不置可否。倪嗣冲是段祺瑞皖系的骨干人物。陆荣廷路过安徽时，倪嗣冲在接风的盛宴上，故意谈论自己反对对德宣战的种种理由，并且请客人表示意见。陆荣廷却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表示意见。”他的这一套“官话”，弄得倪嗣冲颇为尴尬，无法再说下去。到了北京以后，他逢人就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八二号《命令》。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七三号《公告》。

表示自己不贪名利，不争权位地盘；渴望早日“解甲归田”。并向黎元洪、段祺瑞推荐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和广西督军。这一套以退为进，争利、争权、争地盘的手法，黎元洪、段祺瑞都心领神会。4月10日，遂发布命令，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任命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陆荣廷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两广军政的全部权力。① 从此，桂系势力进入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旺盛时期。

另一件事更令人感到意外。陆荣廷到北京以后，在拜会黎元洪、段祺瑞的第二天，即29日，他竟一头栽进紫禁城里，用“觐见皇上”的大礼向十一岁的废帝溥仪叩首称臣表忠。他的这个举动，连溥仪和他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等也感到莫明其妙。两个月以后，溥仪要接见搞复辟的张勋，联想到陆荣廷的“觐见”，无疑是被冷落了多时的“紫禁城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给他安排了不平常的赏赐，而且使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军”。陆荣廷受此“殊荣”，除了当即向溥仪“报效了崇陵植树一万元”，回广西后还专门写信向溥仪“叩谢天恩”。也就从这时起，“南陆北张”成了宫廷“上下常提起的话头”，而且认为：“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②

陆荣廷进宫向废帝溥仪“叩首称臣”、报效表忠的举动，完全出于他个人的主动表演。可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已经六年，他仍念念不忘旧主，说明他在辛亥革命时宣称赞成民主共和，确是大势所趋，出于无奈，而本性始终不改。护国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宣布反袁，亦非反对封建帝制，拥护民主共和，只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不反对溥仪皇帝或者他认为可以拥戴的人做皇帝。由此可见，陆荣廷始终是个帝制派，而非共和派。无怪紫禁城里从被废黜的皇帝，到大小遗老遗少、太监宫女们，都把他和张勋相提并论，视为可以帮助复辟帝制的大忠臣了。

---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24～26页，104～106页；《（北洋）政府公报》，第四四八号《命令》。

②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9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78。

和“张勋复辟”的微妙瓜葛

因为中国是否参加欧洲大战的问题，使北京的政潮起伏，瞬息万变。段祺瑞以皖系督军为骨干，召开会议，胁迫黎元洪同意参战，并于5月间效法袁世凯的故技，组织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通过参战案。结果逼得议员们只好停会。与此同时，段祺瑞秘密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罪恶活动被揭露，更加激起了议员和人民的愤怒。黎元洪在冯国璋直系及各方舆论的支持下，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转往天津，鼓动各省督军起来反抗。倪嗣冲在安徽首先发难。皖系或亲段的各地督军也相继宣布“独立”，叫嚷要对黎元洪实行“兵谏”，直至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分电各地督军，希望采取共同行动。

陆荣廷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素怀戒心。倪嗣冲等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广西时，陆荣廷于6月1日在南宁召开桂系骨干会议，会后即以他和陈炳焜、谭浩明的名义，致电冯国璋，请他出面“解除棼难，以固共和”。随又明确拒绝皖系督军关于“独立”和组织临时政府的建议，并与国民党各派以及西南地方各督军联络，共商讨逆事宜。6月9日，陈炳焜、谭浩明和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西南六省联合讨伐叛逆。20日，陈炳焜、谭浩明又发通电，声明在国会恢复之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政事务暂行自主，不受非法内阁干涉。

但是，就在陆荣廷桂系联络各方“讨逆”，宣布广西“自主”之际，张勋却以调停纷争为名，带他的辫子兵从徐州进入北京，赶走黎元洪，于7月1日演出了“奏请”清废帝复辟的丑剧。在康有为代拟的奏请复辟的“奏折”中，“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者，列名第一的是张勋，第二是冯国璋，第三就是陆荣廷。[1] 从此，在三天之内，用溥仪的名

[1]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卷四，《清室复辟之始末》，（台）文海出版社印行。

义，连发了19道“诏谕”，从第二道“诏谕”以后，都是“赐封”爵位与委派职官的。其中：

张勋赐封为一等公，任内阁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旋又赐封为忠勇亲王。

冯国璋受命为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旋又赐封为一等公。

陆荣廷受命为两广总督；旋又赐封为一等公。而陈炳焜被委派为广东巡抚，谭浩明为广西巡抚。

张勋和康有为等一手炮制的复辟丑剧，一开始就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申讨电文如雪片飞来，所以只有短短的12天就宣告失败了。陆荣廷是主要的署名“劝进”者之一。他事后对“署名劝进”虽然通电否认，指责是张勋伪造出来的，而且表示和陈炳焜、谭浩明等要“克日誓师”，“杀贼救国”。[①] 但张勋敢于把他列名于“劝进”的奏章内，也并非随心所欲，全无根据。他们同是苏元春手下的老兄弟，几个月前的徐州相会，彼此也谈得十分投机。陆荣廷曾私下对张勋表露心事，说“清时未见过皇上，故欲一见”。待他“入宫觐上”以后，又对人言：“皇上实中兴明主也。”[②] 是以陆荣廷在想什么，张勋自然心中有底。再说“上书劝进”之日，张勋在北京私宅里接见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时，还明确肯定，不但陆荣廷同意复辟，即“两广陈炳焜、谭浩明督军均已赞成复辟”。[③] 由此看来，陆荣廷桂系和张勋复辟有何瓜葛，至今仍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抵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张勋搞复辟，本来是和段祺瑞商谈过的。段祺瑞利用他解散了国会，赶走了黎元洪，创造了东山再起的时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清废帝复辟声中，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五三〇、五三二号《公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6)，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③ 《中华民国史料长编》(6)。

段祺瑞又乘机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7月12日，打进北京城。张勋逃人荷兰使馆；溥仪又一次宣告退位。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冯国璋继任大总统。

从张勋搞复辟，国会被迫解散，到段祺瑞重新掌权，始终引起孙中山的关注。7月3日，孙中山以张勋奏请清帝复辟，破坏民主共和，立即从上海南下广州，并通电国会和各省革命党人，齐起“出师讨逆”；旋又致电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六省都督及商、学各界人士，希望“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7月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一面电责段祺瑞“援引帝党，擅据鼎钟”；一面与陈炳焜、朱庆澜等商讨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恢复“民元临时约法”问题，并希望陈炳焜促请陆荣廷前来广州合作。30日，又直接致电陆荣廷，指出：“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虽美，其实尤巍。”再次要求陆荣廷为反段护法尽力。①

当时，桂系势力虽然进人广东，但是，广东的地方武装与护国战争时进驻广东的滇军仍极强大。这是桂系无法控制的。而段祺瑞统一南方的首要目标是湖南，矛头直接指向广西的北方屏障。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又必然影响桂系在广东的地位。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都使陆荣廷桂系感到左右为难。然而，人民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反对独裁专制，拥护民主共和。何况，6月上旬，陈炳焜、谭浩明和李烈钧在联名发表的讨逆通电中，曾有联合西南滇、黔、川、桂、粤、湘六省共推陆荣廷为盟主，出兵讨逆的提议。为了争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抵制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在广东的发展，陆荣廷又借助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如唐绍仪、岑春煊等人，电邀他们前来广州，共同“组织军务院，以树征讨之旗”②。陈炳焜也表示愿意邀请西南各省区的国会议员，前来广州集会，“以筹划西南半壁对外之政策”。这些动作，

---

①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

② 《申报》1917年6月26日。

使人感到“桂系雄心勃勃，大有诱天下英雄人彀之概”。①

在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军阀专制独裁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陆续到达广州。8月25日，国会议员120余人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讨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可是，就在这一天，陈炳焜却在广州发表声明，说什么“凡此举动，无论是否合法”，也“无论发生何种问题，炳焜概不负责”。第二天，陆荣廷和谭浩明也在南宁发出通电，声称：“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议，易淆视听”。并作出拒绝就任元帅、抵制国会非常会议的决定，表示对国会非常会议之一切决议概不负责。② 孙中山为此一面致电在天津的黎元洪，要他早日南下，共同救国；一面致电陆荣廷，告以国会委以率师讨贼重任，“应以效死为勇，勿以谦退为高”。③ 而陆荣廷竟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护法运动兴起以后，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调兵南下，进攻湖南，并于8月初免去谭延闿的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职，改由皖系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推行其“武力统一”的政策。这些举动，对桂系的利益与安危，关系极大。9月底，北军与拥护护法的湖南军在衡山发生战斗，相持于衡山、宝庆一带。10月初，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军事会议，组织援湘的护法联军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和林虎分任各军司令，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20日，谭浩明通电誓师援湘，护法讨段，立即得到湖南护法军程潜、刘建藩等人的响应，并举谭浩明为粤、桂、湘三省护法联军总司令。段祺瑞则假借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下令将“昌言自立”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广东镇守使莫荣新免职。11月，又特任陆荣廷为宁武上将军，着

① 1917年9月25日李烈钧致唐继尧电，转引自莫世祥《护法运动史》，71页。

②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台湾《革命文献》，493页。

③ 参看《孙中山年谱》，210~214页。

迅速来京任职，特派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其目的显然是架空陆荣廷，稳住龙济光。随又下令声讨谭浩明“拥众横恣，甘为戎首”，于1918年2月5日“褫夺谭浩明的官职暨勋位、勋章”。[1] 对于孙中山的争取，陆荣廷虽然在军饷和队伍编组方面略作让步，但对护法军政府却始终采取抵制态度，排斥孙中山的领导。

面对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假护法之名，行扩张私利、图谋割据之实，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布大元帅令，申明军政府受非常国会之委托，“负维持国家之巨任”，如护法者“分树异军，矫别名号，欲自外于军政府，此则所谓欲强其枝，而不惜弱其干，其极非至自弱自杀而不已”。“军政府职权所在，亦惟有不得已垂涕征诛，与众弃之。”[2] 表明了与假护法者绝不妥协的态度。

但是，陆荣廷对孙中山的劝告依然置若罔闻。同一天，他在直系出面调和南北战事，并取得桂系可以占有湖南的默许下，授意谭浩明通令粤桂湘联军“照约法停战”。12月，陆荣廷桂系更公开通电主和，并于1918年1月联合滇系唐继尧等，组织“护法联合会”，随即由桂系主持在广东督军署举行护法各省联席会议，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继尧为财政总代表，陆荣廷、唐继尧和程璧光[3] 为军事总代表。这是和孙中山军政府相对立的军政机构，也是陆荣廷、唐继尧等排斥孙中山于护法运动之外，破坏护法运动的重要一着。

桂系主持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开过不久，改组军政府的叫嚷甚嚣尘上。经过西南军阀和各地政客的一番幕后活动，国会非常会议于5月4日开会。在桂系大批军警的监视下，强行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大元帅制为总统会议制。孙中山被迫于当天向非常国会声明辞职，并发表通电，回顾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指出国家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六四〇、六五二、七三四号《命令》。

②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208、241页。

③ 程璧光，孙中山军政府的海军部长，1918年2月被人刺杀身死。

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表示今后“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①]

接替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②] 在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议案之后，竟捏造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吞饷自肥，通敌撤师”，把他拘捕囚禁；并派兵杀害军政府陆军次长崔文藻，查封陆军部派驻广东各县的招兵机构。5月20日，非常国会再次开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6月5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主要权力却被陆荣廷桂系操纵。第二天，孙中山毅然离开广州。历时一年的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桂系祸粤与“驱陆”风潮[③]

陆荣廷桂系虽然操纵了南方政局，出现了它的最盛时期。但是，因为他们反对民主共和，逆时代潮流而动。因此，也是他们走向衰亡的开始。

自从1916年陆荣廷乘反袁之机，出兵广东，驱逐龙济光势力，并于10月率军进驻广州以后，广州实际处于桂系统治之下。至1920年10月桂军被驱逐出境，整整四年，广东督军先后由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和莫荣新轮流担任。广东成了桂系的“一统天下”。他们勾结岑春煊及滇系军阀唐继尧等，设都司令部，开军务院，排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操纵军权、政权。陈炳焜公然反对民选的广东省长胡汉民，自以督军兼任。而且拒不出席孙中山就任护法海陆军大元帅就职典礼，派人暗杀军政府的海军部长程璧光。他们

---

①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472页。

② 陈炳焜于1917年就任广东督军。因其专横贪索，激起粤人不满。陆荣廷被迫于12月把他调回广西会办军务，以祖籍广东的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③ 以下所述，除注明出处外，余皆据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

推行“侵略之军政”，裁汰粤籍官兵，枪杀滇军将士，甚至于1918年1月悍然拘捕孙中山大元帅府卫队连官兵，并加以杀害。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桂系借口筹集军政费用，入粤后即公开设立公司，开放赌博之禁，举凡番摊、山票、铺票，放手招商承办。除征收赌税、花捐之外，还大肆征收鸦片烟税。护送鸦片烟过境，每百斤抽收纹银230两。年运广东鸦片计15万斤，收税银35万两。又借欧战粮米腾贵之机，违背严禁运米出洋老例，利用兵轮，欺骗海关，大做盐、米进出口生意，每月可得约计300万元。尤为严重的是，桂系以广东之矿山以及工厂、烟草、屠宰、厘金、航运、邮电等收入与房产作抵押，大肆举借内外各债。有记载说：“桂系在粤，借入内外债款总额为一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圆零三毫七仙，内日金四百七十四万圆，港纸一百零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九圆二毫五仙，大圆约一百五十二万圆，毫票四百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七十九圆五毫九仙。如此巨大之债款，究作何开销？不得而知，无从过问，吾粤能不民穷财尽哉！”

压制民主，实行文化专政，亦无所不用其极。要者如：1916年11月，《南越报》主任李汇泉著文揭露并抨击桂系大倡开赌之议。谭浩明竟命令营官农有兴将李汇泉诱捕并杀害。1918年，又借口军事问题，无端封闭《南越报》。同年4月《安雅报》误载陆荣廷死讯。莫荣新指责该报动摇军心，下令逮捕该报编辑黎佩诗，封禁报馆，没收营业器具。6月，《民主报》编辑陈耿夫刊发“杨永泰觊觎财厅，为曾彦所忌，运动军队，一致反对”的消息。莫荣新指为挑拨军心，下令将陈耿夫捕杀。访员许球，愤桂系专横，特组织名曰“憬民”的访员机构专以揭发桂系罪恶，被莫荣新下令拘捕，处以酷刑，羁押数月之久。1919年，因所谓“省长问题”，① 各报据实直书，主持公论，又触桂系之怒，结果，《国民报》被查封，《羊城报》、《共和报》、《粤报》、《国华报》和《商报》主笔及访员数十人被捕。7月，广州学生、工人、商人

① 桂系反对民选省长胡汉民；莫荣新免去李耀汉肇军总司令职，并抄没财产，解散肇军；广州各界请愿由伍廷芳兼任省长，莫荣新置之不理。

数千人奋起响应“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要求废除一切中日密约。莫荣新竟下令拘捕罢课、罢工、罢市之群众3000余人。孙中山急电广东当局，要求立即释放各界请愿群众，怒斥桂系暴行“不唯粤人之所共愤，亦即全国所不容”①。8月，粤军反攻，连克潮汕、惠州等地，桂军狼狈逃窜。各报据实报道，而桂系指为“造谣煽惑”，竟将广州所有报刊封禁。陆荣廷桂系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东各界更加高涨的“驱陆”风潮。1920年6月3日，孙中山和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合发表宣言，声讨陆荣廷桂系：

> 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饱骄兵悍将之欲。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匪为国法所不容，直人类之所不齿。②

在一片讨伐声中，桂系势力于10月被全部逐出广东。他们转而通过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关系，向曹琨、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靠拢，并于12月发表声明，“特率全省文武官吏取消自主，一切政令悉候中央主持”。29日，北京政府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命令：“桂省地居边远，该上将军（耀武）等多方绥辑，功在邦家。据电各情，尤见宏济艰难，深明大义。”随即“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特任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两日后，又以陆荣廷“久领疆圻，勋猷懋著，匡持大局，功在邦家，特颁给九狮军刀一柄，以昭殊绩”。特授谭浩明以勋三位，李静诚以勋四位；陈炳焜则给予一等大绥宝光嘉禾章。③ 可是，历史是无情的。这些闪耀在几个桂系头面人物面前的“荣光”，不过是西下残阳的几道回光罢了！1921年孙中山的“北伐讨陆”，注定了陆荣廷桂系败亡的命运。这是后话，留待现代史部分去评说了。

---

① 《移设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68页。

②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七四九、一七五一号《命令》。

第十七章　民国初年的广西社会

在陆荣廷桂系的集权专制和武力统治下，民国初年的广西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安定的时期。而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的多年混战，迫使他们放松了对外的扩张和掠夺，也给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民国初建的几年间，广西的农林、工矿、交通、商贸和教育等方面也都有过一些新的发展。但是，好景不常。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约，更因为桂系集团的巧取豪夺，政治日益走向反动，以致民国初年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畸形。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实惠，反而造成严重的祸害。因此，也就促使陆荣廷桂系政权的迅速垮台。

一、民国初年广西的政区建置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广西的行政区域仍然承袭清代旧制，称广西省，

省治桂林。[①] 同年10月，决定把省会迁往南宁，并裁撤桂平梧、左江、右江、太平思顺四道，废直隶州、厅，悉改为县。全省仍置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庆远、浔州、南宁、太平、思恩、泗城和镇安十一府，分管所属各县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州县等地方。[②] 府设府长，县置知事。不久，废府建置，于1913年2月请设邕南、郁江、漓江、柳江、田南、镇南六道。3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废府改道”的建议。以邕南道驻武鸣，辖宣化、武鸣[③]、上思等十一县及附近各土司。郁江道驻梧州，辖苍梧、怀集、桂平、郁林、信都等十五县。漓江道驻桂林，辖临桂、全县、中渡、平乐、永安等十九县。柳江道驻柳州，辖马平、怀远[④]、来宾、宜山、迁江、思恩等十四县及附近各土司。田南道驻百色，辖百色、凌云、天保、东兰等九县及附近各土司。镇南道驻龙州，辖龙州、崇善、宁明、靖西[⑤] 等十县及附近各土司地区。道设观察使，负责辖区内的军民政务。[⑥] 1914年，漓江、郁江、邕南三道分别改称桂林、苍梧、南宁道，柳江、田南、镇南三道名称不变，各道

---

① 1912年7月27日，北京政府颁布《省制草案》，其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订明，称省者有直隶、奉天、广西等共22个，见《（北洋）政府公报》第八八号《附录》。

② 1912年10月3日，北洋政府颁布各省议员复选区时，广西共分十五区，依次是：南宁府、武鸣府、上思府、梧州府、浔州府、郁林府、桂林府、平乐府、柳州府、庆远府、泗城府、百色府、镇安府、太平府、归顺府。其中武鸣府即原来的思恩府。而所谓上思、郁林、百色、归顺四府，想是划分选区时的误称，实际并未设府。选区划分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五六号。

③ 1912年3月，陆荣廷改武缘县为武鸣县。

④ 1914年1月，永安县改名蒙山县，怀远县改名三江县，同时改名的有永康县改名同正县，新宁县改名扶南县，安化县改名宜北县。

⑤ 1913年6月，百色直隶厅改名百色县，归顺直隶州改名靖西县。

⑥ 《（北洋）政府公报》第三〇八号《公电》、第三二九号《命令》、第五〇四、五〇五号《通告》。

辖地及驻地基本同前。①

在土官管辖的少数民族地区，或居全省中央，或在千里边地。幅员既广，形势尤胜。但是，经过历代“改土归流”，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所存已经不多。其中由于土官死亡而未请承袭，或虽然已经承袭而因案撤任的，至1907年冬，共计43处，经决定均停止申请承袭或者不准回任的，一律暂由汉员弹压，统俟将来入读新学的土族学生毕业以后，再“择贤请袭”。② 但是，不到四年辛亥革命就发生了，所谓“择贤请袭”已不可能。1915年，民政长张鸣岐请将南宁道属武鸣承审的安定、白山、古零、兴隆、定罗、旧城、都阳七土司，以及隆安县承审的归德、果化二土司实行改流，置都安、隆山、果德三县。1916年9月，又将南宁、镇南两道所属之土忠州、结伦、结安、都结、镇远、茗盈、全茗、龙英、思州与思陵改流，设置忠县、镇结县、龙茗县和思陵县。1917年6月，再将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司改设向都县。③ 民国初年，左、右江20多个土州、土县都实行“改土归流”，设置新县，余下的那些出缺的土州、土县，也是名存而实亡了。

二、滥征赋税造成的社会病态

滥发通货与苛捐劣税

广西的财政收支，向来入不敷出。前清时代，多靠两湖与广东的“协饷”

① 《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中国大事记》，同卷第二号，《中国大事记》。

②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张鸣岐奏，见《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一二。

③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中国大事记》第十一《内外时报》；第十五卷第十一号《中国大事记》。又参《（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六四号《命令》，第一一六六号《呈》。

帮助。辛亥革命以后，“协饷”中断。藩库存银90余万两，又被沈秉堃、王芝祥先后以率军北伐援鄂需要为名，提取殆尽。而大宗的军费开支和“机构层设”，陆荣廷桂系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有报告说：1913年6月，广西岁出不敷多达600万元，等于辛亥革命前财政亏空的四倍。[①] 为了解决广西严重的财政困难，陆荣廷政府除了向外借债外，就是肆意向人民增捐加税，进行横征暴敛，使全省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先是1912年5月，陆荣廷把广西官银钱局改组为广西银行，总行仍设桂林，另在梧州设立分行，以利于金融开发及对外举债工作。同时命令财政司长严端将广西银行原来印制之兑换券300余万元，尽数抛向市场，强迫民间使用。第二年3月，又命令财政司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定印1元、5元两种票额的钞票计800万元（一说1200万元）。限10个月印就，并把它逐步推向市场，与流行于城市的墨西哥鹰洋、中国龙洋、广东毫洋、香港毫洋、外省毫洋以及铜仙、制钱等硬币同时使用，而税收则以硬币为主。由于发行的钞票没有可靠的基金保证，1914年，广西银行资本“实银不足三、四万元”[②]。1918年10月，桂系政府以原宝桂鼓铸局址设广西铜元局，于次年鼓铸一仙铜元（当制钱十文）27万枚。此乃广西有史以来惟一一次自铸铜元。而军阀穷兵黩武，官吏挥霍无度，依仗权势，任意责令银行借贷，甚或随意提取。结果，银行现金被提用一空。毫无准备基金的钞票充斥城乡，币值日降，终至形同废纸。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而军阀、官僚却借此大发其财。[③] 据有人统计，从1912年至1921年，陆荣廷治桂期间，印发的各种面额的兑换券，有案可查者共为25471469元，连同沿用广西官银号、清末广西银行已经印成并且移充

① 1913年6月27日，广西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沈式荀向国务院财政部的报告，见《（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二四号《公电》。

② 周保銮：《中华银行史》第五编，《地方银行》第34页，（台）文海出版社。又据《（北洋）政府公报》第七六号《公电》载：1912年6月29日，陆荣廷曾致电袁世凯与参议会，请以各省解中央之款作为基金，发行纸币，各省一律使用，但无结果。

③ 参看廖竞天《广西银行史料》，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使用的3130000元，总计为28601469元，减去1916年为响应废两改元而报销的旧钞802800元，实发27798669元。[①] 如此巨额的无保证金钞券流通市场，其为害社会是可以想见的。

从统税做文章，也是桂系的"生财"之道。

对于原来已经实行的统税，桂系政府改取"招商承包"的办法，以保证财政的收入。其实施办法是：把遍布全省各地的税卡，比照原有的税额，招商承包，按月由承包者向政府缴纳应有税款。此种办法，虽然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承包商人为了获利，势必随意提高税率，额外增收税款，既加重了正当商人和消费者的负担，也影响了货畅其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滥发钞票、招商承包统税征收之外，陆荣廷还根据林绍斐的建议，以"筹饷"为名，从1912年开始，即在广西以鸦片走私，征收"赌税"、"花捐"等方法，搜刮钱财，积累财富。

民国初年，政府曾有禁种、禁运、禁吸鸦片的命令，并设立禁烟机构，违者处以极刑。[②] 但是，贪官污吏假借禁烟的命令，进行贪污纳贿，勒索谋财的勾当。陆荣廷本人，就放纵部属护送鸦片贩运，收取大量的保护费。当时，广西沟通云南、贵州和广东的鸦片之路有四条。贩运鸦片烟帮多结队而行，每帮多者可达一千数百人，他们多由军队护送。所贩烟土，有的多达50万两。每两收保护费3角，每百斤征收过境税银230两，收入十分可观。每年仅转运广东的鸦片即多达15.2万斤，可收过境通行税35万两。[③] 与此同

---

① 周堡銮：《中华银行史》第五编，《地方银行》。

② 1913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决议中央设立禁烟督察局，内务部设立督察禁烟处。见《（北洋）政府公报》，第六八五号《呈》。

③ 岑建英在《广西百色的烟帮》一文说："一九一六年以前，百色未有鸦片烟帮。"当时陆荣廷禁烟还是"比较认真"的，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但黄绍竑在《新桂系与鸦片烟》；郑家度在《陆荣廷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等文中，也都以具体的事实，同时揭露了陆荣廷放纵鸦片走私，贩烟筹饷的情况，分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二十一辑。

时，陆荣廷又以“缉查烟土”为名，掠夺鸦片商贩。百色是陆荣廷早年活动的地区，也是云南、贵州鸦片和土特百货集散、转运的重要市镇。在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十余年间，一直把百色视做禁脔，非与陆荣廷有特殊关系的队伍，绝不让在那里驻扎。而陆荣廷的部属，也有直接从事鸦片贩运牟取暴利的。①

陆荣廷桂系既大开烟禁，而又私运鸦片以牟利。于是，“珠江两岸，全黑化了”。尽管广西许多地方不适于种植鸦片，然而在暴利的诱惑下，以致部分地区（主要是桂西高原地区）“所有肥田，因当局勒令种烟，人民赖以生活之谷物，顿形减少。米珠薪桂，饥馑迭告，拆骨烹儿，司空见惯”！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大受影响，这又是桂系之一大虐政。②

赌博是社会的又一病态。而陆荣廷却明目张胆地以开赌筹饷，使赌博合法化。在他的都督府财政司之下，设有“广西筹饷局”，负责召集各州县的土豪、劣绅、赌棍开设赌馆，承包赌税。据统计，1912年，广西全省仅征收赌税一项，共计360余万元。1916年，开赌“筹饷”公开化，且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招商投筒承包，由省总公司规定各县饷额公布，限期投筒，以出最高额者为取得承包权；由承包人招商投于区，区及于各团、各乡，赌博遍县境矣”！③ 桂西的龙州，亦因此而赌博之风满城乡了！④

随着烟馆、赌场的广泛存在，娼寮、妓馆也随处可见，收取所谓“花捐”，就成了陆荣廷政府“发财”的又一重要门道，而且通过政府的提倡使之合法化。早在1912年10月28日，陈炳焜就以龙州军政分府的名义，核准辖区各属“开设娼寮”，实行商包“花捐”。⑤ 百色一处，仅在河面就公开出现了三个“水寨”，内有妓女百余人。“入夜则锣鼓喧天，笙歌聒耳，嫖赌饮吹，

---

① 据说陆荣廷手下的一个团长贩运鸦片，箱上贴着“郁林五属硝磺公司”的标记，到处销售。

②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623、628页，三联书店，1957。

③ 姜玉笙：《三江县志》卷三，《政治·税捐》。

④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

⑤ 叶茂茎：《龙州县志》卷一五，《纪事略》。

色色俱全”，成了烟贩、富商、官僚、军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场所。① 南宁在迁省后，在邕江上也建筑所谓的“牌筏”，“以勾引顾客，每妓夜渡资索价四、五元，而开厅叫局，弦索彻宵，议员政客，辄借此为运动之场，缠头之费，黄金挥斥，视同瓦砾。军政要人，又常招至公馆衙署，演艺侑觞。一时莺莺燕燕，奇装诡服，招摇过市，遇者疑为误人天台，惜自顾非刘阮也，此为邕江花界最发达时期”。② 在陆荣廷桂系统治下，整个广西，也因此成了烟、赌、娼、盗“四多”的世界。

“验契”与“清赋”

陆荣廷桂系“筹饷”聚财的另一重要手法，就是进行所谓“验契”与“清赋”。因此而负担最重的，也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1914年1月，桂系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验契”，征收“验契”税。按袁世凯北洋政府公布的契税条例规定：凡条例公布前之旧契须一律呈验。每张交纳验费1元，另交注册费1角。一年之间，通过检验田房地契，广西共收入“验契费”2541454.8元，另有“契税”实收为28088.87元，还有当税实收为12835.705元。三项全年共收2582379.375元。③ 有的地方官府在验契时竟命“令田契重印，供银一元，则无契而自行写造者，亦准盖认”。论者讥为“数百年来未闻之新政”。④

第二年，又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清理田赋”，先设“清赋总局”，以财政厅长孔昭焱为总办。3月，孔昭焱去职，改由田承斌负责。按照所颁“清赋”章程，取消以丁折米旧制，改两为元，厘定产谷百斤，征银一角；杂粮百斤，征银六分。仅当年即增加税收150多万元。⑤ 这次“清赋”，对于“改土归

① 黄绍竑：《新桂系和鸦片烟》。

② 莫炳奎：《邕宁县志》卷四〇，《社会志·娼妓》。

③ 《（北洋）政府公报》，二九八号《附录》；第九二〇号《命令》。

④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〇，《食货下》。

⑤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〇五九号《呈》。

流”的少数民族地区，剥削尤其严重。因为左、右江各州、县、峒，过去为土官统治，实行劳役或实物地租，没有征收田赋的货币地租。少数开荒的所谓“粮田”，缴纳钱粮甚少。而“改土归流”以后，钱粮逐渐增加，但也只比原额增加百分之几十而已。1915年桂系政府的“清赋”，如依原定章程，应先行清丈田亩以定产谷数额。每产谷百斤，征正赋毫银一角，并废除丁银、民米各项复杂名称。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以清丈田亩、评定田产为据，而是由州、县官自由上报，多报者有奖。于是，各地方官多“迎合意旨，专在加赋，不问地产几何，各依前清赋额责令增加若干成，甚至一倍或数倍不等”。[①] 是以，营私舞弊之事，比比皆是。西林县知事姚传骥，清赋时“希邀上赏，不体民情，剥肤及髓，严勒各调查员再三反复加多产数，以遂其奢望。是以西林清赋竟达六千余元之多！弹丸小邑，民生凋敝，从此生计日更维艰矣”[②]！贵县“知事万武办理清赋，不实行清丈，只将原日粮额加三成后伸算银元，其应纳一角者，即定其田亩产谷为一百斤。名为清赋，实则加赋也”[③]。武宣县奉令后，“官绅协商办理，议在就近之年中比较收入，以何年实征得多收入者为率，随调查收入最多之年是九千元，即决议照此额数加一倍，征收一万八千元”[④]。而地富豪绅结纳官府，可以少加或者不加；一般平民百姓，则听任恶吏劣绅为所欲为，无可申辩。故在各州县中，普遍存在“有田无粮，无田有粮，重益加重之弊”。是以广西自从1914年奉令“清赋”以后，非但沿河富庶之区如桂平、贵县、平南、横县等地田赋陡增一倍或数倍，而左、右江“改流”后的各州、县、峒，其增加钱粮田赋，更远比过去多出数倍或者数十倍。具体情况见下表：[⑤]

---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八，《食货上·田赋》。

② 杭汝珖编：《广西西林县志书》，民国十二年抄本。按：杭汝珖曾任西林县知县。

③ 梁崇鼎等：《贵县志》卷七，《经济·田赋》。

④ 庞赓辛等：《武宣县志》第三编《政治》，第二十一章《财政》。

⑤ 以下两表，皆根据刘锡蕃《岭表纪蛮》第七章，《赋税的今昔》。

1915年左江州、县、峒增加田赋表（单位：元）

州、县、峒名	清赋前旧额	清赋后新额	增加倍数
龙　　州	1050	11937	10倍强
下　　冻	105	3126	30倍弱
上　　龙	256	4927	19倍强
宁　　明	408	6167	15倍强

右江“改流”各县，1915年“清赋”后的钱粮田赋，也普遍增加。请看下表：

1915年右江各县增加田赋表（单位：元）

县　　名	清赋前旧额	清赋后新额	增加倍数
镇　　边	3958	12274	3倍强
凤　　山	106	8002	75倍强
隆　　山	932	10331	11倍强
都　　安	932	13315	14倍强
果　　德	932	12531	13倍强
那　　马	2984	14779	5倍弱

其他如西隆、西林、凌云、天保等县，1915年“清赋”以后，也比原额增加1至4倍不等。而东兰县田赋新额较旧额增加10倍有余。[①]

还必须指出的是：“清赋”后的田赋征收，多作包商制。承包者多是有权

① 据《东兰县政纪要·田粮项》说：“本县初无田赋，宋、元、明时，土司以田赋为对象而征贡。到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始有田赋，全县共纳银五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民四年，重新调查全县田亩；民五年，实行清赋，全县赋额计一万零八元。”按一元合七钱二分计，共为七千七百七十六两。故较原额增加十倍有余。

势的土豪劣绅或奸商，或者是县官的亲族。他们在承征时上下其手，营私舞弊，鱼肉乡民。以凌云县为例，全县田赋分作160亭开征，如征某亭，须先向官府缴交二三百元，名为“垫柜”，官食“垫柜”，而承征者可以在正赋外多收，以抵“垫柜”所出。如每纳1元，收割“飞银”1角等。而“所用货币，多是法元、袁元，一切税收核算银水，均以廉收重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①] 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土官应交的官钱，又多加在农民身上。有“龙州小吏”某氏作的《竹枝词》为证，词曰：

谷收年计百千箱，坐享丰盈岁月长；
边地普遍成惯例，不归田主纳官粮。[②]

旧的官粮如此，新的田赋自然也可以如法炮制。此外，桂系政府还经常借口举办各种事业的需要，随时巧立名目，向人民肆意勒索。前清在举办“新政”名义下久已存在的“警捐”、“学捐”、“屠捐”等等，辛亥革命后许多地方依旧保留下来。

陆荣廷桂系的这一套“增收”办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赞扬。1914年12月，“验契”已见成效，“清赋”正在进行之时，袁世凯的政事堂即命令桂系政府汇报经验，继则给增收各县知县以各种奖励，规定凡增收达到1万元者，即可发给五等金质双鹤奖章；超过1万元者，则按其数目多少发给一至四等金质双鹤奖章。[③] 这实际是公开鼓励各级官吏放手对人民进行敲榨勒索。

面对桂系的验契、清赋，名目繁多的苛捐重税，大大小小的污吏贪官，人民深恶痛绝，自不待言。1916年，一块高约2米、宽近1米，上书“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八个大字的“劣政碑”，竖立在桂北灵渠之畔。被指名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虽然只有“兴安知事吕德慎”一人，实际却是广西人民

① 岑家文：《广西民政视察报告汇编》。
② 刘敦安：《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载《中国农村》第五、六期合刊。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九三〇号《命令》，第九六三号《呈》，第九九一号《命令》。

对陆荣廷桂系推行种种劣政的愤怒抗议。①

三、花多果少的实业建设

领垦荒地，发展农林

广西农业素称落后。辛亥革命以后，落后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变。1910年，全省人口共计896万余人，耕地面积968万余亩，人均耕地不及1.1亩，②少于60年前1.2亩的水平。而大部分耕地仍旧掌握在地主、富户和官府手中。由于社会变革及其他因素，公田私有化的现象各地多有出现。因为地少人多，地主、官府大量增加租赋，浮收勒索之事充斥城乡。③ 广大农民非但没有因为革命变革得到实质性的利益，而且天灾人祸频仍，加以生产条件落后，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仍旧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不断，土地既不怕盗贼，也不忧水火。所以，土地占有者满足于地租剥削，直至民国初年，官绅富户直接投资农村、从事粮食的资本主义性质经营者，实属罕见。而投资设立各种农垦公司，以"领垦"之名，行占有之实，在大片荒地上从事林业及其他经济作物耕植者，在清末开发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据政府报告，仅从1912年至1916年，在

① "劣政碑"刻的是："浮加赋税　冒功累民　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　中华民国五年立"。

② 《广西通志·人口志》，2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广西通志·统计志》，5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③ 蒋良术：《灌阳县志》卷二一述清末民初该县浮收勒索情形："纳谷之时，数十里肩挑背负，及运至仓，书吏等又多索费用，虽极干圆、洁净，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纳者。……稍不满意，即为挂欠，令其补纳。大约完谷一石，其耗费已需至数石矣！"

广西投资开办的各种垦殖公司即达35家之多，而1917年至1921年，因为政局动乱，开办的垦殖公司仅有4家。据统计，民初五年间设立的公司，占清末以来直至1921年广西全部垦殖公司的百分之五十八。① 且举数例说明当时经营的一般情况：

1912年，创设于邕宁县北高峰隘的正气种植公司，资金3万元，种植大茴香树30万株，肉桂16万株，其他树木30万株。

1913年，亦创设于高峰隘的企永种植公司，投资6万元，种植大茴香树140万株，肉桂6万株，桐树30万株。

同年，由广东商人张伯乾投资5万元，创设于贵县北山的广利种植公司，除种植桐树、肉桂30余万株外，还种蓝草制靛。

1915年，创办于天保县靖（镇）安区的崇本林业公司，股本1万元，种植大茴香树100万株。

还有济福有限公司，原是1909年龙济光投资2万元在邕宁（旧宣化）创办的。1911年因革命军起而停办。到了民国初年，因受举办垦殖公司热潮的鼓动，由曹有明、龙绍乾投资12万元再办。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时期所办的35家种植公司，有的是以公司的名义集体领垦的，而更多的公司则是用私人的名义领垦的。以上所举的几家公司的经营情况，乃创办后经过多年努力的成果。他们种植的树木，又以可以加工茴油、桂油、桐油出口，而且经济价值很高的树种为主。有的公司，如济福有限公司，虽然增加了投资，申请领取了比较宽广的荒地，但仍然是出租给农民，采取“借资出租”的经营办法，“变成一个地主债主结合的组织”，② 失去了资本主义经营垦殖的性质。

在粮食农业经营步履艰难的时候，广西当时最有前途，可以“行销外洋，获取厚利”的物品，就是一些地方特产了。如桂平、平南的桂，恩阳、恩隆、

①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55～57页，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

② 《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59页。

靖西、天保、奉议、龙州的茴等等。它如遍及全省各地的桐、茶、桑、麻和松、杉等，也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① 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举办国货展览会，广西送展入选的产品，除了河池庆云公司和富贺官矿的锡砖以及少数手工艺制品外，主要是天保镇安林业公司的茴油，李荣英个人送展的桐油以及其他地方、单位或个人送展的桂油、茶油、茶叶、八角、木材、蚕丝、白花草、葛仙米等农副产品，没有工业产品。广西送展的展品，无一样获得大会特别奖，获一、二、三等奖及褒奖的共57项，只占全国展品得奖总数的百分之二强。②

民国初年，棉花和花生的生产，在一些地区也得到了发展。1916年，谭浩明、李静诚以灵川、义宁、阳朔、平乐四县天气高温，肥料易得，人工低廉，旷地亦多，于是会同地方士绅尽力提倡植棉。经过四年的努力，所产棉花，"大致已能与通棉媲美"云。花生的种植，从1910年起，十几年间，广西的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150万亩以上，几占全国花生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八；年产花生近500万担，占全国花生产量的百分之二三。③

当时，北洋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农业，曾经采取一些与农事有关的措施，命令全国遵行。

一是饬令各省成立农会。1912年9月24日，北洋政府农林部参照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工商部奏定之"农会章程"三十五条，改订成"农会章程三十六条并实施细则九条"。11月6日，由农林部"转饬各省遵章照办"。1913年3月，广西省农会成立于省城内，会长王树槐，副会长莫景恒。于是，南宁、上思、桂平、永淳、郁林、下冻土州、崇善、信都、灵川、罗城、凌云、武宣、灌阳、养利、平乐、陆川、横县、凭祥和昭平等县（州）也相继成立了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六六号《呈》。
②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第二八号《示》。
③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9、227页。

农会。①

二是要求各省建立“农业试验场”，同时责令各省和县“广设苗圃”，其工作则由各省区道尹及省、县农会负责筹办。规定省农会办之苗圃，面积须百亩以上，县农会苗圃30亩以上。并应讲求良种，“各依种类分编种植法”。以上各项要求实施的结果，只见1914年7月农林部“发给广西巡按使公署刺槐种十斤”。1915年11月，田南道百色县报称建立了火神庙苗圃，经费2500元，面积及树种则欠报。② 至于省建“农业试验场”，直至1927年始报告成立，远远落在全国许多省区之后。③ 由此可见，当年成立的农会，并不能反映农民的愿望，维护农业经营者的权益。它的出现，只是“民初政治”的摆设而已！

工、矿诸业生产的滞后

论及民国初年的广西工业，也十分落后。如前所述，1912年，堪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资本，只占全国工业资本的0.016%，与同年的广西钱庄典当业资本相比，不到1.3%。说明民国以后的广西近代工业生产，也是基础薄弱，举步维艰的。至于一般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开办，民国建立以后的头两年，也难与全国的许多省区相比，而且已经开办起来的厂家，也多呈倒退状态。请看下表：

---

① 《（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第二八号《示》。按：1910年6月，曾按光绪三十三年章程在桂林成立广西农务总会，推举蒋实英为总理、梁廷栋为协理，滕光松等30人为董事，以推动各属成立分会。通过调查、宣传、陈列等手段，振兴农业。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五四六、五四七、五六〇、五六一号《附录》。

③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82页。

1912～1913年广西16种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统计表①

行　业	年　份	家　数	职工数	全国家数
织物业	1912	5	146	2130
	1913	5	232	1289
成衣业	1912	25	249	987
	1913	6	50	547
染纺及漂洗业	1912	7	73	265
	1913	2	19	255
窑瓷业	1912	18	16721	2214
	1913	4	94	1875
制油及制蜡业	1912	8	70	1703
	1913	10	88	1014
染料及颜料业	1912	—	—	73
	1913	1	15	52
制香烛业	1912	10	188	264
	1913	2	67	107
酿酒业	1912	—	—	1387
	1913	3	36	2445
制糖业	1912	4	32	728
	1913	3	27	975
制烟业	1912	21	294	996
	1913	15	194	760
制茶业	1912	3	44	617

① 据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433～447页附表编制。原表列全国各省区的25个行业进行统计，广西缺棉织、制线、刺绣、针织、造纸、制漆、火药火柴、洋皂烛业和糕点制造九个行业。

行　业	年 份	家 数	职工数	全国家数
制·茶　业	1913	—	—	703
印刷刻字业	1912	1	10	50
	1913	1	20	56
纸制品业	1912	—	—	115
	1913	2	96	304
竹木藤棕柳器业	1912	8	90	631
	1913	2	24	599
毛皮革制品业	1912	16	195	427
	1913	30	342	551
玉器牙骨介角制品业	1912	—	—	57
	1913	7	94	69

据上表可知，1912年全省的坊、场为126家，职工18132人；1913年的坊、场为93家，职工1196人。两相比较，无论是厂家或职工数，1913年比1912年都减少很多。到了1914年，广西的手工作坊或工场只有56家；1915年，增到74家；1916年为76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16个行业的所有厂家中，直至1916年，没有一家是使用原动力进行生产的。① 从总体看，民国初年广西的所有手工业，其经营规模小，设备和技术条件差，生产难以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具体分析一个行业，例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针织业。1915年，广西从事针织手工生产的有3168家，从事此项劳动的共3838人，平均每家1.2人，基本属于单干户。其中女工3524人，男工314人。女工与男工相比为11:1强。生产品种有衬衣衬裤、手套、袜、汗衫、毛巾和其他针织物。年总

① 参看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448页，以及书后附之《全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与不使用原动力统计表》。

产值为326573元，年人均产值只有85元。如果与广东相比，则广东在同期内从事针织业的人数只有3757人，年总产值为1283699元，年人均产值多于343元，为广西年人均产值的4倍多。①

当然，广西当年也有少数规模较大的工厂，如1917年11月在南宁对河开办的张德（Chang - Teh）织染厂，投资1万元，有旧式织布机80架，雇佣男女工人150人。月产棉布约1000匹，同时还织造毛巾和床单。另一家是设在城内的富永德染织厂（Fu Yung Teh Dyeing and Weaving Factory），资本2万元，有织机150架，工人320名，月产布约2000匹。两家工厂所产布匹，几乎全在当地销售，多半用做士兵制服，只有少数运往内地。织布工人是从桂林和湖南招募来的。男工每日工资为0.75元至1.5元不等，纺纱工则全部在当地招收女工，日工资为0.2至0.35元。② 类似张德和富永德这样的设备与生产规模的工厂，在当时的广西是不多见的。

有些原已兴办的行业，如苍梧县的手机缫丝，昭平县的手工造纸，辛亥革命以后仍在继续发展。据调查，民国初年，广东南海、顺德两县商人到苍梧长洲投资创办机器缫丝厂的就有20多家，③ 而拥有70多年生产历史的昭平造纸业，民国初年，它的产品仍旧是该县的"出口大宗"④。

论及民国初年广西的矿业，可以一言以蔽之，有些矿抓住了机遇，取得了短时的发展，而不少老矿因为政局或政策的变动，却出现了不少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锑的需求甚切，锑价猛增，广西锑矿的开采、

① 梁崇鼎等：《贵县志》卷一一，《实业》载：20世纪初年，西方缝纫机已经传入广西。光绪、宣统之交，梧州、桂林、南宁等地已出现用缝纫机缝制服装的缝纫店，并迅速传入各县。宣统年间，贵县已有缝纫机数台，"机声轧轧，比户相闻"。一般是一店一人或数人。又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665页，《1915年中国各省针织业之分配》。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669～670页，据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③ 谭汝南：《梧州工业史漫谈》，见《梧州市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

④ 李树枏等：《昭平县志》卷六，《物产部》。

冶炼和销售盛极一时。仅宾阳一县，即有锑矿公司10余家，矿窿数十个。河池野车河八面山四周，采锑厂多达80余家。[①] 在广西的另外一些地区，民国初年，出现了一股申请探矿和采矿的热潮。1913年8月5日，天河磺矿尚义公司总理梁世华经过申请，取得了开采天河翁峒山硫磺矿的经营执照，矿区面积183亩3分3厘3毫。1915年元月11日，两粤商办广福矿业有限公司代表吴友仁，请准在吴村乡保卫团忠良段红花卫探测银矿，面积272亩42平方丈有奇。同年12月14日，庆云锡矿公司以简肇承为代表，同时取得了河池南丹土州邑黎村、河池塘垅河等六处的锡矿开采执照，面积共计1109亩15平方丈，另有塘垅河延长5里99丈9尺的地段。[②] 从地域看，集中于河池及桂西的小部地方，以锡矿的探测、开采为主；就效果论，只反映了当年绅商对矿业开采的积极性，尚无任何实际结果。

至于老矿，如当年盛极一时的富川、贺县两地的锡矿和煤矿，按规定，凡新开之矿，从1914年11月起，可以免交矿区及出口各税三年。但民国以后，富川、贺县两地，“匪患频仍”，“盗风猖獗”，所有各处开采锡砂之窿口、庄头纷纷停办；荒僻之区，虽矿苗丰富，亦不敢问津。而且“物价则较以前倍涨，锡价则与往昔相同，所得不偿所失”，是以矿商亦多裹足不前。矿局停办日久，机器诸多锈坏，如欲增添设备再办，则又经费难筹。面对种种困难，也只有忍痛停办了！[③] 以历史悠久、实力雄厚著称的富川、贺县矿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电力的开发与使用是近代广西工业的一束新葩。

南宁电力公司创办于1914年。徐儒阶、陈叔仁经广西省政府批准，在军政界中招股集资20万元，从国外购进发电机成套设备，于是年12月在南宁安装完毕，正式开机发电。1919年，共装电表1500多个，用灯114000余盏。[④]

---

①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164页。
② 《（北洋）政府公报》，六〇六号、六一七号。
③ 富贺矿局李春晖的报告，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五八五号《命令》。
④ 莫炳奎等：《邕宁县志》卷二九，《交通二》。

梧州电力公司创设于1915年。由商人林德昭、余瑞初等经营，在龙母庙山上设厂，安装100匹及200匹马力发电机各一台，发电可供13000盏电灯照明。但因管理不善，电力不足，效果不佳。

桂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由粤商英甫臣等集资9.5万元兴办，以黄冠辉等总其事，厂址设于象鼻山附近。1916年从香港购进42和44千瓦电机各一台，第二年安装完毕，开机发电。但因机器设备与技术力量太差，加以管理不善，故多有亏累。

柳州电力厂是1917年集商股资金5万元开办的。厂址在城内斜阳街，置有40和48千瓦发电机各一台。1918年开机供电，年有获利。到了1921年，因社会动乱不安，且技术力量缺乏，于是走向亏累。

平乐协力电力公司，由伍绍周、张伯秋等于1918年集资兴办，股本5万元，在城外半边街设厂，有45及70匹马力发电机各一台，开办初期进展顺利，但不数年亦屡遭亏折。

百色日光电灯公司创办于1919年，由何庚心等集资经营，因资金短缺，属试办阶段。①

民国初年广西电力工业的建设，全部使用火力发电，水力的开发和利用尚未起步。而所有电力，多用于生活照明，以电力作为生产动力的亦未见报道。在广西，电力的发展如同农林、工矿的发展一样，一方面，常受资金、设备和技术的制约，而资金的短缺尤为关键。陆荣廷桂系政府成立初期，也曾打着兴办实业的旗号，计划向广东农工商业公司贷款50万金镑，用以设立实业银行，举办“资本少而获利厚”，“原料富而制造易”，“行销广而为日用所必需”以及“适于土宜者”的林业、矿业与制革、棉麻纺织等工业。② 但只是纸上空谈，并无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安定的社会环境，又是经济发展

① 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79～84页，1940。又据1911年海关报告：梧州电灯机器厂业已建成，只“以资本不足，尚未开办”营业。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825页。

② 《（北洋）政府公报》，四九六号《呈批》。

的重要前提。这是民初广西农林、工矿业兴衰史留给我们的十分重要的启示。

商业和对外贸易

由于工农各业生产的停滞落后，直接影响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1915年，广西巡按使张鸣岐用了两个月时间，巡视了广西23个州县，回署后在一份报告中，对广西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作了两点基本的估计：

一曰广西一省之大，若论工艺，“曾无特种制造品物行销外省，亦无特设工厂收纳贫民，其窳劣可想。人民生计大半在农”。

二曰“梧州、龙州、南宁三处虽为通商口岸，其实邕、龙两埠外人交易甚少，商务并不为繁；梧埠较盛，近以欧战影响，亦大减色”。“其余各属，大都寻常贸易，小本经营，不足以言商务”。①

在这种情况下，外地货物充斥大小圩市，对外贸易极不景气，关税收入大量减少。且看1913年12月与1912年12月的各关税钞表，即可见其大概。

1913年12月与1912年12月各关税钞表（单位：两）②

关名	1913年12月新关税钞数目	1912年12月新关税钞数目	比　较
梧州	48576.723	64166.841	-15590.118
南宁	10780.019	8524.232	+2255.787
龙州	372.659	231.237	+141.422

由上表可知，1913年12月南宁、龙州两关税钞，较1912年虽有增加，但两关收入的总值尚不到梧州关同期减收的六分之一。1914年2月，梧州关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六六号《呈》。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六五五号《公文》。又：同一时期，北海关1913年税钞数目是7724.438两，1912年12月税钞数目是11397.623两，两相比较，减3673.185两。

税钞收入为57644.009两，比1913年12月增收9067.286两，都仍比1912年12月少收6522.832两。同期，龙州关税钞收入为599.728两，较上年12月增收227.069两。而南宁关则只收税钞9222.446两，较上年12月减收1557.573两。①1916年与1915年相比，梧州、龙州两关也是减收多于增收，其中1916年8月梧州关较上年同期减收达18000余两之多。②

另一方面，由于鸦片、赌博、娼妓等社会病态的蔓延；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生活的腐化，虽然在城镇出现了某些重消费、少生产的虚假繁荣，而对外贸易却连年入超，对于国计民生影响至大。且看民初十年间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对比，即可明白。

民初十年广西进出口货值比较表（单位：海关两）③

年　份	进口洋货值	出口土货值	出入超值
1912	10510006	7145224	-3364782
1913	11404518	7053184	-4351334
1914	11046230	6606643	-4439587
1915	10182207	8578398	-1603809
1916	9557200	10535017	+977817
1917	10680796	9291055	-1389741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七〇八号《公文》。1914年12月，北海关税钞收入为8289.111两，较上年12月增收564.673两。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三九、二四三、二四六、二四七、三三四、七二二号《附录》。

③ 本表所列数字，系以梧州、龙州、南宁三关净数合计。根据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对外贸易》部分提供资料编制，民国二十二年。

年　份	进口洋货值	出口土货值	出入超值
1918	10436363	9417833	-1018530
1919	12479179	9168491	-3310688
1920	12864083	9368584	-3495499
1921	8406126	7299304	-1106822

从上表所列民初十年广西的对外贸易情况看，只有1916年出超近100万海关两，其余几年皆处于入超地位。其中1915年、1917年、1918年以及1921年入超较少。而洋货进口在1918年以前也始终徘徊在1000万海关两左右，并不能有大的增加。这是因为：1914年至1918年，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正纠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它们被迫放松了对中国的输出。1916年正是欧战的紧张之时，是广西在十年对外贸易中仅有的出超年，与此当有关系。可惜，陆荣廷桂系政府没有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做些增加生产，促进出口，保护商贸的工作，却任由外地商人和国际市场在价格、供求等方面的支配。且举桂平当年的对外贸易，即可概见其他：

……幸轮电纷驰，土物出境倍于以前。山间物产外销，获利不少。而家畜鸡豚亦各载之舟中，随大江东去，售之港澳，日日不休，宜乎民生日进也。

但是，这种家畜鸡豚乘舟东去，农副产品商品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非主观所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

而客观实情，则价格为港政府所操纵。货既入港，停搁不售，则旅费又增；苟待价而沽，则所得不敌所失，间关跋涉，仅博蝇头微利，犹不及彼方酬庸之费，心非所甘，遂购运海产洋货归售于乡，意谓千里远行，不至辜负。然反顾境中，土物日贵，外货滋多，则

一出一入，无异以资本博充港商贩奴，于地方生计无裨也。[①]

广西和广东、福建，素为我国主要产糖之地。所产砂糖，除供内销外，其余输出欧美、日、韩诸国。后因遭受欧洲甜菜糖、爪哇粗糖与香港精糖排斥，贩路日渐收缩。至民国初年，不惟海外输出全行杜绝，即国内市场亦为国外所夺。[②] 还有桂平出产之桂油，乃西人制造香水及军家用品所必需。故数十年来，为出口大宗。“欧战既起，销流锐减”。[③] 而因欧战所需，盛极一时的锑砂矿开采、冶炼与出口，则因“欧战结束，锑价猛跌；加以地方治安状况不佳，各锑厂相继停办”。[④] 这一切，又充分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国度里民族工业和商贸事业的虚弱。

因为工农业生产停滞，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军政开支漫无限制，造成省库严重亏累。到了1916年，全省岁入预计4221773元，岁出的经常和临时经费预计为5597221元，收支相较，不足1375448元。[⑤] 其抵补的主要办法，也是加强向人民搜刮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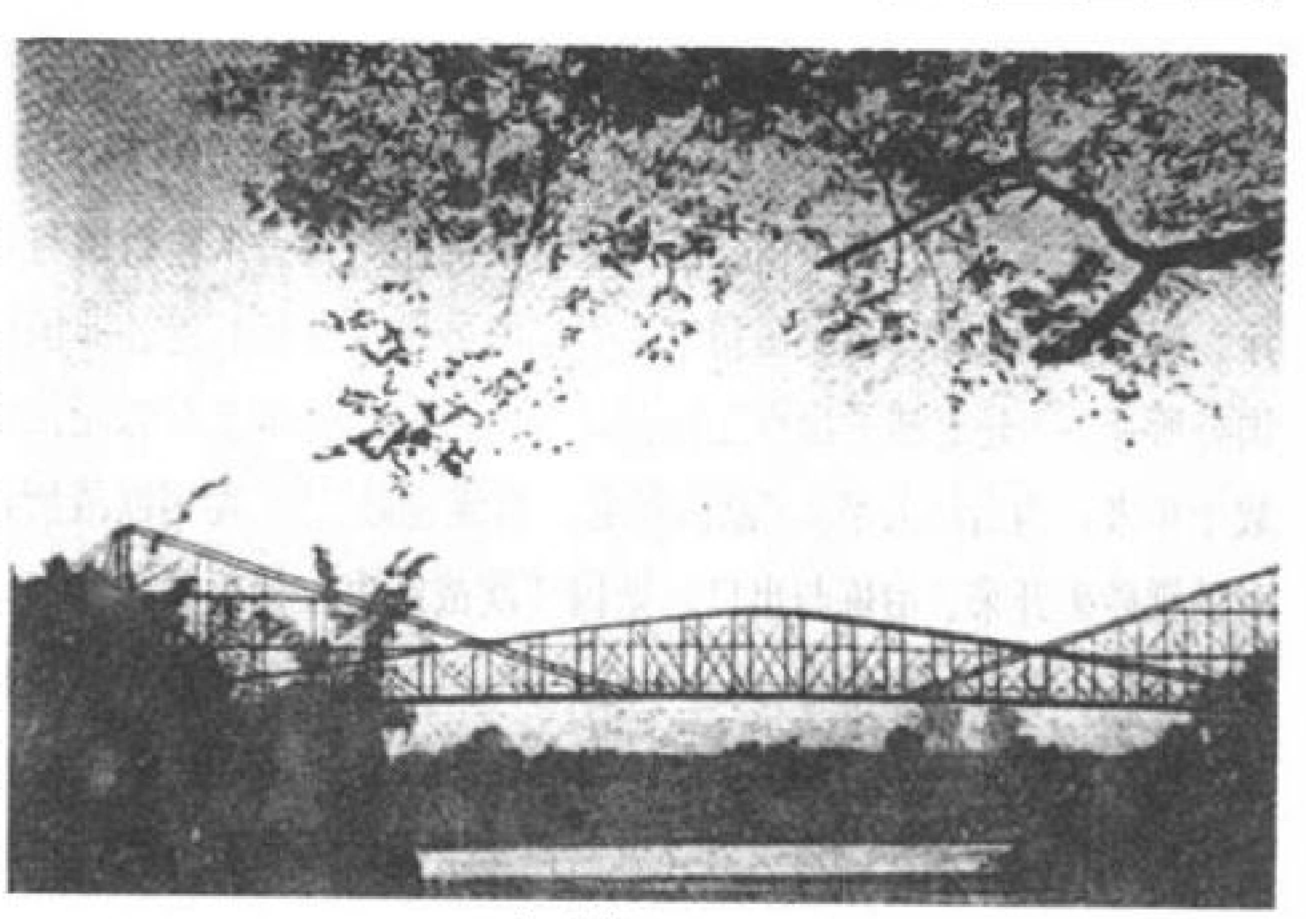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

商业贸易的发展，是和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彼此关连，互为促进的。民国初年，由于“货畅其流”和军事调动、政务联系等的需要，广西的水陆交通和邮电通讯事业，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首先是公路的修筑。1915年，陆荣廷派遣陆军工兵营，修筑了从南宁经武鸣直至他的老家宁武的公路，全长52公里。因为经费不继，时局动荡，几经波折，直至1919年始告竣工。1917年，谭浩明任广西督军，采用裁兵一营

---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食货中·民业》。
②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39页。
③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食货中·民业》。
④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164页。
⑤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下册，附录《民国五年度广西省岁入岁出分预算表》。


龙州铁桥侧面

的办法，以其经费，招募民工200余人，在苏元春原修军路的基础上，修筑了从龙州到他的老家水口关的公路33.5公里。1921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陆荣廷，又下令以苏元春早年修造的军路为基础，下令修建龙州至镇南关的公路。1923年竣工通车。他们还先后拨款修建了龙州铁桥和水口街铁桥。[①] 尽管修造这些公路和桥梁是为了方便自己和桂系军事上的需要，是凭借权势建筑起来的。但到底是办了几件实事，用从百姓身上榨取来的民脂民膏筑路修桥，总比拿去花天酒地，或者买枪置炮打内战要好得多。而且，广西之有近代公路，就是从邕武公路和龙水公路开始的。

民国初年广西航运业的发展，除了贸易和军事运输的需要外，也和鸦片贩运等有一定联系。据北洋政府交通部通告，从1914年至1921年，广西经过核准注册并发给执照投入营运的大小轮船，年有增加，具体情况如下表：

① 张若龄等编：《广西公路史》第二册，第二章《公路的萌芽与创建》，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广西核准注册给照营运轮船情况表（1914～1921）①

年　份	注册船只(艘)	轮船吨位(吨)	资　　金(元)
1914	2	163	28000
1915	4	377	61000
1916	19	5715	514016
1917	2	298	36000
1918	13	3241.49	451300
1921	1	48	8500
合　计	41	9842.49	1098816

从上表可见，民初广西航运业的发展，主要是欧战中、后期的1916年和1918年。但是，注册领照的船只共计才41艘，总吨位不到1万吨，总投资不及110万元，其中没有一艘达到千吨，最大的一艘只有907吨，另有10艘为400吨至800余吨，其他多是100余吨或不足百吨的小船。经营者多属私人，以公司名义注册领照的只有西江船业公司和安行公司两家。营运航道以梧州至南宁，梧州经广州至香港为主，桂江、柳江和左、右江等内河，因为河道不畅，商贸不旺，所以在这些河道营运的多是百吨左右的小船。从航运业的盛衰也可以窥见商贸的旺淡，以及国内与国际的风云变幻。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商贸经营和军政信息的传递日显迫切，广西的邮电通讯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是邮政事业的开办。

① 本表主要根据《（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二七、一二九号《示》；第二七〇、三三二、四三五、七五九、七九四、八〇二、八二四、八八六、九二六、九四四、一〇〇四号《通告》；第七八〇号《公文》以及一八三〇号《公报》等所列的资料编制。

早在1901年7月，海关税务司阿理嗣（J. A. Aalst）向赫德建议，在中国各直省省城及府、州、厅、县广设邮政分局，用火车或轮船、或马匹、或人役依时寄送邮件。第二年7月，邮政总办帛黎（T. Piry）绘成中国邮政总图帖说，海路以“上海为各埠总枢纽”，“由最南之广东廉州府之北海沿海各埠，直达海路最北之盛京之营口”。“广东邮路，除径达各省口岸外，仍可沿西江直抵南宁。”当时，由梧州经平乐至桂林；经南宁、百色至云南之广南、开化直达蒙自；经浔州、柳州、庆远至贵州，各邮路已经开通。另从桂林经湖南永州、衡州至湘潭，以与岳州、长沙沟通的邮路，也在筹建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推广，次第扩充，全国划分邮界与分邮界45处。广西与广东、云南同属广州邮界统辖。梧州则设副邮政司，北海、龙州设邮政帮办专司其事。①

1906年，清政府建立邮传部，决定接管由海关兼办的邮政。因为帝国主义的阻挠，直至1911年始办理移交。但邮政总办仍由法国人帛黎充任，邮政管理和人事制度依然沿袭旧制。至1913年，邮局已“遍布内地”，广西各县皆设邮局。由于财政困难，为了节省开支，邮界及分邮界转依行政区域删并为21个区，每区成立邮务管理局，设邮务长一员。广西邮务管理局于1914年3月设在桂林。时北洋政府任命阿林敦为广西邮务管理局邮务长，②邮政管理权依旧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因为邮政有助于商民的信息传递、物资投寄和银钱汇兑，所以发展日益迅速。1912年全省有邮政局、所192处，1914年增至255处，1915年以后，邮政局、所增设不少，业务发展尚称正常。其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二编，《中国海关与邮政》第二章，《邮政总局的开办和发展》（1896～1911）。

② 《广西年鉴》第二回，564页，1935。

1914～1919年广西邮政业务概况表①

年份	局、所数	邮件数	包裹件数	汇兑款数（元）
1915	265	259286	114860	110100
1916	269	2748700	91400	140500
1917	269	2719500	116030	187500
1918	272	2821176	122850	265900
1919	272	3002041	122890	298800

当时，由于财力、物力和技术条件，邮政设备比较简陋，而且由于人口分布多少不同，所以机构的设置是局少所多。1912年，全省支局以上的机构只有14个，局代办所却有178个。1914年，支局以上的机构为28个，代办所也增至227个。到了1919年，支局以上的机构为31个，代办所已有241个。邮件、包裹和汇单等的传递，多靠邮递员肩挑背驮，以步代车了。②

广西创办电报，始于中法战争时期，当时仅为军用。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了民国初年，电报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从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13年4月发表的邮政管理局辖区及其等次的通令中可以看到。具体情况是：

一等电报局乙级有：南宁、梧州

二等电报局甲级有：龙州、桂林

乙级有：柳州

三等电报局甲级有：浔州、平乐、横州、镇边、靖西、百色、

① 据张宏涛等：《广西通志·邮电志》第一篇《通信机构》，第二章《邮电局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张宏涛等：《广西通志·邮电志》第一篇《通信机构》，第二章《邮电局所》；又据同书第二篇《邮政通信》第一章《驿路、邮路》载：1913年，广西邮路总长13650公里，其中轮船、帆船邮路1985公里，邮差邮路11665公里；1919年，邮路总长13131公里，其中轮船、帆船邮路2014公里，邮差邮路11117公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凭祥、全州

乙级有：郁林、贵县、隆安、兴安、迁江、上思、恭城、兴业、来宾、平孟、硕龙、海渊、平南、庆远、藤县、永淳、鹿寨、平马、驮卢、乌石、白沙、宾州、宁明、昭平、太平、南关、果化、下冻、中渡、水口、富川、永福、平局、八步①

应该指出：民初时期的电报事业，仍把持在官府与驻军手中，主要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而便利商民，发展社会，仍难办到。1918年以后，全省各地电报局、所经常出现驻军、镇守使、道尹和所谓游击司令部等派员驻局，检查或扣压往来电报的事件，使电报业务无法正常进行。有不少电报局还被迫宣布“因军事撤销”的事。②

电话的使用首先见于省的军政机关。1912年，广西都督府为了与下属机构联系的方便，从国外购进磁石式电话总机，在都督府内安装使用，是广西有电话通讯之始。不久，桂林、梧州也相继购进设备，使用了电话。并由政府逐步推广至某行业或实业单位，用户范围亦随之扩大。于是，南宁电报局内也安装总机。据统计，到了1919年，南宁城区使用电话者已达13家之多。1917年，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署为了与边关加强联系，利用原有的电报杆木附架电话线路，在南宁与龙州之间安装了电话，这是广西境内的第一条长途电话线。③

---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三三〇号《命令》。又：当时属于广东的北海、钦州、东兴为三等电报局，列甲级；灵山、小董、那良、防城、陆屋、武利、那丽为三等乙级电报局。

② 见《（北洋）政府公报》，第七五六、一八九二、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三五、二三七五、二三八一、三一六五、三二六五号《通告》。

③ 参看赖彦于等：《广西一览·交通类》，29页；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二九，《交通志二·电政》。

四、教育事业举步维艰

民国初年，广西的教育事业由于桂系重视“武化”，轻视“文化”，是以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设备简陋。发展教育，也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1917年3月，北洋政府统计局对全国的教育状况做了调查并提出报告。关于民国建立后头两个学年的广西教育概况，可看下表：

广西教育概况（1912～1913）①

项　　目	第一学年(1912.8－1913.7)	第二学年(1913.8－1914.7)
学校(所)	1531	2036
学生(名)	62339	85305
毕业生(名)	4415	4875
教员(名)	1487	2014
岁入(元)	533577	724583
岁出(元)	560504	733979
资产(元)	1991856	2342275

具体到各类教育，统计局的报告亦有说明。如师范学校，各省报部有案可查者1915年度约计141所，而广西只有男子师范学校2所，无女校；在校男生331名，毕业学生36名。师范学校经费共计19800元。②

中学：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校403所，内省立中学占十分之五，县立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一三号《附录》。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二〇、四二一号《附录》。

中学占十分之四，私立中学占十分之一。全国中学生共计59835人，经费数共计3623470元”。而广西仅有学校23所，在校学生3167人，毕业生159人，经费127057元。①

小学：据1913年8月至1914年7月调查，全省共有初等小学1622所，其中公立男校1095所，女校44所；私立男校480所，女校3所。在校初等小学生59762人，其中公立男校生44401人，女校生2323人；私立男校生12878人，女校生160人。同一个时期全省共有高等小学370所，其中公立男校298所，公立女校13所；私立男校59所，无女校。公立学校男生16315人，女生405人；私立学校男生2180人。②

实业学校分甲（中等）、乙（初等）两种。1915年，广西只有甲种实业学校两所，一为农校，学生71人；一为工校，学生98人，尚无毕业生。③ 此外，1908年开办之法政学校，1915年经教育部重新认可，有法科学生83人，尚无毕业生。④

至于出国留学，因有学历、履历、工龄、按籍贯分配名额以及考选等条件限制，而且“留学事务于民国成立时情形至为散漫”，所以能外出者极为有限。1915年，广西留学生派往欧美者定额为3名，留学日本者定额为15名。⑤

当时，为了“补助学校教育所不逮”，在社会上还成立了“通俗教育会”的组织，⑥ 比较广泛地开展通俗教育工作。其方式有二：一为通过“通俗教育讲演所”进行工作。1915年，广西即有“通俗教育讲演所”177处，每星期讲演2次，每次平均听讲人数为30人；有些地方则组织“巡行宣传团”。当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二一号《附录》。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二一、四二五号《附录》。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二五、四二六号《附录》。
④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三五、四三七号《附录》。
⑤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三九、四四〇号《附录》。
⑥ 据《（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五〇、四五三号《附录》可知，当时柳城、凌云等县皆有“通俗教育会”，提倡者多为办学及行政人员。

时广西全省有“巡行宣传团”36处，每星期讲演2次，每次平均听讲人数60人。① 讲演的内容为何，则不见报道。另一类向群众进行通俗教育的形式则是：创办公众实习学校、露天学校、半日学校、简易识字学校等等。据报道，广西当年有公众实习学校45处，每校一班，每班学生平均20人。半日学校28处，每校2班，每班学生平均20人。简易识字学校224处，每校2班，每班学生平均20人。②

从以上的情况介绍可知，当年的不少办学人员，面对许多困难，经受不少辛苦，想出各种办法，为发展广西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如凭祥县上石国民学校兼高等小学校长刘亲汉，因为“在校先后八年，管教认真”，于1918年1月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奖章与奖状的鼓励。但是，从总体看，广西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重男轻女”的观念反映在教育上仍十分突出，不容忽视。1915年冬，张鸣岐在他的“巡视报告”中，谈到广西教育时说：全省省立学校只有师范两所，实业学校两所，模范小学一所。由各县地方自行筹款办理的县立中学20多所。但因“经费不足，勉作支持，终难语于完善”。至于各地方自办的中小学校，“因地方多事，挪款办团”，被迫停辍者更比比皆是。③ 被视为“教育之母”的师范教育，也不容乐观。1917年10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咨文广西省长，说是：根据“部视学陆懋德等报告，广西师范学校共有桂林、梧州、南宁三处。南宁师范学校因军兴停办，今年始得恢复，仅有预科一班。统观各校程度甚浅，且轻视教授实习，至今未设附小，殊不足培植适宜之师资。苍梧县立女子师范学生程度虽浅，但用功颇勤，尚堪造就”。④ 两份报告提出的广西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直至桂系统治垮台，也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四七、四五〇号《附录》。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五四、四五六号《附录》。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一一六六号《呈》。
④ 《（北洋）政府公报》，第622号《公文》。

第十八章　广西近代文化

广西近代文化，以道咸时的岭西文派和光绪年间的临桂词派为最著，其他如史学与方志修纂，亦有一定成绩，而哲学研究及著作则可述者甚少。随着维新思潮的涌现以及晚清新政、新学的举办，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文化事业如报刊、图书、体育、戏剧和科学技术等等也逐步兴起，表现了比较清新的时代特色。

一、文学

岭西五家与杉湖十子

岭西文派，起于嘉（庆）、道（光）之际。先是，永福吕璜以古文倡导于乡党，而临桂朱琦、龙启瑞、唐启华，马平王拯与平南彭昱尧等“一时并起倡和，皆祖桐城，于是粤西之文且为世所指名”。梅曾亮评说：“海内文字萃于粤西盛矣！”论者以其成就及影响，尊崇吕璜、朱琦、龙启瑞、王拯与彭昱

尧为岭西桐城派古文五大家。他们改变了崇尚八股时文，专攻八股试帖的弊病，使广西文风为之一变，开创了近代广西文学鼎盛的新局面。①

吕璜（1778～1838），字礼北，号月沧，自号南郭老民，永福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官浙江庆元（今属龙泉）、奉化、山阴（今属绍兴）、钱塘（今属杭州）等县，兼摄镇海，升杭州西海防同知，以廉能善断见称于世。道光五年（1825年），因“会签德清县民妇徐蔡氏尸骨不实”获罪，解职回乡，主讲于榕湖（经古）、秀峰书院。曾师从桐城派姚鼐之弟子吴德旋，以“倡导古文为己任”，乃广西“桐城派中之老前辈”。著有《月沧诗文集》、《月沧年谱》、《初月楼古文绪论》等。②

朱琦（1803～1861），字伯韩，号濂甫，临桂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十五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御史。因痛感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数上书切论时务”，以敢言直谏，与陈庆镛、苏文魁并称“谏垣三直”。因“所言既不见用”，遂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回乡，出任桂山（孝廉）书院山长。在文学上，因受吕璜影响，专攻古文，“兼方苞、姚鼐之长，而扩其未至”。朱琦亦善诗，其“诗格雄浑，不立纲宗而自成体势”，且多感慨时事、关心民瘼与评人论史之作。著有《怡志堂文初编》六卷、《怡志堂诗初编》八卷以及《台垣奏议》等。③

彭昱尧（1809～1851），字子穆，又字兰畹，别号阆石山人，平南县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贡生，二十年（1840年）举人。“生有轶才，倜傥权奇，不屑于制义，而矜尚风节，屡试闱不第，乃放怀山水，恣其游览。初以诗见知于学使池生春，嗣又与吕璜、龙启瑞、梅曾亮游，所为古文辞以才气雄放见长，尤工于诗。”著有《致翼堂文集》、《怡云楼诗草》、《忏绮龛词稿》等。④

①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六，《纪人·文学传》。

② 参见《月沧年谱》；《古今广西人名鉴》。

③ 《清史列传·文苑传四》卷七三。

④ 郑湘畴：《平南县鉴》第一编，《概述·人物志略》。

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临桂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二十一年辛丑科状元。由翰林院修撰历官广东乡试副考官、侍讲、湖北学政、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江西学政与布政使等职。道光三十年丁父忧回籍，旋主持乡团事务。启瑞早年从吕璜、梅曾亮习古文，受姚鼐影响，精通经史，善古文辞，亦工诗、书及丹青，尤精于音韵、训诂之学。生平著述甚多，要者如：《古韵通说》、《经籍举要》、《尔雅经注集证》、《经德堂文集》、《浣月山房诗集》、《汉南春柳诗钞》、《粤西团练辑略》等。自序《古韵通说》，尝言："虽不敢谓诸家大成，而自来言古文者，于斯为备。"①



朱琦、龙启瑞、王拯诗文集

王拯（1815～1876），初名锡振，字少鹤，号定甫，又号龙壁山人，马平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二十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通政使等。因"敢于言事，直声震朝野"，"卒以劾某权贵夺职归"。曾主讲桂林各书院，并任秀峰、榕湖书院山长，与朱琦、龙启瑞等相互问学，文学桐城，极盛一时。亦工于词，兼善诗、书、画。著有《龙壁山房诗文集》、《茂陵秋雨词》、《成有谕斋文钞》、《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以及《瘦春词》、《谈艺录》等多种。②

岭西五家诗文，虽各有专集存世，为了辨明桐城派古文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唐启华于同治末年将吕璜、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王拯与梅曾亮等人的著作加以搜集、录编，于咸丰四年（1854年）刻印成书，名曰《涵通楼

①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卷六九。

② 《清史列传·文苑传四》卷七三。

师友文钞》存世。[1]

朱琦、龙启瑞、彭昱尧因能文善诗，在桂林期间常与诗友聚会于杉湖畔之补杉楼，以诗词互相酬唱，时人称为杉湖诗派，而朱琦、龙启瑞、彭昱尧与商书浚、汪运、李宗瀛、曾克敬、赵德湘、杨继荣、黄锡祖等十人又被称为诗派中的杉湖十子。

商书浚，字鹿原，临桂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著有《存恕堂集》。汪运，字剑峰，又字任之，临桂举人，著作有《沐日浴月庵集》。李宗瀛，字小庐，号季容，又称懒余子，江西临川人，著作有《小庐诗存》。曾克敬，字跻堂，又号芷潭，平乐县人，著作有《芷潭诗余》。赵德湘，字澹仙，江西南丰人，著有《丽则堂诗存》。杨继荣，字浮黼，号柳堂，浙江山阴人，著作有《柳堂诗存》。黄锡祖，字香圃，湖北汉阳人，著有《香圃诗遗》。同治初年，张凯嵩巡抚广西，将十子诗汇编为《杉湖十子诗钞》，又名《桂林十子诗钞》。凡二十二卷，八册。同治七年刻于桂林。张凯嵩序云："粤近中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十子虽非尽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其间"，故题之曰《杉湖十子诗钞》，由是十子之名益著。

岭西五家与杉湖十子在古文、词诗上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广西文化，也是近代广西文学步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在晚清的中国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临桂词派

清末临桂词派在词论和词作上的成就，是广西近代文学成就的又一体现，其主要代表者是王鹏运和况周颐。

王鹏运生逢国家多难之时，痛感国事日非；而于慈禧太后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且生活奢靡，尤为不满。是以支持康梁维新派变法，且屡"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然亦因此被革，险遭杀身之祸。王鹏运被迫转至上海，入

---

① 唐启华即唐岳，涵通楼是他的雁山别墅的藏书楼。

南洋公学任教，并专注于词学，与浙江吴兴朱祖谋（彊村），汉军正黄旗人郑文焯及况周颐，并称词坛四大家，人称晚清词派。王鹏运与况周颐同为临桂人，故又称临桂词派。

在词学理论上，王鹏运提出“重、拙、大”三字论。据况周颐的解析：所谓“重”，即格调上“纯任自然，不假锤炼”；所谓“拙”，即写作中雕琢“毋太过，毋不及”，以“恰到好处”为胜；所谓“大”，即词作应达到博大深厚的境界。[①] 王鹏运的词论，对当时词坛中存在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弊作用，也为临桂词派奠立了理论基础。



临桂词派的代表者——王鹏运

王鹏运的词，博采五代、两宋以来众多词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他生当国难深重之时，而又科场失意，仕途坎坷，其“天性和易而多优戚”，词作亦多忧时愤世之作，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一生词作甚多，存世的词集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集》和《南潜集》等。他还以30年的时间，收集、校勘历代词作，做了细致的正误、校异、补脱和删复工作，刊为《四印斋所刻词》；又与朱祖谋合作编校刊《梦窗词》，成为中国词集精本。从此“词家有校刊之学，词集有可读之本”。朱祖谋题《四印斋所刻词》有云：“岭表此宗风。”对王鹏运的词学，推崇备至。

在王鹏运的许多词集中，《庚子秋词》的写作值得一谈。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狼狈逃亡西安。“士大夫之官京朝者，亦各仓皇戎马，奔驰星散。”[②] 王鹏

① 参看《蕙风词话》。

② 引见朱祖谋《半塘定稿·序》；又参王鹏运《庚子秋词自序》。

运来不及出走，蛰居在北京南城“四印斋”寓所里。帝国主义者分区统治北京，纵容士兵到处烧杀淫掠。王鹏运的朋友朱祖谋、刘福姚为了避免侵略者的骚扰，秘密转移到“四印斋”来与他同住。国难当前，他们“发愤叫呼，相对太息”，在“生死之路皆穷”之际，惟有“拈题刻烛”，提笔填词以消愁泄愤了。每有所成，三人“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阢陧中，而以为友朋文字之乐也”。[①] 这次危难中的闭门酬唱，成绩非常可观。据王鹏运自己统计，“自庚子旧历七月二十六日讫九月尽，六十五日中，拈调七十一，得词二百六十八，附和作三十九，共三百又七首。十、十一两月，五十九日间，拈调六十一，得词三百一十三，附原作二，共三百一十五首”。后经整理汇编，题名《庚子秋词》，合为一册二卷。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因避溥仪讳，故改名。字夔生，号蕙风，又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临桂人。生于世代书香官宦之家，自小即酷喜填词，青年时即自订词集。亦以举人人为内阁中书，得与同乡王鹏运同事，彼此往还密切，常“以词相切劘”，受到王鹏运词风的影响。自云：“少年时作词，多性灵语，不免失艳之讥。至京与半塘交，体格为之一变。”他不但工于填词，而且重视词学研究。在《蕙风词话》中，对历代词派做了评论，概括了填词的基本要领；并对词学理论做了探索，对王鹏运关于填词“重、拙、大”三字论做了发挥，认为：“重者轻之反，拙者巧之反，大者纤之反。”主张填词要讲究词境，提出“词心”、“词首”、“词尾”之说。而词境的掌握和个人之天资、学力以及“平日



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
——况周颐

① 引见朱祖谋《半塘定稿·序》；又参王鹏运《庚子秋词自序》。

之阅历，目前之境界”，都有关系，并非一朝一夕所可致的。是以填词力求“情真景真”，力避“矫揉而强为之”。语言应讲究“矜炼”，要“艳济以雅”，“韵美益进于清遒”等等。此外，对于“词学的程序”以及学习前人应注意之事，亦有论述。况周颐不愧为晚清的词学评论家。①

临桂以外的诗文作家

无论是岭西五家，或是杉湖十子，诚如张凯嵩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所说：“虽非尽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说得恰切些，他们虽非尽为桂林人，然皆与桂林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因缘、情结。但论广西近代文学，不可忽略那些桂林以外的名家，也不可忘记那些不列“五家”、“十子”的学者。桂中象州的郑献甫，就是首先应该提到的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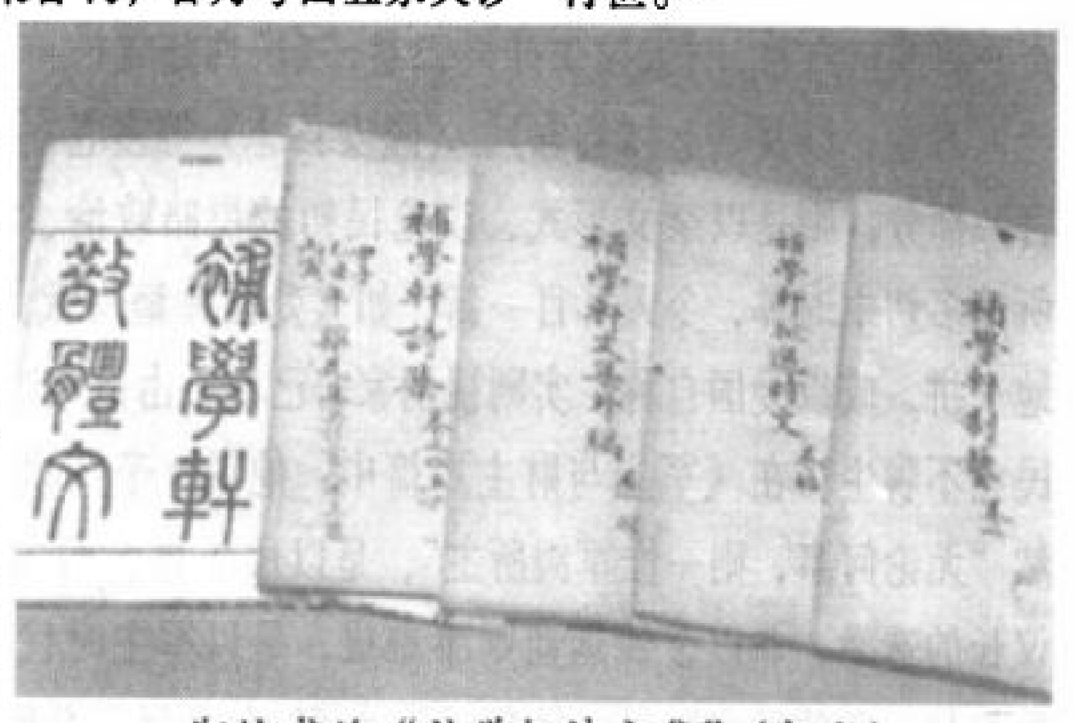
郑献甫（1801～1872），本名存纻，字小谷，自号识字耕田夫，象州白石村人。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十五年进士，官刑部主事。第二年，即以亲老乞养，辞官归里，以讲学著书为乐。先后在桂林，广东顺德、广州，以及象州、柳州各地书院讲学，卒于桂林榕湖经舍。可说与桂林关系也十分密切。他学通经史，著述甚丰，要者有《手批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四书翼注论文》、《愚一录》、《补学轩文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和《鸥闲集》等。同治九年（1870年），编纂《象州志》。郑献甫主要成就在文学。他“为文直抒所见，力辟道统文派之说”。认为道无所



郑献甫像

① 参看《蕙风词话》。

谓为派，文之有派，都是门户之见，而非心理之公。他批评桐城派崇尚古文，“不惟于体大拘，而于事亦太陋矣”。提倡为文落笔，“出于自然，不事规仿，于广西文学界独树一帜”。论者推崇为“思想解放之急先锋”。① 但是，也正由于他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力辟近人所论，归方文统之非”。所以，“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时，自乾隆至咸丰间，海内共采三十八人，内有吾乡吕（璜）、龙（启瑞）、彭（昱尧）、王（拯）各数篇，独不及郑（献甫）。或亦风尚文统之见也”。这种“道统文派”之见，直至“光绪初，临桂侯氏东周始以吕、朱（琦）、龙、王并郑各集合刊，署为粤西五家文钞”行世。②



郑献甫的“补学轩诗文集”（部分）

19世纪后期，武缘的韦丰华则以诗歌饮誉广西诗坛。他字剑城。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而他自己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40岁时始得拔贡，此后却“秋闱大试不登科”，长期受聘为书院山长。有诗400余首，收入《今是山房吟草》，共七卷。另有《今是山房吟草琐记》七卷，乃诗话杂记之作。其诗作除反映地方文化、艺术外，兼及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掌故、民情风习。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诗论。他认为：诗作应具真情，切忌无实感的描摩填砌，否则虽工整严密，亦难免神趣枯竭，缺乏生气。他还认为：诗家如史家，作诗如写史，应具才、学、识三长，始能写出佳作。无才则落笔庸俗，无学则言出浅薄，无识则命意卑鄙，

① 《广西一览·古今名人志略·历代先贤》。

② 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六，《纪人·文学传》。

是无法写出好诗的。基于这些认识，韦丰华写出了不少贴近现实，反映并抨击当时社会各种病态的诗篇。①

另一位武缘人黄诚沅（1863~1939），则以杂文论政见长。他字云生，号芷坪，监生出身。曾任清云南昆明县丞，直隶州补用知县，以及云南陆军讲武学堂、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回广西后，则多从事教育及办报工作，成为著名的文史、地理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计有《云南通省舆地图说》十六卷，《广南日记》一卷，《滇南界务陈牍》三卷，《粤西武缘起凤黄氏家乘》一卷，《广西文人录》三卷，《广右文人录》二卷，《蜗寄庐文撮》一卷，《蜗寄庐随笔》六卷，《报馆生涯》二卷，《广西建置沿革表》五卷，《武缘县图经》六卷，以及《上林县志》、《隆安县志》等多卷。他的《蜗寄庐文撮·迩言》部分，则是以杂文形式，议论民初的黑暗政治，抨击军阀的胡作非为，所论多切中时弊，令人耳目一新。如《爱国》篇写武人政客，通电言谈，据地火拼，咸以爱国自称。实则视国家若己有，由是愈谈爱国，则国愈无宁日，民愈不聊生！在《军主与财主》篇中，他说：辛亥以后，变君主而为民主。然“无论何事，则一惟军阀所主”，是以民主再变而为军主。但总统、省长、议长的选举，非以金钱运动则事难成，是以军主时代更将变而为财主时代。果如是，必致民穷财尽，复变而为洪荒时代无疑。其他如《奴隶性》、《警笛》等篇，在揭露民初社会的人情世态方面，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宁明州人黎申产（1823~约1883），号嵩山，又号蠡庵。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即授庆远府儒学训导，后回乡任宁江书院山长。著有《菜根草堂吟稿》二卷，《宁明州志》二卷存世。而《菜根草堂读书记》四卷、《宿缘小名录》一卷、《医案》一卷则不存。他善吟咏，崇拜袁枚，自刻印章云“袁子才门下走狗黎某”。常以咏物寓情，褒贬人世间的真伪、善恶。如《咏物小诗》中的《扑灯蛾》：“本为观光来，翻因赴热死。”讥讽那些热衷名利，

① 据黄君钜、黄诚沅：《武缘县图经》卷七，《献略上·艺文》。又：韦丰华尚有《今是山房吟余琐记》，并增修《武缘县志草》十四卷未刊。或说他得拔贡在1866年（同治五年）。

缺乏自知者的悲剧人生。《蜘蛛》："终朝设网罗，自诩谋食巧。"但终难免成为信天翁果腹的食品。这是存心害人终于害己者的下场。而咏《蝇》、《臭虫》、《蜣螂》和《蚤》诸首，则是"影射生活里的谗言者、吸血鬼、老圆滑、帮凶和打手"。"叩头虫是软骨头的画相，和挡车的螳螂成鲜明的对比。"诗人对这两种小虫的吟咏，"意在强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气节"。咏《蚊》："聚众如雷轰，声闻震两耳"，其叮人吸血，固然令人厌恶，但是"较诸暗箭伤，犹为彼善此"。说明"那些造谣中伤，背后下手的奸人"尤其令人厌恶。① 这些诗都是有所为而发，读来耐人寻味。

小说家何诹（1882～1925），学名谦章，字子康，别号惠云，又号工老，兴业县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曾考取秀才，后就读于广州两广速成师范和广西法政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发表长篇小说《碎琴楼》于《东方杂志》，后出单行本并拍成电影，有"南方才子"之称。一度任广州《人权报》主编，常著文抨击贪官污吏，针砭时弊。后寄寓香港，专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菩萨》、《古老爷》、《双凤记》、《钱革命》、《鳖营长》、《残蝉魂影》、《妾薄令》、《苍梧怒》、《飞乞》、《狗之革命运动》、《红神怀思记》、《秋影楼》、《魂归记》、《大铁椎前后传》以及《何诹诗集》等，是近代广西"誉满岭南"的作家。②

在近代广西，善诗能文者还有不少。但他们的作品，多已散佚不存。有的虽然刊刻成书，因为年代久远，或因社会动乱，也多难以见到。目前可述者如：桂平的程大璋（1873～1924），又名式穀，号子良，1894年举人，一生嗜读经史，擅长词章、训诂之学。著有《经学通论》、《春秋讲义》、《礼记各篇书后》、《曲礼注疏摘要》、《王制义案通论》、《左传略释》、《史记经义》、《汉书艺文志书后》、《子学论纂》、《说文部首》与《演解诗文集》等多种。③

---

① 以上参见欧阳若修等编《壮族文学史》第四编，《"黑烟变火花"时代的文学》（1840～1919），第十三章《文人文学》。

② 陈国河主编：《玉林市志》第三十二编《人物》，第二章《历代名人·传略》。

③ 凌崇征主编：《桂平县志》第二十八编《人物》，第三章《历代名人·传略》。

博白县的宾光椿（1853～1904）、祁永膺（1853～1905），两人青年时都曾到广州广雅书院学习经史。宾光椿见重于巡抚马丕瑶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受聘为桂林独秀书院山长，著有《精读经史策论》和《策论义采腴》等传世。祁永膺为1894年进士，官内阁中书、陇西知县和拱州知府等，著有《勉之钮室类稿》、《愚斋存稿》和《荀氏易文疏正》等。[①] 其他如全州的蒋珣、蒋元杰、赵炳麟，宣化的钟德祥，苍梧的李璲，迁江（今合山市）的凌应楠，贺县的于式枚等，也都有遗著问世。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研究和著述，涉及经、子诸学，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朱玉仙和韦懿桢两位女诗人。朱玉仙（1796～1861），博白县松山村人，出身于书香官宦之家。嫁与北流县拔贡黎玉章，随夫宦游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善诗词，有诗200余首刊为《画诗楼稿》传世。灌阳蒋达评其诗云："其气清而腴，其体纯而粹，其词温而雅，其旨深而远。"有《度雁门关》二首，时人评曰："诗心雄过雁门关"，人称"北流女史"。[②] 韦懿桢，永宁州（今永福县）人，生于鸦片战争前夕，殁于辛亥革命之时。一生做诗甚多，但随做随毁，今存诗词仅百余首，其后人集刊为《倚栖居烬存吟草》传世。虽然内容单薄，意境不宽，但文字流畅自然，词采斐然，显出一定诗作功力。[③]

当我们叙述广西文学史的时候，有必要指出，所有文人学士，都生当国家多难之秋，内忧外患，从无宁日；国难家仇，铭心刻骨。故不少人的著述诗作，类多亲自经历，目睹耳闻，是以愤世忧时，抒情记事之作颇多，既是文学，亦可作史书参读。

---

①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六，《人物·历代名人传略》。

②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六，《人物·历代名人传略》；梁树礼主编：《北流县志》第三十一篇《人物》，第一章《历代名人·传略》。

③ 潘其旭、覃乃昌主编：《壮族百科辞典》，二十二，《人物类·文学界人物》。

二、史学和方志修纂

史学

近代广西无全面记述地方社会历史的通史著作，也缺乏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专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西布政使张祥河的《粤西笔述》，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宛平人杨翰的《粤西得碑记》，以及广东林德钧的《粤西溪蛮琐记》，江苏沈日霖的《粤西琐记》，多属记述广西地理、历史、民情风俗之作，虽篇幅只三五万言或十万字左右，纪事亦欠全面、系统，但资料多辑自地方文献或得自实地采访，所记实在、具体，对研究广西地方民族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谈近代广西史学，首先应该提到郁林州人苏宗经。他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卒于同治三年（1864年）。字是程，号文庵，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历任新宁州（今扶绥县）训导，平乐县教谕，梧州府教授，国子监丞等职。他在讲学授徒之余，悉心考研文史，著有《读史管见》四卷，《名臣百咏》一卷，《慎动斋文集》十八卷，《明史约编》三十卷，《鉴史精华》八卷，以及《广西通志辑要》等，① 是近代广西史家著述较多的学者。

近代广西重大事件迭出，不少史著多据历史事件成书，如记述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广西农民反抗活动的著作，就有苏凤文编撰、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印成书的《堂匪总录》、《股匪总录》、《平桂纪略》以及《广西昭忠录》诸书。《堂匪总录》十二卷，附《广西道里表》一卷。《股匪总录》三卷，分

① 陈国河等编纂：《玉林市志》第三十二编《人物》，第二章《历代名人·传略》。

地区记述各府天地会以及不属于会党系统的农民反抗活动。而《平桂纪略》则以时间为经，记述广西各地农民反抗与清军、团练进行镇压的概况。《广西昭忠录》乃为建立昭忠祠与提供国史馆参考而作，依各地官绅在镇压农民反抗时死亡的先后，介绍其生平及死亡事迹。以上各书，叙事皆起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止于1869年（同治八年）。苏凤文于1865年5月（同治四年四月）任广西布政使，1867年8月（同治六年七月）至1870年（同治九年）任广西巡抚。他了解地方文献及人事、变故，所编各书，对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广西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时，巡抚邹鸣鹤奏办团练，以龙启瑞总其事。因此，他于1852年（咸丰二年）编成《粤西团练辑略》四卷。举凡“粤西团练缘起，父老之条约，士民之忠义及户口多寡，山川地形险扼”，其“有裨于时务”，或者“可备掌故者”，分作四门辑人。有朱琦作序及龙启瑞的自序。研究广西团练及太平天国起义史，可作参考。

桂人记述中法战争史，首推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十卷。1882年（光绪八年），唐景崧以吏部主事自请赴越会同刘永福抗法，他以日记体裁，记述自1883年8月（光绪九年七月）至1886年10月（光绪十二年九月）在越南的抗法活动，以及战后参与中越划界各事。所记多亲身经历、见闻，兼及有关奏折、谕旨与函电，是研究中法战争史的重要参考著作。1893年（光绪十九年）刊于台湾布政使署。① 梁廷栋的《梧城风鹤纪略》，逐日记述辛亥武昌起义后梧州独立的曲折过程，篇幅虽仅三万余言，纪事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对梧州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陆荣廷排斥革命党人、独揽广西政权；广东政局变动对梧州的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势力阻挠梧州独立等等，都有具体的记述。作者评人论事，虽然偏向保守，但所述皆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叙事简明具体，不失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有用之作。②

---

① 该书已收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六种《中法战争》（二）。

② 政协广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已收入《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

关于广西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的《广西舆地全图》。它的编辑、绘制，缘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清会典馆饬令各省测绘舆地，并颁发编绘格式。巡抚马丕瑶以广西地形复杂，人才缺乏，于是到省外延聘同文馆学生，并购置仪器，在桂林、柳州、南宁分设三局，采用新法，分区测绘，历年余而草图绘成，又历年余而修改定稿付印。全书包括省总图一，经纬图一，府总图十一，直隶厅总图一，直隶州总图一，厅、州、县及土州县司散图八十三，凡例一，说四，表八十二。内容翔实，绘制精美，时人称为善本。1892年（光绪十八年）春，马丕瑶去广西巡抚职，由张联桂继任。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联桂奏称："广西边界，绘图立石，暨全省舆图测绘一律告竣。"① 其后，李经羲出抚广西，曾将此书送广州重印，"分发防军，为剿寇之用"。

在近代，还有不少人用笔记、诗歌等形式，记述亲见、亲闻、亲历的时事，或写下读史的心得，亦可为后来治史者参考。要者如：桂平人黄体正（1766～1845），字直，号云湄。1798年（嘉庆三年）解元，著有《带江园诗草》六卷，《带江园杂著》六卷。其诗文多忧时感事之作，有助于了解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的浔州社会变乱，以及官绅亟谋"弭乱"自救的历史。而象州人覃元苏的《象州乱略记》（手抄本），具体记述了太平军金田起义、进驻象州、清军疲于应付的种种情况。1852年（咸丰二年）佚名的桂林《独秀峰题壁三十首》，以太平军从永安州进攻桂林为主题，写尽了官兵团练在农民革命大潮冲击下畏葸逃避的种种丑态，顷刻间随太平军进军金陵而传遍大江南北。同年郑献甫作《壬子书事二十首》；稍后况澄② 的《时事诗二十四首》以及龙启瑞的《纪事诗》，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进军桂东北为主题，虽然诬揭太平军为盗为寇，而字里行间也暴露了官绅大吏的畏葸无能，官军团练的名兵实寇，以及农民起义军的英勇善战。以上种种，实是一组报道太平天国初期情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六，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② 况澄，字少吴，临桂人。著有《西舍文遗篇》四卷，《粤西胜迹诗钞》十六卷，《西舍诗钞》十六卷，《使秦纪程》二卷。

况的绝妙史诗。马秉良①是桂林的团练头目之一。他的《云谷琐录》，记述太平军于咸丰壬子二年围攻桂林的情况，皆其亲身经历，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久居刘永福幕中，直接参与甲申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黄焕中②，今存所作绝句、律诗近300首，不少篇章抒写了我国将士抗敌御侮的真情实感。永康州（今属扶绥县）人曾鸿燊③，存诗百余篇，多是描写清末民初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以及因此造成的人民苦难。他们的诗作，也都有助于后人对广西以至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

方志修纂

广西近代的修志事业，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既不如鸦片战争以前，也远逊于五四运动以后。据现存的志书统计，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919年（民国八年）的79年中，修纂完成的各类志书，共计61种，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近代广西地方志书修纂概况④

时间 / 数目 / 地区	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元年至八年	合计
广西省				1			1
桂林府	2	1		4		3	10

① 马秉良，又名致远，号云谷。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生于桂林，回族人。

② 黄焕中，生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字尧文，号其章，宁明人。

③ 曾鸿燊，1865年（同治四年）生，字子仪，号瓶山，别号此愚。1893年（光绪十九年）举人。

④ 本表以清代建置的府、州、厅、县为据，民国以后，少数州、县的归属有变动，仍以从前归属统计。主要参考广西通志馆编《广西方志提要》一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续上表

柳州府	1		1			1	3
南宁府				2		1	3
梧州府			2	1		1	4
平乐府				7		1	8
浔州府	1		1	3		1	6
庆远府				2		1	3
思恩府	1			3	1	2	7
太平府				1	4	1	6
镇安府				1			1
郁林州				2		1	3
归顺州				3		1	4
百色厅				2			2
合　计	5	1	4	32	5	14	61

从表列可知，79年岁月，广西全省共修成志书61种，其中省志1种，府及直隶州志共5种，州、县志49种，还有土州志略4种，乡土教材及《湘山志》各1种。与此同时，在当时未入广西行政建置的廉州和钦州，有梁鸿勋的《北海杂录》（光绪三十一年铅印），纪载邦、刘运熙等修纂的《灵山县志》（民国三年铅印），以及李受彤修纂的《防城县小志》（光绪抄本）等3种。

从修志的时间看，以光绪年间修纂的最多，咸丰、同治年间修纂的最少。这种现象，首先和社会的治乱程度不同有关，而与光绪朝维持的时间较长也

有一定联系。从地域看，则桂林府最多，次为平乐、思恩、浔州、太平等府。从志书的质量言，则浔州、郁林两府（州）的志书较好。

在61种志书中，省志仅1种，即由苏宗经、羊复礼、夏敬颐等人主持，根据嘉庆《广西通志》选辑的《广西通志辑要》。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苏宗经起首辑录初稿十三卷，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羊复礼受命增辑和夏敬颐重加厘订，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共成十八卷，附图132幅，交由桂林唐九如堂刊刻面世，历时45年。《广西通志辑要》保存了谢启昆《广西通志》的主要内容，而又增添了从嘉庆至光绪有关广西的一些重要史料，这是它的一大贡献。

府与直隶州志主要有4种，一为何鲲据乾隆苏士俊修纂的《南宁府志》为原本，增入1742年（乾隆七年）以后至道光年间的内容，是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增刻本。二是魏笃、王俊臣修纂，1874年（同治十三年）刊刻的《浔州府志》；夏敬颐、诸兴周修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刊刻的《浔州府志》。三为羊复礼修纂，1892年（光绪十八年）刻印的《镇安府志》。四为冯德材、文德馨等修纂，1894年（光绪二十年）刊刻的《郁林州志》。道光《南宁府志》已残缺不全。光绪《浔州府志》亦有缺佚。惟同治《浔州府志》三十八卷，首一卷，凡二十册；光绪《郁林州志》二十卷，首一卷，尚完好存世。以上两志与光绪《镇安府志》最具参考价值，素为学者所推重。

州、县志虽然不少，但上乘之作不多，可述者有：张灿奎修纂的《新宁州志》（光绪五年刊本）；黄诚沅修纂的《隆安县志》（民国二年铅印本）；郑献甫修纂的《象州志》（同治十年刊本）；黄泌、曹驯等修纂的《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刻本）；蒋良术、戴毓驯修纂的《灌阳县志》（民国三年印本）；李百龄、王栋修纂的《苍梧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黄占梅、程大璋修纂的《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裘彬、周寿祺修纂的《平南县志》（光绪十年刻本）；封祝唐、黄玉年修纂的《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徐作梅、李士琨修纂的《北流县志》（光绪六年刻本）；夏敬颐、梁吉祥修纂的《贵县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陈如金、华本松修纂的《百色厅志》（光绪

十七年刊本）；以及颜嗣徽等修纂之《归顺直隶州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等。

与此同时，曾经修纂、仅成初稿，或者已成稿而未刊即告散佚者尚有：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刘宅俊修纂的《新宁州志》，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修纂、清末经人续辑的《龙胜厅志》，约于同治年间由苏政祥修纂的《永康州志》，同治、光绪之交凌河、林德辉修纂的《合浦县志》，1881年（光绪七年）段荣棣、姚善镛修纂的《宜山县志》，光绪年间韦丰华增修的《武缘县志草》十四卷以及1917年（民国六年）陈沛霖、林其椿修纂的《凌云县志》等共7种。①

三、书报的出版、管理和使用

报刊的出版与流传

20世纪初期，广西地方报刊的出版、发行和展阅工作已经逐步走向社会，成了开通风气、传播新知、启发民智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具体情况，从《东方杂志》的记载中可知大概：

1905年，桂林的“多数志士”深感社会风气闭塞，首先在城内成立了一家阅报社，“捐资购报，任众游览。俟经费充足，尚欲于阅报社添设俱乐部及教育研究室，并将各种要件译演白话，到处送赠”。他们的工作，得到学政汪诒书的支持，按月给予经费资助。

1906年，南宁知府“自捐廉俸，在府前之清风楼设一阅报所，名曰又新”。

---

① 陈相因、秦邕江：《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907年，广西报刊只有《宏文丛报》一种，每月出版二册，但“销路极滞，颇难支持”。经官书局坐办闵别、贺世荣等报告护理广西巡抚张鸣岐批准，“创办《桂林白话报》，已聘定主笔，不日出报”。

同年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广西士绅合力创办之《广西日报》正式出版。

1908年，又有“桂省学界同仁近就铁路公所发行《桂报》，以振兴本省路矿，提倡地方自治为宗旨”①。

上列各种报刊，除《桂报》外，因多为官绅所办，故其政治倾向与基本内容多为官绅立言。如果与当时广西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海内外创办的报刊合计，则广西人士经营的报刊，已经接近20种了。

随着报刊的出版发行,公共的阅报事业也有了发展。据北洋政府统计局1917年4月的统计报告,广西当时已有“公共阅报所”54处,其中公家设立的48处,私人设立的6处,提供阅读的报纸5种,每日每所阅览的人数平均在20人左右。② 这是一个进步。但从全省范围而言,这种进步是远远不够的。

图书的出版和发行

说到近代性质的图书在广西的出版与发行，有必要回顾一下光绪中期成立的桂垣书局。

1889年10月（光绪十五年九月），巡抚马丕瑶以“广西素称瘠苦”，“俗悍民贫”，非教养兼施，不能挽回“敝习”。于是请设书局，“以培本源”。第二年，即以秀峰书院西斋为局址，创办桂垣书局。③ 书局三进五间，依次为

① 分见该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教育》；第三卷第十期，《教育》；第四卷第三期，《教育》；第五卷第三、第六期，《教育》。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五六号《附录》。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二七六，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以下所述有关桂垣书局和官书印刷局的情况，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广西学务提要·图书科》。

书局、读书堂与藏书楼，局务由有关司道及书院山长负责，订有《存发书籍章程》十二条。一面向文化发达、藏书丰富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和广东等省征集图书，计得各省赠书384种；一面自己选择一批经、史、子、集善本自行刊刻。所有书籍，除留置桂垣书局外，尚分发浔州、柳州、梧州、南宁、太平、泗城和百色、郁林、归顺各府、厅、州建楼庋藏，以供士民阅读。[①] 至20世纪初年，桂垣书局共有各类藏书1134部，16754册。[②] 桂垣书局重雕版刻印，直至1907年，巡抚张鸣岐始拨款购置铅印机4架，在省城老提塘街陈文恭祠内开办官书印刷局，专印官厅文书。同时按照学部审定的书目，分别购买各类图书，供各地学堂兴办教学需要。1912年（民国元年）随省会迁往南宁。

桂垣书局为官办。所以，它所印刷出版或购买发行的图书，主要由学部或提学使司决定。其发行方式，有由官书局将教科书配齐，然后直接送往各府、厅、州转为批发的；有由各州县直接派人来局领取的；也有由地方官因公事来省而直接带回的。所售图书，“悉照折实原价，加人运费、补水、汇水发兑，不收余利”，纯为地方服务性质。所该书款，按月表列结算。但各州县缴解书款多不如期，常须提学使司“按表札催”。

官书印刷局印刷的图书文报，也以官府认定需印的图书文件为主。[③] 例如：1909年，提学使司批准开办《广西教育杂志》，内分诏令、章奏、文牍、论说、国粹、译述、学制、调查、新闻和杂俎十个栏目。于是年10月14日（九月初一日）创刊，“每月一册，正、腊两月停印。全年十册，共收费一元八角，另加邮费三角”。因为杂志内经常刊登有关学务要件，具有正式公文性

---

① 马丕瑶：《分建书楼庋藏各省书籍并刊布经书折》，见光绪十七年三月初七日《申报》附张。

② 见民国《广西通志稿·社会教育》。

③ 桂垣书局自成立以后，即用传统方法，刻印书籍。如1890年（光绪十六年）刊刻陈皓集注之《礼记》（大字本）十卷十册；1891年补刊清嘉庆六年谢启昆等纂修之《广西通志》二八〇卷，八十册。

质。所以，凡在省城及各府、厅、州、县的官立或公立学堂和劝学所，均须派销一份。其他公私立各校，如经费稍足，亦须购阅。

桂垣书局与官书印刷局资金雄厚，1910年共有基金5万两，且首先使用铅字机器。所以，它是近代广西首家、也是最大的和最先进的图书出版与发行机构。

对于图书出版事业，清政府曾有“著作权律”，明定凡“翻印、仿制他人著作以及就原著加以割裂改窜，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他人之著作”者，应据不同情况给予处罚。1912年9月，北洋政府内务部以前清“本律尚无与民国国体抵触之规定”，通令各省“暂行援用”。而在广西，当时就有不少私营书商“图利假冒，百出其伎”，侵犯其他书局的版权。如桂林的翰文堂，南宁的文海堂、富文堂、石渠书局，梧州的麟经阁等，因为“图书假冒，证据确凿”，于1913年11月受到商务印书馆以“公犯禁例，侵害私权”的控告。① 这类“文化官司”出现在广西近代图书出版和发行事业的起步阶段，是可以理解的。基于社会需求日趋迫切，1914年6月26日，上海商务印书局注册在桂林设立分店，对广西近代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②

新式图书馆的创建

图书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园地，它以丰富的藏书供人们阅读和研究，在增长群众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加速社会进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国计民生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近代性质的图书馆在广西出现，首推设于桂林的广西图书馆。1909年，学部奏准颁布《图书馆章程》，并在京师先行办馆。按照章程规定，1910年，“各行省一律开办图书馆”。广西商议和筹建图书馆，始于1909年。首倡者是

① 《（北洋）政府公报》，第五四三号《通告》。
② 《（北洋）政府公报》，第七九〇号《示》。

教育总会会长唐钟元和陈智伟等人。图书馆馆址选定在王城内东南角，预计建馆经费需银一万五千两。是年秋，适逢全省举行举贡生员的考送、考职之期。于是，议定“考拔各生每名捐银四元，考优各生每名捐银二元，考职各生每名捐银一元，保送举贡每名捐银十元；其考优、考拔录取者，每名加捐十元，考职录取者每名加捐五元，供作开办经费。至其常年经费，则将桂垣书局原有存款拨入广西图书馆生息，并将全省中学毕业生领照银两提出半数，拨归图书馆开支。以后如有不足，再随时设法补筹”。这些筹款办法，得到了巡抚张鸣岐的批准。①

筹款既得门路，建筑馆舍随之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包括藏书、阅览及工作等在内的馆房终告完成，其中大型阅览室四间。整个馆舍，在当日的桂林，堪称宏伟建筑。

至于图书，先由教育总会报请提学使司分别行文桂垣书局与优级师范学堂，将原有官置书籍移送到馆，充作馆藏。又得上海各书局捐助图书2000余种。本省人士况仕任捐赠 图书数百种，连同省内外官绅所捐图书，共计4000余种，约7万余册。其中新版译著，则系派员专程往上海购买的。由是新旧并蓄，规模粗具。② 广西图书馆，不仅是近代广西最早的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史上，也是较早的图书馆之一。

广西图书馆于1910年建成开馆以后，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业务继续得到发展。据北洋政府统计局1917年4月的《行政统计汇报》：馆藏图书已经超过7000种，其中善本书580余种，常本书5760余种，新译书250余种，外文图书340余种，每月到馆阅览人数约1800余人。③

应该指出的是：广西图书馆虽然建立，而省属各县的图书事业却普遍滞

① 《广西学务提要·图书科》，12～13页。

② 参看《广西学务提要·图书科》；龙兆佛：《广西省立图书馆概况》；唐现之：《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唐文说，初期藏书“已有四千余种，三万余册”，与龙说不同，并志此以待考。

③ 《（北洋）政府公报》，第四四四、四四六号《附录》。

后。或云早在“光绪初年”，苍梧县已在“县城梧州设立西江图书馆”。[1] 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丕瑶在龙州开办了暨南书院图书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边防督办郑孝胥捐巨款兴办了开明学社图书馆，并把苏元春在连城的24箱藏书拨入馆内，成为由士绅开办，供士绅读书、吟咏的图书馆。[2] 其实，这些图书馆，与桂垣书局同类性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图书馆，直至20世纪初新桂系主政广西时，才逐步在各地建立起来，对广西社会文化的提高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体育、戏曲

新式体育的教学和竞赛

近代体育传入广西之前，广西的民间体育活动已十分活跃，形式丰富多彩，且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如舞狮、舞龙、抢花炮、抛绣球、舂堂、射弩、斗马等等。据调查，流传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项目，就多达100余种。

随着北海、龙州、梧州、南宁的对外开放，以及外国教会在广西创办各类学校，西方近代体育如体操、田径等逐步传入广西。[3] 20世纪初年兴办新学时，体操已被定为各类学堂的重要教学科目。1904年，广西大学堂已建有运动场和体操场。在强调德育、智育的同时，也注意体育训练。尽管尚属初创阶段，但终究是体育运动的进步。

---

① 陈云枢主编：《苍梧县志》第二十七编，《文化·事业机构》。

② 余晋良主编：《龙州县志》、《文化艺术志》第四章《图书·档案》。

③ 据梁鸿勋：《北海杂录》记载，1886年（光绪十二年），英国人在北海开设普仁医院，附设男义学，即开体育课。

当时，在外敌不断入侵，国家日益贫弱的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是把开展体育教育与“强国保种”相联系的。1906年3月，清政府学部在“奏请将教育宗旨宣示天下”折中，也把“尚武”定作教育五大宗旨之一，认为“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论及学校体育，则云：

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语云：“行步而有强国之容。”记云：“礼者所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非虚语也。臣等尝询查日本小学校矣，休息之时，任意嬉戏，所以养其活泼之性也；口号一呼，行列立定，出入教室，肃若军容，所以养其守法之性也。又尝询查日本师范学校矣，师范为规制最肃、约束最严之地，而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特设大会，其国家且宣法令以鼓励之，其命意可知矣。中国如采取此义，极力仿行，日月渐染，习与性成，我三代以前人尽知兵之义，庶几可复乎。①

希望照搬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培养青少年一代，当然不妥。但它把体育教育与爱国图强相联系，则是可取的。

广西在推行新式体育方面，曾经做了一些工作，除规定城镇学堂以体操为必修科目，乡村学堂如条件许可亦应开设体操课外，并于1908年创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时，办了一届学制两年的体操专修科。同一年，还有人在桂林创办私立体操专修科学校，培养体育教学专门人才。② 所有专修科的教师在教学时，分别不同对象，以《普通体操法》、《高等小学游戏教科书》、《小学校体操法》、《瑞典式体操初步》以及《初等小学体操教授书》等作为教学的依据。③ 有的青年学子，如藤县的苏乐群，郁林的张家辅，容县的陈汉刚，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九九，5495页。

② 张树武等纂：《广西通志·体育志》第一编第一章《学校体育》，第三节《体育师资》。

③ 《广西学务提要·图书科》，4、9页。

贵县的李峻寰等，还远渡东洋，在日本学习体育专业，回国后从事学校体育教学工作。①

随着各类学堂体操课的开设，1907年，广西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体育运动会。

据举办这次运动会的“章程”记载，大会不称运动会而称“游艺会”，运动员进人比赛称为“演试”。直接举办这次大会的是广西巡抚衙门，因此，巡抚张鸣岐担任了大会的总会长，副会长则由藩司兼臬司王芝祥、提学使司李翰芬担任，下设评判、稽查、筹备、指挥、招待、卫生各司，分别负责裁判、纠察、总务、竞赛、接待和保卫救护等工作。经费白银1500两，由政府直接拨给。所以，这是一次由政府提倡与直接承办的运动会。

参加运动会的主要是学校的师生，计有学校39所，人数990人，其中小学堂33所，454人，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共6所，536人。此外，还有来宾和大会职员，也参加了部分项目的“演试”活动。

运动会会期两天。11月29日开幕，30日闭幕（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竞赛分普通会员、小学会员、来宾和职员四组进行。普通会员组由桂林中学堂、陆军小学堂等6所学校组成。他们竞赛的项目最多，计有300米、600米和800米竞走，算术竞走，戴囊竞走，暮夜行军，拉绳，犬牙形竞走，拾物竞走，越脊竞走，跳远，跳高12项，构成整个运动会的主体。小学会员组的竞赛项目有百米竞走，犬牙形竞走，记忆竞走，计算竞走，越脊竞走和电讯竞走6项。来宾组和职员组的竞赛项目较少，前者是提灯竞走和匙蛋竞走，后者是提灯竞走和300米竞走。比赛的结果，各组获胜的前三名的次序是：

① 据岑聘华、陈大荣在《建国前后贵县体育概况》一文中说：李峻寰，字镜堂，留学日本大森体育专科学校，继之者还有刘德操、周寿龄等人。学成归国后，由于时局动乱，使他们虽然身怀长技，却报国无门。见《贵港市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普通会员组：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优级师范学堂。

小学会员组：优级师范学堂附属高级小学堂，六塘公益初级小学堂，南区第三初等小学堂。

来宾组和职员组参赛意在提倡和助兴，所以不评名次。

从这次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和内容看，主要是一次田径运动会。但整个比赛，寓智力培养、体力锻炼和娱乐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体育竞赛和尚武精神结合起来，其举办目的亦可想见。这次运动会，虽然只限于桂林，但它无疑是广西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运动会，是广西新式体育事业启蒙阶段的一次检阅，在广西体育运动史上是有其一定意义的。①

新式戏曲的创作和演出

流行在广西地方的戏曲，除桂剧外，还有粤剧、彩调剧、师公戏、牛娘戏、壮剧、侗剧、毛难戏等等。它们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各有自己的特色。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下，国难日深，民生愈困，有的戏剧更加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特点；少数剧种甚或直接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大声呐喊。这是广西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彩调剧流行于广西各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拥有传统剧目数百个，绝大部分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爱情和揭露、鞭挞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愚蠢的，从不反映帝王将相以及他们的宫廷生活。因此，也往往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排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由于鸦片泛滥广西，以及嫖、赌等社会病态的日益严重，彩调剧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些问题。像《劝戒洋烟》（又名《汪三吹烟》），《妹劝哥》（又名《大脑壳借钱》）等戏，不

① 参看拙文《清代广西的一次运动会》，见桂林市志办公室编：《桂林史志》创刊号；《广西通志·体育志》第三编《运动会》，第一章《历届区（省）运动会》第一节《清代》。据记载：1908年，广西学界在桂林举行了第二次游艺会，参赛学校共51所，到会3700余人。并志此以供参考。

但通过剧中人的真实遭遇，讲明鸦片的害处，劝人戒除鸦片，重新做人，而且对鸦片商贩的谋财害命，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产生了《推翻满清》这样富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战斗内容的剧目。①

与此同时，彩调剧的演出从农村的地堂、泥台开始走向中小城镇的戏台。一些闲散的彩调业余爱好者，有不少人也成了半农半艺或专业艺人了。而且出现了妇女参与演出，冲破“妇女不唱调”的封建传统，成了著名彩调坤角。② 这也是颇有意义的变化。

流行于桂北、湘南的古老的桂剧，咸丰年间在桂林就出现了以“瑞华”命名的专业戏班；生角刘玉彩、旦角大喜美和小喜美就是“瑞华班”的主要台柱。到了光绪末年，桂剧艺术从剧本创作、演员培养到日常演出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唐景崧像

一是某些著名的官绅直接从事桂剧剧本的编写和组织演出的活动。如唐景崧辞官回乡后，潜心于桂剧的研究，编写了一部《看棋亭杂剧》四十种。③ 并于1896年在桂林组织了“桂林春班”，经常约请演员在家里演出。唐景崧所做的大量工作，不但使“桂剧没有自己的剧本”之说得到了若干修正，而且对于桂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也

① 丘振声、潘其旭等编：《彩调沿革初探》，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等编：《彩调戏剧史论文集》（下），1981。

② 杨爱民：《彩调剧》，见《广西戏剧史论文集》（下）。

③ 《看棋亭杂剧》四十种，原由桂林三经堂刻印社刻印成册传世，1944年湘桂沦陷，剧本散失。解放后，广西戏曲研究室编印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是由老艺人林秀甫等口授而笔录下来的。

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近代剧院（或称戏院、戏园）的创建，改变了过去除了在官府衙门或达官贵人的大公馆演唱堂戏，就是借助于庙宇、会馆的戏台，或者乡村的草台演唱酬神戏的局面。广西桂剧之有正式剧院，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桂剧著名艺人林秀甫与何元宝创办的“景福园”。这是他前往上海旅行参观回桂以后，仿照上海的剧院建立起来的。① 1910年，何元宝又在桂林组建了“世镜园”，同时成立了第一个名为“增福园”的女科班。② 继之，则有“和园”与马缨卿经营的“仪园”等。从此，桂剧开始在固定的剧院演出，逐步改变了经常游走于城乡庙台与草台演出以及坤角多由男扮的局面。因为剧院并立，各自为了发展业务，于是在1907年和1908年，桂林的“和园”与“仪园”相继到上海、天津等地招聘了一批京剧的生、旦、丑角来桂林登台演出，从此，我国的重要剧种京剧开始传入广西。③

三是有些艺人与革命党人相结合，戏院成了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以后，桂林的同盟会会员耿毅、何遂、刘建藩等为了“韬光养晦”，经常到凤凰街横巷内的景福戏院，借看戏掩人耳目，进行革命联络活动；还与唱小旦的荣兰拜了把兄弟，参加者有20多人，把一些本来不是同盟会的人也都带动起来，使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④

粤剧流行于广东。明、清以来，随着粤商和其他劳动者大量移居广西，加以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陈开、李文茂率大成军入桂征战，粤剧也日益成为广西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辛亥革命前夕，两广革命者还利用粤剧艺术开展宣传，号召人民奋起抗争。

---

① 李文钊：《试论桂剧的形成、演变和它的发展前途》，见《广西戏剧史论文集》（上），1981。

② 广西文史研究馆：《桂剧班社》，见《广西戏剧史论文集》（上），何元宝为桂剧旦角。

③ 黄淑良：《谈桂剧》，见《广西戏剧史论文集》（上）。

④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见《近代史资料》，1958（4）。

自1904年起，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即有富于民族革命思想的黄鲁逸、程子仪、黄世仲、陈铁军、黄轩胄等人，或撰写戏曲歌谣，刊于报端；或组织剧团，演出新剧，讥刺时政得失，歌颂爱国英雄，鼓吹民族革命，颇得各方好评。程子仪在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李纪堂的支持下，组成的采南歌剧班，黄鲁逸、陈铁军等组织的优天影剧团（原名优天社），都是当时有名的粤剧团。时人通称这些新剧团为志士班。①

约在1909年、1910年间，广东的优天影剧团曾到梧州演出。其所排演之剧目，类皆揭露时政之败坏，社会之黑暗，抨击清朝之腐朽苛酷。所有词曲，纯用粤语，间以说白打诨，庄谐杂出，极受观众的欢迎，每场俱告满座。由是见忌于地方官府，始罢演回粤。但演出方法之巧妙，寓宣传于旁敲侧击之中，已在群众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

在广东优天影剧团的启示与带动下，梧州的同盟会会员认识到戏剧既可以深入社会各阶层，又利于宣传革命主张，掩护革命活动。于是，在1911年夏间，取达尔文“优胜劣汰”学说之义，组织了“优者胜剧社”，作为宣传革命的基地。众推平南的清末秀才梁莲溪为社长，甘建斋、钱秀斋为副社长，吴芳圃为总务。社员有黄剑光、苏无涯、陈勉生、苏寿南、曾树栋等20人左右。成立之初，即派专人往广州聘请教师前来教练，并在梧州试演数场。但因教演的多是传统的老剧目，对革命宣传作用不大，遂将全社人员开赴澳门，得到黄鲁逸、陈铁军等的鼎力相助，由优天影剧团派人指导，所教剧目，除该团编演者外，大部采用陈少白、李纪堂、黎同廉等所组“天演公司”编写的新剧目，如《岳飞报国仇》、《黄帝征蚩尤》、《文天祥殉国》、《地府革命》、《侠男儿》、《剃头痛》、《虐奴报》、《黑狱红莲》、《邋遢妹拜神》、《博浪沙击秦》和《火烧大沙头》等。这些剧目，“有的表扬民族气节，排斥异族的侵略和压迫；有的讥讽时政；有的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大都对鼓吹革命寓

① 冯自由：《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见《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梁大年：《梧州独立杂记》，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有良好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当该社同仁学成正欲回梧州大显身手时，武昌起义爆发了。[①]

五、科学技术

广西近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虽然早在变法维新时期，有识之士就提出要重视西方自然科学，在学校教学内容上应有所兴革，并在这种主张推动下创办了一些“实业学校”。有的青年还走出国门，在国外留学，直接探求外国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然而，直至民国初年，各级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仍寥寥可数，把新的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者更少。

但是，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在求知或生活需要的驱动下，对上自天文、下至农耕、保健等事物做了有益的探讨，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如对天文学的探索，早在清道光年间，容县人王维新通过自己的观察研究，写出了《天文钩钤》。清光绪年间，郁林州人钟章元写出了《天文浅说》。钟章元是清道光癸未进士，授陕西清涧县，旋调郃阳县，以廉干著称。他在从政之余，“惟嗜学，博极群书，即至星历医卜，靡不通究”。[②] 这是十分可贵的。

医疗保健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关医学研究成果也较多。1840 年，桂林龙敬业堂出版了《方验辑成》一册。1858 年，劳崇光重刻了桂林杨鸿文堂藏版、韦进德编著的《医学指南》20 册。清同治年间，苍梧人李世瑞编纂了《本草拾遗》。1879 年，桂林蒋文成堂出版了贵县梁廉夫编纂的《不知医必要》四卷。这是他“取前人所著方论，择其辨症显明、药皆常用者，删繁就简，并参以己见，汇编成稿”的。目的在方便那些不知医者“能

① 曾树栋：《同盟会在梧州的宣传活动》，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② 文德馨：《郁林州志》卷一五，《人物列传·学行》。

家备一书，临病翻阅，不至为庸医所误”云。① 1881年，孙廉访编著的《急救应验良方》在粤东文华阁书局印行。1908年，钟远洋编著的《伤寒括要》在郁林翰文堂出版。第二年，于风八的《医医医》亦刊印面世。民国以后，又有路顺德的《治蛊新方》② 和刘绍汉的《舌胎图说》③ 面世。这些成果，虽非医学上的鸿篇巨制，但多“殚精医理”或留心保健者的经验之谈。④ 还应提到的是：1911年8月24日（宣统三年七月初一日），桂林的国医界同仁20多人，出于对祖国医学的尊崇，由刘绍香、房炤珊和吴仲复发起，组织了崇华医学会，希望通过学术团体，群策群力，加强中医中药的研究，达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造福社会人群的目的。⑤ 附带说一下，到了1922年1月26日（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广西，开始成立了国际性的志愿救济团体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梧州分会和桂林分会。⑥

工艺技术的发明、创造也不发达，见于记载者亦少。可以介绍的有融县廪生苏民甫研制了割草机、磨粉机等农具，以及制造骨粉的方法，以之与各种肥料混合，有益于农作物生长。附生梁镇中，发明用稻草造纸，将成品送巴拿马博览会，曾获二等奖章。而德惠村人莫桂玉，将旧水碾加以机括，既可碾米，兼可织布，成绩甚佳。路顺德还编写并刊行了整治农作物虫害的《捕蝗法》。⑦ 贵县郭南里的梁建枢（1883～1915），“家贫力学，创造木制双织布机，一人同时可织布二匹。其特点在用螺旋形歪盘轮，可免现时铁制织机因齿轮太多，修理不易之弊。又制吸水机、锯木机、切薯藤机、切薯丝机，

---

① 龚政、梁崇鼎等纂：《贵县志》卷一二，《学艺·著述》。

② 龙泰任纂：《融县志》说路顺德“殚精医学”，县属古鼎（今属融水县）人。

③ 该书刊于1917年，桂林经益堂有藏版。

④ 以上所述，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述作目录》，民国二十三年。

⑤ 吴钟复撰：《崇华医学会碑记》，摩崖刻石于桂林风洞山。

⑥ 《（北洋）政府公报》第二二五六、二二五八号《通告》。

⑦ 龙泰任纂：《融县志》第五编，《文化·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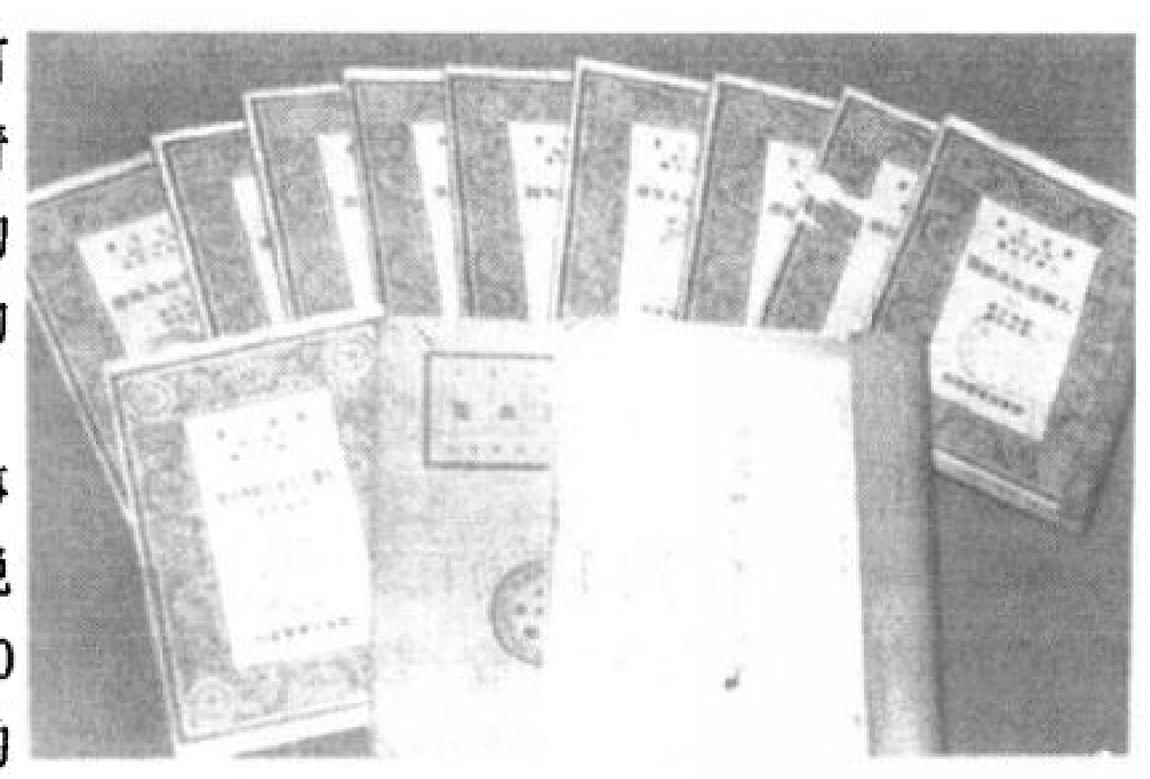
构造俱见巧思，合于实用。其切薯藤机已渐多仿造，通行于县属各地，余存模型”云。[①] 光绪年间，郁林州已有人利用密封的原理，进行食品保鲜加工。据地方志载：当时州中柑桔“种者颇多，价廉。客运致远，盛锡罐固封，勿透风，可至暴夏不坏”。由此可以待价而沽，从而价高数倍。[②] 所有这些所谓发明创造，只不过是在原有工具上作些改进，除利用水力外，其他依旧脱离不了人工操作。

在开办新学和要求变革的推动下，当时还有人编写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教材，或者直接把外国的一些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来。前者主要的有：光绪年间，徐绍桢编写了《勾股通议》上册（1988年），接着，又审订并出版了《学一斋算课草》二册（1897年），《学一斋勾股代数草》（1898年）和《学一斋算学问答》（1899年）诸书。与此同时，朱宪章编写并出版了《算学报》（1899年）。这些算学读本，都是由桂林九如堂刻印的。稍后，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出版了桂林何锡麟编写的《平面几何画法》（1907年），以及马君武翻译的《平面几何学》（1910年）。而靖西人曾彦（1886～1966），本名植铨，字其衡，号拙庵居士。19岁选派留学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回国，任归顺直隶州劝学所长，创办归顺两等小学堂。在此期间，他编写了《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学》、《查尔斯密小代数》和《数学辞书》等多种教科书。与此同时，桂林的李天佑也编写了《植物学》；灵川的秦嗣宗则编写了《理科教科书》和《理科讲授法》等。[③] 1911年，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又出版了马君武译的《矿物学》一书。上述的这些教材，全属理科，而且是普通的、普及性质的读物。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把这些前所未见的新知引进课堂，也就给学校涂上一层新学的色彩，说明广西的教育从旧

① 龚政、梁崇鼎等纂：《贵县志》卷一二，《学艺·科学发明》；卷一六，《人物·列传》。

② 文德馨纂：《郁林州志》卷四，《舆地略四·物产》。

③ 据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述作目录》。


马君武先生的译著（部分）

学到新学跨出了可喜的一步，也为青少年学子获取新的知识提供了起步的基石。

广西人士从事西方社会科学学说的介绍，始于20世纪初期，年轻的马君武是这项工作的开路先锋。1902年至1903年，21岁的马君武在日本东京译成并出版了日本福本诚的《法兰西革命史》，英国达尔文的《天择篇》、《物竞篇》，斯宾塞的《女权篇》、《社会学原理》，以及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等重要著作；同时还翻译介绍西方其他新学和抨击时弊的文章，如：《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唯心论巨子黑智儿学说》，《民权自由之敌奥太利宰相梅特涅传》等20余篇。在此后的十几年中，马君武更译介了卢骚的《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学说。[①] 马君武的这些译著，不仅使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和行动逐步从改良维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历程，而且对国人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发挥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① 参看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

附　录

一、大事记

1840年（道光二十年）

4月29日（三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各省大吏认真缉拿各府州县鸦片，不得草率塞责；命广西巡抚严查平乐、柳州等地传习邪教情况。

5月3日（四月初二日）

清廷谕军机大臣等：廉州府属合浦县龙头沙地方，海船贩运烟土入口，奸商偷运，府书与县丁勾通包庇，涉及郁林州属地方，着林则徐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12月16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广西巡抚梁章钜奏：上年颁发章程，限一年半禁绝鸦片，因罪名愈重，藏匿愈深，查拿愈严，趋避愈巧，恳请展限。不允。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1月27日（正月初五日）

以英军攻陷珠江口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旻宁下诏对英宣战。

3月15日（二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广西巡抚梁章钜、提督薛升调营兵600名驻防梧州，另调2000名迅赴广东，驻扎离广州40里之瓜埠口、鹰咀沙。

4月6日（三月十五日）

清廷以广西贮存2000斤至5000斤大炮甚多，命梁章钜等拣选数十

尊，解往广东调用。

嘉应直隶州知州、苍梧人李百龄奉命押解为虎作伥之鲍鹏赴京治罪，道光帝三次召见，询问粤东、香港情形，“恩奖频繁”。

6月14日（四月二十五日）

赐辛丑科一甲龙启瑞进士及第。19日，授一甲一名进士龙启瑞为翰林院修撰。

9月29日（八月十五日）

清廷命广西等已停铸钱文省份，务照每年应铸卯额，迅速开铸，以便流通，并搭放兵饷。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日）

中英《南京条约》签字，鸦片战争结束。此后，不少广东、湖南等地裁兵散勇流入广西，“散而为盗”，始则“沿江劫掠”，继则“横行乡间”。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是年

广西“盗起”，贵县破获关亚乌“纠会”巨案。湖南武冈饥民阻米出口风潮扩大。清廷命广西巡抚郑祖琛协同“饬属兜拿，毋令勾结蔓延”。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1月24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清廷议准巡抚周之琦疏报，开采永宁州崇庆铁厂，照例输税。

5月21日（四月初五日）

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抵达贵县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组织拜上帝会。

5月25日（四月初九日）

清廷谕：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广西等省向有银矿，着周之琦等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断不可假手胥吏，以免侵蚀、滋扰、阻挠。

6月30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议准周之琦疏报，设厂开采北流县大牛岭铁矿。

以护送越南员弁回国之兵船在桂平石咀河面被劫，帮同捕拿之夷兵3名被伤。清廷命广西巡抚周之琦彻底根究，严行惩办。随获“盗犯”新会六、关亚恒等57名。

9月5日（七月二十三日）

冯云山从贵县至桂平，先住浔州府城，旋入大宣圩古林社。

10月5日（八月二十四日）

以藤县护解钱粮银两船在昭平县地方被劫，苍梧知县叶庆熊、昭平知县张林一并交部议处。

11月30日（十月二十一日）

洪秀全从贵县经桂平回抵广东花县，在家设馆授徒，撰写革命论文。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春

冯云山从古林社入紫荆山，在高坑冲设馆授徒，并宣传拜上帝教。

是年

广西布政使张祥河撰成《粤西笔述》。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春

冯云山从高坑冲转至大冲村曾家设馆并传教。

秋

桂平人李观保与任文丙、刘亚乌等“聚党劫江上”，纵横江河之“艇匪”由此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5月13日（三月二十九日）

清廷命两广总督耆英于广西镇将中，择其实能训练士卒者，操练技艺精熟，纪律严明，壮健骁勇之劲旅二三千名，以期遇事调遣。

8月27日（七月十七日）

洪秀全从广东回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晤，时紫荆山信徒已逾2000人。贵县、平南、象州、陆川以及广东信宜等地，已有拜上帝会组织。

10月18日（九月初十日）

湖南新宁瑶人雷再浩、广西全州汉人李世德于湘桂边起义，旋入广西，由是各地义民“乘机窃发”。

26日（九月十八日）

洪秀全、冯云山捣毁象州三江口甘王庙，从此声誉大起，信徒加增更速。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武宣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起团将冯云山拘捕。旋被会众抢脱。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1月17日（十二月十二日）

王作新再捕冯云山，送解桂平县狱。6月，判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于途中潜归紫荆山。

3月（二月）

李自昌、张嘉祥、苏三相等联合贵县和广东钦州、灵山等地天地会众，在横州起事，以“济弱锄强”，“劫富济贫”相号召。

4月6日（三月初三日）

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

4月（三月）

武宣人陈亚贵联合宾州等地天地会起义反清，随即转战于柳州、平乐府属各地方，省城桂林为之震动。

5月（四月）

广东“艇贼”张钊、田芳等率众驾船攻梧州，继入浔州，有船数百只，拥众数千人，往来浔、梧江面。

9月16日（八月十九日）

清廷以本年五月有商船20余号在横州南乡被劫，计赃10000余金。北流、百色地方，比年以来亦复劫案频仍，着郑祖琛严密访查，认真催解。寻奏各地案犯已获，并分别严办。

10月5日（九月初九日）

萧朝贵伪托天兄耶稣下凡附身传言。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2月8日（正月十六日）

桂林大火，焚毁民居7000余家。

11月27日（十月十三日）

李沅发率众起于湖南新宁，旋入广西，全州、灵川、修仁各地会党纷起响应。

12月

左江镇总兵盛筠、浔州知府顾元凯招抚张嘉祥，提为把总，改名国梁。

是年

钟敏和、邓立奇各率数百人活动于苍梧县属之思德、安平、平政、多贤各乡，控制抚河，苍梧戒严。

1850年（道光三十年）

2月（正月）

博白人刘八聚众数千起于粤桂边区，兵官望风溃逃。

6月15日（五月初六日）

清廷以广西马平、迁江、贵县、永福、永安、修仁、苍梧等地“会匪焚劫”，宣化、庆远、桂平、象州等地“贼首啸聚”，命巡抚郑祖琛严拿究办。

7月29日（六月二十一日）

天地会陈亚贵率众3000余人破武宣县城。旋北上，连克修仁、荔浦县城，直逼桂林。

7月（六月）

拜上帝会密谋“团营”。

8月20日（七月十三日）

石达开率贵县龙山拜上帝会众千余人屯桂平白沙圩，立辕门。开炉铸炮，旋往金田团营。

8月（七月）

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庆远各府士绅赴都察院呈诉广西“匪情”。

10月17日（九月十三日）

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迅速赴广西，会同郑祖琛等“悉心剿抚”。并于是月分别从湖南、贵州、云南调兵入桂。11月22日（十月十九日），林则徐在潮州普宁旅次病逝。

11月13日（十月初十日）

赖九、黄文金率拜上帝会众数千击败团兵于郁林州蒲塘圩，随即渡浔江入金田。

11月30日（十月二十七日）

天地会张钊、田芳、侯志、罗大纲等各率所部加入拜上帝会，后多叛变投敌，独罗大纲坚持联合。

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蒙得恩、胡以晃各率金田、平南会众大败兵练于思旺圩，第二日，迎洪秀全、冯云山从思旺回金田。

1851年（咸丰元年）

1月11日（十二月初十日）

拜上帝会众在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建立太平军，颁布军律五条。

3月23日（二月二十一日）

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立国号，称天王，建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31日（二月二十九日）

凌十八率广东信宜拜上帝会众攻郁林州城。5月5日（四月初五日）退回广东。

6月27日（五月二十八日）

博白刘八部将黄锦泗、冯子材倒戈降清。7月，刘八败亡。

9月25日（闰八月初一日）

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城。

11月7日（九月十五日）

永淳壮人杨隆盛、黄可经等，以豁免官租民租、自耕自纳相号召，聚会群众，应者十三屯万余人，旋以李文彩为首领，同起抗租。

12月17日（十月二十五日）

洪秀全在永安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又制定各官袍服制式，颁布太平天历。

1852年（咸丰二年）

2月4日（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元旦，在永安始行天历。

4月5日（二月十六日）

太平军在永安破围东出，8日（十九日），大败清军，杀长瑞等四总兵及兵弁4000余人。

18日（二月二十九日）

太平军进攻桂林城。

5月19日（四月初一日）

太平军从桂林北上，22日（初四日）占领兴安县城。

6月3日（四月十六日）

太平军破全州城。5日（十八日）挥师北上时被清军伏击于水塘湾，南王冯云山伤重牺牲。6日（十九日），太平军从陆路转攻湘南。

夏

吴凌云在新宁州起义抗清。

1853年（咸丰三年）

2月15日（正月初八日）

清廷谕内阁：免广西全省咸丰元年缓征额赋十分之五，永安、桂平、宣化、永康等十五厅、州、县咸丰二年应征额赋十分之三。

6月28日（五月二十二日）

兴安武举张凤岗、廪生侯尔宇聚众攻占县城，杀知县蔡映符，随即分路攻全州，破灵川城，进逼桂林。

冬

贵县壮人黄鼎凤在覃塘起义。

是年

奉旨设广西官钱局，招商承办，经理宝钞、大钱的发行、汇兑。开始使用钱票。

1854年（咸丰四年）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

天地会胡有禄、朱洪英攻占灌阳县城，建号升平天国，胡有禄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

冬

左江道张敬修以“剿办艇贼筹经费”，于梧州关下“设厂抽厘”，“名经费厂”，为广西厘税之始。

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潜入西林。

1855年（咸丰五年）

5月23日（四月初八日）

陈开、李文茂率众4万余，乘船艇千艘从广东溯江而上，攻梧州、藤县、平南。9月27日（八月十七日），破浔州府城，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年号“洪德”，陈开称洪德王（亦称镇南王）。

夏

巡抚劳崇光依照户部有关章程，在梧州开办盐厘。

9月4日（七月二十三日）

巡抚劳崇光奏：广西办理捐输章程，照饷例减三成办理，并准以制钱1500文作银一两交纳。

1856年（咸丰六年）

2月29日（正月二十四日）

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在西林被知县张鸣凤逮捕，旋处死。

7月25日（六月二十四日）

法署使顾思以马赖在西林被杀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抗议，要求赔偿并“惩凶”。

是年夏

来宾、武宣、藤县、岑溪、平南、郁林、博白、北流、容县、陆川等州县洪水成灾。

8月29日（七月二十九日）

李文茂率军攻占平南县城，杀知县李载文。

1857年（咸丰七年）

3月2日（二月初七日）

李文茂率军攻占柳州府城，改柳州府为龙城府，改马平县为瑞龙县。李文茂称平靖王。

5月27日（五月初五日）

大成国定国公李文彩率部攻入南宁，改南宁府为南安府，宣化县为永宁县。10月2日（八月十五日），清军复南宁。

8月15日（六月二十六日）

黄鼎凤率众万余人攻占宾州城，擒杀知州翟景禧。

12月28日（十一月十三日）

法国以马赖在西林被杀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攻陷广州。

1858年（咸丰八年）

5月30日（四月十八日）

大成国平东王梁培友为广东提督崑寿所败，退出梧州。

6月27日（五月十七日）

《中法天津条约》签字，允许增开口岸、公使驻京，并准外人在内地游历、传教。

11月（十月）

巡抚劳崇光奏准照章在桂林、平乐、浔州、梧州、郁林等府设厘金局（卡）。

1859年（咸丰九年）

2月24日（正月二十二日）

英法兵舰5艘，在巴夏礼、斯托宾齐带领下，闯入梧州，会晤崑寿，测量街道、河段，探问前往桂林、浔州道路。次日东去。

8月22日（七月二十四日）

石达开率太平军从湖南陆续入广西。27日（二十九日），国宗石镇吉部攻桂林。

9月16日（八月二十日）

石达开部将陶金汤联合张高友攻占永安州。不久，陶金汤被张高友杀害，部众散亡几尽。

10月5日（九月初十日）

石镇吉军撤离桂林。

15日（九月二十日）

石达开军占庆远府城。

1860年（咸丰十年）

1月25日（正月初三日）

郁林州发生5.5级地震，波及浔州、梧州、武缘及广东高州、廉州各州县。

1月31日（正月初九日）

清军攻陷柳州。

4月6日（三月十六日）

石镇吉军攻百色，战一月，不利，东走都安被俘死。

5月23日（四月初三日）

石达开弃庆远，率部向柳州、南宁府转移。

8月10日（六月二十四日）

石达开军赖裕新部攻南宁。

是年

两广总督劳崇光创设桂林同善官局，便民典当。

1861年（咸丰十一年）

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

吴凌云在太平府立延陵国，自称延陵王。

6月（五月）

石达开部将彭大顺、朱依点、吉庆元等率所部离开广西，回归天京（南京）。

7月16日（六月初九日）

石达开率军进驻贵县。

8月21日（七月十六日）

广西按察使蒋益澧攻陷浔州府城，陈开在出走途中被俘，大成国败亡。

10月26日（九月二十三日）

石达开率军从融县进入湖南绥宁。

1862年（同治元年）

5月14日（四月十六日）

黄鼎凤联合大成军余部共数万人会攻浔州府城，历时两月，不利，退走。

1863年（同治二年）

2月（十二月至正月）

清军围扶绥陇罗圩（今扶绥县东罗村），吴凌云在突围时战死，长子亚忠（或作亚终）接统其众，转战于镇安、归顺等地。

春

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桂平等县“贼目”大会于容县之自良圩，群推覃亚税（或作亚帅）为六县盟主，称开国公，戴九称建国公，范亚音称镇容公，改自良圩为万安郡。

1864年（同治三年）

5月（四月）

黄鼎凤在平天寨造宫殿，称建章王。

6月24日（五月二十一日）

建章王黄鼎凤与军师周竹岐在贵县兵败被俘，延续十年的抗清起义失败。

1865年（同治四年）

2月（正月）

吴亚忠率部围攻镇安，左、右江农民军纷起响应，群推吴亚忠为首。

是年

武缘、宾州、上林、马平、柳城、来宾、融县、武宣、象州、临桂、灵川、天保、恩阳、奉议等20余州县大旱，百草焦枯，米珠薪桂，民多饿死。

1866年（同治五年）

2月（正月）

吴亚忠入驻归顺，分兵屯新圩、旧州、养利、向都、剥隘及越南牧马、保乐等地，据地纵横数百里。

刘永福率200余人与吴亚忠联合，在归顺安德创立黑旗军。

9月（八月）

吴亚忠率众攻占泗城府城，杀知府陈燮燧。

1867年（同治六年）

1月5日（同治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清廷以广东肇庆等处土客构衅，仇杀多年，经派兵弹压，命将客民遣送高、廉、雷、琼及广西之贺县、容县、贵县、平南、苍梧等处安插，并准客民编籍考试。

1月12日（十二月初七日）

清军攻陷泗城府，吴亚忠退回归顺州。

2月（正月）

刘永福以筹粮为名，率黑旗军300余人脱离吴亚忠，入越南六安州。

1868年（同治七年）

5月（四月）

清军冯子材部破归顺州。

7月（五至六月间）

吴亚忠率军转入越南境，越南请清廷出兵援救。

秋（六月）

巡抚苏凤文派员会同各州县官绅清丈田亩，立新田赋户册，先从浔州始。至1875年（光绪元年），全省清丈立册告竣。

是年

广西厘金总局在桂林成立，专司厘税事务。

1869年（同治八年）

4月（二至三月）

冯子材率军分路入越南，大举进攻吴亚忠部。

6月3日（四月二十三日）

清军败吴亚忠军于越南高平。

10月31日（九月二十七日）

吴亚忠在那宥战死，所部溃散，起义失败。

1870年（同治九年）

7月26日（六月二十八日）

来宾县暴风大雨，红水河舟覆殆尽。

是年

北海创设“森昌成”号民信馆。

1871年（同治十年）

春

吴亚忠余部黄崇英（盘轮四）等在越南复起，踞北圻之河阳等地。

4月14日（二月二十五日）

以越南“匪乱”，清廷命署广西巡抚李福泰增兵布防，以冯子材率防兵16营驻龙州，旋又督兵出关“助剿”。

11月19日（十月初七日）

清廷命巡抚刘长佑整饬边关内外各军，并酌予裁并。

1872年（同治十一年）

是年

郑献甫卒于桂林榕湖经舍。

1873年（同治十二年）

11月5日（九月十六日）

法国侵略者安邺抵越南，20日攻陷河内，随又占领海阳、宁平、南

定等城。

12月21日（十一月初二日）

刘永福应越南之请，率黑旗军数千自保胜（老街）至河内助越抗法，大败法国侵略军，击毙安邺。

1874年（同治十三年）

11月30日（十月二十二日）

南丹土州莫云羲反。

1875年（光绪元年）

6月8日（五月初五日）

广西乐业、贵州罗甸发生6.5级地震，大地轰鸣，山崩地陷，大量房舍被毁，人畜死亡。泗城及镇安、思恩、南宁、柳州、百色、庆远各府、厅皆有不同程度波及，损失惨重。

是年

以土田州岑氏土族争袭械斗多年，清廷革去土田州知州世职，改置恩隆县，隶百色厅。

天主教广西教区成立，法国神甫文芎理为首任主教。

1876年（光绪二年）

9月13日（七月二十六日）

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内定北海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之地，并“免收洋货厘金”。

是年

王拯病逝。

1877年（光绪三年）

2月19日（正月初七日）

北海设立海关，英国人吉德为税务司。3月18日（二月初四日），英国在北海建领事馆，并代理奥、美等国商务。4月1日（二月十八日），北海正式开埠。

是年

法国天主教在涠州岛建立教堂，从此教会势力控制了该岛。

1878年（光绪四年）

10月23日（九月二十八日）

广西记名总兵李扬才伪称奉命募勇出关，集众万人在钦州、灵山起事，是日经上思进入越南。

是年

苍梧、昭平、永安、贺县、郁林、平南、归顺、罗城、龙胜等地大水成灾。

1879年（光绪五年）

1月（光绪四年十二月）

清廷应越南之请，命冯子材率军入越追剿李扬才。

10月17日（九月初三日）

李扬才在越南投案自首，旋被押解回国，在桂林处决。清军随即撤兵入关。

是年

英国派人勘测北海港口，并绘制海港图。英国开辟香港至北海航线，以“海南号”轮船办理定期客货运输业务。

1880年（光绪六年）

9月（八月）

抽调广西绿营兵6营3000人，仿湘、淮军营制，改为练军。

是年

灵川县县民李世林等兴办七都炼铁厂（后更名宝兴铁厂），采矿炼铁，年出铁30吨。

1881年（光绪七年）

4月8日（三月初十日）

清廷命巡抚庆裕督办广西农桑。

是年

南宁、太平、桂林、梧州、浔州、百色等府厅属各州县大水，左江灾情尤重，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数十万亩。

以法国侵略越南，清廷命广西提督黄桂兰率兵出关，驻越南北宁一带。

法国在北海建天主堂，并成立北海教区。

1882年（光绪八年）

6月25日（五月初十日）

广西已革道员赵沃奉命率兵出关，与黄桂兰军互为犄角，是为驻越左、右两路军。

7月12日（五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署两广总督曾国荃，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统筹滇、桂两省边防。

9月16日（八月初五日）

清廷准吏部主事唐景崧奏，亲赴越南联络刘永福黑旗军抗法。

10月（八至九月）

以法国侵略越南，贵县桥圩人李亚英率数百人到三板桥捣毁法国天主堂，并捆缚神甫。

1883年（光绪九年）

1月

唐景崧往越南北圻。

3月

巡抚倪文蔚拟定设立省河（即抚河）、梧州、浔州、柳州、南宁水师5营，巡船135艘，防勇1820名。

4月26日（三月二十日）

布政使徐延旭奉命出关视师。

5月19日（四月十三日）

刘永福率黑旗军设伏于河内纸桥，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将领李维业中校。

7月（六月）

两广总督张树声以越南事急，调兵驻防北海，并修建地角、冠头岭等炮台。

9月1日（八月初一日）

法军水陆军进攻丹凤，黑旗军血战三日，再败法军。

是年

金秀瑶山召开首次石牌大会，成立金秀总石牌。

桂林大火，毁房舍甚多。

1884年（光绪十年）

3月12日（二月十五日）

在法军进攻下，入越清军全部溃退，山西、北宁相继失守。26日，清廷诏拿徐延旭，命潘鼎新赴广西，寻任为巡抚，办理援越抗法军务。

4月7日（三月十二日）

清廷下诏拿问黄桂兰、赵沃。黄桂兰畏罪自尽。

7月（闰五月）

广州经梧州至龙州的有线电报安设完成。

8月17日（六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法人肇衅，无理已甚，命岑毓英促刘永福出兵迅图规复北圻，并令滇、桂各军陆续进发。

8月26日（七月初六日）

清廷以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进犯东南海疆，下诏对法宣战，随即调集桂、粤、湘、鄂各军出关。

12月3日（十月十六日）

冯子材奉命在钦州组建萃军。

是年

天主教会保送12名广西青年往南洋槟榔屿大修院学习宗教知识，是为广西青年外出留学之始。

1885年（光绪十一年）

1月20日（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

冯子材率萃军18营自钦州开抵龙州。

2月12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越南东路法军大举北犯，潘鼎新弃谅山逃入镇南关，清军随之溃退，粮饷、炮械损失殆尽。

2月23日（正月初九日）

法军攻陷文渊，潘鼎新弃镇南关退至幕府、凭祥，再逃匿于龙州海村。镇南关陷敌。

3月2日（正月十六日）

冯子材、王孝祺各率所部开赴镇南关前线，负责龙州西运局之广西按察使李秉衡协调各军，共举冯子材为前敌主帅。

3月24日（二月初八日）

冯子材、苏元春率军痛歼法军于关前隘，残敌狼狈败走。是日，清廷下诏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革潘鼎新巡抚职。冯子材随即率军出关，数日之间，连克文渊、谅山等地。

4月4日（二月十九日）

英人金登干代表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停战条件》。三日后，清廷命令前线清军限期撤退回国。

6月10日（四月二十八日）

苏元春奏报撤兵还界、布置边防意见。

6月

桂林、平乐、梧州、浔州、郁林州各府属州县大水，屋毁人亡，灾情惨重。

8月29日（七月二十日）

清廷派内阁学士周德润、鸿胪寺卿邓承修分别驰往云南、广西，会同地方官员办理中越勘界事宜。

是年

对“土药”（鸦片）公开征税。

1886年（光绪十二年）

2月18日（正月十五日）

李秉衡奏办裁兵节饷，保留常驻防军20营11000人，节饷可达20余万两。

9月13日（八月十六日）

清廷诏准广西提督从柳州移驻龙州，督提兼办边防督办；另设柳庆镇总兵官之议。

是年

苏元春奏：年初动土改建镇南关，年底可竣工。

桂林、梧州、平乐、浔州、郁林、钦州等府30余州县百日无雨，灾情极重。

1887年（光绪十三年）

2月4日（正月十二日）

清廷诏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开放两广铁禁。

3月29日（三月初五日）

中法两国在越南芒街签订《边界勘界节录》。

5月

梧州至桂林电报线路架设竣工。

6月26日（五月初六日）

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续议商务专条》，中国被迫开龙州和云南蒙自为通商口岸。30日，设太平思顺道兼管龙州通商口岸有关中外交涉事务。

1888年（光绪十四年）

2月21日（正月初十日）

清廷准抚巡沈秉成奏，在巡抚衙门设立洋务司，以臬司张联桂理其事。

是年

巡抚沈秉成、布政使马丕瑶在桂林设官蚕局，编印植桑、育蚕及缫丝书籍，劝各州县大力兴办桑蚕。

融县长安街大火，焚毁民居2000余家。

广西全省户口调查，合计人口759万。

1889年（光绪十五年）

4月（三月）

临桂人张建勋中己丑科状元。

6月1日（五月初三日）

正式成立龙州海关，以太平思顺道兼龙州关监督，美国人客格纳为税务司。

11月24日（十一月初二日）

巡抚马丕瑶奏准开设官书局。

是年

清廷命各省测绘舆图。马丕瑶延聘技师，购置仪器，在桂林、柳州、南宁设局，分区测绘，历年余始成草图。

法国在龙州圈地设领事馆。

1890年（光绪十六年）

2月18日（正月二十九日）

巡抚马丕瑶奏，经四年施工，用银8万两，龙州建造城垣工竣。

4月14日（闰二月二十五日）

中法签订广东防城段与越南界约。

8月29日（七月十四日）

博白与广东廉江发生6级地震。博白城关一带撼动三番，官民房舍墙瓦晃落，三瑾堡地陷成潭，深不见底。郁林、桂平、陆川、岑溪、钦州各地，皆受波及。

1891年（光绪十七年）

2月14日（正月初六日）

巡抚马丕瑶奏于省城独秀峰麓建造书楼，庋藏各省书籍，并饬各属照省城章程分建书楼。又奏：准予土司送土民应试。

8月7日（七月初三日）

上思州升为直隶厅，归太平思顺道统辖。

1892年（光绪十八年）

4月23日（三月二十七日）

太平思顺道蔡希邠与法国代表西威仪会勘桂越西段（自平而关向西至各达村）界线完毕。

是月

临桂人刘福姚中壬辰科状元。

1893年（光绪十九年）

11月26日（十月十九日）

清晨，永康州发生4.75级地震，“屋瓦多被翻烂”。

12月29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法订立《广东越南第二图界约》，具体确定钦州与越南等地界址。

1894年（光绪二十年）

6月19日（五月十六日）

中法两国勘界委员在龙州签订《广西越南界约》（又称《桂越界约》），确认界图，广西与越南界图共立界石207块。历时九年的划界、勘界交涉宣告结束。

7月24日（六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军速赴台湾办理防务。第二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

9月7日（八月初八日）

巡抚张联桂奏称：历时五年测验的《广西全省舆图》绘制完成，装订成册，进呈朝廷。

10月13日（九月十五日）

清廷以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

11月23日（十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冯子材招募旧部10营，速赴江南布防。

是月

英国公使窦纳乐要求清廷开南宁为商埠，未允。

12月下旬（十一月下旬）

康有为应桂林龙泽厚之请，从广州抵桂林，讲学于叠彩山景风阁。

冬间

游勇陆亚宋部数百人受苏元春招安，从越南回国。所部改编为健字前营，以陆亚宋为管带，并改名荣廷。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冯子材率萃军10营从钦州经广西、湖南、江西往江南，4月4日抵南京，旋奉命驻镇江，节制淮海、江南吴淞守军40余营。

5月2日（四月初八日）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局势危急，康有为、梁启超邀集18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开会上书拒和。广西举人99人在上书中签名。

5月25日（五月初二日）

清廷签订卖国条约，割让台湾，人民奋起反对，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坚持抗日。6月初，唐景崧携印“内渡”。

6月20日（五月二十八日）

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除重申开埠通商外，法国取得了货物进出口减税，水陆交通、铁路建筑等特殊权益。

10月19日（九月初二日）

刘永福因在台湾抗日粮尽援绝，被迫从台南内渡回粤。

是年夏、秋间

容县、恭城、富川等地暴雨成灾。南宁、柳州、桂林、浔州、梧州、泗城、郁林、百色等府、州、厅、县大旱，饥民抢粮及阻米船出境，民变时有发生。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3月6日（正月二十三日）

郑观应受李鸿章之命，从广州乘船抵梧州，考察沿河水道及土货出口情况，并与地方人士洽谈购买地段、修建码头问题 。

3月20日（二月初七日）

清廷在法国胁迫下，准许修筑龙州至越南同登铁路，以苏元春兼任督办。

是月

苏元春率领军民艰苦奋斗，历时十年的边防建设工程宣告完成。

5月7日（三月二十五日）

中法签订《中越边界会巡章程》，规定中越沿边设对汛处十处。

5月9日（三月二十七日）

郑观应再到梧州，选定泊位码头，为招商局轮船通航做准备。

9月21日（八月十五日）

根据《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在凭祥设立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以提督苏元春兼任督办。

是年

春夏数月，全省大旱，柳州、庆远、南宁、思恩、太平、浔州各府灾情尤重。巡抚史念祖、两广总督谭钟麟拨银开仓，并招商至邻省和派员至香港购进洋米赈济灾民。桂平有割饿殍股肉烹食的惨象。

苍梧严式镠得梧州厘金督办谭国恩之助，创办西学堂，习中文并英文、算学两科。

史念祖奏：本年全省开垦官荒民荒，造田7310亩。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2月11日（正月初十日）

康有为再游广西，抵达桂林。

是月

招商局轮船从香港首航梧州成功。

4月1日（二月三十日）

游勇游维翰痛恨法国侵略，于凌云县乐里圩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甫马仙及教徒两名。21日，法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6月下旬，游维翰被清兵俘获，后被杀害。

4月8日（三月初七日）

康有为在桂林西华门外广仁善堂开圣学会。15日，出版《广仁报》，并筹建广仁善堂。

6月4日（五月初五日）

根据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梧州被迫正式对外开放。设立梧州海关，由英国人阿歧森代理税务司。

是年

北海、龙州、梧州三口岸开办邮政，由海关税务司兼理邮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1月初旬

马平会党刘三金、梁才等聚众数千，在三都圩竖旗起义，反对官绅抽捐，旋遭镇压。

4月5日（三月十五日）

巡抚黄槐森奏请将五金、煤矿、铁路招商集股开办。

4月12日（三月二十二日）

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广西举人龙焕纶、况仕任、龙应中、程式榖等9人列名与会。

4月21日（闰三月初一日）

法国天主教士苏安宁与两教徒在永安州被执杀。6月，清政府在法国要挟下，以革官、惩凶、赔银4万两结案。

6月28日（五月初十日）

李立廷在陆川县平乐圩举旗起义。

9月

广西裁汰绿营，削减水师，改建练勇，先从抚标、提标、各镇标实行。时全省共有练兵1400名。

12月13日（十一月初一日）

苏元春在官绅及商界集资7200元，在龙州开办邕龙利济局，专营南宁、龙州间的客货航运。

是年

修仁、平南等地会党纷起，游勇经左江分股潜入桂西各地活动。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1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总理衙门据黄槐森奏，请援岳州等处成例，自开南宁为通商口岸。清廷虽下诏“依议”，但并不即行。

5月15日（四月初六日）

黄槐森拟订《严查保甲整顿团练章程八条》，令各府、州、县依章实行。

9月15日（八月十一日）

苏元春与法国费务林公司订立《龙州至镇南关续立铁路十条》，商定路轨改为窄轨以及铁路修建中的各项经费开支办法。

11月28日（十月二十六日）

武宣发生5级地震，南乡山石震落，通挽区龙统泉塞，转从大樟树前龙美地涌出。象州地震有声，自北而南，金铁皆鸣。

是年冬

苏元春在龙州设立制造局，购置德国机器，制造军火。

黄槐森以桂林文昌门外机器局旧址为校址，创办体用学堂，聘唐景崧为总教习。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是年

广西“匪乱频仍”。那马厅发生戕官巨案；泗城府“匪徒滋扰”；西隆州“游匪闯入”，毁衙署、劫官印；武宣县会党聚众攻城；永淳县会党与游勇结合，围攻防营哨所；黔桂边地“游匪盘踞蔓延，势至鸱张，久为边患”；平乐、桂林两府会党纷起。清廷命在籍礼部左侍郎唐景崇督办全省团练。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2月

据巡抚黄槐森建议，梧州商船总会成立。

4月4日（二月十六日）

清廷命广西巡抚黄槐森开缺候简，调湖北巡抚于荫霖为广西巡抚，后因英国反对，改以云南布政使李经羲出任，旋又以云南巡抚丁振铎为广西巡抚。

8月

在出洋游学，探求新知潮流的推动下，桂林人马和（君武）自费东渡日本，入西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

是年

左江各州县瘟疫流行，患者“十死其五”；宜山县大瘟疫，“有全家死绝者”。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2月25日（正月十八日）

法国军官达隆由龙州布局对汛处返回越南途中被杀，法国认定为中国散兵所为，要求清廷严惩署广西提督马盛治，并调苏元春从湖北回防广西。

5月13日（四月初六日）

巡抚丁振铎奏报省城书院改设学堂情形：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

秀峰书院改为育才馆，以桂山书院院址办工艺厂。

7月（六月）

黔江大水，融县县城及近河十余里乡村尽被淹没，为有县以来最大水灾；柳州全城被淹，道署及民居多成泽国，为百年来未遇之大水灾；来宾县江水入城，五日始退；武宣县三里区及沿河一片汪洋，漫无畔岸；象州沿河民房、田谷漂没。大水过后，城乡俱发瘟疫。

12月18日（十一月十九日）

以广西"游匪"蜂起，此拿彼窜，清廷命广西、云南、贵州三省"不分畛域，认真痛剿，方足以净根株"。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4月18日（三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负责"剿办广西游土各匪"。

4月25日（三月二十八日）

以巡抚王之春向法国借兵、借款镇压会党，旅居上海的广西人士在张园集会，号召两广绅商罢工罢市，并致电清廷阻止法兵入境，罢免王之春。

6月19日（五月二十四日）

岑春煊到广州接篆任事，旋上梧州坐镇"督剿"。

7月7日（闰五月十三日）

清廷据岑春煊奏，巡抚王之春，帮办军务，诸多蒙蔽；提督苏元春，养痈成患，贻误地方，着一并革职。

是月

梧州知府周天霖改梧州中西学堂为梧州府中学堂。

12月19日（十一月初一日）

巡抚柯逢时在桂林设立官银钱号，以布政使刘心源兼任总办，收发

司、局外款。

是年

梧州成立师范讲习班，是为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师范学堂。

唐景崧在桂林病故。

1904年（光绪三十年）

1月2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两广学务处制定考选出洋留学章程。是年夏，桂林李质和象州苏寿松考取留日生，怀集李灿基考取留美生，是广西考送官费留学之始。

3月10日（正月二十四日）

岑春煊以广西兵多疲弱，徒糜饷糈，奏请将尚存马战、步战及守兵5458名酌留182名，抚标、提标与镇标以下各官只留一员，余尽裁撤，并撤柳庆镇总兵，以右江镇总兵从百色移驻柳州，驻南宁之左江镇总兵移驻百色。

5月2日（三月十七日）

巡抚柯逢时以军费无着，奏请废厘金，行统税，将厘金总局改为统税总局。商民一度罢市反对。

5月7日（三月二十二日）

巡抚柯逢时奏请恢复光绪初年水师五军旧制。按水路之长短，官船之多寡，划分地段，各专责成。自桂林至昭平马江为中军，马江经苍梧至平南为前军，平南至横州大滩为左军，庆远、柳州两府河面至武宣为右军，南宁和百色等府、厅河面为后军。水师五军汛地，计船158号，统领管带16员，勇丁2088名。

5月26日（四月十二日）

柯逢时奏请筹设省城警察巡军。

6月24日（五月十一日）

清军绍字营管带陆亚发与梁桂才、黄留芝等在柳州发动兵变，攻占

马平县、柳州府和右江道衙门，缴获库银、枪械甚多。数日后，向柳州东北转移，各地会党纷起响应，众至万余，连营百里。

7月10日（五月二十七日）

以陆亚发攻占永宁州之三隍圩，军情吃紧，省城戒严，清廷迭颁谕旨命调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各省兵共3万余人入桂“会剿”。

8月21日（七月十一日）

广西大学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以沈赞清为提调，是日开学。

是年

容县人陆宠廷捐资创办女子学校于梧州。

王鹏运卒于杭州。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2月（正月）

边防督办郑孝胥倡立龙州学社，提倡新学，选送青年出省、出国学习。

5月（四月）

巡抚李经羲奏调郭人漳为桂林巡防营统领，编练新军，聘请蔡锷至桂林主办随营速成学堂。

8月20日（七月二十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广西马君武、邓家彦、卢汝翼、曾彦、蓝德中、曾龙章、谭鸾翰、朱金钟、欧晃等出席大会。马君武被选为执行部书记长兼广西主盟人，邓家彦被选为司法部判事长。

是月

以美国排华，全国掀起抵制美货风潮。梧州商界齐集粤东会馆订立约章，杜绝美货。桂林、南宁商民纷起响应，抵制美货进口。

桂平、贵县、柳州、南宁等地商民以白马卡统税委员胡大庚擅订苛

章，贪污勒索，纷起罢市罢航。

9月23日（八月二十五日）

桂林府中学堂成立。

是月

按察使余诚格在桂林创办广西初级警察学堂。在此之前，桂林已分区设立警察教练所。

10月19日（九月二十一日）

岑春煊奏："广西全省股匪一律肃清。"

12月（十一月）

黄兴由香港秘密来到桂林，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组织活动。第二年春初，与新军中的郭人漳、赵声、蔡锷、林虎等九人成立革命组织。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3月（二月）

太平思顺兵备道庄蕴宽创办广西陆军测量学堂于龙州，以测绘局长陈其蔚兼任学堂监督。

南宁、平乐、泗城三府分别创建中学堂。

5月21日（四月二十八日）

巡抚林绍年奏：遵章将农工商矿局改为农工商局，另设矿政调查局，专办矿务。

是月

广西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以李翰芬为广西提学使。广西学务处将高等学堂改设简易师范学堂。

8月

广西官绅陆嘉晋、梁济等68人联名奏请广西自办铁路，设立有限公司，公举于式枚为总理。

10月27日（九月初十日）

林绍年奏：请仿外洋商垦之法，招商垦荒，官府给照，定限升科。

11月（九至十月间）

改桂垣书局为广西官书局，专营印刷图书及报刊。

林绍年奏请设立官锑局，酌提公款收运官锑，并暂免出井税；又请招商查勘富川、贺县、南丹煤锡诸矿。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清廷照会各国公使，南宁正式开埠。

是月

广西陆军小学堂在桂林开学，以蔡锷为总办。

3月4日（正月二十日）

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等抵达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谋在两广及云南发动起义。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

4月（二至三月间）

钦州那彭、那丽、那思三乡人民2万余人，在刘思裕领导下，成立“万人会”，抗议钦廉道王秉恩征收糖捐。5月，抗捐失败，刘思裕被杀。

5月

庄蕴宽在龙州创办广西边防法政学堂，自任监督。

6月

广西抚院出版《广西官报》，每月一册，刊载本省要政及法令。

广西教育总会成立，唐钟元、郭春森分任正副会长。

7月24日（六月十五日）

在广西“同乡京官”的推动下，桂林铁路办事公所成立，公举梁廷栋负责。8月16日，成立梧州铁路办事公所。

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

王和顺、梁少廷等奉孙中山之命，率领200余人，在钦州、防城和

上思接界之王岗山起义，破防城，攻灵山，发文告，起而响应者3000余人。因郭人漳不履行内应之约，起义失败。

是月

梧州商务总会成立，以戴增谦为总理，苏智谦为协理。

11月29日（十月二十四日）

广西学界游艺会在桂林举行，巡抚张鸣岐为大会总务长，参赛者近千人，会期两天，是为广西举办体育运动会之始。

于式枚以出国考察宪政所得上奏清廷，认为宪政之名，中国古已有之，切不可“舍本随人”，有失“尊主庇民之义”。

12月1日（十月二十六日）

同盟会以黄明堂率领400人，由越南入境，夜半占据镇南关右辅山。4日，孙中山偕黄兴等亲临前线开炮击敌。起义军苦战七昼夜，终因弹尽援绝退去。

12月8日（十一月初四日）

英国借口商船“西南号”在广东肇庆被劫，于是日派舰非法闯入西江，搜查并扣留过往船只，我国轮船“广西号”被击沉。

12月15日（十一月十一日）

巡抚张鸣岐奏请在桂林设立学堂，专教土族子弟，期能从中任贤使能，使土族有大治之时。

12月17日（十一月十三日）

梧州绅商发布文告并召开会议，谴责英国侵犯西江航运权和缉捕权。旅沪及留日商、学各界人士纷纷集会声援。

是年

南宁同盟会成立，入会者有雷在汉、周君实、黄筒初等十余人。

提学使李翰芬在桂林开办广西女子师范学堂。

柳州、太平、庆远等府成立中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2月（正月）

提学使李翰芬将广西简易师范学堂改为广西官立优级师范学堂，专事培养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资分由各府道负责培养，并在桂林、梧州、南宁设立初级师范学堂。

3月27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率军发动钦廉起义，历时40余日。

4月（三月）

广西全省自治局在桂林成立，附设自治研究所，培养“新政”人才。

5月（四月）

梧州爱国绅商筹议设立“梧州航业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购船航行西江各埠及香港，以与洋船公司竞争。

7月3日（六月初五日）

广西讲武学堂在龙州开学。是月，广西为编练新军，设兵备处于桂林，以庄蕴宽为总办，钮永建为帮办。

7月8日（六月初十日）

张鸣岐奏：派员出国，周历美洲各埠，联络商情，并以筹办广西矿务，恳请免征出井、出口税五年，以裨实业。

10月（九月）

遵照清廷关于一年开办谘议局谕旨，成立谘议局筹备处，以布政、臬政、学政三司为总办，唐钟元、唐尚光、陈树勋、陈智伟和蒋继伊五人为襄办。

是年

南宁、柳州成立商务总会，黄增荣为南宁总会总理，梁耀基为柳州总会总理。

张鸣岐改广西官银钱号为广西银行。总行设桂林，派蒋继伊筹办。梧州、南宁、龙州、上海、广州、汉口、衡州各地成立分行。次年正式

开业。

甘德蕃、蒙经、陈太龙在梧州办《梧州新报》，宣传君主立宪；甘绍相、区笠翁等在梧州办《广西日报》，宣传民主革命。

广西曾彦，云南赵仲，越南潘佩珠在日本东京成立革命团体“桂滇越联盟会”。

全国掀起抵制日货风潮，梧州、南宁、桂林等地起而响应，日货进口锐减，土货生产与出口增加。

1909年（宣统元年）

5月9日（三月二十日）

张鸣岐与英国葆林公司签订《桂林全州铁路测勘合同》，由葆林公司勘测线路。

10月14日（九月初一日）

广西谘议局在桂林王城成立，选举陈树勋为议长，唐尚元、甘德蕃为副议长。第一届会议历时月余，经推选并由巡抚裁定黄乃昌、冯汝梅、吴锡龄为广西出席北京谘议局议员。

是年

张鸣岐派道员刘士骥出国招商兴办实业。粤籍侨商叶恩随刘回国，与刘义任等集资组织“振华公司”，开采贵县平天山银矿。

永淳、岑溪、怀远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众武装抗捐斗争，附近州县纷起响应，相持年余始息。

建广西图书馆于桂林王城。次年2月正式开馆。

1910年（宣统二年）

2月28日（正月十九日）

设立广西劝业道，以胡铭槃署道员，综理农工商各业。

是月

广西内河商船总会在梧州成立，周之济为总理。以联络浔、桂、柳三江商船，悬挂国旗，不用洋单偷税，并清查匪徒为宗旨。

4月（三月）

桂林新军革命党人发起成立“广西军国指南社”。5月2日（三月二十三日），出版《军国指南》月刊。

7月初（五月下旬）

归顺、镇边、天保等地群众抗缴门牌捐，围攻归顺州城。

7月9日（六月初三日）

于桂林成立省会高级审判厅、桂林地方审判厅与临桂初级审判厅，同时相应设立三级检察厅。

夏

张鸣岐清洗桂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蔡锷从南宁调回桂林，接任陆军干部学堂总办兼学兵营营长。

8月20日（七月十六日）

农工商部奏：广西自准招商报垦以来，已在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浔州、太平各府设立垦牧公司25处，新开水利290处，修整旧有水利360余处。

是月

桂林新军成立同盟会支部，耿毅为支部长。

广西督练公所在桂林成立，张鸣岐兼任督办。

10月（九月）

广西同盟会支部在桂林出版《南报》月刊。

10月12日（九月初十日）

广西谘议局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历时40日。会中因抗议张鸣岐未认真执行上届会议作出的限期禁烟决议案，全体议员提出辞职。后经资政院裁决并请旨批准，仍按原议执行，议员始复会。因陈树勋、唐尚元辞职，改选甘德蕃为议长，秦步衢、黄宏宪为副议长。

1911年（宣统三年）

2月5日（正月初七日）

郁林、贵县间发生5.25级地震，一日数次，屋瓦掉落，幸无人畜伤亡。

2月13日（正月十五日）

《南报》因言论过激被禁，广西同盟会支部改名《南风报》登记出版。

是月

陆军部核准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通讯电线工程。东线自广东廉州起，经灵山、钦州至南宁；西线自云南腾越起，经临安、开化、广西归顺至南宁，同时设临安、开化、归顺、龙州、南宁、廉州、钦州电报分局。

4月7日（三月初九日）

张鸣岐奏调御史赵炳麟督办桂全铁路。17日，赵炳麟以长（沙）永（州）线无着，主张先修桂梧路，以与西江航路相接。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广西李德山、刘古香等30余人参战，李德山、韦云卿、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韦树模、林盛初7人英勇战死，后葬于广州黄花岗。

4月29日（四月初一日）

广西教育总会会长唐钟元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育界总联合会首次会议，通过《统一国语方法案》等。

是月

广西建立新军混成协，以原学兵营4队为新军一营，另于桂林、平乐、梧州三府征得1100名，全协共2000人。

5月

桂林成立总商会，以温敬甫为总理。

7月10日（六月十五日）

梧州、龙州两埠商界发出通电，反对清政府借名铁路国有，收回民办粤汉、川汉铁路，转资外国。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

武昌新军发动起义，时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的广西学生160余人参加起义行列。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

柳州革命党人进攻左江镇衙门，总兵陈宗棠“献印投降”。刘古香出任柳州军政分府长。

11月5日（九月十五日）

浔州革命党人武装攻克平南县城，由卢殿林摄理县政。

11月7日（九月十七日）

巡抚沈秉堃在谘议局议长甘德蕃，副议长黄宏宪等劝说下，迫于革命大势，同意宣布广西独立。沈秉堃被举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21日沈秉堃辞都督职，后由陆荣廷继位。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

陆荣廷在南宁通电全国，“附和共和”，宣布独立。

11月21日（十月初一日）

浔州民军进攻府城，相持五昼夜，不克，散去。

11月23日（十月初三日）

梧州成立由沈林一主持的军政分府，宣布独立。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

陆荣廷在南宁发表通电，接受广西都督职务。

是月

广西军政府应湖北军政府邀请，派张其锽为代表，至武昌出席独立各省代表会议。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各省代表赴南京继续开

会，讨论并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1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日，通令全国改用阳历，以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之始。

2月8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陆荣廷在桂林就任广西都督，改军政府为都督府，下设四司二局。

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宣统帝溥仪下诏宣告退位。

2月13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位。

2月25日

广西都督府公布《广西临时约法》7章58条。

4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院更名临时参议会，选举林绎为议长，雷殷、杨煊为副议长。

10月

废道及直隶州、厅，留府建制，旋废府，悉改为县。

10月17日（九月初八日）

省临时参议会在南宁开会，决议省会由桂林迁南宁。

10月28日（九月十九日）

陈炳焜以龙州军政公府名义，核准开设娼寮，实行商包“花捐”。

12月

广西都督府开始使用电话。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2月

广西省议会正式成立，选举国民党人姚建生为议长，何英彦、张一气为副议长。

3月20日（二月十三日）

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于沪宁车站，孙中山随即号召武力讨袁。

3月

请准设立邕南、漓江、郁江、柳江、田南、镇南六道。

广西省农会成立，王树槐、莫景恒为正、副会长。

6月

广西邮政总局由桂林迁南宁。

7月12日（六月初九日）

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动“二次革命”，江苏、广东、上海等省纷起响应。

7月14日（六月十一日）

陆荣廷向全国发出通电，指责革命党为“乱党”，要求袁世凯严缉惩治，并望“友邦”配合缉拿。

9月9日（八月初九日）

“开国元勋”蒋翊武在桂林被杀害。

9月12日（八月十二日）

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宣布独立，起兵讨袁。

10月9日（九月初十日）

陆荣廷赶至柳州，按袁世凯指示，将被叛徒出卖的刘古香“就地处决”。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1月

陆荣廷政府开征检验田、房地契税。

中华全国机器总工会广西机器工会在梧州成立，这是广西最早的工会组织。

3月1日（二月初五日）

广西邮务管理局在桂林成立，由美国人阿林敦代理邮务长。此乃广西办理邮政的第一个省级管理机构。

4月

袁世凯北洋政府内务部通令解散各省议会。广西行政公署追缴国民党籍议员姚健生、张一气等25人的议员证书。

6月10日（五月十七日）

广西普降大雨，漓江、左江、右江及西江洪水暴涨，沿江38县受灾严重，为70年来所未见。

6月26日（闰五月初四日）

商务印书局在桂林设立分店。

6月30日（闰五月初八日）

袁世凯授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

12月

南宁建成电灯厂，正式开机发电。

是年

漓江、郁江、邕南三道分别更名桂林、苍梧、南宁道。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6月

袁世凯阴谋帝制自为，改授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为其子陆裕光荣加少将衔。

7月

袁世凯任命心腹人物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相继赋予监督全省财政、

司法及军务大权。

秋间

袁世凯复辟帝制御用组织筹安会示意各省军政大吏，就所谓“国体”问题进行公决。陆荣廷与王祖同立即联名去电表示拥戴，并派出“劝进”代表，要求将民主制改为君主制。

12月12日（十一月初六日）

袁世凯下令复辟帝制。

12月25日（十一月十九日）

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是月

梁启超、岑春煊、陈炯明等派代表秘密来桂，劝陆荣廷兴师讨袁。

是年

广西全省清理田赋，年增税收150余万元。

陆荣廷派军工兴修邕（宁）武（鸣）公路。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1月

陆荣廷派人往南京、上海与冯国璋联系，并邀梁启超来桂，共商讨袁问题。

2月8日（正月初六日）

袁世凯授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命他取道百色，进攻云南。

3月7日（二月初四日）

袁世凯命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要他率军从贵州进攻云南。陆荣廷乘机向袁世凯索取饷械。

3月11日（二月初八日）

陆裕光、马济奉陆荣廷密令，从滇东、百色夹击龙觐光军，尽夺龙

部饷械。

3月15日（二月十二日）

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广西独立，自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出师讨袁。

3月22日（二月十九日）

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宣布取消帝制，仍以大总统自任。

4月4日（三月初二日）

梁启超从上海乘日轮经越南到南宁，向陆荣廷提出组织护国军领导机构问题。

5月1日（三月二十九日）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8日，都司令部扩大为军务院。

10月6日（九月初十日）

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

10月14日（九月十八日）

陆荣廷自佛山率军入广州就督军职。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3月27日（闰二月初五日）

陆荣廷应黎元洪、段祺瑞邀请，取道香港、上海北上，27日到达北京。28日，分别会晤黎元洪、段祺瑞。29日，入故宫向废帝溥仪行礼称臣。

7月1日（五月十三日）

张勋在北京上书拥戴溥仪复辟，陆荣廷列名拥戴书中。

7月2日（五月十四日）

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贼”，宣布复任总理，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

7月3日（五月十五日）

陆荣廷在南宁发出通电，声明在“复辟伪奏中，列有己名，实为张（勋）、康（有为）所捏造”。4、5两日，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又发布通电，声言将兴师讨贼。

7月12日（五月二十四日）

张勋复辟失败。

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因反对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从上海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随又多次电请陆荣廷协同护法，都遭陆荣廷反对。

8月25日（七月初八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9月1日，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陆荣廷又通电反对。

10月2日（八月十七日）

陆荣廷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护国联军”，出兵湖南，与孙中山援湘攻闽的计划对立。

12月19日（十一月初六日）

陆荣廷、唐继尧与冯国璋秘密通电，主张南北议和。

是年

谭浩明裁兵募工修筑龙（州）水（口）公路。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1月2日（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莫荣新擅自拘捕孙中山大元帅府卫队连官兵60余人。对孙中山提出的交涉非但置之不理，且枪杀多人。

1月3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命海军炮击莫荣新督军府以示惩罚，随又举行招待会，揭露陆荣廷桂系阻挠护法的罪行。

5月4日（三月二十四日）

在桂系操纵下，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制为总裁会议制。20日，选举岑春煊、陆荣廷、孙中山7人为总裁，实权操于桂系。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

6月1日（四月二十三日）

陆荣廷在南宁通电就任广州军政府总裁。

10月

将宝桂鼓铸局改设为广西铜元局。

11月

北京政府国务院致电广州军政府，同意停战，并各派代表议和。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5月4日（四月初五日）

北京青年学生发起反帝反封的“五四”爱国运动，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和日本侵略山东的罪行。消息传至广西，学生、工人和市民纷起响应。

5月

梧州民船和轮船一律禁载日货，桂、柳、邕、梧及龙州、贵县等地青年学生、工人与市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抵制日货，并将查获日货当众销毁。南宁学联出版《爱国报》，桂林学生组织晨呼队、夜呼队，进行街头宣传，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广东督军莫荣新拘捕广州罢课、罢工、罢市之群众3000余人，激起粤人公愤。

6月

梧州学生提出“扫除文盲，反日与爱国并举”的口号，组织“平民义学”；南宁各界3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等要求。

11月

梧州各界成立“国货劝销场”和“日货陈列所”，号召使用国货，抵制日货。

二、主要参考书目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二

《清宣宗道光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清文宗咸丰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清穆宗同治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清德宗光绪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清宣统政纪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等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王先谦等辑:《雍正朝东华录》,光绪十年本

王先谦等辑:《道光朝东华续录》,光绪十年本

王先谦等辑:《咸丰朝东华续录》,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宣统元年

王先谦等辑:《同治朝东华续录》,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宣统元年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

文庆等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64

贾桢等纂:《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79

宝鋆等纂:《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影印本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民国二十一年本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民国二十二年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82
《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北洋）政府公报》，上海，上海书店，198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影印本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台）文海出版社
广西巡抚衙门编印:《广西官报》，宣统元、二、三年
《广西谘议局筹备处第一、二次报告书》，广西官书局，宣统元、二年
《广西谘议局第三、四次报告书》，广西官书局，宣统二年
《广西谘议局第一、二届会议提议、建议、决议案》，广西官书局，宣统二年
广西谘议局:《广西禁烟案汇钞》，广西官书局，宣统二年
《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广西官书局，宣统二年
《广西学务提要》，宣统三年刊本
广西都督府编印:《广西公报》，民国元、二、三年
《广西省议会第一届第一次报告书》，南宁达成印务局

三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邮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57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49),北京,三联书店,195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三联书店,1957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3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28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日）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7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李文茂资料汇编》，1959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

黎斐然、彭大雍等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二十六辑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内部），1960

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1975年铅印本

北京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北京，教育图片出版社，1968

四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光绪三年刊本

李星沅:《李文恭公文集》,同治三年刻本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光绪十二年刻本

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咸丰十年刻本

刘坤一:《刘忠诚公奏疏》,宣统元年刻本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本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民国十七年刊本

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三辑

马丕瑶:《马中丞遗集》,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辽宁作新印刷局,民国十九年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四年初版

张联桂:《问心斋学治杂录》,光绪十一年刊本

冯子材:《冯宫保军牍集要》,(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编三编第四十三辑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

夏 燮:《粤氛纪事》,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

姚 莹:《中复堂遗稿》,同治四年刊本

姚 莹:《中复堂遗稿续编》,同治四年刊本

苏凤文:《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刊本

苏凤文:《堂匪总录》,光绪十五年刊本

苏凤文:《股匪总录》,光绪十五年刊本

苏凤文:《广西昭忠录》，光绪十五年刊本
马秉良:《云谷录·云谷琐录》，咸丰刻本
覃元苏:《象州乱略记》抄本
王大作:《日新斋稿》抄本
朱　琦:《怡志堂诗初稿》，同治三年刻本
龙启瑞:《经德堂诗文集》，光绪四年刻本
王　拯:《龙壁山房文集》，光绪九年刻本
郑献甫:《补学轩集》，（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
王鹏运:《半塘定稿》，京华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
康有为:《康南海诗集》，民国二十五年印本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北平文化学社，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杨恩寿:《坦园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岑春煊:《乐斋漫笔》，（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六辑
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本
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
罗尔纲:《困学丛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局，196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局，1958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黄炎培辑:《清季各省兴学史》，（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六辑

周谈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台)三民书局,1985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邹　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增订本

游悔原:《中华民国再造史》,(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

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四辑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1959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社会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李官理:《广西》,上海,商务印书局,光绪三十一年

萧凤韶:《广西善后刍议》,(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六辑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由来及其经过》,(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六辑

高　劳:《帝制运动始末记》,(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辑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78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黄绍竑回忆录》(内部发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莫世祥:《马君武集》(190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张若龄、陈庚礼等:《广西公路史》第一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马依、舒瑞萍等:《广西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顾裕瑞、李志俭等:《北海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周春源:《广西留学史》,南宁,广西教育厅,民国二十三年

梁精华：《广西科举史话》，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广西政协文史办公室：《雷沛鸿纪念文集》，1984

徐　舸：《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黄诚沅：《蜗寄文撮》，南宁大成印书局本

李刚已编：《教务纪略》，（台）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编三编第四十五辑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1934

（法）和为贵：《广西天主教史》，香港，1925

（美）陈法言：《开路先锋在广西》，1935

梧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梧州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史料》（油印本），1959

桂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桂林地区进行侵略罪行史料》（油印本），1959

《桂南浸信会联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49年铅印本

五

（嘉庆）谢启昆、胡虔：《广西通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室据光绪十七年补刊本点校，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民国）广西通志馆：《广西通志稿》（未完稿），民国三十八年油印本

（民国）莫炳奎：《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曾唯儒：《武鸣县志》，民国四年铅印本

（民国）黄君钜等：《武缘县图经》，民国十年铅印本

（光绪）杨椿、陆生兰：《宾州志》，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朱昌奎：《宾阳县志》，1961年区档案馆铅印本

（民国）黄诚沅：《上林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叶茂茎：《龙州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陈必明：《龙津县志》，1960年区档案馆铅印本

（乾隆）朱秀：《横州志》，1983年横县文物管理所据光绪二十五年重刻本标点排印

（民国）王辑熙：《横县志》，民国三十二年抄本

（民国）陈尔训等：《永淳县志》，民国十三年抄本

（民国）黄诚沅：《隆安县志》，民国二年铅印本

（道光）王言纪、朱锦：《白山司志》，道光十年刻本

（民国）林锦臣：《那马县志草略》，1984年那马县志办印

（民国）张景星等：《崇善县志》，1962年区档案馆据民国二十七年抄本铅印

（民国）曾瓶山等：《同正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民国）梁明纶：《雷平县志》，1958年区博物馆油印本

（光绪）张灿奎：《新宁州志》，民国三年刻本

刘继辉主编：《宁明县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童健飞主编：《大新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乾隆）吴九龄、史鸣皋：《梧州府志》，同治十二年重刻本

（同治）李百龄、王栋：《苍梧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民国）李衡宙、李家诜：《苍梧县志》，1959年抄本

（民国）李树楠、吴寿崧：《昭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印本

（民国）潘宝疆、卢世标：《钟山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民国）梁培瑛等：《贺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同治）边其晋、胡毓璠：《藤县志》，同治七年刻本

（民国）何亮辅：《藤县志稿》，民国三十六年稿本

（光绪）邓文渊等：《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光绪）黄泌等：《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乾隆）黄德星、李宏济：《全州志》，乾隆三十年刻本

（民国）唐载生、廖藻：《全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蒋良术、戴毓训：《灌阳县志》，民国三年刻本
（民国）李滋繁、文同书：《灵川县志》，民国十八年石印本
（道光）周诚之：《龙胜厅志》，民国二十五年印本
（道光）谢沄、朱象珽：《义宁县志》，道光元年抄本
（光绪）全文炳：《平乐县志》，光绪十年刻本
（民国）张智林、罗玉槐：《平乐县志》，民国二十九铅印本
（民国）常存诚、骆少鹤：《恭城县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康熙）许之豫：《荔浦县志》，康熙四十八年抄本
（民国）余庆锡、曹骏：《荔浦县志》，民国三年刻本
（光绪）佚名《修仁县志续集》，光绪末年稿本
（民国）黎启勋：《阳朔县志》，民国三十二年本
谢求聚主编：《阳朔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同治）魏笃、王俊臣：《浔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光绪）夏敬颐、褚兴周：《浔州府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民国）程大璋：《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
凌崇征主编：《桂平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光绪）周寿祺：《平南县志》，光绪十年刻本
（民国）郑湘畴：《平南县鉴》，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光绪）梁吉祥：《贵县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民国）龚政、梁崇鼎：《贵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罗甫琼主编：《贵港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光绪）文德馨、牟懋圻：《郁林州志》，光绪二十年刻本
陈国河主编：《玉林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光绪）封祝唐、黄玉年：《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光绪）李士琨等：《北流县志》，光绪六年刻本
（民国）李寿祺：《北流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梁树礼主编：《北流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民国）吕濬堃、范晋藩：《陆川县志》，民国十三年刻本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光绪）华本松：《百色厅志》，光绪十七年刻本
（光绪）羊复礼：《镇安府志》，光绪十八年刻本
（光绪）颜嗣徽：《归顺直隶州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民国）王由贤、王彭年：《凌云县志》，民国三十一年石印本
（民国）杭汝琥：《西林县志书》，民国十二年抄本
（民国）岑启沃：《田西县志》，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李懋椿主编：《田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民国）龙泰任：《融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庞赓辛：《武宣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翟富文：《来宾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萧殿元等：《榴江县志》，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民国）姜玉笙：《三江县志》，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
（民国）刘策群：《象县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民国）吴瑜：《思恩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民国）黄文观：《凤山县志》，1957年区博物馆油印本
（民国）蒋晃：《东兰县政纪要》，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杨家珍：《天河县乡土志》，1967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据民国抄本影印
（光绪）梁鸿勋：《北海杂录》，香港日华印务公司，光绪三十一年
罗威：《北海市志》，1979年油印本
（民国）陈德周：《钦县志》，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
（民国）黄步青：《上思县志》，民国四年铅印本
（民国）黄知元等：《防城县志》，民国三十四年稿本（缺4章）
（民国）刘运熙、李镇中：《灵山县志》，民国三年铅印本
张树武主编：《广西通志·体育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莫敬业主编:《广西通志·地震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翟佑华主编:《广西通志·地质矿产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罗叙德主编:《广西通志·铁路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黄贤林主编:《广西通志·人口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向大有主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张宏涛主编:《广西通志·邮电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陈伯发主编:《广西通志·金融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李德韩主编:《广西通志·教育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朱名遂主编:《广西通志·宗教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黎灼仁主编:《广西通志·财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梁祥胜主编:《广西通志·统计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周国荣主编:《广西通志·海关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广西方志提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陈相因、秦邕江:《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著述目录》,民国二十三年

赖彦于等编:《广西一览》,民国二十五年

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一、二、三回),民国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

龙兆佛、莫凤欣:《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光绪)史澄等:《广州府志》,光绪五年刻本

(光绪)朱润芳等:《清远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

(民国)周赞元等:《怀集县志》,民国五年本

(同治)郑梦玉、梁绍献:《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

(光绪)梁安甸:《信宜县志》,光绪十五年本

(光绪)杨霁、陈兰彬:《高州府志》,光绪十五年本

（光绪）曾国荃等：《湖南省志》，光绪十一年刻本

（道光）郑显鹤等：《宝庆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光绪）刘长佑、刘坤一：《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刻本

（光绪）欧阳泽闿：《宁远县志》，光绪二年刻本

（光绪）周诜诒：《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光绪）胡元士：《东安县志》，光绪二年刻本

六

钟元辅：《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平南），康熙六十一年

梁瀚：《增建列圣宫碑记》（平南），乾隆十五年

林兆兰、刘桂芳等：《龙华寺实在租粮并田坵永远碑记》（桂平），乾隆十三年

福康安等：《奉爵阁部堂福大人饬禁妄报碑记》（桂平），乾隆五十五年

福康安：《奉两广部堂福公宪饬禁供应碑记》（桂平），乾隆五十五年

孙鉴：《奉两广部堂禁革碑记》（平南），乾隆五十五年

汤雄业：《奉宪加禁抽买铺贩谷米并短价派累遏籴肆扰碑记》（桂平），乾隆五十七年

汤雄业：《奉督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桂平），乾隆五十八年

冯成修：《创建粤东会馆碑记》（桂平），乾隆五十八年

佚名：《迁建旧圩义烈宫芳名银数碑记》（桂平），道光十九年）

《浔州府知府谕瑶民捕匪碑》（金秀瑶山），道光二十四年

黄体正：《重修宣里新圩三界祖庙碑记》（桂平），道光二十四年

黄体正：《安良约第一、第二碑记》（桂平），道光二十五年

费有基、张汝瀛：《永宁圩团练保甲社仓第一、二、三碑记》（桂平），道光二十四年

徐延旭、黄炳銹：《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桂平），同治六年

罗钰：《重修三界阡陌二庙碑记》（桂平），同治年间

王乾元等：《王作新墓碑》（桂平），光绪十年

徐延旭：《重修学官记》（桂平），同治六年

周鲁铿：《重修浔阳书院碑记》（桂平）

卢鼎亭：《重修沙棠村男妇殉难碑记》（桂平），同治十二年

佚名：《奉上宪禁革陋例碑记》（横州），乾隆三十九年

周镐：《引盐查禁抬价掺砂碑记》（贵县），嘉庆四年

黄锡麟等：《呈巡抚示封禁龙头诸山开矿碑》（贵县），嘉庆四年

佚名：《大河圩二十二村联村乡约碑》，（桂林）道光五年

倪文蔚：《皇清中兴圣德颂碑》（桂林），光绪九年

佚名：《新建粤东会馆碑记》（阳朔白沙），光绪八年

璞崇额等：《龙胜火药厂碑记》，（龙胜）道光十六年

温汝适：《重修粤东会馆碑记》（苍梧戎圩），乾隆五十三年

赵燮和：《岑溪县养济院新增义田碑》，（岑溪）光绪二十一年

秦焕：《清永安州知州吴江墓志铭》，（蒙山）光绪十年

徐子苓：《诰授通议大夫广西按察使司姚公（莹）墓志铭》

陈济南：《新建忠义祠兼义学碑记》（兴安），同治五年

佚名：《兴安县知事吕德慎劣政碑》（兴安），民国五年

佚名：《严禁苗区拜会碑》（融县），道光二十四年

石大亨：《天桥岩团寨碑》（融县），同治六年

佚名：《重修蒲庙武圣宫碑记》（邕宁），嘉庆九年、道光二十三年

章炳麟：《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荣廷）墓表》（武鸣），民国二十三年

卜永春：《安定司潘世侯（凤岗）墓表》（都安），光绪十四年

田骏丰：《泗邑中学堂建筑鸠工用料始末记》（百色），光绪三十二年

姚复姣等：《立禁约碑》（凌云），同治十二年

徐延旭：《重建太平府署记》（崇左），同治十年

傅超衡：《屯甲山炮台碑记》（凭祥），光绪十六年

佚名:《创建邕耀滩碑记》(宁明),光绪二十四年

马盛治:《伏波庙碑记》(关前隘),光绪二十年

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内部资料,上、中、下三册),1977年印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七

博白东平《刘氏家谱》,民国十四年

博白三滩《刘氏家谱》,民国二十三年

贵县《林光远堂族谱》,民国十九年

平南鹏化《陈氏宗支部》,民国二十五年

平南鹏化《翁氏族谱》,不注编修年月

永安壬山《陈氏族谱》,不注编修年月

临桂《李氏宗谱》,道光十五年

《廉江上县黄氏族谱》,民国二十年重修

广东花县《洪氏宗谱》(校补本),1981年

湖南《兴宁焦氏续修族谱》,民国三年

后　记

在这部书稿写完的时候，回顾过去，感到还有几句话要说。

开始写这部书稿，是在1960年。那年春夏之交，我应广西通志馆之约，到南宁参加编写《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白天和同志们一道工作，晚上各自回家。而我无家可归，独自住在馆里。那时正值困难时期，一日三餐，饮食有限，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没有条件，也无心外出寻亲访友，走街游园。幸好馆藏的地方文献资料不少，还能以挑灯夜读为乐。四个月过去了，也积累了不少资料，为写广西近代史打下了初步基础。回校以后，一面教学，一面继续读书，同时抽空动笔写作。当时所拟的纲目，是按照“三个高潮”分作三个大编设计的。到了1965年秋奉命下乡参加“四清”工作之前，第一编的6章已成初稿，共计17万多字。谁知“四清”工作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就起来了。在一片批判声中，奉“小将”之命，我把书稿交去“审查”。自以为书稿没反动，审查又何妨？结果，在那“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中，十几万字的书稿和一部分资料，也被“革”得永不归宗了！

1969年，我随“革命师生”到兴安县茶源乡接受“再教育”。几个月后，转回学校的“五七”农场劳动。蒙大家的举荐，做了受监督改造的饲养班班长的小“官”。白天和“战友”们一道劳动，晚上却空得十分无聊。那时候，史学是被视为“集封、资、修大成”、“五毒俱全”，应该予以取消的，谁还敢

去沾它的边呢？何况“监督劳动”的对象是不许乱说乱动的。但是，苦于长夜难熬；也可以说是“品性难移”、“死不改悔”吧，一有机会回到家里，我又尽自己拥有的图书资料从事“秘密活动”了。1972年离开农场以后，在“开门办学”的几年间，尽管各式各样的“批判”、“评论”、“反击”接连而来，搞得人心惶惶，而我却借下乡、入市之机，兼搞社会调查，从事资料收集的“私活”。1976年，“四人帮”垮台，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我在从事教学兼负历史系和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室行政职务的同时，开设了《广西地方史》新课，并继续广西近代历史的研究。经过近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再经过10年的补充、修订，才完成了今天这部书稿（《广西通史》第二卷）。从动笔写作到基本定稿，整整38年。因此，可以说，这部书稿的本身，就自有一部历尽坎坷的历史。

关于本书的内容，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从时间上说，本书从1840年写到1919年。我把这80年的历史，分为18章，一板书地写下去，不再划分时期，因此也不用编、章、节的体例。叙述基本是按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为经，只有几章根据内容的相类和说明的需要，采用了综合的写法。不分时期并不是说历史的发展不存在它的阶段性。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广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仔细考察广西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具体表现，则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以后，从此，法、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手段，直接干涉广西事务。广西几条江河沿岸的城乡，明显地出现了洋纱、洋布、洋油等洋货；航运、通讯、文化教育等所谓新事物，也多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民族的矿业，虽然有人多次投资兴办，但多以亏累告终。近代性质的民族工业，直至20世纪30年代，依旧是一片

空白。商业和金融业，除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外，前者多操纵在粤商和湘商手中，后者则为晋、粤、闽、赣各帮所包办。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直至20世纪初期，才有不足100公里的公路。公路的修建不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是出于军阀生活的需要。在沿江和沿边的一些城乡，自然经济结构虽然出现了被分解的迹象，而在广大的内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和山区，自然经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在整个广西近代史时期，封建的自然经济和文化远远胜于近代工业经济和文化。这是广西近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众多的农民破产失业。而湖南、广东等省游民的大量涌入，又加速了广西社会的动荡不安，是以人民造反和官府镇压之事时有发生。中英鸦片战争后的20多年，以天地会为核心，有粤、桂、湘等省人民参与的反清事件延续不断，建号称王之事屡有出现。在此期间，又爆发了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撼动了广西半壁江山，出现了全国人民起义的高潮。继之是援越抗法的战争和跨世纪的会党大起义，还有为数甚多、遍及全省各地的“民教冲突”事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随之而起的却是陆荣廷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他假拥护革命之名，行破坏革命之实；在赞成民主共和的幌子下，建立军阀独裁统治。他一面通过增加捐税，清理田赋等手段，加强对人民的盘剥；一面通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扩大桂系的地盘和实力，因此也就给广西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祸害。由此可以看到：一部为时80年的广西近代史，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社会的战乱和遭受破坏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既不可能，而人民因饱受苦难也练就了不甘屈服，勇于抗争的性格。据此可以说：动乱多于安定，“武化”

盛于“文化”，是广西近代社会的又一基本特点。

如上所述的两个基本特点，无论是各个时期的官文书，各个事件的有关资料汇编，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书和私家著述，还是在社会调查中看到的谱牒、碑刻和听到的口碑中，都有大量的反映。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我用了较多的篇幅，写了近代广西的政治和社会战乱，同时根据掌握的史料，写了这个时期广西的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和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书稿从写作到完成，虽然历时数十年，而且几经修订，但是，由于个人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有限，加以见识不广，书中的错误与不及肯定存在。我期望得到史学同行和读者朋友们的指教，待有机会时得以增补和改正。

最后需要说明，我在写作这部书稿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广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心与鼓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朱从兵和廖勤，研究生邱允生和罗婧等同志，为我打印和校对书稿；我的老伴张玉霞同志不论在我遭受劫难的最为艰难的时刻，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都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不少史学同仁在我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合作与支持；在我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科研院所及图书馆的帮助；在我深入社会调查时，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与无私的帮助。此外，我还参考了各地发表的有关科研成果。因此，这部书稿的完成和得以出版，是和大家的帮助分不开的。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钟文典

1998年2月18日